

泉州宗教石刻

(增订本)

吴文良 原著

吴幼雄 增订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泉州宋元石刻

卷之三

宋元石刻

宋元石刻

宋元石刻

泉州宗教石刻

(增订本)

吴文良 原著

吴幼雄 增订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汇集泉州地方遗存古代宗教建筑和坟墓的石刻遗物，分别属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以及佛教、道教及其他民间信仰，以文物照片、拓本、文字说明、资料辑录、考证、专题论述及古阿拉伯文字的释译，为研究古代社会历史、宗教、艺术、中外交通、中外古文字和宋元以来外国人在泉州一带的活动提供了极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展示了泉州作为古代东方最大商港的特殊风采。本书于1957年初版，此后作者以数十年的努力进行增订，内容扩充数倍，为地方考古工作树立了榜样。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美术史和中外交通史的专家学者以及相关专业的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吴文良原著；吴幼雄增订.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ISBN 7-03-015528-9

I. 泉… II. ①吴… ②吴… III. 寺庙-石刻-泉州市 IV. 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8408 号

责任编辑：黄文昆 孙 莉 / 责任校对：李奕萱

责任印制：钱玉芬 / 封面设计：王 浩

书名题签：郑振铎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5年5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5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42 1/2

印数：1—1 500 字数：977 000

定价：35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序　一

幼雄按：陈梦家先生（1911～1966年）是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生前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部副主编，曾分管《泉州宗教石刻》编辑工作。《泉州宗教石刻》编辑完毕时，先生热情撰写《编辑后记》。付印出版之际，陈先生被打成“右派分子”，《后记》也被粗暴抽掉。1979年，陈先生右派错案得到平反，先生撰写的《后记》理应再受尊重、重新发表，故收入本书，为序一，并借此寄托我们对陈先生的哀思。

考古学的资料，可以供给历史研究以实物的佐证，不仅限于古代的，对于本国与外国、少数民族以及近世的历史同样有所帮助。民族考古正在开始，对于重写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一宗重要的依据；鸦片战争以来，近代史的研究已经在实物、遗址的许多发现上得到更详尽的史料。我国沿海商港在中古时代与海外的贸易与交通，向来还没有足够的注意，尤其有关实物的记载并不很丰富。

吴文良先生生长在泉州，并且在泉州从事教育工作，二十余年来在教课之余关心本地乡梓为人所疏忽的古物遗存，并以一己之力调查搜集，累积成了一批很重要的资料。泉州是宋、元时代南方一大商港，许多外国商人市舶于此，亦有留居于此的，他们的坟墓石刻和宗教建筑的遗物，对于研究当时的交通、宗教、中亚文字和宗教艺术，都是第一手的资料。吴文良先生曾以初步整理的结果，寄给考古研究所，我们认为有及早发表的必要，因邀请他北来作短期的勾留。在考古所期间，凡有关费事查考的书籍，曾由夏鼐先生帮助；编写说明与编订图版则由考古所编辑室同志协助；完稿以后又经郑振铎先生审阅，并为题字。这本书将先以图录的形式出版，所以在文字说明方面只能力求简明。阿拉伯文字的翻译，有一部分曾由马坚等先生翻译。但这些译文，也还只是初步的试译，希望本书出版以后可供文字学者研究。

由于向来研究这一方面的人不多，这批重要的资料未能更彻底地加以研究。我们相信，由于此书的出版，可以引起学者的注意，从而进一步地研究它。

这本图录是吴文良先生二十年来的心血，我愿意在此提出两点值得我们钦佩之处。一是从事地方考古。关于乡梓的文献遗物，以一人一手之力，孜孜不息地作此寂寞之学。这种精神是极可贵的。倘使有许多人都能如此，我想许多地方为人所不注意的考古资料，可以赖以保存。我国历史悠久，土地辽阔，地方考古是很可以有丰富的收获的。二是吴文良先生乃业余的考古工作者，他青年时代专攻生物学，后来在中学担任历史教学，乃以余力做地方考古的工作。对于考古，他虽非专业，然而以钻研专业的精神，刻苦自学，愈久愈勤，而谦虚下怀，不以不知为知，肯于请教学人。这种毅力是极可贵的。倘使有许多人都能从事业余考古，那么中国考古学的前途更要可观了。

我昔日年少之时，游观开封，古代景教遗存虽已无存，而犹太遗族的形象，在市民之中尚

泉州宗教石刻

可偶见一二。我们若不及时加以调查研究，则年代愈久，考溯有所不能。今见此书，则泉州宗教遗物，凡其见闻所及的，无不尽力以求，真是令人欣慰。若能本此书的体例，推而广之，则其他各地的宗教刻石，或者仍有见存。凡此发掘、保存和深入研究，都是我们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责无旁贷的。我于此学，极为荒疏，但很久前曾对宗教史的研究有过兴趣，此次因吴文良先生来所的机会，得以获得许多见闻，故于此书编辑完毕之时，缀此数语。

陈梦家

1956年11月

序二

《泉州宗教石刻》从 1957 年原著出版到 2005 年增订本付印，前后历时四十八年。在这四十八年间，原著者为此书遭受迫害致死，增订者为此书历尽艰难曲折，原定夏鼐先生撰写序言，现在却由我代庖，皆事非得已也。原来在 1980 年，原著吴文良先生哲嗣幼雄来京增订此书时，夏鼐先生曾欣然惠允为增订本写“序”，没有料到书未编成，而夏先生竟于 1985 年 6 月西归，未能为这部晚出的书写“序”。承幼雄雅意，要我来完成夏先生生前许下的诺言。因为夏先生是我进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以后的导师，而文良父子又同是我的知交，我对这部书的编撰过程也比较清楚，有了这几层关系，故不避代庖之嫌，毅然接受这项重托。

事情还得从我与吴氏父子的关系和夏鼐先生决定出“增订本”说起。

吴文良先生，早年攻读于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在泉州市区各中学任教，为谋生计，先后或同时讲授生物、历史、英语、国文等多种课程，因学识广博，富有教学经验，深受学生爱戴，享誉泉州学界。20 世纪 40 年代，我到泉州念中学，虽然无缘亲聆教诲，但闻其大名，并略知他收集研究古代石刻，心仰慕焉。而真正结识吴先生是在 1955 年春节期间。当时，我第一次从北京回老家（位于紧邻泉州的南安县属农村）省亲。临行前，夏鼐师嘱咐我到吴先生家看看他所收藏的宗教石刻，并说郑振铎先生（时任我所所长）曾到他家看过，有意出版这批石刻资料。翌日，郑先生来所上班，知道我要回家看吴先生收藏的石刻，向我介绍了这批石刻的大致内容，并面示帮助编撰出版的一些想法。我返家省亲后几天，即去吴府拜谒。文良先生对我这个学生辈的远道来访者，视为旧友，一见如故。从收集石刻的缘由，收集过程中的艰辛，以及编撰近况，都作了详尽的介绍。他那真挚、热情、坦率的天性，以及对事业的奉献精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此后，为了这批石刻的编撰出版，我们书信不断。1956 年，先生应邀来京编撰是书，我们朝夕共处，切磋问难，遂成忘年交。

1957 年，《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当地党政领导考虑到吴文良的专长，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泉州宗教石刻研究，安排他到筹建中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工作。吴先生一到海交馆，便积极参加筹建，全身心地投入文物事业中，先后参与灵山圣墓维修、九日山祈风石刻整理和陈埭回族调查。他的学术成就，也在这期间臻于成熟。1965 年，夏鼐先生有感于《泉州宗教石刻》主要属资料性著录，编撰时间过短，内容稍显单薄，研究深度不够。当得知文良先生这时已受聘为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特约研究员，可以有较好的工作条件和较多的时间从事研究，立即去信建议增订原著，要求增收石刻资料，扩大研究课题，提高研究水平，变原著的资料性为主为资料性与学术性并重的增订本论著。文良先生接信后欣喜若狂，随即着手对原著进行增补修订。1966 年 5 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神州陆沉，吴先生的增订工作被迫中断，文稿部分散失，先生身心遭到极大摧残。我亦身处逆境，无法再同他联系。1968 年 4 月，我趁“革命造反派”大分裂的间隙时机，潜返故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

泉州宗教石刻

悄悄地摸到先生家。这时,吴文良先生虽然忧心忡忡,但自问历史清白,平生不作亏心事,幻想劫难不久将成过去。我对时局的严重性也缺乏认识,只劝慰几句就告辞了。万万没有想到,我的这次私访,与先生竟成永诀。原来在我私访后不久,时局再度恶化,先生被送去德化集中营(美其名曰“学习班”),厄运随之降临,祸根竟出在《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上。原来在该书出版后,海外一些学者曾就书中的某些问题与吴先生进行书信商榷,造反派竟据此诬为罪证,采用高压的逼供信手段,把先生打成“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对先生施行残酷的严刑拷打,直至被迫害致死。时在1969年6月7日,终年67岁。这桩草菅人命的消息,我到1974年才从一个同乡的来信中获悉。

1975年春,夏鼐先生恢复人身自由,重新主持考古研究所工作。当他得知文良先生被迫害致死,曾表示无限愤慨,嘱我转告文良先生家属设法抢救他的遗稿,准备将来出版增订本。1977年春,我出差福建,又一次登临吴府,接待我的便是幼雄。返京后,我向夏先生汇报吴先生身后情况及其子幼雄可以继承父业,续成遗著的有利条件。夏先生表示满意,于是在1980年7月邀请幼雄来京进行这项工作。从此,我又同幼雄结下私谊,成了吴家父子的知交。

幼雄受家学的熏陶,童稚时即酷爱文史。及长,就读于福建师范学院历史系。1958年毕业后,先后在泉州第七中学、泉州师范专科学校、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从事教研工作,曾任教授、系主任、所长职务。其父在日,他即襄助研治这批石刻兼及古代海外交通史。文良先生物故后,他以继承其父的遗业为己任,用心愈加刻苦。由于他有较好的业务基础,谨严求实的治学态度,又得到夏先生的随时指导,编撰得心应手,进展顺利。书中古阿拉伯文的释读破译,经夏先生推荐,由古阿拉伯文专家华维卿先生担任,也取得圆满成果。到1981年春季,增订本的编撰工作已基本完成。

编撰基本完成后,本应再接再厉,一举克成,孰料在要求补拍石刻照片时,竟遭到收藏吴先生捐献石刻单位某些人的阻挠,增订本书稿被迫搁置。

转眼到了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学术考察活动在泉州举行。参与活动的中外学者,在缅怀为我国海外交通史的资料搜集和研究都做出突出贡献的吴文良先生时,强烈要求再版《泉州宗教石刻》,以应各界需求。进入本世纪,中外学者的殷切期望得到福建省政府和泉州市政府的支持与资助,原出版《泉州宗教石刻》的科学出版社也热情表示要为增订本的出版尽力。再版条件至此俱备,又经幼雄同志费时一年多的辛勤劳动,增订本终于脱稿付梓。消息传来,不胜欣慰。在增订本脱稿付梓之际,我有幸作为本书的第一名读者,感慨良多,谨就阅读所及略叙一二。

首先让我想到的是吴文良先生的献身精神和夏鼐先生对本书的关注。

文良先生热爱乡土,情系古代宗教文化,深知外来宗教石刻遗物对于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以及海外交通史的重要价值。从1928年起,就以一介中教身份关心调查搜集和研究遗留在泉州的各类宗教石刻。在艰苦的经济条件下,不顾世俗的鄙视,利用课余时间,或师友群众帮助,自费搜集或出资购买,然后运回家中保管。1954年和1959年,先后把历年搜集的各类宗教石刻近二百万无私捐献出来,为国家保存了一批弥足珍贵的文化财产,成为收藏这批石刻

博物馆的镇馆藏品。他的无私奉献精神,应该永远受到后来人的敬重,面对这部倾注了文良先生毕生心血并为之献出生命的书稿,倍添肃然起敬之情。夏鼐先生自始至终关心《泉州宗教石刻》的编撰出版,并亲自做了一些研究,如果没有夏先生的关注安排,原著的编撰出版和增订本的编撰,恐怕都难于实现。在增订本付梓之际,我们更加怀念吴夏二先生。二位先生在天有知,当会感到宽慰吧。

宋元时期,泉州是当时全国六大都市之一,一度跃居为“梯航万国”的东方第一大港。繁荣发达的海外交通,招徕数以万计的外国人到这里侨居或定居。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含天主教)、犹太教、婆罗门教(印度教)和摩尼教(明教)等多种宗教。与长期流传于泉州的本土道教、民间信仰以及地方儒教文化和平相处,按照各自的教门特点、民族特点,兴修教堂、寺院,广造邸宅、铺店,营建坟墓、茔域。泉州成了一座古代神学文化的宝库。元末泉州惨遭亦思巴奚兵祸,元气大伤,加以明清实行海禁政策,泉州港没落。昔日的繁华景象,俱成历史陈迹。各种宗教石刻,散处荒郊野地、街衢闾巷,时有被发现者。除文良先生收录在原著的二百万方以外,继文良先生之后,泉州的文博部门和幼雄同志也尽力调查搜集发掘,又有不少新的发现,其中大部分被增订本所采录。我把增订本书稿,同1957年出版的原著作了初步比较,发现增订本收集的实物资料比原著有了极大的丰富,研究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粗略估算,实物图片比原著增加三倍多,文字增加四倍多。而且增加了全部古阿拉伯文的释文、译文,这是原著所无的。可以认为,增订本的出版,不但为研究宋元泉州与阿拉伯、南亚诸国的交通史、贸易史、文化史、艺术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为古阿拉伯文的辨识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例如,书中收集的三百多方古伊斯兰教墓碑,经翻译,得知墓主来自阿拉伯、也门、阿曼、波斯、叙利亚、土耳其、花剌子模、伊拉克、里海地区和布哈拉等地。他们的身份有贵族、传教士、官员、商人、技艺人直至一般平民和奴婢。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直系后裔赛典赤·杜安莎,波斯宰相撒都丁的爱女法蒂美,便是其中最著名的两人。在收集的七十多方元代泉州基督教墓碑中,发现有古拉丁文,蒙古八思巴文,古叙利亚文,古叙利亚字母拼写的突厥语,回鹘文以及未被认识的文字和汉字。从墓碑文字和碑额形式判断,当时泉州的基督教有聂斯脱利教派(即景教)和圣方济各会派(罗马的天主教)。此外,书中还收集大批文献无征的古印度婆罗门教雕刻,以及全国惟一保存至今的元代摩尼教寺和摩尼坐姿雕像。这批宗教石刻的出土情况及其历史意义,书中都有明确交代和阐述。这批石刻资料,是这些教门在泉州活动的最忠实的历史见证。作者对其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碑文,做了精辟的考证,为泉州史及其海外交通史的研究,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还应该提到,原著以大量实物资料进一步证明中世纪名噪一时的古刺桐港确是今泉州港,赢得海内外学者的认同。“泉州”一名广为人知。1982年泉州被列为国务院第一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随后,又列为对外开放城市。随着泉州经济腾飞,文化昌盛,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和增订本的出版,必将吸引更多的海外游客和台港同胞的兴趣。他们要来这里访古寻幽,领略这座曾经是古代世界东方最大商港而又充满古代世界神学色彩的真面目。观摩“市井十洲人”创建的各种宗教遗迹遗物,一睹重振古刺桐港的海运经贸文化风采。可以预

泉州宗教石刻

期,泉州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友好往来,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度出现。吴文良父子精心收藏和编撰的泉州宗教石刻资料及其研究成果,必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

黄展岳

1988年9月初稿于北京朝阳门苇舍

2005年春节修订于木樨园寓所

目 录

序一.....	陈梦家
序二.....	黃展岳
绪言.....	1

第一部分 泉州古伊斯兰教

一、泉州伊斯兰教寺和“拱拜尔”石刻	8
A 1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平面图、正立面图、门楼纵剖面图和门楼仰视图	8
A 2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	9
A 3 通淮街清净寺大门	11
A 4 通淮街清净寺大门第一层穹顶和穹顶下两侧石墙上的双重尖拱形假门	12
A 5 通淮街清净寺大门第二层穹顶及穹顶下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14
A 6 通淮街清净寺进口大门甬道圆顶盖及圆顶盖下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15
A 7 清净寺大门甬道后石墙上元代阿拉伯文字修寺石刻	15
A 8 明正德二年《重立清净寺碑》	16
A 9 明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	18
附录:	
一、李光缙《净寺纪序》	20
二、李光缙《重修清净寺募缘疏》	20
A 10 清净寺礼拜堂正门	22
A 11 清净寺礼拜堂临街石墙上八个方形窗和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22
A 12 清净寺礼拜堂内的石壁龛和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22
A 13 清净寺礼拜堂内的石壁龛	22
A 14 清净寺永乐五年上谕碑	27
A 15 礼拜堂西面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28
A 16 礼拜堂奉天坛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28
A 17 也门人奈纳·乌马尔修建清净寺碑记	29
A 18 拉吉·艾比克里姆重修清净寺碑记	31
A 19 穆罕默德修清净寺碑记	32
A 20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33

泉州宗教石刻

A 21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34
A 22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35
A 23	古伊斯兰教寺门楣石	36
A 24	古伊斯兰教寺门楣石	37
A 25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枢石	38
A 26	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38
A 27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碑刻	40
A 28、A 29	古伊斯兰教寺碑石	41
二、泉州东郊伊斯兰教灵山圣墓		42
A 30、A 31	东塘头元代丁节斋墓碑	42
附录：鹿园祖墓文契		45
A 32	20世纪20年代的泉州东郊灵山圣墓及碑记	48
A 33	灵山圣墓元代阿拉伯文修墓碑记	50
A 34	20世纪修缮前的灵山圣墓	50
A 35	20世纪60年代初修缮后的灵山圣墓	51
A 36	灵山圣墓郑和下西洋行香碑记	52
附录：		
一、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		54
二、郑和在锡兰所立碑		56
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		56
A 37	灵山圣墓古伊斯兰教徒墓葬区之一角	57
A 38	灵山圣墓康熙五十一年《重修先贤墓碑》	58
A 39	乾隆十六年修圣墓碑记和乾隆四十八年修圣墓碑记	58
A 40	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温陵圣墓碑记》	59
A 41	同治十年重修圣墓碑记	60
三、泉州古伊斯兰教墓碑		61
A 42	格兹威尼斯人吐特卡墓碑	61
A 43	哈只·×××墓碑	62
A 44	布哈拉人埃米尔·赛典赤·杜安沙墓碑	64
A 45	赛典赤·杜安沙墓碑	67
A 46	艾哈迈德墓碑	68
A 47	尼纳·穆罕默德墓碑	69
A 48	格兰塔·特勤墓碑	70
A 49	大长老×××墓碑	71
A 50	格兹威尼斯人侯赛因墓碑	72
A 51	乌马儿教长墓碑	72

目 录

A 52	大不里士人叶海亚丁墓碑	73
A 53	花刺子模人夏菲墓碑	74
A 54	赫瓦杰·加麦尔丁墓碑	75
A 55	哈只·本·艾阿法贝克墓碑	75
A 56	瞻思丁墓碑	76
A 57	可敦·本·哈桑墓碑	77
A 58	法蒂美墓碑	78
A 59	德黑兰人海迪杰墓碑	79
A 60	伊斯法罕人拜赫莱旺·亚南墓碑	81
A 61	法蒂美可敦墓碑	82
A 62	萨阿德拉墓碑	82
A 63	古伊斯兰教墓碑	84
A 64	艾卜法蒂美墓碑	85
A 65	古伊斯兰教墓碑	85
A 66	古伊斯兰教墓碑	86
A 67	古伊斯兰教墓碑	87
A 68	哈瓦杰·阿里墓碑	88
A 69	施那威人哈只·赫瓦杰·侯赛因墓碑	89
A 70	大不里士人瞻思丁·穆罕默德墓碑	90
A 71	胡斯娜·易司马仪小姐墓碑	90
A 72	黄公墓百氏坟墓碑	91
A 73	古伊斯兰教墓碑	92
A 74	古伊斯兰教墓碑	93
A 75	穆罕默德·本·迈斯乌德墓碑	94
A 76	蕃客墓——阿卜杜拉·阿里·穆罕默德·本·哈桑墓碑	95
A 77	哈拉提人侯赛因墓碑	97
A 78	元郭氏世祖坟茔碑	98
A 79	施那威人伊卜拉欣墓碑	100
A 80	阿布贝克尔墓碑	100
A 81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1
A 82	哈马丹人赛义德×××墓碑	103
A 83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3
A 84	范夏赫之女海迪杰墓碑	104
A 85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4
A 86	费赫里·易卜拉欣长老墓碑	105
A 87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6

泉州宗教石刻

A 88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6
A 89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7
A 90 ×××贝克尔墓碑	108
A 91 古伊斯兰教墓碑	109
A 92 永春县达鲁花赤墓碑	109
A 93 潘总领墓碑	111
A 94 古伊斯兰教墓碑	113
A 95 哈只·纳萨衣之女法蒂美墓碑	114
A 96 古伊斯兰教墓碑	114
A 97 古伊斯兰教墓碑	115
A 98 古伊斯兰教墓碑	115
A 99 古伊斯兰教墓碑	116
A 100 古伊斯兰教墓碑	116
四、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17
A 101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17
A 10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18
A 103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18
A 104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19
A 105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0
A 106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0
A 107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1
A 108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2
A 109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2
A 110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3
A 111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4
A 11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4
A 113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5
A 114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6
A 115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6
A 116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7
A 117 穆萨之女法蒂美墓塔石	128
A 118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9
A 119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29
A 120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30
A 121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30
A 12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131

目 录

A 123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2
A 124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2
A 125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3
A 126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3
A 127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4
A 128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4
A 129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5
A 130 須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136
A 131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6
A 132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7
A 133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7
A 134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7
A 135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8
A 136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8
A 137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9
A 138 須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139
五、泉州古伊斯兰教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39
A 139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39
A 140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0
A 141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0
A 142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1
A 143 格茲威尼人薩德爾丁·艾哈邁德墓石构件	142
A 144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2
A 145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3
A 146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3
A 147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4
A 148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4
A 149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5
A 150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5
A 151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6
A 152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7
A 153 哈米德丁之女法蒂美墓石构件	147
A 154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8
A 155 須弥座式石墓构件	149
A 156 古伊斯兰教墓碑	149
六、泉州明代抱鼓石和云月形墓碑	150

泉州宗教石刻

A 157	泉州明代抱鼓石	150
A 158	泉州明代抱鼓石	150
A 159	泉州明代云月形墓碑	151
A 160	泉州明代云月形墓碑	152
A 161	泉州明代云月形墓碑	152
A 162	泉州明代云月形汉式墓葬	153
七、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3
A 16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3
A 164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5
A 165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6
A 166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7
A 167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7
A 168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8
A 169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8
A 170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8
A 171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9
A 172	贾尔杰尔姆人古图布丁·雅各布墓墓顶石	159
A 17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59
A 174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60
A 175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160
八、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160
A 176	须弥座式石墓	160
A 177	须弥座式石墓	161
A 178	须弥座式石墓	161
A 179	须弥座式石墓	162
A 180	暂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内的须弥座式石墓	163
A 181	暂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内的须弥座式石墓	163
A 182	须弥座式石墓	163
A 183	须弥座式石墓	164
A 184	须弥座式石墓	164
A 185	须弥座式石墓	165
A 186	须弥座式石墓	165
A 187	须弥座式石墓	166
A 188	须弥座式石墓	166
A 189	须弥座式石墓	167
A 190	须弥座式石墓	168

目 录

A 191	须弥座式石墓	168
A 192	须弥座式石墓	169
A 193	须弥座式石墓	170
A 194	须弥座式石墓	170
A 195	须弥座式石墓	171
A 196	须弥座式石墓	172
A 197	须弥座式石墓	172
A 198	须弥座式石墓	173
A 199	须弥座式石墓	173
A 200	施那威人迈哈茂德墓	174
A 201	须弥座式石墓	175
A 202	须弥座式石墓	175
A 203	须弥座式石墓	175
A 204	须弥座式石墓	176
A 205	须弥座式石墓	176
A 206	须弥座式石墓	177
A 207	须弥座式石墓	177
A 208	须弥座式石墓	179
A 209	须弥座式石墓	179
A 210	须弥座式石墓	180
A 211	须弥座式石墓	180
A 212	须弥座式石墓	180
A 213	须弥座式石墓	181
A 214	须弥座式石墓	181
A 215	须弥座式石墓	182
A 216	须弥座式石墓	182
A 217	须弥座式石墓	183
A 218	须弥座式石墓	183
A 219	须弥座式石墓	184
A 220	须弥座式石墓	184
A 221	须弥座式石墓	185
A 222	须弥座式石墓	185
A 223	须弥座式石墓	186
A 224	须弥座式石墓	186
A 225	须弥座式石墓	186
A 226	须弥座式石墓	187

泉州宗教石刻	
A 227 須彌座式石墓	188
A 228 須彌座式石墓	188
A 229 須彌座式石墓	189
A 230 須彌座式石墓	189
A 231 須彌座式石墓	189
A 232 須彌座式石墓	190
A 233 須彌座式石墓	190
A 234 須彌座式石墓	191
A 235 須彌座式石墓	191
A 236 須彌座式石墓	192
A 237 須彌座式石墓	192
A 238 須彌座式石墓	193
A 239 須彌座式石墓	193
A 240 須彌座式石墓	194
A 241 須彌座式石墓	194
九、惠安百奇回族郭氏和东园回族郭氏須彌座式石墓	195
A 242 郭仲远墓文物保护碑	195
A 243 百奇回族郭仲远墓	195
A 244 百奇回族郭仲远夫妇墓	196
A 245 百奇回族乡接官亭	197
A 246 百奇回族郭仕初夫妇墓	198
A 247 百奇回族須彌座祭坛式墓塚石	198
A 248 百奇回族須彌座式石墓	199
A 249 百奇回族須彌座式石墓	200
A 250 百奇回族須彌座式石墓	200
A 251 百奇回族須彌座式石墓	201
A 252 百奇回族須彌座式石墓	201
A 253 东园镇后海村回族郭氏須彌座式石墓	202
十、洛江区杏宅村回族郭氏須彌座式石墓和石碑	203
A 254 杏宅回族郭氏須彌座式石墓	203
A 255 杏宅回族郭氏須彌座式石墓	203
A 256 杏宅回族郭氏須彌座祭坛式墓塚石	204
A 257 杏宅回族郭氏“永结汉回缘”碑	204
A 258 杏宅回族《郭氏家庙重修记》碑	205
十一、泉州德济门城基出土須彌座式墓墓顶石	206
A 259 德济门城基础遗址	206

A 260 德济门城东侧城基础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7
A 261 德济门瓮城东侧城墙基础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7
A 262 德济门东侧城墙基础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8
十二、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保存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8
A 26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8
A 264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9
A 265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10
A 266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10
十三、泉州津淮街拓改工程出土的须弥座式石墓	211
A 267 通淮门外津头埔的须弥座式石墓	212
A 268 通淮门外津头埔的须弥座式石墓	213
A 269 通淮门外津头埔的须弥座式石墓	213
十四、石狮市博物馆保存的须弥座式石墓	213
A 270 须弥座式石墓	213
A 271 须弥座式石墓	214
A 272 须弥座式石墓	215
A 273 须弥座式石墓	216
十五、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的须弥座式石墓和寺内考古发掘现场	216
A 274 通淮街清净寺保存的须弥座式石墓群	216
A 275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南墙基址清理出的石柱和础石	217
A 276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西墙基址清理出的墙基础和铺地砖	218
A 277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西南角清理出的墙基础、排水沟和铺地砖	218
A 278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西北角清理出的南宋铺地砖	219
A 279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南墙中部清理出的铺地砖	219
A 280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清理出的磉墩	219
十六、新增古伊斯兰教清净寺石墓和墓碑	220
A 281 花剌子模人穆罕默德墓碑	220
A 282 瓮蛮人阿卜杜拉墓碑	221
A 283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2
A 284 陈埭回族丁氏四世祖墓碑	223
A 285 哈只·阿卜杜拉墓碑	223
A 286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4
A 287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5
A 288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5
A 289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5

泉州宗教石刻

A 290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6
A 291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6
A 292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7
A 293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8
A 294	古伊斯兰教墓碑	228
A 295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29
A 296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0
A 297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0
A 298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1
A 299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2
A 300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3
A 301	布哈拉人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3
A 30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4
A 303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4
A 304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5
A 305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5
A 306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6
A 307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37
A 308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237
A 309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238
A 310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38
A 311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39
A 312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39
A 313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40
A 314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40
A 315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41
A 316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241
A 317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42
A 318	通淮街清净寺“真门”石刻	242
A 319	通淮街清净寺“圣泉”石刻	243
A 320	通淮街清净寺“蹑云”石刻	243
A 321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43
A 32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244
A 32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45
A 324	古伊斯兰教墓碑	245
A 325	古伊斯兰教“云月”墓碑	246

目 录

A 326 须弥座式石墓	246
A 327 须弥座式石墓及墓顶石	247
A 328 须弥座式石墓	248
A 329 须弥座式石墓	249
A 330 须弥座式石墓	249
A 331 须弥座式石墓	250
A 332 须弥座式石墓	250
A 333 须弥座石墓墓顶石	251
A 334 须弥座式石墓	251
A 335 须弥座式石墓群	252
A 336 须弥座式石墓群	253
A 337 须弥座式石墓群	254
十七、泉州古代外国人石墓种类简介	254
A 338 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255
A 339 泉州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255
A 340 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256
A 341 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257
A 342 泉州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	257
附录:泉州古代外国人墓葬区分布概况	258
十八、泉州古伊斯兰教史料和回族史料摘抄	262
(一) 夏宣武将军墓志铭	262
(二)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七,拾遗(摘抄)	262
(三) 泉州蒲氏族谱摘抄	266
(四) 泉州《清源金氏族谱》摘抄	268
(五) 李贽家族谱牒和墓圹志摘抄	270
(六) 陈埭丁氏族谱摘抄(明万历二十二年抄本)	273
(七) 百奇郭氏族谱摘抄	273
(八) 燕支苏氏族谱摘抄	274
(九) 乾隆《泉州府志》摘抄	274
(十) 泉州回族概况及其葬俗	275
十九、泉州古伊斯兰教论丛	吴幼雄 277
(一) 蒲寿庚家族事迹考评	277
(二)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286
(三) 陈埭丁姓回族的渊源与启示	290
(四) 百奇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	296
(五) 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	304

第二部分 泉州古基督教

一、泉州古基督教石刻	365
B 1 古基督教墓碑	365
B 2 古基督教墓碑	365
B 3 古基督教墓碑	366
B 4 跌坐羽翼天使墓碑	366
B 5 跌坐羽翼天使墓碑	367
B 6 古基督教墓碑	368
B 7 羽翼双飞使墓碑	368
B 8 古基督教墓碑	369
B 9 古基督教墓碑	369
B 10 《唐景教碑颂正诠》中的泉州古十字架石碑	370
B 11 《唐景教碑颂正诠》中的泉州古十字架石碑	371
B 12 《唐景教碑颂正诠》中的泉州古十字架石碑	371
B 13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372
B 14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373
B 15 古天主教安德鲁·佩鲁亚斯主教拉丁文墓碑	373
B 16 古天主教徒海田拉丁文墓碑	376
B 17 高昌城人乌斯提克·塔斯汗墓碑	377
B 18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79
B 19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0
B 20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1
B 21 古基督教墓碑	382
B 22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4
B 23 也里可温教徒贵妇玛尔达公主墓碑	384
B 24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7
B 25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8
B 26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8
B 27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8
B 28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89
B 29 古基督教墓碑	390
B 30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90
B 31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391

目 录

B 3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392
B 33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393
B 34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393
B 35	古基督教墓碑	394
B 36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395
B 37	元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失里门主教墓碑	395
附录:日本村山七郎氏致郭沫若先生的信		401
B 38	古基督教墓碑	403
B 39	大德黄公墓碑	404
B 40	侍者长柯存诚墓碑	405
B 41	叶氏墓志碑	406
B 42	易公刘氏墓志碑	407
B 43	凯珊·居延女儿云之墓志碑	408
B 44	翁叶杨氏墓道碑	409
B 45	古基督教墓碑	411
B 46	古基督教墓永思碑	411
B 47	戴舍王氏十二小娘为故妣二亲立墓碑	413
B 48	古基督教墓碑	416
B 49	古基督教墓碑	417
B 50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417
B 51	元代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兴明寺住持吴唆哆呢唎书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418
B 52	须弥座式石墓	421
B 53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421
B 54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422
B 55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422
B 56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423
B 57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3
B 58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4
B 59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4
B 60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5
B 61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6
B 62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6
B 63	须弥座式石墓	426
B 64	须弥座式石墓	427
B 65	德济门瓮城基础中的建筑石柱	427

泉州宗教石刻

B 66	德济门瓮城东侧基础中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28
B 67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31
B 68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432
B 69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432
B 70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433
B 71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434
B 72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434
B 73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434
B 74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435
B 75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436
B 76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436
二、附录		437
(一)	元代在泉州的基督教派别	437
(二)	未经拍摄的十字架石刻	438
(三)	关于元代泉州安德肋所建天主教堂的遗址问题	439

第三部分 泉州古摩尼教(明教)

一、泉州古摩尼教石刻		441
C 1	晋江华表山元代草庵摩尼教遗址	441
C 2	晋江华表山元代草庵石雕摩尼佛像	441
C 3	晋江华表山草庵明代崖刻	442
C 4	晋江华表山草庵元代碑记	443
二、附录		444
泉州晋江华表山元代草庵及摩尼教的研究		444

第四部分 泉州古印度教

一、泉州古印度教石刻		449
D 1	印度教寺石匾额	449
D 2	半兽半鸟形门楣石	449
D 3	半兽半鸟形门楣石	450
D 4	印度教寺石横枋	451
D 5	印度教寺门框石	451
D 6	印度教寺门框石	452

目 录

D 7	毗湿纽石造像	453
D 8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古印度教石柱	453
D 9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古印度教石柱	457
D 10	挹伯鲁马尔创建湿婆神庙泰米尔文字碑记	460
D 11	天妃宫寢殿前廊古印度教石柱	462
D 12	天妃宫寢殿前廊古印度教石柱	463
D 13	古印度教石柱	464
D 14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464
D 15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465
D 16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466
D 17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466
D 18	半兽半鸟形石刻	466
D 19	印度教寺钩栏板万字石刻	467
D 20	希腊式柱头石	467
D 21	希腊式柱头石	468
D 22	希腊式柱头石	469
D 23	直角形转角柱头石	469
D 24	希腊式柱头石	470
D 25	希腊式柱头石	470
D 26	希腊式柱头石	471
D 27	希腊式柱头石	471
D 28	希腊式柱头石	471
D 29	印度式柱头石	471
D 30	印度式柱头石	472
D 31	印度式柱头石	473
D 32	印度式柱头石	474
D 33	印度式柱头石	474
D 34	印度式柱头石	474
D 35	兽面形柱头石	475
D 36	兽面形柱头石	476
D 37	兽面形石刻	477
D 38	兽面形石刻	478
D 39	印度式柱头石	479
D 40	印度式石雀替	479
D 41	印度式石雀替	479
D 42	印度式石栏杆柱头	480

泉州宗教石刻

D 43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480
D 44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481
D 45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481
D 46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482
D 47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482
D 48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483
D 49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483
D 50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484
D 51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485
D 52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485
D 53	半兽半鸟形石刻	485
D 54	半兽半鸟形石刻	486
D 55	印度式柱头石	486
D 56	印度教寺建筑石构件	486
D 57	印度教寺门框石	487
D 58	印度教寺柱础石	487
D 59	印度教寺建筑石构件	489
D 60	古印度教狮形石雕	489
D 61	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489
D 62	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490
D 63	古印度教祭坛石卧狮	491
D 64	印度教寺石卧牛	492
D 65	开元寺大雄宝殿月台古印度教须弥座石刻	493
D 66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5
D 67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6
D 68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6
D 69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7
D 70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8
D 71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8
D 72	印度教寺柱础石	499
D 73	印度式蛇形纹石刻	499
D 74	印度式蛇形纹石刻	501
D 75	古印度教大独石柱	502
D 76	印度教寺建筑基座石刻	503
D 77	印度教寺柱础石	504
D 78	印度式蛇形纹石刻	504

目 录

D 79	古印度教石刻	505
D 80	锡兰王裔“世家坑”墓地	505
D 81	使臣世公墓碑	508
D 82	通事世公墓碑	509
D 83	锡兰世氏祖茔碑	509
D 84	锡兰世氏墓碑	510
D 85	锡兰故考碑	511
D 86	锡兰世门吴氏墓碑	511
D 87	锡兰何公祖坟碑	511
D 88	锡兰宗什敦岸世公祖茔碑	512
D 89	锡兰考开仕世公祖坟碑	512
D 90	锡兰孙振世公祖坟碑	513
二、附录		514
(一)	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	514
(二)	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	520

第五部分 泉州古佛教

E 1	重修后的开元寺唐大中八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529
E 2	唐大中八年经幢石雕佛像	531
E 3	开元寺唐代石雕佛像	531
E 4	开元寺唐代石雕观音像	532
E 5	开元寺唐代石雕佛像	532
E 6	开元寺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533
E 7	五代石雕观音像	534
E 8	开元寺南唐保大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宝盖石雕残件	535
E 9	开元寺南唐保大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拓本	536
E 10	开元寺镇国塔	540
E 11	开元寺仁寿塔	543
E 12	开元寺宋代金涂式石塔	545
E 13	开元寺宋代金涂式石塔	546
E 14	开元寺拜庭东侧石塔群	547
E 15	开元寺焚帛炉	547
E 16	开元寺石构小塔	548
E 17	开元寺内水陆寺石塔构件	549
E 18	开元寺内水陆寺石塔构件	549

泉州宗教石刻

附录: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550
E 19 安福寺石雕造像	551
E 20 安福寺唐代石雕阿弥陀佛像	551
E 21 安福寺宋代石雕佛像	552
E 22 安福寺宋代石雕释迦牟尼像	553
E 23 安福寺宋代石雕佛像	553
E 24 安福寺唐代石雕佛立像	554
E 25 安福寺宋代石雕造像	554
E 26 承天寺宋代石经幢	555
E 27 承天寺宋代石经幢	556
E 28 承天寺宋代七佛石塔	557
E 29 崇福寺应庚塔	557
E 30 崇福寺石构小塔	558
E 31 石狮宝盖山万寿塔	559
E 32 石狮金钗山六胜塔	560
E 33 金井西资岩造像	562
E 34 东石南天寺造像	563
E 35 九日山石佛岩五代阿弥陀佛像	564
E 36 九日山石佛岩北宋题记	565
E 37 九日山僧墓	566
E 38 九日山宋代方形石塔	566
附录:宋曾会《修延福寺碑铭》	567
E 39 清源山瑞像岩石室	568
E 40 清源山赐恩岩宋代石雕观音像	569
E 41 清源山碧霄岩三世佛像	570
E 42 清源山弥陀岩石室和石雕阿弥陀佛立像	573
附录:	
一、元《修弥陀岩崖记》	574
二、元《重建清源纯阳洞记》	574
E 43 万安桥佛教石雕	577
E 44 石笋桥宋代石塔	579
E 45 宋代顺济桥石雕守护神	582
E 46 开元寺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582
E 47 通天巷宋代石经幢	583
E 48 丰州镇北宋石经幢	583
E 49 云托日石刻	584

目 录

E 50	榕桥乡宋代释迦立像	585
E 51	宋代石雕达磨像	585
E 52	宋代石雕罗汉像	586
E 53	宋代伽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586
E 54	宋代力士柱础	588
E 55	宋代石雕造像	589
E 56	明代石雕佛像	589
E 57	明代石雕佛像	589
E 58	宋代石塔、经幢构件	589
E 59	宋代石经幢构件	590
E 60	梵文佛塔构件	591
E 61	佛教石塔构件	591
E 62	元亦黑迷失所立一百大寺看经记碑	592

第六部分 泉州古道教

F 1	清源山老君岩石像	599
F 2	玄妙观石雕道教神仙像	600
F 3	法石山云麓村三翁宫石刻	601
附录:	《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碑	602
F 4	泉州府城隍庙照墙雕饰	603
F 5	石湖村金钗山东岳庙牌坊	604

第七部分 泉州古民间信仰

一、九日山通远王祈风摩崖石刻	606	
G 1	九日山西峰祈风摩崖	612
G 2	淳熙元年虞仲房等祈风石刻	613
G 3	淳熙十年司马伋等祈风石刻	614
G 4	淳熙十五年林枅等祈风石刻	616
G 5	嘉泰元年倪思等祈风石刻	617
G 6	嘉定十六年章棟等祈风石刻	619
G 7	淳祐三年颜颐仲等祈风石刻	620
G 8	淳祐七年赵师耕祈风石刻	624
G 9	宝祐五年谢埴等祈风石刻	625
G 10	宝祐六年方澄孙等祈风石刻	626

泉州宗教石刻

G 11 咸淳三年赵希忬等祈风石刻	627
二、天妃的崇拜	631
G 12 泉州南门清《重修天后宫碑记》	633
三、保生大帝的崇拜	634
四、关帝的崇拜	634
五、王爷的崇拜	635
G 13 凤山《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碑	636
附录：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碑	637

第八部分 纪功、贞节牌坊及其他

H 1 东门外古道上的石牌坊	639
H 2 东门外古道上的石牌坊	640
H 3 东门外清初透雕大石牌坊	641
H 4 开元寺门口的石牌坊	641
H 5 东郊灵山圣墓和明代僧人墓	642
H 6 元代奉使波斯使者的墓碑	643
后记	645
Abstract	647

绪 言

福建省居我国东南沿海的中部。泉州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地当福州和厦门二市的中间，有公路与福州、厦门联系，东南临泉州湾。城扼晋江下游，又当闽海要冲，水陆交通便捷，故中古时代成为中外交通中心。

泉州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低。西北部多丘陵，林木丰茂。东南部多平原，是主要的耕作地区。在丘陵地带多花岗岩，是建筑的良好材料。泉州的城墙、寺庙、牌坊、塔幢、佛像、墓碑、石墓等，以至民间的楼房建筑，几乎全部是以花岗岩建成的。

泉州在秦、汉的时代属闽越地。至陈文帝置南安郡（或曰后梁），隋文帝平陈，郡废属泉州，泉州名之始也^①。当时泉州的地域，包括闽北和闽南，但中心地在今福州。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由泉州划分出武荣州，州治就在南安东南十里的地方（即今丰州），但不久又废除了。唐《元和郡县图志》载：

旧泉州本理在今闽县，武德六年置。景云二年改为闽州，开元中改为福州。今泉州本南安县也。久视元年，县人孙师业诉称赴州遥远，遂于南安县东北界置武荣州。景云二年改为泉州，即今理也。^②

自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始，闽北的泉州和闽南的泉州正式分开。久视元年（公元700年）闽南泉州的州治仍在武荣州（今丰州）。景云二年武荣州改称泉州。开元六年（公元718年），析南安县东置（晋江县），而自南安徙州治今泉州地方^③。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晋江县改名清源郡，管辖今天的晋江、南安、莆田、仙游和龙溪等县。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清源郡改名泉州。以前，泉州的地域是很大的，几乎包括了今天的闽北与闽南，至宋初，泉州的范围才逐渐缩小。今天的泉州就是指晋江、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等六个县。

泉州城的创建年代很难确定。据《泉州府志》载，始建于唐开元间（公元713年以后）^④。但当时泉州城的范围不大，有内、中、外三重。在内的叫衙城，中叫子城^⑤，在外的叫罗城。直到五代留从效割据泉州的时候，才把城的范围加以扩大，并在城的周围环植刺桐树。乾德初（公元963年），陈洪进再扩大城的东北隅。但泉州城的建筑，在这以前却是用砖砌的，至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开始把城墙的内层改用花岗石来砌筑，城外层还仍旧是砖砌^⑥。直至嘉

① 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百三十，福建路泉州。

②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江南道五泉州（清源上），清道光二十七年版。

③ 见《新唐书·地理志》泉州条，中华书局标点本。

④ 《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载：唐“贞元中刺史席相重建北楼。欧阳詹记：‘开元中别驾赵颐正凿沟，通舟楫城下。’”

⑤ 1928年和1983年，在城北中山公园内捡获印有“衙子城砖使立”的城砖数块。这可能是修衙城和子城时遗留的砖块。考泉州子城筑于王审知时，但当时不称子城，迨保大中留从效筑罗城，于是有子城之称。宣和中郡守陆藻增筑，外砖内石。宋绍兴十八年叶廷珪陶土为砖取砾为灰以筑城。以上记载皆见诸郡志。但不知这些“衙子城砖”是留氏之遗，抑陆、叶所造矣。

⑥ 见《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泉州宗教石刻

定三年(公元 1210 年),才借助于阿拉伯、波斯商人的财力,将城大加修建^①,但修建的主要材料仍旧是砖。一直到元末至正十二年(公元 1352 年),才把罗城及翼城连接与扩大起来。这个时候的泉州城墙,周围全长延伸达到三十华里,高二丈一尺,城墙的基础扩大为二丈四尺(仅南城墙基广二丈),城墙的外壁都改用花岗石来砌筑。明洪武初,泉州城墙增高五尺,城基广俱增至二丈四尺,内外壁皆砌石^②。

在元代,由于泉州海外交通位置重要,曾多次设省治,成为福建的政治中心。它设省治的次序是:

至元十五年,泉州由宣慰司改为行中书省^③。

至元十九年,又为行省省会^④。

大德元年,改福建省为平海等处行省,徙治泉州^⑤。大德六年“省并江浙立宣慰司行省”,宣慰司仍置于泉州^⑥。

至正二年,行省尚在泉州,是年宣慰司设在福州^⑦。

泉州发现古代外国人遗留下的石刻,有的学者认为是远在 8 世纪的事^⑧。清代咸丰、同治时,在城的东南隅园圃内,就经常发现刻有古阿拉伯文字的碑碣,因当时尚不知其重要性,除少数为伊斯兰教徒捡获收存现存通淮街清净寺外,多数被破坏了。我们对泉州古代外国人遗留下的石刻的调查与搜集,是从 1928 年才开始的。但是,这种调查与搜集都是业余的,故所得并不很多。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城垣拆卸,以致许多有价值的石刻多被卖掉,改琢成建筑石材及其他器具。例如泉州东门城兜一家石店,十多年间就破坏了一百六十多方刻有外国文字的石碑。南岳及南门厂口街的两家石店所破坏之数,也大略相同。中山南路侨光戏院后的一家石店的围墙,全部由通淮门拆卸的印度教石刻砌成(注:20 世纪 80 年代,房东扩建房屋,印度教石刻流失)。此外,泉州北门城近旁的几家石店也破坏古基督教石刻达一百二十方以上。因此,我们现在得到的石刻,可以说是残存的很少的一部分了。

1944 年,笔者曾把发现和搜集得到的石刻,稍作说明,编为《泉州古代石刻集》。由于个人知识的贫乏,复受经济条件的限制,致使这些材料,没有及时地整理出来,以供大家参考与研究。1954 年,有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者,未经笔者本人的同意,竟将借去的十字架石刻材料,发表于《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中,这应该特别在此声明。

① 《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载:“嘉定四年,守邹应龙以贾胡簿录之费,请于朝而大修之”。我们于泉州城拆卸时,在城的东门共获数百万方城砖,上打印有“嘉定三年修城官砖”的模印文字。特别是在水门城墙内发现的最多。故修城时间,应以砖的印记为准。

② 见《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③ 见《元史》卷六十二,地理志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

④ 同上注④。

⑤ 见《元史·成宗本纪》。

⑥ 见《晋江县志》卷十六,词翰,《(元)庄弥邵罗城外壕记》。但《元史》载,大德三年,泉州改为宣慰司,恐所载有误,应以石刻碑记为准。

⑦ 见清陈榮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乌石山元人题名十七段《焦德裕题名摩崖石刻》。

⑧ 见英人摩尔《1550 年前的中国基督教》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Chapter 3, p. 82. by A. C. Moule, London, S. P. C. K. 1930.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党及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大力帮助,特别是郑振铎、尹达、夏鼐、陈梦家和黄展岳等先生及考古所编辑室诸位同志的帮助,使这一批有关中外交通的史料得以出版。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福建泉州是中世纪的一个对外通商大港,是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地点。泉州海外交通,自唐代起有比较可靠的文字记载。在国外的文献记载,公元9世纪中叶,波斯人伊本·考尔大贝(Ibn Khordâdbeh),居住巴格达,曾一度任邮政局长,公元844到848年,著书《道路和王国》,提到跟中国港口贸易的事,其中有泉府的名称^①。在《唐宋贸易港研究》一书中,日人桑原骘藏称伊本·考尔大贝的书为《道程及郡国志》,在引文中提到:

由广府(Khanfou)经八日到泉府(Djanfou)。此地物产也与广府无大差别。由泉府到扬州(Kantou)需六日,其地产物亦相同。^②

在国内文献上也有记载,如唐人所云:

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③

又如:“唐天祐元年(公元904年)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齐国入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宁远将军。”^④在《泉南杂志》卷上载:“唐设泉州……参军事四,掌出使导赞”。^⑤还有,唐人的“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利深波也深,君意竟如何? 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⑥。和“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⑦。以及“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连年不见雪,到处即行春”^⑧等诗句,都反映了泉州自唐始,已有发达的海外交通。《宋史·外国列传》及《诸蕃志》计算海外各国距离中国的远近,无不以泉州为起点。

宋绍兴八年,福建莆田《祥应庙记》有如下的记载:

往时游商海贾,冒风涛历险阻,以牟利于他郡外蕃者,未尝至祠下。往往不幸有覆舟于风波……又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皆归德于神。自是商人远行,莫不来祷。^⑨

莆田《祥应庙记》记录了南宋初泉州的海外交通情况,这段史料为史书所失载。

当时外国人都称泉州做刺桐港(特别是元代),这是因为早在唐朝,泉州就有刺桐这个别

^① 巴达尔·丁《阿拉伯和中国的关系》(阿文版),第46页,1950年开罗版,复兴书店发行。

^② 桑原骘藏著 杨鍊译《唐宋贸易港研究》(四),《伊本所记中国贸易港》,1935年,商务印书馆。

^③ 《全唐文》卷七十五,唐文宗七,《太和八年疾愈德音》。

^④ 《唐会要》卷一百,《归降官位》,清光绪十年,江苏书局刻本。

^⑤ 明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⑥ 见《全唐诗》卷二十六和《闽诗录》乙集卷四,以及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二。黄滔,唐乾宁二年擢进士第,光化中除四门。

^⑦ 见《全唐诗》卷二十一,《薛能送福建李大夫》诗。薛能,唐会昌六年登进士第,大中末书判中选补盩厔尉。

^⑧ 见《泉州府志》卷八,形势,《唐包何送李使君赴泉州诗》。

^⑨ 清刘尚文编《莆阳金石初编》卷上,《祥应庙记》,清光绪庚子福州版。又见清陈启仁《闽中金石略》卷八,宋六,《祥应庙记》,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

名了。查“刺桐”为地名，最早见诸《兴化府莆田县志》，志云“祖迈，唐武德初，令莆田，始家刺桐巷”^①。至于刺桐为泉州的别名，那是唐末的事。唐人有“帝京须早入，莫被刺桐迷”^②，“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和“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③，还有唐末徐寅弃官返莆田隐居时有“昔游红杏苑，今隐刺桐村”^④的诗句。可见，在唐代，泉州别名刺桐城已经很流行了。五代的时候，留从效割据泉州，在城的周围环植刺桐，更负有刺桐港之称^⑤。宋、元时代，阿拉伯、波斯商人叫泉州做“桥墩城”(Madiant Zaytun)。在中近东和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国家，盛产一种木樨科植物，这种乔木也叫桥墩(Zaytun)。因为桥墩树的读音和刺桐(Zaiton)树的音译相近，因此阿拉伯、波斯商人就误把泉州城所见到的刺桐树译做“桥墩树”。同样，他们也把刺桐城叫做“桥墩城”了。下面的一段记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元代曾经来泉州访问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在其《伊本·巴都他游记》一书中有一段记载：

我渡海之后，首先到达的城市，叫桥墩城，这个城并没有桥墩树，中国和印度都没有这种果子，然而这座城却叫做桥墩城。这是一座雄伟的城市。这里出产浮出花纹的缎子，桥墩缎(Zaytūna)著名于世。桥墩的港口，是世界的最大海港之一。^⑥

这段记载，说明了阿拉伯、波斯商人误把刺桐译为桥墩。因此，伊本·巴都他到泉州时，自然看不到有桥墩树，桥墩城这个地名，至今还保留在许多阿拉伯的文献里，如穆罕默德·伊本·叶儿孤白·菲鲁宰巴特(公元1329~1413年)著的《大辞典》(Al-Qāmūs al-Muhibī)载：

Al-Zaytūn haladun bi al-sin (桥墩是一个中国城市)。^⑦

今日的泉州人还喜欢称呼自己的家乡为刺桐城。早在数十年前，中外历史学家们虽然知道中国东南沿海除广州、杭州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国际贸易大港叫扎东(Zayton)或称才通(Zaitun)的，但不知道就是今天的泉州。有的说是在福建的漳州，如英国的菲立普斯(Phillips)；有的说是在海澄，如道格拉士(Douglas)；有的说是杭州，如英国的斯普棱格尔(Sprenger)；有的甚至说就是扬州的，如亨利玉尔(Henry Yule)和日人藤田丰八等。因为他们从没到过泉州，仅凭主观推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元代的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商埠之一，下面我们引两位大游历家的记载，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马可孛罗游记》载：

我们到了一个很大很繁华的刺桐城。这里是海港。所有印度的船皆来到这里，载着极值钱的商品，许多顶贵重的宝石和许多又大又美丽的珍珠。它也是四邻蛮子国商人所群聚的一个商埠。……我郑重的告诉你们罢，假如有一只载胡椒的船去到亚力山大港

① 见《莆田县志》卷十七，人物，《陈彦恭传》和《兴化府志》卷三十六，《陈同传》。

② 见《全唐诗》卷二十七，曹松《送陈樵校书归泉州》诗和《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刺桐》。曹松，唐天复初及第。

③ 见《全唐诗》卷二十七，陈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诗和《泉州府志》卷十九，物产，《刺桐》。陈陶，唐大中时游学长安，南唐昇元中隐洪州西山。

④ 见《闽诗录》卷一。

⑤ 见《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⑥ 见《伊本·巴都他游记》(阿文版，修订本)第二册，第252页，1934年，开罗，埃米尔亚出版社出版。

⑦ 见穆罕默德·伊本·叶儿孤白·菲鲁宰巴特著《大辞典》第一册，第148页，1944年，开罗版。

(Alexandria)或到奉基督教诸国之别地者,比例起来,必有一百只船来到这刺桐港。因为你们要晓得,据商业量额上说起来,这是世界上两大港之一。^①

14世纪中叶,伊本·巴都他在他的游记中是这样记载刺桐港的:

刺桐的港口,是世界最大的海港之一,或者可称为世界最大的海港。我亲眼看见港里有大船一百艘,小船多得无法计算。这是由大海伸入内地的一个大港,港头与一条大河相连。在这座大城和中国所有的大城市里,每家都有大小花园和空地,住宅就建筑在中央。很像我国的西吉勒马赛城(Sijimasah)的情况一样。因此,中国各城都很大,穆斯林们(指刺桐城的波斯、阿拉伯侨民)则居住在城里一个地区里面。^②

所以,元代的刺桐港不但在海外交通贸易地位重要,而且曾多次设立省会,成为福建的政治中心。当时的泉州港,处于鼎盛时期。

1926年,张星烺和陈万里两位先生到泉州考古,日本人桑原骘藏所著的《唐宋元时代中西交通史》一书也差不多在这时候出版,他们一致确认,中古时代曾经繁盛一时的刺桐港就是今天的泉州。但是桑原骘藏虽博引中外史书的记录来考证刺桐港就是泉州,他所能举出的实物例证却很少。张星烺先生主要是根据现存的泉州通淮街(俗呼涂门街)清净寺,以及泉州东门外伊斯兰教先贤墓(俗呼圣墓)来证实刺桐港就是泉州,并指出它是中古时代世界最大贸易港之一。张氏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他在《泉州访古记》中说得好,现节引于下:

登高远眺,全城风景尽在目中。城为椭圆形,东西长而南北狭^③。共有七门,南门城垣已拆。城内富户住宅甚多,宅中多有园庭,花木蓊郁。我昔读《拔都他游记》,谓泉州人家多花园,占地甚广,故城市甚大。今见情形,尚无异于数百年前外国人之记载也,城市未改,而繁盛已非昔日比矣。向东远眺,可望见海。据云,距城仅二、三十里耳。当宋、元之世,泉州为世界第一大商埠。刺桐城之名,见之于《马哥孛罗游记》^④、《和德理游记》^⑤、《玛黎诺理奉使东方录》^⑥、《拔都他游记》^⑦,俱言为世界第一商港。外国贾客蚁聚,番货荟集于此。由中国往外国及由外国来中国,莫不于泉州放洋或登陆。马哥孛罗、玛黎诺理回欧洲,自刺桐放洋;孟德哥维奴^⑧、鄂多力克^⑨及拔都他等来中国,先抵刺桐港登陆。……西极之国如摩洛哥、意大利等皆有游客踪迹至泉州,其大食、波斯之胡贾,寄居于此

^① 张星烺译《马可孛罗游记》第336~337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见《伊本·巴都他游记》(阿文版,修订本),第二册,第252页,1934年,开罗,埃尔米亚出版社。

^③ 张星烺当年所谓“登高远眺”的地点,恰好是唐代泉州子城西南角城墙之近旁。所谓“登高”,只不过登上泉州花巷启明女子学校的三层楼屋顶。由于视野受限制,所以产生错觉,觉得泉州城是东西长,南北狭了。其实,泉州城早在“元至正十二年,监郡契立拓南罗城地合翼城为一周三十里”时,即成为南北长,东西狭的形状了。详见《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④ 马哥孛罗(Marcopolo)于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到中国,仕官元廷,前后十八年。于忽必烈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伴送蒙古公主科克清遣嫁波斯,由泉州后渚港放洋回国。

^⑤ 和德理(Ordorico da Pordenone)意大利人,于元硕德八刺(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到中国,由泉州登陆。

^⑥ 玛黎诺理(Marignoei)于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奉教皇本笃第十二世命到中国,由泉州登陆。

^⑦ 拔都他(Ibn-Batua)非洲摩洛哥人,于公元1342年奉苏丹命来中国,中途复舟,乃出苏门答腊,因得来中国的航路,于泉州登陆。

^⑧ 孟德哥维奴(Mentecorvino)意大利人,到中国北京任天主教总主教,于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由泉州登陆。

^⑨ 鄂多力克,即和德理的别译。

泉州宗教石刻

者，当更不知其几千万矣。

张氏的这种总结性说法，是很正确的，但他提出实际史料或遗物还是很少的。我们在这七十多年来，获得了更多的史迹和遗物，证实了张氏的推论并非夸大。现在把这批遗物及遗迹，按其宗教性质分为八大类：

第一类，伊斯兰教。

七十多年来，我们发现和搜集的古阿拉伯文碑碣有数百万。这些碑碣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已毁没的伊斯兰教堂的阿拉伯文字石刻。这些石刻记载有修建清净寺的人名和国籍；有的是已毁没的清净寺的刻有《古兰经》的壁龛石、门楣石，以及石墙上的《古兰经》石刻和清净寺石碑的石座等。

其二是刻有古阿拉伯文字（有的是阿拉伯字和汉字并用）的墓碑石。已发现的这一类有纪年的墓碑石，其年代多数是在回历 700 年间，少数是在回历 600 年间的。这些外国人，他们多数是波斯人、阿拉伯人，也有土耳其人、阿曼人、也门人、里海地区人和中亚的布哈拉人。他们中有贵族、官僚、商人、教长、传教士、艺人和奴婢，也有妇女和儿童。由于他们多数是商人，又来自不同的国家，所以在书写阿拉伯文墓碑时，多数不甚规范，以致有的很难辨认。我们也发现一些墓碑上的阿拉伯文字中夹杂有波斯文字。此外，还有“拱拜尔”石刻。

第二类，基督教。

这一类的石碑多刻有十字架、天使、莲花、云朵、华盖、幡幢、梅花，甚至有鸽子等图案。石碑上的文字，有汉字、八思巴蒙古文字、叙利亚文字、叙利亚字母拼写突厥语、回鹘文字，以及叙利亚字母拼写中亚的一些地方的方言和中部亚洲方言，有的天主教墓碑则刻古拉丁文字。更为特殊的是同一墓顶石刻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标志。

第三类，摩尼教遗迹和遗物。

这方面我们发现的较少。可以确定的有草庵摩尼教遗址及摩尼光佛的石刻造像，还有草庵摩尼教摩崖碑记。乾隆《泉州府志》所记，泉州北门外老君山下，有摩尼教呼禄法师墓，但至今未找到。此外，我们还发现刻立于公元 1313 年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西雷蒙主教墓碑。

第四类，印度教。

我们获得这一类石刻有二百多方。1959 年在泉州北门裴巷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工地上，一次就出土十二方印度教寺庙建筑石刻。1996 年，又在东岳山发现锡兰印度教徒邪巴来那国王后裔墓碑二十三方。以及锡兰王裔在泉州建立的“白狗庙”印度教神庙。1986 年，泉州开元寺戒坛重修，又出土十一方兽面等印度教寺庙石刻。

以上的二百多方印度教石刻，有印度教崇拜神的造像，有印度教寺庙建筑构件和碑记。如古印度式石柱、柱头、柱础、雀替、石狮、石牛、门框石，以及半人半兽、半兽半鸟形的雕刻，还有希腊式的人面狮身石雕和希腊式的柱头石等。这些建筑遗物的形式及雕刻内容，与古代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印度教寺庙建筑形式，与印度、锡兰流传的印度教神话故事，有很密切的关系。1956 年，发现创建于公元 1281 年的泰米尔文字刻写的湿婆神庙碑记。

第五类，佛教。

佛教传入泉州较早,其遗迹、遗物较多。本书收录的主要是石塔、石经幢、石佛雕像等。有名的泉州开元寺镇国塔和仁寿塔,晋江市六胜塔和石湖塔,泉州西门附近的唐大中五年石经幢,南安市九日山五代石雕佛像和泉州法石村附近的梁开平四年石雕观音海神像,以及元代亦黑迷失所立的《一百大寺看经碑》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佛教建筑和造像石刻。

第六类,道教。

本书收入泉州道教胜地清源山的老君石雕造像,还有最早道教寺观——玄妙观的石刻,还有象征五岳四渎相贯,精神之相系的三翁宫石刻,以及道教艺术作品——麒麟壁。

第七类,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遍及城乡各个角落,神明数量极多,本书只选取几个代表,如海神通远王、天妃,医神保生大帝,忠义、财神关帝和王爷神。

第八类,纪功、贞节牌坊和其他。

这里收集有封建仕进官员的纪功牌坊和封建礼教倡导妇女贞节的旌表牌坊,还有记载灵山圣墓历史信息的老照片,以及元代奉使波斯使节的墓碑。

由于出书的时间拖延了数十年,因此本书收入新发现的宗教碑刻也就比较多,而且现在的研究条件也比从前好得多,此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哉。但是,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有不足之处,还望诸位行家指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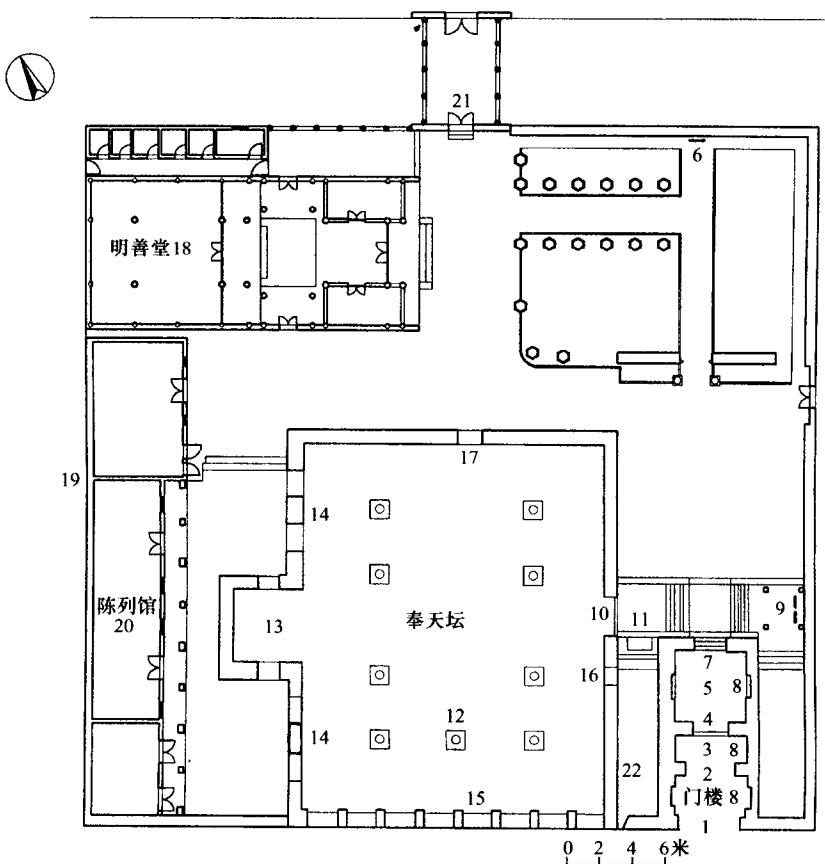
1956年9月,吴文良记于北京

2005年3月,吴幼雄又记于泉州

第一部分 泉州古伊斯兰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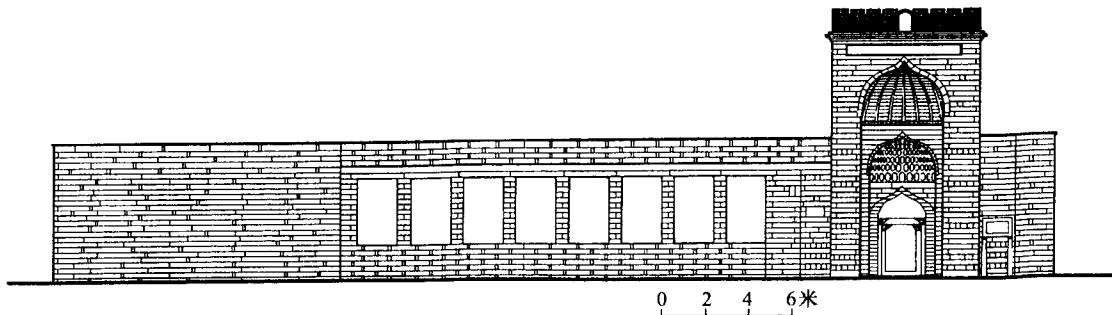
一、泉州伊斯兰教寺和“拱拜尔”石刻

A 1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平面图、正立面图、门楼纵剖面图和门楼仰视图^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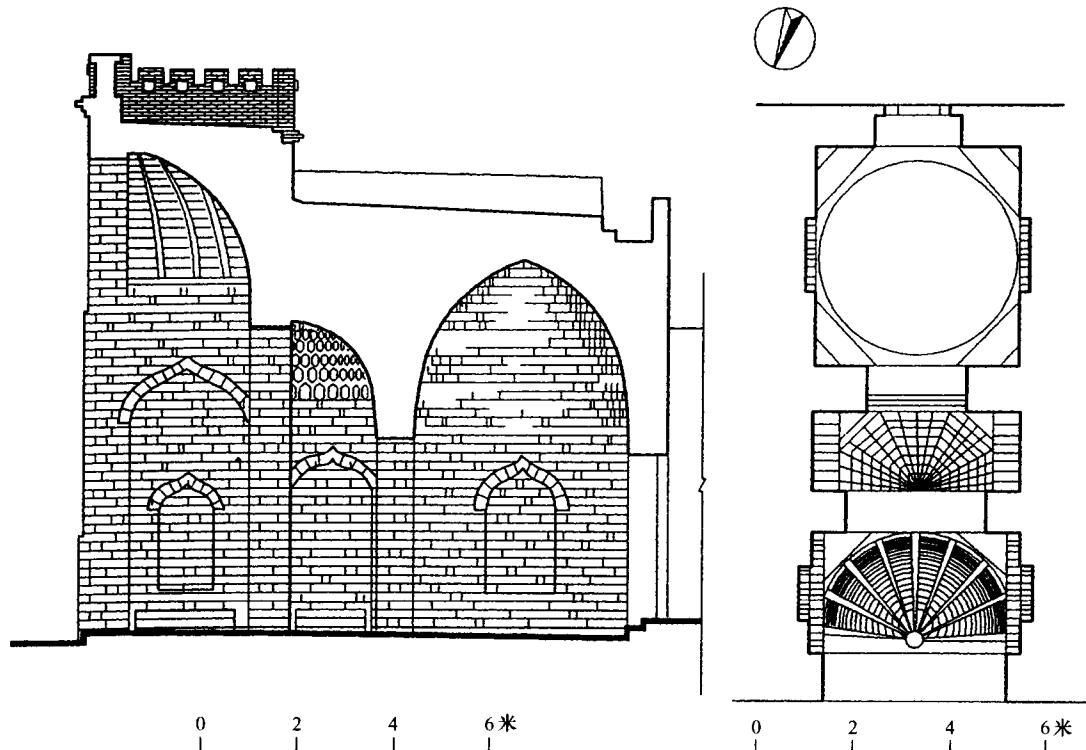


A 1.1 清净寺平面图

1. 清净寺进口大门。
2. 第一层垂莲穹顶。
3. 第二层龟纹图案穹顶。
4. 第一道尖拱形门。
5. 圆形顶盖。
6. 明永乐五年上谕碑刻，原置于进口大门第二层龟纹图案穹顶下的东墙上，20世纪80年代重修时移砌北围墙。
7. 第二道尖拱形门。
8. 清净寺大门甬道两旁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9. 元至正十年三山吴鉴撰，明正德二年《重建清净寺碑》和明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
10. 礼拜大厅尖拱形大门。
11. 通往“上楼”石阶(已毁)，由此而上，直通进口大门顶上的望月台(教徒观星月的地方)。
12. 礼拜大厅柱础位置，共有十二个。
13. 奉天坛(亦称讲经坛)，设于厅的西面，作方形凹入。
14. 壁龛，共有七个。龛作尖拱形，以奉天坛的壁龛最大，高3.40米，宽1.74米。其他左右各三个，较小，但差距不甚大。龛内刻《古兰经》经文五行或七行不等。
15. 礼拜大厅八个方形大窗。据碑文记载，为明代修建时改建的。
16. 朝东的边门。由礼拜大厅过此门，可直通上楼。
17. 朝北的方形大门，据碑文记载，是明代改建的。
18. 明善堂大厅。明朝隆庆间建，作为教徒每于月斋、日斋登楼诵经之后休息的地方，现在作为礼拜之所。
19. 石围墙。
20. 陈列馆。
21. 清净寺桥。
22. 宣礼塔遗址。



A 1.2 清净寺正立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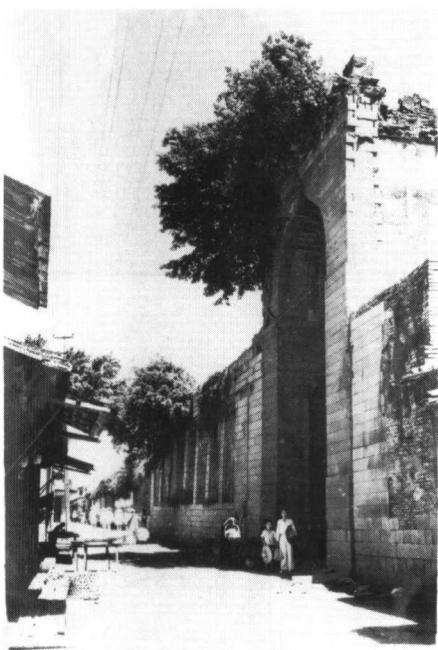
A 1.3 清净寺门楼纵剖面图

A 1.4 清净寺门楼仰视图

A 2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创建和重修的历史，万历、乾隆《泉州府志》，以及乾隆、道光《晋江县志》和私人文集都有记载。万历《泉州府志》记载：

① 测绘线图，皆转引自世界遗产公约申报文化遗产：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送审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2004年。泉州海上丝绸之路申报办公室制。对清净寺平面图，本书作者略有改动。



A 2.1 20世纪30年代通淮街清净寺大门

清净寺，在郡城通淮街北，府学之东。宋绍兴间，回人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泉所造。楼塔高敞，相传为文庙青龙之左角。教以沐浴事天为本，详三山吴鉴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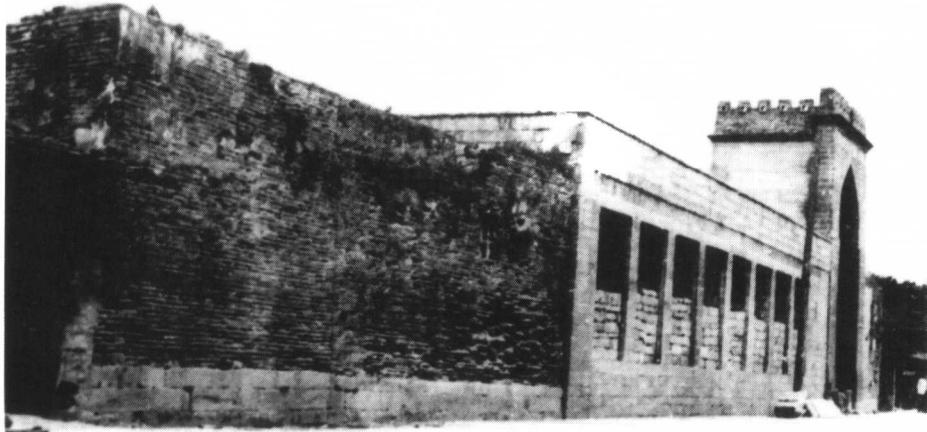
元至正间寺坏，里人金阿里修之。国朝正德间，住持夏彦高鸠众重修。隆庆丁卯，木塔坏，知府万庆捐俸，令住持夏东升、教人苏养正等，修塔五层。

万历三十七年，地大震，楼颓其角。而寺中房屋占住几百余人，污秽破坏，知府姜志礼、知县李待问捐俸重修，悉驱之出，仍构亭宇，寺为一清，令教人林日耀、住持夏日禹董其役，孝廉李光缙有记。^①

据乾隆《泉州府志》载：

清净寺在府治通淮街北。宋绍兴元年，回人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泉，建置银灯、香炉，及田土、房屋。元至正间，里人金阿里重建，三山吴鉴为记。明正德间，住持夏彦高鸠众重修。隆庆间

知府万庆，万历间知府姜志礼，相继修寺。旧有塔，万历间住持夏东升等修。^②



A 2.2 1953年初步修整后之通淮街清净寺大门及临街南围墙

① 见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杂志，寺观宫庙类，清净寺。又见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三，寺观，清净寺。再见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中寺观，清净寺。道光《晋江县志》另记：“俗称礼拜寺，讹为马拜寺。”

② 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

《泉州府志》又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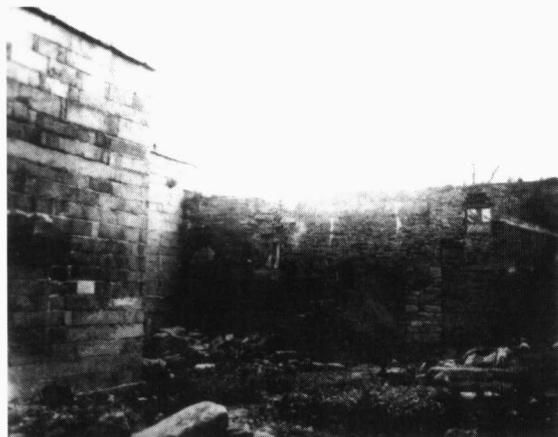
徐回逊，字世渊，晋江人……能拔人危难中……先是光孝寺灾，独立重建，无所吝啬。又以清净寺浅逼，更拓地架堂广之，今纪德遗碑犹有存者。年八十余卒，御史林潮为立传记。之子陟，永乐庚子举人。^①

可见，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在元代最后一次修建是至正十年。入明以后，有记载可查的，其首次修建是洪武、永乐间的徐回逊；接下去才是明正德丁卯年夏彦高重修；第三次是明嘉靖间回族人丁自申，因清净寺楼塔坏，独力“修清净寺楼塔”^②；第四次是明隆庆间；第五次是明万历间。了解这个修建过程，对于考证这座清净寺的始建年代是至为必要的。

20世纪30年代，泉州通淮街清净寺门楼顶、礼拜大厅石墙上和转墙上，巨大榕树丛生，盘根垂地，门楼涨裂，石墙和转墙塌毁，一派荒凉的景象。又长期作为屠宰场和牛皮硝洗处，垃圾污秽，狼藉不堪。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通淮街清净寺临街南围墙的一段及西围墙，均系砖墙。因年代久远，临街砖墙已经严重腐蚀剥落。特别东侧砖墙部分塌陷严重。

从照片上看，通淮街清净寺临街南砖墙上还保留着两扇窗，可见古代该寺奉天坛后的建筑是层楼式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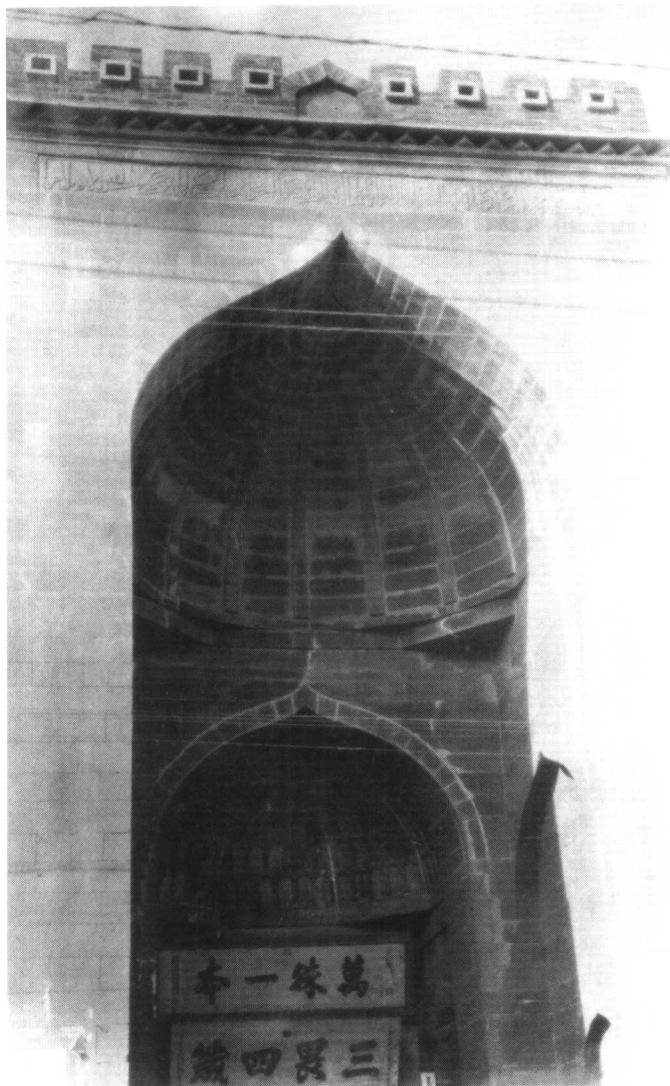
A 2.3 1953年从清净寺奉天坛后看南砖墙

A 3 通淮街清净寺大门

清净寺位于泉州通淮门大街（俗称涂门街，元代蒲姓阿拉伯人多聚居于此，故又名半蒲街）。大门门楼用辉绿岩、白花岗石砌成，整体上窄下宽。门楼高12.3米，楼基宽6.6米。门楼和通寺内的甬道，由外、中、内三部分组成。外层尖拱形大门穹顶，高10米，宽3.8米；中层龟纹尖拱形穹顶，高6.7米；内层两个尖拱形门之间，有一个25平方米的过道厅，屋顶是一个大圆形顶盖，高约7米，直径达4.8米。在外、中二层穹顶和内层圆顶下的两侧石墙上，各砌有不能通行的尖拱形假门（建于1310年的西亚金曜寺，其大门两侧墙上就是砌筑尖拱假门的）。大门外层的尖拱顶上面，有一横列古阿拉伯文字石刻（系《古兰经》第三章第十八节全文和第十九节节录，见本书第312页）。大门的门楼顶上有平台，四周围以蝶形砖垛，状似“回”字，是为望月台，为教徒斋月望月之所。进口大门东侧，原有尖塔（即宣礼塔），明隆庆丁卯塔

^① 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一，明乐善。然徐回逊重修清净寺的纪德遗碑今已不存。

^② 丁自申《三陵集》卷八，《封主事先大人后吾府君行实》（手抄本），存泉州市图书馆。泉州三世登进士者仅三家，回族丁姓为其一（即丁自申、子丁日近、孙丁启浚）。嘉靖己酉（二十八年，公元1549年），丁自申登进士；万历己丑（十七年，公元1589年）丁日近登进士；万历壬辰（二十年，公元1562年）丁启浚登进士。



A 3.1 1953~1957 年重修后的通淮街清净寺进口大门

坏,修之。康熙二十六年(公元 1687 年)五月“泉州大风,礼拜寺塔圮”^①,从此没有修复。大门左边有 6 米多高的临街石墙一道,墙上有方形大石窗八个,为明万历年间改建。临街石窗顶,有一横长古阿拉伯文字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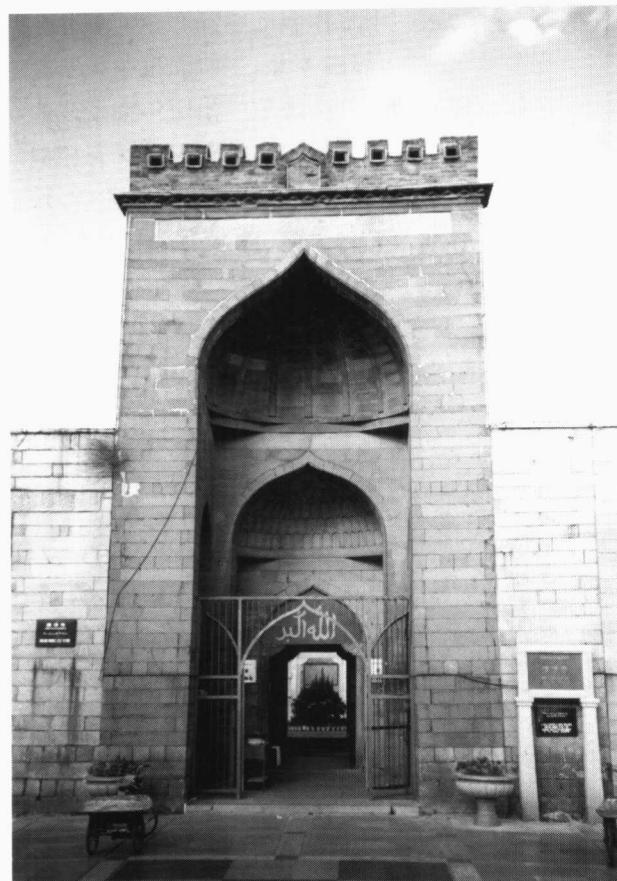
A 4 通淮街清净寺大门第一层穹顶和穹顶下两侧石墙上的双重尖拱形假门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进口尖拱形大门,就总体看,它是西亚式的建筑,但在具体砌筑方法上,则混杂有中国式的藻井式构筑法。如穹顶的顶心为一朵辉绿岩雕成的开放垂莲。宋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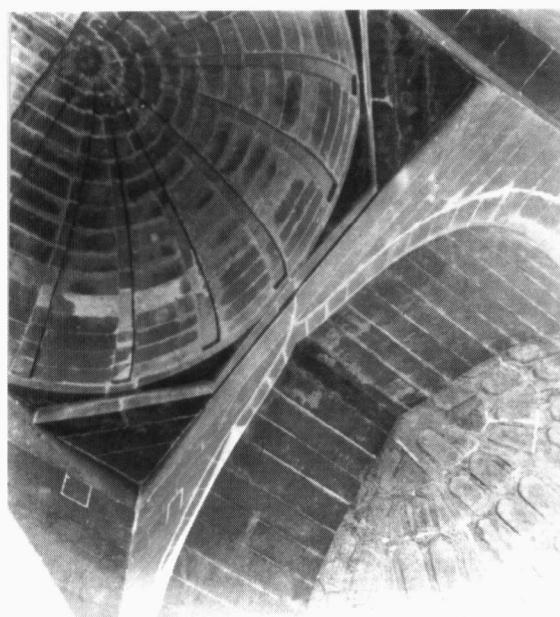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祥异。



A 3.2 1983年重修后的通淮街清净寺外观



A 3.3 1997年重修后的通淮街清净寺进口大门



A 4.1 清净寺大门第一层尖拱形穹顶



A 4.2 穹顶下两侧石墙上的双重假门

仲撰《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三”的“斗八藻井”载：

其名有三：一曰藻井，二曰圜泉……于顶心之下施垂莲或雕华云卷。^①

又其穹顶的砌筑方法既与广州历年来发现的汉式穹形砖墓的砌筑方法有相似的地方，又和西亚一些清净寺尖拱形大门的砌筑方法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它的砌筑特点。西亚和埃及的一些清净寺的大门尖拱顶，是用砖砌成后，涂上灰，然后装饰各种图案和花纹与其上。而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大门穹顶，每一块弧形石刻，都是预先精工细雕，共有十六层，使其成为左右长、上下短的凹弧形，渐高渐狭，依次向上递减，直至合尖处的垂莲为止。

因此，就其细部看，它是中国的建筑形式的藻井式的一种变体，但总体仍是西亚式的建筑。

穹顶下两侧石墙上的双重尖拱形假门，与西亚的金曜寺（建于公元 1310 年）形式一样，是西亚式的建筑。

A 5 通淮街清净寺大门第二层穹顶及穹顶下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图 A5.1 所见第二层穹顶仍作尖拱形。就总体看，还是西亚式的建筑。但穹顶由五块扇形的雕刻龟背纹的白花岗石所组成，下则另砌以垫石，这也是中国木构建筑物上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同样是中国藻井式的构筑法。这种砌筑法，用以配合那座西亚式的尖拱形进口大门，就显得庄严而伟丽。

穹顶下两侧石墙上砌筑西亚式的尖拱形假门，见图 A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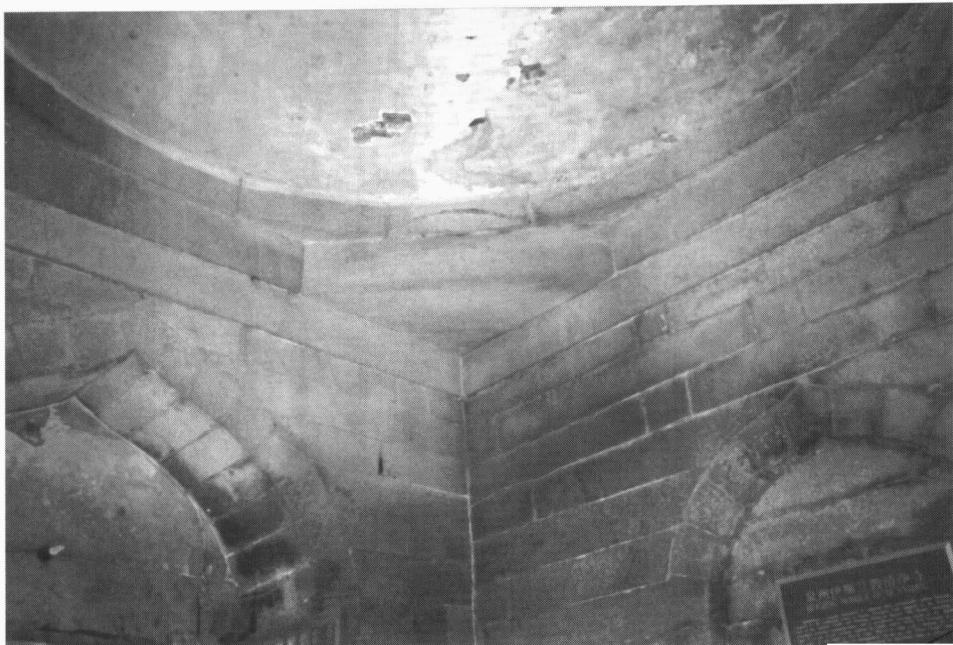
A 5.1 大门第二层尖拱形穹顶



A 5.2 穹顶下两侧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① 李诫《营造法式》第二册，法式卷八，1929 年，商务印书馆。

A 6 通淮街清净寺进口大门甬道圆顶盖及圆顶盖下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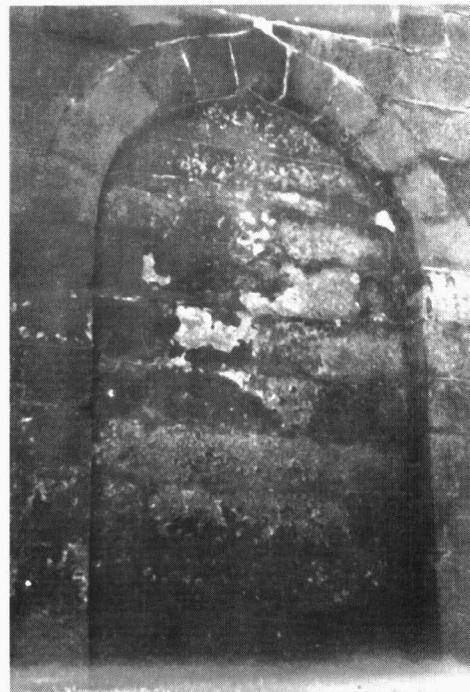


A 6.1 进口大门甬道圆顶盖

进入清净寺大门，过第一、二尖拱形穹顶门，穿过第一座尖拱形门，其上即有一直径为 4.8 米的过道厅圆顶盖，其砌筑方法亦是藻井式。圆顶盖下东、西墙上，各有一个尖拱形假门，这也是西亚式建筑。

A 7 清净寺大门甬道后石墙上元代阿拉伯文字修寺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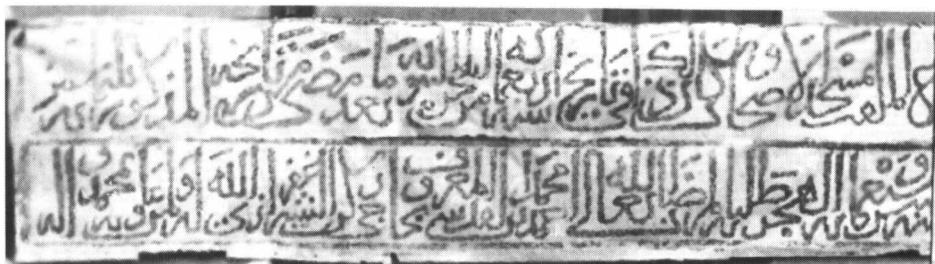
在清净寺甬道后北面的石墙高处，有白花岗石雕成的古体阿拉伯文字二行，长 5.30 米，上行高 38 厘米，下行高 34 厘米。这些字在 20 世纪初年曾由西班牙人阿奈司 (Arnaiz) 译为法文，德国人艾锷风又自法文译成英文，张星烺先生再由英文译成汉文。1956 年马坚教授再次翻译。1980 年 12 月华维卿先生为本书的出版重译，作出现代阿拉伯文的释读和汉文译文（见本书第 312 页）。



A 6.2 圆顶盖下石墙上的尖拱形假门



A 7.1 清净寺大门甬道后石墙



A 7.2 甬道后石墙上的石刻拓片

A 8 明正德二年《重立清净寺碑》

泉州通淮门街清净寺内有两方汉字碑记。现将元至正十年，三山吴鉴志，明正德丁卯年《重立清净寺碑》照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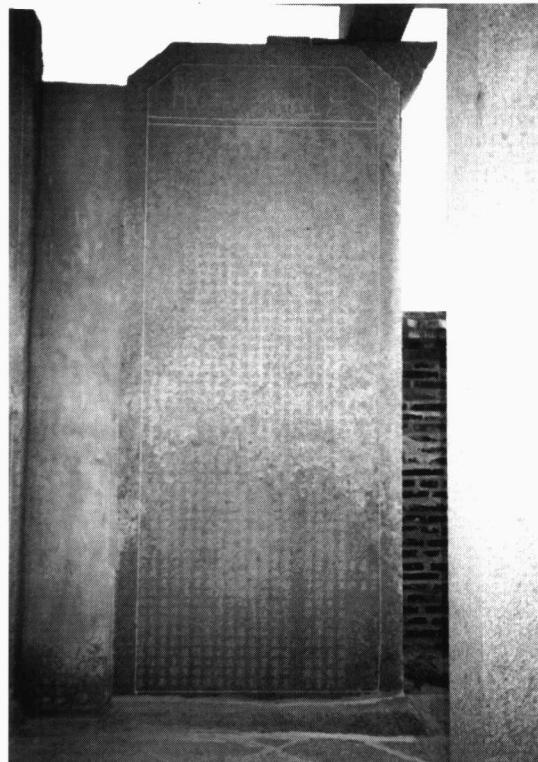
明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重刻元至正十年，三山吴鉴《重立清净寺记》碑，碑高2.62米，宽1.10米，厚0.14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面竖刻汉字二十二行，但字多漫漶剥蚀。文云：

重立清净寺碑记 哈梯卜、夏彦高、谟阿津□□□全募

明□□将军福建都指挥使司都指挥金事□□许清篆盖

赐进士观户部政使司江□都分督□□事□□丁仪书碑

西出玉门万余里，有国曰大实，于今为帖直氏。北连安息、条支，东隔土番、高昌，南距云南、安南，西渐于海，地莽平，广袤数万里，自古绝不与中国通驰骋。其宫室园圃，沟渠田畜，布列与江淮风土迥异。寒暑应候，民物繁庶。种五谷、葡萄诸果，俗重杀，好善。书体旁行，有篆、楷、草三法。著经史、诗文、阴阳、星历、医药、音乐，皆极精妙。制造织文，雕镂器皿尤巧。初默德那国王别谱拔尔谟罕蓦德生而神灵，有大德，臣服西域诸国，咸称圣人。别谱拔尔犹华言天使，盖尊而号之也。其教以万物净乎天，天可理无可像，故事天至虔，而无像设。每岁斋戒一月，更衣沐浴，居必易常处。日西向拜天，净心诵经。经本天人所授，三十藏，计一百三十四部，凡六千六百六十六卷，旨义渊微，以至公无私，正心修德为本；以祝圣化民，周急解厄为事。虑悔过自新，持己接人，内外慎敕，不容毫末悖理。迄今八百余载，国俗严奉尊信，虽适殊域，传子孙，累世犹不敢易焉。至隋开皇七年^①，有撒哈八撒阿的斡葛思者，自大实航海至广方，建礼拜寺于广州，赐号怀圣。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造银灯香炉以供天，买土田房屋以给众。后以没塔完里阿哈味不任，凡供天给众具窜，易无孑遗，寺因废坏不治。其徒累诉于官，墨司不决有年矣。至正九年，闻海宪金赫德尔行部至泉，为政清简，民吏畏服。摄思廉不鲁罕丁命舍刺甫丁、哈梯卜领众分诉，宪公审覆得情，任达鲁花赤高昌契玉立正议，为之征理复蔽旧物，众志大悦。于是，里人金阿里质以己赀，一新其寺，来征余文为记。予尝闻长老言：帖直氏国初首入职方，土俗教化，与他种特异，征诸《西使》、《岛夷》等志尤信。因为言曰天之欲平分天下，由来非一日积也。庄子书佛书，皆言西方有大圣人，至隋而谟罕蓦德始出。其教大端颇与理合。汉唐通西域，羁縻



A 8 明正德二年《重立清净寺碑》

^① 查伊斯兰教创立于唐武德年间，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才是回历纪元的开始，隋开皇七年（公元587年）自不可能有伊斯兰教的传入中国，这里所谓“开皇七年”者，是错误的。

泉州宗教石刻

不尽臣服。自礼拜寺先入闽广，此其兆盖已远矣。今泉之礼拜寺增为六七，而兹寺之废复兴。虽遭时盛平，名公大人硕力赞赞，亦摄思廉益绵之有其人也。余往年与修《清源郡志》，已著其事，今复刻其废兴本末，俾刻之石，以见夫善教流行，义无所不达也。奉政赫公，正议契公，皆明经进士。其于是役，皆以大公至正之心行之耳，非慕其教者。契公治泉有惠，期年之内，百废皆兴，而是寺之一新者，亦余波之及欤。谓非明使者与贤郡守，则兹寺之教坠矣。不鲁罕丁者年一百二十岁，博学有才德，精健如中年人，命为摄思廉，犹华言主教也。益绵苦思丁、麻哈抹，没塔完里舍刺甫丁、哈悌卜，谟阿津萨都丁。益绵，犹言住持也。没塔完里，犹言都寺也。谟阿津犹言唱拜者也。

赞其事，总管孙文英，中顺推官徐君正，奉训知事郑士凯。将仕董其役者，泉州路平准行用库副使乌马沙也。时至正十年，三山吴鉴志。

按旧碑年久朽敝无徵，掌教夏彦高，耆旧赵尹璋、蒲景荣、迭元高等，录诸郡志全文，募众以重立石。如尚书赵公荣立扁“清净寺”三大金字以辉壮之。他如参将马公谨、张公惠，少卿赵公竑，知州马公庆，指挥干公辅^①。皆以本教为念，或茂以修葺之功，或厚以俸资之施，而咸有功斯寺者。然教中显于泉者尤多，以其行茂此地，故漏之是跋。正德丁卯夏之吉旦。

A 9 明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

此著录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 1609 年)《重修清净寺碑记》，并附录明李光缙《净寺纪序》、《重修清净寺募缘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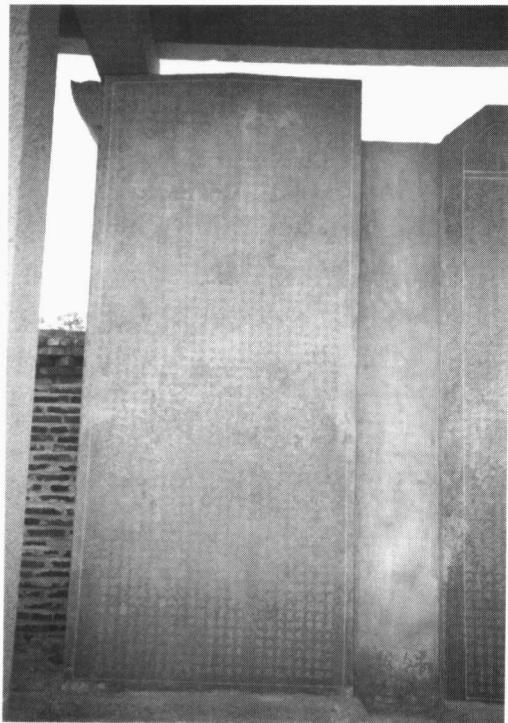
碑高 2.77 米、宽 1.18 米、厚 0.16 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竖刻汉字二十七行，楷书。文云：

重修清净寺碑记

清净之教，流入中土，自隋开皇始。经首言真主，以真命为天主，真心为人主，故其教主于斋戒沐浴以事天。凡一年必有一月之斋，如吾中国岁首月是也；凡一月必有四日之斋，值亢牛娄鬼之日是也。拜必沐浴，非沐浴不敢入拜；斋必素食，非见星不敢尝食。教主遇斋，率众诵经，西向罗列，但有膜拜，而无供养，此教之大凡也。郡建寺楼，相传宋绍兴间兹喜鲁丁自撒那威来泉所造。楼峙文庙青龙之左角，有上下层，以西向为尊。临街之门从南入，砌石三圜以象天，三左右壁各六合，若九门，追琢皆九九数，取苍穹九天之义。内圜顶象天，上为望月台，下两门相峙而中方，取地方象。入门转西级而上，曰下楼。南级上曰上楼。下楼石壁门从东入，正西之座曰奉天坛。中圜象太极，左右二门象两仪，西四门象四象，南八门象八卦，北一门以象乾元。天开于子，故曰天门。柱十有二，象十二月。上楼之正东曰祝圣亭，亭之南为塔四，围柱于石城，设二十四窗，象二十四气。西座为天坛，所书皆经言云。登楼睇之，清源在北，鸿渐在南，葵山在西，灵山在东，紫帽在

^① 干辅，系干八秃帖木儿三世孙，明宏治间，世袭永宁卫指挥使。干八秃帖木儿，从明太祖征天下，官拜永宁卫指挥使。永乐初，随郑和下西洋。据万历《泉州府志》卷十二，武卫表记，干氏通州人。干八秃帖木儿，似是蒙古人或色月人。从碑文“皆以本教为念”句看，干辅系伊斯兰教徒。

西南，宝盖天马在东南，凤山在东北，朋山在西北。众峰迤列，如屏如垒，溪水从西来，二长虹阑之，大瀛海汪洋其东。附瞰城中，千雉如带，双塔插天，通衢曲巷，飞甍联檐，四望一紫，在趾踵下。楼北有堂，郡太守万灵湖公额曰“明善堂”。以楼为正峰，横河界，之通海水潮汐，短桥以济。异时教众，每于月斋、日斋，登楼诵经，已毕，退休息于此堂之上。寺极观备是矣。胜国以前，递坏递兴，无得而纪。按碑载：元至正有回夏不鲁罕丁与里人金阿里修之。明兴，不知凡几缮。隆庆丁卯，塔坏，住持夏东升鸠众修之，太守万灵湖公捐俸以助。今万历三十五年，地大震，暴风淫雨，楼栋飘摇倾圮日甚。住持夏日禹率父老子弟请余修之，余曰：公役也，有赀舍财，无赀舍力，无乾没，无冒破，以成厥胜。众皆欣然。时丁君哲初以吏部郎请给里居，与余谋金同，于是始事。先是楼北无庭除，左设居房，右置竈舍，中道如甬，后为占住者屠牛之垣，余是以移去之，易居为洗心亭，除竈为小西天。庭空月碧，楼影徘徊，亭光翼之，若增一胜。楼之坏者葺，欹者正，仆者隆起。因集颜鲁公“遥天楼”三字额之。又题曰“唯天为大”，以晓人尊天之意。逮及明善之堂，翕然改观矣，余乃记之。余按净教之经，默德那国王谟罕蓦所著，与禅经并来西域，均非中国圣人之书。但禅经译而便于读，故至今学士谭之；而净教之经，未重汉译，是以不甚盛行于世。然以余所观，释氏书多祖心经。其始译，则沙门玄奘奉诏为之，岂其人通夷语解佛理，果无鲁鱼亥豕之误乎？唐一时君臣，奉若天书，即二帝三王之经不啻，上好而下必甚，是以萧瑀、傅奕之徒皆言佛，而佛经滋多于是矣。吾以为玄奘之译，未必尽无讹，而《金刚》、《楞严》、《圆觉》、《法华》以下之书，岂必其真从西至也？禅经译而经杂，净经不译而经不杂。译者可言而亦可知，知之则愈幻，不译者不可知而可言，徒读之，未尽舛。尝按是以思，儒有声色臭味，安佚不谓性之说，禅之教近之，故不有其眼耳鼻舌身意，而空之于一切，但言性而不言命；儒有仁义礼智，天道不谓命之说，净之教近之，故有其君臣父子夫妇而归之于事天，但言命而不言性。之二者，习之而善，各有得，习之而不善，均不能无得，乃今之习净教者何如也？沿其迹，不得其真性。往物肇于饮食之弥，文踵率其出沐之故事，曾于“维天之命”一置思否，甚则以肉食为斋，以净为教矣。是以世俗见其然，信机祥者，既已其□关于死生祸福之籍而忽之，饭慈悲者，又以其多不合于斧斤芒刃之用而□之。故清净氏之言天堂，反不如释氏之言地狱，虽其先守教之家，今亦掉臂而叛去，此教



A 9 明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

泉州宗教石刻

之所繇衰，而寺之所繇圮，乃未趋渐失使然耳，岂其初立教之本旨哉？说者谓儒道如日中天，释道如月照地，余谓净教亦然。韩昌黎欲于佛火其书，庐其居，此愤激太过之论。茫茫区宇，何所不有，邹鲁六籍之外，百家九流，亦足补苴大道，何必尽非？上帝临汝，无贰尔心，吾于斯楼取其为事天之所；多言释道，不如冥冥，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吾于经取其不译而已矣。夫是以议修复之，非徒以区区灵光之迹也。

是役也，郡大夫姜公，邑大夫李公谓兹楼之胜，于文庙有关，捐俸助修，及里中诸大夫君子相与协力成之，余何力之有焉？役始于万历戊申岁之六月，竣于己酉岁之九月，费金百有奇。董役则林日耀、任才鍾、李东廉、王廷华，募缘则夏日禹、何仕全、何天启，而昼夜勦心竭力，以稽工实，则日耀之功居多。例得并书。

万历叁拾柒年岁在己丑秋重阳之吉，儒林门人李光缙、宗谦甫顿首拜撰。

附录一：李光缙《净寺纪序》

净寺始议修时，众皆难之，今工幸告成矣。志斋陈公著戒杀议，以禁末俗屠牛之非；哲初丁公作明善堂记，以溯本初敬天之美。由陈公之训，则辞严而义正，使人悚然知所畏；由丁公之训，则旨远而思长，使人翕然知所兴。均于世风大有裨也。余自惭多言而无益矣，安能复置喙哉？虽然窃有概于中。

寺建自宋绍兴间，去今七八百年久矣。当是时，缙绅大夫家，阀阅相高，岂无广宫大厦，名园崇台，夸耀一时。今不唯无一留者，且不知其几奕棋而几桑海矣。此寺岿然独存，虽极颓坏，又令修复，何以故也？夫亦治构者之人，捐金公之，不以为己私有也。唯其不以为己私有，是以可千百年而不废。今夫人竭半生之力，倾不赀之费，以治宫室台榭，不过欲身有之，而以遗其子孙，乃其不终有之端，遂孽于此。繇既去之后思之，其当日蚤虻之劳不过代他人牛马之役耳。何怪其不能久有此乎。故今之修寺，与寺之所以得修，亦乃其初非一家一人之有，是以能长存至今也。

昔苏坡公，为其父老泉公，舍吴道子四菩萨像，浮屠人唯简，作大阁以藏之。坡公语简曰：“此唐明皇之所不能守，而焚于贼者也。余得之以献先君，先君最嗜之。今为先君舍而与子，子其何以长守此？”简曰：“吾以身守之。”坡公曰：“是终子之世耳？”简又曰：“吾盟于佛而以鬼守之”。坡公曰：“世有无佛而蔑鬼者”。坡公非欲简之自为守也，以为吾不有，而为父舍之，以教天下之孝，自非无佛蔑鬼之人有无父之心，而甘自同于广明之贼者，其奚忍取之而以为快也。

吾今亦窃坡公之意，修之以公，斯世之知事天者，其或后有畏天、不畏天之人，此坡公之所不能必于菩萨阁也。余亦恶乎知之，但知今日之可修，以俟后人之能修而已。^①

附录二：李光缙《重修清净寺募缘疏》（万历三十六年）

窃以吾儒之道东鲁为尊，异氏之端西天各别。维兹清净之教，不同佛乘之宗。盖其道主

^① 明李光缙《景壁集》卷五，文序，《净寺纪序》。崇祯十年，武林出版。

于事天，而其法先于尊祖，不必外别其派。舍世身以皈空，何尝内弃其亲，沿衣钵而他父。业即士农工商之业，人为父子兄弟之人。说其真言，谅不在饮食拘忌之迹。微其奥旨，倘亦有神明斋戒之方。所严者天而非神，可无尚鬼之诮。所宗者法，而无像，何烦迎骨之讥。虽语不谐乎唐音，和之者寡，而经无从乎汉译，读之为难，然惟不易以中国之书，是以得免乎伪经之杂。宣则同调，即异斋可以合鸣。悔则净心，但顶礼而无供养。依一年之运，定一日以为斋。按七政之期，遇七日则有拜。礼实严而难犯，法似近而易遵。岂无当儒者之慎修，可沐浴以事上帝。抑或同墨子之薄葬，亦封树而掩其亲。故有谭禅谭玄。是书固推援之所未及，而儒或攻佛攻老，此道则弹射之所不加。均非震旦之真传，当是竺乾之一派。

据此层楼之设，岂非壁土之奇，筹坎离而宅其中，通震兑以作其会。门以南为向，堂以西为尊，叠叠重重，规制异人间之庙宇，昂昂哈哈，翠革仿天上之楼台。峙文庙之东，则如凤有翼而龙有角。崛武台之北，宛若虎斯隐而豹斯藏。一柱干云，并紫帽峰而作对。七级凌日，参开元塔以为三。宁第壮法门之观，实足表儒林之胜。乃积岁月之颓坏，兼值风雨以飘摇。屋虽未颠，栋其挠下，若及今而葺治，犹有灵光。必徒任其丘夷，终然瓦解，诚净教之存亡攸系，亦斯文之兴废所关。为此募缘共成胜事，善根有触，何必问人主出奴。福地无边，但异发同心雅念。落笔即为实愿，喜拾请无虚言^①。



A 10

^① 李光缙《景壁集》卷十一，疏。崇祯十年，武林出版。

A 10 清净寺礼拜堂正门

进清净寺大门，过甬道向左转（即西面），有礼拜厅。礼拜厅正门门顶作尖拱形。尖拱内有三块砌叠在一起的白花岗石，各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系《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二十五节节录和第一百二十七节全文，见本书第314页）。最下面的一块石刻（即礼拜厅大门的门楣石）的底长为2.29米。除去左右门框石宽各0.23米，礼拜厅大门实际宽1.83米。

A 11 清净寺礼拜堂临街石墙上八个方形窗和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A 11.1 清净寺礼拜堂临街石墙
(上有八个方形窗)

礼拜堂临街八个方形大石窗，均高3.08米，宽自东向西依次为1.81、1.82、1.80、1.80、1.87、1.87、1.84、1.84米。其建筑风格显然与伊斯兰建筑作尖拱状不相称。据明万历三十七年《重修清净寺碑记》载：“设二十四窗，象二十四气”和“南八门象八卦”。因此，很可能是明代为适合其所谓“两仪”、“四象”、“八卦”、“乾元”等而改建的。窗顶临街石墙上，有一长列古阿拉伯文字石刻（系《古兰经》第七十六章全文，见本书第314页）。

这一长列古阿拉伯文字石刻，是由八方横长方形石刻组成，全长达19米。文字内容，是《古兰经》第七十六章全章共三十一节全文。

A 12 清净寺礼拜堂内的石壁龛和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清净寺礼拜堂屋顶早已倾塌，仅存四周的石墙。礼拜大厅宽23.10米、深18.68米。堂内西面（朝向圣地麦加方向）的石墙上建有壁龛七个，均作尖拱形顶。以正中的一个壁龛为最大，高3.40米，宽1.74米。龛内砌有七方各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的石刻，内容系《古兰经》经文。正中石龛位于西墙正中凹入的方形壁面上，是当时讲经坛所在地，宽4.60米，深4.32米。迄今泉州伊斯兰教徒还称之为“奉天坛”。左右两旁各有较小的壁龛三个，分别向左、右依次排列。龛内都雕有古阿拉伯文字。左面的三个龛内，各砌五方浮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的石块。右面的三个龛内，各砌四方浮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的石块。各龛所在的石墙很厚，近1米。各石壁龛顶上方的石墙上，也刻有通壁宽的横长古阿拉伯文字一行，内容亦系《古兰经》经文。

A 13 清净寺礼拜堂内的石壁龛

礼拜堂正中壁龛，高3.40米，宽1.74米。尖拱形龛内砌有古阿拉伯文字石刻，白花岗石琢成。石壁龛位于“奉天坛”正中，是七个壁龛当中最大的一个。龛内用十四层横长条形石块砌成龛壁，尖拱形龛顶处叠砌的两方石块各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以下隔层砌古阿拉伯文字



A 11.2 礼拜堂临街石墙方窗之上的阿拉伯文字石刻



A 12.1 礼拜堂西墙左边



A 12.2 礼拜堂西墙右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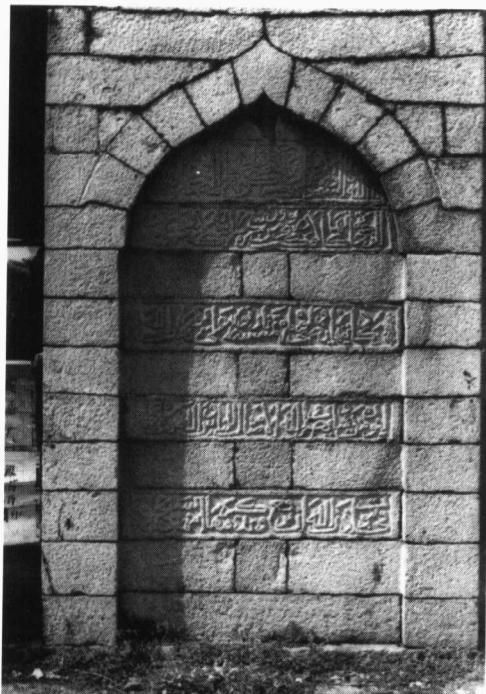
石刻五方，全龛共七方，内容系《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一百零七节、第五章第五十五节、第三章第一百四十四节节录、第三十三章第四十节节录、第六十一章第六节节录、第四十八章第二十八节、第四十八章第二十九节节录、第二章第二百零七节、第九章第四十节节录（见本书第317页）。

左边第一壁龛，高2.53米，宽1.29米。尖拱形龛内用十一方石块砌成龛壁，尖拱形龛顶处第二、第三层叠砌两方石块各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以下隔层砌古阿拉伯文字石刻三方，全龛共五方。皆以白花岗石琢成。石刻高度均20多厘米到30厘米不等。内容系《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三十六节全文（见本书第31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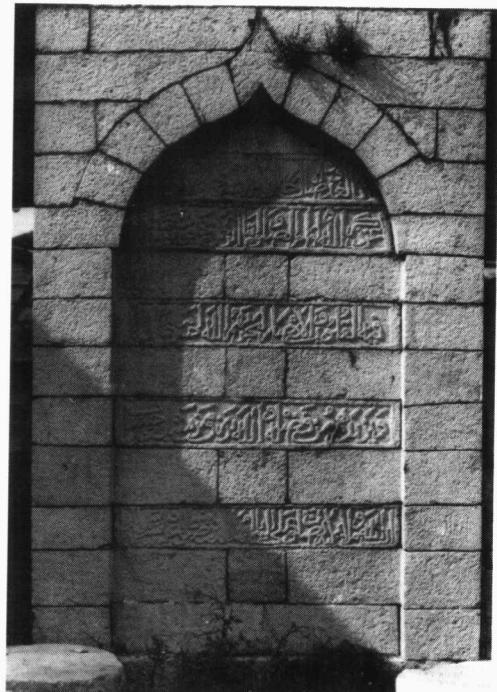
左边第二壁龛，高2.57米，宽1.28米。尖拱形龛顶处砌叠两方古阿拉伯文字石刻，以下隔层砌三方古阿拉伯文石刻，皆白花岗石琢成。石



A 13.1 礼拜堂正中壁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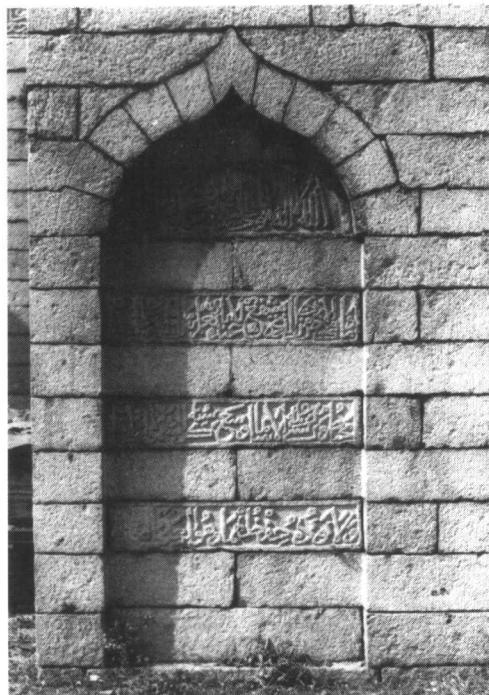
A 13.2 礼拜堂左边第一壁龛



A 13.3 礼拜堂左边第二壁龛



A 13.4 礼拜堂左边第三壁龛



A 13.5 礼拜堂右边第一壁龛



A 13.6 礼拜堂右边第二壁龛



A 13.7 礼拜堂右边第三壁龛

刻高 20 多厘米不等。内容系《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七、三十八节全文和第三十三章五十六节全文(见本书第 318 页)。

左边第三壁龛，高 2.52 米，宽 1.28 米。自尖拱形龛顶处以下隔层砌古阿拉伯文字石刻四方，皆白花岗石琢成。石刻高度 20 多厘米不等。内容系《古兰经》第二章二百八十六节节录和第三章一百九十三、九十四节全文(见本书第 319 页)。

右边第一壁龛，高 2.43 米，宽 1.09 米。自尖拱形龛顶处以下隔层砌古阿拉伯文字石刻四方，皆白花岗石琢成。各方石刻高度 20 至 30 厘米不等。内容系《古兰经》第二章二百五十五节全文(见本书第 320 页)。

右边第二壁龛，高 2.42 米，宽 1.07 米。自尖拱形龛顶处以下隔层砌古阿拉伯文字石刻四方，皆白花岗石琢成。各方石刻高度由 20 至 30 厘米不等。内容系《古兰经》第三十一章二十九、三十、三十一节全文(见本书第 320 页)。

右边第三壁龛，高 2.43 米，高 1.08 米。尖拱形龛顶处以下隔层砌古阿拉伯文字石刻四方，均白花岗石琢成。各方石刻高度 20 多厘米不等。内容系《古兰经》第三章一百八十九、一百九十、一百九十一、一百九十二节全文(见本书第 321 页)。

A 14 清净寺永乐五年上谕碑

进入清净寺大门，在第二层穹顶下的右侧石墙上，嵌有一方白花岗石雕成的永乐上谕碑(1997 年，该碑移砌清净寺北围墙上)。碑略作横长方形，宽 164 厘米，高 101 厘米。四周浮雕九条飞龙图案。碑顶上边，刻“敕谕”二字，以下碑面直书汉字十六行。文字照录如下：

敕谕

大明皇帝敕谕米里哈只。朕惟能诚心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劝率善类，阴翊皇度。故天锡以福，享有无穷之庆。尔米里哈只，早从马哈麻之教。笃志好善，导引善类，又能敬天事上，益效忠诚，眷兹善行，良可嘉尚。今特授尔以敕谕，护持所在。官员军民一应



A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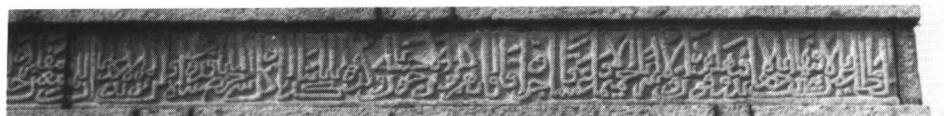
人等，毋得慢侮欺凌，敢有故违朕命，慢侮欺凌者，以罪罪之。

故谕

永乐五年五月十一日

A 15 礼拜堂西面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这一长行古阿拉伯文字石刻，全长 18.50 米，白花岗石琢成。由六方横长方形石刻组成，为礼拜堂右边石墙高处三方石刻和礼拜堂左边石墙高处三方石刻，中间隔有宽 4.60 米的“奉天坛”。所刻文字，系《古兰经》第七十八章全文（见本书第 321 页）。



A 15

A 16 礼拜堂奉天坛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

这一长行阿拉伯文字石刻，由三方横长方形的白花岗石琢成，砌于礼拜堂奉天坛的石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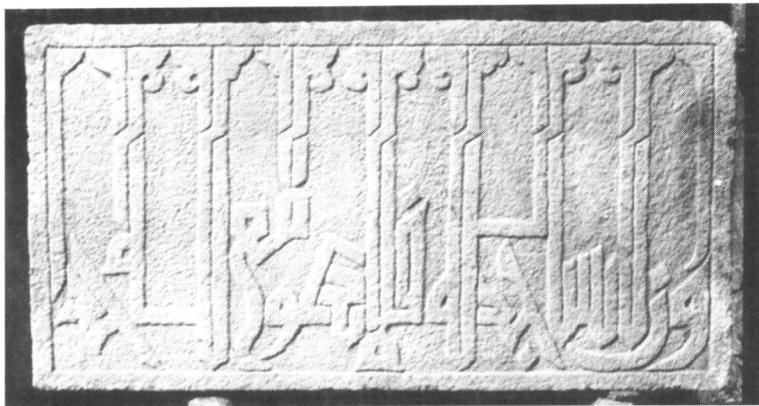


A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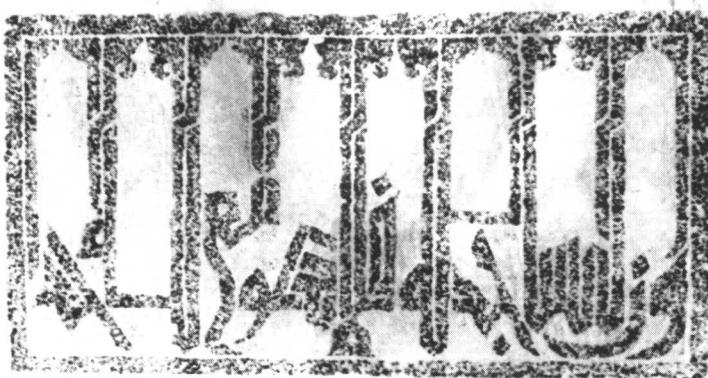
高处。全长 13.20 米。内容系《古兰经》第二章一百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节全文(见本书第 323 页)。

A 17 也门人奈纳·乌马尔修建清净寺碑记

碑高 50.05 米、长 96.02 米、厚 8.7 厘米, 辉绿岩雕成。碑为长方形, 两面皆浮刻古阿拉伯文字。1940 年, 泉州通淮门拆卸时, 被挖城工人抬回家中铺地。1956 年底, 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某姓农民家里发现。据云, 此石碑出土时, 旁边杂以一些大块雕花青石(即印度教石刻)。并且在这碑石出土地点附近, 还掘到多方长方形和尖拱形的回文(即阿拉伯文字)石



A 17.1 碑记正面



A 17.1 拓片

块。这些石块都被卖掉作建屋石材。当时选取这方石碑拾回家中，原是打算作洗衣板用的，也曾用过一段时间，后改用作铺地石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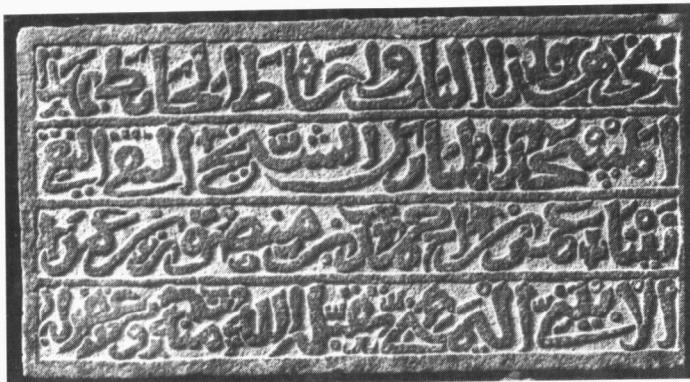
碑的正面，浮刻库法体古阿拉伯图案文字（系《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全文），字体规范，为数十年来泉州地区所发现的古阿拉伯文字石刻中，书写最好的一方（见本书第324页）。

碑的背面，浮刻四行古阿拉伯文字，行间有浮刻横线隔开。碑文是记载也门阿卜也尼城人奈纳·乌马尔修建清净寺的事（见本书第325页）。

1954年10月，我们在泉州南较场棋盘园发现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字的清净寺石碑石座。这方石碑座是居民筑屋从地下深处掘出的。

以上两件石刻发现的地点相近，因此我们推测，宋代或者元代，在泉州南较场棋盘园这个地方，曾经存在过一座清净寺。或者它就是奈纳·乌马尔修建的这座清净寺。

古也门的阿卜也尼城，即今阿拉伯半岛南端的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东南部的阿比迪城，地处半沙漠地带，气候干燥。也门是伊斯兰教什叶派势力最盛的国度之一。



A 17.2 碑记背面



A 17.2 拓片

A 18 拉吉·艾比克里姆重修清净寺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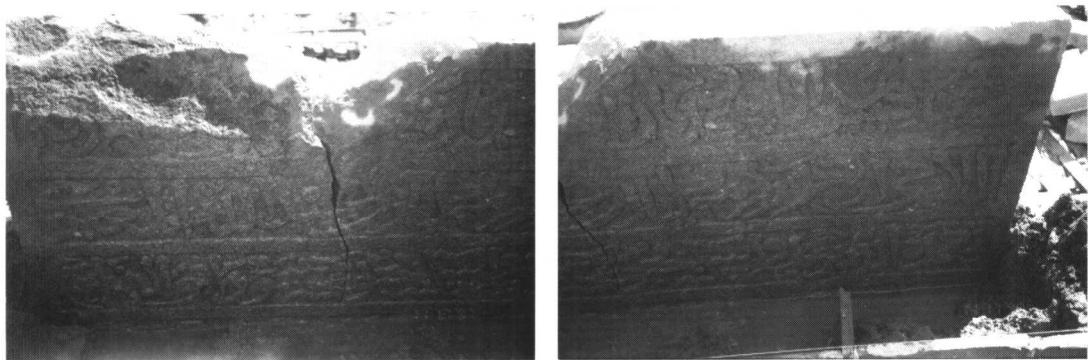
A 18.1 碑记正面



A 18.1 拓片

碑宽 99 厘米、高 56 厘米。辉绿岩雕成。石碑已断裂为左、右两块。沿正面碑石的四周，浮雕一条宽 3 厘米的方框，碑中浮刻库法体古阿拉伯图案文字一行，内容系《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全文(见本书第 325 页)。

碑石于清末泉州南较场棋盘园地下掘获，后收存通淮街清净寺，之后又被砌于明善堂大厅西墙正中。此碑的库法体古阿拉伯图案文字的字体，与奈纳·乌马尔修寺碑记的正面相



A 18.2 碑记背面

似,文字内容则完全一样。该碑有错笔,据判断是模仿乌马尔修寺碑记的库法体阿拉伯字刻成。由于它发现的地点也近通淮门,所以很可能是另一座清净寺的建筑物。

碑的背面周沿浮刻 3 厘米宽的方框,方框里有二条浮刻等分隔线,在等分长方框里浮刻楷体古阿拉伯文字。整个碑面浮刻三行古阿拉伯文字。1997 年,泉州通淮街清净寺进行重修,该石碑曾被卸下,该碑背面上部破损严重,加上拍摄者居于俯视角度,因而阿拉伯文字不甚清楚。不久,石碑又被重砌于明善堂西墙正中。2004 年 7 月,住持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张海星阿訇依据照片进行认读,认为不完全的译文是:“拉吉·艾比克里姆吩咐修建和管理这座清真寺……祈求得到真主的慈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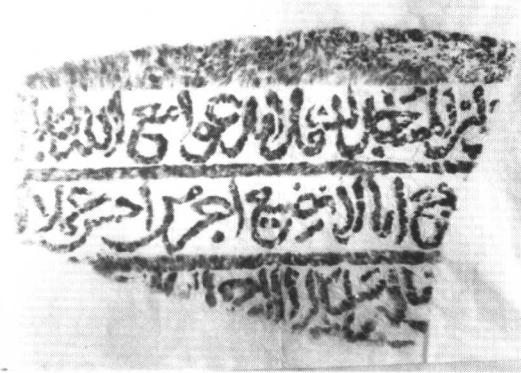
A 19 穆罕默德修清净寺碑记

碑为辉绿岩石雕成,已残断。长 61 厘米、宽处 39.5 厘米、狭处 20 厘米、厚 8.4 厘米。1948 年,在泉州南门城基内出土。若恢复其原形,碑石应是略微圆弧顶的长方形碑。两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行间有横线隔开(见本书第 325 页)。

根据译文,这座清净寺是穆罕默德建造的,他的别名叫加麦尔丁。这就证明,在宋代或元代,泉州南门城附近,曾经存在过一座清净寺。



A 19.1 碑记正面



A 19.1 拓片



A 19.2 碑记背面



A 19.2 拓片

A 20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这方石刻,从外型看,从雕刻的古阿拉伯字的内容看,都与 1946 年在南门城基掘出的另一方尖拱形门楣石相似,其内容都是讲死亡的事。

这方石刻,于清末在棋盘园附近掘获,被当时伊斯兰教徒收存通淮街清净寺,后来被移砌于清净寺“明善堂”大厅西墙正中。

通观自清末至今百多年来,所发现的古伊斯兰教寺和“拱拜尔”石刻,其地点大都在通淮门向南,经南较场(包括棋盘园),到南门城(德济门)城基(包括月城)。由此,我怀疑宋、元时代,泉州的另几座伊斯兰教寺和“拱拜尔”陵墓的遗址,很可能就集中在通淮街以南,排铺街以东,这一城东南的城内外区域里。这一大片区域,正是宋、元时代泉州的蕃坊和墓葬地所在地。

石刻作尖拱形,底长 135 厘米,高 54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

石刻正面沿尖拱的两个弧边及底边,浮雕一条 3 厘米宽的框。其内浮刻一条 3 厘米宽的横线,把整个石面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横线以上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二行,横线以下浮刻库法体古阿拉伯图案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25 页)。石刻背面浮雕两行古阿拉伯文字。1997 年,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时,从西墙卸下。后又原样砌于明善堂西墙正中。



A 20.1 门楣石正面



A 20.1 拓片



A 20.2 门楣石背面

A 21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石刻底长 105 厘米、高 55 厘米、厚 30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上尖下广，作尖拱形。石的正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另一面在横线下浮雕库法体阿拉伯图案文字（见本书第 325 页）。1946 年，在泉州南门城基内掘获。这方石刻是一建筑构件，可能是来自南门城附近被拆毁的一座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

这方石刻背面的库法体阿拉伯文字，与 A20.1 完全相同（见本书第 326 页），但在刻写方面却不规范，因此它很可能是对 A20.1 石刻的模仿。这表明两方石刻分别代表了两座“拱拜尔”陵墓。至于石刻正面头一个词的译文是“讲台”，则不知其用意是什么。



A 21.1 门楣石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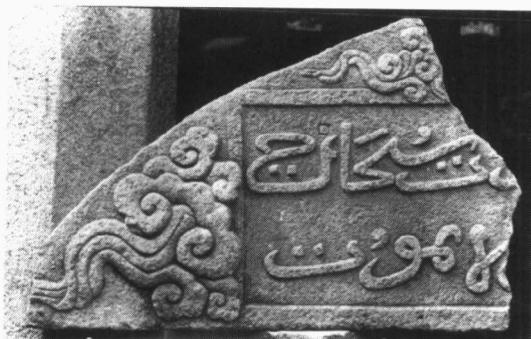
A 21.2 门楣石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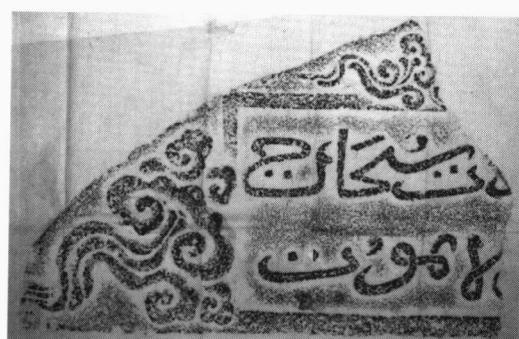
A 21.1 拓片

A 22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石刻已残破，原状略呈三角形。残高 40 厘米，底残长 65 厘米，厚 10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正面刻一个凹入长方槽格，格里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见本书第 326 页），格左边浮雕卷云，格上方也浮雕卷云，雕工颇精细。背面正中刻一凹入长方形槽格，格里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见本书第 326 页）。根据现状判断，这是一方尖拱形门楣石。1958 年 12 月，发现于距南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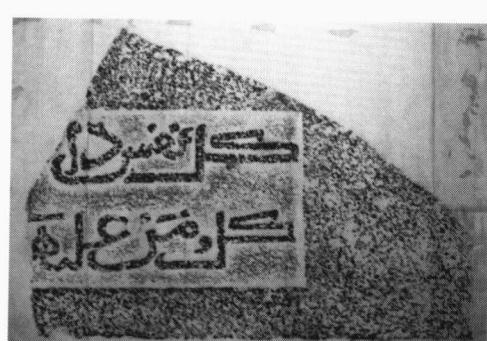
A 22.1 门楣石正面



A 22.1 拓片



A 22.2 门楣石背面



A 22.2 拓片

门不远的乡民家里。据该乡民说,石刻是十多年前(1946~1948年),因参加挖掘南门城墙,在城基深处所获,与其他杂石运回家中砌墙筑屋。因该石刻呈三角形,不便砌叠,遂弃置不用,所以这方门楣石,可能是从南门城墙附近一所早已毁弃的伊斯兰教“拱拜尔”式陵墓上拆卸下来的。

A 23 古伊斯兰教寺门楣石

石高50厘米、底长186厘米、厚15厘米。白花岗石琢成。它仍是一方在1946年由泉州南门城垣挖出的伊斯兰教寺门楣石。两面皆浮雕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326页)。随后,由清净寺金明增阿訇移置明善堂保存。

从石刻底长1.86米来判断,这座清净寺的门比现存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正门稍狭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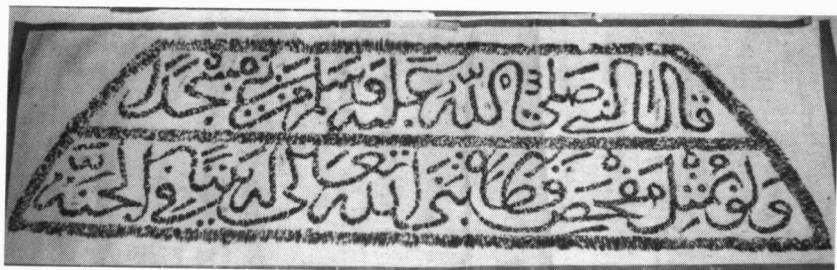
A 23.1 门楣石正面



A 23.1 拓片



A 23.2 门楣石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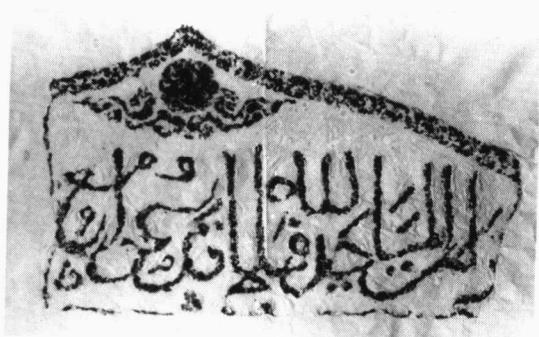


A 23.2 拓片

A 24 古伊斯兰教寺门楣石



A 24.1 门楣石正面



A 24.1 拓片



A 24.2 门楣石背面



A 24.2 拓片

石刻呈尖拱形，已残断。残长 57 厘米，高 36 厘米，厚 10.2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正面尖拱下浮刻云月图案，下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背面阴刻五行书写很不规范的古阿拉伯文字，颇难辨认（见本书第 326 页）。它可能是一方伊斯兰教寺的门楣石。1948 年，在南门城基内掘获。1955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石刻文字纪年为回历 728 年

(元泰定五年,公元 1328 年)。

A 25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枢石



A 25.1 门楣枢石正面



A 25.1 拓片



A 25.2 门楣枢石背面

石刻已断裂为两段。长 108 厘米,高 30 厘米,厚 11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全石呈长方形,周边浮雕方框。石刻正中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见本书第 327 页),行间用浮刻横线隔开。石的左、右两端,各刻一个方框,左边方框内浮雕折枝山茶花一朵,右边方框内浮雕野牡丹花一朵。石刻背面两端浮雕瓜瓣形门枢。因此,该石刻是一座已毁的古伊斯兰教“拱拜尔”的门楣门枢石。1959 年 3 月,在泉州南门城墙附近居民家中发现。据云为 1946~1948 年拆卸南门城墙时所获。

A 26 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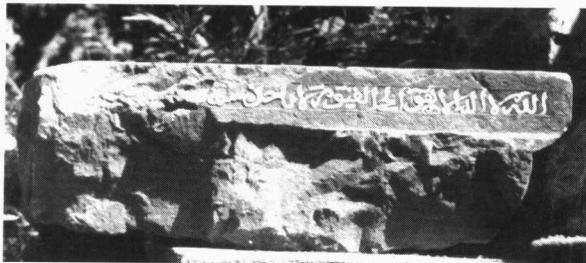
石墓已残断。长 70 厘米,宽 34 厘米,残高 22 厘米。浅灰色石灰石雕成。1954 年 10 月,因居民在南较场棋盘园筑屋挖地,从地下 1.20 米深处掘获。

石墓残高 22 厘米,但雕刻部分只有石座上沿周边宽 7 厘米一带。下面的雕刻部分被毁。

在这 7 厘米高的范围内,于正中刻一凹入长方格,格中浮雕古阿拉伯小楷体文字一行。长方形格的高度仅有 3 厘米。长方格周边阴刻一条高仅 2 厘米的“剔地平卷叶”^①连传花枝图案。阿拉伯文字的雕工极精细,配上周边的花朵图案,给人一种严肃、工整的感觉。

石墓的顶面,沿石面的四周,雕刻一条 4 厘米宽的长方形框,框内浮雕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衬以枝叶,雕工亦甚精美。在绕以浮雕牡丹花的长方框的中间,是墓顶石的位置,但墓顶石已被凿毁。墓顶石底的位置宽 21 厘米。石墓四周的古阿拉伯文字,除左侧面被毁外,其余三面大部分保存(见本书第 327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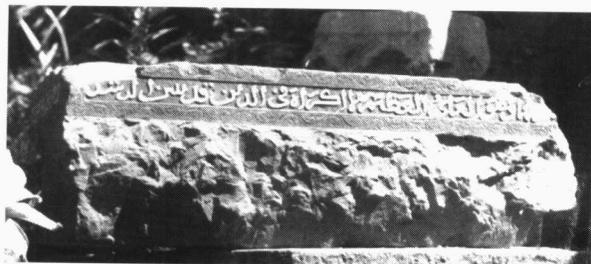
泉州发现古伊斯兰教石灰岩质须弥座式石墓,这还是第一次。泉州开元寺保存着一方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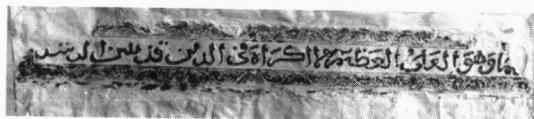
A 26.1 墓石正面



A 26.1 拓片



A 26.2 墓石背面



A 26.2 拓片

^① 李诚《营造法式》卷第三十二,格子门等腰华版第三,剔地平卷叶。1929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A 26.3 墓石右侧面



A 26.3 拓片

唐保大四年(公元 946 年)刻的石灰岩质的石经幢,经幢上文字记载石材的来源是:“请僧于浙水募缘,召匠于太湖采石,徙移五载,竟未成功。”^①可见,泉州的石灰岩石,要到苏、浙采购。从石墓的用材和雕工之精美,可以推断墓主出身于十分富裕的商人家庭。这里我们又联想到现代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还保存着一座石灰岩石雕刻的古香炉,它们之间可能存在者联系。

A 27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碑刻

碑长 74 厘米、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沿碑的四周,浮雕一条宽 3 厘米的框,框中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27 页),字体浑厚。该碑清末在棋盘园掘获,后收存通淮街清净寺,以后移砌于明善堂大厅西墙上。



A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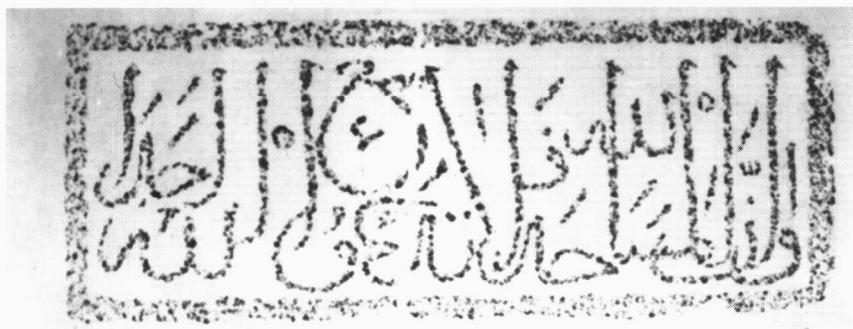
A 27 拓片

① 泉州历史研究会、泉州文物管理委员会编《泉州文史》第 9 期,第 29~32 页,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1986 年 12 月出版。

A 28、A 29 古伊斯兰教寺碑石



A 28、A 29



A 28、A 29 拓片

原为两块断碑。A28 碑左端残断。残长 68 厘米，高 48 厘米。A29 碑右端残断。残长 56 厘米，高 48 厘米。均为白花岗石琢成。碑的边缘浮雕 4 厘米宽的框，框内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字体瘦长。二碑石的高度相同，字体一致，从行文看，刚好由“你”字断开，二石接合，恰是一碑；A28 是右半部，A29 是左半部。这方碑刻的古阿拉伯文字与现存通淮街清净寺石墙高处的古阿拉伯文字石刻，有相似之处，但不同之处有四：其一，本碑的笔画，最宽处只有 2 厘米，而通淮街清净寺石墙高处和甬道后石墙上的古阿拉伯文字的笔画，则一般宽在 2.2 到 3.5 厘米之间。其二，本碑字体瘦长，而后者浑厚。其三，本碑浮雕文字笔画表面呈圆凸形，而通淮街清净寺石墙高处和甬道后石墙高处的阿拉伯文字笔画表面，则呈平面状。其四，就石碑边缘的框看，本碑周边框的宽度也超过通淮街清净寺石墙高处阿拉伯文字石刻碑的周边框的宽度。再从碑中文字内容看，译文是“清净寺是属于安拉，你们不要向安拉之外者祈祷”（另见本书第 327 页）。可见，它不是现存通淮街清净寺的残留碑刻，它可能是另一座清净寺（已毁灭）的碑刻。

这两块碑石，在清末泉州南较场棋盘园居民住宅区掘出，收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以后分别移砌明善堂大厅南墙和北墙上。1983 年重修明善堂时从墙上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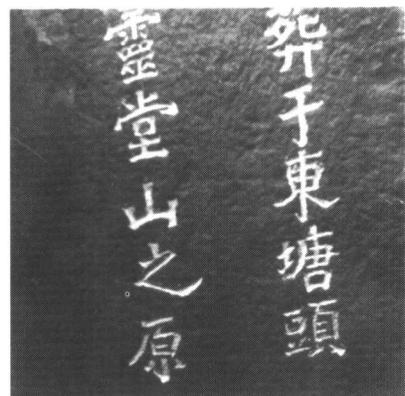
二、泉州东郊伊斯兰教灵山圣墓

A 30、A 31 东塘头元代丁节斋墓碑

碑高 84 厘米、宽 60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作圆拱形，与汉人一般墓碑形状相似。碑面上部刻“大元”两字；中间竖刻“节斋丁公墓”；其右侧和左侧分别竖刻“泰定四年”和“冬十月立”。皆阴刻。碑背面阴刻两竖行汉字：“葬于东塘头灵堂山之原”。元泰定四年为公元 1327 年，虽时隔数百年之久，又长期深埋城基下，碑字上的朱漆颜色尚存。1940 年



A 30 碑石正面



A 31 碑石背面



A 30 拓片



A 31 拓片

夏，在泉州东门城基掘获^①。从泉州东城门到东塘头灵堂山（即灵山圣墓），约1公里，从丁节斋墓碑石深埋于东门城基之下，足见元末明初泉州排外运动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即连距离东门城1公里的丁节斋的墓葬也不能幸免，而在捣毁之后，一概埋入城基。

据乾隆《泉州府志》和《晋江县志》^②记载，东塘头乡，属晋江县三十七都东湖铺。东湖铺领有圣墓、鹿（乐）园、东塘头等十四个乡。东塘头地名今日仍然存在，位于圣墓和鹿（乐）园之间，而紧邻圣墓。东塘头的位置，不是《陈埭丁氏回族宗谱·墓纪》所记的“三十九都驿路铺”^③。同是《陈埭丁氏回族宗谱·契约文书》，均记元代的东塘头是在三十七都^④。元代契约文书见文后附录。

查《陈埭丁氏回族宗谱》，万历甲午（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丁衍夏《东塘祖墓纪略》，仅记丁节斋“葬东郊”^⑤。而记丁节斋葬“三十九都”是明崇祯间一、二、三世合葬后之说。自泰定四年至崇祯间合葬，相去三百多年，族谱错误可以理解。可见，东塘头是在三十七都，即今灵山圣墓山麓。

自清末同治年间以来（公元1862~1874年），泉州的伊斯兰教有所复兴，当时人们曾根据《泉州南门外陈埭丁氏执斋公图谱》载：

吾族丁氏肇基于始祖节斋公，由姑苏行贾入泉，居于桐城之文山里……节斋公卒于元大德二年。

和《泉州南门外陈江雁沟里丁氏族谱》载：

我祖，自节斋公而上……不知其所至也。嘉靖丙申，伯父出所藏毅祖手书见示……蕃地蕃语，难于史册记也。其起句曰：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仕元，拜平章政事，行省云南。

人们据上推测泉州南门外陈埭十三个村庄的丁姓，是“赛典赤瞻思丁之后裔”。此后，是说甚盛。

1952年，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城基础，掘获一方赛典赤·杜安沙阿拉伯文字碑。赛典赤·杜安沙碑载其卒于回历702年（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而《陈埭丁氏执斋公图谱》载，丁节斋卒于元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根据赛典赤·杜安沙和丁节斋死亡年份相近，人们进一步推测，赛典赤·杜安沙可能即丁节斋。

^① 幼雄按：1984年6月24至26日，陈国强教授率领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博物馆等单位联合调查组，到泉州和晋江陈埭进行回族调查，并于同年10月1日完成《晋江县陈埭公社回族调查报告》（油印本）。在《回族调查报告》的第14页，附有丁节斋墓碑拓片的图画；第15页的第二段末，还记曰“（19）62年发现的丁节斋墓碑说明，陈埭丁姓至少元代其祖宗就已采用汉名汉姓了”。此结论甚正确。但说“（19）62年发现的丁节斋墓碑”，则是错误的。丁节斋墓碑发现于1940年夏。发生错误的原因，可能是当时调查组到我家访问，我赠送调查组一张丁节斋墓碑毛边纸质的拓片，拓片上打印1962年的字样。拓片上打印的是造作拓片的时间，而不是墓碑出土的时间。

吴文良先生于1940年发现丁节斋墓碑，是时陈埭回族丁氏始祖系赛典赤·瞻思丁说方兴，为慎重起见，长期没有发表这个发现，直至“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致死。2003年9月11日，我们兄妹几人，把丁节斋墓碑捐赠晋江市博物馆陈埭回族史馆保存。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都里和乾隆《晋江县志》卷一，舆地志，五，都里。

^③ 庄景辉校编《陈埭丁氏回族宗谱》卷五，墓纪、圹志，第138页。

^④ 同注③卷七，契约文书，第243~246页（见附录）。

^⑤ 同注③卷十，绘图、画像，第404页。

泉州宗教石刻

丁节斋墓碑的发现,说明丁节斋与赛典赤·杜安沙的国籍不同,死亡年代也相去二十五年,他们根本不是一个人,从而纠正了百年的讹传。但丁节斋碑更主要的是给我们提供了另外四个重要启示。

其一,据碑载,丁节斋“葬于东塘头灵堂山之原”。此地正是现在的灵山圣墓。灵山自宋以来,就是中外伊斯兰教徒的墓葬区,从墓葬地点看,我们确信丁节斋是伊斯兰教徒,这正与《泉州南门外陈江雁沟里丁氏族谱》所记同。同时,也揭示“灵山圣墓”在元代称“灵堂山”。所谓“灵山圣墓”,是明代何乔远《闽书》根据“回家言”:“唐武德间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的传说所记的后起之说。这与圣墓石回廊正中古阿拉伯文碑记所载“这两位传教士于法格木尔时代到这国家”^①的时间也无矛盾。所以元代的“灵堂山”即明代的“灵山”。这一点是为地方志书所遗漏了,揭示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据此,我们又联想到“灵堂山”一名称的来源。

其二,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六载:

负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其一也。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数,试那围其一也。试那围之在泉,轻财急义,有以庇护其畴者,其事以十数,族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建发于其畴之蒲霞辛(Abu Gasim),而试那围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东东(南)坡,既剪雉其草莱,夷铲其瓦砾,则广为窀穸之坎,且复栋宇,周以垣墙,严以扃钥,俾凡绝海之番商有死于吾地者,举以此葬焉。经始于绍兴之壬午(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而卒成乎隆兴之癸未(元年,公元1163年)。试那围于是举也,能使其椎髻卉服已任,生无所忧,死者无恨矣。持斯术以往,是使大有益乎互市,而无一愧乎远怀也。余故喜其能然,遂为之记,以信其传于海外之岛夷云^②。

又据《诸蕃志》载:

有蕃商曰施那围,大食人也,跻身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③

据以上记载,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灵堂山一名称,来源于宋代林之奇所记修蕃商墓。故丁节斋墓碑石的发现,为文献记载提供了实物证明。

其三,据泉州陈埭丁氏族谱记载,其始祖丁节斋于宋末“由姑苏行贾入泉”。丁节斋墓碑的发现这就为我们今天研究泉州地区回族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据陈埭回族丁氏族谱《仁庵府君传》(即四世祖丁善)云,始祖“节斋公自苏(州)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又云:“元至正末……徙居南门外廿里许,是为陈江”。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引阿尔肥达《地理书》:“此为中国都城,其大王拔格伯尔即居此”。

又同书引艾德利斯《地理书》说“中国面积甚广,人口甚庶。国王号称拔格伯格……”。

又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1章《补述行在》云:“今请言一华丽宫殿,国王范福儿之居也……国王范福儿例在此殿设大朝”。

“法格木尔”一词,各书译法不同,但都是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对中国皇帝的称呼。然译作“铁格木尔”,则可能是元成宗铁木尔(公元1295~1307年)。那么,泉州灵山圣墓的历史就不是如《闽书》和《闽书抄》所说的了。

② 宋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六,《泉州东坂葬蕃商记》。

③ 宋赵汝适著《诸蕃志》卷上。

又陈埭回族丁氏宗祠的门厅大门两侧的石柱，上刻“派衍金闾，二千石敬承祖惠；门迎宝盖，廿七都宏启人文”。据《苏州府志》记，苏州城内闾门外有丁家巷，巷内有座清真寺，为西域人所创建，现在该地仍为丁姓族人聚居。所以，门厅石柱对联的“派衍金闾”句，是回应丁氏族谱《仁庵府君传》里“节斋公自苏(州)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一句的。丁节斋墓碑的发现，证实陈埭回族丁氏来自苏州，其先祖已在中国居住多年。

其四，宋元时代，长期居留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分南北两路进入泉州港贸易。他们对发展泉州港的海内外贸易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陈埭丁姓、白奇郭姓属北方南下的，而南方北上的以蒲寿庚家族为代表。

宋元时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到泉州进行国际贸易，是借助居留中国数世，并已逐渐汉化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裔支持的。他们对招邀蕃商来泉州港贸易和传播伊斯兰教，曾起过特殊的媒介作用。过去，史学界注重研究蒲寿庚家族，而今加上姑苏的丁姓和杭州的郭姓阿拉伯人(或波斯人)，于元代南下泉州定居经商的史实，我们了解宋元时代的泉州港，不但是一個联系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大港，而且在国内泉州港与江、浙、淮、湖的港埠，亦组成一个密切的贸易网区，而这个国内贸易网区，亦以泉州港为中心。正如《螺江风物赋》概括的宋元时代泉州港繁荣景象，是“遐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贾客“自远方而来徙家者，复多于穴之蚁，巢之蜂”。^①证以《马可·波罗行纪》记载刺桐城云：“印度一切船舶……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一切蛮子商人常至此港……然后转贩蛮子境内”，^②则完全一致。以上两处的记载与丁节斋墓碑的发现可以互证，这是丁节斋墓碑发现的启示之四。

附录：鹿园祖墓文契

〔麻合抹立帐目〕 泉州路录事司南隅排铺住人麻合抹，有祖上梯己花园一段、山一段、亭一所、亭屋一间，及花果等木在内，并花园外屋基一段，坐落晋江县三十七都，土名东塘头村。今欲出卖□钱中统钞一百五十锭。如有愿买者，就上批价，前来相议。不愿买者，就上批退。今恐□□难信，立帐目一纸，前去为用者。

至元二年七月 日帐目 立帐出卖孙男麻合抹
同立帐出卖母亲时邻
行帐官牙黄隆祖
不愿买人姑忽鲁合 姑比比
姑阿弥答 叔忽撒马丁

〔麻合抹告卖花园山地帖〕 皇帝圣旨里泉州路晋江务，据录事司南隅住民麻合抹告：“父沙律忽丁在日，原买得谢安等山园、屋基、山地，辟成园，于内栽种花木，四围筑墙为界，及有花园外屋基地一段，俱坐落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塘头庙西保，递年立麻合抹通纳苗米二斗八升，原

① 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二《礼纪·艺文志·词赋类》之《螺江风物赋》有序。

②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156章《刺桐城》。1936年，商务印书馆初版。

泉州宗教石刻

买山园、屋基，东、西四至，该载契书分晓。今来为□□□远，不能管顾，又兼阙钞经纪，欲将上项花园、山地出卖，未敢擅便，告乞施行。”得此，行据三十七都里正主首刘观志等申：“遵依呼集耆邻陈九等，从公勘当得上项花园、山地，委系麻合抹承父沙律忽丁□买□□物业，中间别无违碍。□到各人执结文状，缴连保结，申乞施行。”得此，除外合□□□又字九号半印勘合公据，付本人收执，前去立帐。□□亲邻愿与不愿执卖，□便□人成交，毕日齎契□□投税，合该产苗依例推收，毋得欺昧违错。所有公据，合行出给者。

至元二年九月十一日给。右付麻合抹收执，准此。

〔麻合抹立情愿卖花园屋基文契〕 泉州路录事司南隅排铺住人麻合抹，有祖上梯己花园一段、山一段，于内亭一座，房屋一间，及花果等木在内，坐落晋江三十七都东塘头庙西，四周筑墙为界，东至孙府山，西至谢家园，南至瑞峰庵田，北至谢家山。又花园西边屋基一段，东至小路，西至陈家厝，南至空地，北至谢家园。因为阙钞经纪用度，将前项花园并屋基连土出卖，遂□晋江县□给公勘据，勘□明白，立帖□问亲邻，俱各不愿承交。今得蔡八郎引到在城东隅住人阿老丁前来就买，经官牙议定时价中统宝钞六十锭。其钞随立文契日一完领讫□□批目，其花园并地基□上手一应祖契，听从买主收执，前去自行经理管业，并无克留寸土在内。所卖花园、屋基，的系麻合抹梯己物业，即不是盜卖房亲兄弟叔伯及他人之业，并无诸般违碍，亦无重张典挂外人财物。如有此色，卖主抵当，不涉买主之事。所有合该产钱麻合抹户苗米二斗八升，自至元二年为始，系买主抵纳。今恐□□难信，立卖契一纸，付买主印税收为用者。

元至元二年十月 日文契 情愿卖花园屋基人麻合抹
同卖花园母亲时邻
引进人蔡八郎
知见卖花园屋基姑夫何暗都刺
代书人林东卿

〔阿老丁买花园山地税课给帖〕 皇帝圣旨里泉州路晋江县，今据阿老丁用价钱中统钞六十锭买到麻合抹花园、山地，除已验价收税外，合行出给者。

至元二年十月初三日给。右付本阿老丁。准此。

〔蒲阿友立帐目〕 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塘头住人蒲阿友，祖有山地一所，坐落本处，栽种果木。今因阙银用度，抽出西畔山地，经官告据出卖，为无房亲，立帐尽卖山邻，愿者酬价，不愿者批退。今恐无凭，立此帐目一纸为照者。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 日 立帐人蒲阿友
不愿买山邻曾大 潘大

〔蒲阿友告卖山地帖〕 皇帝圣旨里泉州路晋江县三十七都住民蒲阿友状告：“祖有山地

一所,坐落本都东塘头庙西,今来阙银用度,就本山内拨出西畔山地,东至自家屋基,西至墙,南至路,北至本宅大石山及鱼池后为界,于上一、二果木,欲行出卖。缘在手别无文凭,未敢擅便,告乞施行。”得此,行据三十七都里正主首蔡大卿状申:“遵依前去呼集亲邻人曾大等,从公勘当得蒲阿友所告前项山地,的□□□□物业,中间并无违碍,就出到□人执□文状,缴连申乞施□。”得此,合行给日字三号半印勘合公据,付蒲阿友收执,□□□□,问亲邻愿与不愿,依律成交,毕日资契付务报税,毋得欺昧税课过错。所有公据,须至给出者。

至正二十六年 月 日。右付蒲阿友。准此。

〔蒲阿友立卖山地文契〕 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塘头庙西保住人蒲阿友,父祖阿老丁在日,买得麻合抹花园及山,坐落本处。今来阙银经纪用度,就本山内拨出西畔山地连花园,东至自家屋基外地,西至墙,南至路,北至本宅大石山及鱼池后山为界,于上□有屋基并四角亭基及樟树、果木等树,及井一口在内,欲行出卖,经官告给日字三号半印勘合公据。为无房亲,立帐尽问山邻,不愿承买,遂得本处庙东住人徐三叔作中,引至在城南隅潘五官前来承买,三面议定,直时价花银九十两重,随契交领足讫,当将上项前地连园,交付买主照依四至管业为主。其山的系阿友承祖物业,与房亲伯叔兄弟无预,亦无重张典挂他人钱物。如有此色,卖主抵当,不干买主之事。其山园该载产钱苗米一斗,自卖过后,从买主津贴阿友抵纳。父祖原买祖契,碍祖坟,难以分拆,就上批凿破。今恐无凭,立此卖契一纸,缴连公据,付买主收执,前经官印税□□为照者。

至正二十六年八月 日文契 卖山地人蒲阿友
作中人徐三叔

〔蒲阿友立卖山地荔枝园文契〕 晋江县三十七都东塘头庙西住人蒲阿友,父祖在日,买得麻合抹荔枝园及山地,坐落本处。今来阙银用度,就本山内拨出西畔山地连荔枝树及六角亭一座并门屋等处,东至自家麦园,西至墙,南至姐姐住小屋,北至后山墙及路为界,欲行出卖,经官告给日字三号半印勘合公据。为无房亲,立帐尽问山邻,不愿承买,托得本处庙东保住人徐三叔作中,引至在城南隅潘五官前来承买,三面议定,价钱花银六十两重,随立文契日交领足讫,当将上项山地连荔枝园、六角亭等处,交付买主照依四至管业为主。其山、园内系阿友承祖物业,与房亲伯叔兄弟并无干预,亦无重张典挂他人财物。如有此色,卖主抵当,不干买主之事。其园该载产钱苗米五升,自卖过后,从买主津贴阿友抵纳。父祖的买祖契碍坟山,难以分拆,就上批凿。今恐无凭,立此卖契一纸,缴连公据,付买主收执,印税管业,永为用者。

至正二十七年二月 日 立卖山地荔枝园人蒲阿友
知见人吴娘仔
作中人徐三叔

〔潘粪扫立卖坟山文契〕 晋江县在城南隅住人潘粪扫,有自己承祖坟山墓地壹所,坐三

泉州宗教石刻

十七都土名东塘头鹿园内，拨出分前壹所，东至自己坟台，西至莲池，南至荔枝树及麦园，北至后山墙。右件四至分晓，自情愿将上项坟山出卖，遂托得陈三姐作中，引进二十七都丁宅边，三面议定，的实价钱陆折钞陆拾贯整，其钞随立文契日交收足讫。其坟山还买主前去照依四至管业，卖主不敢争执。坟山系是自己分前物业，不是盜卖房亲及他人之业。今恐无凭，故立文契一纸，付买人收执，永为祖者。契尾填写“后吉”二字。

洪武二十七年五月 日文契 卖坟山人潘粪扫
作中人陈三姐

[丁彦仁买坟山墓地税课给帖] 晋江县税课局今据本县二十七都丁彦仁用得实价钱折钞陆拾贯，买得同县在城南隅住人潘粪扫自己承祖坟山墓地一所，坐落三十七都土名东塘头鹿园，内拨出分前一所，该载东西四至登载契书明白。今责契赴税课局照例课，已依律收税外，所有愿降户部契本已销尽讫。今岁契本未蒙关降，今给乾字贰号半记勘合契尾付照者。右付买坟山墓地人丁彦仁收执。准。

永乐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吏缺 巡栏吴乌仔

A 32 20世纪20年代的泉州东郊灵山圣墓及碑记

本图片是20世纪20年代灵山圣墓的三座墓和木石结构墓亭的残架。请注意四根石亭柱皆雕成梭柱型。

灵山圣墓距泉州城东门1公里。明万历间何乔远著《闽书》卷七《方域志·灵山》条记载：

自郡东南折而东，遵湖冈南行为灵山，有默德那国二人葬焉，回回之祖也。回家言：默德那国有吗喊八德圣人，生隋开皇元年，圣真显美，其国王聘之，御位二十年，隆示经典，好善恶恶，奉天传教，日不晒曝，雨不湿衣，入火不死，入水不澌，呼树而至，法回而行。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此山。然则二人唐时人也。二人自葬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曰圣墓，曰西方圣人之墓也。其在郡城有清净寺云。

而《闽书抄》下册·方外志(抄本)则记：

回回主教沙渴储、我高仕者，默德那人。其师曰吗喊叭德(《一统志》作摸罕蓦德)。生而神灵，入火不热，入水不濡，呼树而止，法回而行，盖至人也。国王聘之，禅以位，妻



A 32 20世纪20年代的灵山圣墓

以女。降示经典(天经天人所授,三十藏分皆百一十四部),奉天传教者四十余年(师生隋开皇元年,在世六十有五载)。唐武德中,遣徒四撒霞叭(犹华言大贤人)来朝京师,有旨留教中国。而沙谒储、我高仕两人者教泉州(其一贤教广州,二贤教扬州)。其教崇奉西天,不设象(以万物本乎天,天一理无可像,向西礼拜),净心诵经,用香花去楮烛,曰:“吾以自然天香享帝也”。开引善类,重杀生(非同类杀弗食,不食唯豕犬肉),要归于敬天严上。以故,世祖悦其说,敕所在建礼拜寺奉之。此两人住泉,自营兆郡东郊灵山。后化去,其徒葬之。傍穴,高弟世许吧吧者附焉。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曰:圣墓(西方圣人墓也)。水旱疾疫,应祷如响。

又最早记载灵山圣墓的,首推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泉州知府周道光,他的记载收入《泉州府志》卷六《山川·灵山》条。其记云:

泉州郡城之东,为仁风门之外半里许,稍折而东南,送湖冈行。望之垒趺郁趺,祥光瑞霭,隐隐呈露,其中若有真藏焉。问之土人,曰:此灵山圣墓也。考之郡乘不载。见于山,叙者曰:北山,府城之主山也。其东支为石壁、石头、圣姑、红虾诸山,疑圣姑之名即此。盖自异域之教入中土,有回教者。其始祖不知何代氏姓,乐此邱而藏焉。余心异之,别驾关朱明公先期集同志者五、六人,偕余往焉。入门,径路甚湫溢。登其堂,境界觉别,陟其巅,有巖封者三,即圣墓也。墓之前,右有小阁,为礼拜所。左有疏轩,可憩。面西而南户,可以远眺。望灵源、宝盖,隐约横亘。蚶江、法石,周遭环抱,不暇悉数。而东南之胜概,一览在目。

以上征引有关灵山圣墓的历史记载,《泉州府志》记嘉靖间有墓三座。《闽书抄》亦记崇祯间有三座墓。而《闽书》却记只有两座墓。这个问题将在《修缮后的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一节详谈。

今所谓“三贤、四贤”墓,是两座三层须弥座式的回式墓顶石石墓,白花岗石雕成。墓址西南向,墓后有半圆形石建回廊。墓上原有木架亭,惜已倾圮。1959年3月,据原样改建石亭。根据情况判断,宋元时代圣墓的建筑,可能与西亚及我国扬州普哈丁墓同为“拱拜尔”式建筑。大约入明、清之后,由于年久倾颓,遂改为中国亭式建筑。

石回廊下正中,竖立一方古阿拉伯文字石碑,碑为元代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所立。北侧有嘉庆二十三年马建纪修葺墓碑记、郑和下西洋行香碑记和乾隆十六年夏必第修墓碑记。南侧有同治十年提督江长贵修墓碑记。东南隅有康熙五十一年七月修墓碑记和乾隆四十八年郭拔萃修墓碑记。此外,还有马阿浑墓碑。

以上各碑,唯康熙碑漫漶难读。各碑详细情况,见以下录文和说明。

大凡谈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通道,必讲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两者沟通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现今,陆上丝绸之路上的喀什(疏勒)还保存着一个古代伊斯兰教的圣迹——纪年石柱。据载“喀城外有回教和卓祠堂,门外刻石柱纪年,一年一画,以派噶木巴尔初生为元年”^①。“和卓”一词,《元史》作“火者”,作“官称也”解,即“美号,非名也”^②。“派噶木

^① 雉皋、姜炳奎、星桥编《西政要》卷五,和卓祠堂。

^② 《元史》卷一百二十,列传七,札八儿火者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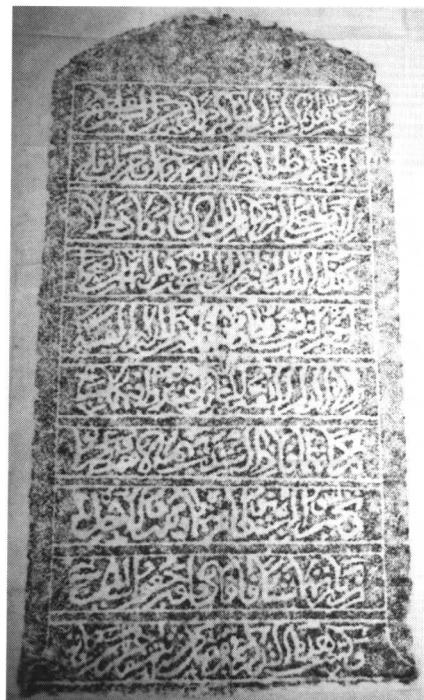
巴尔”即《元史》的“别奄伯尔”^①，即穆罕默德圣人。据喀什和卓祠堂（即清真寺）刻石柱上纪年上推，“当托始于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可见，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都有唐武德间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传说。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史学界主要有两说。一为唐武德（公元 618~626 年）说；一为唐永徽（公元 651 年）说。谨严史家一般赞成唐永徽说。八世纪后半期，阿巴斯王朝定都巴格达，注重对东方贸易，伊斯兰教可能随阿拉伯商人传播到泉州。后蒙古西征军灭亡阿巴斯王朝，迨蒙古军队为埃及的马木鲁克王朝军队所败，东返灭南宋，大军所到之处也播洒了伊斯兰教。元代，泉州的伊斯兰教有的是从海路传入，也有的是随蒙古军队到来而传入的。

A 33 灵山圣墓元代阿拉伯文修墓碑记



A 33



A 33 拓片

碑高 110 厘米、宽 55.3 厘米、厚 12.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圆弧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十行（见本书第 327 页），行间有阴刻横线隔开。

A 34 20 世纪修缮前的灵山圣墓

20 世纪 30 年代的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其时墓亭木架已残断，剩有四根石雕梭柱型亭柱。

^①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列传十二，赛典赤瞻思丁传。



A 34.1 20世纪30年代的灵山圣墓



A 34.2 1958年清理后的灵山圣墓

从照片看,当时灵山圣墓仍然保存着摆成品字形的三座须弥座式且有回字形墓顶石的石墓。

1958年,泉州市文化局、文物管理委员会清理保护灵山圣墓,图为清理后摆成品字形的三座须弥座式石墓,请注意其墓顶石作“回”字形。

A 35 20世纪60年代初修缮后的灵山圣墓



A 35

经清末和民国,墓亭倾塌,回廊残破,荆棘遍地,荒凉不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数次拨款重修。

1958年,泉州东门外福(州)厦(门)公路加宽,市文管会把道旁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数座移置灵山圣墓。1958年,通淮门外津头埔乡农民积肥料,疏浚池塘污泥,出土十多座须弥座式石墓,市文管会运回暂时保存清净寺内,接着又移置灵山圣墓。同年,通淮街居民建屋出土的三座并列须弥座式石墓也一并移置灵山圣墓。

原灵山圣墓有回式三层须弥座式石墓三座,摆成品字形。早在明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泉州府知府周道光游灵山圣墓时,就记载“有鬻封者三”,即圣墓有墓三座。此记载,比何乔远著《闽书》早六十年左右。以后崇祯间成书的《闽书抄》又记第三座墓是“三贤、四贤”

泉州宗教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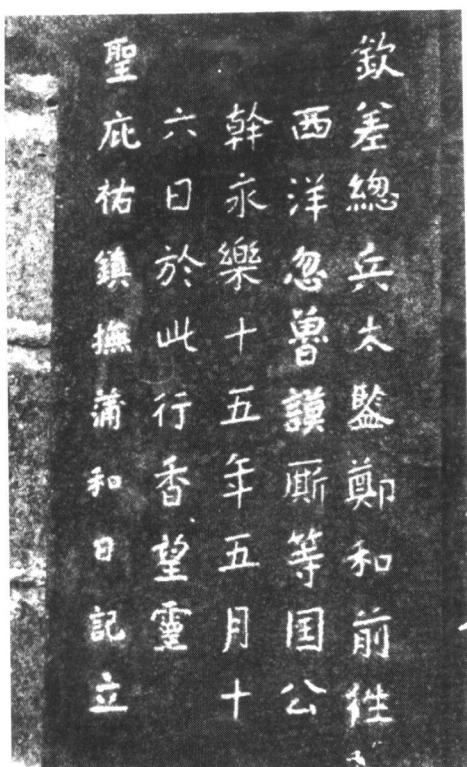
的“高弟世许吧吧”(阿訇)的坟墓。

1958年秋,泉州市文化局、市文管会为适应《闽书》所记“三贤、四贤”圣墓的传说,移去其中一座回式石墓,置于圣墓北面山坡上。此墓即《闽书抄》所谓的“高弟世许吧吧”教长的坟墓。圣墓前南面的“马阿浑永春之墓”(教长)亦被移置北面山坡,与他墓杂处。

当时,所以移去品字形三座墓中的一座,是因为第三座三层回式墓是在亭子之外,据《闽书抄》载是“傍穴”(即附葬)的,有可能是明代在泉州的外国伊斯兰教教长,因他生前有善行、有德望,而死后被附葬于此的。

1959年3月,改原木建墓亭为石构。又依山势的高低,砌建台地三层,两旁辟阶道。为防止雨水冲刷,从墓后的山坳,开掘水沟以排水。再将原在墓前的丛冢,迁移他处,让出一块草坪,扩大了圣墓的范围。此照片摄于60年代初。

A 36 灵山圣墓郑和下西洋行香碑记



A 36



A 36 拓片

碑高99.4厘米、宽42.5厘米、厚9.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此碑为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过泉州时所立。碑上有文字五行,四十六字。照录如下:

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忽鲁谟斯等国公干。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于此行香,望灵圣庇祐。镇抚蒲和日记立。

《明史》记：“永乐十四年冬……复命和等偕往，赐其君长。”^①又，永乐十四年“十二月丁卯，郑和复使西洋。”^②所云与第五次出使时间同。其实郑和第五次奉使是永乐十四年，而出发时间是永乐十五年。这与福建省长乐县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所载“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③的时间完全一样。所以永乐十五年五月，郑和还在泉州。

忽鲁谟斯，即 Ormuz、Hormus 对音，位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的忽鲁谟斯海峡以北，是波斯湾头的一个波斯重要海港城市。十三世纪蒙古人攻占该城，城毁。十四世纪初，城迁至附近的 Djeroun 岛，仍称忽鲁谟斯。

明宣德五年(1430 年)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即以忽鲁谟斯为宝船远航的终点。明朝茅元仪编《武备志》，^④有《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亦简称《郑和航海图》)。在《郑和航海图》里，忽鲁谟斯被绘成一个岛，还有一个假忽鲁谟斯岛。可见郑和所到的忽鲁谟斯是新的忽鲁谟斯，而非十四世纪以前的旧忽鲁谟斯。而明朝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记忽鲁谟斯国，“其地倚山临海”，^⑤应该是指旧的忽鲁谟斯港城。直至十七世纪，忽鲁谟斯仍为波斯湾头的重要商业城市。

另外，《明史》没有记载郑和信奉伊斯兰教。查袁嘉穀《續編》卷三，记永乐三年李至刚为郑和的父亲所撰的墓志铭，铭云：

公字哈只，姓马氏，世为云南昆阳州人。祖拜颜(Bayan)，妣马氏。父哈只，母温氏。公生而魁岸奇伟，风裁凛凛可畏，不肯枉已附人。人有过，辄面斥无隐。性尤好善，遇贫困及鳏寡无依者恒保护周给，未尝有倦容，以故乡党靡不称公为长者。娶温氏，有妇德。子男二人，长文铭，次和，女四人。和自幼有材志，事今天子，赐姓郑，为内官监太监。公勤敏，谦恭谨密，不避劳勦，缙绅咸称誉焉。呜呼，观其子而公之积累于平日，与义方之训可见矣。公生于甲申年十二月初九日，卒于洪武壬戌七月初三日，享年三十九岁。长子文铭奉柩安厝于宝山乡和代村之原，礼也。铭曰：

身处乎边陲而服礼仪之习，分安乎庶民而存惠泽之施，宜其余庆深长，而有子光显于当时也！

时永乐三年端阳日资善大夫礼部尚书兼左春坊大学士李至刚撰。

附碑阴郑和题记：

马氏第二子太监郑和，奉命于永乐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到于祖宗坟茔，祭扫追荐。

① 《明史》卷三百四，郑和传。

② 《明史》卷七，成祖三。

③ 福建省长乐县南山寺郑和等立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1930 年农民在南山寺遗址中发现。抗日战争期间，转移南平县保存。1948 年运回长乐。1985 年 6 月，移置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原南山寺遗址)保存。碑高 162 厘米、宽 78 厘米、厚 17 厘米。碑篆额《天妃灵应之记》，碑文正书三十行，刻文一千一百十七字。碑文详细记述郑和七次率舟师下西洋的时间、经历诸国简况，以及在长乐活动的情况，是研究郑和航海史、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资料。碑文附录于后，见附一(录自向达校注，明巩珍《西洋番国志》第 53~55 页，1961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④ 向达整理，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1961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⑤ 谢方校注，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下，忽鲁谟斯国第二十一，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

至闰十二月吉日回还记耳。^①

“哈只”，犹言巡礼人也。这说明郑和的父亲曾到过到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朝觐。足见郑和世代信奉伊斯兰教。

可是郑和亦是虔诚的佛教徒。据《摩利支天经》有永乐元年姚广孝题记，云：

今菩萨戒弟子郑和，法名福善，施财命工刊印流通，其所得胜报，非言可能尽矣。一日怀香过余请题，故告以此。永乐元年岁在癸未秋八月二十又三日。僧录司左善世沙门道衍。

可见在明代，伊斯兰教徒对佛教亦不甚排斥。灵山圣墓碑的发现，证明郑和是一个伊斯兰教徒。

郑和身兼伊斯兰教徒和佛教徒，他还于“永乐五年(1407年)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泉州长乐的天妃宫。又于永乐七年(1409年)在锡兰刻立三种文字(汉字、波斯文字和泰米尔文字)的石碑。汉字碑文的内容是对佛陀的敬献^②；波斯碑文是对伊斯兰教安拉的敬献；泰米尔碑文是对印度教保护神毗湿奴的敬献。此外，郑和还于宣德六年(1431年)，在江苏太仓县刘家港刻立《通番事迹记》碑^③，又在福建长乐县太平港南山刻立《天妃灵应之记》碑。二碑内容大体相同，一为感谢天妃“神功”、“康济”，而“著神之德于石”；一为记录七次下西洋的简历。

郑和在长乐碑文里，表明他“修佛宇神宫”的目的，是“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碑文进而揭示恭事天地神明之心，来源于“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应；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这就是以“国事”为目的、为指导的“事神”行动的儒家思想的体现，亦即《礼记》所谓“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和“有功于民，始在祀典”，把“国事”与“事神”紧密结合一起。这一切表明了明初的郑和，乃至明成祖朱棣，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外来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以及对国内民间信仰(天妃信仰等)的海纳百川的宽宏、容忍，以及“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它显示了明朝初期，中国的儒家文化容纳世界多元宗教文化的事；它同时显示明朝前期中国儒家文化的开放性与和平共处的特性。所以，郑和是一位世界性的，代表世界多元宗教文化的一位和平的使者。

附录一：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④

天妃之神灵应记^⑤

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国，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珍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齐币往賚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

① 向达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附录二。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

② 汉字碑文见附二(录自向达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第50页，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

③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记》碑文，见附录三(录自向达校注，巩珍《西洋番国志》第51页，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

④ 原石在福建长乐县。

⑤ 篆额作“天妃灵应之记”。

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雾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祐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既有神灯烛于帆檣，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略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

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屡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①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金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唯恐弗逮，敢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番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灵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刺国有伪王苏斡刺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回献。是年满刺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糜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齐捧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责，视前有加。

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舶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

^① 蚁应作𧈧。

泉州宗教石刻

祐之功，如是勒记于石。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

附录二：郑和在锡兰所立碑^①

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贵通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惟慈尊，圆明广大，道臻玄妙，法济群伦。历劫河沙，悉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言言梵刹，灵感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之开，深赖慈佑，人舟安利，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纻丝宝幡、香炉、花瓶、纻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总计布施锡兰山立佛等寺供养：金壹仟钱、银伍仟钱，各色纻丝伍拾疋、各色绢伍拾疋、织金纻丝宝幡肆对内红贰对黄壹对青壹对、古铜香炉伍对、戗金座全古铜花瓶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烛台伍对、戗金座全黄铜灯盏伍个、戗金座全朱红漆戗金香盒伍个、金莲花陆对、香油貳仟伍佰斤、腊烛壹拾对、檀香壹拾炷。时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谨施。

附录三：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②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

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左少监张达等立。其辞曰：

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弘仁普济天妃之神，威灵布于钜海，功德著于太常，尚矣。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罗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③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鲸波接天，浩浩无涯，或烟雾之溟濛，或风浪之崔嵬。海洋之状，变态无时，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非仗神功，曷能康济。直有险阻，一称神号，感应如响，即有神灯烛于帆檣。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舟师恬然，咸保无虞。此神功之大概也。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寇兵之肆暴掠者殄灭之，海道由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皆神之助也。

神之功绩，昔尝奏请于朝廷，官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事，钦承御制记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刘家港之行宫，创造有年，每至于斯，即为葺理。宣德五年冬复奉使诸番国，舣舟祠下，官军人等瞻礼勤诚，祀享络绎。神之殿堂益加修饰，弘胜旧规。复重建嵒山小姐之神祠于宫之后，殿堂神像，粲然一新。官校军民咸乐趋事，自不有容已者。非神之功德感于人心而致乎！是用勒文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昭示永久焉。

永乐三年统领舟师往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等聚众于三佛齐国抄掠番商，生擒厥魁。至五年回还。

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其国王各以方物珍禽兽贡献。至七年

① 原石今移置斯里兰卡科伦坡博物馆。

② 原石佚，文见钱穀《吴郡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

③ 十原作千，今正。

回还。

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①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灵显应知觉，遂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复归国。

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刺国伪王苏斡刺寇侵本国，其王遣使赴阙陈诉请救，就率官兵剿捕，神功默助，遂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刺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

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刺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鹿并狮子；卜刺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国、古里国进麋里羔兽。各进方物，皆古所未闻者。及遣王男王弟捧金叶表文朝贡。

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各国使臣久侍京师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贡献方物，视前益加。

宣德五年，仍往诸番开诏，舟师泊于祠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护助之功，于是勒文于石。

A 37 灵山圣墓古伊斯兰教徒墓葬区之一角

现在该地保存宋、元、明三代的伊斯兰教徒石墓三十多座。还有 1993 年，因为建筑公路的需要，陈埭丁氏回族一世祖以后的数代石墓，均从仁风门外、乐园等处迁移至东塘头灵山圣墓。



A 37

^① 苦原作若，今正。

A 38 灵山圣墓康熙五十一年《重修先贤墓碑》

清康熙五十一年七月《重修先贤墓碑》，碑高 119.5 厘米、宽 55.5 厘米、厚 15 厘米。花岗石雕成。因风化严重，照片、拓片均不很清楚。但从拓片仔细辨读并进行实地校对，基本可以认读，录文于下，以供研究时参考。

郡府福建汀延邵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
督加三级纪录六次陈公讳有功

福建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府陈讳美

重修先贤墓碑

温陵八闽胜地

先贤墓之秀，慕嵒城东南。峦峰环拱，
□凤翥龙覲之势。泽国朝宗，扩补夫浴日之
奇。今赐以此称雄，清真于焉。著盛溯厥，
原由始自唐之中叶。周陪逶迤，堂阜佳丽，
饶斯域也。

大观□□及其移次，筑基址范福地，呈
乡旧父老悦□，恒慚今昔异时，绵力莫□。
达贤镇宪陈公，一朝硅础。盛国计，故奉

命天子，□穀□□汀延邵一带，上筹焉。
却眷顾温陵教门渐替，奏达

宕聰，特简加多。丁讳美诞膺投戎左
军，甫下车即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
篆，慧□使讽诵无敢径声，彻奇中外教门，命
增生色。然兹墓况日颓，低回残址，虑胜迹遽湮。就谋□伯，独力保肩，捐赀临构。□媲
畴昔之朋，忻遂此日之愿。今者筑成既落，长幼毕集，铭功俱在，心皈颂德，宁止口碑。谨
泐贞珉，用志不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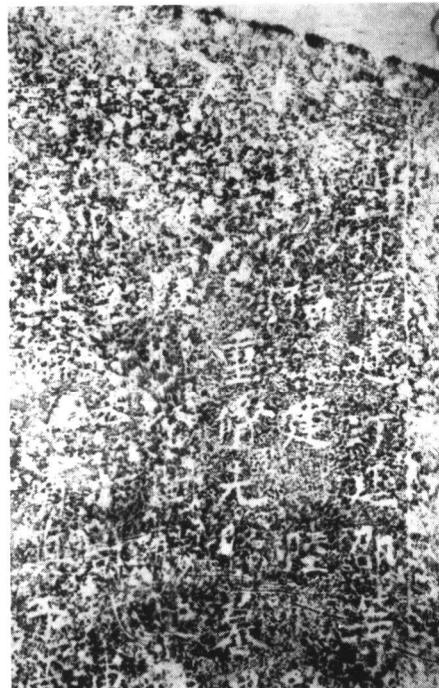
国子监 陈忠祺、马□□、□□□、□□□

教师师 □文吉、□□□、马乃康、郭老观、马国珍、郭□□、黄宗平、李邦絮、郭□□

□□试 □□□、□□□、杨英、陈□忠、马日愚、蒲国絮、蒲国崑

国子监 □□□、丁天麟、□□□、郭□龙、□□教、□□□、□蜀□、□世美

康熙伍拾壹年柒月吉旦全立



A 38 《重修先贤墓碑》拓片(局部)

A 39 乾隆十六年修圣墓碑记和乾隆四十八年修圣墓碑记

前者，碑高 66.3 厘米、宽 27.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文录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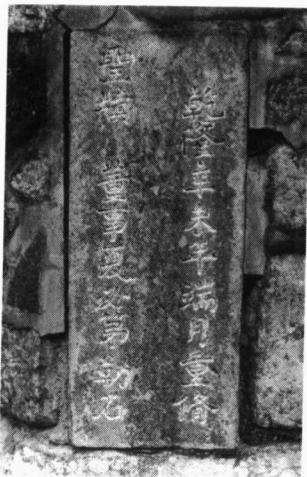
乾隆辛未年端月，重修圣坟。董事夏必第勒石。

乾隆辛未，即乾隆十六年(公元 175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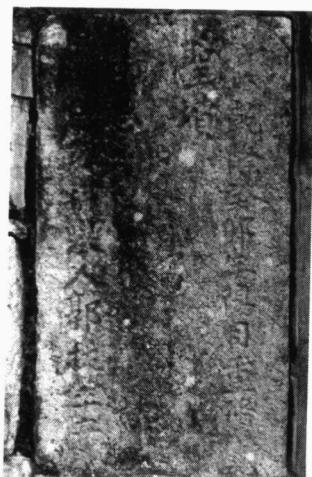
后者,碑高 61.5 厘米、宽 33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文录于下:

乾隆癸卯年阳月,重修圣坟。特恩科举人郭拔萃立。

郭拔萃(公元 1758~1787 年),惠安县白奇人,回族。乾隆己亥(四十四年,公元 1779 年)科中式武举人,授武德骑尉,任台湾安平左营左厅,歿后例赠宣武大夫。乾隆四十八年,郭拔萃“挂标厦门”,“奉命巡视台湾、澎湖等处海口”^①。乾隆五十二年(公元 1787 年),台湾林爽文起义,围诸罗县,郭拔萃奉命驰援,战歿。



A 39.1 乾隆十六年修圣墓碑记



A 39.2 乾隆四十八年修圣墓碑记

A 40 嘉庆二十三年《重修温陵圣墓碑记》

碑高 142 厘米、宽 63 厘米、厚 1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文照录如下:

重修温陵圣墓碑记

嘉庆二十有三年,岁在著雍摄提格(戊寅)之孟陬(夏历正月孟春建寅之月),余奉命提督福建陆路军务来温陵,因知东关外有爸爸墓焉。按府志载,唐武德中来朝,有三贤、四贤传教泉州,卒葬于此。葬后是山夜光显发,人异而灵之,名斯墓曰圣墓。

明永乐钦差总兵太监郑和,前往西洋,行香于此,蒙其庇佑,为立碑记。我朝康熙年间,福建汀、邵、延等处总兵官陈有功,陆路提标左协中军游府陈美,乾隆癸丑辛未孝廉郭拔萃、夏必第等相继修葺。迄今日久坍塌,爰捐俸重修,再建墓亭,悬扁额于其上,以昭灵爽,用答神庥。既竣工,约其事而为之记。署福建全省陆路提督军门漳州总镇西蜀马建纪勒石。

^① 《百奇郭氏回族宗谱》,四,人物志,回族武举人郭拔萃。百奇郭氏回族宗谱编修委员会重修,2000 年。



A 40



A 41

A 41 同治十年重修圣墓碑记

碑高 131.6 厘米、宽 65.4 厘米、厚 11.1 厘米。白花岗石雕琢成。碑文如下：

我教之行于中国，由来旧矣。泉州滨大海，为中国最东南边地，距西域不下数万里，则教之行于斯也，不亦难乎！同治庚午秋，长贵奉命提督福建陆路军务，莅任泉州。下车后，询问地利，部下有以郡东郊有三贤、四贤墓告者。初听之，而疑其误也，继思之，而恐其讹也。公余策马出城，如所告而访之，平冈之上，果有两墓在焉，而不知其始于何代及为何如人。墓侧碑碣，苔蚀沙啮，字迹漫漶，多不可辨，唯我蜀马公权提督篆时所撰立者。上故有亭，尚未磨灭。而亭久倾圮，碑仆卧尘沙中，已不知几历年所矣。竟日爬刮，继以淋洗，始得约略扪读。证诸郡志，乃获其详。盖三贤、四贤于唐武德中入朝，传教泉州，卒而葬此者。厥后屡显灵异，郡人士咸崇奉之。明永乐太监郑和出使西洋，道此蒙佑，曾立碑记。我朝康熙、乾隆间，泉之官绅，迭继修治。马公重修在嘉庆二十三年，乃其最后者也，然于今已五十四寒暑矣。其间水旱兵燹，未尝无之，虽荆棘蒙蔓，不免就荒，而两墓修既竣事，其崖巒如此。惟冀后之来者以时展缓勿任其如马公及余相去之速而已。冀治日復一日，渐就湮没也。是则我教之幸抑亦余所深惜者，爾是为记。

欽命提督福建全省陸路軍務執事巴圖魯賈寧江長貴謹沐啟誠
朝康熙永樂太監鄭和出使西洋道此蒙佑曾立碑記我朝
己五十四寒暑矣其間水旱兵燹未嘗無之雖荆棘蒙蔓不免就荒而兩墓漸然無恙
且達有宋官是土之余以踵馬公於五十四年之後繼母兩賢之靈有以狀與之乎
然則西城雖遠其教能行於中國最東南邊地也更無論安於是捐廉籌吉鳴工重
修既竣事誌其崖巒如此惟冀後之來者以時展緩勿任其如馬公及余相去之速而已
冀治日復一日漸就湮沒也是則我教之幸抑亦余所深惜者爾是為記
同治十年歲在辛未季秋之月下旬穀旦
欽命提督福建全省陸路軍務執事巴圖魯賈寧江長貴謹沐啟誠
書福建全省陸路軍務提督軍門澤州總兵馬是紀勒石

岿然无恙。且适有来官是土之余，以踵马公于五十四年之后。噫！得毋两贤之灵有以默相之乎？然则西域虽远，其教之能行于中国最东南边地也，更无论矣。于是捐廉择吉，鸠工重修。既竣事，志其崖略如此。惟冀后之来者，以时展繙，勿任其如马公及余相去之远，而未葺治，日复一日，渐就湮没也。是则我教之幸，抑亦余所深祷者尔。是为记。

同治十年，岁在辛未季秋之月下旬谷旦。钦命提督福建全省陆路军务执勇巴图鲁盐亭江长贵盥沐敬撰。

另有马阿浑永春墓碑，碑高约 65 厘米、宽 40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墓碑立在圣墓石回廊前三贤、四贤墓之左侧。碑文云：

同治壬申年七月初十日，故四川成都六品军功马阿浑永春之墓。盐亭乡愚弟江长贵顿首拜立。

同治壬申，即同治十一年，公元 1872 年。该石碑是前代主持泉州伊斯兰教的阿浑，死后埋葬在灵山上，后经江长贵修葺的。

三、泉州古伊斯兰教墓碑

A 42 格兹威尼人吐特卡墓碑

碑高 71 厘米、宽 34 厘米、厚 11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狭长，正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背面浮刻五行。碑侧一面也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系记载墓主死亡时间（见本书第 329 页）。1942 年，发现于泉州东门外仁风街石店，是由城垣中出土的。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本墓碑的主人是位教长，名叫“吐特卡·迈努奈·阿米尔·阿里·本·哈桑·本·阿里·格兹威尼”，他卒于回历 672 年（南宋咸淳九年，公元 1273 年）。格兹威尼位于里海以南的波斯境内。

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

广州蕃坊，海外诸国人聚居，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①

《唐会要》卷一百载：

天祐元年（公元 904 年）六月，授福建道（三）佛齐国人朝进奉使都蕃长蒲诃粟宁远将军。^②

《宋史·外国列传·大食国》载：

熙宁中（公元 1068~1077 年），其使辛押陁罗乙统察蕃长司公事。诏广州裁度。

在中国之伊斯兰教教长，亦经常兼任蕃长之职。可见泉州在宋代与广州一样，也有“蕃坊”的存在。

^① 见朱彧撰《萍洲可谈》卷二。收入《墨海金壶》子部，第一百四十九册，清张海鹏（若云）辑，1921 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清刊本。

^② 见王溥撰《唐会要》卷一百，《归降官位》。清光绪十年，江苏书局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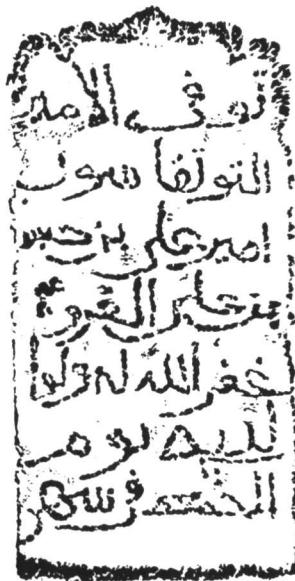
A 42.1 墓碑正面



A 42.2 墓碑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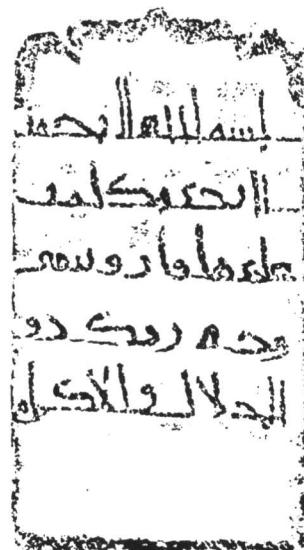
A 42.3 墓碑背面



A 42.1 拓片



A 42.2 拓片



A 42.3 拓片

A 43 哈只·×××墓碑

碑高 88 厘米、宽 31 厘米、厚 9.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的正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行间浮刻横线隔开。背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29 页），行间



A 43.1 墓碑正面



A 43.1 拓片



A 43.2 墓碑背面



A 43.2 拓片

亦有浮刻横线隔开。碑全形狭长。1930年,泉州东门城拆卸时所获。墓主是一位“哈只”,即朝觐过圣地麦加的伊斯兰教徒。他卒于回历764年(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44 布哈拉人埃米尔·赛典赤·杜安沙墓碑



A 44.1 墓碑正面



A 44.2 墓碑背面



A 44.1 拓片



A 44.2 拓片

碑高 86 厘米、宽 49.2 厘米、厚 10.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状。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背面阴刻五行（见本书第 330 页）。1952 年，在泉州东南隅南较场城基内掘出。1959 年十周年国庆前夕，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关于杜安沙家族的世系问题。据《元史·赛典赤瞻思丁传》载：

赛典赤瞻思丁一名乌马儿，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言贵族也。太祖西征，瞻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鹤迎降。命入宿卫，从征伐，以赛典赤呼之。至元十六年卒……子五人，长纳速拉丁……次忽卒……

“别庵伯尔”是波斯文 Peighember 的译音，其义是“先知先觉者”。这就是说赛典赤·瞻思丁是穆罕默德的圣裔。泉州在安沙墓碑的发现，说明有一支穆圣的后裔，在元代来到泉州。

又《元史·纳速拉丁传》载：

纳速拉丁，至元二十二年，从皇太子脱欢征交趾……至元二十九年卒（公元 1293 年）……子十二人，伯颜中书平章政事，次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在波斯史学家拉世德（Rashiduddin）著《蒙古史》里，也可以找到有关这个家族的记事：

纳速拉丁之子，名叫艾不别克儿，现称作伯颜平章，曾被派往刺桐港任长官。

可是拉世德同在《蒙古史》中又说：

在铁格木尔（公元 1295~1307 年）可汗时期，所有平章的首脑是伯颜平章，他是赛夷（纳速拉丁）之子，赛典赤之孙，他也叫赛典赤。

《蒙古史》在记载十二省的第六省京师城时又说：

第六省京师城（福州），以前为蛮子国之都城……该城（刺桐城）守令异密答失蛮的兄弟，即伯颜平章的兄弟异密乌马儿。

以上拉世德的记载是自相矛盾的。查《元史·宰相表》，自元贞元年到大德七年，都有伯颜（或赛典赤）的名字。因此，在此时间，伯颜不可能到刺桐港任长官。这里拉世德的记载可能有误。

关于赛典赤家族世系问题，有他自己家族人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下面举一碑记说明。后至元五年九月，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乌马儿的儿子也列失，为纪念他的叔祖忽辛所立的《济渎重建灵异碑记》，钱大昕跋文^①云：

济渎重建灵异碑记，为孟州达鲁花赤也列失追述其叔祖忽辛，祀济渎灵异事所载。

世系云：始祖赛天知苦鲁马丁，追封世王。子一人赛天知瞻思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咸阳王，谥忠惠。

子三人，长赛天知纳速儿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延安王，谥宣靖。次忽辛，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犹子赛天知乌马儿，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也列失则乌马儿之子也。

跋文反映出碑记载明赛典赤瞻思丁的父亲名叫苦鲁马丁，江浙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乌马儿的儿子名叫也列失。这些都是《元史》所漏载的。但这个碑记，已被《新元史》所采用。如《新元史·

^① 见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二十，《济渎重建灵异碑记》和毕沅《中州金石记》卷五，《济渎重建灵异碑记》。

泉州宗教石刻

赛典赤瞻思丁传》云^①：

父苦鲁马丁……后进封咸阳王，改谥忠惠。

《新元史·纳速拉丁传》载：

追封延安王，谥宣靖。

而且，《新元史》又增加了《乌马儿传》^②，云：

乌马儿，累官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建泉州、兴化两郡庙学，置学田。又筑兴化、莆田等县海塘为田，以赡贫民。闽人颂之。至治元年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现在着重来讨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乌马儿的问题。即乌马儿何时来泉州，何时调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查《元史·地理志》：

至元十五年，置行省于泉州（按：元世祖十五年，蒲寿庚降元，故置省于泉州）。十八年，迁福州。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乃迁福州。

又《元史·成宗本纪》载：

大德元年，改福建省为平海等处行省，徙治泉州（按：图琉球也）。

但据乾隆《续通志》云：

大德三年，罢福建行省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徙治福州。

查《泉州府志·文职官上》载，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有“左丞乌马儿，大德初任”。以上的记载只能说明乌马儿于大德初在泉州^③任平海行中书省平章政事，但没有明确指出乌马儿何时离开泉州。从下面的一段记载，可以找出这个问题的准确答案。

据《晋江县志·词翰》的元《庄弥邵罗城外濠记》^④载：

泉本海隅偏藩，世祖皇帝混一区宇，梯航万国，此其都会始为东南巨镇，或建省或立宣慰司，所以重其镇也。一城要地莫盛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贡皆于是乎集。旧有镇南门，门之外有河，跨河为桥，流东西贯直南，并受潮汐。岁久湮阏，有力者占为园池亭榭，以便娱乐。前太守真西山虽尝开修，利未尽而中辍，今又八十年矣。皇帝飞龙之六载（按大德六年），省并江浙立宣慰司行省。右丞札刺立丁公领使司帅府，视事以来，曾未逾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可见，泉州废行省立宣慰司，是在大德六年，而非大德三年。而且大德六年宣慰司仍置于泉州，亦未尝徙福州。由此看来，大约可以肯定，乌马儿是于大德初来泉州上任，而于大德六年改任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他的儿子杜安沙，就死于他离开泉州的这一年。所以《新元史》说乌马儿于“至治元年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是有错误的。

如果说具体一点，元大德六年泉州宣慰司札刺立丁重浚南濠桥，据庄弥邵记是“军、民、官董其工，始其事于二月初八日，至于二十九日迄成”。那么，大德六年的泉州“省并江浙立宣慰

① 见柯劭忞《新元史》卷一百五十五，列传第五十二。

② 见《新元史》列传第五十二和任士林《松乡先生文集》卷一、卷二。

③ 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六，文职官上。

④ 见乾隆《晋江县志》卷十六，词翰和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司行省”是在二月初八日之前，而乌马儿之子杜安沙是死于回历 702 年 2 月 9 日（即公元 1302 年 10 月 1 日）。可见，杜安沙逝世时，其父乌马儿已离开泉州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此外，拉世德的《蒙古史》说赛典赤是布哈拉人，这与本碑的记载是相同的。

杜安沙的父亲是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赛典赤·乌马儿，这应该说是无疑的。但是，墓碑上载的“本·赛典赤·埃米兰·本·埃米尔·艾斯费赫萨拉尔·杜尔·比克尔”，是不是《元史》所载的赛典赤·纳速拉丁和赛典赤·瞻思丁，以及《济渎重建灵异碑记》跋文所载的苦马鲁丁呢？我们还没找到史料来说明。按阿拉伯人的习惯，或许一个是正式的名字，一个是个别名。

“埃米尔”（Amir）一词，早在唐代译作“异密”。如唐“玄宗开元七年二月……被大食元率将异密屈底波领众军兵来此，共臣等斗战”^①。埃米尔，阿拉伯语义为首领、贵族、总督。

“埃米兰”（Amian）一词，是埃米尔的复数。如果把“埃米兰”理解为“第二位云南省平章政事”（即赛典赤·瞻思丁之子赛典赤·纳速拉丁），可是在碑文中又解释不通。

本碑文中的“艾斯费赫萨拉尔”，在波斯语意为军队的首领。是由波斯语的“艾斯费赫”与土耳其语的“萨拉尔”（即军队）组成的复合词。所以，“艾斯费赫萨拉尔”通常被用来称呼国家军队的首领。“埃米兰”是波斯语的复数词；“埃米尔”是阿拉伯语的单数词（即王子、首领、酋长之意）。在用作称号时，通常是“埃米兰”与“埃米尔”联用，以表示最强的语气。从本碑文内容看，是以最强的语气表达“艾斯费赫萨拉尔”的显耀地位。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借助另一方杜安沙墓碑（A45）来进一步说明。

A 45 赛典赤·杜安沙墓碑



A 45

碑石左间柱完好，右间柱大部残缺。长 78 厘米，高 22.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中刻一长方形框，框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31 页）。碑的四周浮刻一种连续云纹图案。这是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块之一。1959 年，在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乱石堆中发现。1964 年，移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

^① 见《册府元龟》卷九百九十九，外臣部，请求，第 11722 页。

这方墓碑与上一方杜安沙墓碑,是同一座坟墓的墓碑石。其理由如下:

其一,两碑中的杜安沙(Toghan shah),均不是阿拉伯人的名字。Toghan是突厥语“鹰”的意思;shah是波斯语“王”的意思。这是中亚人对贵族的称呼,意即“魔王”。碑中称他是布哈拉人,正相符合。

其二,两方墓碑的杜安沙的先祖姓名,都是乌马儿·赛典赤。先祖一致,所以可能是同一个人。

其三,两碑的草体阿拉伯文字之字体基本一致,可能是出于同一人之手。而且两碑都有不规范的阿拉伯字,但本碑比前一碑好些,可以辨认清楚。这又说明是同一座坟墓的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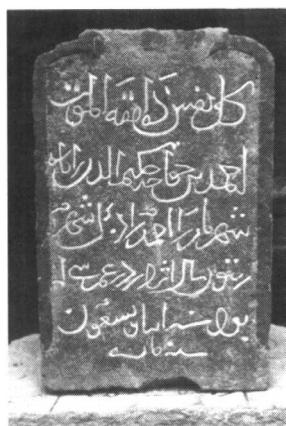
其四,两碑的发现地点,都在泉州东南城墙附近。本碑虽发现地点是在清净寺乱石堆中,然这堆石头是从通淮门附近城基础中掘出的。从本碑的出土地点和发现地点,都与前一方尖拱形杜安沙墓碑出土地点相近。这又证明两碑是同一座坟墓的墓碑。

此外,本碑是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块,从这一个角度看,杜安沙的坟墓规模大,其经济能力强。这与杜安沙父亲乌马儿的政治地位也相适应。

这方杜安沙墓碑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补充了前一方墓碑的不足之处。赛典赤,阿拉伯文原音为赛伊德·艾杰勒(Sayyid ajall),意为尊贵的首领,是他家族所特有的尊贵称号。拉世德《蒙古史》说:“大食人认为赛典赤称号很尊贵,蒙古人用这个称号称呼大丞相。为提高他的权威,可汗(指铁格木尔)称他为赛典赤”。

这方碑石,仅仅写乌马儿之父的称号叫“赛典赤”,而不写他的人名全称。这或许说明,元代泉州地区,只有赛典赤这一家族,不可能会发生任何其他的混淆。因此,为了突出、显耀他的社会地位和避免与主要墓碑文重复,只刻写称号“赛典赤”。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更有把握地认为,杜安沙确实是赛典赤·瞻思丁这一家族的后裔,而这一家族是伊斯兰教的圣裔。

A 46 艾哈迈德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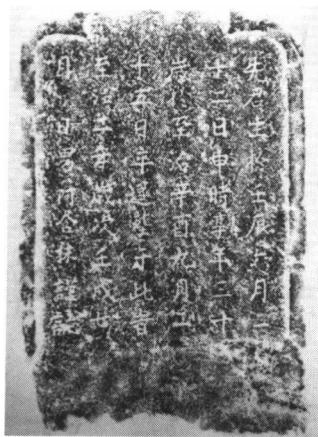
A 46.1 墓碑正面



A 46.1 拓片



A 46.2 墓碑背面



A 46.2 拓片

碑高 54 厘米、宽 35.8 厘米、厚 7.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但已缺损。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31 页），背面阴刻竖行汉字六行。文字抄录如下：

先君生于壬辰六月二十三日申时，享年三十岁。于至治辛酉九月二十五日卒，遂葬于此。时至治二年岁次壬戌七月 日。男阿含抹谨志。

1956 年 12 月，获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池畔。是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据碑正面阿拉伯文字的记载，死者名叫艾哈迈德，卒于回历 672 年 7 月（南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 1273 年），可是碑的背面汉字，却记载墓主卒于“至治辛酉九月”（元英宗至治元年，公元 1321 年），而立墓碑时间是“至治二年七月”。这样，同一方墓碑的正反两个面的两种文字记载，时间竟然相差四十八年。据华维卿先生认读，认为本碑阿拉伯文字的“月份的前后，出现一些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非阿拉伯文的文字”，这就为碑文的认读增添了困难。碑文“赫瓦杰”，波斯语为宗教长老的意思。

A 47 尼纳·穆罕默德墓碑

碑高 57 厘米、宽 35.5 厘米、厚 9.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的尖拱已被破坏。碑的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31 页），背面阴刻直行汉字五行。1940 年获于泉州涂门街外津头埔乡。1959 年，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保存。

背面汉字录文如下：

先君生于戊辰十二月初九日，卒于癸卯二月初七日，享年三十六岁，安葬于此。时大德七年七月初一日，孤子吴应斗泣血谨志。

从阿拉伯文字（卒于回历 704 年，公元 1304 年）和中国文字（卒于大德七年，公元 1303 年）记载看，关于死者尼纳·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的死亡年份，相差一年。

吴应斗的父亲阿卜杜拉，有可能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吴应斗可能是用汉名汉姓的侨生子。



A 47.1 墓碑正面



A 47.2 墓碑背面



A 47.1 拓片



A 47.2 拓片

A 48 格兰塔·特勤墓碑

碑高 72 厘米、宽 39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正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31 页），背面无雕刻。1938 年，在泉州东门挖城石时所获。

墓主格兰塔，卒于回历 708 年（公元 1308 年）。他死于英年，头衔是“特勤”。“特勤”，突

厥语，谓突厥可汗之弟也。清朝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芬兰人海克尔（Heikel），在蒙古鄂尔坤河畔发现《阙特勤碑》。阙特勤者，突厥可汗之弟也。他卒于唐朝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唐明皇诏张去逸、吕向赍玺书吊祭，并为立此碑。此事《新唐书·突厥传》^①有记，但史籍多数误作“特勤”。在波斯语中，“特勤”（Takin）作为王子、贵族的称号。



A 48



A 48 拓片

A 49 大长老×××墓碑



A 49



A 49 拓片

① 《新唐书》卷二百六,《突厥传》上,“突厥阿史那氏……其别部典兵者曰设,子弟曰特勒……武德元年骨咄禄特勒来朝……九年进犯泾原,李靖与战,破之于秦州,斩一特勒。”引文里的三个“特勒”,皆“特勤”之误。

泉州宗教石刻

碑高 61 厘米、宽 39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八行(见本书第 332 页),背面未刻文字。1931 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发现。墓主是位伊斯兰教长老,他逝于回历 701 年(大德五年,公元 1301 年)。

A 50 格兹威尼人侯赛因墓碑



A 50



A 50 拓片

碑高 65 厘米、宽 35.5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状。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八行(见本书第 332 页),背面未刻文字。1935 年,泉州通天门(北门)拆卸时所获。墓主侯赛因的父亲是格兹威尼人(里海南部城市),是一位朝觐过圣城麦加的伊斯兰教徒。侯赛因卒于回历 707 年(大德十一年,公元 1307 年)。

A 51 乌马儿教长墓碑

碑高 92 厘米、宽 49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的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十行(见本书第 332 页),背面未刻文字。此碑已断为二段,下半段于 1934 年泉州通淮门外田间小路获得。上半段是在 1942 年,泉州东门挖城墙础石时获得的。

本墓碑的主人是位教长,名叫乌马儿。卒于回历 700 年代(后两位数未辨)。



A 51



A 51 拓片

A 52 大不里士人叶海亚丁墓碑



A 52



A 52 拓片

碑高 55 厘米、宽 37 厘米、厚 7.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的尖拱受破坏。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33 页),行间各浮雕横线隔开,碑底部分文字受损。碑的背面阴刻楷书汉字“泉”字,字径 26.5×21.5 厘米。据云,清代在城内蒲姓园圃中掘获,后移通淮街清净寺保存,被砌于明善堂南墙正中 2.60 米高处。1983 年夏卸下。

墓主叶海亚丁,其籍贯是波斯西北重要城市——大不里士(Tabriz),其地处波斯西北部库赫·塞汉特山麓高原上。八世纪起曾长期是波斯的都城。是西北农牧业产品的重要贸易中心,以制革、织毯手工业著名。叶海亚丁卒于回历 767 年(至正二十五年,公元 1365 年)。

本墓碑文的另一种译文如下:

他是永恒的主。

大不里兹人哈申族艾哈默的儿子、白哈温丁奥玛尔在 764 年 7 月 8 日逝世归真。^①回历 764 年(至正二十二年,公元 1362 年),奥玛尔逝世。哈申族,据赛尔顿著《教义学大纲·师表的资格》载,第一代是阿德南,哈申(哈什姆)为第十八代,穆罕默德为第二十一代^②。墓碑文的撰者特别强调墓主奥玛尔是哈申族的后裔。

A 53 花剌子模人夏菲墓碑



A 53



A 53 拓片

碑高 49 厘米、宽 36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33 页),行间浮刻横线隔开。1936 年,在泉州朝天门(北门)拆城时获得。墓主夏菲,卒于回历

①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见《考古》1986 年第 6 期,第 526~530 页。

② 赛尔顿著,马坚译《教义大纲》第十七章《圣门四大弟子和选举师表》,第五节《师表的资格》,第 138 页,伊斯兰文化丛书,1944 年 7 月出版。

722 年(至治二年,公元 1322 年),他是花刺子模人。

花刺子模(Khorasm; Khwarizm),国名,即中亚阿姆河下游之古国,地处咸海南部今中亚基发一带。《新唐书》称为货利习弥^①。宋朝时突厥族建国于此,曾为塞尔柱朝(Seljiks)之藩属,后塞尔柱王朝为西辽耶律大石所破,乘机灭之,并有波斯。其后,更灭西辽及阿富汗郭耳王朝,旋为元太祖成吉思汗所灭。据《多桑蒙古史》记“八世纪初,地属哈里发,遂奉回教。蒙古来侵时,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城居者为数不少”^②《元史》称其为回回国,《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花刺子模。十四世纪末为帖木儿征服,十六世纪初属乌兹别克,1873 年并于俄国。

A 54 赫瓦杰·加麦尔丁墓碑



A 54.1 墓碑正面



A 54.2 墓碑背面

碑高 69 厘米、宽 4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状。正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行间各有浮雕横线隔开。背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四行(见本书第 334 页),行间亦各有浮刻横线隔开。1931 年夏,泉州东门城拆卸时所得。

碑文中的“赫瓦杰”即波斯语的“和加”,意为宗教长老。墓主卒于回历 705 年(大德九年,公元 1305 年),他的名字叫加麦尔丁,是一位伊斯兰教的长老。

A 55 哈只·本·艾阿法贝克墓碑

碑高 67 厘米、宽 41.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正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背面浮刻五行(见本书第 334 页)。1929 年,泉州东门掘城垣时所获。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哈只·本·艾阿法贝克,是一位朝觐过圣地麦加的伊斯兰教徒,逝于回

^①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西域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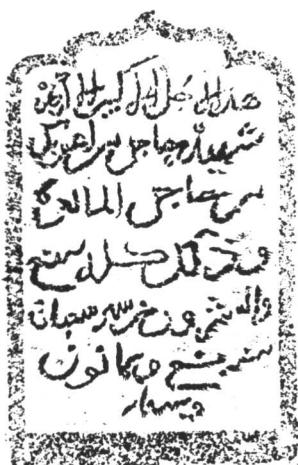
^② 冯承钧译,多桑著《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七章,第 143 页。193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A 55.1 墓碑正面



A 55.2 墓碑背面



A 55.1 拓片



A 55.2 拓片

历 789 年(洪武二十年, 公元 1387 年)。本墓碑的发现表明, 明朝初年, 虽经元末十年的战乱, 但泉州的伊斯兰教并未灭绝。

A 56 瞻思丁墓碑

碑高 54 厘米、宽 30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正面浮刻古阿拉



A 56.1 墓碑正面



A 56.2 墓碑背面



A 56.1 拓片



A 56.2 拓片

伯文字七行，背面刻五行（见本书第 335 页）。1940 年泉州东门城拆卸时所获。墓主瞻思丁，他卒于回历 725 年（泰定二年，公元 1325 年）。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57 可敦·本·哈桑墓碑

这是一方女子的墓碑，高 74 厘米，宽 43.5 厘米，厚 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八行，背面刻六行（见本书第 335 页）。1932 年，泉州东门城垣拆卸



A 57.1 墓碑正面



A 57.2 墓碑背面



A 57.1 拓片



A 57.2 拓片

时所获。墓主可敦，原为土耳其语，意为“皇后”、“夫人”。故墓主是一位地位较高的女人。她卒于回历 721 年（至治元年，公元 1321 年）。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58 法蒂美墓碑

这是一方女子的墓碑，高 60 厘米，宽 38.2 厘米，厚 8.6 厘米。辉绿岩雕成。碑的顶端作



A 58.1 墓碑正面



A 58.2 墓碑背面

尖拱形状，下部榫已断毁，碑面较粗糙。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背面阴刻四行（见本书第336页）。

1963年3月，在泉州东门外瑞枫岭附近某姓农民家中获得。据乡民说，此碑是他家中百年古墙倾塌而出现的，至于详细来源则不知。我们又在附近发现古伊斯兰教石墓数座。因此，瑞枫岭也是宋、元时代的外国人墓葬区域之一。墓主法蒂美，她卒于回历706年（大德十年，公元1306年）。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59 德黑兰人海迪杰墓碑

这是一方女子的墓碑，高61.5厘米，宽39厘米，厚7.5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尖拱形的顶端下浮雕云月图案。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五行（见本书第337页），行间各有浮雕横线隔开。碑的背面浮刻五行古阿拉伯文字，亦有横线隔开。碑系清末夏姓开掘园圃所获，移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以后砌于明善堂西墙北侧1.60米高处。1983年夏，从明善堂壁上卸下。墓主海迪杰，别号萨达鲁，生前很富有，卒于回历736年（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

本碑文有另外的译文，即：

吉庆、善良、礼拜、廉洁的夫人海地哲，故宰相帖哈麦人赛尔屯·丁先生的女儿。在穆历736年10月一个夜晚，由虚幻的尘世到达幸福的世界，到达赦人的真主慈爱的一边。

墓碑背面的译文是：

每个人都要死亡，你们在末日将获得报酬，凡脱离火狱而进入乐园的人，他确已成功了，尘世的生活无非是骗人的享受。^①



A 59.1 墓碑正面



A 59.2 墓碑背面



A 59.1 拓片



A 59.2 拓片

①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年第6期，第527页。

以上两种译文，墓主的名字海迪杰与海地哲是一致的；卒年同样为回历 736 年。只是墓主的父、祖辈名字不同。如果按后一种译文，则要引起人们的注意。

查《多桑蒙古史》，在公元 1298 年波斯合赞王杀支持他上台的丞相撒都鲁丁（赞章人），任命新丞相撒都丁（Sa'd-ud-din）。撒都丁是萨维（Save）人^①。疑《多桑蒙古史》中的“萨维”即墓碑文“帖哈麦”的异译；《多桑蒙古史》中的“撒都丁”即墓碑文“赛尔屯丁”的异译。

1304 年，合赞病死，遗命其弟合儿班答嗣位，即完者都。1312 年，完者都杀丞相撒都丁^②。墓主海地哲可能因其父被杀，与亲属随穆斯林客商航海来泉州，后卒葬泉州。

墓碑文中的帖哈麦即波斯德黑兰（Tehelan），为今伊朗首都。位于波斯北部厄尔布鲁士（Elbruz）山南麓平原地区，以产瓷器、毛毡著名。这是泉州发现的少有的德黑兰人的墓碑。

A 60 伊斯法罕人拜赫莱旺·亚南墓碑



A 60



A 60 拓片

碑高 50 厘米、宽 36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尖拱下刻云月图案。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碑顶尖拱的右侧和“云月”，部分受破坏。1936 年，获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拜赫莱旺·亚南，拜赫莱旺为其别号，意为君主。波斯人以“拜赫莱旺”与地名伊斯法罕（或族名）相配合，构成别号。墓主卒于回历 759 年（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 年，见本书第 337 页）。

^① 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第 6 卷，第 5 章《合赞》，第 966~967 页，万有文库本，1935 年商务图书馆出版。

^② 同注①第 7 卷，第 2 章《完者都》，第 1130~1131 页。

泉州宗教石刻

伊斯法罕(Isfahan or Ispahan),地名。在伊朗德黑兰之南部。公元14世纪中蒙古人东征,城被毁。17世纪时,阿拔斯第一定都于此。1722年阿富汗攻占该地,而渐次衰落。伊斯法罕为波斯宗教的中心,该地盛产烟草、陶器、玻璃、麻布等。

A 61 法蒂美可敦墓碑



A 61



A 61 拓片

这是一方女子的墓碑,高66厘米,宽34厘米,厚8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九行(见本书第338页),除第一、第二行外,其余行间有阴刻横线隔开。碑的下部,浮雕一朵大仰莲,承托着整个石碑。背面琢平,无雕刻。碑的左右侧面和碑顶面,浮雕图案花纹。全碑雕刻精细、美观。1956年10月,从泉州仁风门外色厝美村收回。同年12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碑文的最后一行半,有可能是采用阿拉伯字母的波斯亦思替非文字。

墓主法蒂美可敦,卒于回历729年(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可敦”,意为皇后、夫人。“特肯”,即“特勤”,原为突厥语“可汗之弟”的意思。“特肯”在波斯语作王子、贵族之意。则知墓主法蒂美出身于贵族家庭。

A 62 萨阿德拉墓碑

碑高91厘米、宽60厘米、厚14.6厘米。辉绿岩石琢成。该碑系清末蒲姓园圃中挖出,移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后砌于明善堂西墙南侧1.35米高的墙上。1983年夏,从墙上卸下。墓碑的两侧面浮雕连续卷云图案。碑的正面刻一个凹入2厘米的石龛,碑面磨光,龛顶尖拱下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构成心形图案,两旁浮刻云朵,其下阴刻十行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338页)。碑面文字两旁各夹一道连续卷云纹浮雕图案,整个碑面显得严整。这是泉



A 62.1 墓碑正面



A 62.1 拓片



A 62.2 墓碑背面



A 62.2 拓片

州地区发现的雕刻最精美,字数最多的古阿拉伯文字墓碑。但因文字是浅刻,一时难以全部认读。墓碑正面记载墓主叫萨阿德拉。逝于“回历 777 年斋月 8 日”(即明洪武八年,公元 1375 年)。但正面碑文有另一种译文,即:

奉大仁大慈的主的尊名。在你以前,我没有规定人类永活不死,若是你死了,难道他们能永活不死吗?每个有生命的都要死亡,你们将归宿他那里。……(回历)764 年……赞颂归化育众世界的主。^①

墓碑背面刻一凹入 2 厘米石龛,龛中镌刻文字部分形状与尖拱形石龛相似,上、左、右三边绕以浮雕连续卷云纹图案,这种雕刻形式与扬州“回回堂”普哈丁墓区的元代阿拉伯人墓碑十分相似。碑面浮刻七行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 339 页),行间有浮刻横线隔开。最后一行阿拉伯文字居中,两旁浮刻云朵。另一种译文是:

艾哈默德先生的墓岗。

先知说:异乡人的死亡是殉教,他由虚幻的世界到永恒的世界,他选择末日而不要尘世,到达真主的慈爱。亡者是国家与宗教的幸福者,伊斯兰教和民族的太阳。愿真主以仁慈、宽恕赦免他,赐穆罕默德和全部后裔幸福。^②

按第二种译文,墓主是艾哈默德,卒于回历 764 年(至正二十二年,公元 1362 年)。

A 63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高 61 厘米、宽 49.5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四行(见本书第 339 页),背面无文字。1955 年,在泉州涂门城附近乱石堆中获得。是年 9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碑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63



A 63 拓片

①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 年第 6 期,第 526~527 页。

② 同上注。

A 64 艾卜法蒂美墓碑



A 64



A 64 拓片

碑高 55 厘米、宽 34.5 厘米、厚 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顶端作尖拱形状，碑下的榫位部分特别宽大，与一般墓碑大不一样。而且，榫位部分也刻上文字，把榫位也作为碑面的一部分。这种处理方法也是不多见的。

碑的正面经加工琢平后，用浅线条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39 页），布局稀疏，部分字迹漫漶。但阿拉伯文字的书写不甚规范。碑的背面亦经琢平，但未刻文字。1958 年 9 月，在泉州镇南门外华洲村的田畔获得。据乡民云，系二十多年前，运泉州南门城石筑屋，因为是墓碑而弃置不用，改作田间小道铺路之用。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名为“艾卜法蒂美”，意即法蒂美的父亲。

A 65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高 62 厘米、宽 48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的顶额，用古阿拉伯字刻成一轮圆月，左右两旁刻有两朵卷云，组成一个“云月”。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四行（见本书第 340 页）。1930 年，在泉州东门城垣上掘得。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碑文内容为一般教徒的祈祷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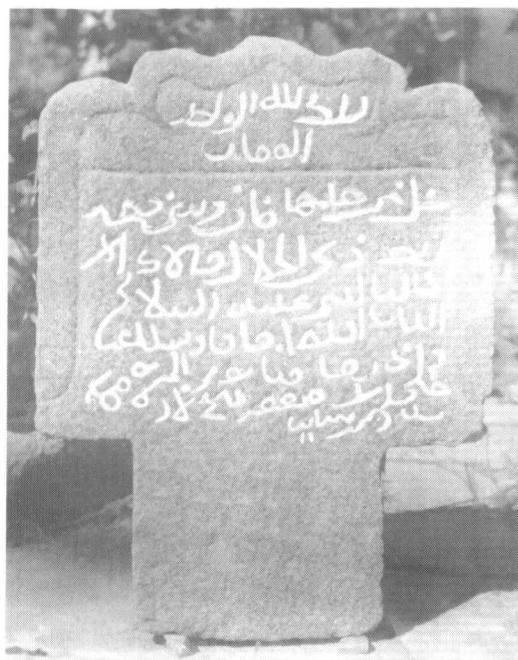


A 65



A 65 拓片

A 66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66



A 66 拓片

碑高 45.2 厘米、宽 33.1 厘米、厚 8.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下端石榫特别长。正面横线以上，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横线以下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见本书第 340 页）。背面琢平，未刻文字。

1959 年 6 月，在泉州通淮门外下围村获得。据乡民云，系多年前在城墙上掘获，杂以其他石块铺在田间小路上。后因修路，重被掘起，因文字奇特，被收存祠堂内。碑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三十九章第四节节录和《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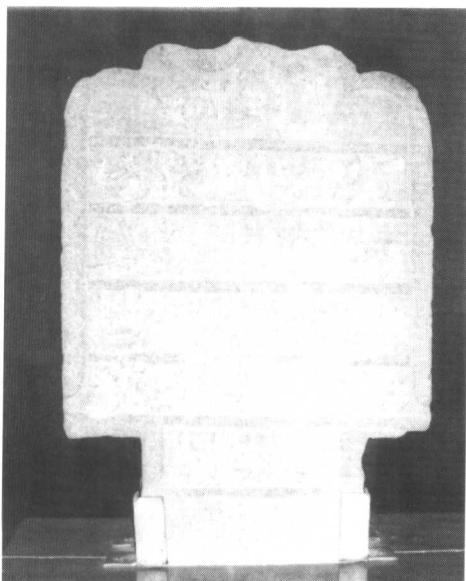
A 67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高 55 厘米、宽 36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正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见本书第 340 页），每行有浮刻横线隔开。碑的背面刻一凹入圆圈，圈内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两行。本碑另一特点，是正面的榫位也雕刻两行古阿拉伯文字，这种把榫位也变成碑面的一部分的处理方法和在背面圆圈中刻字的雕刻方法，在泉州数十年来所发现的阿拉伯文字墓碑中，是少见的。全碑状似一块倒立的有肩石斧，碑顶仍作尖弧形。以阿拉伯字的雕刻风格及手法上看，它很可能是一方元代侨居在泉州的阿拉伯人所留下的墓碑。

1964 年 3 月，在泉州市中心区华侨大厦建筑工地掘获。该地是清代海清亭遗址。四十年代初，民国政府在此地建筑参议会院址，曾拆卸泉州东、南门城墙石块作为建筑材料。此碑很可能是当时一起搬来，作为基础石，被填入墙基中。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本墓碑未刻记死者的姓名和死亡年份。而墓碑正面浮刻《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背面两行阿拉伯文字的另一种译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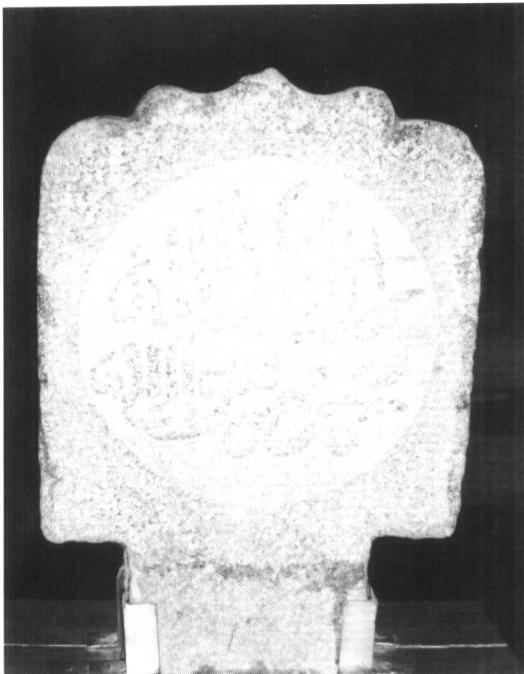
除真主以外，别无可崇拜。



A 67.1 墓碑正面



A 67.1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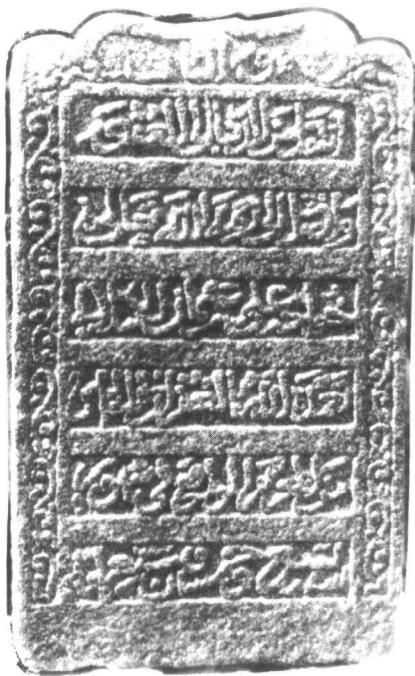


A 67.2 墓碑背面



A 67.2 拓片

A 68 哈瓦杰·阿里墓碑



A 68



A 68 拓片

碑高 55.7 厘米、宽 32.6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尖拱顶被毁。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见本书第 341 页),行间浮雕横线隔开。碑面两旁刻有连续传枝花纹图案。1939 年,泉州通淮门城墙拆卸时所获。墓主哈瓦杰·阿里,卒于回历 759 年(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 年)。墓碑文记墓主逝于回历“759 年第 4 个禁月”,按回历一年有 4 个禁月,即一月、七月、十一月和十二月,第 4 个禁月即十二月。“哈瓦杰”,在波斯语中为先生、商人、教师、长老之意,这里作为称号。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69 施那威人哈只·赫瓦杰·侯赛因墓碑



A 69



A 69 拓片

碑高 58.5 厘米、宽 35 厘米、厚 8.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但尖拱顶已损毁。碑面浮刻六行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 341 页)。除第一行外,其他每行间都有浮刻横线隔开。背面琢平,未刻文字。1958 年 4 月,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城基掘获。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墓主哈只·赫瓦杰·侯赛因,卒于回历 764 年(至正二十二年,公元 1362 年)。“哈只”,表明墓主生前朝觐过圣地麦加。“赫瓦杰”(Khewajh),原为波斯语,意为先生、教师、商人、长老,在伊斯兰教国家用作称号。墓碑文中的“西拉菲”系地名,即波斯的施罗围(亦称施拉夫、撒那威、尸罗夫、斯罗夫)。西拉菲(Siraf),是地处波斯南部法尔斯坦(Farstan)地方的重要城市,地近波斯湾。自 9 世纪上半叶至 13 世纪上半叶的近四百年间,为波斯湾最大的贸易港,在此期间,大量波斯商人通过此城到东方进行贸易。岳珂《桯史》记“泉亦有舶獠,曰尸罗围,货乙于蒲”^①;赵汝适《诸蕃志》记泉州“有番商曰施那围,大食人也,距寓泉南(泉州的别称),轻

^① 岳珂《桯史》卷十一,《番禺海獠》。1981 年,中华书局出版。

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丛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①；林之奇《拙斋文集》记“泉州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国以十数，三佛齐其一也。三佛齐之海贾以富豪宅生于泉州者，其人以十数，试那围其一也。”^②以及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元至正十年刻立、明正德二年重刻的《重立清净寺碑记》载“宋绍兴元年，有纳只卜·穆兹喜鲁丁者，自撒那威从商舶来泉，创兹寺于泉州之南城”。以上文献资料和碑记，都记载波斯西拉菲人在泉州经商的事迹。南宋时，居泉州的阿拉伯、波斯富商，多数为西拉菲人。

A 70 大不里士人瞻思丁·穆罕默德墓碑



A 70



A 70 拓片

碑高 38.5 厘米、宽 36 厘米、厚 8.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顶端已被损毁，碑面阳刻古阿拉伯文字五行（见本书第 341 页），行间有浮雕横线隔开。清末在夏姓园圃中掘获，移清净寺保存，以后砌于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大厅北侧墙上 2.60 米高处，1983 年夏卸下。碑背阴刻楷书汉字“圣”，字径 23.5 厘米×18 厘米。墓碑今存泉州清净寺内。

墓主名叫瞻思丁·穆罕默德，他是波斯大不里士人。

大不里士（Tabriz），伊朗第二大城，位于伊朗西北部库赫·塞汉特山麓高原上。自公元八世纪起，曾长期为波斯首都。城东萨维兰山为拜火教圣地。该城是波斯西北农牧业产品的重要贸易中心，以织毯、制革手工业著名。

A 71 胡斯娜·易司马仪小姐墓碑

碑高 49 厘米、宽 38.7 厘米、厚 9.3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碑正面阴刻

①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卷上，《大食国》。1956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② 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五，《泉州东坂葬蕃商记》。

古阿拉伯文字五行(见本书第 342 页),背面粗糙,无雕刻。1956 年 11 月,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街道上。同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墓主胡斯娜·易司马仪小姐,她卒于回历 764 年(至正二十二年,公元 1362 年)。



A 71



A 71 拓片

A 72 黄公墓百氏坟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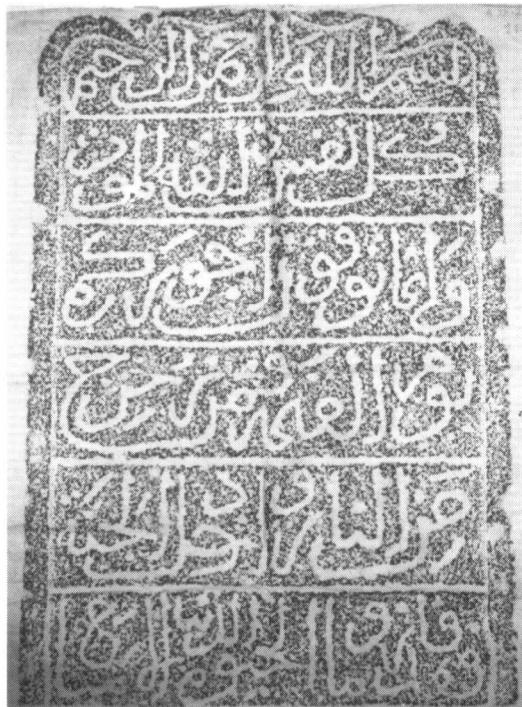
A 72.1 墓碑正面



A 72.1 拓片



A 72.2 墓碑背面



A 72.2 拓片

碑高 77 厘米、宽 51 厘米、厚 9.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端作尖拱形，但尖顶略受损毁。碑的正面阴刻一横线，横线以上自右至左，竖行阴刻汉字“黄公墓 百氏坟”二行六字。汉字下面阴刻两行古阿拉伯文字，但字迹被磨损，已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横线以下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两行（见本书第 342 页）。

背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行间有阴刻横线隔开。

这可能是夫妻合葬的墓碑石。“百氏”可能是色目女。“黄公”可能是逐渐汉化了的色目人，或者是崇奉伊斯兰教的汉人。今泉州的回族就有黄姓。本碑的发现，提供了泉州回族黄姓由来的实物资料。

1963 年 9 月，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获得，先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后送福建省博物馆展出。墓主阿拉伯文姓名模糊，难以认读，仅识得其卒于回历 715 年（延祐二年，公元 1315 年）。碑的背面刻写《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A 73 古伊斯兰教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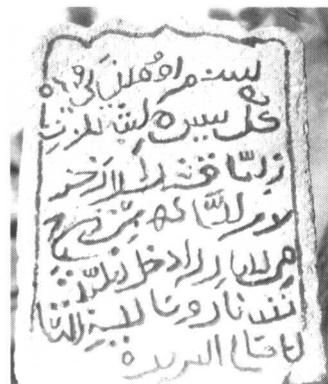
碑高 59 厘米、宽 38 厘米、厚 8 厘米。白花岗岩石琢成。碑顶端作尖拱形。碑面很粗糙。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见本书第 342 页）。碑背面也很粗糙，未刻文字。由于碑面粗糙，字迹模糊，经涂粉后尚可辨读。1962 年 4 月，获于泉州小东门外东湖附近田间。据乡民云，是早年从城墙上挖来铺路的。墓碑无刻死者姓名和死亡年、月，仅刻《古兰经》第三章第一



A 73.1



A 73.1 拓片



A 73.2 墓碑文字涂粉后照片

百八十五节全文。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74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高 55 厘米、宽 34 厘米、厚 6.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十行(见本书第 343 页)。1929 年,泉州东门城拆卸时所获,被断为三段,叠砌于民宅墙上。1950 年,因墙圮而出现。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本墓碑的古阿拉伯文字模糊难辨,仅认读出墓主卒于回历 788 年(洪武十九年,公元 1386 年)。其余碑文是《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四、三十五节全文。本墓碑的发现说明经元末亦思巴奚十年战乱之后,伊斯兰教仍然在泉州存在。



A 74.1 拓片



A 74.1



A 74.2 墓碑文字涂粉后照片

A 75 穆罕默德·本·迈斯乌德墓碑



A 7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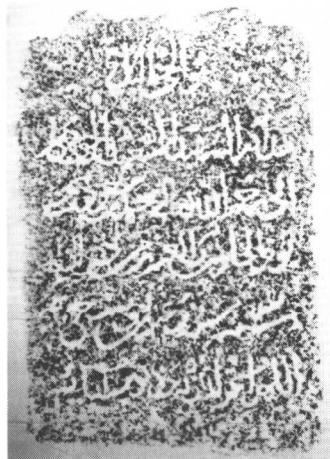


A 75.2 墓碑文字涂粉后照片

碑高 77 厘米、宽 39 厘米、厚 7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43 页),背面无文字。1933 年,在泉州东门拆卸城墙时获得,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穆罕默德·本·迈斯乌德,卒于回历 726 年(泰定三年,公元 1326 年)。

A 76 蕃客墓——阿卜杜拉·阿里·穆罕默德·本·哈桑墓碑

碑高 139 厘米、顶宽 31 厘米、中腰宽 47.5 厘米、底宽 62 厘米、厚 16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略呈等腰梯形,石面甚粗糙。就整个碑面的现有情况推断,本碑在早年曾被当作路面石块使用过。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43 页),字体不甚规范。此外,在第五、六行古阿拉伯文字之间,自右至左阴刻横书“蕃客墓”三个汉字。汉字之大显然与整个碑面很不相称,虽是草草刻上的,但字的间架、结构、笔画都很规整。本碑的石质较疏松,碑的背面和侧面部分,已剥蚀和出现裂缝。



A 75.1 拓片



A 76



A 76 拓片

“蕃客”一词，见《唐语林》载：

拔河古谓之牵钩，襄汉风俗……中宗曾以清明日，御梨园毬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明皇数（教）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十观者，莫不震骇^①。

又唐文宗太和八年（公元834年），诏书曰：

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恩仁，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②

可见，“蕃客”一词，唐代即有之。其意即住中国之外国人。

又据《萍洲可谈》卷二载：

北人过海外，是岁不还者，谓之住蕃。诸国人至广州，是岁不归者，谓之住唐^③。古时称外国曰“蕃”。

又《宋会要》载：

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土生蕃客，愿往他州或东京贩易物货者，仰经提举市舶司陈状，本司勘验旨实，给与公凭。

所谓“土生蕃客”，有可能是指在中国出生之外国人，亦有可能指外国商人与中国人通婚生下之子女。这种混血儿，在泉州地方则称“半南蕃”。

又《宋会要》载政和四年（公元1114年）五月十八日诏：

诸国蕃客，到中国居住，已经五世，其财产依海行无合承分人，及不经隶属者，并依户绝法，仍入市舶拘管。

宋代对外商仍称“蕃客”。

总之，自唐开始，外国人来中国经商者，中国人称之为“蕃客”。古之泉州地方，亦有“蕃客”一词，有此“蕃客墓”石碑为证。本碑的发现，说明当时在泉州的外国人，也接受泉州当地人对他们的称呼，也自称起“蕃客”来了。但今日泉州人所称的“蕃客”，则专指出洋之中国人，与原义完全相反矣。可惜本墓碑未刻年代，但据以上资料和我们所发现的泉州宋代同类型阿拉伯文墓碑石的字体判断，这方墓碑可能是宋代的遗物。

1965年5月，泉州东门外东岳山李公祠东南面（泉州运输总站汽车修配厂东南角墙边），因修筑道路掘获，被弃置于路旁。后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王朝小先生移馆保存。不久送福建省博物馆展出。

墓主阿卜杜拉·阿里·穆罕默德，但未刻记死亡年份。关于本墓碑文，有不同的译文。1978年，《海交史研究》创刊号发表题为《蕃客墓及其有关问题试谈》的文章，首次披露伊拉克专家的译文，译文如下：

① 宋王谠撰《唐语林》卷五，补遗。收入《墨海金壶》子部，第147册，清张海鹏（若云）辑，1921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清刊本。

② 见《全唐文》卷七十五，文宗七，《太和八年疾愈德音》，清嘉庆十九年刊本。

③ 朱彧撰《萍洲可谈》卷二。收入《墨海金壶》，子部，第一百四十九册。

爱资哈尔

安拉是今世和来世的主

伊卜·阿卜杜拉

穆罕默德·伊卜·哈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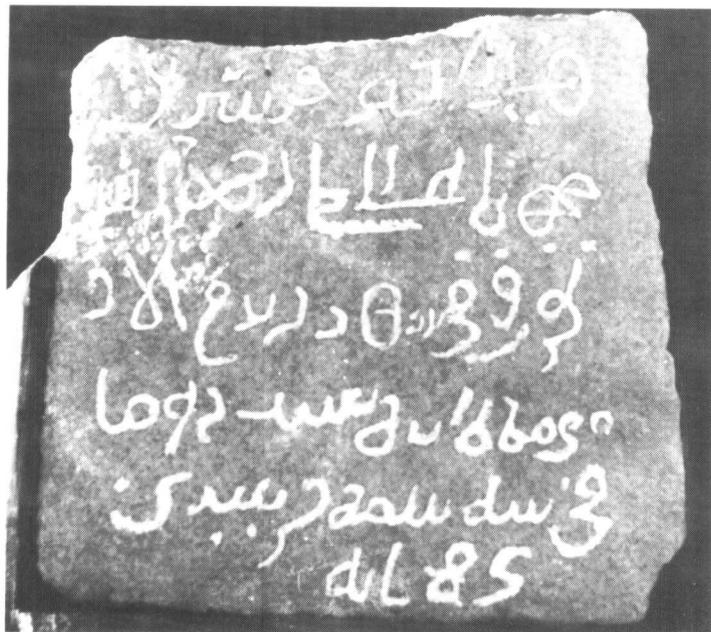
埃及^①

就整个碑面上的六行古阿拉伯文字看,第一行和第六行的字体相同,而与其他四行的字体不一样。似乎是在整个“蕃客墓”碑完工之后由于某种原因附加上去的。因为碑面文字已刻好,又挤进第一行和第六行阿拉伯文字,而且这第一、六行的阿拉伯文字,对碑文内容并无影响。

据阿拉伯语专家华维卿先生的释读,认为第一行的译文是“地”;第六行的译文是“墓”较为恰当,即“墓地”的意思。整句的意思是“死者阿卜杜拉·阿里·穆罕默德·本·哈桑墓地”。

A 77 哈拉提人侯赛因墓碑

碑的顶部已残毁,残高43厘米,上宽40厘米,下宽42.2厘米,厚10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石面琢平,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344页),书写不甚规范,以致年代不能准确



A 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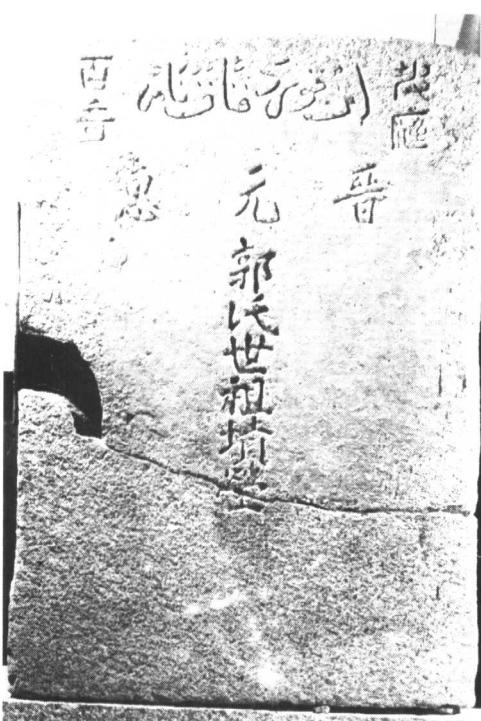
^① 题为《蕃客墓及其有关问题试谈》,载于《海交史研究》1978年第1期(创刊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辑。

判定。本碑石原在泉州中山中路善缘堂(后改为芬陀室)屋檐下,作为石桌面。据云,于1952年建屋,从泉州东门购置城础石时,一起搬来的。因其略呈方形,石面较平,遂作石桌面使用。1965年秋,泉州中山中路(俗名南街头)吴元英女士把碑石赠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王朝小先生负责运回。

如果本墓碑主人逝世年份(回历567年,宋孝宗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可以肯定的话,那么此碑仍是泉州历年来已发现的有记载年代的最古老的一方阿拉伯文字墓碑石。墓主侯赛因,其籍贯“赫拉蒂”(Khalat,哈拉提),其地系亚美尼亚首府。

A 78 元郭氏世祖坟茔碑

碑高138厘米、宽94厘米、厚11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圆顶,与汉人普通墓碑无异。碑已断裂。碑面文字皆阴刻,由汉字和阿拉伯字组成,分四部分:



A 78

1. 右上角,竖刻“坡庭”两字;左上角,竖刻“百奇”两字。
2. 在“坡庭”和“百奇”之间,横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
3. 在阿拉伯文字之下横刻“晋、惠”两字。
4. 在“晋、惠”之间,竖刻“元郭氏世祖坟茔”七个字。

墓碑中的阿拉伯文字,系汉字的对音,即“元郭氏德广之墓”(见本书第344页)。

此碑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4公里处,即法石乡圣殿村金二娘山下的柳公砌地方。

法石滨海靠山,宋、元时代为泉州海外交通要冲,也是泉州通后渚港的必经之地。宋真德秀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载:

法石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
外足以扼海道。^①

文献记载或传说中,皆有涉及当时这一地区的外国人的活动事迹。如《闽书》载:

寿庚迎降及歼淮兵、宗子,皆寿嵒阴为之

谋,事成乃佯著野人服,入法石山,若无与其事者。^②

又传说法石的石路是蒲寿庚叛宋降元后,为迎接元将唆都而沿海滩所筑云云。

① 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万有文库本。

② 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

1959年4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派出调查组，到法石调查海外交通史迹。曾先在法石美山的金厝山下的“西墓园”，发现数座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继而于1962年秋冬之际，根据惠安《白奇郭氏族谱》^①提供的线索，对法石乡柳公砌进行较系统的调查，终于在此地发现这仆碑。1974年，泉州海交馆再次到该地社会调查，运回墓碑保存。

据惠安《白奇郭氏族谱》载，法石郭氏“始居于元”。同谱的《修葺義斋郭公墓文》载：“我家自开基法石德广公，即从清真教”。郭氏族谱以上的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法石地处泉州至后渚港的中心点，水陆交通便利。元代信仰伊斯兰教的郭德广，居住于此是完全可能的。

《白奇郭氏族谱》又载，元代郭氏移居法石，即“卜居坡庭”。墓碑上的“坡庭”即法石乡圣殿村的一个角落，今仍叫“坡庭”。墓碑石所记和族谱所记完全吻合。

《白奇郭氏族谱·适回辩篇》记载：“吾宗何以适回者，爰悉长者曰‘从妈教’……吾宗先世，元太常寺卿德广公肇基法石……此乃泉州之一世祖，其坟茔用回教法，如何得‘从妈教’？若‘从妈教’必先德广公用汉葬法，二世公始用回葬法……如何一世祖已从回，安得为‘从妈教’？”

什么是“从妈教”？一般认为是从妻、从母信奉伊斯兰教叫做“从妈教”。的确，明初李贽的二世祖林努是从妻信奉伊斯兰教的，直至成化、嘉靖年间，李贽的祖母迭贞勤乃“家袭清净之教”。因此，人们附会信奉伊斯兰教为“从妈教”。我们认为，所谓“从妈教”，可能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称宗教领袖叫“以妈妈”有关系。宋、元时代泉州多波斯人，可能当时的泉州人就用“以妈妈”作为伊斯兰教的代名词了。

至于，为什么郭姓移居惠安白奇呢？我们认为，元时的郭德广因为信仰伊斯兰教，于元末那兀纳亦思巴奚兵叛乱平定之后，受当时排外运动所波及，加上明初泉州进一步扩大排外运动。信仰伊斯兰教的“卜居坡庭”的郭氏，被迫离开法石，渡海至后渚港对岸的惠安白奇海边，遂定居于此。

又《白奇郭氏族谱》载，“德广公，洪武初……疾故，葬于法石光堂宫之左”。光堂宫就在圣殿村柳公砌之近旁。“元郭氏世祖坟茔”碑石发现地点，恰恰在此附近，这与族谱所记亦相符合。

可以肯定，此碑不是郭德广原来的墓碑石。从“郭氏世祖”几个字看，可以判断它是后代另立的。原郭德广的墓碑，可能在明初泉州的排外运动中被毁，而明永乐五年五月，颁布保护伊斯兰教的“敕谕”之后，居住白奇的郭氏后裔，为纪念他们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祖先郭德广所立。

此墓碑上所刻的一行阿拉伯文，从单个字看，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完整的字义。从整体看，在阿拉伯语里并不成文。但联系碑上所刻中文，与百奇、坡庭、惠、晋等均无关系，但与“元郭氏世祖坟茔”却有令人注目的关系。据白奇郭氏族谱记载，郭德广为郭氏的世祖，再看墓碑上所刻的阿拉伯文的读音为“Yin go zi degangong ta Mou”，它是墓碑上“元郭氏德广公的墓”汉字的对音。

① 墓碑上的“百奇”地名，今又称“白奇”或“百崎”，属惠安县界，与泉州后渚港隔海相望。

泉州宗教石刻

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汉语,这在西北地区的回族聚居地称“消经”或“小儿锦”,这是西北地区回民为学习阿拉伯语的方便起见而创造的一种方法。“小儿锦”流行于清代,清末、民国初还出现“小儿锦”的书,现在仍流行于西北回民中。但在泉州地区发现这种“小儿锦”仍属首见,它反映了清代泉州回族与西北地区回族之间的关系。

由此判断,重刻此碑的时间上限是在清代。所以郭德广是穆斯林,这是毫无疑义的。

惠安《白奇郭氏族谱》载,他们的祖先是唐代郭子仪。考其原因,那只不过是因为元末明初的处境极端困难,不得已托名唐代宰相郭子仪后裔,便于避祸罢了。

A 79 施那威人伊卜拉欣墓碑



A 79



A 79 拓片

碑的上、下部分均已残缺。残高 33 厘米,残宽 39.9 厘米,厚 8.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中阴刻五行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 344 页)。1955 年 8 月,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惠祥教授采获自泉州东门外仁风街。现在碑存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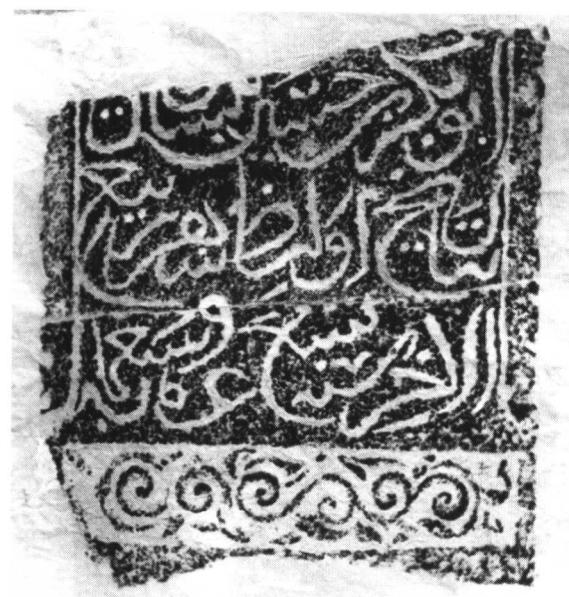
墓主的身份是奴仆,名叫“×××伊卜拉欣”,他的籍贯是波斯“西拉菲”(即施罗围、施那威)。墓碑文字已残缺,不知其卒年。

A 80 阿布贝克尔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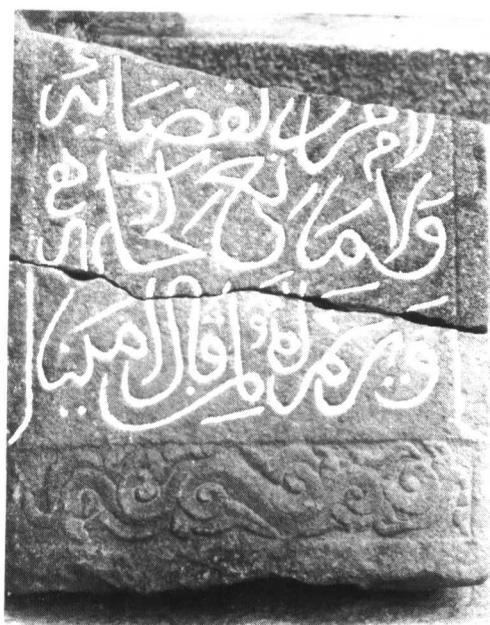
碑的上部已残缺,残高 47 厘米、宽 42.5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除上部残外,又断裂成上下两段。碑的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背面阴刻古阿文三行(见本书第 345 页)。两面碑底均浮刻一行连续云纹图案。碑的上半段,1953 年获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一农民宅中。碑的下半段,1956 年 12 月,在距上半段发现地点不远的一口池塘中发现。同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墓主阿布贝克尔·本·侯赛因,卒于回历 719 年(延祐六年,公元 1319 年)。



A 80.1 墓碑正面



A 80.1 拓片



A 80.2 墓碑背面



A 80.2 拓片

A 81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的下部已缺损,残高47厘米,宽47厘米,厚10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

泉州宗教石刻

碑正面 上部，浮雕图案，下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四行（见本书第345页）。碑背面尖拱下浮刻卷云和交曲图案花纹，下阴刻古阿文三行。背面左碑面文字部分损毁。1956年3月，在泉州东门外东湖畔获得。同年同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因墓碑的下部损毁，故不知墓主姓名、籍贯和卒年。



A 81.1 墓碑正面



A 81.1 拓片



A 81.2 墓碑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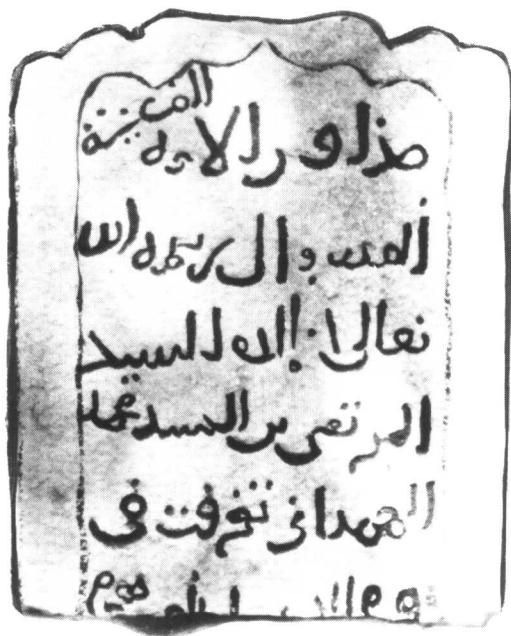
A 81.2 拓片

A 82 哈马丹人赛义德×××墓碑

这是一方女子的墓碑，残高 79 厘米，宽 64 厘米，厚 13 厘米，下部已残缺。白花岗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45 页）。1926 年，陈万里先生在泉州南大街路上发现，当时陈氏认为甚重要，特嘱当时地方政府建设局移入局内保存。不久，建设局迁址，该碑遗留在局旧址中。1935 年，泉州洪水为灾，旧址倒塌，碑遂遗失。1955 年 3 月，居民在旧址中挖出，但底部已残。该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墓主赛义德×××，她是哈姆丹尼人。赛义德，《元史》称“赛夷”，系指圣裔。哈姆丹尼，即波斯的哈马丹（Hamadan）城，该地为伊朗古都，位于德黑兰西南 160 英里，为波斯西北部的重要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皮革制造业极盛。

A 83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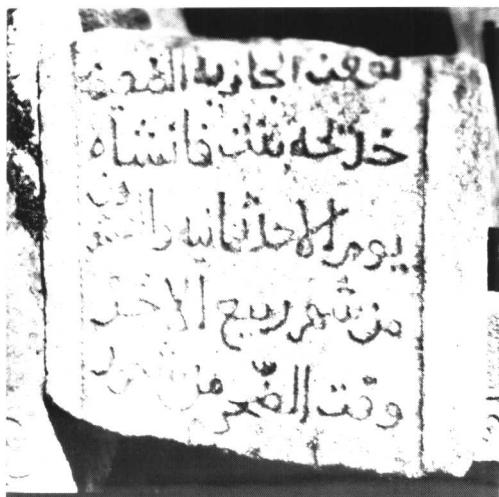
A 83



A 83 拓片

碑下部已残断,残高 67 厘米,宽 57 厘米,厚 9.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七行(见本书第 345 页)。1947 年,在泉州德济门(南门)城基础掘出。同年修桥时,又被砌在南门顺济桥的桥墩上,后经发现移出保存。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因墓碑下半部残失,而不知墓主姓名和逝世年份。现存碑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84 范夏赫之女海迪杰墓碑



A 84



A 84 拓片

这是一方女子的墓碑。碑的上、下部皆残断。残高 57 厘米,宽 61 厘米,厚 11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五行(见本书第 346 页)。1932 年,在泉州西街路上获得。此碑是由城垣上拆卸下来被铺在路上的。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是范夏之女儿海迪杰,她卒于英年,但死亡年份,因墓下半部残断而不可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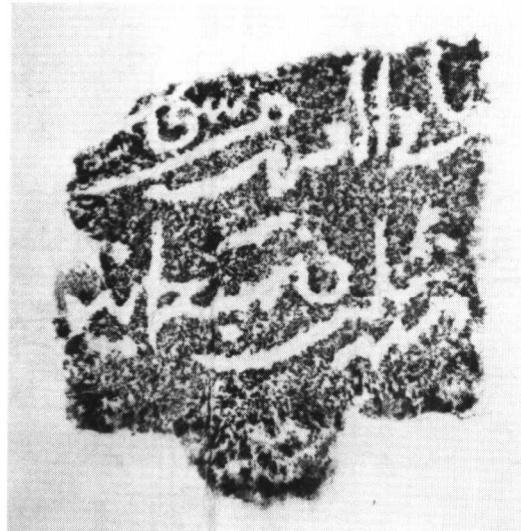
A 85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石上部已毁。残高 24.5 厘米,宽 20.5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尚存两行(见本书第 346 页)。与同类型墓碑比较,这方墓碑显得特别小。清末收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以后被砌于明善堂大厅门口廊下南墙 2.45 米高处。1983 年夏,碑被卸下,现保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内。因墓碑上部损毁,而不知墓主姓名,仅知卒于回历 780 年(洪武十一年,公元 1378 年)。但墓主的卒年,有不同的译文,译作卒于“(回历) 736 年元月”^①。

^① 见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 年第 6 期(总 225 期),第 529 页。



A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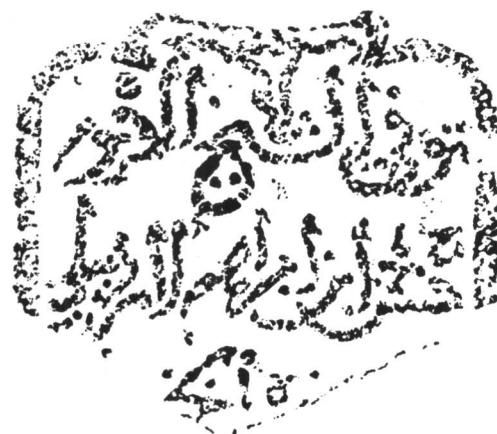
A 85 拓片

A 86 费赫里·易卜拉欣长老墓碑

碑下部残缺,尖拱形碑顶被毁坏。辉绿岩琢成。残高36厘米,宽39厘米,厚8厘米。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见本书第346页),有浮刻边框。1944年,在泉州东门城基下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费赫里·易卜拉欣长老,卒年的记载因碑面的残缺而未可知。



A 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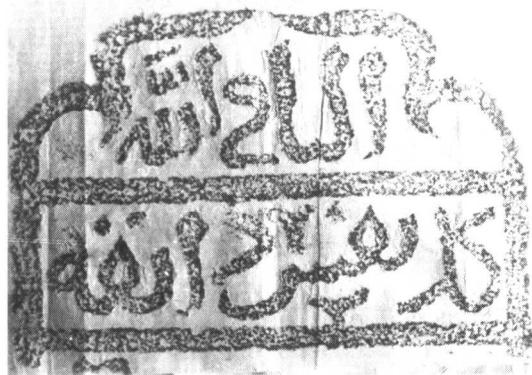


A 86 拓片

A 87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87



A 87 拓片

碑的大半下部已损毁。残高 29 厘米, 宽 42 厘米, 厚 11.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顶端作尖拱形。正面浮雕古阿位伯文字两行(见本书第 347 页), 有浮雕边框, 行间有浮雕横线隔开。背面琢平, 未刻文字。1945 年, 在泉州南门厂口某居民家里发现。1953 年, 收回保存。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现存碑文系《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的节录。

A 88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仅剩上半段。残高 35 厘米, 宽 46 厘米, 厚 6.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顶端作尖拱状。正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两行(见本书第 346 页), 有浮刻边框, 行间有浮刻横线隔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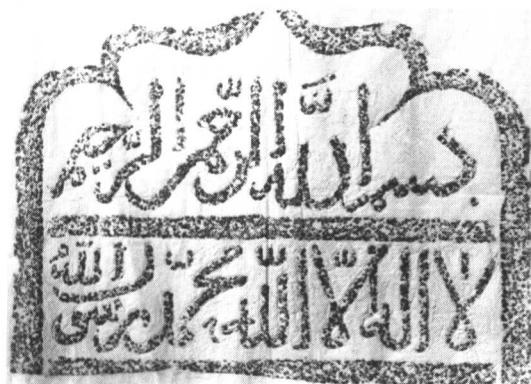


A 88.1 墓碑背面

背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行间亦有横线隔开。1944年,获于泉州东门城基。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碑正面刻《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的节录。



A 88.2 墓碑正面



A 88.1 拓片



A 88.2 拓片

A 89 古伊斯兰教墓碑

此为一墓碑的残段,上、下、左三面皆残缺,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347页),碑右沿有波状云纹的图案雕刻。辉绿岩石琢成。1946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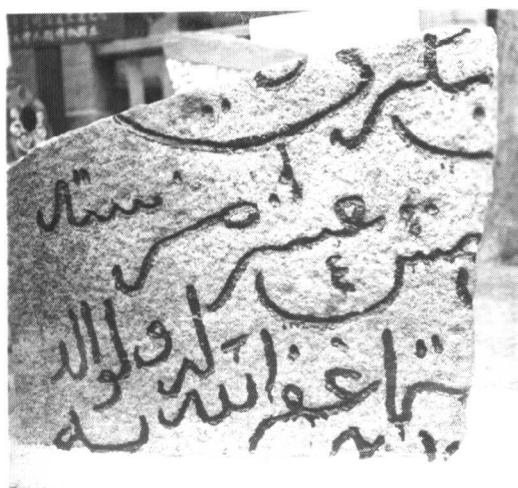


A 8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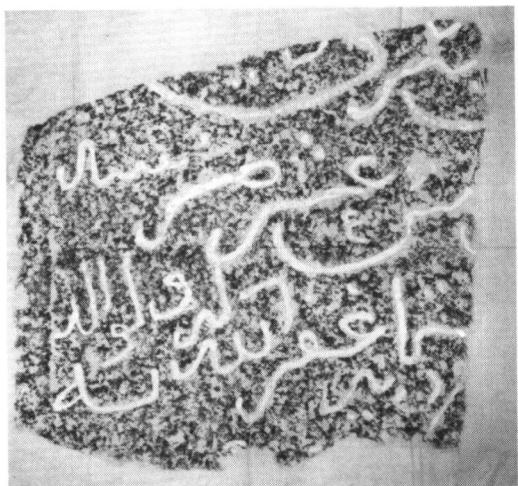


A 89.2 墓碑文字、花纹涂粉后照片

A 90 ×××贝克尔墓碑



A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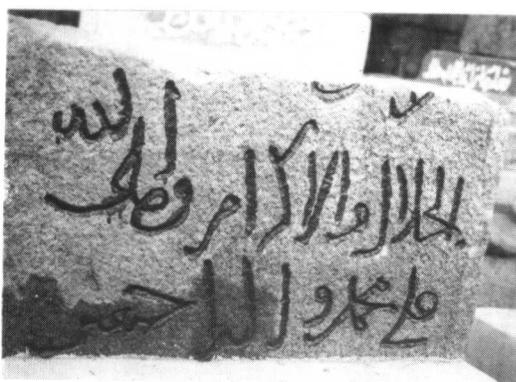


A 90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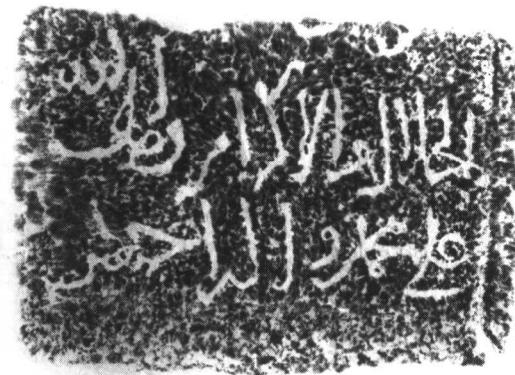
碑的上、下和右边皆残缺。残高 48 厘米，宽 52 厘米，厚 10.8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粗糙，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见本页第 347 页）。1950 年，在泉州东门外东塘头村农民宅

中发现。1955年12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 91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91



A 91 拓片

碑的上、下部已残断。残高38厘米,宽56.3厘米,厚8.5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两行(见本书第347页)。1955年,泉州东门外乐园路旁发现。是年12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 92 永春县达鲁花赤墓碑



A 92.1 墓碑正面



A 92.1 拓片



A 92.2 墓碑背面



A 92.2 拓片

碑已残断。残长 44 厘米, 宽 42 厘米, 厚 8.5 厘米。1939 年获于东门外池塘中。辉绿岩石琢成, 雕工精细, 碑面四周绕以一种重复的连续传枝花纹。碑顶作尖拱形。碑的正面残留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五行(见本书第 347 页), 行间有浮刻横线隔开。背面阴刻汉文:

奉训大夫永春县达鲁(?)……(应是达鲁花赤)

“达鲁花赤”是蒙古语, 本义谓“镇压者”、“制裁者”、“盖印者”等, 意译作“镇守官”。元代于各行省的路、府、州、县及各提举司、各总管府等, 皆设置达鲁花赤(又作达噜噶齐), 而以蒙古人任这一官职。

“奉训”一职称, 未见《元史·百官志》, 但泉州北门外瑞像岩, 有至正二十一年, 伯亮题名摩崖石刻(隶书), 载:

大元福建行中书省奉训伯亮与耆士李月海……^①

又元吴鉴撰《重立清净寺碑》有“奉训知事郑士凯”一官名。可见, “奉训”应当是行省的属官。永春县城距泉州 86 公里。这一方石刻, 很可能是一个元代做永春县官而死在泉州的色目人的墓碑。

据译文, 墓主的称号是“赛德尔·艾杰勒·凯比尔”。据阿拉伯文“赛德尔”是首位的意思; “艾杰勒”是尊敬的意思; “凯比尔”是重要的意思。以上三者联用是为了强调称号之尊贵。查《永春州志·达鲁花赤》, 有脱欢沙朵罗孛尔一名, 音近于赛德尔·凯比尔, 可能是同一个人。据《永春州志》载: “元制, 江淮以南, 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 一万户之上者为中县, 一万户之下者为下县。永春为下县: 达鲁花赤一员。”^②

① 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

② 乾隆《永春州志》卷十九, 职官, 永春县达鲁花赤。乾隆二十二年版。

A 93 潘总领墓碑

碑高 36 厘米、底宽 66 厘米、厚 1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形制与普通阿拉伯文墓碑有些不同，碑顶仍作尖拱形。碑的中间部分，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四行（见本书第 348 页）。1934 年夏，泉州东门城基掘获。碑下部两翼伸出部分，自右至左，分别阴刻汉字：

潘总领四月初一日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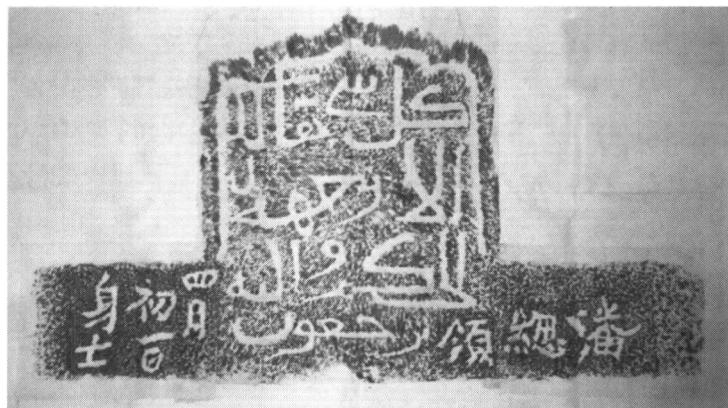
《宋史·职官七》载：

总领，四人。掌措置移运应办诸军钱粮，以朝臣充……初，建炎间（公元 1128～1130 年），张浚出使川、陕，用赵开总领四川财赋，置所系衔，总领名官自此始。

又宋《诚斋文集》^①、《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②和《宋史·食货志》等均载有“总领”官职名称。



A 93



A 93 拓片

① 杨万里《诚斋文集》卷二十四、卷四十一，清乾隆五十九年版。

②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十二、卷四十三、卷四十四、卷四十七，万有文库本，1937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由上引证,可见“总领”这一官职,是南宋政府因为军事需要而设置的,专管钱、粮、税收。绍兴间,“又使之预闻军政,不独职饷馈而已”^①。因此,南宋的“总领”权力是相当大的。元代载籍中,只有“提领”官职,未见“总领”官职名称。故此碑碣,可能是南宋遗物。

“潘总领”是外国人或者是中国人?我们有相当理由认为他可能是一位外国人。其理由如下:

其一,中国古代素有楚材晋用之例,任用官吏不受种族的限制。如宋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蕃官为之巾袍履笏,如华人”^②。况乎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拮据,出现了“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也”^③的困难局面和“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④的倚靠向蕃舶征税的局面。为招来蕃舶,南宋政府于绍兴六年,由知泉州的连南夫,奏请奖励海外贸易的措施,即“诸市舶、纲首,能抬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因此出现“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⑤的情况。又于嘉定间制定“罢和买,禁重征”^⑥的保护蕃商措施。为保证蕃舶前来贸易,南宋政府频频发动扫荡“海盗”的军事行动^⑦。南宋政府和蕃商,为了共同利益,嘉定三年,出现“以贾胡簿录之货修之,城始固”^⑧的修泉州城的行动和淳熙中晋江县令林湜大造战舰,“诸蕃寓居者义之,咸助其役”^⑨的共同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政府为了方便发展海外贸易,增加税收,保证维持庞大的军政开支,以一个外国人充任“总领”的官职,那就不足为奇了。

其二,墓碑上“潘总领”三字横写,“四月初一日身亡”是竖写,均符合汉字的书写方法。但刻于墓碑两翼伸出的狭窄部分,两翼似是为挤上汉字而加上的。从墓碑上阿拉伯文字和汉字所占位置主次看,以阿拉伯文字占主位。

其三,四十年来,在泉州发现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墓碑,常有只刻记死者逝世的月、日,而不刻记逝世年份的习惯。此碑不载死亡年份。又墓碑顶作尖拱形,是阿拉伯人、波斯人通用形式。因此,“潘总领”有可能是一位冠以汉姓的外国人。

其四,从阿拉伯语角度看“潘”、“蒲”同音,这里的“潘”可能是“蒲”的异译字。

总之,泉州有南宋绍兴六年“诏蒲啰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⑩的大食蕃国人任华官先例,有本碑的“潘总领”,又有据史载因击退“海贼”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⑪的

① 见《宋史》卷一百六十七,《职官志》七,百衲本。

② 见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收入在清张海鹏(若云)辑《墨海金壶》,子部,第一百四十九册,1921年,上海博古斋影印清刊本。

③ 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海外诸蕃》。

④ 见真德秀《真文忠先生文集》卷五十,明正统重刻本。

⑤ 见《宋史》卷一百三十八,《食货志》六,百衲本。

⑥ 乾隆《晋江县志》卷六,宦绩。

⑦ 见《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卷十五,万有文库本。

⑧ 乾隆《晋江县志》卷六,宦绩。

⑨ 乾隆《晋江县志》卷六,宦绩。

⑩ 见《宋会要辑稿》第一百九十七册,蕃夷四,7760页,1936年影印本。

⑪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拾遗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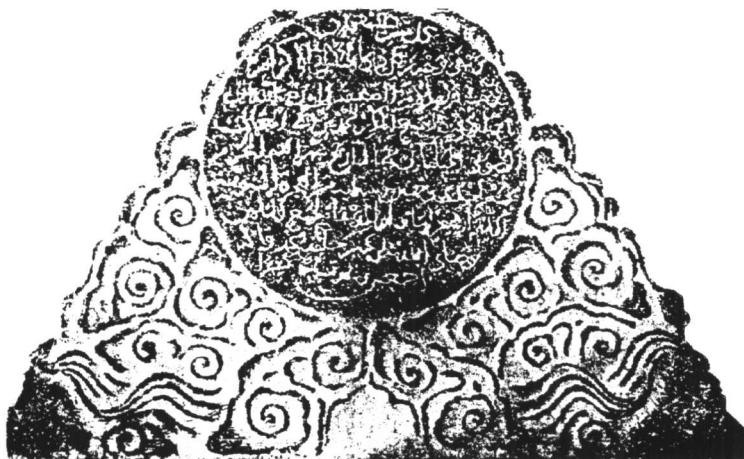
蒲寿庚在后。特别要指出的，是他们三人所处的时代，与泉州西门外九日山祈风摩崖石刻、泉州清净寺的建筑和泉州东门外葬蕃商墓地的建置^①，都是同处于一个时代的。

但我们也不排除“潘总领”是元代的人。查《元史·百官志》，没有“总领”官职，可是《元典章》记载路、府、州、县监狱里设有“总领”小吏之职名。所以“潘总领”也可能是元代泉州路，或晋江县监狱里的小吏。一位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在泉州任狱中小吏是十分正常的事。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94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94



A 94 拓片

^① 赵汝适《诸蕃志》卷上，大食国。

泉州宗教石刻

碑两边琢成连续弧形,尖顶已被毁坏。高 55.5 厘米,底宽 89 厘米,顶宽 2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整个碑面刻一“云月”图案。月的直径 39 厘米,月里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九行(见本书第 348 页),下有密云缭绕。底部中央又有一透雕小尖拱形的石龛。1940 年,在泉州涂门城教场头一带掘城基时所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姓名难以认读,卒于回历 751 年(至正十年,公元 1350 年)。碑文还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95 哈只·纳萨衣之女法蒂美墓碑



A 95



A 95 拓片

碑高 55 厘米、底宽 89 厘米、顶宽 25 厘米、厚 11.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两边琢成连续弧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 348 页),背面无雕刻。1927 年,在泉州东门城墙中发现。1955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墓主系“哈只·纳萨衣的女儿法蒂美”,但未刻记逝世年份。

A 96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96



A 96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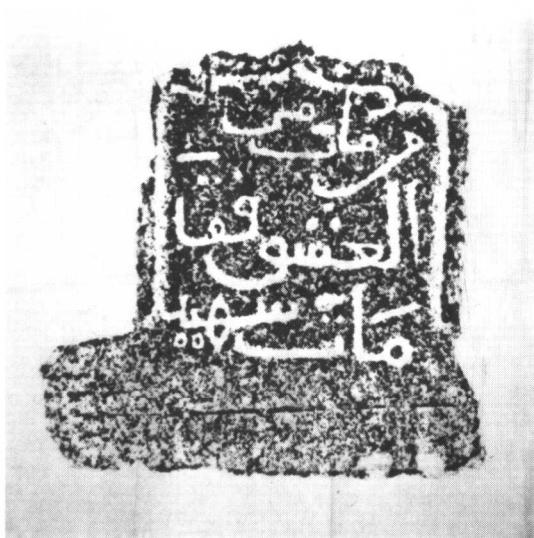
碑高 56.5 厘米、底残宽 55 厘米、厚 12.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两边雕成连续弧形。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见本书第 349 页),背面粗糙无雕刻。碑的右端和底部有残

缺,部分文字受损,且碑已断裂为左右二段。1956年12月,在泉州东门城附近第三巷内发现。同年12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碑文不记死者姓名、死亡年月,仅刻《古兰经》第一百十二章全文。

A 97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97



A 97 拓片

碑高37.8厘米、宽29厘米、底座残宽41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乃作尖拱形,下部左右伸出部分已断。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见本书第349页)。整个墓碑的镌刻布局,与“潘总领”碑类同。1956年春,发现于泉州东门农民家里。是年3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从墓碑的阿拉伯文译文看,这墓碑的主人是一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碑文未记墓主姓名和卒年。

A 98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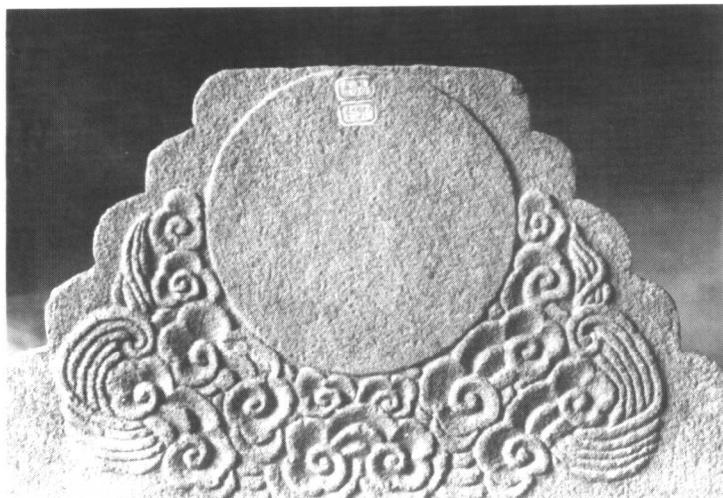


A 98 拓片

泉州宗教石刻

碑底长 78.5 厘米、高 42.5 厘米、厚 13.2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但顶已缺损。碑下部两端各浮雕一个内旋螺纹。碑面正中部分阴刻左右两条竖线，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五行（见本书第 349 页）。但阿拉伯文字大部分写错，只能勉强猜译其大意。1956 年 11 月，在泉州通淮门城址内掘获。同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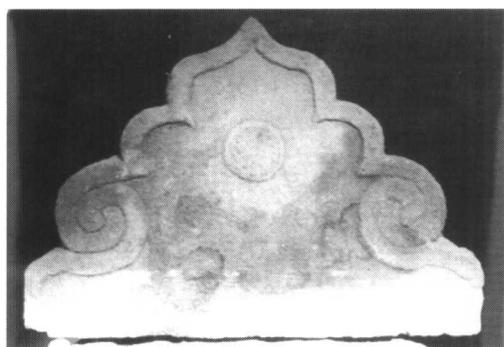
A 99 古伊斯兰教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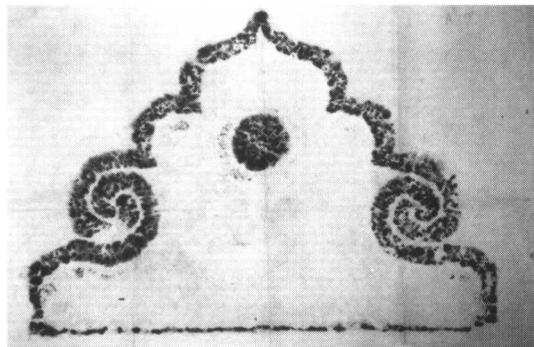
A 99

碑底宽 79 厘米、顶宽 28 厘米、高 42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可能是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墓顶的石墓碑。碑的左右两边，雕成连续弯弧形，平顶。整个碑面雕刻“云月”图案，月下有丛云缭绕。全碑雕工精细，但未刻文字。“云月”为伊斯兰教的徽号。1958 年 10 月，获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00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100



A 100 拓片

碑底长 61 厘米、高 42.8 厘米、厚 6.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作尖拱形状，上部狭小，下部逐次加宽。最下一层弧边，改雕内旋形图案，因此碑面显得紧凑而不松散。碑面上部正中尖拱之下，浮雕一个圆月，直径为 7.5 厘米。全碑无文字。此碑应是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顶上的墓碑石。类似这类型的墓碑，历年来在泉州已发现两方（其中一方保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1955 年 3 月，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发现。1955 年 8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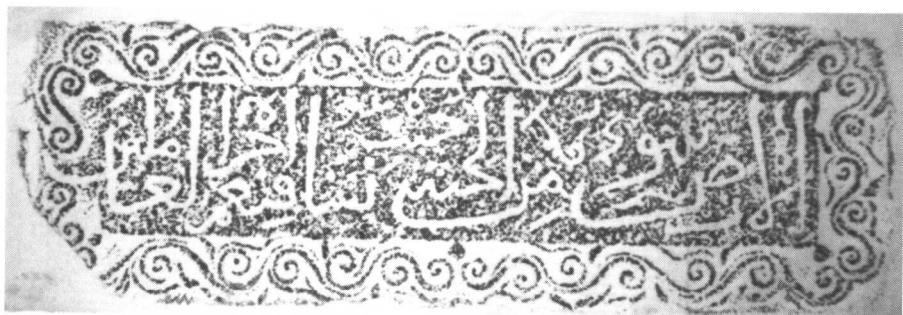
四、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01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这是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长 74 厘米，高 22.5 厘米，厚 11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垛石左、右两端间柱已毁坏。石面正中刻一长方形框，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49 页），周边绕以连续图案花纹。1957 年，在泉州小东门凤池与津头埔之间的田间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的内容系《古兰经》第三十九章第七十四节的节录。



A 1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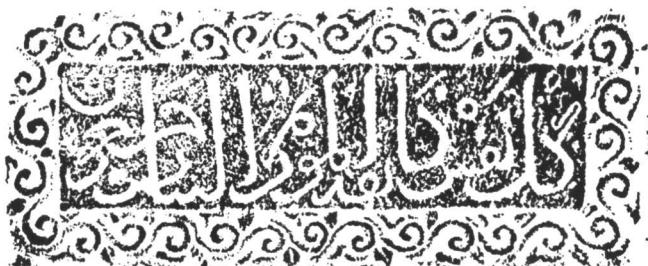
A 101 拓片

A 102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这是古阿拉伯人的一种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堵石,长73厘米,高24厘米,厚10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的四周雕刻一种连续传枝的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49页)。1939年,在泉州涂门城垣内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全文。



A 1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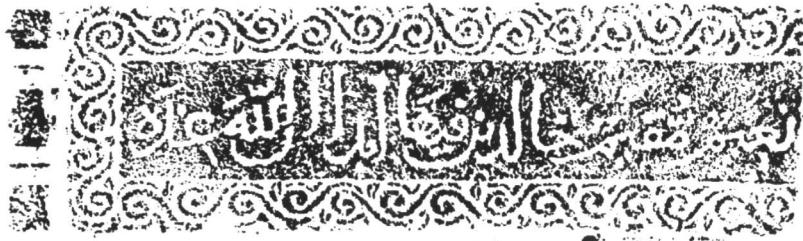
A 102 拓片

A 103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A 103

堵石的右端已断毁,左间柱完整。残长89厘米,高27厘米,厚10厘米。辉绿岩石琢成。除右边外,石面其余三个边各雕刻连续传枝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字一行(见本书第



A 103 拓片

349 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塔。1943 年,在泉州东门城基内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九章第二十一节的节录和二十二节全文。

A 104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塔石的右端已断毁。残长 71 厘米,高 22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除右端残缺外,其余各边雕有传枝图案花纹。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0 页)。1927 年,在泉州东门城垣中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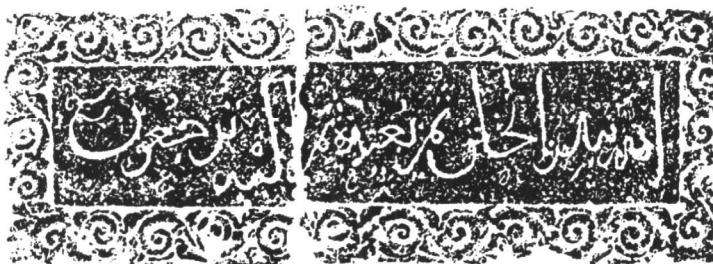


A 104 拓片

A 105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05



A 105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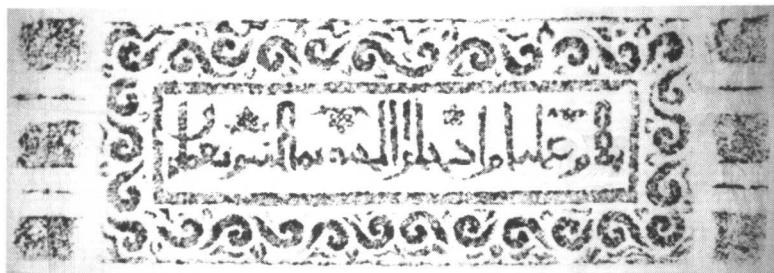
垛石残长 74 厘米、高 25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垛石已断裂为两段，左边间柱亦被毁。石面周边雕刻连续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0 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垛。1938 年，在泉州东门城垣中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全文。

A 106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06

垛石长 86.7 厘米、高 28.6 厘米、厚 1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四周雕有连续图案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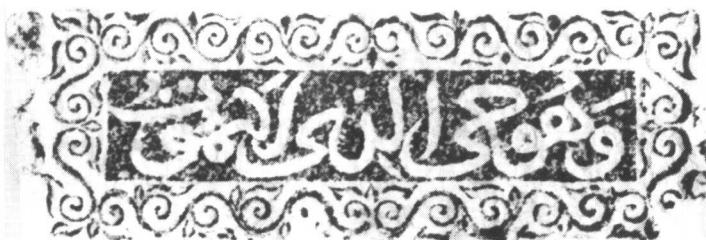
A 106 拓片

纹,中间浮雕库法(Kufa)^①体的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0页)。左右两旁间柱完整。双间柱的背后,还各延伸有一段十多厘米长的石刻,上浮刻古阿拉伯文字。由此判断,本石碑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侧面的石垛。1955年,在泉州东门外东头乡发现。据居民说,此石是二十多年前城墙拆卸时,移来作石阶用的。是年12月,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的节录。

A 107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07



A 107 拓片

垛石残长73厘米、高24.2厘米、厚13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垛石的左右两端间柱皆被

^① 公元7世纪中(回历17年),阿拉伯曾征服伊拉克,建立留索拉及库法(Kufa)两座城。库法城位置在伊拉克的底格里斯河西边,在北纬32度北。当时居住库法城的阿拉伯人、伊拉克人和也门人,创造出一种类似图案的阿拉伯文字,叫库法体阿拉伯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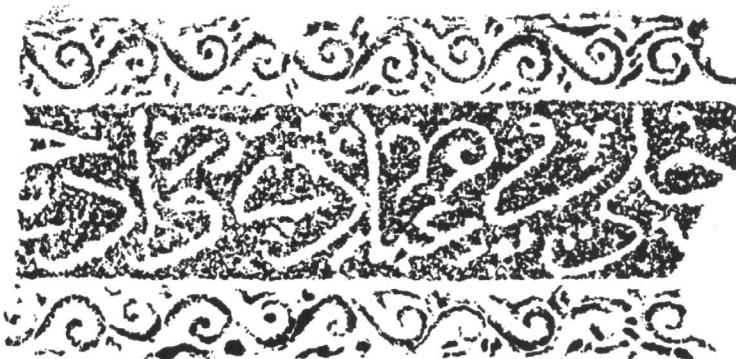
泉州宗教石刻

毁。石面的周边浮刻连续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0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塔。1956年12月，获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同年同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 108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A 108



A 108 拓片

塔石残长46.5厘米、高24厘米。塔石两端已残缺，上下边缘刻连续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0页）。辉绿岩石琢成。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塔。1948年，在泉州南门外3公里处的亭店乡发现。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八十九章第二十九、三十节全文。

A 109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塔石残长53厘米、高23厘米、厚13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右端已残缺，正中上部破损，余者三个边缘雕刻连续图案花纹。石面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0页）。此碑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塔。1927年，在泉州南门城附近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09



A 109 拓片

A 110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A 110



A 110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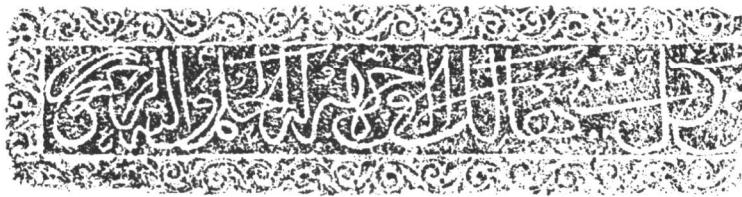
泉州宗教石刻

块石的左、右两端皆残断。残长 55.5 厘米，高 25.3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的上下边缘雕刻连续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0 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1943 年，在泉州东教场附近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11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A 111



A 111 拓片

块石长 92 厘米、高 24.6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块石的右端已残缺，其余三个石面边缘，均雕刻连续传枝图案花纹，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0 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1944 年，在泉州东门城基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的节录。

A 112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块石残长 56 厘米、高 23.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左右端皆残缺，上下边缘雕刻连续卷曲图案花纹。碑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1 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A 112



A 112 拓片

的石块。1955 年发现时，石刻被砌在泉州新门街某姓居民墙上。同年 8 月，林惠祥教授将其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全文。

A 113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A 113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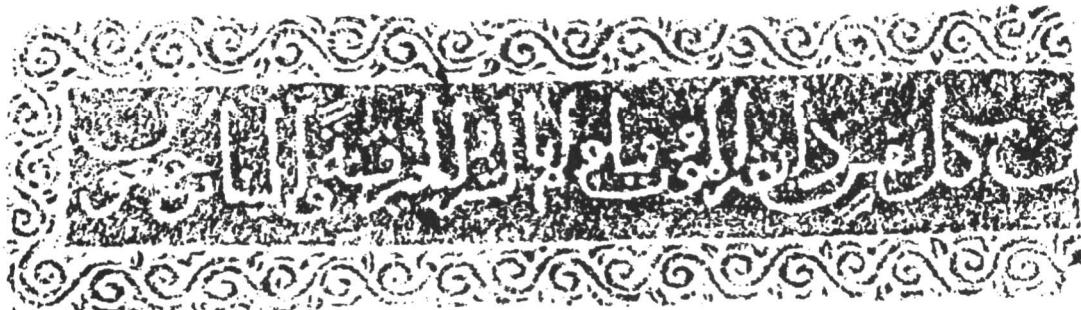
A 113 拓片

块石残长 62 厘米、高 24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左右间柱皆残破。石面周边雕刻连续卷曲图案花纹，中间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但有几个阿拉文字的字母损毁（见本书第 351 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1946 年，在泉州水仙门废石堆中发现，后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

A 114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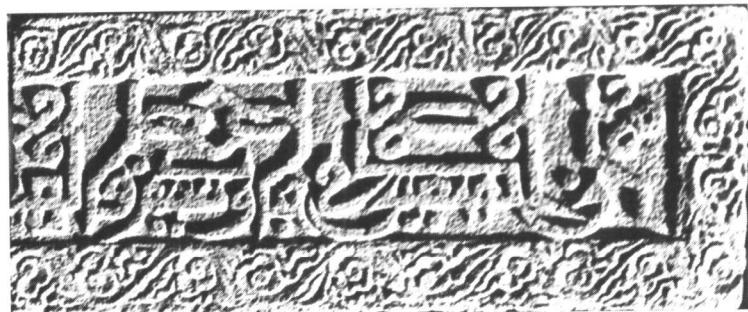
A 114



A 114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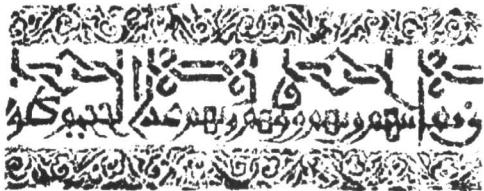
堵石残长 97 厘米、高 26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左边有一间柱，右端残缺。除右边残缺外，其余三边缘雕刻连续卷曲图案花纹。碑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1 页）。它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墓石。1944 年，在泉州东门城基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系《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A 115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A 115

块石作长方形,残长 66 厘米,高 29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块石的左端已断,其余三个边各浮雕云状连续花纹。石面中间浮雕库法体古阿拉伯图案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1 页),雕刻深浅分明,字体遒劲。这是块石右端的一段。1940 年,在泉州南教场废石堆中发现。1955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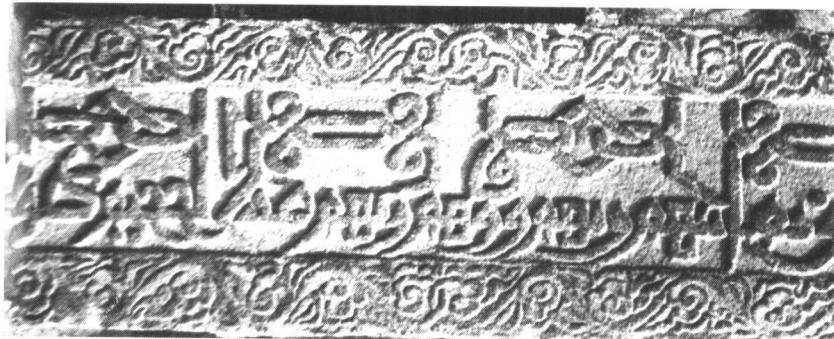
A 116 拓片



A 115 拓片

A 116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块石作长方形,残长 71.2 厘米,高 29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的上下边缘浮雕云状连续图案,中间浮刻库法体古阿拉伯图案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1 页)。1957 年 2 月,在泉州通淮门外距城 6 公里的一个池塘里发现,即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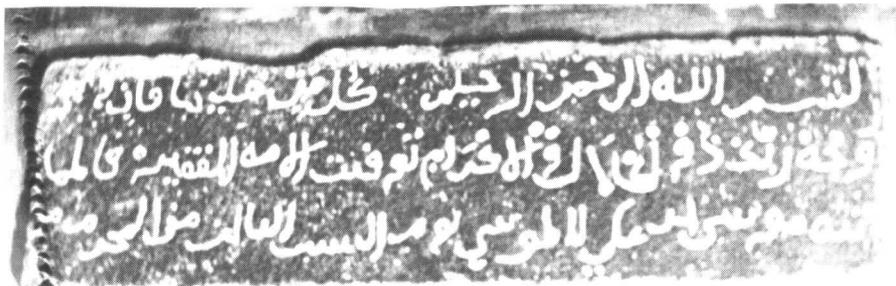
A 116

此件与上一件均为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且本碑是前一碑的左段,两石合之,恰为同一块石。砌合后的两石,尚不完整,还有一段,被砌于泉州南教场附近释迦寺的石墙上。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二章第十七、十八和十九节全文。

在释迦寺内井旁边的朝北平屋的西墙上,还砌有三方古伊斯兰教墓块石。一方是双间柱完整的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内浮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系《古兰经》经文,但石碑形制较小;另一方也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但左、右两端皆残断,内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亦是《古兰经》经文。第三方是须弥座式石墓的石块,阿拉伯文字被琢毁,已辨认不出字形。这三方石刻,都是抗战胜利后,寺僧购买通淮门城基石块筑屋,砌于墙上的。

A 117 穆萨之女法蒂美墓垛石

垛石长 100.5 厘米、高 30 厘米、厚 12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见本书第 351 页)。全石呈长方形。据马厚恩阿訇云,于清末蒲姓园圃中掘获,后移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以后被砌于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大厅西墙南侧的 2.40 米高处。1983 年夏,从墙上卸下。



A 117



A 117 拓片

墓主是穆萨之女法蒂美,未记卒年。但本垛石有另一种译文:

奉大仁大慈的真主的尊名启:

大地上的全部生物都要死亡,你伟大的恩慈的主永恒。

贫穷的女仆,那图斯人阿里的儿子、母撒的女儿法图迈于元月三日礼拜六逝世。^①

那图斯,即那布鲁斯(Nabrus),是地中海东岸的一个贸易港口,位于贝鲁特和耶路撒冷之间,西临地中海,东邻大马士革。墓主法图迈的身份是女仆,她大约随主人从地中海东岸的那布鲁斯来泉州,后卒葬泉州。这是泉州第一次发现那布鲁斯人的墓碑。

垛石作长方形,四周无任何纹饰,显得过于简易,异于其他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墓石,这可能与她的身份有关。据垛石造型判断,有可能是砌于石墓前的另外一个墓碑座上的。

^①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考古》,1986 年第 6 期,第 529~530 页。

A 118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长 81 厘米、高 26.5 厘米、厚 1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碑石的两端附有间柱，碑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三行（见本书第 351 页），雕工深劲，全碑雕刻十分细致。1948 年 7 月，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某姓农民家里。1973 年 8 月 29 日，由吴文良先生遗孀刘婉如捐献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118



A 118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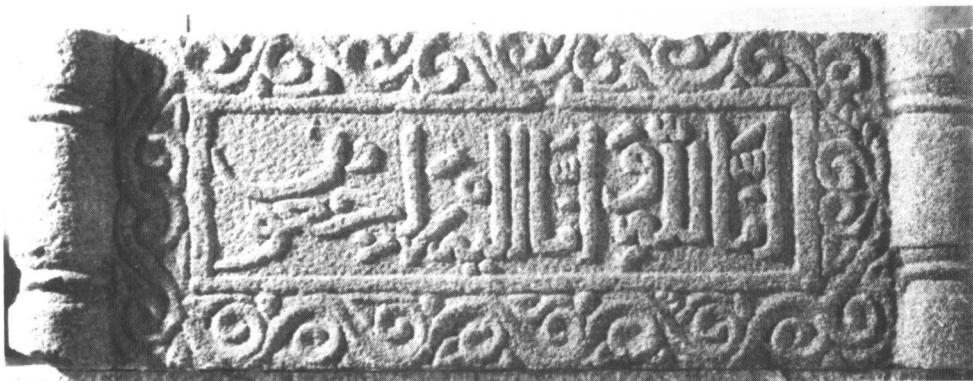
A 119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长 73 厘米、高 28.5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系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两端附有间柱，中间刻一长方形框，框面琢平，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见本书第 352 页），四周浮雕一种连续卷曲图案花纹，雕工精细。1946 年 11 月，发现于泉州东门城附近某姓农民家中。据云是从城墙中掘出来的，后被当作石阶使用。1957 年春，收回保存。1973 年 8 月 29 日，由吴文良先生遗孀刘婉如捐献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全文。



A 119

A 120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20

垛石完整,双间柱齐全。石长 69 厘米、高 24 厘米、厚 1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刻一凹入长方形框,框中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四周绕以连续图案花纹。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1978 年,泉州东鲁巷释迦寺被改建鞋厂,从寺内井旁的朝北平屋的西墙上卸下。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的节录。

A 121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两端的间柱已损毁。残长 56 厘米,高 20.6 厘米,厚 21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的正中浮雕一长方形框,磨平,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四周浮雕连续花纹图案。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原砌于泉州东街蔡巷某姓居民家石墙上,为 1942 年拆卸泉州东门城墙时所获。1955 年 12 月,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惠祥教授移至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的节录。



A 121



A 121 拓片

A 122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A 122



A 122 拓片

塔石两端的间柱残。残长 52.7 厘米,高 25.8 厘米,厚 8.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中间浮刻一长方形框,面磨光,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周边浮刻连传花纹图案。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塔之一。原砌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某姓农民家石墙上,为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较场附近城基掘获。1955 年 12 月,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惠祥教授移人类博物馆保存。

A 123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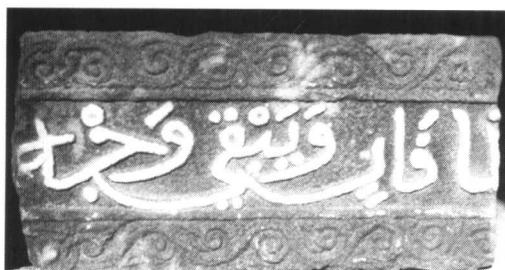
A 123



A 123 拓片

塔石的左右两端皆残断。残长 39 厘米,宽 23.7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上下沿均刻连续图案花纹。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塔之一。1960 年,在泉州东门崇福寺口乱石堆中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24 须弥座祭坛式墓塔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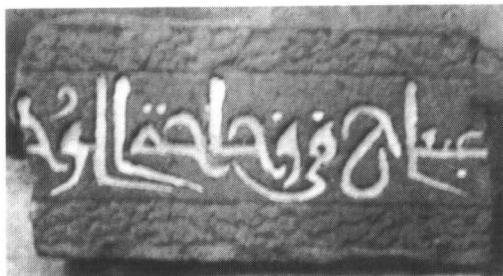
A 124



A 124 拓片

塔石的左右两端皆残断。残长 50.2 厘米,高 25.2 厘米,厚 1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中间刻一凹入长方形框,框中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上下边沿刻连续图案花纹。1952 年获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1955 年 8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125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25



A 125 拓片

垛石的左右两端皆残。残长 45 厘米,高 23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中间浮刻一长方形框,磨平,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字笔画粗大。石面的上、下边缘浮雕四季花花朵。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1959 年,获于南门城附近。据当地居民云,系 1946~1948 年拆卸南门城时所得。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的节录。

A 126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的左右和上部皆残缺。残长 52 厘米,高 1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2 页)。碑下缘的浮雕连续图案花纹尚存。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A 126



A 126 拓片

泉州宗教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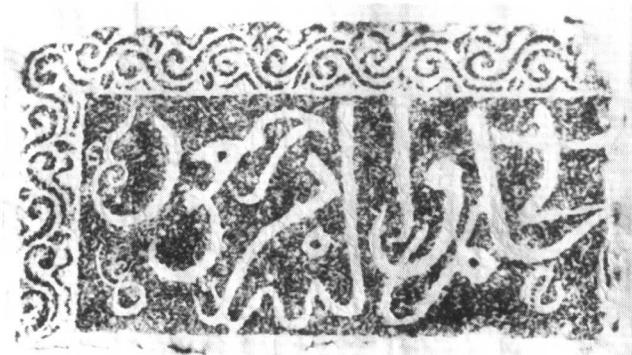
的主要石块之一。原砌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某姓农民家的石墙上。据云为掘地建屋时所获。1955年12月,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惠祥教授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127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块石的右端和下部均被损毁,两端的间柱也已毁。残长42厘米,高33厘米。青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3页)。石刻属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块之一。1953年秋,砌于泉州南较场边菜市场东面石墙上。据云为当年菜市场筑屋购买城基础石时一起搬运来的,遂砌于墙上。20世纪90年代,南菜市场重建,卸下,现保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的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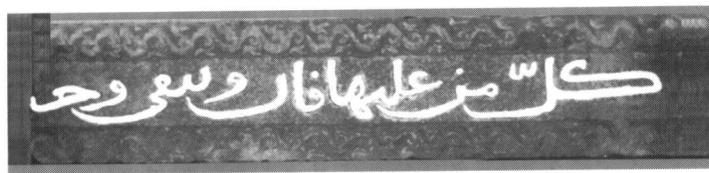
A 127



A 127 拓片

A 128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块石的两端均断毁。残长92.1厘米,高20厘米,厚13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面磨光,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3页)。碑的上、下边缘阳刻连续传枝图案。这也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块之一。1955年12月,在泉州小东门外东湖畔掘获,出土时该



A 128



A 128 拓片

碑是与一方印度教刻有兽面鸟翼的门楣石叠在一起的。是年,本石刻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129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的右间柱保留完整,左边大部碑面被毁。残长 27 厘米,高 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此乃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3 页),边沿浮刻连续图案花纹。1937 年,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检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图为垛石拓片。



A 129 垛石拓片

A 130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130 墓石拓片

垛石的左、右皆残。残长 29 厘米，高 24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正中长方形框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3 页）。这也属于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1957 年，捡获于泉州南较场附近的乱石堆中。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图为垛石拓片。

A 131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A 131

以下 8 件均系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雕花石垛，纹样为中国美术史上常见的四季花、牡丹花、茶花和荷花。这些雕花石垛，都是 1928 年以来与其他伊斯兰教墓碑石，一起从泉州东门、小东门、通淮门和南门城等城垣和城基础掘获的。因为考虑到都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垛，故置本类古阿拉伯文字石刻之后。

此石长 61 厘米、高 23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垛石左边附有间柱。石面浮雕一束以丝绸带捆系的荷花束(有荷花、花蕾和莲蓬),还有绿叶扶持。丝带下垂,打结处明显,亭亭如真。数十年前,在泉州东门城基乱石堆中发现。

A 132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A 132

垛石长 75 厘米、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边附有间柱。石面浮雕折枝牡丹花,插纸条处是透雕的地方。雕工精致,花枝料峭。1934 年,与其他须弥座祭坛式墓石一起出土于泉州东门城垣。

A 133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A 133

垛石高 24 厘米、长 81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右边附有间柱。石面浮雕牡丹花,花叶稍向内卷曲,枝叶繁茂,栩栩如生。1940 年,与其他古阿拉伯文字石刻,同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南较场头出土。

A 134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垛石长 81 厘米、高 24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边附有间柱,石面浮雕折枝牡丹花。1936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垣,与其他古阿拉伯文字墓石一起出土。



A 134

A 135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堵石

堵石长 84 厘米、高 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两端附有间柱，石面浮雕折枝牡丹花。1938 年，自泉州东门城垣中出土。



A 135

A 136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堵石

堵石长 97 厘米、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浮刻折枝牡丹花。1934 年，在通淮门城垣附近发现。



A 136

A 137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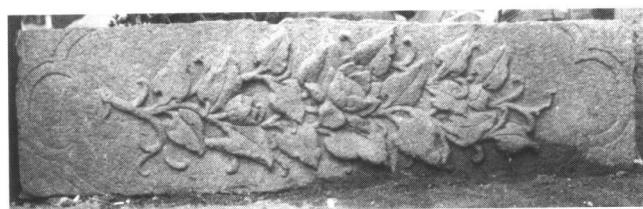
垛石残长 58.5 厘米、高 25.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浮雕折枝荔枝，右边雕成一个斜面，应是与另一石垛的接合处。1946 年，获于泉州东北角城垣。



A 137

A 138 须弥座祭坛式墓雕花垛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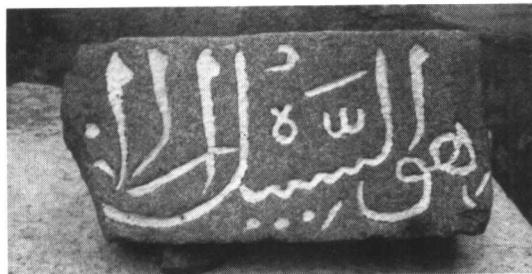
垛石长 92 厘米、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浮雕折枝茶花，雕工精细。1931 年，在泉州小东门城垣中掘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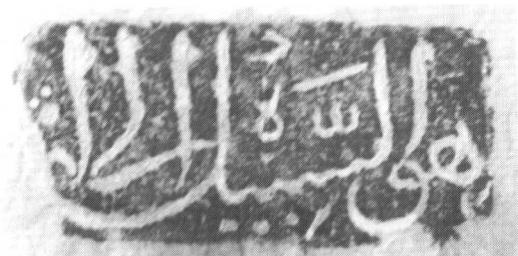
A 138

五、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 139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 139



A 139 拓片

泉州宗教石刻

墓石的左右两端皆残断。残长 32.5, 高 15.7, 厚 12.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面经磨光, 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3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52 年, 获于泉州南门厂口。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40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右端已残断。残长 59.1 厘米, 高 21 厘米, 厚 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3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55 年, 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发现。是年 12 月, 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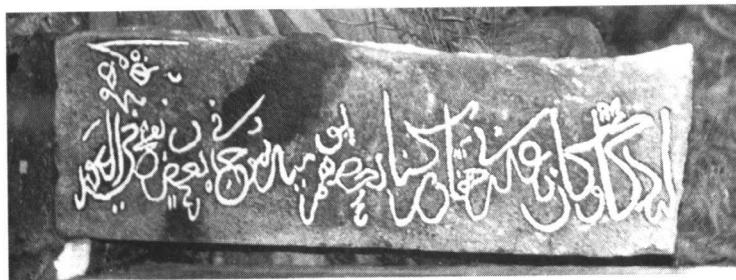


A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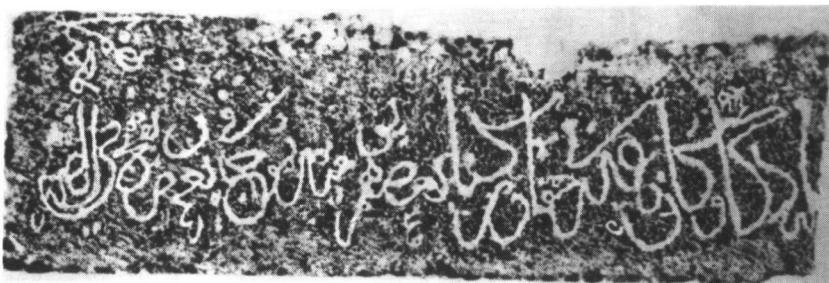


A 140 拓片

A 141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 141



A 141 拓片

墓石长 60.8 厘米、高 20.1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琢平，阴刻文字两行，文字雕刻浅而细密。构件是用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一方墓石改琢而成的。从文字看，不是阿拉伯文字，但其中有许多阿拉伯字母，按阿拉伯文读之，读不通。因此，疑为亦思替非文字。六十多年来，在泉州发现类似此体文字的碑石，已有数方。

亦思替非(Istakhr)为古波斯都城，所谓亦思替非文字，为古波斯文字。《元史·选举志》载：

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于施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夫与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肄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祐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

又《黄金华文集》卷八载：

先是蒙古新字及亦思替非，并教于本院，今回回学士亦省，而亦思替非以侍制兼掌之。

可见，至元二十六年因与西域诸国交通频繁，始置回回国子学，教习亦思替非文字。待元文宗天历以后，西北三藩失其统治力，西域交通濒绝，亦思替非文字使用不多，故“亦思替非以侍制兼掌之”。但泉州出土的亦思替非文字，非陆路所来，例如有一方墓碑，死者叫法蒂美，她卒于回历 729 年(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 1329 年，见本书第 82 页，A61)。那方墓碑是刻写阿拉伯文字的，但在最后二行，则刻写(疑为)亦思替非的文字。很清楚地泉州的亦思替非文字，是波斯商人从海上带来的。

1947 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发现。1955 年 9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 142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的左端残断。残长 48 厘米，高 20 厘米，厚 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下框沿被琢毁。碑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墓石。1957 年冬，在泉州南门德济门外某居民家发现，作为门框石使用。据云，为 1946 年建屋时购置南门城石，从南门城墙边搬来，后来砌于墙上。



A 1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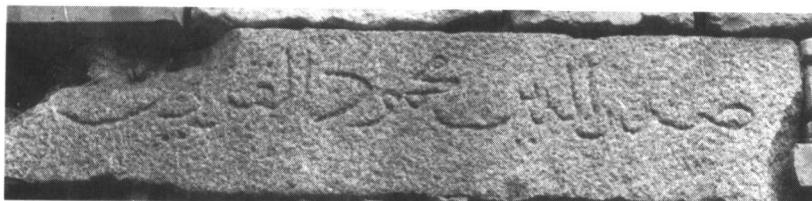


A 142 拓片

A 143 格兹威尼人萨德尔丁·艾哈迈德墓石构件

墓石的左边已残断。残长 58 厘米,高 13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3 页)。这方石刻属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43 年秋,在泉州小东门处城基出土,以后被砌于石墙上。

本墓碑的主人,名叫萨德尔丁·艾哈迈(茂)德·格兹威尼。里海,阿拉伯语叫格兹威尼。在里海西南岸波斯境内有一城市叫格兹威尼。可见,在宋、元时代,有西亚商人通过波斯由海道来到泉州。



A 143



A 143 拓片

A 144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左右两端皆残断。残长 66.8 厘米,高 13.3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中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3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55 年 9 月,获于泉州东门城附近。是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的节录。



A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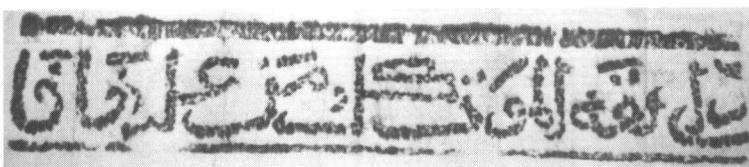
A 144 拓片

A 145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两端均残缺。残长 69 厘米, 高 12 厘米, 厚 7.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 雕工精美。本碑亦属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清末在蒲姓园圃中掘获, 后移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 以后砌于明善堂大厅北墙上, 距地面高 2.40 米。1983 年夏, 从墙上卸下。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和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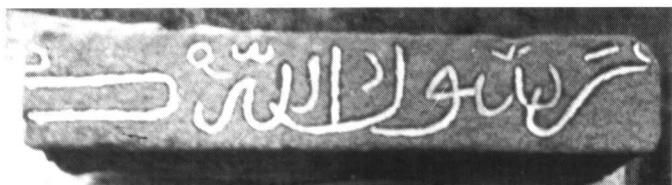
A 145



A 145 拓片

A 146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的左端残断。残长 50.3 厘米, 高 9.4 厘米, 厚 2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这石亦属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57 年, 获于泉州小东门凤池宫附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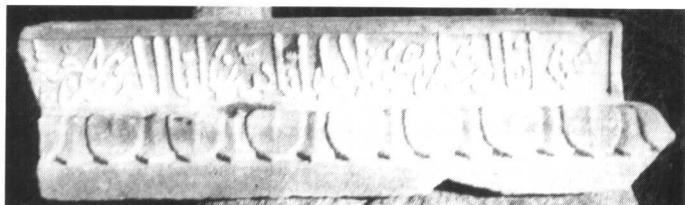
A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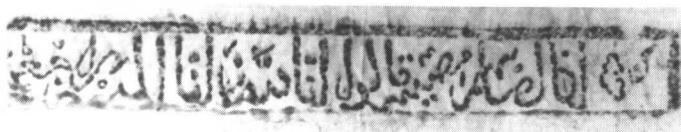
A 146 拓片

A 147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的左端已断毁。残长 77.8 厘米, 高 10.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这方石刻是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三层(刻重叠覆莲瓣)和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 见本书第 354 页)的墓石。1955 年 12 月, 自泉州东门外仁风街掘获, 同年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是《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



A 147



A 147 拓片

A 148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左端已残断。长 107 厘米, 高 1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此仍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32 年, 在泉州东门城垣掘获, 现砌于墙基。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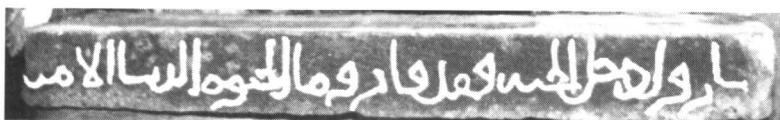
A 148



A 148 拓片

A 149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的左边已残断。残长 85.2 厘米, 高 9.5 厘米, 厚 1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55 年 12 月, 在泉州东门城基掘获。是年, 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



A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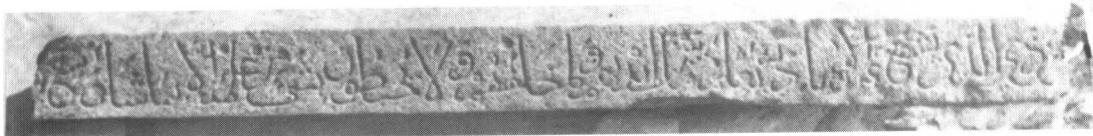
A 149 拓片

A 150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的左端已残断。残长 117 厘米, 高 9.7 厘米, 厚 18 厘米, 辉绿岩石琢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48 年, 在泉州通淮门附

泉州宗教石刻

近城基出土，现存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A 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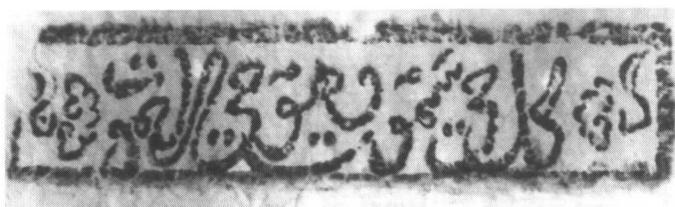


A 150 拓片

A 151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 151



A 151 拓片

墓石残长 42.8 厘米、高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4 页)。这方石刻的文字雕刻与下面的重叠莲瓣浮雕，是一块石头琢成的，属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55 年 8 月，获于泉州东门外乐园。同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 152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的左右两端均已断毁，残长 87 厘米，高 20.7 厘米，厚 1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5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39 年夏，获于泉州南较场。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四十三章第七十一节节录。



A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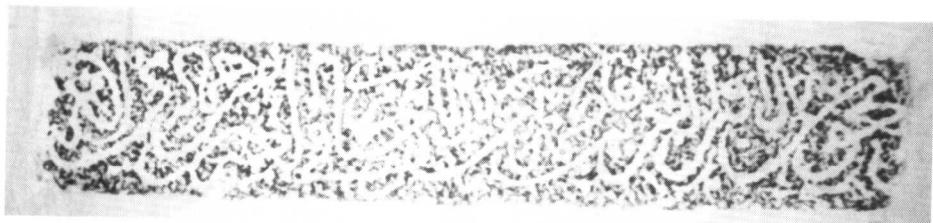


A 152 拓片

A 153 哈米德丁之女法蒂美墓石构件



A 153



A 153 拓片

泉州宗教石刻

墓石长 65.8 厘米、高 12.5 厘米、厚 1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5 页)。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清末在泉州夏姓园圃中掘获,后收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以后砌于清净寺明善堂大厅南墙正中 2.40 米高处。1983 年夏,从墙上卸下。死者是位妇女,名叫法蒂美。

本墓碑文另有一种译文如下:

……你们将复归于主。

这是异乡人哈铎惹人哈米德女儿法图默的墓,在××六月二十日^①。

哈铎惹(Hadula),即阿达那,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产山羊毛。今为土耳其东南部大都市阿达纳。地近地中海,塞浦路斯岛在其西南方向。这是泉州第一次发现阿达纳人的墓碑。墓主法图默可能航海来泉州,后卒葬泉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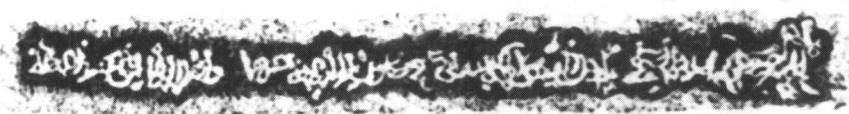
A 154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图中上下两方墓石。上方的一件,两端已残断。残长 85 厘米,高 13.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5 页)。这是一方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1931 年,在泉州东门城垣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和《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图中下方墓石长 78 厘米、高 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阴刻文字一行,因石面粗糙,字迹细小,不易辨认。此有可能是古阿拉伯文字,也有可能是亦思替非文字。这方石刻也应是须弥



A 154. 1



A 154. 2 下方墓石拓片

①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 年第 6 期,第 530 页,科学出版社。

座式石墓的构件。1943年,获于泉州通淮门靠南较场城墙基础。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55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已残。残长38.2厘米,高14厘米,厚12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55页),字画粗大。这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清末在泉州夏姓园圃中掘获,后移通淮街清净寺保存,以后又移砌于清净寺明善堂大厅西墙北侧2.40米的高处。1983年夏,从墙上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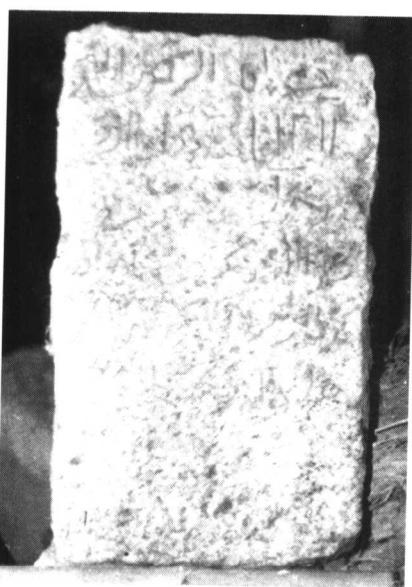
A 155



A 155 拓片

A 156 古伊斯兰教墓碑

墓石已残。残长43.5厘米,宽24.4厘米,厚10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石面光滑,阴刻六行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355页)。由于长期铺在地面,碑面磨损,字迹多模糊不清。在1955年8月,厦门大学历史系林惠祥教授来泉州采获。现保存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碑文内



A 156



A 156 拓片

容是《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

六、泉州明代抱鼓石和云月形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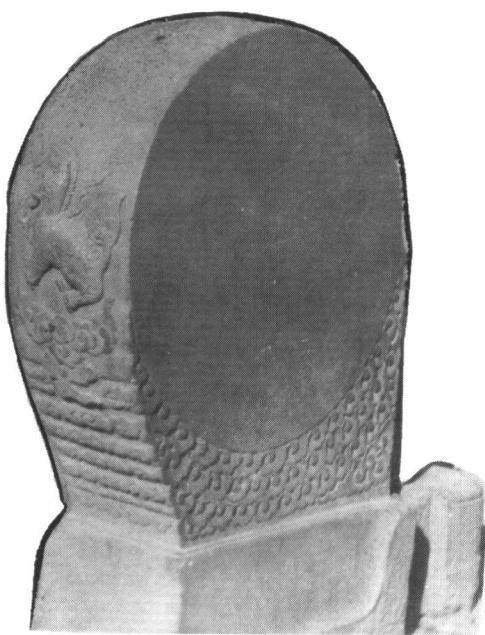
A 157 泉州明代抱鼓石

泉州明代祠宇大门外最常见的抱鼓石中有两种，它们的形制及雕刻方法很可能是由伊斯兰教最重视的“云月”演变而来的。遍观泉州城内外，所有寺庙、祠宇外的抱鼓石不下数百对，除东街文庙里的一对作真正的“鼓形”以外，其余的多类似此两种。我们虽不敢说它一定是受伊斯兰教“云月”的影响，但至少在雕刻艺术方面与之有关。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的陈埭回族丁氏祖墓，其明代石墓前也雕刻两个大“云月”抱鼓石。江苏扬州东门外运河边的先贤普哈丁墓的入口大门处，也雕刻两个“云月”大抱鼓石。

此石高90厘米、宽80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上部为一鼓形，作螺旋状。鼓下前端浮雕一鹿，口中衔灵芝草。鼓下两侧有浮雕的卷云。其下有座，刻重叠的莲瓣。这与常见的古代伊斯兰教石墓雕刻类似。



A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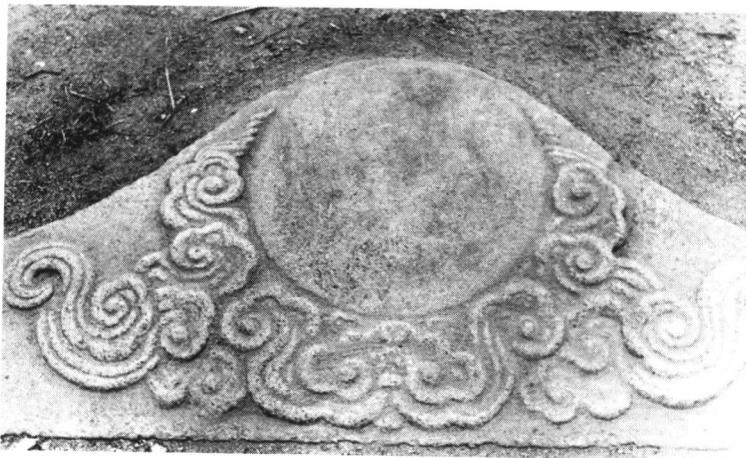
A 158

A 158 泉州明代抱鼓石

石高100厘米、宽60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上部仍为鼓形，其前端浮雕一麒麟，下面浮雕密云。疑其雕刻与伊斯兰教的“云月”有关。

A 159 泉州明代云月形墓碑

泉州常见一种明代“云月”形墓碑石，砌于墓的正面，形制都较大，多不雕刻文字。墓碑顶都作圆弧形，向两侧逐渐斜下。如果墓碑的两侧改琢成连续弧形，那么就与元代外国伊斯兰教徒的须弥座祭坛式墓碑石没有两样了。



A 159

数十年来，在泉州的北门外、东门外、通淮门外和临漳门外（俗称新门外），均发现此类墓碑石。此外，在距离泉州 76 公里的同安县东门外和距离泉州 88 公里的莆田县北门，均发现此种“云月”形明代墓碑石。泉州、莆田、同安等地，在元代都是外国伊斯兰教商人活动的地方。这种圆顶“云月”形墓和墓碑石，可能是元代外国伊斯兰教徒须弥座祭坛式石墓和墓碑的一种变体。亦即受印度和伊斯兰雕刻艺术影响的产物。

泉州遭元末亦思巴奚战乱的洗劫，又遭元末明初泉州人排外运动的打击。入明之后，外国来客多避开泉州港。如永乐六年，渤泥国王惹加那加来朝，即从福州登岸，后卒葬南京^①。又如永乐十八年，古麻刺朗国哇来顷本国王来朝^②。十九年辞行，卒葬福州西门外茶园山，赐谥号康靖王，其墓至今犹存，墓前有石翁仲数尊。原先“市舶司置于泉州，后入贡船多抵河口。又成化八年，巡抚副都御史张瑄奏请迁设于福州”^③，加上明代的所谓朝贡贸易政策和严禁通番政策，泉州港日趋没落了。虽然如此，但伊斯兰教在泉州，并没有因波斯人、阿拉伯人的离去而消亡，它的文化影响还相当深远。现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两方修寺汉字碑刻，记载了明代伊斯兰教在泉州的活动情况。此外，我们又摘抄几段明代李贽（李卓吾）家族谱牒、墓志，附在后面（见本书第 270 页）。这些记载，是研究明代泉州伊斯兰教史的重要资料。

① 见《闽书》卷一百三十六，岛夷。

② 《皇明四夷考》卷下，古麻刺载：“古麻刺，在东南海中。永乐时，王哇来顷本率其臣来朝，至福州卒，赐谥康靖，敕葬闽县，有司岁时祭”。

③ 见《八闽通志》卷四十，公署。

泉州宗教石刻

此碑宽 152 厘米、高 70.5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顶作圆弧形，碑中浮刻一个大圆月，两旁及下方有密云缭绕。数十年前，泉州城东北郊后茂村农民从明墓上拆卸下来，后铺在晒谷埕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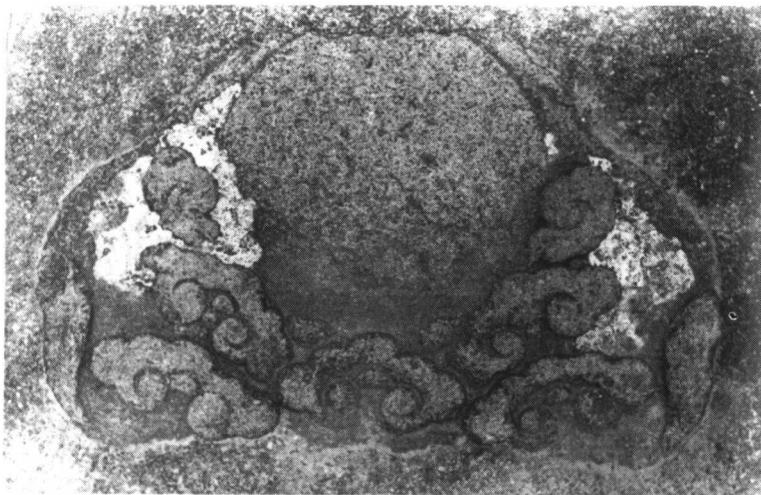
A 160 泉州明代云月形墓碑

碑宽 126 厘米、高 61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顶作圆弧形。碑中的大“云月”图案几乎占满整个碑面。数十年前，泉州东门外乐园附近村民从明墓上卸下，后作为墙基础护石。



A 160 .

A 161 泉州明代云月形墓碑



A 161

碑宽 85 厘米、高 53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顶作圆弧形，左右两端皆被琢毁。现仍涂灰于碑上。数十年前，泉州东北郊后茂村农民从明墓卸下，后铺在晒谷埕上。

A 162 泉州明代云月形汉式墓葬



A 162

本墓为典型的泉州明代云月形汉式墓葬。20世纪90年代末，在泉州市鲤城区江南镇紫帽山北麓苏夫人姑庙附近出土。该墓正面底层为白花岗石雕刻的如意状三足图案，上为须弥座祭坛式束腰石构（仅有一面），束腰处由三间柱挡垛石组成。三间柱石上各刻宋代的“方胜合罗”^①图案，中间挡垛石则在图案中浮雕一朵莲花。须弥座祭坛上竖立一方云月形墓碑。这种明代云月形汉式石墓，受到印度雕刻艺术的影响，其艺术发源于印度犍驮罗之建筑艺术，它是由公元4~5世纪混有希腊、罗马、安息、波斯、印度文化因素的犍驮罗风格的油撒浮择伊式的塔婆（浮屠）发展而来的。本书的 A 159、160、161 等“云月”形墓碑，皆为此类混合多国建筑雕刻艺术的汉式墓葬。它表明在明代，泉州的建筑雕刻艺术受罗马、希腊、安息、波斯和印度的艺术影响很深。

七、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 16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长 82 厘米、高 19.5 厘米、底宽 26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正面雕作尖拱形状。正面和两侧，各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55 页）。

1955 年 9 月，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区掘获，是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墓顶石三面内容是《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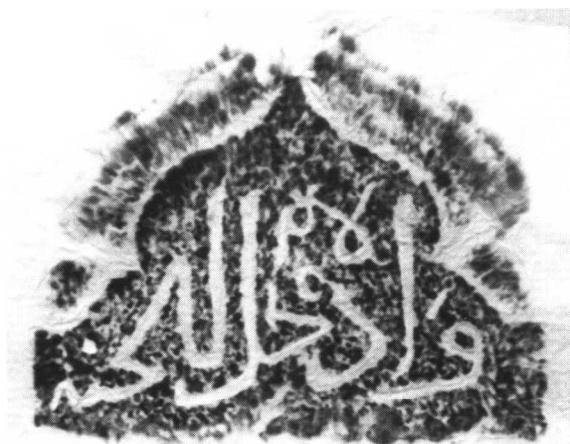
^① 李诫《营造法式》，法式三十三，彩画制作图样上，五彩杂华第一，方胜合罗，1929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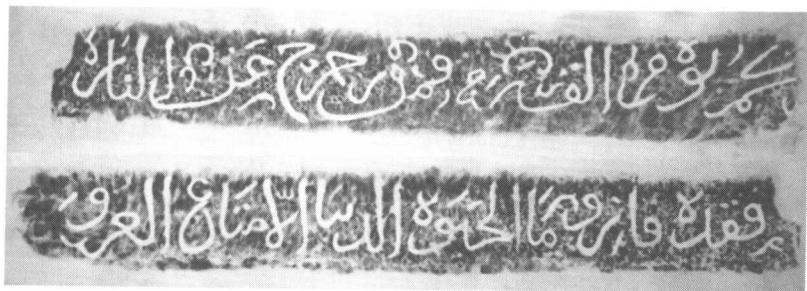
A 163.1 墓顶石正面与右侧面



A 163.2 墓顶石正面与左侧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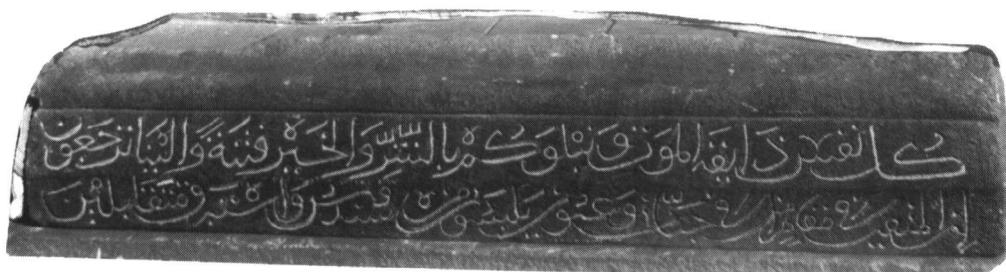
A 163.3 墓顶石正面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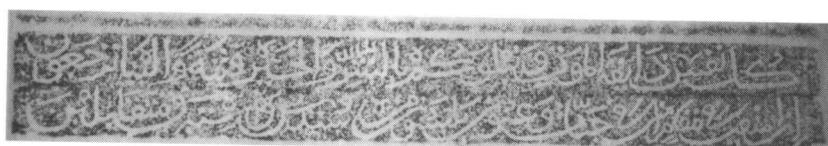
A 163.4 墓顶石左、右侧面拓片

A 164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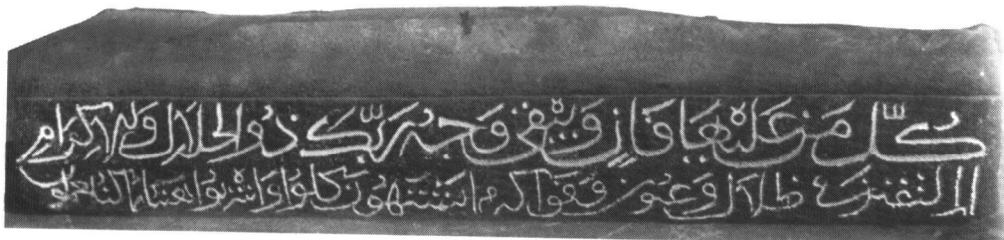
墓顶石长 138 厘米、高 26 厘米、底宽 27.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左右两端所雕的“云月”被琢毁，两侧各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二行（见本书第 356 页），每行字高 9 厘米。在发现的墓顶石中，刻有两行阿拉伯文字的还很少见。由此推测，这一座须弥座式石墓可能较大。1949 年，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1955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墓石一侧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和第四十四章第五十一、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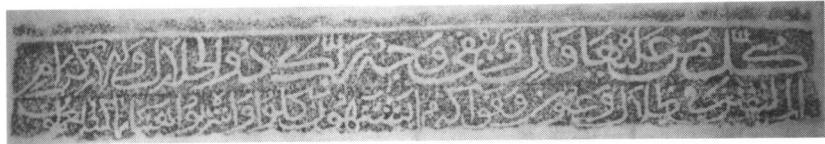
A 164.1 墓顶石侧面之一



A 164.1 拓片



A 164.2 墓顶石侧面之二



A 164.2 拓片

五十三节全文。另一侧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和第七十七章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节全文。

A 165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石长 157 厘米、高 26 厘米、底宽 2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正面雕成尖拱状，正中浮雕“云月”。1957 年 11 月。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获得。



A 165.1 墓顶石正面



A 165.2 墓顶石后面

A 166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 166

墓顶石长 115 厘米、高 24 厘米、宽 27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最上二层，顶作弯弧形，圆弧下浮刻“云月”。1945 年，泉州东门仁风街掘获。

A 167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长 92 厘米、高 24 厘米、底宽 2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正面雕作尖拱形状，中浮刻“云月”，云作交曲状。1960 年 12 月，在泉州小东门外东湖边发现。据乡民云，是二十多年以前，从小东门附近城垣中卸下的。



A 167



A 168



A 169

A 168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长 147 厘米、高 23 厘米，宽 24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正面雕作尖拱形，其中浮刻“云月”。1956 年 10 月，在泉州东门城垣基础内获得。

A 169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长 148 厘米、高 26 厘米，宽 24.4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正面作尖拱形状，尖拱下浮雕一轮明月，月下有云朵围绕。1947 年，在泉州东门打石店发现。

A 170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残长 97.6 厘米、高 23 厘米。它是由一座须弥座式的石墓上拆下来的。墓顶石一面刻图案花纹，一面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 356 页）。石的两边略有缺损。1943 年，在

泉州东门城基内掘获。



A 1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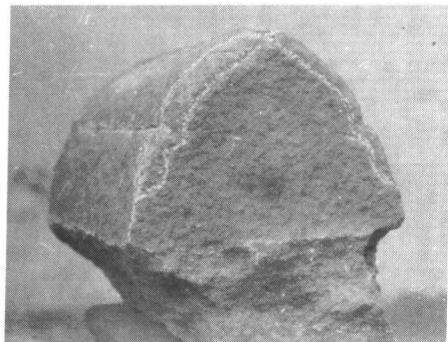
A 170 拓片

A 171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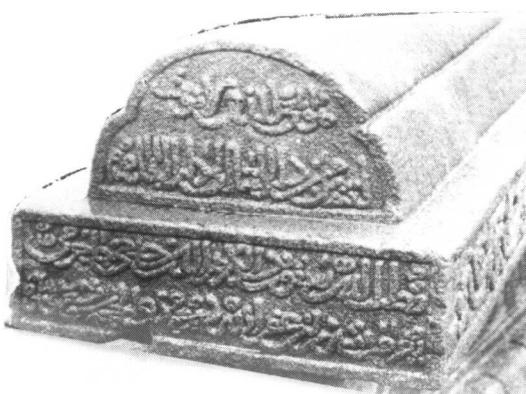
墓顶石残长 49 厘米、残高 17 厘米、底宽 19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石已残断，此段可能是后半段，雕作尖拱形状。从规格小这个角度看，可能是儿童墓的墓顶石。1953 年，获于泉州南较场附近。

A 172 贾尔杰尔姆人古图布丁·雅各布墓墓顶石

这是一方古时在泉州的波斯人的墓顶石。它是须弥座式石墓最上面两层的墓石。长 140.5 厘米，高 26.5 厘米，底宽 33.5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正面雕作圆拱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四行（见本书第 356 页），记载死者的姓名和逝世年月。石的左右及后面，都雕刻图案花纹。1927 年，在泉州东门外东禅寺附近发现。1958 年收回保存。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墓主是波斯北部贾尔杰尔姆城人古图布丁·雅各布，他卒于回历 709 年（至大二年，公元 1309 年）。



A 171



A 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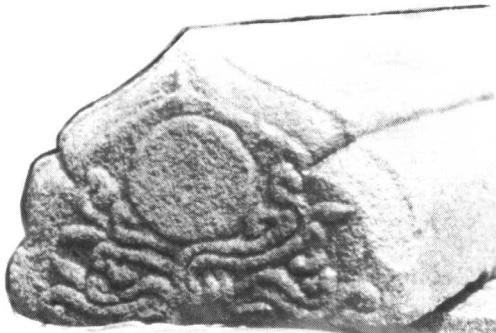
A 173

A 17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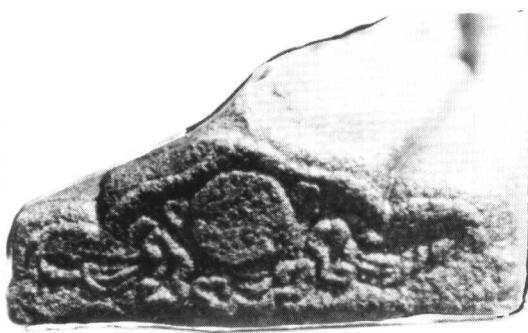
石残长 71 厘米、高 24 厘米、底宽 2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正面雕作尖拱形，尖拱下刻有“云月”。是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1942 年，在泉州东门城墙上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74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残长 92 厘米、高 23 厘米、底宽 26 厘米。辉绿岩雕成。正面雕作尖拱形，尖拱下浮雕“云月”，“云月”下浮刻交曲花草图案。1942 年，泉州东门城垣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174



A 175

A 175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残长 74 厘米、高 12 厘米、底宽 30 厘米。辉绿岩雕成。墓石的整体较低矮，在前端尖拱下，浮雕有“云月”，旁有浮云围绕。1947 年，在泉州东门城基内掘得。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八、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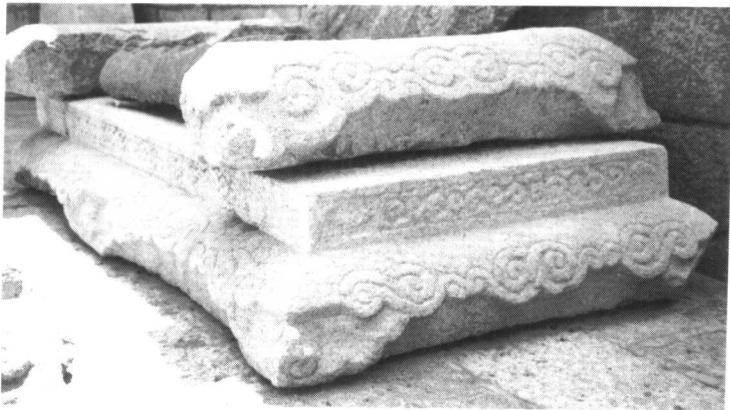
A 176 须弥座式石墓



A 176

这座五层须弥座式石墓，为一块白花岗岩石雕成，墓中凿空，第二、四层均浮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雕刻覆莲瓣，底层浮刻如意状六足，是一座融合中国、印度、希腊、波斯、安息雕刻艺术的作品（参见 A 274，本书第 217 页）。墓顶石已遗失。现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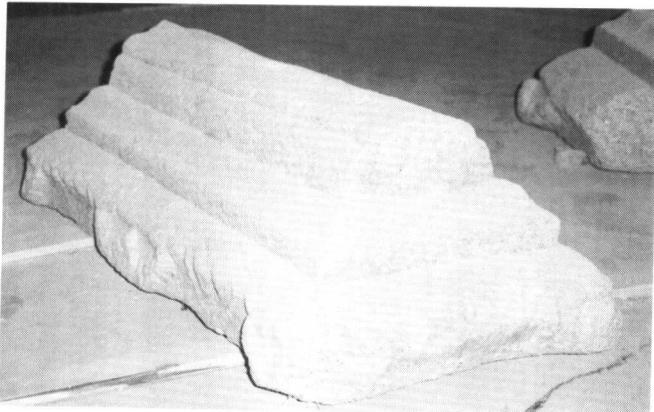
A 177 须弥座式石墓



A 177

这座须弥座式石墓仅存下部二层，其特点是墓的形制特别大，长 223 厘米，宽 103 厘米。底层浮刻如意状六足，其上层浮雕连续传枝图案。如此大型的须弥座式石墓，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还有四、五座。现保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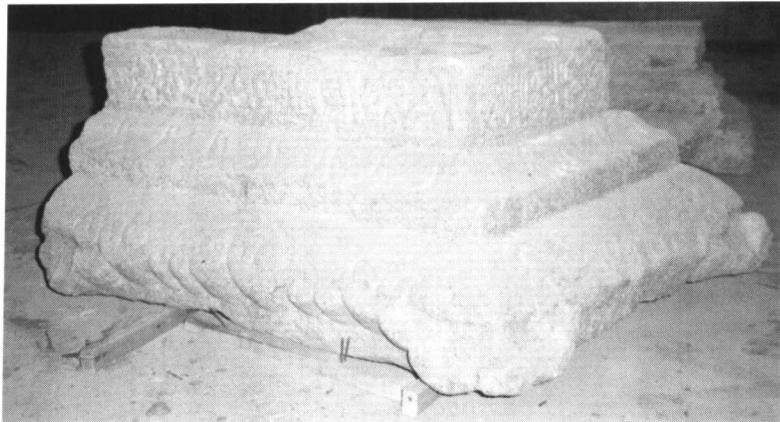
A 178 须弥座式石墓



A 178

这座须弥座式石墓由一整块白花岗岩石雕成，实心。形制较小，可能是少年儿童的石墓。长 116 厘米，底宽 52 厘米，高 39 厘米。石墓分三层，底层雕刻如意状六足；第二层斜面素平；上层墓顶石正面雕成尖拱形，尖拱中浮刻一朵野菊花。现存泉州市博物馆。

A 179 须弥座式石墓



A 179

这是一座残断的四层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墓顶石已遗失。第三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第二层浮刻覆莲瓣，底层浮雕如意状六足。可惜残断近半。石墓由白花岗岩石雕成，空心。现存泉州市博物馆。



A 180

A 180 暂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内的须弥座式石墓

1958年秋、冬，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为保护一批城区出土的宋、元、明等朝代的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暂时寄放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内。图中白花岗石雕成的绕有连续花枝浮雕的圆柱为大型柱础石，系现存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的建筑遗物。

A 181 暂存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内的须弥座式石墓

A 181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内存放的众多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A 182 须弥座式石墓

石墓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附近，是古阿拉伯人墓葬。石墓共分五层，是一种受佛教艺术影响的须弥座式雕刻。五层，底层最长最大，向上各层依次渐狭渐小。自下而上，第一层刻六个如意状圭脚；第二层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装饰图案；第四层刻有阿拉伯文字；最上层是墓顶石。墓顶石一般浮雕伊斯兰教的徽号“云月”于正面，在左右两侧则雕刻阿拉伯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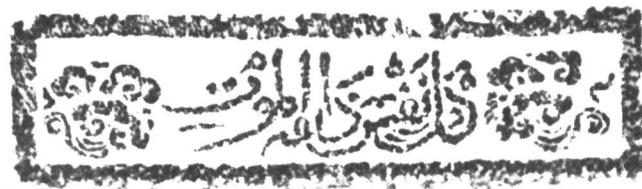


A 182



A 1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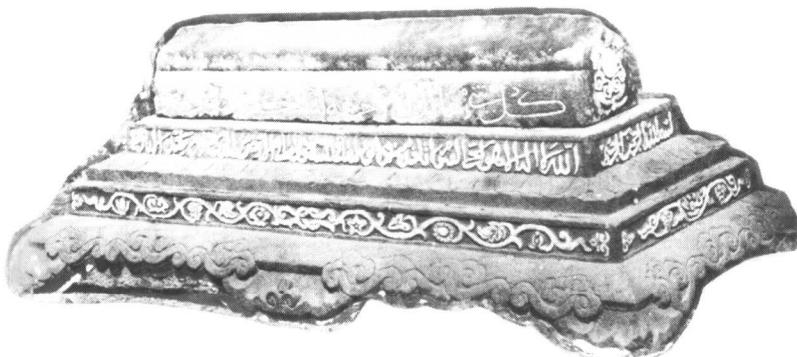
A 183 须弥座式石墓



A 183 拓片

泉州涂门外津头埔乡所见的古阿拉伯人的石墓，除墓顶石外，全由一整块花岗岩大石雕成，其中凿空。第四层的四周，环刻有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 357 页）。碑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A 184 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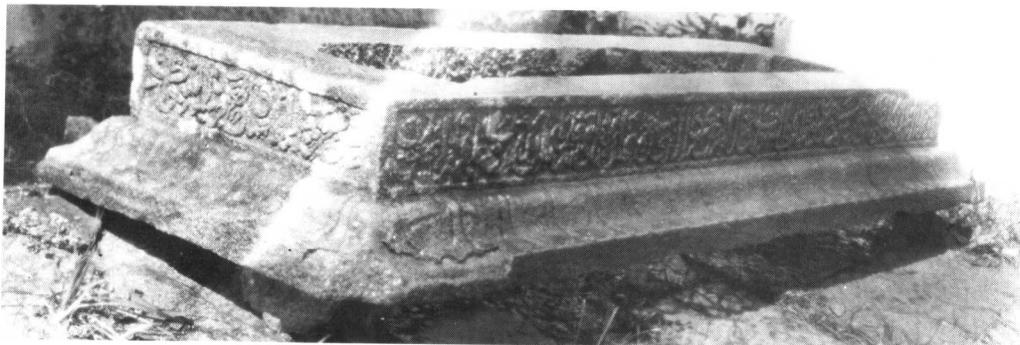
A 184. 1

这是一座在泉州东门外夏厝山发现古阿拉伯人的石墓。在明、清两代，便有许多阿拉伯人的石墓被移作石碑座的代用品了。很多明、清碑座的四周，还存有阿拉伯文字。此座辉绿岩雕成的石墓，于1955年12月移送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墓顶石已移去，可以看出中央是凿空的。石墓上一侧刻古阿拉伯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和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见本书第357页）。石墓上另一侧刻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和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A 184. 2

A 185 须弥座式石墓



A 185

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三、四层墓石。由一块辉绿岩石琢成。第三层浮雕重叠覆莲瓣，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357页）。原第一、二层和第五层墓顶石已散失。墓石中心凿空。1958年秋，从泉州东门外乐园的田野间移回保存。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从拓片认读，石墓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A 186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三、四层墓石。由一整块白花岗石雕成。第三层浮刻重叠覆莲瓣，第四层阴刻古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358页）。原第一、二层和五层墓顶石已散失。墓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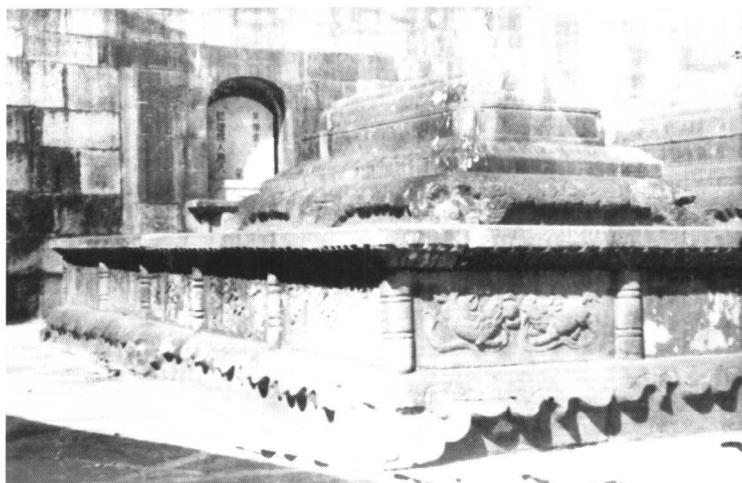


A 186

中心凿空。1958年秋,自泉州东门外东禅寺附近移回保存。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依拓片认读,石墓刻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全文。

A 187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的一座伊斯兰教徒石墓。在须弥座祭坛式平台上放置两座须弥座式石墓。这是经后人加以改造的一种形式。其须弥座祭坛的束腰处,雕刻佛教的万字符号和双狮戏珠。这反映了泉州多元文化的特征。该墓系陈埭回族丁氏英杰与孺人施氏墓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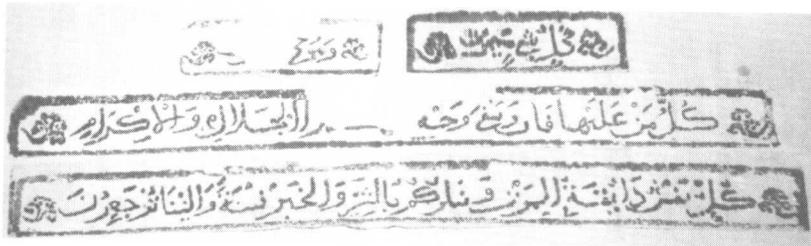
A 187

A 188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底层是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未雕刻纹饰,第三层的四周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第四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白花岗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灵山圣墓区。依据拓片认读,阿拉伯文字内容是《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和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见本书第358页)。



A 188



A 188 拓片

A 189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图案的有六只圭脚的底座。第二层浮雕覆莲瓣图案。第三层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第四层墓顶石已毁。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琢成，内凿空。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容，依据拓片认读，是《古兰经》第二章



A 189



A 189 拓片

第二百五十五节上半节；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下半节；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全文；第四十章第十六节节录（见本书第358页）。

A 190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卷曲图案的有六足的底座。第二层浮雕重叠覆莲瓣图案，第三层浮雕古阿拉伯文字，第四层的墓顶石已毁。石墓由一整块白花岗石琢成，实心。



A 190

这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已断裂。第一层是雕刻如意卷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雕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浮雕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字与字间的距离紧密，第五层墓顶石已被毁。整座石墓由一块辉绿岩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容依拓片认读，系《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全文（见本书第359页）。



A 191



A 191 拓片

A 192 须弥座式石墓



A 1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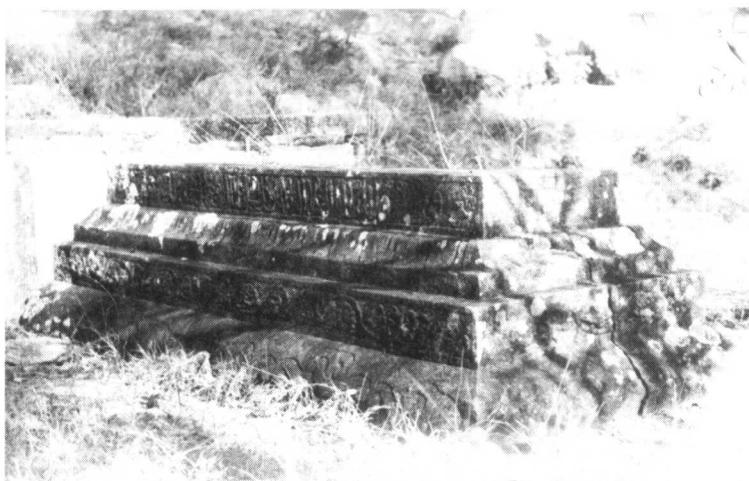


A 192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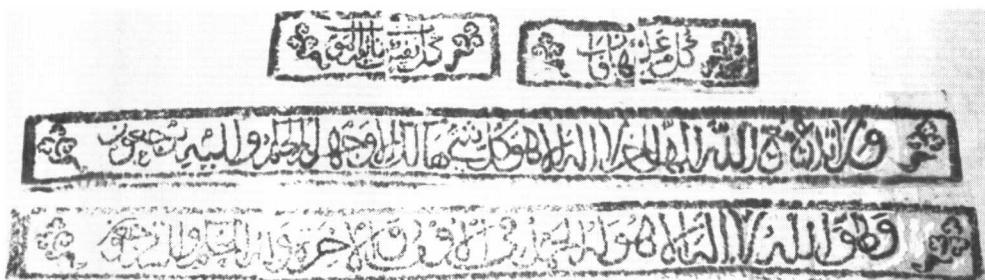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雕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浮刻重叠覆莲瓣，第四层周边浮刻古阿拉伯文字，第五层的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

容依据拓片认读,系《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全文(见本书第359页)。

A 193 须弥座式石墓



A 193



A 193 拓片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雕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浮雕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第五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辉绿岩石琢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容依据拓片认读,系《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全文;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节录;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七十节全文(见本书第361页)。

A 194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六个圭脚的雕刻如意状花纹的底层,第二层浮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刻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第五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辉绿岩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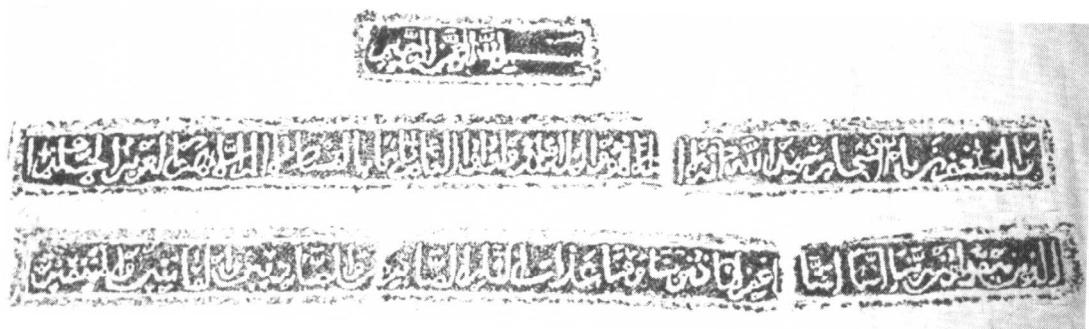


A 194

A 195 须弥座式石墓



A 195



A 195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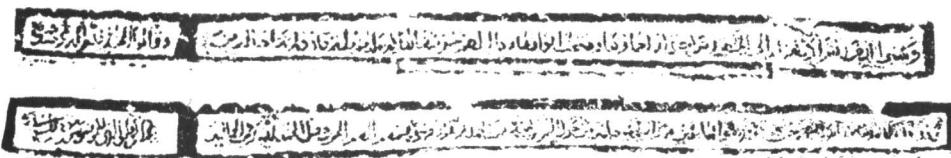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已断裂。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卷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雕连续花枝图案，第三层浮雕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第五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容依据拓片认读，系《古兰经》第三章第十六、十七、十八节全文（见本书第360页）。

A 196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六个圭脚的底座；第二层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部分字已风化模糊，但勉强可以辨认；第五层墓顶石已毁。石墓由一块辉绿岩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容依据拓片认读，系《古兰经》第三十九章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节全文（见本书第361页）。



A 196



A 196 拓片

A 197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置于须弥座祭坛平台之上。第一层是六个圭足的底层，刻如意状图案；第二层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刻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61页）；第五层墓顶石作曲拱状。全墓由一块辉绿岩石雕成。根据石墓的形制，是一座明代的伊斯兰教徒墓葬（参见A 233和A 284）。



A 197

系陈埭回族丁姓仁庵和孺人庄氏合葬墓。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字内容是《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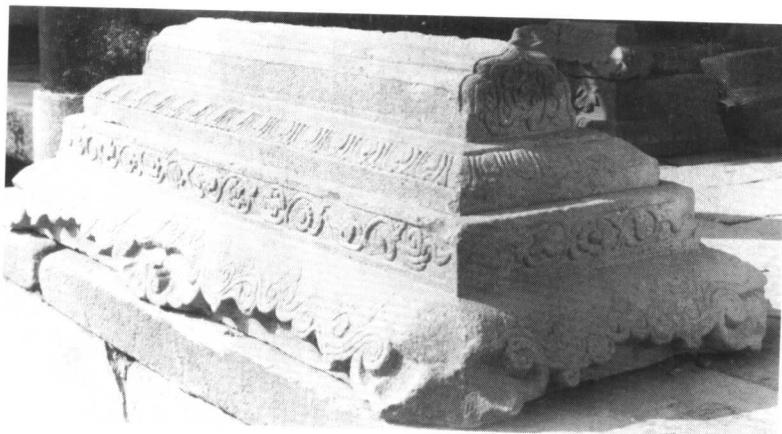
A 198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刻连续花枝图案，第三层浮刻重叠覆莲瓣，第四层浮雕古阿拉伯文字，第五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辉绿岩石琢成。石墓已被凿裂。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198 须弥座式石墓

A 199 须弥座式石墓



A 199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儿童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雕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浮刻另一式样的重叠覆莲瓣，第四层为墓顶石，雕成尖拱形状，正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362页）。石墓由一整块白花岗石琢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阿拉伯文字内容系《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节录。

A 200 施那威人迈哈茂德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为六足如意状的底座，第二层正面阴刻古阿拉伯文



A 200.1



A 200.2 石墓正面



A 200.3 第二层石刻古阿拉伯文字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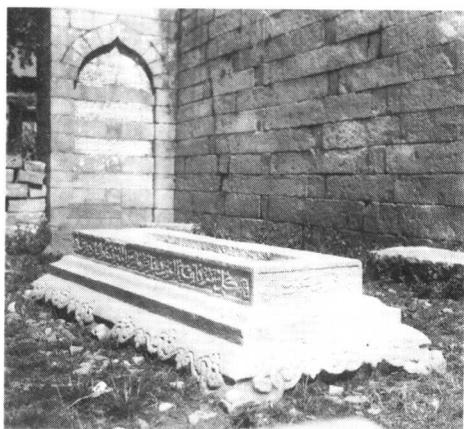
字一行(见本书第 362 页),第三层未雕刻纹饰,第四层墓顶石已毁。全墓由一块白花岗石雕成,实心。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墓主迈哈茂德,“夏菲”(即波斯施拉夫城)人,卒于回历 700 年(大德四年,公元 1300 年)。“夏菲”(Siraf),即施罗围,或译作施那威、撒那威、西拉围,是地处波斯南部法尔斯坦(Farstan)的重要城市,地近波斯湾。自 9 世纪上半叶至 13 世纪上半叶的近四百年间,为波斯湾最大的贸易港。在此期间,大量波斯商人通过此城到东方进行贸易。

A 201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五层须弥座式石墓。第一层是六个圭脚的底座,第二层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62 页),第五层墓顶石已被毁。由一块白花岗石雕凿而成。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内容系《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A 201



A 202

A 202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墓顶石已毁,第三层四周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62 页)。由一整块白花岗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阿拉伯文内容是《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A 203 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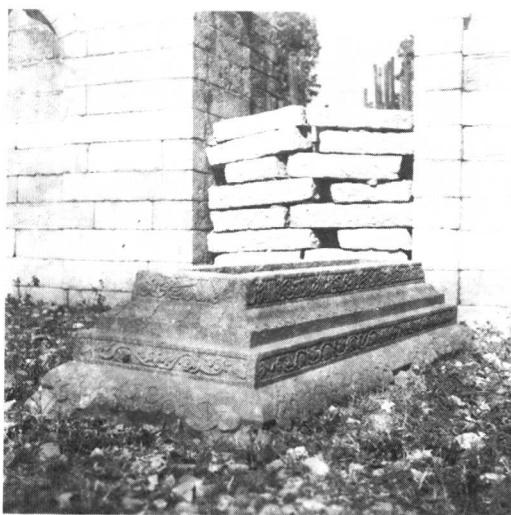
本照片上的这座石墓,是由两座各不完整的须弥座式石墓拼凑起来的。上面三层,是一座须弥座式白花岗石石墓,浮雕有中国美术史上常见的折枝牡丹(有间柱隔开)。下面两层是另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一、二层。现有的灰泥圆形墓顶,为现代伊斯兰教徒挪用时加上的。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03

A 204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六个圭足的底座，第二层刻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刻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第五层墓顶石已毁。石墓由一整块辉绿岩石雕成，中心凿空。



A 204



A 205.1

A 205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卷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素平，未刻花纹，第三层浮雕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墓顶石雕成圆拱状，正面浮刻莲花一朵，另一面浮雕一朵云。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凿成，实心。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05.2 石墓正面

A 206 须弥座式石墓



A 20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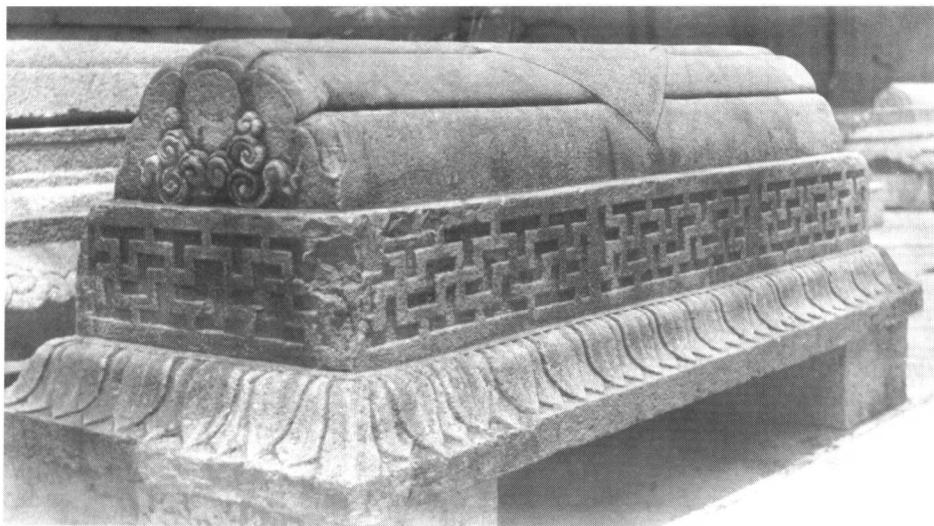


A 206.2 石墓正面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刻连续传枝花图案，第三层浮刻重叠覆莲瓣，第四层墓顶石，刻成连续弯拱弧状，正面浮雕“云月”。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琢成，实心。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07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底层和第二层已毁。第三至第五层由一块辉绿岩石琢成。第三层浮刻重叠覆莲瓣，第四层浮刻一种“卍”（“万”）字连续图案，第五层墓顶石作连弧圆拱形状，正面浮刻“云月”。墓顶正中，浮雕一方形图案，如巾状披覆墓顶上。



A 207

就墓的形式看,它与历年来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乐园、灵山、瑞枫岭、云麓、南较场和津头铺等地所发现的石墓相似。奇特的是石墓的第四层,浮刻“卍”字图案。这是数十年来发现的古伊斯兰教徒石墓所少见的。

按“万”字,分为右旋“卐”与左旋“卍”两种,在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国,有时混用。

梵语 Swastika,是“吉祥如意”,用右旋“卐”表示,也称为“佛心印”,表示“万寿无量”。梵语又称左旋为 Suavstika,以区别右旋。

又据印度婆罗门教的毗耶派(Jains)认为:右旋万字为阳神,左旋者为阴神。阳神代表太阳和光明,阴神代表黑暗与灭亡。

通观泉州佛教庙宇、塔幢雕刻,“万”字有左旋、右旋两种。以后又发现泉州婆罗门教的钩栏板石雕,亦作“万”字左旋。

伊斯兰教徒石墓浮雕佛教、婆罗门教的左旋标志,此为仅见。如果从这三种宗教的教义上来说,伊斯兰教石墓作此雕刻,是不能解释的。查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有“曲水万字”^①的艺术雕刻。

由是观之,这座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上的左旋“万”字雕刻,只能是一种艺术雕刻而已,它与宗教教义是没有关系的。

这座石墓,就其雕刻风格和手法看,属于明代。1959年秋,在泉州通淮门外5公里的法石乡海边的美山发现,后移回保存。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关于这座石墓的最早报道,是20世纪50年代末的《考古》杂志,文云:“这里遗存完整和能复原的石墓4座……能复原的2座皆用青石雕成,其大小形式略有不同,大的1座,顶宽38厘米、长144厘米,底部宽215厘

① 李诫《营造法式》卷三十二,彩画制作图样上,五彩锁文第二,1929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米……但这墓刻有各种不同的图案，墓顶石的正中，浮雕一方形图案作巾状披墓顶上，两顶侧面刻有云月，第2层四侧刻“卍”字不断的图案纹。”^①

A 208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1959年，在通淮门外3公里处的法石山发现。这座石墓的底层已被毁，仅存上面的三层。上三层是由一白花岗石雕成的。墓顶石作连续弯拱形，正面浮雕“云月”。

A 209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伊斯兰教徒三层回式石墓。底层浮雕覆莲瓣状的卷曲图案，第二层无雕刻图案和花纹，第三层为一回式墓顶石。与宋代三贤、四贤回式石墓形式类同。原这座石墓是置于三贤、四贤墓石回廊之前（南面）。1959年，重修三



A 208



A 209

贤、四贤墓时，把它移置于石回廊的北面山坡。原此墓旁立有汉字碑一方，上阴刻：

同治壬申年七月初十日（公元1872年，同治十一年），故四川成都六品军功马阿浑永春之墓。盐亭乡愚弟江长贵顿首拜立。

这座回式石墓即《闽书抄》所记灵山圣墓三座石墓之一，亦即所谓“世许爸爸”之回式石墓，而“马阿浑永春”之墓则置于“世许爸爸”墓之右前方。

^①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泉州涂关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迹的调查》，载《考古》1959年第11期，第61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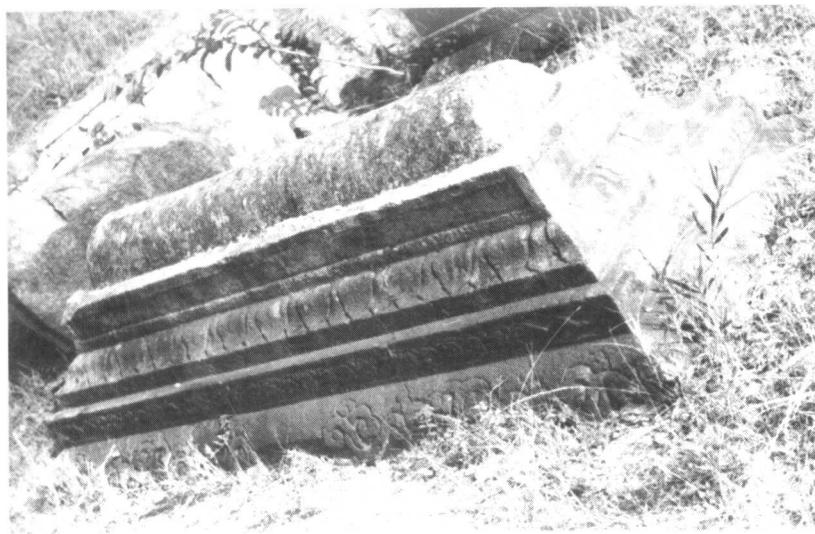
A 210

A 210 須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須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是如意状图案六足底座。第二层无雕刻文字或花纹，第三层雕凹入长方形框，素平，未刻文字。第四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墓的规格比一般成年人墓为小，可能是少年人的石墓。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11 須弥座式石墓

这是五层的須弥座式石墓。第一层刻六个圭足，是底座；第二层刻连续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素平，未刻文字；第五层墓顶石已毁。现有的灰泥圆拱形墓顶，为现代伊斯兰教徒挪用时加上的。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11

A 212 須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須弥座式五层石墓。底层刻有六个圭脚；第二层刻连续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刻一长方形凹入的方框，石面素平，未刻文字；第五层墓顶石已毁。由整块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12



A 213

A 213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小孩的须弥座式三层石墓。底层刻四个圭足，刻如意状图案。第二层仅刻斜面。墓顶石已毁。由一整块白花岗石琢成，实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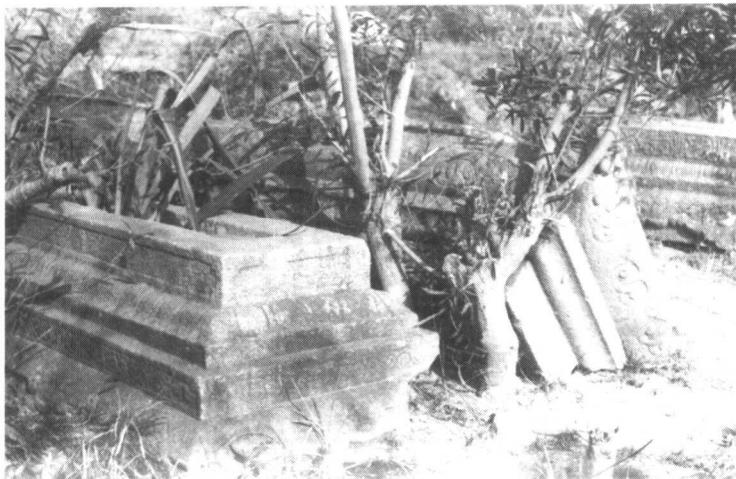
A 214 须弥座式石墓



A 214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刻四个圭足，第二层仅刻斜面，第三层长方框中素平，第四层墓顶石已毁。白花岗石琢成，实心。因形制小，可能是儿童的石墓。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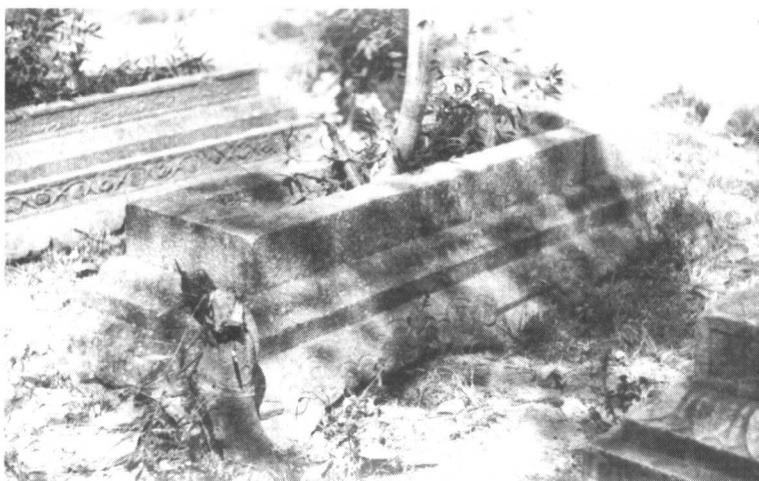
A 215 须弥座式石墓



A 215

这座五层须弥座式石墓比一般同类型石墓为大,但雕刻较简单。底层是刻六只圭足;第二层刻连续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素平;第五层墓顶石已毁,中心凿空。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雕成,右边圭足已残损。其旁为一座翻倒的须弥座四层石墓。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16 须弥座式石墓



A 216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卷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刻斜面,第三层素平,未刻文字。第四层墓顶石已毁。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

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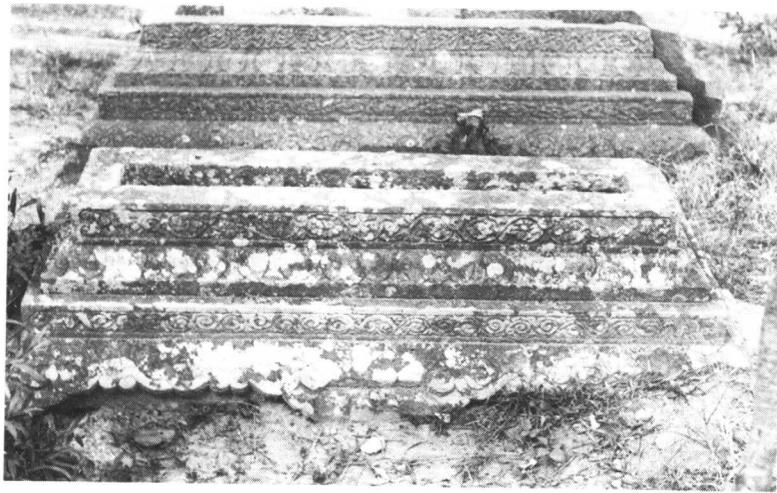
A 217 须弥座式石墓



A 217

这是五层须弥座式石墓。辉绿岩石雕成。底座刻如意状图案和六只圭足；第二层刻水波纹状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刻连续花枝图案，正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18 须弥座式石墓



A 218

这是辉绿岩石雕成的须弥座式石墓。墓顶石已毁。第一层刻六双圭足，第二层刻连续图案花纹，第三层刻覆莲瓣图案；第四层刻连续花枝图案。中心凿空。其旁为一座已断裂的须

泉州宗教石刻

弥座式五层石墓，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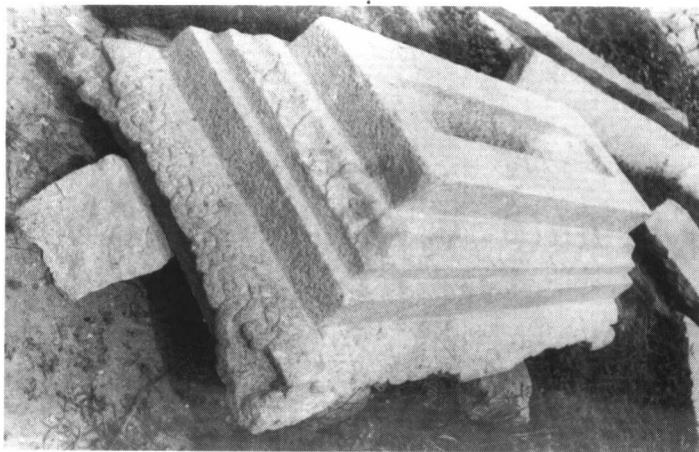
A 219 须弥座式石墓



A 219

照片中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原有五层，墓顶石已毁。底层刻六只圭足，第二层刻连续缠枝图案，第三层刻覆莲瓣，第四层刻连续水波纹图案。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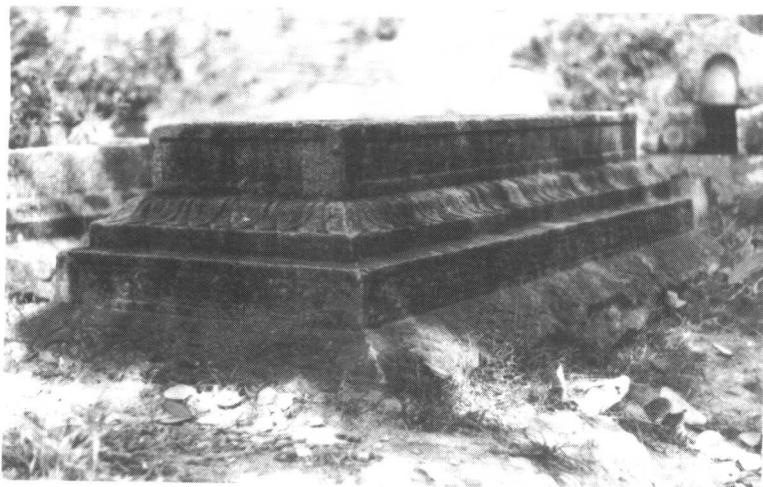
A 220 须弥座式石墓



A 220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素平，第三层浮刻覆莲瓣，第四层素平。整座石墓由一块花岗岩石凿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21 须弥座式石墓



A 221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浮刻连续卷曲图案；第三层浮刻重叠覆莲瓣；第四层刻成长方形凹入方框，素平，未刻文字。第五层墓顶石已毁。全座石墓由一整块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22 须弥座式石墓



A 222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至三层已毁。现第四、五层为一块白花岗石琢成，墓顶石作连续弧状，正面浮刻“云月”。就其雕刻风格看，大约是明代的石墓。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23 须弥座式石墓

这座须弥座式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雕成，实心。分四层，第一层是六只圭足的底座；第二层刻连续缠枝花图案；第三层刻重叠覆莲瓣图案；第四层为墓顶石，正面作连续弧形，中间刻伊斯兰教的徽号“云月”。



A 223



A 224

A 224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五层须弥座式石墓，白花岗石琢成。第一层如意状石雕墓座已毁，第五层墓顶石也已毁，仅保留其第二、三、四层。其特点是，这三层由一石雕成，中心凿空，第四层的四周浮雕折枝牡丹花、茶花等，每幅花枝浮雕之间有间柱隔开。雕工精致，枝叶繁茂挺拔，花朵逼真。此类石墓在泉州较少见。1958年，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发现，后移通淮街清净寺保存。

A 225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交曲图案的六足底座，第二层以上由一块白花岗石凿成，第二层浮刻卷曲图案，第三层浮雕重叠覆莲瓣。第四层刻长方形凹入方框，素平，未刻文字。第五层墓顶石雕成连续弯弧状，正面浮雕“云月”。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25. 1



A 225. 2 石墓正面

A 226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四层须弥座式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雕成，中心凿空。第一层刻六只圭足；第二层仅刻斜面；第三层在长方形框内未刻文字或花纹；墓顶石已毁。现存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区。



A 2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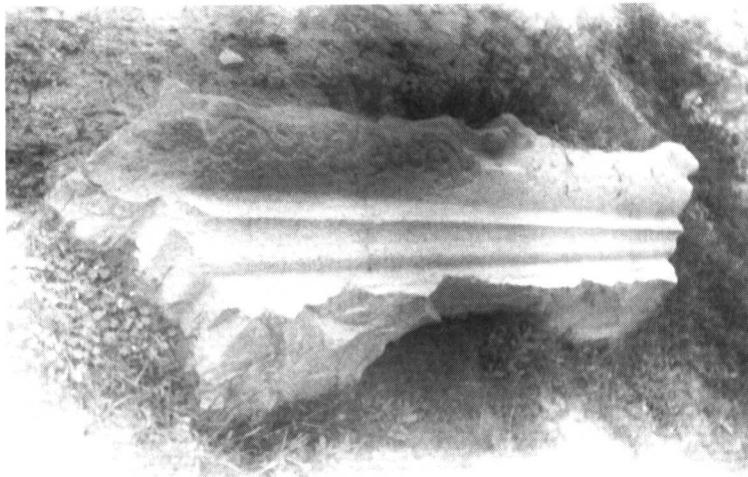
A 227 须弥座式石墓



A 227

这是一座四层的须弥座式石墓，雕刻简单。第一层刻四个圭足，第二层仅刻斜面，第三层仅刻凹入方框，墓顶石已散失，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该石墓型制较小，可能是儿童的石墓。现存泉州灵山圣墓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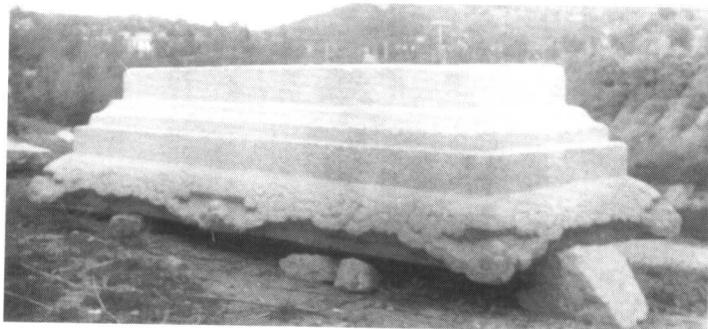
A 228 须弥座式石墓



A 228

这座石墓被翻倒在东门外鹿园的路旁，其一半还埋入土坎里。其第一层和第三层都受破坏。整座石墓用一块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原状应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

A 229 须弥座式石墓



A 229

这座须弥座式石墓由一大块白花岗石雕成，分五级。第五级墓顶石已被毁。其余各级雕刻较一般。但底层圭足底，则刻直线平面，这又是比一般同类型石墓精细的。这座石墓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村修水渠时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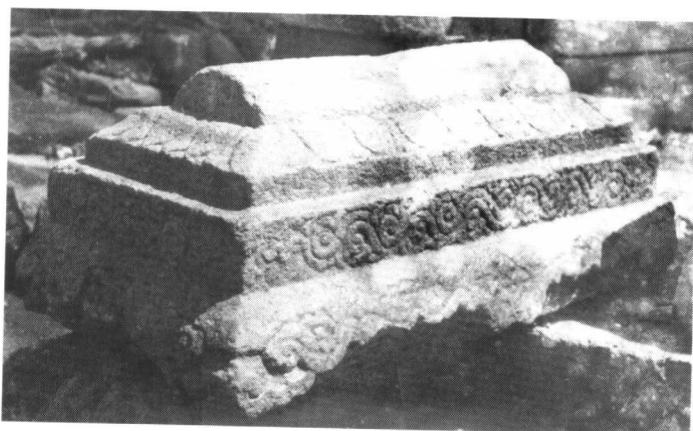
A 230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散落在水稻田间小路旁的须弥座式石墓。白花岗石琢成，中心凿空。除底层露出地面外，其他各层都埋入泥中。此照片摄于 1978 年夏，地点在泉州涂门外津头铺乡田间。



A 230

A 231 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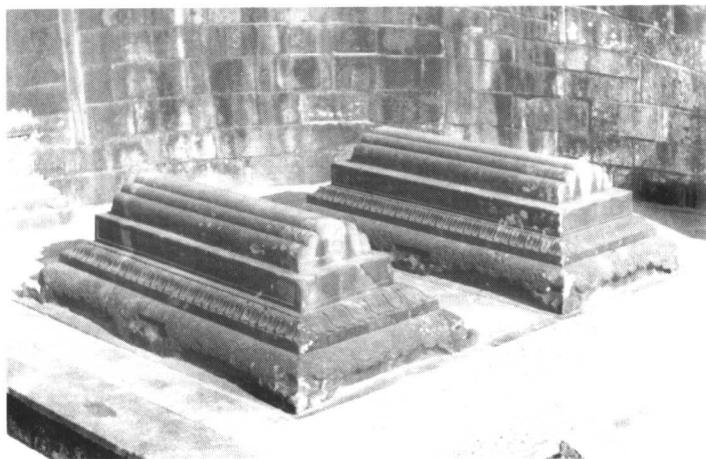


A 231

泉州宗教石刻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第一层雕刻如意状交曲状图案，第二层浮刻连续卷曲图案，第三层浮雕重叠莲瓣，第四层是刻连续弯弧圆拱形的墓顶石。石墓由一整块白花岗石琢成，其规格甚小，底座长度仅76厘米。可能是一座儿童墓。1959年，在泉州通淮门外5公里处的法石乡美山宫附近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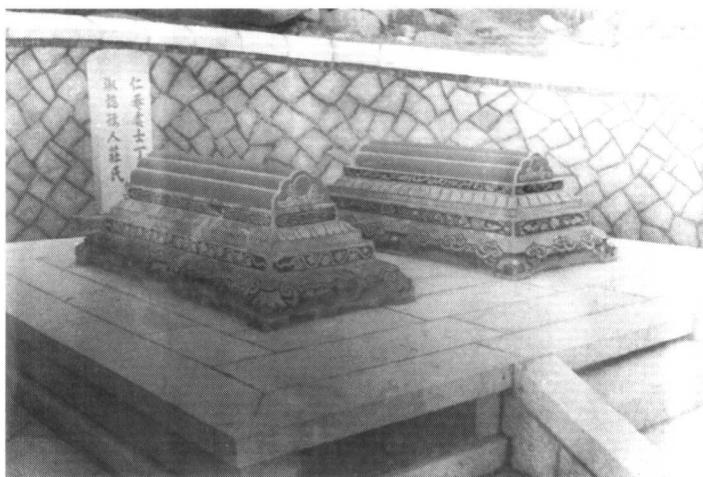
A 232 须弥座式石墓



A 232

这是两座明代的须弥座式四层石墓。白花岗石琢成。墓顶石作连续弯弧圆拱状。系泉州陈埭回族丁氏的祖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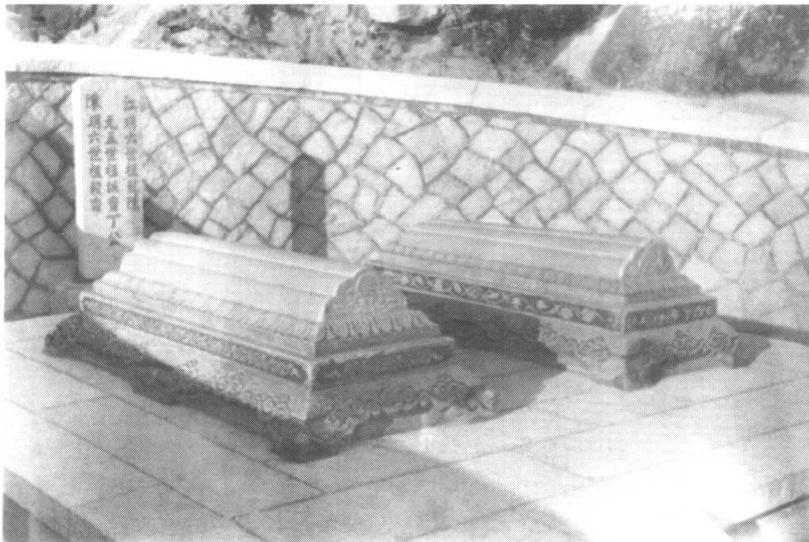
A 233 须弥座式石墓



A 233

这是两座辉绿岩石琢成的须弥座式五层石墓。墓顶石正面浮刻“云月”。系泉州陈埭回族丁氏的祖墓。

A 234 须弥座式石墓



A 234

这是两座须弥座式四层石墓。墓顶石正面刻伊斯兰教徽号“云月”。系泉州陈埭回族丁氏的祖墓。

A 235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 1959 年，在泉州通淮门外法石美山发现的两座五级须弥座式石墓。第一、二层由一块白花岗琢成；第三、四、五层由另一块白花岗石雕成。

《考古》杂志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发表过这两座石墓的报道文章，文云：“完整的 2 座相排并立，仅相隔 1 米，大小形式完全相似，墓向正南，为白色花岗岩雕刻而成，计分 5 层，自下层向上缩小，上层长 140、宽 30 厘米。底层长 215、宽 106 厘米。上 3 层为一石刻成，下 2 层为一石雕成，墓顶作半圆状。”^①



A 235

^①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泉州涂关外法石沿海有关中外交通史迹的调查》，载《考古》1959 年第 11 期，第 613～61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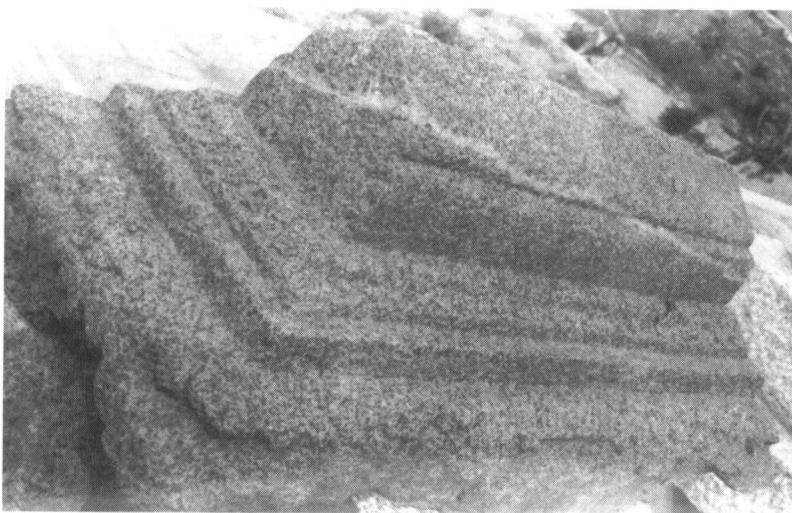
A 236 须弥座式石墓



A 236

这是一座须弥座式四层儿童石墓。第一层是雕刻如意状图案的四足底座，第二层浮雕重叠覆莲瓣，第三层浮刻连续卷曲图案，第四层墓顶石已毁。石墓长 71.5 厘米、宽 45 厘米、高 35 厘米。是数年前从蒲寿庚故宅棋盘园的池塘边地下约 2 米深处挖出的。整座石墓由一块白花岗石琢成，实心。现存泉州第七中学历史教研室。

A 237 须弥座式石墓



A 237

这是一座辉绿岩石雕成的四层须弥座式石墓。这座石墓发现于泉州东门外乐园，为至今发现的伊斯兰教石墓中最小的一座。底座长 59 厘米，底座宽 30 厘米，通高 22.5 厘米。墓顶石作尖拱形，侧面似乎有阴刻阿拉伯文字，但已漫漶不清。

A 238 须弥座式石墓



A 238

照片上有五座须弥座式石墓。这些石墓，被利用作小寺庙的墙基。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的这座房屋的基础，就填入十多座须弥座式石墓。摄于 1978 年冬。

A 239 须弥座式石墓



A 239

这是砌于墙基础里的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第一层如意状图案和第二层连续花枝图案仍清晰可见。1978 年冬，摄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

A 240 须弥座式石墓



A 240

这座须弥座式石墓，也是被作为墙基础之用的，其中一面三层露出田畔，底层如意状雕刻清楚可见。1978年冬，摄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

A 241 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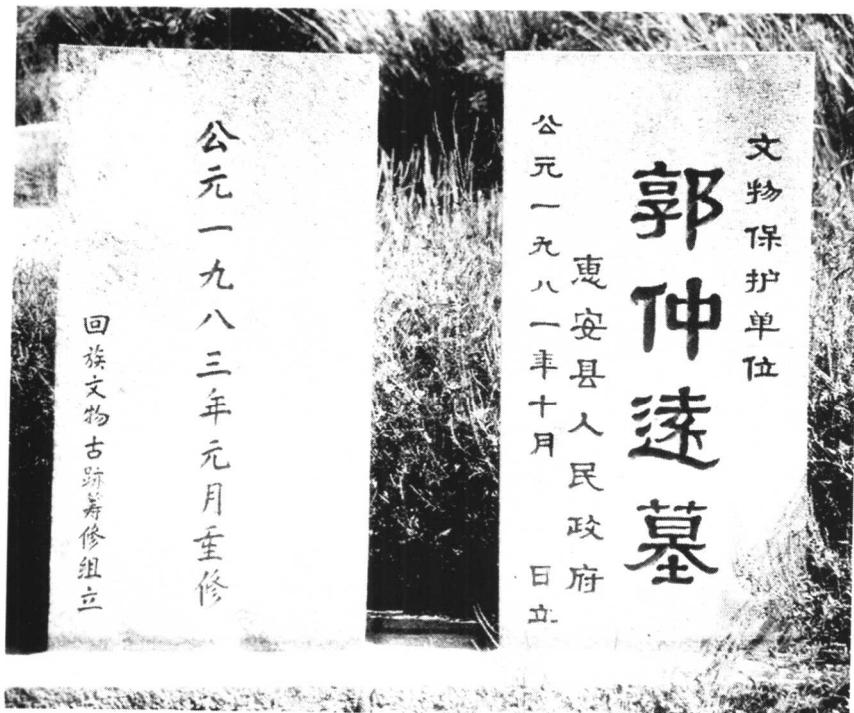


A 241

照片上的须弥座式石墓，也是砌于墙基础上的，二层露出田畔。底层如意状图案雕刻和第二层连续花枝图案雕刻清楚可见。1978年冬，摄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

九、惠安百奇回族郭氏和东园回族郭氏须弥座式石墓

A 242 郭仲远墓文物保护碑



A 242

郭仲远(公元 1348~1422 年),讳泰,字仲远,号毅轩。父郭子洪,祖郭德广。元季,郭德广自杭州之富阳县来泉州,占籍涂关门外法石村。洪武初年,郭仲远迁徙惠安县百奇村,为百奇回族郭氏开基祖。孺人陈氏。

郭仲远乐善好施,造石桥、砌石路、扶贫送死,乡民德之。族谱记载与三宝太监郑和有往来^①。

A 243 百奇回族郭仲远墓

郭仲远墓系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第一层雕刻六足及如意状图案,第二层刻连续花枝图案,第三层浮刻覆莲瓣,第四层浮雕古阿拉伯文《古兰经》句。自一至四层为一块白花岗石凿成,中空。第五层为墓顶石,两头雕成圆拱形,未刻图案。左边一座为郭仲远夫人陈氏的须弥座式石墓,未刻阿拉伯文字,仅雕刻图案花纹。

^① 《百奇郭氏回族宗谱》,《谱序卷》,四,《人物志》。百奇郭氏回族宗谱编委会重修,2000 年出版。



A 243

A 244 百奇回族郭仲远夫妇墓



A 244

两座白花岗岩须弥座式石墓，并排置于一个 30 厘米高的石台面上，后砌筑马蹄形挡土墙，挡土墙正中竖立一方云月形石碑。有三级台面，墓地朝向西南。墓址在白奇乡下埭吉圃村龙头山之阳，俗称“石狮公墓”。

A 245 百奇回族乡接官亭



A 245

接官亭，地处惠安县白奇回族乡白奇渡口，与后渚港隔海对峙。全由白花岗岩石构成，正面宽 7 米，进深 6.7 米，亭顶高 5 米，占地面积近 50 平方米，亭盖呈伞形。亭的平面呈正方形，亭柱分内、外两层，内层为四根亭柱组正方形“口”字，外层由十二根石柱组成一个“口”字，合内外层组成一个“回”字。

亭创建于洪武年间，为回族郭氏三世祖郭仲远所创建。据《百奇郭氏回族宗谱》，永乐十五年（公元 1417 年），三宝太监郑和奉旨第五次下西洋，中途驻泉州港，曾到过泉州灵山圣墓行香，并到通淮街清净寺礼拜，结识了郭仲远。郑和屈尊渡海到百奇拜访郭仲远。郭仲远在渡口石凉亭摆设香案迎接郑和。从此，渡口凉亭改称接官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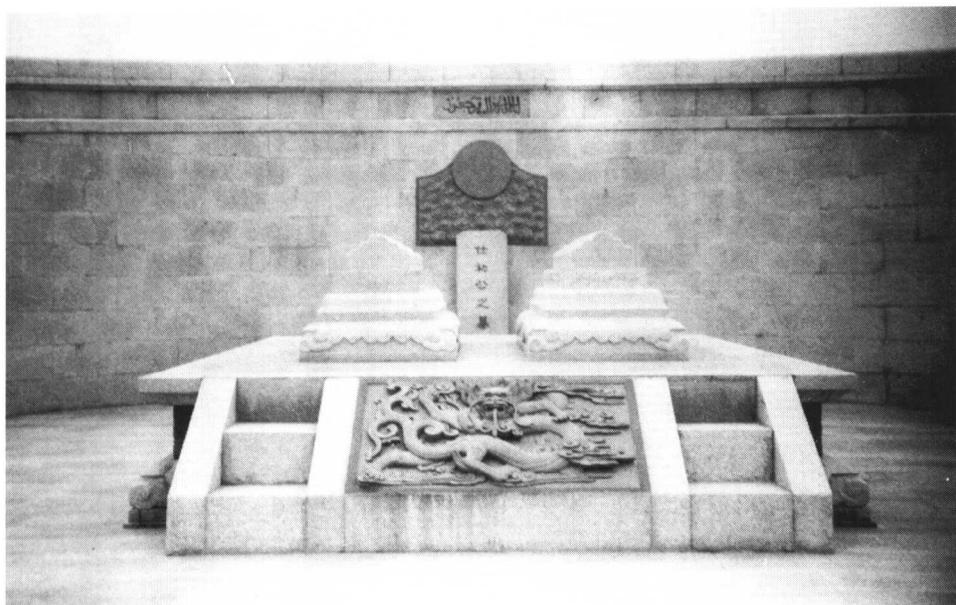
又云，相传永乐二十年（公元 1422 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返国时，在泉州港暂驻，又到百奇拜访郭仲远，两人在接官亭对弈，留下石雕棋盘（已毁）。此外，还留下郑和为郭仲远第五子仕昭在接官亭主婚的美谈，接官亭因此又称送嫁亭^①。如今，白奇还有一道 800 米长的海堤，

^① 《百奇郭氏回族宗谱》，《谱序卷》，三，《文物志》，“接官亭”。百奇郭氏回族宗谱编委会重修，2000 年出版。

称郑和堤，据云是郑和命官兵所筑，今犹存。

现今，接官亭还保存有乾隆、光绪重修碑和1993年惠安县人民政府第三批文物保护碑。

A 246 百奇回族郭仕初夫妇墓



A 246

郭仕初，讳萌，字仕初，号元朴，郭仲远之长子。生于1371年，卒于1449年。仕初助父仲远行义举，颇得乡人信任，又手订回族郭氏家谱，创郭氏宗祠。

郭仕初墓在百奇乡田吟村。2003年，新墓落成，占地四亩，建筑美观，有石牌坊山门、广场。墓址作马蹄形，中砌筑须弥座祭坛，台面上并列郭仕初与夫人杨氏的四层须弥座式石墓。须弥座祭坛正面的辉绿岩斜面上砌汉式石雕云龙图案，台阶附两旁。祭坛后竖墓碑，上刻“仕初公之墓”。墓碑后上方的挡土墙很高，约有5米，正中砌一方巨大的辉绿岩石“云月”雕刻，上方砌一方阿拉伯文字石刻（见A247）。

A 247 百奇回族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这是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的挡垛石。长101厘米，高0.45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石面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译文是：“他——真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你们都将归向他”。

此碑于20世纪70年代百奇村围海开垦工地出土，后移回族郭氏宗祠保存，砌于宗祠西庑墙上。2003年，移置郭仕初陵墓石砌挡土墙正中高处。



A 247

A 248 百奇回族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两座并列的百奇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墓址在百奇下埭吉圃村龙头山之阳，东侧紧邻郭仲远夫妻墓。两座石墓的形制一样，都为须弥座五层石墓，但墓顶石均已遗失。现存二石墓并列置于一个石台平面上，墓后正中，竖立一方石碑，碑上浮刻月亮。两座石墓各由两块花岗岩石雕成，除底层刻如意状图案外，别无其他雕饰，显得简陋。



A 2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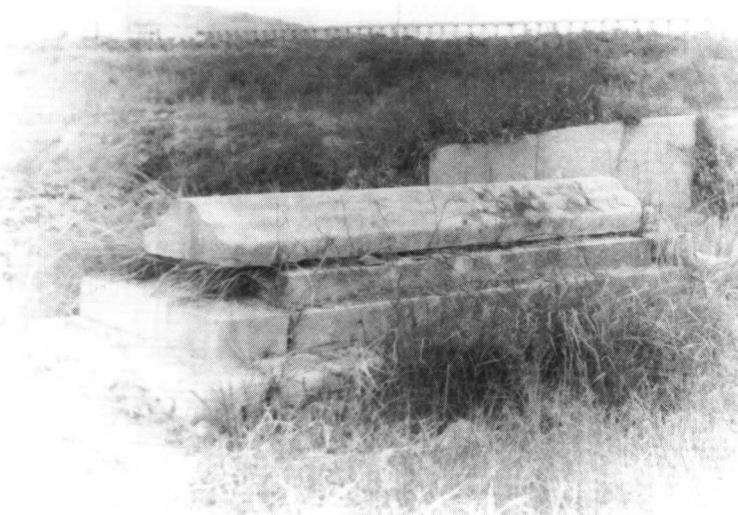
A 249 百奇回族须弥座式石墓



A 249

这是两座现代特殊形式的伊斯兰教石墓。两座石墓并列于一个平台上，为花岗岩石琢成，表面磨光。石墓各作三层，墓顶均作圆柱形攒尖顶，中层刻尖拱形框，框内刻五行（右墓）或三行（左墓）阿拉伯文字。两座石幕后有半圆形的挡土墙，墙正中用水磨辉绿岩石影雕尖拱形框，框中影雕一个圆圈，圈中刻阿拉伯文字，尖拱顶部影雕星和弯月。

A 250 百奇回族须弥座式石墓



A 250

这是一座四层须弥座式石墓，位于百奇内村，由数块白花岗石构成。底层刻如意状六足，第二、三层无雕刻。墓顶石作连弧圆拱形，正面刻“云月”。第三层的石块前部已毁。石墓中心凿空。整座石墓置于石铺地板上，地板下为埋葬处。石墓后有几块简易的挡土石。

A 251 百奇回族须弥座式石墓



A 251

在百奇内村(又名里春)，伊斯兰教石墓一列六座。每座石墓形体类似，五层，均由两块花岗岩石琢成；底层为素面，用一块石头琢成；上四层亦皆素面，用另一块石头琢成。墓顶石雕成弧形。六座须弥座式石墓并列于一“三合土”平台上，平台后有高 50 厘米左右的“三合土”挡土墙，俗称“鸟墓树”。

据《百奇回族郭氏宗谱》记载，15 世纪以降，有十三位先人安葬于此。又云：“以墓围为界可分列为五个墓区，共有十一座墓圹……也是研究百奇回族历史和丧葬习俗的宝贵实物资料。”^①

A 252 百奇回族须弥座式石墓

百奇内村六座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中的两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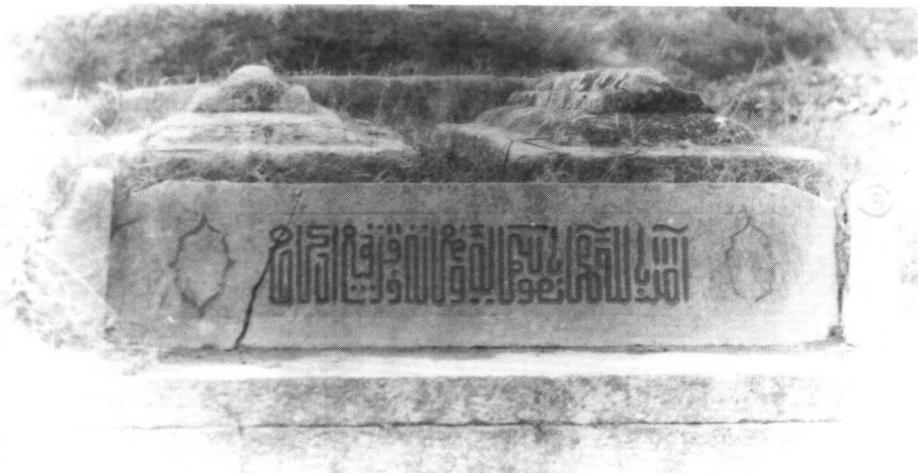
^① 《百奇郭氏回族宗谱》，《谱序卷》，三，《文物志》，“百奇回族伊斯兰教墓群”，第 47 页。百奇郭氏回族宗谱编委会重修，2000 年出版。



A 252

A 253 东园镇后海村回族郭氏须弥座式石墓

墓在惠安县东园镇后海村，俗称九叔公墓。两座“三合土”须弥座式墓并列于一个“三合土”平台上，墓作四层，墓顶作半圆形，无雕饰。墓后有“三合土”挡土墙。墓前有一列长墓桌，上砌一方阿拉伯文字石刻，系穆斯林的信条，译文内容是：“我信仰真主，即如他的名称和他的德行，我接受他的全部律法”（另见本书第362页）。墓前有墓埕，立有四根圆形攒尖顶矮石柱，以标示范围。据乡民云，墓为清道光年间所筑。



A 253



A 253 拓片

十、洛江区杏宅村回族郭氏须弥座式石墓和石碑

A 254 杏宅回族郭氏须弥座式石墓

泉州洛江区杏宅村回族郭氏家庙保存一批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照片上,花盆下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不同构件,可见第一层刻如意状六足,二层素平。另外几块须弥座式石墓不同层位的构件,有的雕刻如意状图案,有的刻莲瓣或连续花枝图案。另有一方石碑,阴刻“伊斯兰教寺遗址”。据乡民云,杏宅回族郭氏家庙,明、清时期的清真寺也设在这里。



A 254

A 255 杏宅回族郭氏须弥座式石墓

花盆下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一、二层;第一层雕刻如意状六足,二层素平。左旁作为碑座的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一、二、三层;第一层雕如意状六足,二层素平,三层刻覆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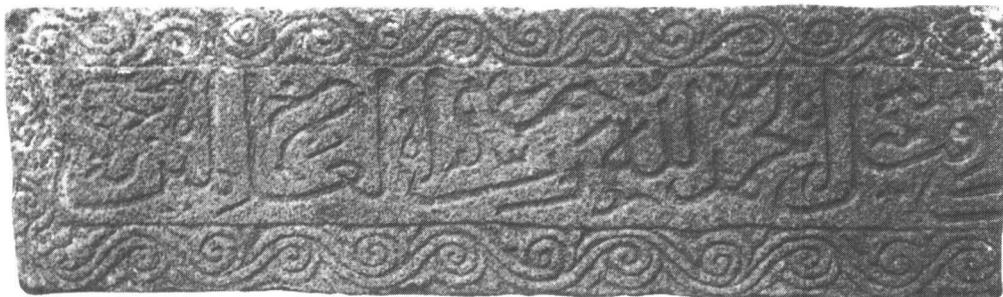


A 255

瓣,上面竖立的石碑刻“郭氏家庙重修记”。在泉州用须弥座式石墓权充石碑座的事例很普遍。

A 256 杏宅回族郭氏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长 75 厘米、高 27 厘米、厚 11 厘米,辉绿岩雕成,右端已凿毁。石面的周边雕有连续波纹图案,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1973 年,郭氏乡民在围海造田时出土,现保存在洛江杏宅回族郭氏家庙。



A 256

A 257 杏宅回族郭氏“永结汉回缘”碑

洛江杏宅村回族郭氏家庙的庭院里,竖立一方汉字碑,上阴刻“同遂嫡胄愿,永结汉回缘”十个大字。

据记载,元代“杏宅郭氏始祖文宪公系伊斯兰教信徒,来自海外天方之国,因慕中夏繁华,

人文鼎盛，遂安家于浙江杭州富阳，务农营商，生息繁衍，聚族定居，后袭汉为郭姓。其子章公。章公生二子，长子德广公，次子德昭公。长子（德广）生于元季，明洪武初分居法石（泉州）、白奇（惠安县）；次子（德昭）分居（泉州城内）东街、大坪、杏宅”^①。郭德昭为杏宅回族郭氏的开基始祖。



A 257



A 258

A 258 杏宅回族《郭氏家庙重修记》碑

杏宅村回族郭氏家庙庭院中，竖立一方《郭氏家庙重修记》碑。碑文记载郭氏于“公元一三八六年，自郡东挈眷卜居于此，生聚繁衍，六百年于今。传廿三世，人丁逾万，散居四方。聚集本乡者亦三千余”。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家庙遭雷击重修。民国三十六年（公元 1947 年）重修并扩建。1997 年再次修缮，为三开间三进二庭院双护厝的闽南仿古建筑。

^① 许在全、吴幼雄、蔡湘江主编《泉州名祠》，“泉州杏宅郭氏家庙”，第 37~38 页，2003 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一、泉州德济门城基出土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 259 德济门城基础遗址



A 259

泉州城德济门(南门),创建于南宋绍定三年(公元 1230 年)。《泉州府志》记:“绍定三年,守游九功砌瓮门,复即南罗城外筑翼城……明洪武初,卫指挥同知李山增高五尺,基广俱二丈四尺,内外皆甃以石,建月城六。”^①20 世纪 20~30 年代,城垣被拆除,德济门城基础被埋入地下,地面建民房。

2001 年 9 月,整治泉州南门天妃宫(天妃宫与德济门仅一街之隔)门前广场时发现。经考古发掘和清理,城门进深 14.10 米,分前后二门道,最宽处 4.10 米。残存城基础南北长约 36.50 米、东西宽约 49.10 米。瓮城(即月城)呈半月状。瓮城门在西侧,进深 5.60 米。城墙基础宽 4.80 米、残高 0.5~1 米。整座德济门面临晋江码头,是宋元时代蕃舶聚集之所。南宋末,文人刘克庄称赞泉州德济门商业繁荣,诗云:“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唯有桐城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②“桐城”,泉州古以刺桐城著称于世,简称桐城。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不少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佛教石刻。这些外来宗教石刻,系明初泉州城加高、加宽时被埋入的。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②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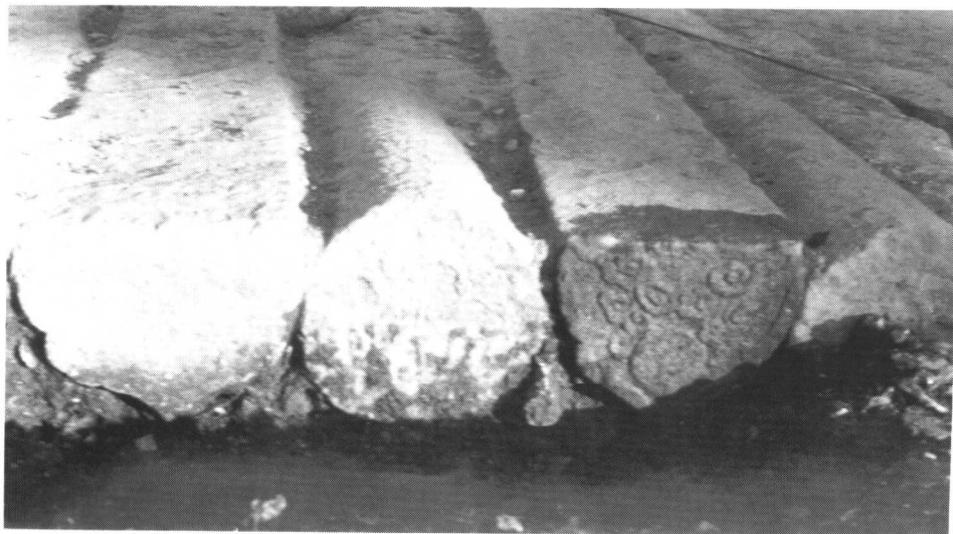
A 260 德济门城东侧城基础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这是一方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砌于德济门城东侧基础,仅露出其尖拱形正面的“云月”雕刻。高 27 厘米,宽 3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



A 260

A 261 德济门瓮城东侧城墙基础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 261

这是一方泉州迄今发现的最奇特的外来宗教石刻。这方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一端雕刻伊斯兰教的云月图案，另一端却雕刻莲花和十字架，同一墓顶石上出现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种宗教的因素。石长 160 厘米、底宽 30 厘米、高 26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

吴文良著《泉州宗教石刻》有一段文字值得注意，云：

据侨居在泉州的天主教传教士西班牙籍任道远(Sarspin Moya)说：泉州在宋、元时代的基督教徒常和伊斯兰教徒混葬在一起，并引色厝尾的南北隅墓地为证；又说：几十年前有一个名叫阿耐司(Arnaiz)的教士，在灵山圣墓捡获一方刻有十字架与阿拉伯文字的石刻残段，因而说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曾经混合过，故其墓葬也可能合葬在一起，甚至说圣墓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徒合葬的坟地。有不少人为此说所影响。^①

但这里要分清两个问题：

其一，近代外国传教士在泉州地面上发现的情况，绝不等于宋、元时代泉州的地面情况。这是容易理解的。

其二，在泉州东门外色厝尾的基督教墓葬区附近发现伊斯兰教石墓，不等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混葬。同样，在灵山圣墓捡到“十字架与阿拉伯文字石刻”，亦不能证明“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曾经混合过”。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有夫、妻信仰不同宗教的合葬；或一个人信仰两种宗教的事实。在元代，以上两种个人情况是常见的事，即所谓“回耶通婚”和一个人信仰多门宗教“以求天佑”。这种个人行为，不能称之为“两教混合”或“两教混葬”。这个问题将留待本书基督教部分加以阐述。

A 262 德济门东侧城墙基础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长 148 厘米，大部分埋入城墙基础，仅顶部露出地面。辉绿岩石雕成。

A 262

十二、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保存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 26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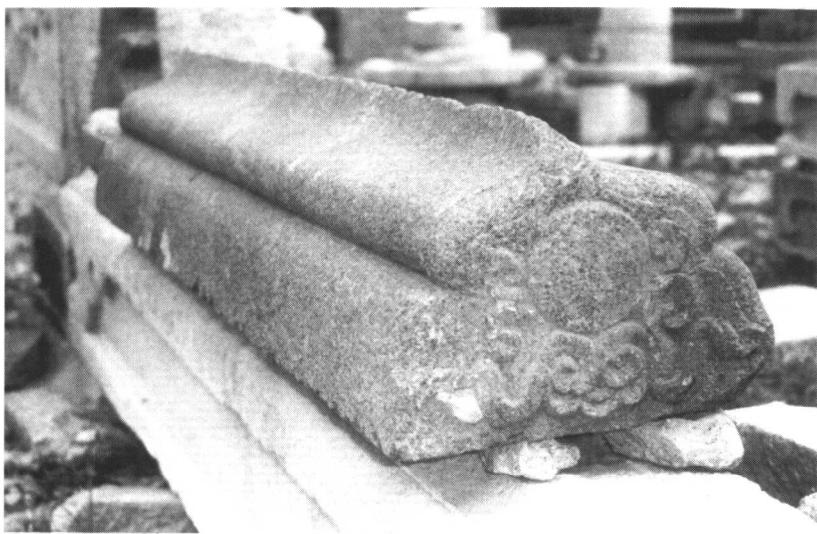
这是一方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残长 58 厘米，底宽 28 厘米，高 2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正面刻成尖拱形，中间浮刻“云月”。现存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二，“泉州古基督教石刻”，第 43 页。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A 263

A 264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A 264

泉州宗教石刻

墓顶石长 163 厘米、底宽 32 厘米、高 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正面雕刻尖拱形，中间浮刻“云月”，背面素平。系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现存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

A 265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残长 53 厘米、底宽 27 厘米、高 28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正面浮雕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系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现存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



A 265

A 266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残长 54.3 厘米、底宽 24.5 厘米、高 27.3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系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正面素平。现存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



A 266

十三、泉州津淮街拓改工程出土的须弥座式石墓

A 267、A268、A269 三幅照片,是 1998 年 9 月泉州津淮路拓改工程铺设地下排水管道时,出土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现场。石墓叠压在一起,多一字排开。这是为什么呢?那就要了解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的历史。

古代,泉州城南通后渚海港有两条陆上通道。其一,是从现存宋元时期的伊斯兰教清净寺所在地通淮街(俗称涂门街)向东,出通淮门(古城门),即到城郊津头铺(津头铺大路两旁宋元时为外国人墓葬区,明代嘉靖间李贽祖母、伊斯兰教徒铁贞勤,即葬于出通淮门五十武地方)。大路由津头铺向东南延伸,经登洲、河溪、沙墩、院前、法石等地,最后抵达后渚海港。此路全长 9 公里。

其二,出泉州南门城德济门,沿晋江与城墙间有一条通道,向东北方向到达车桥头(番舶聚汇之处),沿城墙根向东北方向接通淮门,汇入通淮门到后渚港的大道。

从通淮门至法石这段路程足有 3 公里,古为海滩冲积地,全是烂泥,道路屡修屡沉入烂泥中。乡民筑路和建池塘,往往用外国伊斯兰教徒须弥座式石墓作为护坡和池岸砌筑材料。本书 A 238 至 A 241 图的照片,就是津头铺的乡民以须弥座式石墓作为一座小寺庙的基础使用。一座小寺庙就使用了十多座须弥座式石墓。

吴文良记津头铺,云:“津头铺区。这里又可再分为二小区。一区在街道内……另一区是在街道以外的铺尾乡,在这里有三口池塘,冬天池水干涸时,可以看到三十多座石墓横卧在池内及池畔。其中一座搁在一株大榕树根上的,最为完整。”^①1998 年,泉州旧城改造,拓建通淮门外津淮路,在铺设地下水管工地上,于地下 3 米深处,出土 26 座须弥座式石墓,出土的地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 41 页。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

点,正是吴文良先生记录的池塘的地方。不了解历史背景的人,那时还以为是考古的重大发现呢,一时间新闻报道沸沸扬扬。

此外,还有一方清末陈步蟾《重修温陵南涂二关外路桥碑记》(在郡城南涂二关外),亦可以解释津头埔乡出土那么多须弥座式石墓的原因。碑文云:

畴众苦斯途泥淖久矣。当泽雨酿膏,原田洋溢,沟浍洼盈,桥梁倾欹,舆者为之息肩,步者为之裹足,凛乎若临深履薄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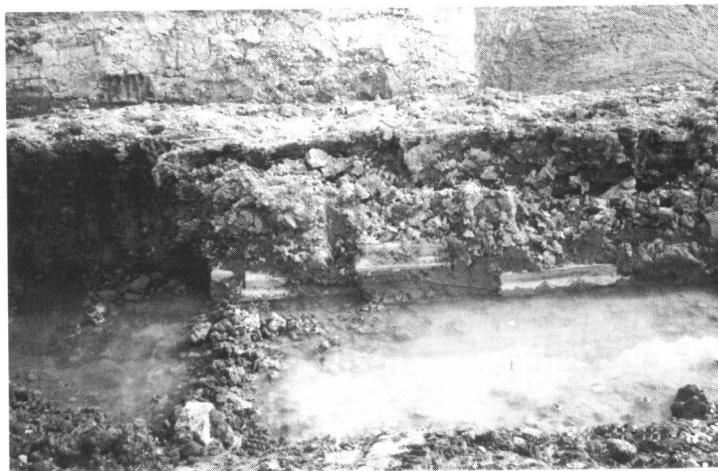
郡中乐善好施诸君子,自省会以抵厦(门)漳(州),旁通安平,窄隘险巇,倡捐修筑,既易危而为安。独此南关车桥以通法石孔道,犹抱憾事,毋乃难者易,易者难欤!孔子曰:凡义不为,是为无勇。诸君子勇矣哉!一喏同声,共襄义举。浃辰得白金两千,购石于山,召工于肆,修之平之,为墩为牮,如其途之曲直而踣之。

长五里,宽五尺有奇,坦平如砥。造桥四,翼以扶栏,曰登洲,曰河溪,曰沙墩,曰院前。建路亭一,可避风雨,可苏疲惫,往来行人心焉德之。

经始于同治壬申六月,越癸酉八月告竣。前捐者郡补道黄君贻檀,浙江候补府何君鸿文、陈君祥,都转陈君怀德、贡生黄君思元,督工贡生方君硕声,监生陈君文波。乐捐者芳名泐石,共垂不朽也。是为记。同治甲戌(公元 1874 年)立石。^①

这方修路桥石碑正是竖于泉州通淮门外、上述两条通往后渚港道路的接合处,也是吴文良所记的有“三十多座石墓横卧在池内及池畔”的地方,图中所示 1998 年 9 月泉州通淮门外发现 26 座须弥座式石墓的地方。总之,津头埔出土的叠压一起的须弥座式石墓,多是作为道路护坡而被埋入地下的。

A 267 通淮门外津头埔的须弥座式石墓



A 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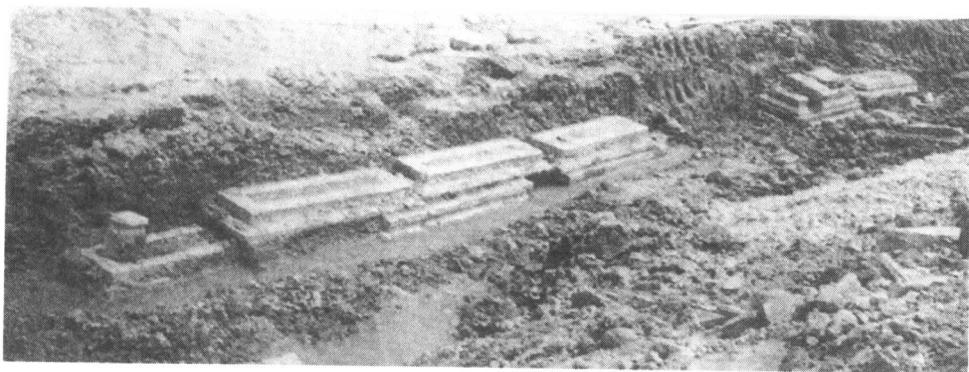
^① 陈步蟾《重修温陵南涂二关外路桥碑记》,载陈国仕《丰州集稿》下册,卷十,《碑记》。南安县志编纂委员会编,1992 年 10 月出版。

A 268 通淮门外津头埔的须弥座式石墓



A 268

A 269 通淮门外津头埔的须弥座式石墓



A 269

十四、石狮市博物馆保存的须弥座式石墓

A 270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四层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残件，断毁近半，墓顶石散失。底层作如意状六

足雕刻,第二、三层素平,仅第三层正面方框里的两侧浮刻如意状图案。由整块白花岗岩石雕成,中心凿空。现存石狮市博物馆。



A 270

A 271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三层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底层雕如意状六足,第二层刻斜面,第三层为尖拱形墓顶石。后面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由整块白花岗岩石雕成,实心。石墓长约1.30米左右,可能墓主为少年儿童。现存石狮市博物馆。

图为石墓的正面,墓顶石浮雕一朵花,有叶片衬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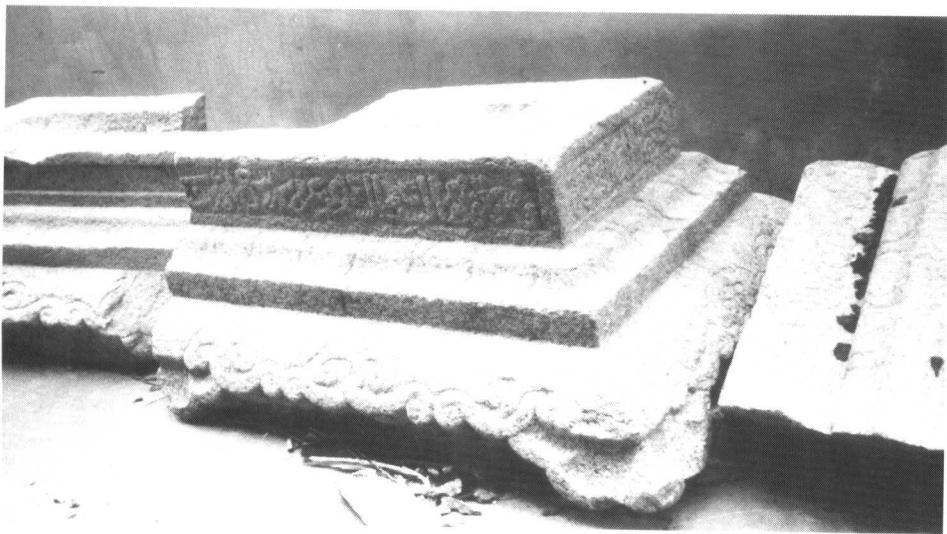


A 271.1



A 271.2

A 272 须弥座式石墓



A 272

这是一座四层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残段。石墓大半已毁。底层雕如意状六足，第二层浮刻覆莲瓣，第三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由整块白花岗石雕成，中心凿空。墓顶石散失，照片上右侧为另一座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残件，第三层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亦由白花岗石

雕成。现存石狮市博物馆。

A 273 须弥座式石墓



A 273

这是一座四层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底层刻如意状六足，第二、三层无雕饰图案，墓顶石散失。由整块白花岗石雕成。现存石狮市博物馆。

十五、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保存的须弥座式 石墓和寺内考古发掘现场

A 274 通淮街清净寺保存的须弥座式石墓群

泉州通淮街，俗称涂门街，古代别称“半蒲街”，是因为有许多阿拉伯人居住的缘故。宋元时期，这里是“蕃坊”所在地，有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归真后，就埋葬于“自己的家园中”^①。20世纪50年代，在通淮街讲武巷口临街某姓民房的地下，曾发现一列三座须弥座式石墓。

1995～1998年，泉州通淮街进行拓改加宽，从地下出土许多座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福建省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住持哈只·黄秋润，细心收集工地出土的宋元时期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图为收集于清净寺内的七座石墓和石墓残件。这七座石墓皆白花岗岩石雕成，中心凿空。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泉州古代外国人石墓及其分布区域概况”，第41页。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A 274

前排左起第一座石墓，仅保存二层，为一块岩石琢成，底层右侧如意状足损坏，二层浮刻图案花纹；第二座为四层须弥座式石墓，由一块岩石凿成，底层如意状六足保存完整，第三层正面方框内浮刻如意状头。这座石墓上叠置另一座三层须弥座式儿童石墓；右侧一座石墓正面右侧如意状足损坏，二、三层无雕花纹。

第二排左起第一座须弥座式石墓，底层雕如意状六足，第二层浮雕图案花纹，第三层浮雕覆莲瓣，由一块岩石雕成，四层散失；第二座为五层须弥座式石墓，下四层由一块花岗岩石雕成，除底层雕如意状六足外，其他各层无雕刻，墓顶石散失；第三座为四层石墓，底层雕如意状六足，余二层未雕刻花纹，墓顶石散失。

A 275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南墙基址清理出的石柱和础石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创建时间，学者经过长期的争论，各执己见，莫衷一是。为了解寺的创建时间和更好地保护这座寺，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接受国家文物局专家杜仙洲的建议，曾于 1959 年沿礼拜大厅的西墙，开挖一条探沟，出土了一些明代印花瓦当和印花墙体饰砖。1979 年，泉州市文管会又进行第



A 275



A 276

二次小规模发掘。

1987年元月,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黄景略处长来福建,与省、市有关领导研究发掘泉州清净寺礼拜大厅基址的事宜。确定由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等单位,共同组成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基址考古发掘工作队,自2月28日起,发掘了五个5米×5米的探方。

图为礼拜大厅南墙(临街石墙)基址揭露的情况。石柱高1.22米、直径0.46米;础石边长分别为0.60米、0.62米,厚0.14米,探方底距地面1.62米。沿南墙基础有三根这样的石柱一字排开,间距3.74米至3.96米。石柱与石础,可能是元代的建筑构件。

A 276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西墙基址 清理出的墙基础和铺地砖

图中的铺地砖可能属于元代建筑,距地表1.60米。墙体基础有六层,基础石伸出墙面12至2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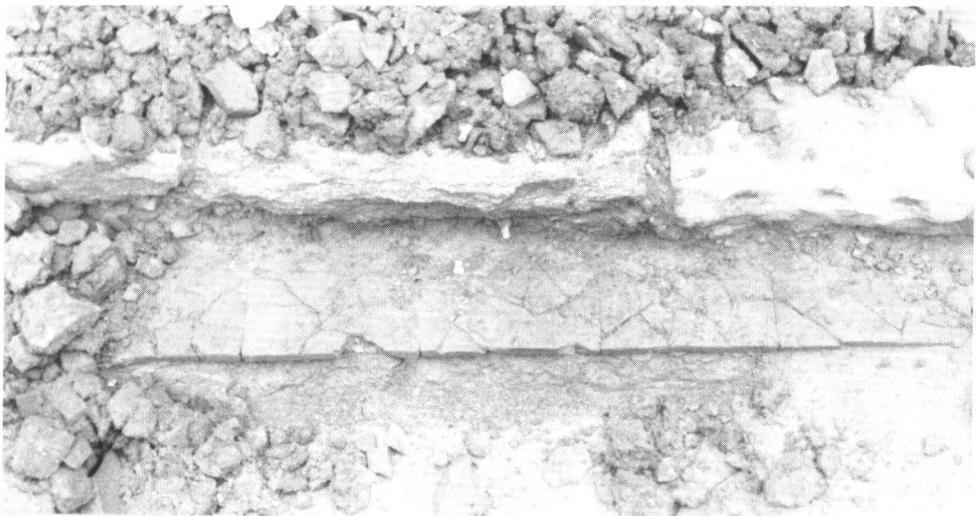
A 277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西南角清理出的墙基础、排水沟和铺地砖



A 277

礼拜大厅南墙与西墙结合部地下 1.60 米深处揭露出的元代铺地砖、排水沟和墙基础。

A 278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西北角清理出的南宋铺地砖



A 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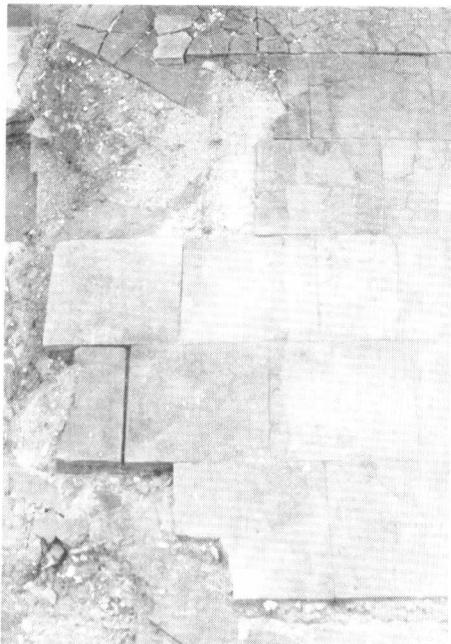
在礼拜大厅的西北角,发现一列南宋时的铺地砖。砖皆破碎而外形保存尚好。

A 279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南墙中部清理出的铺地砖

在 1.60 米深处发现的这层元代铺地砖,面积较大,保存也较好,有的砖完好无损。

A 280 通淮街清净寺礼拜大厅清理出的磉墩

据李光缙撰文《重修清净寺碑记》云:“正西之座曰奉天坛,中圜象太极……柱十有二,象十二月。”^①这些巨大的磉墩均由花岗岩石块叠成,底层距地表 2.10 米。地面还保存数个浮雕花纹图案的柱础石,直径都有 50 厘米。这些大磉墩应就是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 1609 年)李光缙《重修清净寺碑记》里所记的十二根柱子的柱础。



A 279

^① 明万历三十七年,李光缙《重修清净寺碑记》,竖于清净寺内大门进口甬道后的东侧亭子里。(见本书 18 页)



A 280

十六、新增古伊斯兰教清净寺石墓和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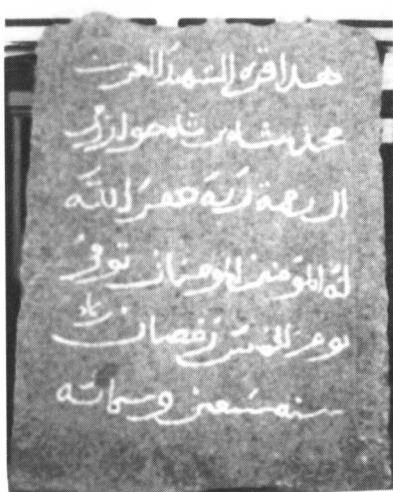
A 281 花刺子模人穆罕默德墓碑

1983年夏,清理清净寺《明善堂》附属建筑北屋地面时掘获。辉绿岩石琢成。碑顶尖拱部分破损,碑残高54厘米、宽39厘米、厚12.2厘米。碑面磨光,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363页)。译文记“卒于(回历)707年”(即元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但据宁夏王耀东阿訇翻译,译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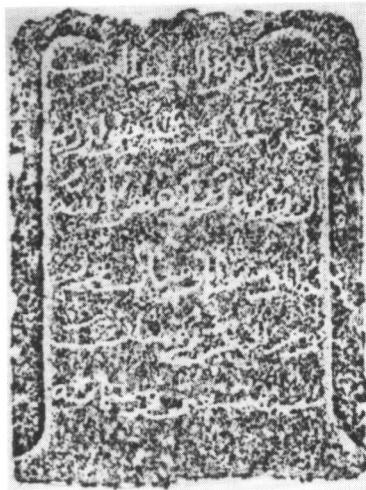
这是华惹慈姆汗·本·异乡烈士穆罕默德汗的墓,愿主饶恕他和穆民男女们,他在
穆历670年斋月星期四逝世。^①

穆历670年,即南宋度宗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正当元军攻陷泉州的前六年。“汗”

^①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年第6期。



A 281



A 281 拓片

(Khan),为阿拉伯语贵族的意思,这里的“汗”,是墓主的身份。华惹慈姆,即中亚阿姆河下游古国花刺子模(Khorasm 或 Khwarizm),地处咸海南部今中亚基发一带。《新唐书》称为货利习弥^①。宋朝时,突厥族建国于此,曾为塞尔柱(Seljiks)王朝之藩属。后塞尔柱王朝被西辽耶律大石所破,花刺子模乘机灭之,且并吞波斯之地,势甚强盛。其后,更灭西辽及阿富汗郭耳王朝。1219年,蒙古西征,成吉思汗一举摧毁穆斯林的花刺子模王国。

据《多桑蒙古史》记,“八世纪初,地属哈里法,遂奉回教。蒙古来侵时,波斯人与阿拉伯人之城居者为数不少”^②。《元史》称其为回回国,《元史·西北地附录》作花刺子模。14世纪末被帖木儿征服,16世纪初属乌兹别克,1873年并于俄国。

墓主穆罕默德汗,是一位花刺子模国的贵族,他在南宋末年,可能通过波斯航海来泉州贸易,而卒葬泉州。本墓碑是泉州发现的有纪年的最早的花刺子模人的墓碑。

A 282 瓮蛮人阿卜杜拉墓碑

1984年5月,在泉州通淮街清净寺门楼东边(原祝圣亭地方)迁移居民拆屋时发现。碑高59厘米、宽32.7厘米、厚9厘米。花岗岩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碑面较粗糙,下部被火熏黑。碑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六行(见本书第363页)。译文记卒“于(回历)760年”(即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但据宁夏王耀东阿訇翻译,译文是:

万物皆朽,真主永存,主掌判决,尔等复归宿于他^③。

马立克子阿卜杜拉·哈曼烈士墓,在(回历)743年九月六日。^④

① 《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一下,西域下。

② 《多桑蒙古史》第一卷,第七章,第143页,万有文库本。

③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蜘蛛》,第88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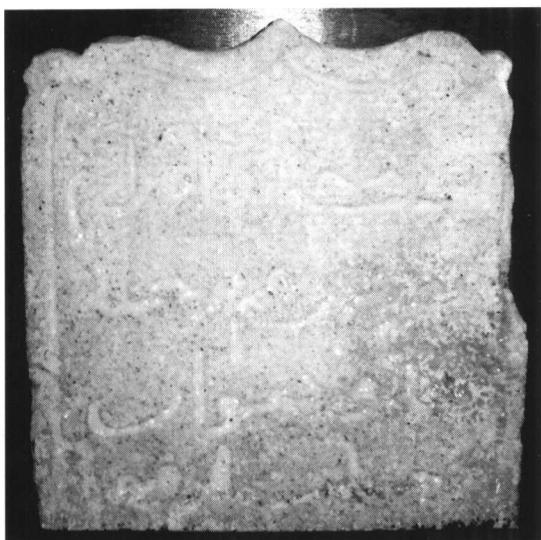
④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年第6期。



A 282



A 282 拓片



A 283

回历 743 年，即元顺帝至正二年，公元 1342 年。瓮蛮，今称阿曼 (Oman)，在阿拉伯半岛东南，位于波斯湾和阿拉伯海间，是伊斯兰教国家。《诸蕃志》有瓮蛮国专条，记“地主缠头，缴缦不衣，跣足……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马，极蕃庶。他国貿販唯买马与真珠及千年枣。用丁香、豆蔻、脑子等为货”^①。《诸蕃志·大食国》记大食国的属国，其中有“瓮篱”。 “瓮篱”应为“瓮蛮”之误。

A 283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作尖拱形，下半部分损毁，右侧边框受损，碑面阴刻四行阿拉伯文字。碑残高 60 厘米、宽 52 厘米、厚 10 厘米。花岗岩

石雕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① 冯承均《诸蕃志校注》卷上，瓮蛮条和大食国条。1956 年，中华书局出版。

A 284 陈埭回族丁氏四世祖墓碑

墓碑为花岗岩石雕成。长 197 厘米，宽 50 厘米，厚 15 厘米。碑上正面阴刻：

仁庵处士丁公
淑懿孺人庄氏
墓

碑顶阴刻两行大部分错写的阿拉伯文字。
碑背面阴刻：

鹿园名山，我贤所置；葬我父母，
出自己意；上兄下弟，乐从无贰；植被
丹荔，永为荫庇；示我儿孙，保此重器。
诚斋叔志。宣统二年八月。^①

查《陈埭回族丁氏宗谱》，“善，字彦仁，号仁庵。生于元至正三年（公元 1343 年）……卒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 1420 年）……妣庄氏，名细娘，字闺秀，谥淑懿，生于元至正四年（公元 1344 年）……卒于明宣德九年（公元 1434 年）……合葬在晋江东门外三十七都鹿园……徙居陈江自公始。”^②

从族谱记载得知，丁仁庵为徙居陈埭丁氏的始祖。据《陈埭回族丁氏宗谱·墓纪》载，“鹿园名山，我诚祖于明洪武、永乐年间买诸潘家……安葬四世祖仁庵公及淑懿妣。”^③则知鹿园为陈埭回族丁氏的墓葬地。此照片摄于 1979 年冬，地点在灵山圣墓道旁。时丁氏祖墓由鹿园迁灵山圣墓。

A 285 哈只·阿卜杜拉墓碑

碑石残高 41 厘米、残宽 24 厘米、厚 7.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正面的上部与右侧全损毁，仅存三行不完整的阴刻阿拉伯文字（见本书第 363 页）。不完全的译文是死“于回历 702 年”（即元大德六年，公元 1302 年）。但据宁夏王耀东阿訇的翻译，译文是“这是哈只·阿卜杜拉的墓。愿真主慈悯亡人，他已经到达真主的慈爱了。”碑的背面亦有三行阴刻的阿拉伯文字。据王耀东阿訇说这三行字书写拙劣，与碑正面的阿文书写技巧悬殊极大，勉强认读，加上



A 284

① 《陈埭回族丁氏宗谱》卷三，传记、行状，第 62 页，1996 年出版。

② 《陈埭回族丁氏宗谱》卷十一，世系、谱图，庄景辉编校，1996 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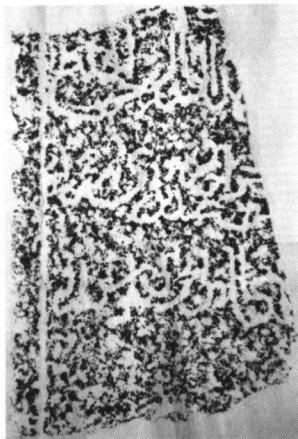
③ 《陈埭回族丁氏宗谱》卷五，墓纪，乾隆二十六年《重修鹿园祖茔纪略》，第 141 页。1996 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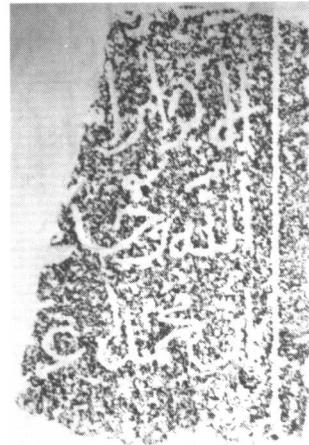
A 285.1 墓碑正面



A 285.2 墓碑背面



A 285.1 拓片



A 285.2 拓片



A 286

猜测,其译文是“承认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独一无二,穆罕默德是仆人又是使者。”这是伊斯兰教的信条。该墓碑 1987 年发现,现保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286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石的右上和右下部分皆残缺,碑残存 4 行浅刻古阿拉伯文字,模糊不清。残高 45 厘米,残宽 22 厘米,厚 10 厘米。花岗岩石雕成。背面粗糙,未刻文字。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室外草坪。

A 287 古伊斯兰教墓碑

这是一方小型伊斯兰教徒墓碑，碑顶作尖拱状，碑面阴刻两行古阿拉伯文字，但都已漫漶，不能认读，只能勉强看到字的痕迹。碑石长42厘米、宽26厘米、厚9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背面无雕刻。碑石发现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村，为乡民用作门外石阶。1985年，泉州第五中学历史教师翁铭镇收集家中。是年，捐赠泉州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现存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

A 288 古伊斯兰教墓碑

墓碑系花岗岩石琢成。碑残高39厘米、宽65厘米、厚11.5厘米。碑的尖拱顶被琢平，碑的下部大都残断。碑面较粗糙，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两行，笔画粗大。1983年夏，从泉州清净寺明善堂大门口庭院北侧地下掘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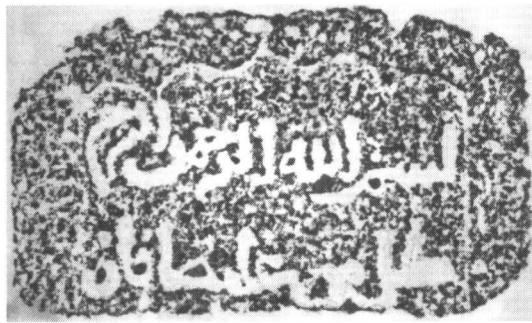
据宁夏王耀东阿訇认读，阿拉伯文的译文是“奉大仁大慈的主名，世界上的人都要死亡的”。



A 287



A 2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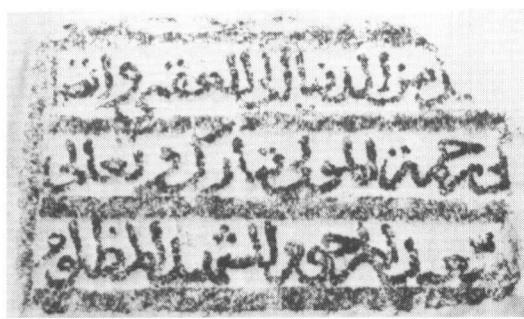
A 288 拓片

A 289 古伊斯兰教墓碑

墓碑的上、下及右侧皆残断，碑面刻四条横格线，中间浮刻三行古阿拉伯文字。碑残高26.6厘米、残宽41.4厘米、厚7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背面未刻文字。该碑系1997年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时，从地下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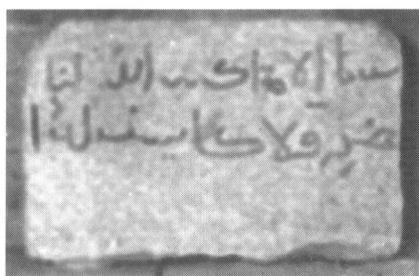


A 289



A 289 拓片

A 290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290



A 290 拓片

墓碑系花岗岩石雕成。碑的上部和左、右均被琢毁。碑残高 37 厘米、残宽 55.5 厘米、厚 11.5 厘米。阴刻两行古阿拉伯文字，但因石块风化严重，碑面很粗糙，字迹模糊，难以认读成句。1983 年夏，从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附属建筑南屋楼梯处地下出土。

A 291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2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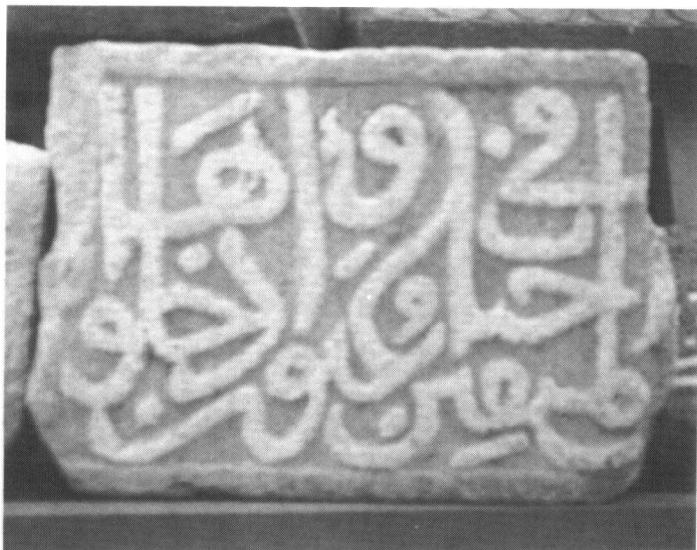


A 291 拓片

碑的上、左、下皆残断，碑面浮雕三行古阿拉伯文字。碑残高 36 厘米、残宽 26.5 厘米、厚 7 厘米。碑背素平，辉绿岩石雕成。1997 年，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时地下出土。

A 292 古伊斯兰教墓碑

碑石用花岗岩石雕成。残长 53 厘米，高 38 厘米，厚 12 厘米。碑的左、右皆残断。碑面浮刻古阿拉伯文字。1997 年，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时从地下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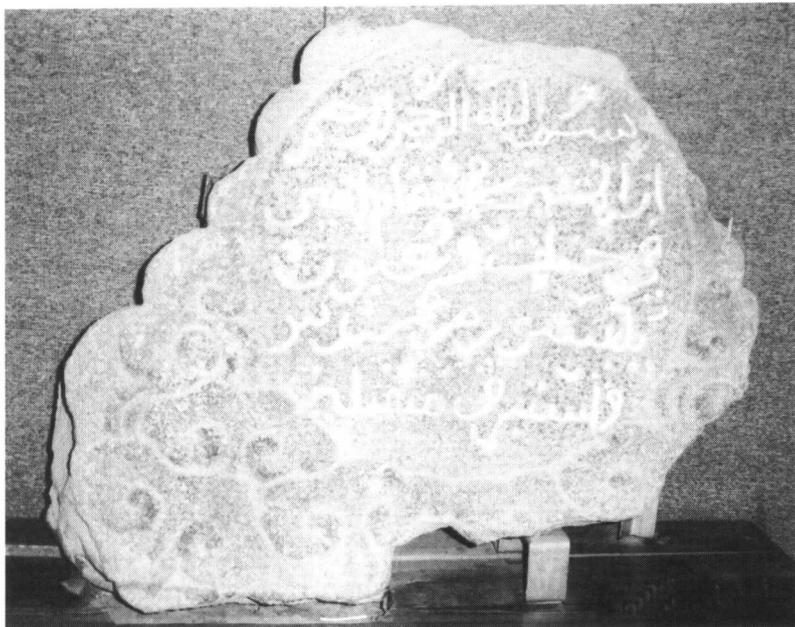


A 292



A 292 拓片

A 293 古伊斯兰教墓碑



A 2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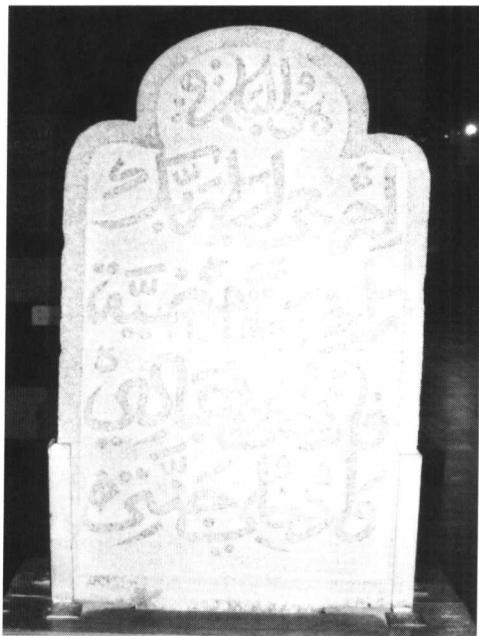
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墓碑。墓碑的原状应是平顶，两边各刻有五个连续弯弧，碑面刻密云和一轮大圆月，月轮中阴刻六行古阿拉伯文字。碑底部正中透雕一个尖拱形窗。但碑石右下云朵雕刻大部分已残缺，幸好圆月及古阿拉伯文字保存完好。碑残高 53 厘米、残宽 66 厘米、厚 13 厘米。20 世纪 80 年代，华侨大学叶道义先生收藏保存，不久捐献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碑由辉绿岩石雕成。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王耀东阿訇翻译，译文是：

奉大仁大慈的真主的尊名启：
敬畏者必定住在安全的地方——住在乐园之中，又临泉水之滨，穿着绫罗绸缎，相向而坐。^①

A 294 古伊斯兰教墓碑

这是须弥座式石墓的墓碑。高 73 厘米，宽 37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此碑形状有别于其他同类墓碑，碑顶作半圆形，碑下有榫。正面浮刻五行古阿拉伯文字，系《古兰经》第八十九章第二十八节至三十节。碑背的圆顶下浮刻如意状头，下浮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内容是“不要崇拜安拉以外者”。该碑于 1973 年在泉州城北清理护城河时出土，现保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① 《古兰经》四十四章《烟雾》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节全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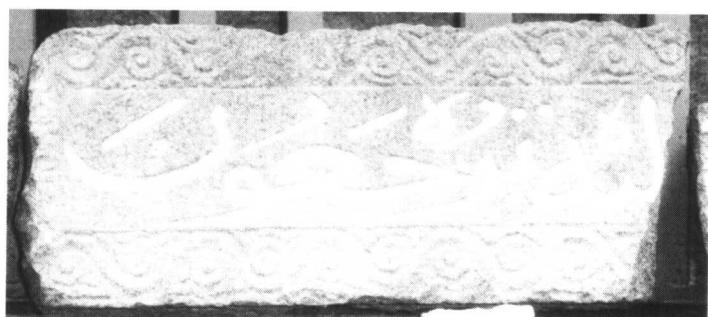


A 294.1 墓碑正面



A 294.2 墓碑背面

A 295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A 295



A 295 拓片



A 296

这是一方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的挡垛石。垛石左方边框花纹图案受损,右邊残断。石面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辉绿岩石琢成。高 24 厘米, 残长 54 厘米, 厚 9 厘米。1997 年, 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重修时从地下出土。

A 296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这是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墓的垛石。辉绿岩石雕成。残长 50.5 厘米, 高 24.5 厘米。上下边框浮刻连续图案, 石面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 两端皆残缺。墓石砌于清净寺进口大门门顶望月台南面堞雉下正中的一个小壁龛里。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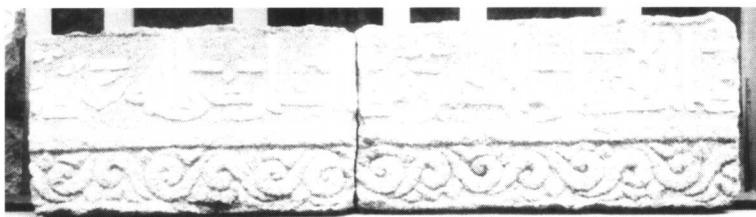
宁夏王耀东阿訇翻译, 译文是:“主掌握判决, 你们将复归于主”, 系《古兰经》第二十八章《故事》第七十节。



A 296 拓片

A 297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这是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辉绿岩石雕成。垛石的上部和左右皆残缺, 中间又断裂。碑下边浮雕连续卷云纹图案, 石面浮雕大楷体和图案体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63 页)。



A 2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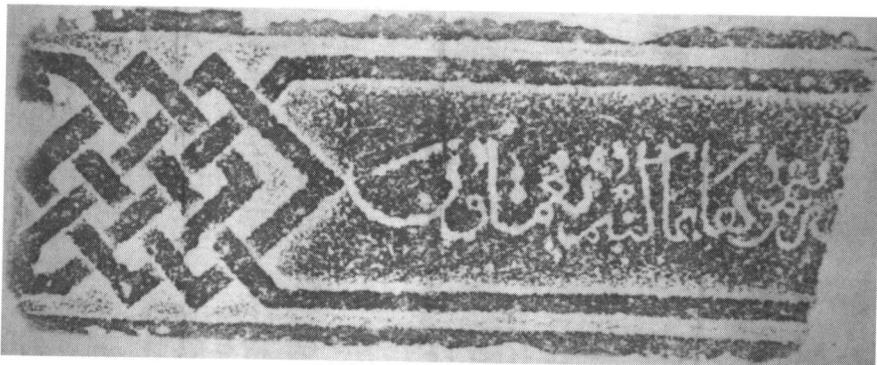


A 297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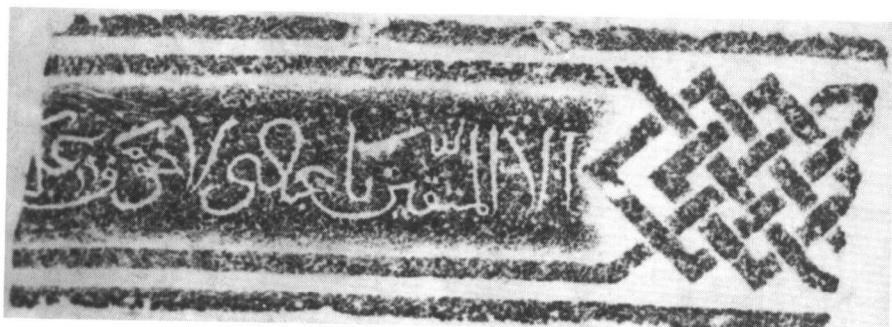
残长 77.8 厘米, 残高 21.8 厘米, 厚 11 厘米。残断后, 左边的一块, 原砌于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前门廊北墙高 2.45 米处, 1983 年夏卸下; 右边一块, 1983 年自明善堂门外院子里北侧地下掘出。据宁夏王耀东阿訇翻译, 译文是“就是他们在其中永生, 河流萦绕于其下的伊甸乐园, 真主因他们的服从而喜悦他们, 他们也满足主的赏赐。”这是《古兰经》第九十八章《明证》第七节。

A 298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图 A298. 1 是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垛石的左半段, 辉绿岩石雕成, 其右端残断。左端浮刻中国式的八吉图案, 石面阴刻不规范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64 页), 残长



A 298. 1 墓垛石左段拓片



A 298. 2 拓片



A 298.2 塚石右段

67.5 厘米,高 27 厘米,厚 9 厘米。1957 年,在泉州通淮街清净寺内乱石堆中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图 A298.2 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塚石的右半段,辉绿岩石雕成,两端均残断,残长 72.3 厘米,高 27 厘米,厚 9.5 厘米。石面磨光,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 364 页),右端浮雕八吉图案。因阿拉伯文字书写不规范,难以认读成句。

此墓石系 1984 年春王爱琛先生在泉州后城隐居桥巷口(即通淮街)附近筑屋时出土,捐赠清净寺陈列。类似这种图案雕刻的墓碑,已故《泉州宗教石刻》的作者吴文良先生的遗孀,曾于 1972 年第三次捐赠一批古代泉州宗教石刻给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其中有一方左边浮雕八吉图案的伊斯兰教碑(即 A298.1),右边也阴刻不规范的阿拉伯文字。经对实物测量,二石的高度、厚度、阿拉伯文字的字体和八吉图案完全一致,且断裂处吻合,证实是同一墓石的左右两段,因被人为断为二块而失散,今二石均被发现,实是幸事。

A 299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这是一方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的塚石。两端有间柱,周边浮刻连续卷曲图案,碑面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碑长 72 厘米、高 27 厘米、厚 8.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现存石狮市博物馆。



A 299

A 300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300



A 300 拓片

这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垛石，残长39厘米，高25厘米，厚13厘米。辉绿岩石雕成，两端皆残缺。石面的上、下有浮雕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此石砌于泉州师范专科学校附近的顶埔洪氏家大门墙上。1985年，洪氏整修房屋卸下，赠送泉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现存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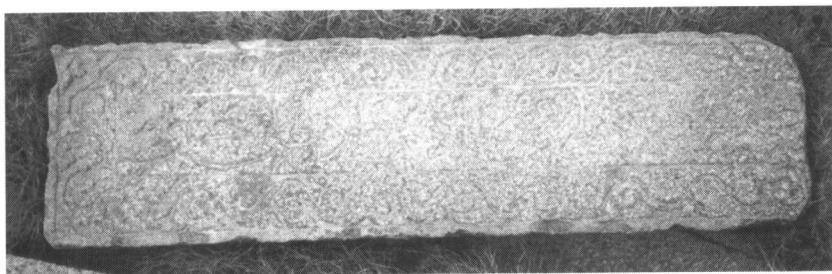
A 301 布哈拉人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残长53.6厘米、高22厘米、厚13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左、右皆残断。碑的上、下浮刻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这是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垛石。1959年，在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乱石堆中发现。1964年，移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



A 301

A 302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302

垛石残长 83 厘米、高 2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端残缺。左侧和上、下均浮刻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03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303

垛石残长 54 厘米、高 2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边残断。上、下和左侧浮刻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中上部的图案和阿拉伯文字部分受损。这是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垛石。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304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 304



A 304 拓片

垛石残长 53.5 厘米、高 23 厘米,左侧边框部分受损。上、下浮刻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墓石的右侧残断,辉绿岩石雕成。1954 年于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305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残长 49 厘米、高 24 厘米、厚 13.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侧残缺。边框浮刻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此石原砌于泉州城内东北角顶埔洪姓家的后墙上,系抗日战争胜利后,洪姓为筑屋购买城基础石所得。1985 年,洪姓重修房屋,把石碑赠送泉州师范专科学校历史系。现存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



A 305



A 305 拓片

A 306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堵石两端皆残缺,石面上、下均浮刻连续图案、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此石残长53.5厘米、高23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306

A 307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这是一方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垛石，两端皆残缺，石面上、下浮刻边框，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笔画粗大。此石残长46.5厘米、高21.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07

A 308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这应是一方伊斯兰教“拱拜尔”式陵墓的门楣石。碑的左边已残缺，右侧浮刻的折枝牡丹花和边框受损。石面上下有浮雕的边框，中间浮刻一行大写楷体古阿拉伯文字。残长57厘



A 308

泉州宗教石刻

米,高 43 厘米,厚 15 厘米。花岗岩石雕成。此石原铺于泉州涂关门(通淮门)外津头浦乡街道南侧的晒谷场上,1978 年 6 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收回保存。

A 309 古伊斯兰教“拱拜尔”陵墓门楣石



A 309

墓石的左、右皆残缺,石面上、下浮刻边框,中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残长 53 厘米,高 33.5 厘米。白花岗岩石琢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10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 310



A 310 拓片

墓石残长 24 厘米、高 13 厘米、厚 3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左、右皆残断。石面上、下浮刻边框,中间浮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墓石的右侧面亦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即 A 311)。墓正面浮刻连续图案。据此推断,本墓石是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第三层或四层的残件。1997 年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明善堂时从地下出土,曾砌于泉州师范专科学校附近的顶浦洪氏家大门墙上。

A 311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残长 23 厘米、高 13 厘米、厚 3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是须弥座式石墓的侧面石刻，与 A 310 为同一须弥座式石墓的残件。左、上、下各有边框，中浮雕古阿拉伯文字一行，右端残缺。1997 年重修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时从地下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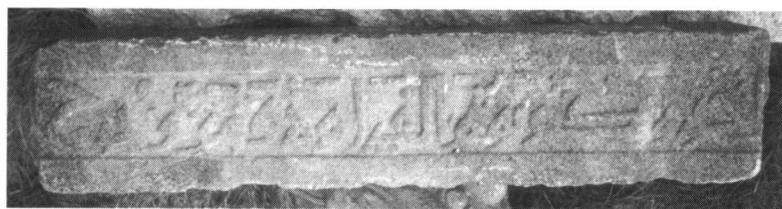


A 311



A 311 拓片

A 312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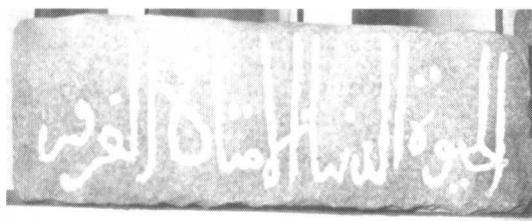


A 312

辉绿岩石雕成,左、右皆残断。残长 66.5 厘米,高 14.5 厘米。墓石上、下浮刻边框,中间浮雕一行图案体古阿拉伯文字。此系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313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长 33 厘米、高 10.6 厘米、厚 6.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这一构件为须弥座式石墓第四层的正面。石面磨光,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见本书第 364 页),石块的两侧亦阴刻阿拉伯文字。1983 年夏,从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附属建筑北屋地下掘出。据宁夏银川市王耀东阿訇认读,译文是“今世的生活无非是迷人的享受”,系《古兰经》第三章《仪姆兰的家属》,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



A 313



A 313 拓片

泉州地区发现的古阿拉伯人须弥座式石墓,多在第四层的四个面刻阿拉伯文字。这种须弥座式石墓主要受印度佛教雕刻艺术的影响,又掺杂希腊、罗马、大夏、安息、波斯之艺术特征融化而成。这类石墓就其外观看,仍保留有 4 世纪至 5 世纪印度西北之犍陀罗雕刻油撒孚择伊(Yusafzai)浮图的一些特征^①。

A 314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 314



A 314 拓片

① 史岩《东洋美术史》卷上,第九章。193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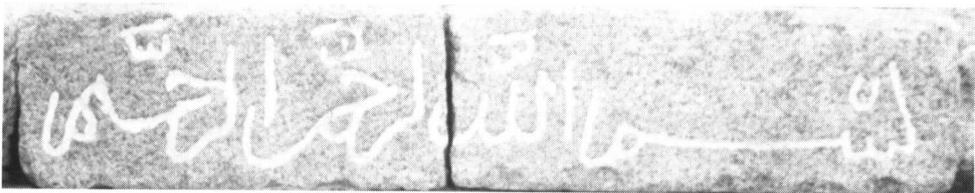
墓石残长 54 厘米、高 13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此石左边残断，石面阴刻一行阿拉伯文字，刻工粗糙，写得也很松散。1997 年，泉州通淮街清净寺明善堂重修时从地下出土。

A 315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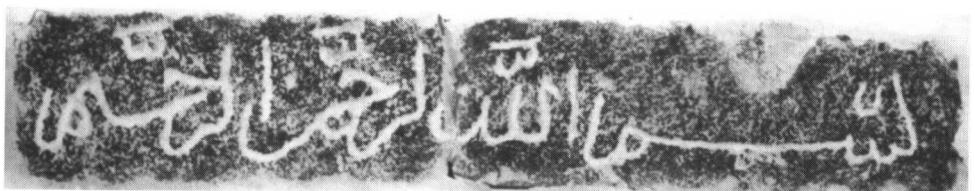
墓石残长 52.5 厘米、高 9.6 厘米、厚 11.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断裂为二。石面磨光，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墓石的两侧亦阴刻古阿拉伯文字，系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石面的古阿拉伯文字，据宁夏银川王耀东阿訇翻译，译文是：

奉着大仁大慈的真主的尊名启

1983 年夏，在明善堂附属建筑北屋西墙上卸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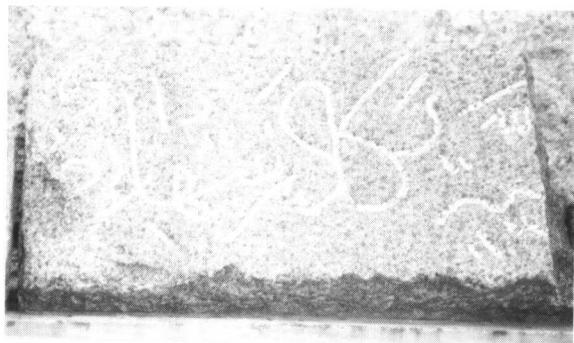
A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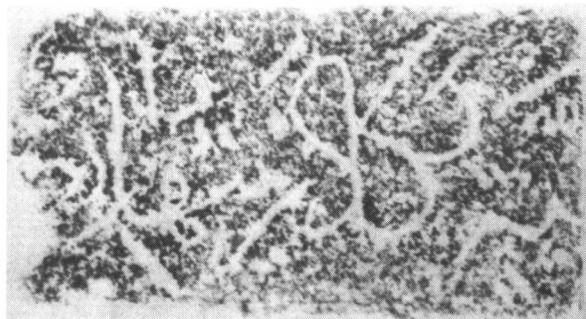
A 315 拓片

A 316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残长 30 厘米、高 16.2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左、右皆残断。石面磨平，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1997 年，重建清净寺明善堂时从地下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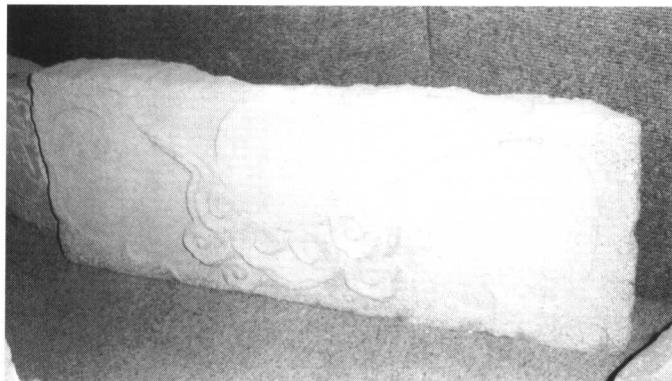


A 316



A 316 拓片

A 317 须弥座祭坛式墓堆石



A 317

这是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束腰处的主要挡垛石。垛石长 75 厘米、高 2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仿《营造法式》中的“梭身合晕”^①技法雕刻，但碑面正中浮刻“云月”，是“梭身合晕”雕刻艺术的一种变体，为泉州伊斯兰教石刻所仅见。

A 318 通淮街清净寺“真门”石刻



A 3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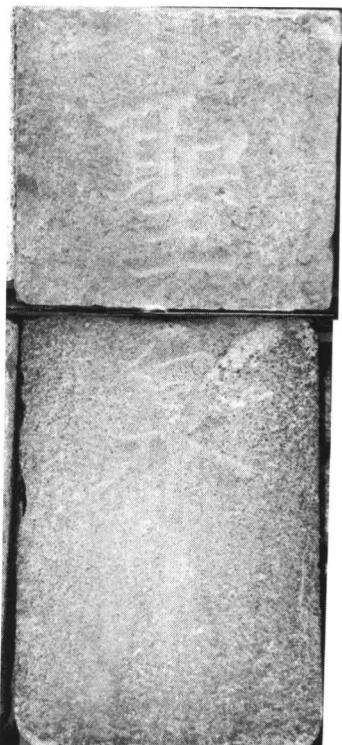
墓石系白花岗石雕成。长 81 厘米，高 27 厘米，厚 7.2 厘米。石面阴刻汉字“真门”两字，字径 13.7 厘米×22 厘米。1983 年夏，从寺内明善堂大门前外庭院地下出土。可能是通淮街清净寺内的门楣石，后倒塌而埋入地下。关于此石刻的报道，首次发表于 1986 年第 6 期《考古》杂志^②。

① 李诫《营造法式》，法式三十三，彩画作制度图样上，五彩杂华第一，梭身合晕。1929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吴幼雄、王耀东、黄秋润《福建泉州清净寺发现一批伊斯兰教碑》，载《考古》1986 年第 6 期，第 546 页。

A 319 通淮街清净寺“圣泉”石刻

这方“圣泉”石刻,是用两方古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字墓碑的背面改琢而成的。“圣”字即刻于本书中 A 70 的背面(字径25 厘米×18 厘米);“泉”字则刻于本书中 A 52 的背面(字径 27 厘米×18 厘米)。



A 319

此二方石刻皆于 1983 年夏从清净寺明善堂墙上卸下,可能是明清时期人们不谙阿拉伯文字,利用寺内收集的古伊斯兰教墓碑的背面改琢而成,并竖于寺内的水井旁。后来,可能有识之士认为不妥,于是砌在明善堂墙上,而以正面古阿拉伯文字朝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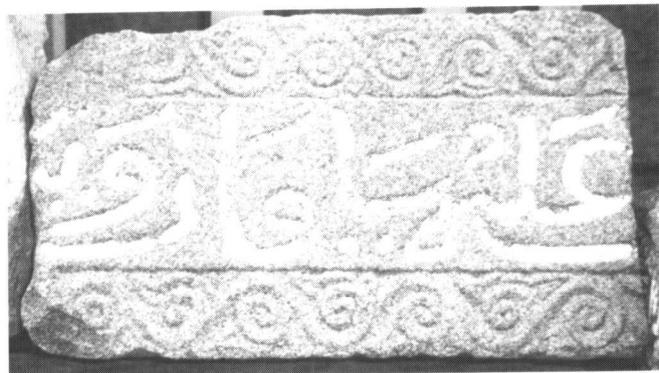
A 320

A 320 通淮街清净寺“蹑云”石刻

石刻高 80.7 厘米、宽 45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顶部原来可能雕成尖拱状,现存系琢平,底端残破。石刻自“云”字处断裂为二。石面浮刻汉字“蹑云”两字。1945 年于通淮街清净寺内石头堆里发现,可能是元、明朝代清净寺内尖塔(宣礼塔)上的遗物。

A 321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塚石残长 41 厘米、高 29.3 厘米、厚 9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面阴刻两条横线,上、下浮刻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笔画较粗大。1997 年重修清净寺明善堂时从地下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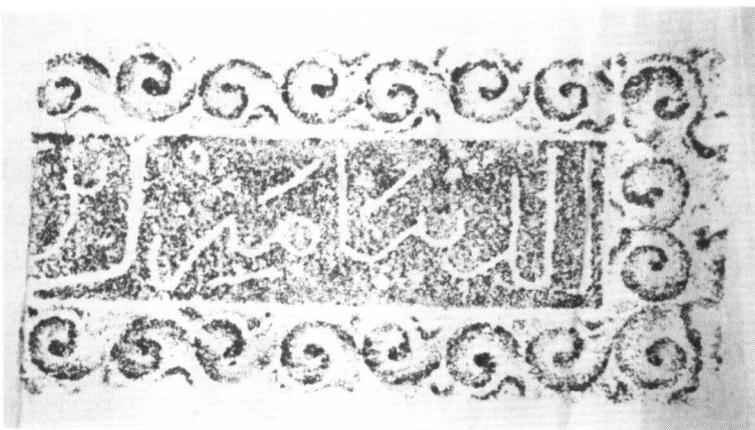


A 321



A 321 拓片

A 322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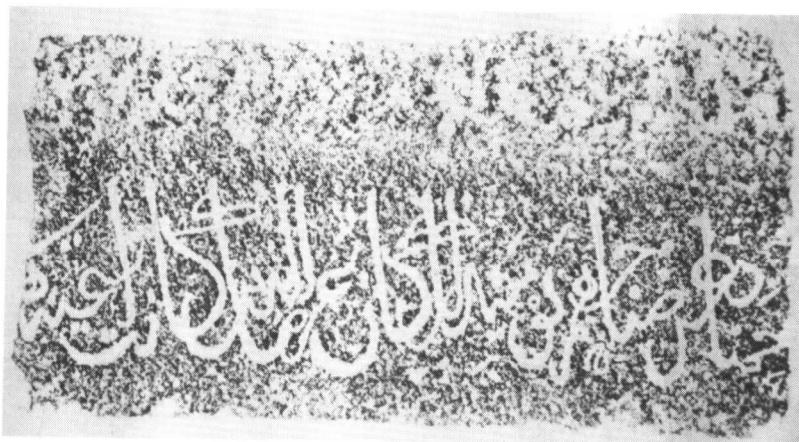


A 322 塚石拓片

块石左边残缺,残长48厘米,高24.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边框浮雕连续云纹图案,中间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1941年夏于东门城基础出土,后保存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因照片遗失,以拓本代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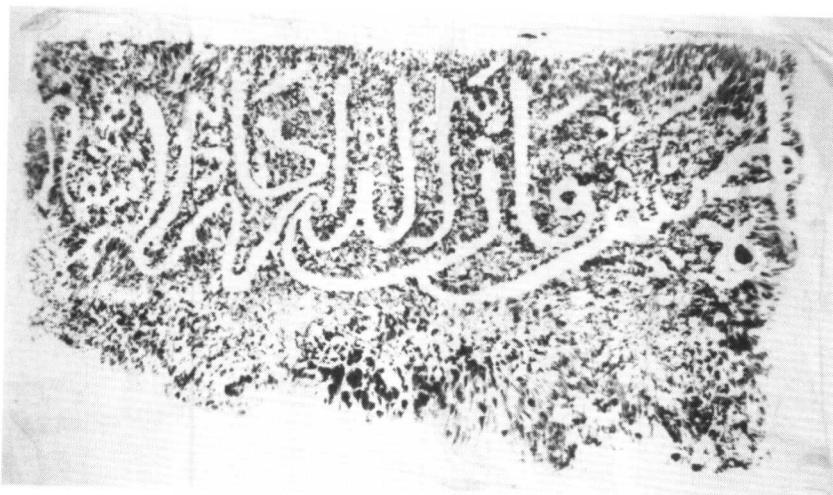
A 32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石的左、右皆残失,上部也被琢去,石面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残长46.8厘米,残高2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1949年于东门石匠店收购,后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因照片遗失,以拓本代之。



A 323 墓顶石拓片

A 324 古伊斯兰教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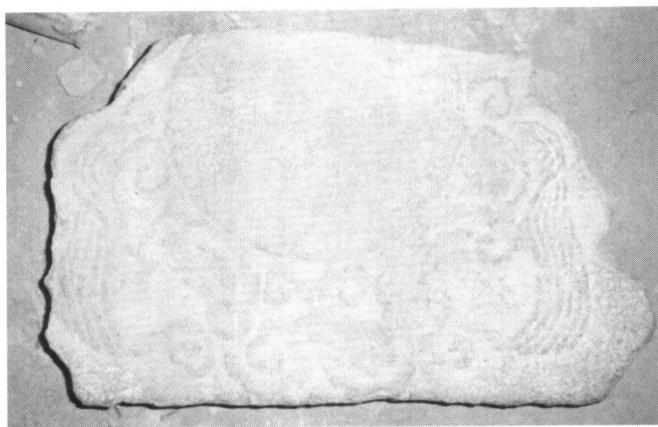
A 324 墓碑拓片

泉州宗教石刻

这方古伊斯兰教墓碑有些特别,它既不像须弥座式石墓构件,也不像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堵石。碑残长60厘米、残高31.5厘米、厚11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琢平,碑面阴刻一行古阿拉伯文字一行,碑的左、右皆残缺。碑的下部很粗糙,明显是被后人琢毁的。1948年,在泉州涂关门外津头铺乡发现,据乡民云,系从城墙基础出土。后移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因原照片遗失,以拓本代之。

A 325 古伊斯兰教“云月”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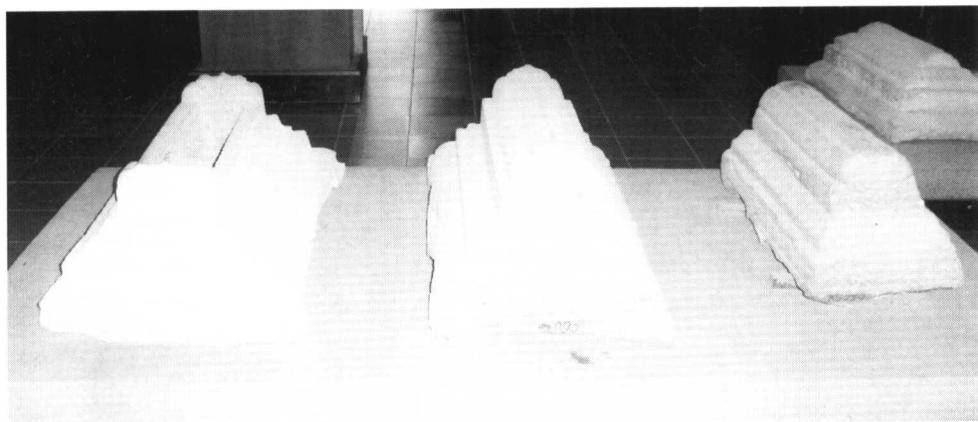
墓碑系辉绿岩石雕成。残长60厘米,残高37厘米,厚14厘米。碑顶缺失。碑面浮刻上涌云朵扶持一轮大圆月亮,为古伊斯兰教“云月”图案。墓碑现存泉州市博物馆。



A 325

A 326 须弥座式石墓

左起第一座须弥座式石墓有四层,为一石琢成。底层刻如意状六足,但正面如意状足部



A 326

分损坏；第二层无雕刻；第三层浮刻覆莲瓣；第四层比较特殊，正面、背面刻尖拱墓碑状，碑面浮刻四季花朵，而墓顶中心凿空。辉绿岩石雕成。

第二座是四层须弥座式石墓，为一石琢成，实心。底层雕如意状六足；第二层雕覆莲瓣；第三层浮雕古阿拉伯文字；第四层墓顶石雕成尖拱状，正面浮刻花卉。辉绿岩石雕成。

第三座系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二、三、四层，底层被破坏；第二层雕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雕刻覆莲瓣；第四层墓顶石作弯弧型，正面浮雕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由辉绿岩石一石雕成。

以上三座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均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327 须弥座式石墓及墓顶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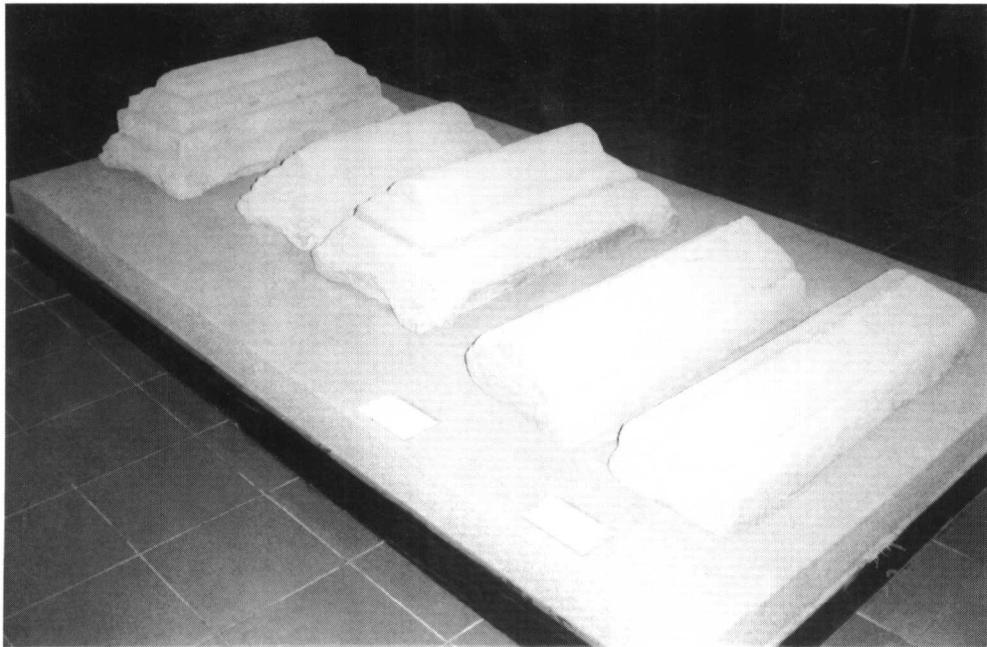
左起第一座系四层须弥座式石墓，由一整块花岗岩石雕成，实心，形制小，可能是儿童的石墓；底层雕如意状六足，第二层浮雕图案花纹，第三层浮刻覆莲瓣，顶层刻弧形。

第二座须弥座式石墓形制更小，亦分四层，由一整块花岗岩石雕成，实心，底层刻如意状六足，其他各层无雕刻，可能是儿童的石墓。

第三座须弥座式石墓，亦是由一块花岗岩雕成的四层石墓。底层雕如意状四足，但部分受破坏；第三层特别低，显得不匀称，刻工较粗糙。

以上三座须弥座式石墓，刻工简陋，形制小，可能都是儿童的石墓。

左起第四件系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作尖拱形，正面浮刻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但月亮的形象与通常所见的圆月不同，特别刻成“弯月”，堪称孤例。辉绿岩石雕成。



A 327

左起第五件是另一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辉绿岩雕成。墓顶石尖拱形，正面浮雕伊斯兰教标志“云月”。

以上三座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以及两块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均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 328 须弥座式石墓

图中近处的两座须弥座式石墓，皆为四层，花岗岩石雕成。左边一座底层刻如意状头六足；第二层浮刻覆莲瓣；第三层阴刻古阿拉伯文字。另一座底层刻如意状六足，第二、三层无花纹和文字。值得注意的是，两座须弥座式石墓上的墓顶石，均非原配，因而显得粗大，不成比例。左边第一座石墓上的墓顶石正面被雕成圆拱状的斜面，斜面部分被敲破。另一座石墓上的墓顶石正面则刻成转折圆弧的斜面。这种粗大、浑厚的墓顶石雕刻，较简朴而形制较大，可能是属于较早的时期，这两方墓顶石，现在保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由一块石头雕成而可以配置这两方巨大的墓顶石的须弥座式石墓，至今未曾在泉州发现过。1985年，泉州北门中山公园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大楼边挖地下防空洞，此地为唐、五代的墓葬区，俗称北山。除了在地下出土许多唐墓砖外，又出土大量花岗岩石块，其中有一方二层须弥座式墓石的残段，墓顶石与下一层石为一石雕成。正面刻尖顶，有边框，底宽约40厘米、高约35厘米，形制巨大。此石被放置于工地旁粮站的龙眼树下。此类巨大墓顶石，可能是较早时期的外国人须弥座式石墓的构件，对研究宋元以前阿拉伯人来泉州贸易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A 328

A 329 须弥座式石墓

图中近处是一座五层须弥座式石墓，下面四层为一石雕成，中心凿空。底层雕刻如意头状六足；第二、四层无雕刻纹饰；第三层刻覆莲瓣。墓顶石正面浮刻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但墓顶石与四层石墓不成比例，墓顶石显得过大，是混装组成的。现在保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右侧远处一座为须弥座式三层石墓，底层雕刻如意状六足，墓顶石作三段弧形，由一整块花岗岩石雕成，实心。



A 329

A 330 须弥座式石墓



A 330

泉州宗教石刻

图上中间是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上部三层，白花岗岩石雕成，中心凿空。墓顶石的巨大与石墓不成比例，可见也是临时混装的。墓顶石正面刻尖拱形，是属于较大型的墓顶石。石墓周围散乱的石块，系其他须弥座式石墓受破坏后的残件。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31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保存较完好的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石墓分五层，底层刻如意头状六足；第二层浮刻连续传枝花朵图案；第三层浮刻覆莲瓣；第四层刻古阿拉伯文字；第五层墓顶石失落。石墓由一块辉绿岩石刻成，中心凿空。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31

A 332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比较奇特的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第一至四层由一整块辉绿岩石雕成，中心凿空。墓顶石非原墓之物。石墓底层雕如意头状六足；第三层刻覆莲瓣；与其他石墓不同的是第二、四层均阴刻古阿拉伯文字，为泉州发现的须弥座式石墓中所仅见。现在装上的墓顶石，前后两段，正面浮刻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且后一段墓顶石比前一段尺度略大。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32

A 333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由辉绿岩石雕成。石长 145 厘米、底宽 28 厘米、高 18 厘米。正面刻五段弧状，中间浮刻伊斯兰教标志“云月”。弧线交接处刻直线贯穿墓顶石前后，使墓顶石五段弧形更具有立体感。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34 须弥座式石墓

第一座系四层须弥座式石墓，由一块花岗岩石雕成，中心凿空。底层雕如意头状六足；第二层刻覆莲瓣；第三层无雕纹饰；第四层墓顶石缺失，图中的墓顶石是拼装上去的，过大而不成比例。墓顶石正面浮雕的“云月”颇有特色，圆月下的云朵刻成蝴蝶的形状。第二座须弥座式石墓为五层，底层刻如意头状六足；第二层浮刻连续图案；第三层浮刻覆莲瓣；第四层浮刻连续传枝花朵图案，刻工精细。墓的下四层由一块花岗岩石雕成，中心凿空。墓顶石也是拼装上去的，显得很不协调。墓顶石作三段弧形，无纹饰。以上两座石墓现存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A 333



A 334

A 335 须弥座式石墓群

图中为成群排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上的须弥座式石墓。照片上第二排右侧,有两座未完成的石墓,左边一座层次初成,未刻图案、文字,第三层仍未完工;右边一座则初坯尚未完成。从这两座未完工的石墓,我们可以了解到须弥座式石墓雕刻的工艺过程。可以说这样说,这些须弥座式石墓,混合了印度、波斯、希腊、大夏、安息、罗马和中国的不同文化因



A 335

素。从宗教角度看,每座须弥座式石墓,都混合了印度和中国的佛教、阿拉伯和波斯的伊斯兰教,以及西方基督教的雕刻艺术。从历史文化角度看,每座须弥座式石墓都是世界多元文化在泉州混合的物证。所以,泉州现存的一百多座须弥座式石墓,是世界宗教、艺术和文化的大观园和宝库。

A 336 须弥座式石墓群



A 336

图 A 336 和 A 337,是陈列于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南侧的三排须弥座式石墓。仅此石墓就有三十多座。照片中明显可见石墓的编号有 70、71、72。据了解,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须弥座式石墓的编号已突破一百号。加上灵山圣墓数十座,百奇二十多座,杏宅郭氏回族祠堂数座,泉州通淮街清净寺七座,石狮子博物馆数座,泉州市博物馆两座,泉州师院泉州学研究所一座。这样泉州的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现存的不少于一百七八十座,还有许多须弥座式石墓的残件不计算在内。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反映了宋、元时期泉州是世界东方的大海港,是世界多元文化的辐射点,也是世界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

A 337 须弥座式石墓群



A 337

十七、泉州古代外国人石墓种类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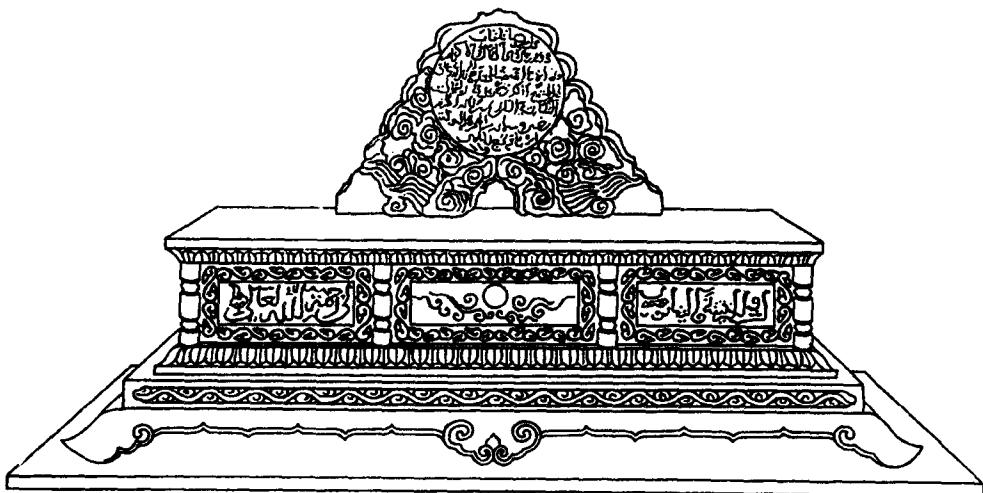
泉州宋、元两代外国人石墓很多,按教门大致可分为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两种。这两种教门的石墓,从其建筑和雕刻的形式上说,受佛教的艺术影响甚大。它们又分两类:第一类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第二类是须弥座式石墓。这两类石墓在泉州仅见之于伊斯兰教及基督教。今以伊斯兰教及基督教石墓的两种形式为例分述如下:

(一)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徒的须弥座祭坛式石墓(A 338、A 339)

这种石墓,通常是由数十方辉绿岩石或白色花岗石经雕琢后砌成的。墓座的正面作长方形的祭坛式,长360厘米,宽90厘米。上下石板伸出,中部的束腰石高约25厘米,突出部分都刻莲瓣或覆莲瓣图案。中央束腰部分一般是分五节或三节,每节有辉绿岩石或白花岗石块五方或三方,但三方的居多。每方石块的衔接处都隔以间柱。如座为五块刻石,则其正中及其左右的两方石块,各刻该教门信仰的标志与文字,其两侧的石块,通常刻中国美术上常见的牡丹花或莲花。如墓是伊斯兰教徒的,则座的正中一方石块,常刻伊斯兰教徒最重视的“云月”图案,其他两石块,则刻阿拉伯文字。石座的背后,才是真正墓葬的所在。墓葬突出石座面约90厘米。石座上的后方,也就是墓葬的前面,竖立一方尖拱形墓碑,碑上刻一大型的“云月”,云月两旁,出现两道很长的上涌卷云。或者在云月中刻阿拉伯字,记载死者的姓名及生卒年月。如墓是基督教徒的,则墓座前的须弥座束腰部分,其正中的一方石块,刻天使、十字架和莲花。左右两方石块,多刻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Nestorian Syriac),石座上后方,也竖刻一方形式相同的尖拱形墓碑,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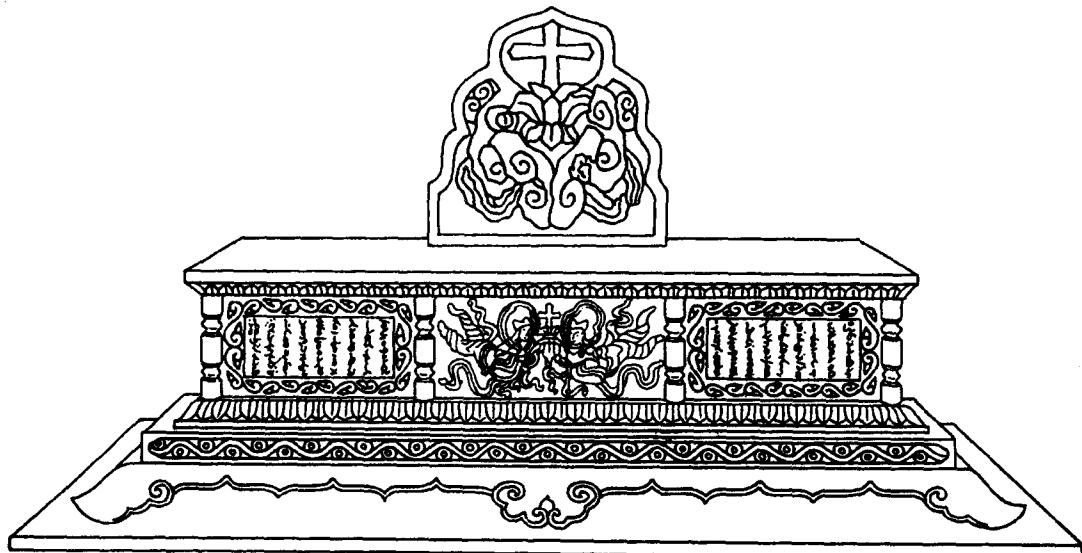
上刻密云、莲花和基督教徒最重视的天使、十字架。但也有的在天使下刻叙利亚等文字的。总之，伊斯兰教徒的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特征是“云月”及阿拉伯文字，而基督教徒的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基本标志是“十字架”、叙利亚文字和莲花。除此之外，他们的墓式大体相类似。

A 338 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A 338

A 339 泉州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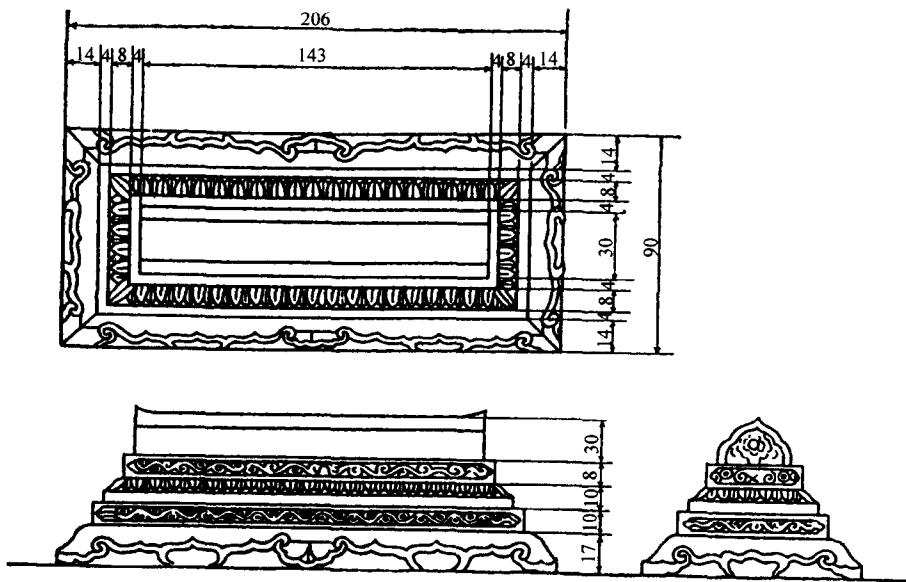


A 339

(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须弥座式石墓(A 340、341、3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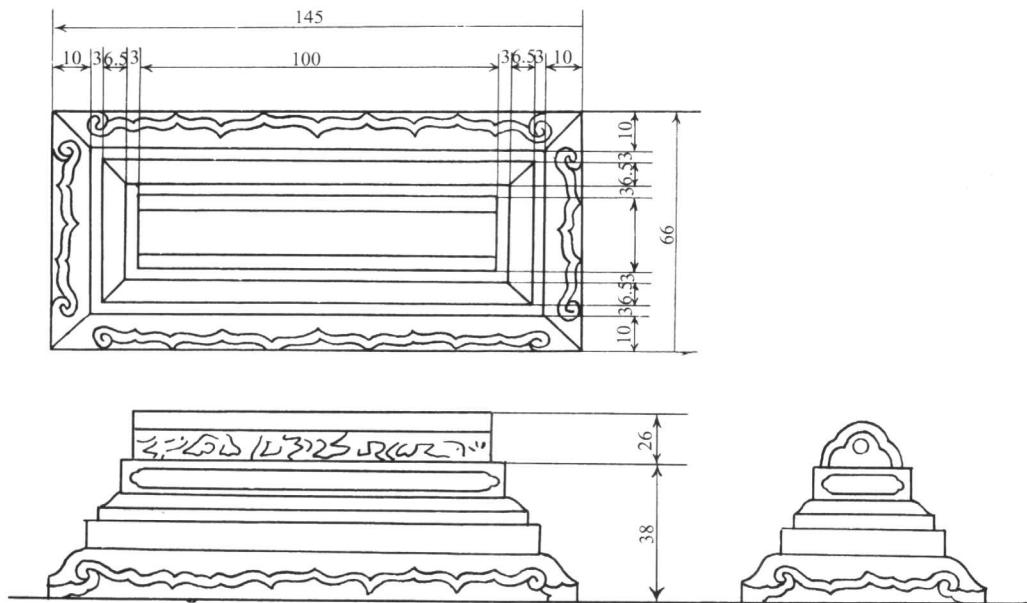
这种石墓的琢制,是由上述的须弥座祭坛式石墓形式演变而成的。它和今日西欧国家的石墓相仿佛,但墓形的巨大及雕刻的精致,则远过之。这种石墓,通常是由一方整块的花岗岩石雕琢而成。一般分五层,自底部算起,第一层最长的达206厘米,最宽的达90厘米。渐向上则渐狭小,一直到第五级为止。第一级的四周,雕刻有一种略似如意状的花纹,互相勾搭着,作为石墓的六个墓柱脚。第二层四周,雕刻有各种各样的连续传枝图案。第三层四周,雕有覆莲瓣图案。如为伊斯兰教徒的石墓,则第四层的四周,往往刻有阿拉伯文字的《古兰经》经文。如为基督教徒的石墓,则其第四层多刻一种水波状的图案花纹,或刻有云和飞天。第五层通常是用另一石雕成的长形尖拱或圆拱顶的石,叫“墓顶石”,放置在石墓的第四层上面。在伊斯兰教徒的墓顶石前端有浮雕的“云月”,在基督教徒的墓顶石前端,则刻一朵莲花,上竖立一个十字架。此外,伊斯兰教徒的石墓,一般由墓底至墓顶,内部凿空。因此,这种中空的石墓,多被后人移用为石碑座。今日在泉州城内外,明、清时代的寺庙及各公署中的大石碑座,大多是用古时阿拉伯人的石墓做碑座。这是因为它的雕刻美观而又适合应用。如1936年,泉州东街前晋江县公署大堂内改建时所移出的十多方大石碑中,其碑座中即有七方用的是古阿拉伯人石墓。他处如泉州东门外的明、清时代官僚的神道碑,以及城内的明伦堂、百源川放生池石碑,碑座也多用阿拉伯人石墓做代用品。其中有的阿拉伯文字尚明显可见,有的则已把阿拉伯文字琢去,但遗留的字迹仍可看出。基督教的石墓中心多不凿空,因而被挪用的较少。

A 340 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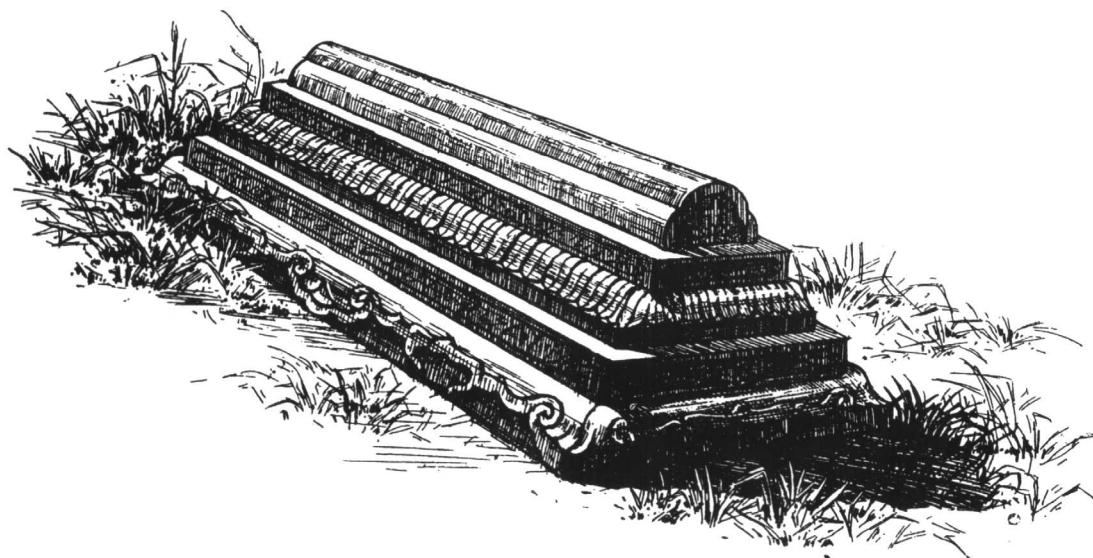
A 340

A 341 泉州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



A 341

A 342 泉州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



A 342

附录：泉州古代外国人墓葬区分布概况

今日遗留在泉州的古代外国人石墓，分布范围很广，从泉州城东南郊外的法石、云麓到通淮门外的津头埔，再向东北通过小东门，一直延伸至东门外的仁风街左右两旁，以至夏厝山、金厝围、迭厝围、苏厝山、色厝尾等处。在此，一路转向城东北角的茫茫园，一直到北门城边的虎头山，一路继续向东伸延至灵山下的东塘头、圣墓，以达福厦公路左侧的乐园，最东端到瑞枫岭霞美村一带。这些墓葬区，尤以乐园、圣墓和津头埔等三个墓葬区为最大，所遗留的外国人石墓也最多。

现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个宗教的不同墓葬区分述于下。

1. 基督教墓葬区

(1) 津头埔区

津头埔乡地处泉州城东南通淮门外，与通淮门仅隔着一条护城河，是宋、元时代泉州城通法石、后渚海港的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古代伊斯兰教徒的大墓葬区，又在附近城墙发现不少古基督教徒墓碑石，如有名的帖迷答扫马等立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主教失里门(Silemun)的墓碑石和圣方济各派的刻有拉丁文字的安德肋主教墓碑石等，都属这墓葬区的范围。但因墓葬区的原貌已被破坏，分辨不出哪里是基督教徒墓葬区，哪里是伊斯兰教徒墓葬区。

(2) 色厝尾区

色厝尾又分南、北两小区，北区是基督教徒的坟地。这里有基督教白石墓四座，两座埋没地下，仅露出其第四级的石面，其旁尚有圆拱形墓顶石一条，刻有莲花十字架，另两座则全埋入地下。本区的石墓，在新中国成立前多遭破坏，迄今尚残存两座，其中有刻十字架的尖拱形墓顶石一段。

(3) 后茂村区

后茂村，俗称后墓。地处泉州罗城东北郊的赐恩山下，距东北城墙仅隔一条护城濠沟。后茂村是宋元时代泉州基督教徒(景教徒)的墓葬区。本书 B 44 的八思巴文字“翁叶杨氏墓道”墓碑和 B 71 至 B76 的古基督教十字石刻，均出土于后茂村。

(4) 茫茫园区

这里地处泉州城里的东北角，自古以来是一个坟地。数十年来，农民挖地出土不少浮雕覆莲瓣和雕有如意状图案的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泉州师范建筑校舍，曾掘到刻有叙利亚文字的基督教墓碑石。刻有疑为回鹘文字的基督教墓碑石也是在此近旁城墙掘获。

(5) 虎头山区

虎头山地处泉州城里北门城近旁，这里自古以来也是一个坟地。早在北门城拆卸之前，当地种植花卉农民就有用古代外国人石墓的石块筑屋的，据农民云是自地下掘出的。数十年来，我们发现的几方刻有八思巴文字的基督教徒墓碑石和一些同类型的基督教石

刻,都是在这坟地的附近北门城基所获。所以,此地无疑是另一基督教徒墓葬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在晋江县立中学任教,该校的校址就在茫园和虎头山之间的北帝庙。我经常于课余到这两个偏僻地方察看,曾经发现过民房墙上砌有十字架石刻。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成立后,我再到该地探访,准备收回保存,但因时隔多年,民屋多数翻新,无处寻觅矣。

2. 伊斯兰教墓葬区

(1) 津头埔区

这里大体又可再分为二小区。一区在街道内。1945年该地乡民在街道左侧的破屋里掘土,发现四座刻有阿拉伯文字的石墓。墓用白花岗石雕成,墓与墓的距离各1米左右,排列很整齐。这四座石墓于屋主修理旧屋时,重埋在地下。另一区是在街道以外的埔尾,在这里有三口池塘,冬天池水干涸时,可以看到三十多座石墓横卧在池内及池畔。其中有一座搁在一株大榕树根上的,最为完整。又有一池,水很浅,池边的泥土断面有铺地古青砖一层,砖层上横着一根大石柱。还有一根石柱础,其圆径可二人合抱,距地面约有1米左右。这石柱可能为古时外国人寺庙的建筑物。若在此地加以发掘,可能还有其他遗迹。以上叙述,只是大体而已,因为墓葬区地貌早已改变,不是成为村落,便是成为水稻田。石墓不是深埋地下,就是被推入池塘。因此区域已无明显界限。

在津头埔乡的南面,有个小村叫后坂,也属津头埔乡。我们在这里也发现许多伊斯兰教徒石墓。仅在后坂宫的东北墙下,我们发现了近十座须弥座式石墓,作为该宫庙的墙础石。此外,在后坂村的水沟旁和稻田泥畔,亦发现数座白花岗石雕成的须弥座式石墓。

(2) 法石尾山和云麓区

法石位于晋江出海处,面临泉州湾,距泉州城东南通淮门约5公里,为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1959年4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对该地进行调查,新发现两个墓葬区,即尾山和云麓墓葬区。

①尾山区。在法石街尽端,有地名曰尾山。街北有山曰金厝山,山下有天妃宫一座(祭祀海神),宫后有地曰西墓园。在西墓园发现完整阿拉伯人石墓两座,相距1米左右,并排,朝南。石墓系须弥座式坟墓,白花岗石雕成,墓顶作圆拱形,五层。上三层由一石刻成,下二层由一石刻成。墓上雕刻简单,仅底层雕有如意状交曲花纹。此外,还发现能复原的石墓两座以及残墓石四块。这两座残石墓皆辉绿岩石琢成。其中大的一座长达144厘米,系须弥座式石墓的上面三层。第三层刻覆莲瓣。第四层浮刻佛教“卍”徽号的连续图案,为历来新发现的古伊斯兰教石墓所未见者。第五层墓顶石,正面作弯曲圆弧顶,中间浮雕“云月”,但在墓顶石正中浮雕一方形图案,作巾状披于墓顶上。这种形式的墓顶石,与泉州东门外乐园陈埭丁姓第四世祖墓同。据丁姓族谱载:四世祖葬于明永乐年间。因此,这类石墓可能属于明代。还有,在尾山宫井旁发现须弥座式儿童石墓一座,为四层,墓顶石正面浮刻“云月”,系一石琢成,底部长仅120厘米。

②云麓区。云麓在法石山左1公里许的山腰上,是一个不很大的村落。宋、元时代出

泉州城东南通淮门抵后渚海港的大道，就从山前经过，距泉州城3公里。《泉州府志》和《泉州南门忠所蒲姓族谱》所载的蒲寿峩“卜居法石”，指的就是这个地方。村中有座寺庙，叫云麓禅寺。寺左有座三翁宫。在三翁宫东南的一个小岗上，地名叫晨钟殿，这里有一个阿拉伯人的墓葬区。原有六座须弥座式石墓，毁坏三座，三座还完整。石墓皆白花岗石雕成，作四层，墓顶石作圆弧顶，正面浮刻“云月”。这一墓葬区的发现，说明这里曾经是外国人的聚居区。据本地乡人云，此地以前经常掘到有“籀形文字”石刻。所谓籀形文字，当是古阿拉伯文字。

3. 南较场区

1936年，因工人在校场的南面挖土烧瓦，曾发现两座石墓并列。以后附近居民，就地倾倒泥土，石墓又被埋没，后经雨水侵蚀，又露出其一小部分。1953年，在校场的北面建筑车站，开掘地基时，又发现同类型的石墓二座。1956年3月29日，在车站附近的大众旅社大门前开掘路旁阴沟时，又出现辉绿岩石凿空的石墓一座，其第四级四周刻有阿拉伯文字，这一石墓除墓顶石缺失外，余皆完整。同年，我们又在此地掘到两座很完整的刻有阿拉伯文字的须弥座式石墓，白花岗石雕成。其中一座移福建省文化局保存，一座移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此外，在释迦寺附近，居民筑屋掘地，也经常挖到石墓，如一华侨建屋，就掘出三座白花岗石须弥座式石墓。关于这一区的石墓，因发现时其石墓多散乱，或倾斜、或倒置，不及他处所发现者的整齐。因此，我们认为这些石墓或者是后人由他处移运来此，未及应用的，或为当时外国人死后埋葬在自己家园中的。南较场原是宋、元时代蒲寿庚的府第，其附近地区，也多是外国人住居的房屋，属泉南番坊的范围，外国人在自己的家园中筑墓，是很可能的。在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之后，泉州出现排外运动，这些外国人石墓被倒置、打破就不足为怪了。

4. 东门外区

这一区可再分为六个区。

①东禅寺夏厝山区。此地原为伊斯兰教徒夏姓墓地，今已辟为园圃了。在这里残存的几座阿拉伯人石墓中，除四座较完整外，其余翻卧在竹林下的三座，有的残缺一半，有的全被破坏了。

②色厝尾区。可再分为二小区，南叫色厝头，北叫色厝尾。南区为伊斯兰教徒色姓墓地。在此尚残存有古阿拉伯人石墓五座，中有一座是小孩的墓，大小五座很齐整地排列在那里，墓顶石都已遗失，但各座石墓都刻有古阿拉伯文字。五座石墓中都凿空，其中有一座墓碑，仍坚固地竖立在石墓上，阿拉伯文字的下面，还刻一朵大莲花，以承托全碑（此碑石1956年向当地农民收回）。1948年夏，石墓被当地无业者破坏，墓碑及墓石，被盗卖一部分，现仅存三座不完全的而已。北区色厝尾为基督教徒的墓葬区。

③仁风街区。在仁风街的左边，居民屋后，有两座完整的阿拉伯人凿空石墓，辉绿岩石琢成，共五级，第四级都刻有古阿拉伯文字，但为丛草所掩盖。在街的右边，有石墓六座，最完整，其中有三座墓顶石仍存在，但是早年被破坏的痕迹仍斑然可见。

④圣墓区。在灵山先贤墓的山坡下,包括东塘头和圣墓两个小村子。石墓残存的尚有二十多座。这一区的石墓,由现状观察,可知当时被破坏很严重。它们中间,有的是后代所重修的,完整的尚有五六座。还有一些较完整的石墓在山坡,多被丛草及泥沙所湮盖。在东塘头,农民掘地和修水利挖沟,也掘出须弥座式石墓三座。

⑤瑞枫岭区。本区距泉州东门城3公里。在1963年3月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根据参观群众提供的线索,在瑞枫岭获得一方古阿拉伯文字墓碑石。据农民说,是因家中百年古墙倾塌而出现的,至于详细来源则不明。我们据此寻找,终于发现数座古代外国人石墓,但多数已破毁。瑞枫岭近旁的霞美村,也发现外国人石墓。

⑥乐园区。本区坟地范围最广大,它原是古时波斯人、阿拉伯人的果园及坟山,故所发现的石墓也最多,其遭受破坏的程度也最严重,完整者很少。其雕刻形式与他区所见略同。虽其中大部分被破坏,移砌在民屋的围墙上,但墓上所刻的阿拉伯文字,仍明显可见。至今还有十多座石墓,被倒置在田园的阡陌上,当做一条任人行走的石路。

以上所说的石墓,大、中、小各不相等,大抵成年人的石墓多且大而广,少年人墓型较小,小孩的则更小。曾发现一座小孩石墓,作四层,由一块辉绿岩石雕成,墓顶石作尖拱形,其底层长59厘米、宽30厘米、墓高22.5厘米而已。可说是在所有发现的石墓中最小的一座,其墓顶石长仅有40厘米。

查“乐园”这一名称,宋、元时代即有,它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坟地之一。泉州陈埭回族丁姓谱牒就收集有关这个地方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买地契券多种,可以为证。但清末竟有堪舆家把它说成是“鹿园”及“母鹿教子”等,而其实就是古时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坟地。在《古兰经》中即有“乐园”这个名词。A 164就有一方阴刻四行古阿拉伯文字的墓顶石,现摘一段译文于下:“敬畏真主的人,他们生活在乐园里,那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果实累累,过去你们做了好事,如今你们尽情地吃吧,喝吧!”^①这一段译文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生活在干旱的沙漠地带,他们把绿树荫、流水和果实等看作是非常宝贵的东西,在他们的想像中,这就是天堂了。所以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乐园”就是天堂的意思。他们以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死后会登天堂,到那绿树成荫,流水潺潺,果实累累的乐园里去,故称坟地为“乐园”。查《诸蕃志》有这样一条记载:

有番商曰施那帏(Silavi),大食人也。侨寓泉南,轻财乐施,有西土气习,作从冢于城外之东南隅,以掩胡贾之遗骸。提舶林之奇记其实。^②

据此,我们推想这个“乐园”大坟地,很可能就是宋代从波斯施那帏城来的大番商所创建,用来掩埋番商遗体,以有利于互市。就地理位置看,灵山和乐园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坟地与赵汝适所记的地点适相符合。

以上所列各外国人墓葬区,由今日残存的遗迹,可以想像当时外国人的坟墓地区是相当广大的,石墓也非常之多。今日在这些地区耕种园圃的农户,掘地时经常挖到整座的石墓。

^① 见《古兰经》第七十七章,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节。

^②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卷上,大食国条。1956年,中华书局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

因其过于巨大，无法将其挖起，故再用土掩盖，就在其上种作物。可见宋、元时代的外国人石墓，其数必有数十倍于今日者。从1920～1948年二三十年间，拆卸城垣，挖掘城基，仅凭我们亲眼所见，挖出的完整石墓及残石墓，不下千座。所有这么多的石墓，大都是在元末亦思巴奚战乱与明初反蒲运动时被破毁，或作石材，或被壅入城基底下。

十八、泉州古伊斯兰教史料和回族史料摘抄

(一) 夏宣武将军墓志铭

天运有别合，山岳有故新。从汉逝者多猛士，隶秦府者俱将才，而籍飞骑歌都护，孰无云起龙骧之思。若夏宣武盖以豪隽而乘明时，而成荣闻者也。

宣武讳璟，字元臣。其先自淮入闽占籍于泉。帐前总辖隐夫之孙，閤门宣替必胜之子。宣武旧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海云蒲平章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之力居多。观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观其所主，知在下之能。蒲平章举最，太史书勋，迺刻符印以赏优劳。宣命下，初武德将军管军千户，再宣武将军管军总管，三管军上千户，散官如故。若省都镇抚福、泉、兴化镇守，又行省累署表也。

宣武号存斋。资厖厚，性宽慈，持身廉勤，同土甘苦。时平固圉，虽惮单骑之，严明文书省约，亦乐将军之简易。鞍马余闲，喜延胜彦弦壶娱乐於乡党姻旧。敬尊己者慈，下己者友，敌己者一，无间言讟跪。

鸿坠大德庚子十一月二十一日，感微恙终于三山治所，其生之年戊申九月初六，寿五十三。娶曾氏，继丁氏。男定保，丁出以父任赐。黄组昭信校尉福州新军上千户，捧万户府檄镇守兴化路，娶尤宣慰孙女它姬。子观僧、失明、应保尚幼。长女归庄刑部子。在次归陈天赐。孙男大顺，女一。

定保卜以丙午某月某日，奉柩空晋江楞伽山。前期下马访余，泣曰：孤不孝，抱陟岵之痛，旧尝执经师门，愿丐令辞俾光琅树。余怜其言哀，诺而铭曰：

呜呼！宣武奋身右科，宠功之典不一，犹未脱矢石之劳，嗣爵之德，至渥宜尔。受山河之褒，不假之年者天，西风嘘送於云萝，克济其美孝子，异时积阙於节旄。

呜呼！宣武死奚可憾，魂即安乎茧窠。

(宋黄仲元《黄四如集》卷四)

(二)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七，拾遗(摘抄)

〔元〕

至正十二年三月，仙游民陈君信、秦通甫、黄文五等聚众数百人攻陷县治，达鲁花赤倒刺沙、主簿要束木皆遁。君信等遂肆焚掠，谋逼郡城，莆田民黄信一等亦聚众应之。未几，信一父子三人先就获，而福建元帅府经历高本祖率兵至仙游招捕，君信势穷走永春，县尹卢琦诱获之，俱送元帅府伏诛。

十四年夏，泉州安溪人李大、南安人吕光甫等聚众为盗。七月，围泉州城。八月，遣其党刘广仁等率兵围兴化，攻陷仙游，执达鲁花赤倒刺沙杀之，胁县民并驱来攻城，为莆田人陈孙通、许必珍、黄德宝等民兵所败，获贼渠数人。余党奔仙游，万户成三宝、同知官保合官军民兵追击，遂退走。十月，广仁复驱其众大至，官军民兵又合击败之。广仁等狼狈奔安溪，仙游始平。

十八年十二月，福建省宪构兵。时前平章三旦八已除行宣政院使，寓兴化，而前总管安童弃官为道士，买宅州峰之下居焉。平章普化帖木儿遣官通三旦八、安童令集兵为己援，又赂泉州亦思巴奚，调其兵进。

十九年正月，三旦八称平章，安童称参政，开分省于路治，吓郡军民官令各以兵会。二月，三旦八驱兴化及亦思巴奚兵合数千人往援福州，安童独留，专兴泉分省之任。其意轻亦思巴奚兵，以为易制，屡挑之，于是亦思巴奚之酋阿迷里丁自领其兵来，名为援福州，实欲袭兴化也。安童亦知之。三月，阿迷里丁至城下。安童信漳州总管陈君用等谋，闭城门，陈兵城上，示有战守具。又聚乌合之众西门外，以为可以疑伏却之也。是时，三旦八闻阿迷里丁兵且至，轻骑至兴化，劝安童纳其兵，不从，三旦八乃自出城迎之，阿迷里丁留之城外，纵火焚城门，矢乱发射城上，城中亟取水沃灭火，矢石亦乱下如雨，相持一日不决。翌日复急攻，视城之西近山处稍低，射走守者，数百人缘而上，遂陷之。安童狼狈遁走，阿迷里丁遂以三旦八入城据之，虏获安童妻子财物，纵兵杀掠蹂践郡境凡一月。闻安童在兴化县龙纪寺起兵，而郡民亦随处屯结欲与之抗，无肯附者，阿迷里丁颇内惧，四月，遂执三旦八及驱所虏获男女奔回泉州。

二十年正月，兴化路推官林德隆集民兵陈于黄石，胁府判柳伯祥走之，德隆遂以兵入城。时广东元帅苦思丁以福建省平章便宜檄升右丞，分省兴化，观伯祥、德隆相仇恶，既不之问；及伯祥走，德隆驱兵入城，亦不之阻，莫知何意也。是年秋，惠安人陈从仁以军功累升兴化路同知，其冬，莆田人林德隆亦以军功累升兴化路总管，二人素以豪不相下，又屡以嫌隙交恶，各拥兵自卫。而从仁之党众且强，其弟同又潜以其兵入，遂密与右丞苦思丁谋诛德隆。十二月，德隆以事出，从仁遣兵执之，系于狱，诬以谋为不轨之罪，搒掠无完躯。既而囊沙压杀之，明日以病死告，出其尸检验，令数卒舁至西山，烬而蹂之。复遣兵莆禧没其财产。德隆长子珙奔福州赛甫丁，次子许瑛奔泉州阿迷里丁，祈哀于二酋，欲有所图。二酋既受其赂，亦怜德隆冤死，且受戕虐太甚，朝夕遣人至苦思丁所，潜议复仇。

二十一年四月，珙自赛甫丁所回，大集民兵陈于湖头诸处，阿迷里丁又急遣兵击同于惠安，而苦思丁已与二酋有密约，遂以计杀从仁于分省之后堂，亦以谋为不轨罪之，解其尸。时阿迷里丁兵至枫亭，珙兵奔突黄石，得苦思丁传至从仁首与臂，乃各退去。同亦以兵来救从仁，至南门外，闻从仁已死，遂奔漳州罗良。未几，苦思丁回福州行省，复遣参政忽都沙、元帅忽先分省兴化。六月，同等自漳州航海回惠安，陷县治，杀官吏，尽驱其民为兵，声言为从仁复仇。珙得报，即以刘希良、林子敬、陈县尉等民兵趋枫亭迎攻，为所败。于是同之姐夫柳伯顺与其党杨九、黄国辅等率兵追珙至吴山、下林诸处。流血波道，飞焰熏天，所至毒甚。然客兵深入，久之不克攻，则与忽先通。七月，伯顺以杜武惠、胡庆甫、林全、李德正等兵袭郡城，由西门梯而入，突至忽都沙家，胁取除授及讨珙文字。于是伯顺称府判据城，威逼官军民兵与柳子

仪等驱以攻珙。许瑛又急奔泉州，乞兵于阿迷里丁。八月，扶信以亦思巴奚等兵进至城下，连日急攻。伯顺兵少力弱，度不能支，先送忽先回福州，而后并其党夜遁去。九月，扶信以其兵入城，自称元帅。而珙亦以兵入城，自称总管，据城守之。亦思巴奚之兵既杀掠无禁，而许瑛又日以兵哨蒲之南北洋为暴，马合谋以亦思巴奚等兵陷仙游县，胡兴祖、上官惟大又领兵穷追伯顺等至兴化县，郡人遭其惨酷，无一方免者。

二十二年二月，泉州阿巫那杀阿迷里丁将穷其党，扶信惧，林珙送之奔福州，赛甫丁令珙还兴化，仍以总管据之。三月，柳伯顺由永福潜兵陷兴化县，杀官吏，驱县民逼郡城，与陈同约夹攻，而同未至，伯顺自以兵突至宁真门外。珙兵衄，其党几溃。适泉州亦思巴奚两骑至，珙厚赂之，声言泉州兵大至，乃以兵从泉州两骑鼓噪而出。伯顺以为泉州兵实来，又其兵方饥劳，休以待食，出其不意直攻之，遂大败，僵尸以千计。伯顺等惭愤退。四月福州平章燕只不花会诸军攻围赛甫丁，因调珙兵，珙辞以故。六月，伯顺复驱兴化县民兵来攻，兵一交即大败，僵尸又以千计，自是遂不复出。珙据城数月，而余阿里自海道还，得燕只不花便宜檄守御兴化。既而尚书李士瞻诱赛甫丁、扶信登海舟，参政魏留家奴蹙杀亦思巴奚兵数百人。燕只不花克复省治，余阿里以江西行省左丞在兴化，遏赛甫丁、扶信奔败之兵，开分省，立官府，余民稍有生意。未几，而参政郑曼代余阿里分省，为两家解仇，珙始还莆禧，而同及伯顺亦各罢兵。莆四百年文物郡，自陈从仁、林德隆作难，兵连不解，遂引异类肆其惨毒，前后戕杀二万余人，焚荡三四万家，虽已解仇罢兵，而陈同犹据仙游县，柳伯顺犹据兴化县，林珙、许瑛亦据有新安、合浦等十余里，分省所治惟附城数里而已。其年，陈同、柳伯顺等势既穷蹙，走仙游求谢必恭助粮与兵，必恭不从。五月，同及伯顺率兵千余人，突至必恭所居谢岩，攻败之，毁其室庐，俘获其妻孥、财物，遂陷仙游县，遣所设县尹林规据守。十一月，必恭自尤溪招诱凶徒百余人至仙游，杀县民陈子仁等，趋龙华寺，袭同所称镇抚詹伯颜，为所败。二十三年十二月，必恭再与土官郑深甫、钱鉴等驱尤溪凶党二百余人，由九座山间道进，方谋攻袭，而同及伯顺得觇报已知之，乘其未至，亲率劲卒迎击于县之廉洁里，尽歼其众。追至柘山，擒必恭拘于龙华寺，寻毒杀之。必恭，仙游人，始因集民兵击败陈君信等，继又聚众助同知官保击刘广仁，累以功举充仙游县尹，乃拥众居谢岩之阻，有桀骜心，凌轹郡县，攘取官赋民租，胁驱二十六里之民，无敢不从者，至是凡七八年而败。

二十三年十一月，泉州阿巫那遣其党白牌、大阔等率官军民兵攻陈同惠安寨，搜之不获。追至仙游，遂陷县治，杀官民。又追至兴化县龙纪寺搜柳伯顺，无在者，遂肆杀掠回，聚其兵枫亭。怒分省左丞郑曼党伯顺及同，明年正月，进兵逼郡城，分省官吏皆挈其妻孥遁去，而禁民不得动，人心惶惶。最后用其掾史任守礼谋，杀伯顺所遣数人，而福建行省亦遣其左右司员外郎德安往泉州，喻阿巫那令退师。二月兵还。

二十四年四月，福建行省左丞观孙自京师至，奉旨分省兴泉，提调市舶军马。恃有朝命及铸降印信，遂轻视阿巫那等，以为皆当禀属于己，遣所设员外郎任立往泉州，封市舶库及检计仓库钱谷。阿巫那空市舶库待之，又阻止不与封视，就用观孙提调军马之文，遣湖州左副千户领军三百至兴化听调。阳为尊奉，实示悖慢，且以觇之。观孙处之无法，听其为暴而不能禁制，故适以启其桀骜之心，自是使传无日不来，然皆侵上生事为不逊语，又日纵兵往来惠安之

境以恐胁之。观孙惶惑不知所为，遂缮城浚河，日役万夫，苛政滋出，民不堪扰。至观孙罢分省还京师，德安以郎中摄分省事，阿巫那乃召其兵退，民始安息。

二十五年三月，福建行省左丞帖木儿不花分省兴化，前摄分省事郎中德安仍参赞之。四月，泉州阿巫那复用恐胁观孙故智，遣湖州左副奕军三百至兴化，又遣同知石家奴、推官林宗和来追取军储，出入城内外，公行为虐，无所顾忌。至帖木儿不花罢归行省，德安仍以郎中摄分省事，乃召其军去。其年十一月，前左丞观孙又以皇太子命分省兴、泉，行省平章燕只不花密令德安自为计拒之，德安遂大集民兵。而行省复与孟孙两同金兵并力守御。德安又用照磨余宗海谋，遣人达意于泉州阿巫那求兵为助，于是阿巫那遣其通事哈散、惠安县尹黄希善率官军民兵至郡城外。哈散意欲攻走两同金兵，而孟同金急纵兵逐之，杀二人，哈散等奔还。于是城中官民皆以为亦思巴奚兵必至，无贵贱夜挈家走。明日，德安亦遁去。既而哈散、黄希善果以亦思巴奚等兵突至，时分省官既去，无敢主其事者，哈散、黄希善遂以兵入。而马合谋、白牌亦以兵继至。明日，白牌等遂出兵大掠涵头、江口、新岭诸处，直至蒜岭、宏路、逼近福清，所至焚掠。行省乃急遣兵拒截常思岭，而令左丞郑旻、郎中易里雅思至白牌等军，喻令退师，不从。最后乃以阿巫那之命始还。

二十六年正月，白牌金阿里等议留哈散、黄希善兵守城，而自以兵攻陷兴化、仙游二县，所至杀掠毒甚。二月，林珙、柳伯顺合谋，乘城中单弱，遣李佛保、许应元等潜兵至城，梯而上，与哈散等兵战城中，大败之。杀亦思巴奚数十人，执哈散至蒲禧杀之，纵黄希善遁去不追。于是李佛保、许应元各称珙、伯顺所伪署官据守兴化，而伯顺又遣其党杜武惠等胁驱民夫千人筑寨涵头，民不胜劳扰。白牌马合谋在仙游，闻城中已变，遂各引兵还泉州。三月，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复领其兵由枫亭沿海直趋吴山攻珙及许瑛，于是珙据守所筑蛎前寨与之抗，而许瑛率众航海往来援之。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先攻许瑛海上，许瑛战败困蹙，尽其党溺水死。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遂率兵逼珙家坟墓，并毁其屋宇、营寨，而新安、武盛、奉国、醴泉、合浦诸里之民，亦皆被其杀掠，扫荡一空。亦思巴奚兵方暴海滨，而分省全左丞急回福州，伯顺乘城内虚遂入据之。时陈有定已得行省讨捕番寇之文，拥兵南下，伯顺得报，始有固心，城中官民亦幸有主事者可以定计战守，故皆乐附之。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闻伯顺据城中，急回其兵疾驱迫城。三月，进至熙宁桥，遂围东南西北四门，而置宁真门不攻，以故城内外得相接应为计。四月，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始移营乌石山，谋攻宁真门，而不知陈有定之子宗海已领兵夜入城中。明日，宗海开西门、南门纵其兵出，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见城门骤开已疑，又见兵出者旗帜衣装鲜明，进退步趋严肃，益恐。亦思巴奚所恃者弓箭刀牌，而宗海兵并心协力，直前搏执之，于是亦思巴奚之兵皆仓卒无所施，遂大败僵尸数千。追擒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杀之，余星散鼠窜，所在农民亦以锄、梃乱杀，无得免者，惟逸四骑去。是日，有定师至，抚集军民，宪复路治，声势赫然。伯顺已在城中听号令，而同及珙亦皆敛兵入奉约束，遂命宗海督伯顺及同等兵合珙水军进讨泉州，有定亦以其师往。五月，诸军克泉州，擒阿巫那等。至是，兴、泉二郡始获免亦思巴奚之祸。

二十七年十二月，国朝征南将军兵下福州。明年正月，前参政袁仁遣宣使关住至兴化，喻

陈有定所设府判徐昇、经历郑元明及元帅王思义、叶万等令纳款。王思义、叶万遂与徐昇密谋杀关住及元明，尽收丰盈库银帛，驱其兵走泉州。于是兴化无主事者，军民惶惧莫能为谋，皆推李子诚、吴弥明等计议。二人首倡迎降之说，然必前其未至，往福州纳款，差可救解兵祸，不然，未可测也。于是众皆愿出道途所费，亟集城内外老者数十人从之往福州，全城归附。

（上十五事出吴源《至正近记》。）

（三）泉州蒲氏族谱摘抄

下面摘抄泉州蒲氏、金氏二家谱牒，并进行简要考证，它对了解南宋末年和元末泉州的海外交通历史是很有意义的。

《泉州南门忠所蒲姓族谱》摘抄

始祖蒲孟宗，宋仁宗初知郓州事，嘉祐中以右丞治蜀，遂为西蜀人。家著多书。二世蒲壳，与苏子瞻有亲戚，历任德州平原县教授。三世蒲尧仁，绍兴间授河西吉安府泰和县。四世蒲绪，为朱熹门生。五世蒲国宝，开禧间家居四川叙州府富顺县，随子入闽。六世蒲仕宾，以恩贡官知福建泉州晋江县，官眷赴任，任满入籍，卜居晋江之法石乡^①。夫人蔡氏，生三子。七世蒲寿晟、蒲寿嵒、蒲寿庚，兄弟三人。寿晟，咸淳九年官蒲州知州，性俭约，于民一毫无所取，建曾井日汲水二瓶，置座右，人颂曰：‘曾氏井泉千古冽，蒲家心事一般清’。立籍陕西巩昌府秦州，遂于官后居蒲州，今山西、陕西多其苗裔。寿嵒，咸淳十年诏为吉州知州，知宋运逆，迄录不赴。迨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三月间，世祖遣御史程文海诏求江南人才，公赴试中第一甲第一名，赐状元及第。夫人金氏，生子师孔、日和。寿庚生子师文、师斯。八世师文娶马氏，大德元年以父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卒于壬辰，承旨官留梦炎撰文，圹内墓志铭，以玛瑙石为之。师斯，至元甲申擢为翰林太史院官，置百果园于泉州城南门内以自娱^②。娶乔平章女。师孔，以荫补承务郎监福州水口镇，后升任监承。娶铁参政长女。日和，秉清真教，慎言谨行，礼拜日勤。元至正间，清真寺损坏，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重修门第，皆以大石板砌成之，极其壮丽。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今犹存。至永乐十三年，与太监郑和奉诏敕往西域寻玉玺有功，加封泉州卫镇抚司，圣墓立碑犹存。

以上蒲氏族谱，是1955年厦门大学庄为玑先生向泉州南门城附近忠所蒲姓族人借出抄录的。蒲氏族谱中记载，蒲寿晟和蒲寿嵒是两个人。《元史·世祖本纪》及明黄仲昭的《八闽通志》则作蒲寿嵒。但蒲寿庚本家的后裔族谱却载蒲寿庚的长兄名蒲寿晟，二兄名蒲寿嵒。族谱涉及的事颇多，属真属伪未能一一考证，现仅择其主要问题略考于下。

一、《闽书》载“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蒲寿庚父开宗，徙于泉”^③，宋郑

① 蒲氏族谱记蒲寿嵒、蒲寿庚的父亲是蒲仕宾，但是明代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记：“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宋朝岳珂《桯史·番禺海獠》则记蒲氏先世“本占城之贵人”，久居广州“富盛甲一时”，后“其富不如曩日”。这便是蒲开宗自广州迁泉州的原因。族谱所记蒲仕宾，无考。

② 现在泉州城南南较场附近还有花园头地名，即今泉州第七中学所在地及其周围的南菜市场及溪亭小学一带。

③ 《闽书》卷一百五十二。

所南《井中心史·大义略》“蒲受耕祖南蕃人，富甲两广”。可是本族谱却载“始祖蒲孟宗，宋仁宗初知郓州事……遂为西蜀人”。查《蒲州府志》宋知河中府有“蒲宗孟”一名^①。又据《泉州府志》宋《艺文》亦有“蒲宗孟”一名^②。不知蒲孟宗和蒲宗孟是否同一个人。

二、蒲氏族谱对蒲寿庚的父亲蒲仕宾何时入闽和蒲寿庚的事迹只字不提，甚觉奇怪。是否与明初泉州人的反蒲运动有关？1945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垣，掘获一方辉绿岩石汉字碑刻，可能是不完整的，颇难解读，其汉字横写，自右向左照录是“质轩公配蒲氏滨泗公在”。不知这里的“蒲氏滨泗公”与“蒲仕宾”有否关系？

三、蒲氏族谱载“咸淳九年寿晟官知蒲州”。这里有误，理由如下：

其一，咸淳九年，山西蒲州已为金地，寿晟知蒲州不可能。查遍《蒲州府志》，亦不见蒲寿晟名字。

其二，《潮州府古考》载：

在城西一里有曾井。南汉时程乡令曾芳因民苦瘴，给药愈之，来者接踵。乃以大囊药投井中，民汲水饮之，皆愈。宋皇祐五年，狄青征侬智高经此，祷于井，泉溢出，军士不苦疫疠。青凯旋，仁宗降制，封芳忠孝公，赐飞白，书‘曾氏忠孝泉’五大字旌之。咸淳七年，知府蒲寿晟建亭井上云。^③

可见“曾井”是在潮州，非蒲州，看来族谱有误。

其三，《心泉学诗稿》有关广东梅州的诗十多首，有《梅阳壬申邵农偶成书呈同官》一首^④。梅阳为梅州，“壬申”为咸淳八年。可见蒲寿晟在咸淳八年居官梅州。

其四，关于蒲寿晟和蒲日和的问题。《晋江县志》载“蒲仲昭，祖心泉（蒲寿晟之号），故梅州太守。知宋祚将危，隐身读书，遗诗若干卷，刘克庄序之。仲昭世其业而游居于泉”可见所谓知梅州的蒲寿晟即蒲寿晟之误。蒲寿晟咸淳八年任梅州太守，已近晚年，其子蒲日和于80年后的至正十年修泉州清净寺，于时间亦不合。

其五，所有史书都载蒲氏只有两兄弟，只是把“晟”误写作“晟”“宬”。现在再证以后至元四年刻，泉州蒲寿晟、蒲寿庚《重建清源纯阳洞记》，至元十八年时，蒲氏兄弟也只有二人。所以族谱记蒲氏兄弟有三人，是有很大的疑问的。

四、蒲氏族谱记蒲寿晟之子蒲日和“秉清真教……至正间清真寺损坏，里人金阿里与之共成厥事……石匾额上镌有名字，至今犹存”。所记蒲日和至正间与金阿里共同修清净寺事，有些疑问。元至正十年吴鉴撰文的《重立清净寺碑》（明正德二年重立）并无蒲日和的名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明正德二年重立的元至正十年吴鉴撰文的《重立清净寺碑》，至今犹存，但无蒲日和名字。而修谱者却硬说有，似有杜撰之嫌。或许正德二年重立清净寺碑时，认为刻上蒲寿庚子孙姓名于碑上，

① 《蒲州府志》卷六，职官，知河中府。乾隆二十年版。

② 《泉州府志》卷七十四，艺文，有“蒲宗孟《文集奏议》七十卷、《八路敕》一卷、《省曹寺监事目格子》四十七卷。蒲宗孟、曾公亮《功德集》三卷”记载。

③ 《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千三百三十九，《潮州府考》。

④ 蒲寿晟《心泉学诗稿》卷六。

泉州宗教石刻

免不了有些嫌烦，因而有意删去，也不能说全无可能。后至元四年刻的泉州清源山《重修清源纯阳洞记》碑，虽地处偏僻的山上，可是碑文中的两处“蒲”字皆被琢去，这就是很好的说明。

金阿里是在元末的战乱中战死于莆田的。从这点上看，蒲日和当时的社会地位和金阿里联合修清真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正德二年《重立清净寺碑》云：因“旧碑朽敝无征……录诸郡志全文”。可惜，元代吴鉴撰的《清源郡志》早已失传，无从查考了。

五、蒲氏族谱载，“师文娶马氏”、“师斯娶铁参政长女”，马、铁二姓，都是回族，符合情理。

六、关于蒲日和为郑和通西域立行香碑问题。《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载：“若寿成次子日和为郑和立泉州伊斯兰先贤墓行香碑，乃尤为昭明之事实也。”^①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重修泉州清净寺，为郑和行香立碑是明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间隔六十七年。如果说蒲日和一手完成这两件事，从时间上看，十分勉强，或者不可能。但郑和行香碑上刻的是“镇抚蒲和日”，“蒲日和”与“蒲和日”是不是同一人，则不可知。地志均不载“镇抚蒲和日”的名字。然《重纂福建通志》全文引用蒲氏族谱这段材料。

（四）泉州《清源金氏族谱》摘抄

泉州《清源金氏族谱》修撰于明嘉靖三十四年，记载了元末色目人在泉州战乱的详细情况。现摘抄三段于下：

《元武略将军一菴金公传赞》摘抄

公名吉，别号一菴，上都人也。少聪慧，长有勇略，至顺壬申（公元1332年）王禅盗乱，公以头目募兵进捕，爰献提勋，文宗嘉之，授武略将军左副翼万户上千户，赐符节，镇守泉州路。拜命来此，用守厥官。先是泉娘自宋景炎幼主南渡，蒲寿庚以抚官叛命。宗室士类至于淮兵，歼杀罔遗，表降于元。赐爵镇国，俾统州政，父子继世，恃宠专制。峻德严刑，以遂征科，人苦薰炎甫九十年。公比到官，拱手听令而已。然公温恭仁恕，不与人忤，金推距人长者。蒲亦雅敬礼惠不衰，公益孜谦谨，示罔为异。有伊楚与公友善，辄功时事，公曰：“事贵有机，患迺兄忿”。玉卒罹害。蒲贼死，其婿那吼呐自立，据土擅武，大肆修夷，遣骑袭劫，寇扰莆阳。行省上其事，檄福州军校及泉之浔美场司丞陈駢，湧洲场司丞龚名安合兵讨之。駢谓军校曰：“蒲、那为乱，州民无辜，战必驱之前列，良可哀恻，宜请行间”。公时守西门，兵利卒锐，不与他等。駢往谓公曰：“官军诛回回，大至。至且玉石俱焚。公宜早计，转廄为切，实此其时。”公喜曰：“吾夙心也。”夜即开门，密纳官兵，擒那吼呐，槛送行省。发蒲诸塚，裸尸声诛，戮厥贼。属绥厥士庶，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州人舞蹈欢快，若获更生。皆公之力也。既平乱，越数岁，至正丁未（公元1367年）天兵入泉，其年公已先没。众论乐公之忠，勋名为寓贤，牢醴载祀。公有子二人，长曰呵哩，次曰嘛念吻。呵哩先以陈柳之乱，倡义徂征，死节于莆。公寝疾病，谓嘛念吻曰：“古人以官为家，生有功德于地，死祭于社。吾自上都拜官于泉，生有微动，死当归魄泉土，宜尔世守，永为泉人。嘛念吻以公命，营葬东郭荔林之原。土石简素，悉依夷风，至今坟墓

^① 金陵大学刘铭恕《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卷五，蒲家杂事。

俨然”。

《丽史》篇摘抄

元君制世，以功封寿庚平章，为开平海省。泉州寿巖亦居甲第。一时子孙贵显，冠于天下，泉人被其薰炎者九十年。至是元政衰，四方兵起，国令不行，其婿西域那吼呐袭作乱^①。州郡官吏非蒙古者皆逐之，中州士类咸没……那吼呐既据城，大意淫虐，选民间女儿，充其室。为金帛撒楼下，命女子攫取，以为戏笑。即乔平章宅建番佛寺，极其壮丽，掠金帛丝织其中。数年间，民无可逃之地，而僧居半城。至正甲午（公元1354年），遣骑攻兴化。福州行中书省奏檄。浔尾场司丞陈骇，湧洲司丞龚名安合兵讨之。陈骇、龚名安皆泉名士，为时儒宗师，以荐避不得已，姑就小官，素得民心，故有是命。

伊蒲年十七，随福州军校见陈骇曰：“作乱者那、蒲二氏耳，民皆胁从。若战必驱胁从者于前，官军杀之何益？请入城行间”。城中千户金吉亦回回种也，守西门，伊蒲见之曰：“官兵诛回回，大至。公为守臣，能除那吼纳以迎官兵，不世功也，若坐待官兵入，而后迎之，窃恐敌兵之际，不辨真伪，公进退狼狈也”。金吉大惊，与伊蒲约，就夜开城西门，密纳陈骇兵入。那吼呐仓卒突骑出子城拒战。伊力持巨斧冒阵，砍百余骑，擒那吼呐，送京师。是役也，凡西域人尽歼之。胡发高鼻有误杀者。闭门行诛三日，民间秋毫无所犯。僧大奎大书彩旗，联句云：“将谓一方皆左衽，岂图今日见王官”。福州军至，发蒲贼诸冢，得诸宝货无计。寿庚长子师文，性残忍，杀宋宗子，皆决其手。圹中宝物尤多，圹志石玛瑙石为之，翰林承旨撰文，金陵人也。盛称元君恩宠，及归功寿巖文学智谋云。大抵犬戎叛乱，出其天性，而奸诡饰诬，或目文学所济，亦有之。凡蒲尸皆裸体，面西方。伊蒲悉令其五刑而诛之。弃其肉于猪槽中，报在宋行弑逆也。顷之，伍阵陈有定据福州，不知蒲已败，遣兵循泉州，欲倚为扰，遂攻城。金吉与伊蒲分兵固守南城。将陷，伊力战死之。相持月余，闻大明天兵自温州渡海，来取福州，乃循。泉民不遭屠戮者，此三人之力也。洪武七年，高皇帝大赦天下圣旨，独蒲氏余孽，悉配戎伍，禁固世世，无得登仕籍，监其祸也。

《李母金氏七十寿序》（王慎中《遵岩集》卷十一）

西方之法岂独可行于其国而已，充其清净无欲之真心，慈悲善救之本性，贯通乎日用应感之间，则有夫妇母子之伦，亦足以默存其教。而积善召祥之福，动于人事，孚乎物理，而家庭翕聚之乐，服含滋殖之政，何啻天堂胜生。绕以香花之奉，饰以珍宝之供，之为芳美华贵也哉！西方之圣莫盛于瞿昙，而天方以西之域，身毒、天竺之派别，自有其法。盖出于瞿昙而少异，其清净。慈悲主于修治，恶业以精世善慧则一而已，亦一方之圣也。入中国已非一日，虽传之者无如佛氏之徒盛然，佛氏之徒已伪售饰习，而为兹方圣人之教者犹不远，其祖持法守戒，顾严于为佛氏者，安得以其异于吾儒而尽訾弃之耶？

^① 这里的“其婿”两字，有人理解为蒲寿庚女婿，但蒲寿庚至元十四年降元，那兀纳至正二十二年据泉，相去八十五年，于理不合。但也有人理解为蒲师文女婿，似也有可能。

金夫人者，庠生李君一林约甫之母也，幼习兹方之教，知以不贪不杀为戒，而天性所禀，最有善根，独能守其戒不坏，故其在家为女称孝，及妇于李翁，事舅姑能敬而敏，佐夫子以勤俭起其家，而以懿惠接姻党，怀藏获蔼然，有名贤于李氏之门，翁虽弃夫人以去，夫人能持其家，授约甫君以尺度谨礼，而惇谊称乡善士，李氏卓为泉之名家。约甫尤念母氏之恩，思所以尽罔极之极，孝养备至，夫人高年弥康，享其子之养，可以千万岁如一日，可谓福矣。一念清净真体，完明百行之吉，皆由是出，以之致诸福之物，如持券取负，非侥幸得之也。西方之法何尝无助于人伦世教，顾欲区区诵守固陋，以非正法摈之，盍观于夫人之所处而有寤乎，某舅氏李小坡兄弟，与吾弟性中皆游于约甫君最厚，而尝拜夫人于堂也，是岁七十九月二十二日，其诞辰也，故集合姻戚友朋，以是日登堂举一觞祝夫人之寿，而请贺言于予，因书以授之，使为轴张于高堂，以助约甫君悦亲之欢而愧于言之不文也。

(五) 李贽家族谱牒和墓圹志摘抄

泉州《荣山李氏族谱》(清光绪二十五年的手抄本)摘抄

第十九世，处士睦斋林公传

公为人敦厚，寡言而长于譬喻，又安素好古，承藉先人蓄积之资，尝以客航泛海外诸国。是时，元纲解纽，戎丑据泉，干戈扰攘，狱讼繁兴。岁又荐饥，公屡散积以济之，活人者多，戎丑虽暴，敬公之德，不敢有犯焉……

第二十世，林弩。

弩字景文，东湖公长子，航吴泛越，为泉臣商。洪武丙辰九年，奉命发舶西洋，娶色目人，遂习其俗，终身不革，今子孙蕃衍，犹不去其异教，乃不悉书之。

(垂戒论)：元氏失驭，而色目人据闽者，惟我泉州为最炽。部落蔓延，大肆凌暴，以涂炭我生灵。迄今虽入编户，然其间有真色目人者，有伪色目人者，有从妻为色目人者，有从母为色目人者，习其异俗，以棼乱我族类，蔑视我常宪，敷拂我彝伦，何也？

中夏之祀天者，元后也为寰邱于南郊，器用陶匏，牲用犊，公侯以下，不敢僭焉；色目之仆夫走卒，亦得图天象于家以事之。

吾之治丧者，摒踊哭泣，含之以琀，袭之以衾襚，而厚之以棺椁。为衰为麻，朝夕奠之；为墙为翼，坟墓葬之；为主于庙，以时祭之。色目者之治丧，笙歌鼓舞，实之以泉，赠之以华，无衰无服，桐棺不掩，而瘞之中野，不为主也，不为祀也。

正衣冠端鞶，绅鸣玉佩，吾之文身也；而色目则缠头被褐而跣足也。

七戒三斋，不饮酒，不茹荤，吾之所调斋也；色目之斋，昼则不食，夜则食之。市则不食，屠则食之。豢则不食，刍则食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所谓孝也；色目者则不刲其身，不为成人也。

其书如蚯如蚓，其言如枭如𫛩，中夏不能辨而晓也。呜呼！色目之道，夷狄之俗也。……今伯父为衣冠缙绅之裔，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恐后之子孙，仍袭其弊者，以特严戒之云尔。

时宣德改元太簇月谷旦廿一世孙李广斋谨志。

第二十一世，林仙保……生恭惠，习译语，冠带通事。……

泉州《凤池林李宗谱》(清嘉庆十二年手抄本)摘抄**老二房二世祖东湖林公传**

公讳弩，字景文，号东湖，始祖睦斋公之长子也。壮年航吴泛越，为泉巨商。洪武十七年，奉命发航西洋忽鲁谟斯等，教不一为事不谐，行年三十，遂从其教，受戒于清净寺教门，号顺天之民。就娶色目婢人归于家，卒年四十六。吾宗七世以上，犹葬用椁，其祖谐此乎。然而肇分林李之派，其隙亦开于此矣。

老二房二世叔祖直斋林公传

叔祖讳端，字景顺，号直斋，始祖睦斋公次子也……居城南，虽介于市廛，然养心静素，乐意弦歌，于世利纷华，异珍奇货，毫不为动，盖其晚节弥淡如也……

论曰：叔祖生于晋，长于晋，……

顾复斋祖伯作谱，必云：公自以不能革其兄之异习，乃退而自居于城南。夫兄娶色目人，律以异习，或所不免。然泉郡中巨族，如金、丁、马、迭、夏五大族，皆以妈氏异教，沿至十余世，犹不革者。叔祖何独恶其先？为此说者，大率本垂戒之意而引申之耶？作是想然语耳，而其实否否。

老长房四世祖恩赐冠带易庵公传

公为通衢公长嗣……里称涂门老人公。……初为里老，后本道府以公谙译语，荐为通事。官引日本诸国入贡京城。成化二年，复与长男琛引琉球入贡。

《睦斋公圹志》**明故处士睦斋公暨配睦斋妣九泰孺人钱氏**

睦斋公讳闻，字君酥。生于元朝至和元年戊辰二月十一日吉时，卒于大明洪武十七年甲子十二月初一日吉时。睦斋妣钱氏，生于元朝至治元年辛酉八月初五日吉时，卒于大明洪武九年丙辰六月十三日吉时。合葬在晋江县三十九都清源山麓，土名北山，老君祠边右畔。墓坐癸向丁兼子午。生二子，长讳弩，次讳端。弩生五子，长讳信，次讳仙保，三讳信生，四讳玉生，五讳福生。端生二子，长讳信与，次讳添与。因信与弗嗣，惟添与永乐二十年壬寅始籍南安县三十都，姓李，改名广齐。时信生从焉。迨宣德天顺年间，玉生偕福生二子而入南安县三十都，亦改从李。独信与、仙保居住泉城，支属仍姓林。而二姓子孙并祖公云。

因元季兵饷费多，粮银推迫，一人焉能特持。又兼幼孤，常在外母之家，是以变名而入外母之林姓。今元纲解纽，而大明中兴，谁敢不念其祖而探其本哉。且元季海内鼎沸，巨族迁窜靡定宇，所在兵燹，谱牒鲜存，故公先代苗裔未易稽核。按坟，睦斋妣先葬，及弩、端遂后即葬。睦斋公率用夷教^①，似有所本，或沿元俗，皆不可详矣。惟是二姓云仍，颇称蕃衍，总袭公庥。迺坟塋岁远，辄被人侵剥失，今不治，后益湮废。兹二姓子孙相率修筑，立石表阡。并据所知而补为圹志，庶几后世子孙得有所考，以识所自，而永不敢忘焉。

万历十一年岁次癸未孟春花月吉旦。

^① 可见李贽的人泉州一世祖林闻信仰伊斯兰教，是回族。所以二世祖林弩赴波斯，娶波斯女为妻是很自然的事。而三世李广济作《垂诫论》批判林弩“迷于色目之俗而不能悟”，这是汉化的表现。

泉州宗教石刻

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广西平乐府前知府前礼部祠祭主事尚实司司丞户部贵州司郎七世孙林奇材谨志。

《明登瀛里林大母贞勤迭氏墓圹志》

1958年秋，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乡农民掘地出土，弃置于围栏下。1983年，家居津头埔的翁铭镇先生发现，采集时已断为上下两块，字也多所磨灭。是年，翁先生以碑石赠送于我研究。2004年10月，碑石捐赠泉州李贽故居纪念馆。石碑高56.7厘米、宽31.2厘米、厚2.7厘米。页岩雕成。石碑篆额，碑竖刻汉字17行。碑文录于下：

祖母贞勤迭氏，年十九归吾祖毅斋公，以勤劳治家，甫十馀载，吾祖不幸新亡。祖母抚孤全节，宗族称之，乡党信之。祖叔太守西泉公辄欲为之表扬，竟死于官，尚未之及，故侍御陈见吾公嘱知。开先闻其志行纯洁，而怜其不及表扬，乃为之序。

吾两学人，士踵开先之门者，读其叙事，而敢不敬仰死之。日吊者盈门，后先相望，而奠章□□，不没其诚，乃谋与吾弟奇材、载贽，恭之以为观风者采焉。夫声闻之间，行实对内非诬亲，外非诬人，殆无嫌于孙子之自为志也，呜呼！墓而自志，有似乎偕第念开先经生微分，而复重之以家贫。既不能旌吾祖母寡守之志，又不能借重先达以为之铭。自知不孚，无所逃罪，姑含哀稽额而志之。

祖母生于成化戊戌十一月十九日亥，卒于嘉靖甲寅十二月十一日申，寿七十七。男三人，长郎吾父瀛，娶吾母王氏。次郎吾叔澜，娶吾婶苏氏。于甲午、丙申二载相继夭没，俱先祖母二十年而葬也。季叔津，娶潘氏，继娶它氏，进士它恩欣烈之侄女，继娶郭氏□女，□□□女一人，配杨桧，乃前侍御杨智之孙也，而今已俱死。孙男三人，予承重，少讳奇栋，及补群庠□□。开先娶陈氏，郡庠生陈忍之女。奇挺娶李氏，兵备副使抑斋恺迺兄琛之女。奇榕娶张氏，苏州府推官罗山乔桧迺姪养正之女。奇桓尚未省事。奇接已聘王教谕东轩禧之孙女也。孙女九人，长配郡庠生王大化，次配潘士炤，次配郡庠生胡一麟，次配陈正仪，次受乡进士黄学莘，尚宾迺弟聘。次受庠生黄爵之孙聘，次受陈新惠少子聘。曾孙五人，曰焜、曰炜、曰煥、曰煜、曰炫。曾孙女二，尚少未聘。外孙杨文灿、文炬。

祖母无恙时，每嘱开先曰：“吾父宽方伯，迭铉之孙也，家袭清净之教。而迨其将终也，授其祖教，而嘱人以三日葬之。吾于今已老矣，朝夕不幸，葬吾礼亦当如之”。开先拜且泣曰：“敢不唯命是听”。及今乃欲如其命也，则有所大不忍者，而侍其情。于是以周公、仲尼之道而葬。其遗命董治棺衾，经营兆圹于吾祖毅斋公之左，十四日土工告阙，不先不后，乃附葬之。铭曰：

嘉靖之甲寅粤十二月念四日之佳辰，葬我祖妣于温陵通远门外，出桥东十武平原之滨。呜呼！千百年后，曰妣林母贞勤迭氏 坟莹

承世孙等泣血稽首

(六) 陈埭丁氏族谱摘抄(明万历二十二年抄本)

《祖教说》(明万历间丁衍夏撰)

吾家自节斋公而上，其迁所自出，俱不得而详也。由其教而观之，敦乎若上世风气之未开然也。如殓不重衣，殡不以木；葬不过三日，封若马鬣而浅；衰以木棉，祀不设主，祭不列品。为会期，日西，相率西向以拜天。岁月一斋，晨昏见星而食，竟日则枵腹。荐神唯香花，不设酒果，不焚楮帛，诵清经，仿所传夷音，不解文义，亦不求其晓，吉凶皆用之。牲杀必自其屠而后食，肉食不以豚。恒沐浴，不是不敢以交神明。衣崇木棉不以帛，大率明洁为尚也。夏(注：丁衍夏)稚年习见如此。厥后殓加衣矣，殡用木矣，葬逾时矣，衰麻棉半矣，祀设主矣，封用圹矣，祭列品矣，牲务肥腯矣。天多不拜矣，斋则无矣，牲杀不必出其屠而自杀矣，衣以帛矣，交神不皆沐浴矣，酒果设矣，棉帛焚他神矣，祀先则未用也，香花之荐犹故也。今则祀先有焚棉帛者，牲杀不必自杀与其屠者，衰皆以麻无用棉者，葬有逾十余年者，吉凶有用黄冠浮屠者，食有以豚者，虽渐变以合于礼……若意出于明洁，必存于诚敬，则宜深念而慎守，相期以勿变也。

《感纪旧闻》

嘉靖丙申岁，余方弱冠，读汾阳祖所遗族谱二序。嗟其书之未就，窃期以成其书。从伯父讳博字遵厚者，嘉予之有斯志也。出所藏毅祖手书裱褙一幅，高尺许，长几二尺，草书寸余大，百余字。纪吾家由来之系示余，其起句曰：由赛典赤回回瞻思丁云云。当时见闻寡昧，不识赛典赤何义，妄以度番地番语，难于史册稽也。继阅郡志，得瞻思丁乃元县佐之官名。丁，若以官为氏也。难究其佐孰县之人而祖之矣。于是但依序中语，断以节斋公为始祖，以上不复考其由来也。故依赛典赤之云，置之而不究。近得李氏《因果录》读之，中载将官章有曰：赛典赤·瞻思丁，回回人，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仕官平章政事，行省云南……及入我朝散处，去夷姓而以其名末字为氏，未可知也。元前中华虽有丁，未必祖回之教，吾家既教宗回，而列祖世载宽仁，所谓似其祖者非耶……漫录而示我后人，有四方之志者，博采而考之。

《纂述世謨》

……夏(注：丁衍夏)先大夫谱序，断以节斋府君为始，不敢妄有所附也……吾家之祖，惟节斋府君为有据，已不能得其所自迁矣。

《丁氏谱牒》

始祖节斋公，讳谨，字慎思。家世洛阳，因官于苏州而家焉……节斋公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善，字彦仁，号仁菴，四世祖是也，植业于城南之陈江，因而迁居焉，业日以拓，族日以大，子孙至今广被其泽，绵绵无替。

(七) 百奇郭氏族谱摘抄

《适回辨》(清嘉庆十二年)

系出汾阳忠武王之苗裔，因五季之后，家于杭州之富阳，其地日郭家村……由郭家村德广

泉州宗教石刻

公服官来泉……迨元之时，于回免其差扰，泉之回尤盛，世人因多从回，或好两国之教，或托足以避乱，故先人之适回，大抵有取矣。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年间……传至第十世宏隆公……因强干弱枝之分，念先人昔从清真教，遂搬入通淮街礼拜寺居住。时在康熙年间，适逢陈都督讳有功仕于泉，重兴教门。自宏隆公入教至今，凡五世矣。

《复遵回教序》(十世孙郭梦祥撰)

我祖自开基百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重经教，认主为本……名曰回回之教，始于天房国……教务极其实理，不尚虚文，能屏斥邪魔，面向清真，我祖由是遵教焉。凡遇祖先忌辰以及父母丧事，唯延师敬诵天经，百犯无忌，斯教之利矣……本期世世尊重，历代不忘，孰意传及五世后，遭兵燹之间关，掌教失传，遂迷染外教之风，竟矇昧正教之则……迨及八世孙恩致公、十世孙志全公并数位侄辈，先得庄师之启传，复得葛师之化成，于是我族重遵此教者，至是有百余年矣。聆葛师之挚意，感真主之厚恩，追溯祖宗诚斋礼拜之风，晓喻养豕食豕之谬。余恐后来子孙仍坠外教，故陈梗概，以勉将来。

(八) 燕支苏氏族谱摘抄

《燕支苏氏族谱序》(弘治十五年，进士傅凯书)

肇于唐舍公，徙居泉之城南，是生男子六人，长居泉养亲，其五子元末避乱于四方，莫知所终……长子布伯公……

《燕支苏氏一世唐舍公传》(据弘治十五年谱，清末重修本)

唐舍公名阿含抹……生南宋咸淳庚午六年正月……配麻氏……公自银同迁居燕支里，学西域净教，易名阿含抹。康熙丁未年，余于涂门真教寺询南京教师杨姓者，云是名，即世称长老也。

《燕支苏氏二世布伯公传》(弘治十五年撰)

布伯公，唐舍公长子，生至元辛卯年八月……配蒲氏……布伯者，犹华言管主也，西南夷相尊称之辞。然则布伯公其净教中之主欤。

(九) 乾隆《泉州府志》摘抄

《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载：

至正十七年，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反，据泉州，民被荼毒。

至正二十二年，回寇那兀纳叛，据泉州。官军至，千户金吉开门纳之。遂执那兀纳。是年，陈友定攻泉州陷之^①。

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乙巳朔。泉州赛甫丁据福州路，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击败之，余众航海还据泉州^②。

^① 据《八闽通志》载，是至正二十六年擒那兀纳，陈友定兵陷泉州。《泉州府志》在这里的记载恐有误。

^② 据《八闽通志》载，赛甫丁据福州是至正十九年。平章燕只不花击败赛甫丁，赛甫丁还据泉州，是至正二十二年。《泉州府志》在这里的记载恐有误。

《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载：

金吉，号一庵。先为上都人。至顺间，以捕盜功授武略将军左副翼万户府上千户，镇守泉州路。值蒲寿庚专权杀戮（这里记载至顺间，金吉来泉州时，蒲寿庚还活着，与史实不符）。吉待时而动，不与为忤。会西域那兀纳窃据泉州，遣骑袭劫莆阳。行省上其事，檄福州军校及泉之浔美场司丞陈駢、湧洲场司丞龚名安，合兵讨之。时吉守西门，兵利卒锐。駢密往见吉，曰：“官军大至，玉石俱焚。公宜早计转祸为功”。吉喜曰：“吾夙心也”。夜潛开门，纳官兵，擒那兀纳，槛送行省。兵不血刃，市不易肆。……长子呵哩，先以陈、柳之乱倡义徂征，死节于莆。次嘛哈吻……（采李筠溪撰传、参《隆庆志·清源丽史》）。

《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载：

陈駢，字元甫，至正中……西域那兀纳等据泉州，行省奉辞讨之。以駢尝为盐官，素得吏民心，辟护军参谋军事……时那兀纳已肆掠兴化，道路梗塞，駢以檄付从者，间道以授县尉龚名安等。那兀纳征兵，名安等佯许之。帅舟师次东山渡^①以俟。翌日，駢等官军至，遂竖行省旗帜，入城秋毫无犯。那兀纳就缚，槛送行省。

(十) 泉州回族概况及其葬俗

泉州回族人民的聚居区，可分为二大部分。

1. 泉州城区、城郊回族**(1) 市区回族**

市区回民有郭、夏、蒲、葛、马、金、黄、丁等八姓。在旧社会，葛、马、丁、黄等姓，多经营皮革业。郭姓，经营金、银首饰业。蒲姓，系宋、元时代提举市舶司蒲寿庚之后裔，元代曾极盛一时，明初多相率反教或改姓他迁。今仍有数户居住原蒲寿庚府邸故址。夏姓，多居今日涂门城内外，以种植为业。郭姓，据其族谱云，系汾阳郭子仪之后裔（按，实是元末明初迁出泉州，永乐五年以后又部分迁回），早年由惠安百奇乡迁来，寄居现存通淮街清净寺内。

(2) 东门城郊回族

据泉州东门城郭附近人民相传，元末明初，凡当时回族所居住之乡村，多被焚毁。苏姓故老云：

我乡原住苏厝围，因明初乡民杀死王指挥使及其兵马（指挥使为明武官职），致被剿毁。因之遂迁逃至东湖水漈及晋江山顶东旗、晋江深沪等地。族谱虽已无存，但考之历代世系，我三世祖迁居水漈正是元末明初的洪武年间。同样，金厝围、铁厝围、夏厝埔等乡亦同于此时遭毁灭，以致废乡。

从现在看，今东岳山尚有金厝围、夏厝埔、苏厝山、色厝尾、铁厝围等地名。而与宋、元时代回族有关的金、丁、夏、马、葛、铁（迭）、黄、色、郭等诸姓多犹存，但回教已失传。

(3) 涂关外回族

该区有法石乡的金、郭两姓和云麓乡的卜（蒲的近似音）姓，皆为回族的后裔，但回教已失

^① 《晋江县志》卷二，渡桥：东山渡在三十五都。又同志卷一，都里条载，在城南江边。

传。今云麓村民多栽种外来花种素馨花(唐《酉阳杂俎》译作“野昔蜜”)。宋蔡襄做泉州太守，有“素馨出南海，万里来商舶”的诗句。

2. 远郊乡居回族

(1) 陈埭回族

陈埭位于泉州南门城外 10 公里的滨海地区，旧分为十三个村，现有万余人口，全部丁姓。据其族谱所载，与宋、元时代波斯、阿拉伯人有关系。据实地考察，当地祠堂构筑作“回”字形状。现墓葬仍有依回式者。现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金厝围、灵山圣墓和乐园等地，还保有陈埭丁姓祖先的回式墓葬。

(2) 百奇回族

百奇位于泉州通淮门外后渚港对岸，属惠安地界。于元末明初由泉州迁来，其地滨海，多以捕鱼为业。其航影远达温州、青岛、天津、台湾和菲律宾。畜牧以牛为主。其宗教观念较深，每遇丧祭大节，请阿訇念经礼拜。据实地考察，该乡亦近万人，全为郭姓，墓葬仍有以回式者。另一支郭氏于明代迁洛江杏宅村，即今杏宅村郭姓回族。

(3) 永春、德化和安溪回族

1938 年，曾调查德化一家蒲姓族谱和永春达埔蒲姓，知其为元末明初，避反蒲风潮迁来。此两地蒲姓，多经营香料业。这又证明了他们是由泉州内迁的。还有安溪县城内新华东路有蒲坂巷，还住有蒲姓居民，在桥头还保存一座清代蒲姓古厝。安溪县文庙还保存一方蒲氏古墓碑。

现在泉州的伊斯兰教徒，仍保留有其丧葬习惯和仪式。下面是他们的葬俗的略述，以备研究者参考。

葬俗。临归真(死)时要搬在大厅边，用床板三块。归真后要横于正厅中，生前汉衣服全部脱去，用“小乌单”(布)盖之。归真后要随即点“晏息香”。全家子孙(后代)身穿白孝服，往大殿请阿訇念天经。同时，请用水者(为死者洗身的人，约三、四人)，孝男要手捧头白到用水者家中请(无论用水者生、喜事或结婚，孝男均可穿白衣、头白进入)。

用水者对“买提”(死者)用水时，阿訇同时念经。用水的用器，水真一个、二缸清水、汤瓶二个。对“买提”洗“五时令”(洗大水。回民沐浴有分大小水)。

洗法。左手先，右手后，各洗三遍。进前、后(洗下身)各三遍。进前后完时，须从左手先，右手后，再各洗三遍。然后开始漱口、哈鼻、洗面各三遍。后就洗全身。从上身洗至“肚才尾”(肚脐)为之上水，由肚才尾至脚尾(脚尖)为之下水。上水可流下身，下水是不能流上顶身(上身)。“买提”身上穿“丕奴汉”一件，前过脚湾(膝盖)，长四尺，后过屁股，长三尺半。“小乌单”三幅，长六尺九寸，“大乌单”三幅，长七尺半，礼拜帽一个，脚套一双，手套一付。洗巾二条(上、下身各一条)，洗后扶过“他富”(棺材)中的七星板。

阿訇边念天经，边制七窍棉(用樟脑、茶心、米、棉)，做七粒，放在“买提”七窍。完毕后，“买提”用七星板装进“他富”，头转向北，面向西。洗“五时令”(洗大水)的六个人，连同阿訇向西赞圣。以后就可抬上山，但出葬时是不能动鼓乐的，整个过程中，子孙均不能啼哭。

坟地是用太兴砖 375 块，砌成 17 层。(374 块)砖不能打断，剩下一块作为“买提”的枕头。坑边要围“围墙”(白布写《古兰经》，长一丈六寸)。“买提”未下坑前，坑下要铺香末、京料、介

末、坛末等数十斤，樟脑少许作为底。“买提”要下坑，中身的带要用孝男的头白；头、脚要用用水者的头白。“买提”下坑后，用水者要下坑为“买提”解开面部的带，面要向西，然后再散些香末，上面要盖天枰（白布写《古兰经》）六尺五寸，后用石板七条盖在坑上。始用灰土、墓盖。阿訇要在墓前念经。孝男要抱香炉在墓四周一转，抓挖上的土一小撮，放在香炉中，就可回家。

安土后，随即煎“油香”四十天（现改为七天）。孝男和阿訇连续要游魂四十天（在天未亮要到死者墓前念经）。大厅中要搭起用水铺、床板三块，放死者衣服四十天，四十天后，将死者衣服送给用水者。

在埋葬过程中，无洗“五时令”的人均不得见到死者，无洗“五时令”为之不洁的人，所以埋葬时拒绝汉人观看。

十九、泉州古伊斯兰教论丛

吴幼雄

（一）蒲寿庚家族事迹考评

8世纪后半叶，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尤其注重对东方印度与中国的通商。9世纪中叶，泉州因广植美化城市的刺桐花和海外贸易的发展，而以刺桐城称誉世界。自10世纪至13世纪，泉州港进入鼎盛时期，以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为主体，亚、欧、非等地区的商人接踵而至，泉州遂发展为中国东南沿海的贸易中心，与南洋群岛、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东亚等贸易区连贯一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一环。在中外关系史上，阿拉伯穆斯林海商蒲寿庚及其家族成员，占有特殊的地位。日本史家桑原氏研究唐、宋、元中西通商史，“以蒲寿庚之事迹为经”。1957年，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披露泉州蒲氏家谱。1983年，陈自强撰文，纠正蒲寿庚“擅蕃舶利三十年”（《中国史研究》），认为仅任市舶几个月。1987年，太平在《中国史研究》发表《蒲寿庚事迹》短文，披露蒲氏弃宋降元时实力，有“家童数千”，愿“保护东南一隅……必保无虑”。这表明学者对蒲寿庚在中外关系史上重要地位的充分重视。本文就新发现的蒲氏家族史料，进一步对其迁徙、国籍、弃宋投元、历官及其主要家族成员事迹，加以考评。

—

泉州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地位怎样？蒲寿庚家族何时迁移泉州？大凡谈中外关系史，必讲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两条路沟通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就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汉武帝的使臣张骞，第一个穿越这条后来成为丝绸之路的路线。1291年，马可·波罗则从这条路的另一端出发来到中国。现今，这条路上的喀什（疏勒）还保存着一个古代伊斯兰教的圣迹——纪年石柱。据载“喀城外有回教和卓祠堂，门外刻石柱纪年，一年一画，以派噶木巴尔初生为元年”^①。“和卓”一词，《元史》作“火者”，作“官称也”解，即美号非名也。“派噶木巴

^① 清雍正、姜炳奎、星桥等编辑《西政挈要》卷五。

尔”即《元史》的“别奄伯尔”，也即穆罕默德圣人。据喀什和卓祠堂刻石柱上纪年上推，石柱当竖于唐高祖武德六年（公元623年）。

泉州为继广州之后兴起的唐、宋时代海外贸易大港，在后期且远超广州之上，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极重要的一站。在泉州亦遗留有反映海上丝绸之路历史的唐武德间（公元618~626年）伊斯兰教圣迹——灵山三贤、四贤圣墓的传说。可见古代北方的喀什和南方的泉州在丝绸之路上地位的重要。

入宋之后，陆上丝绸之路完全阻断，海上丝绸之路迅速发展，泉州的地位越发重要。1087年，设置市舶司。入南宋，逐渐取代广州，上升为东方大海港。时号称白番人的“本占城之贵人”的蒲姓（蒲寿庚之祖父），“乃请于其主，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主许焉”。自此，广州的“舶事实赖给其家”。至嘉定初年，居广州的蒲姓，“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堰皆废”、“家资益落”。蒲寿庚之父蒲开宗自广州迁泉州，蒲寿庚及其兄蒲寿成。遂定居泉州，后成为宋元鼎革之际的两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亦对元初福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研究蒲寿庚家族的事迹，是研究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课题。由于明代的正统观念和盲目排外思想的影响，有关蒲寿庚家族的史料保存甚少，为后代研究蒲寿庚家族行迹增加不少困难。历史上对蒲寿庚家族，特别是对蒲寿庚的评价亦有分歧。

二

蒲寿庚的国籍，诸史、志和蒲氏家谱记载不一，应以与蒲氏同时人的记载为准，现举数例于下考证。

郑所南《心史·大义略》云：

泉州蒲受耕，祖南蕃人，富甲两广。

（郑所南《铁函心史·大义略叙》）

王磐《藁城县志·董文炳遗爱碑》云：

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童数千。

（嘉靖《藁城县志》卷八，王磐《董文炳遗爱碑》）

王磐《董文炳神道碑》记：

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来降。寿庚本回纥人，以海舶为业，家资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

（嘉靖《藁城县志》卷九，王磐《董文炳神道碑》）

董文炳、王磐与蒲寿庚为同时代的人，王磐在董文炳《遗爱碑》和《神道碑》里，一说蒲寿庚“本西域人”，一说“本回纥人”，这似乎是矛盾，其实不然。古代关于西域一词的概念，从广义说陆路指阳关以西，以及葱岭以西都称西域；海路的西域则泛指南洋群岛以西的地域。陈垣早在《西域人华化考下》指出：“回回、回纥，元人亦视为一。”^①又考证云：“元人公牍文字，多从俗用回回，至于士大夫执笔为文，则辄易回回为回纥，以回纥之名较古雅也。”关于回回即回纥的问

^①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下，《燕京学报》第2期。

题,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也记载十分清楚,云“回回有数十种,亦无姓,回回即回纥也,彼俗不食猪”。则知在元朝人看来,回回、回纥系指西亚诸伊斯兰教国的伊斯兰教徒,其祖国在今阿拉伯。郑所南《心史》说蒲寿庚“祖南蕃人”,系指明其祖先是从南方海路来泉州的回人。

宋岳霖的儿子岳珂撰《桯史·番禺海獠》,所记即蒲寿庚先世在广州的活动,记云“其最豪者蒲姓,号白番人,本占城之贵人也……愿留中国,以通往来之货……舶事实赖给其家。岁益久,定居城中……富盛甲一时……性尚鬼而好洁,平居终日,相与膜拜祈福。有堂焉……而无像设……堂中有碑……上皆刻异书……是为像主,拜者皆向之……后有窣堵波,高入云表……望之如银笔……余后北归……言其富已不如曩日,池匱皆废”。而《闽书》记:“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蕃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①则知蒲寿庚之先祖长期居留广州,“总诸蕃互市”,广州的“舶事实赖给其家”。《桯史》完成于嘉定七年(公元1214年),所记蒲氏“其富已不如曩日”之事,必定在嘉定七年之前。蒲开宗名字在泉州地方史上第一次出现是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则知蒲开宗自广州迁徙泉州当在嘉定七年至绍定六年之间。有关蒲寿庚及其家族的国籍、族属,至此当确定无疑。

三

蒲寿庚在咸淳末因击海寇有功,累官至福建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②。可见,宋末蒲寿庚掌握了相当的兵力和海舶。嘉靖《藁城县志》的董文炳《遗爱碑》和《神道碑》,为我们了解蒲寿庚的海上实力提供了具体数字。《遗爱碑》云,蒲寿庚有“家童数千,及降,愿与子男、家人保护东南一隅”。由此,则知蒲寿庚投元时海上实力有数千人。因此他敢于向董文炳保证“必保无虞”。《元史·董文炳传》云:“寿庚素主市舶,谓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捍海寇,诱诸蛮臣服。”^③其中“捍海寇”一句,在《神道碑》里得到解释,所谓海寇,即指“张世杰出海上”。蒲寿庚在弃宋投元过程中所起作用的问题,记载较详细的当推《宋史·瀛国公传》和《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位》。《宋史》记云:

是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市舶,擅蕃舶利者三十年。是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有资。寿庚乃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是移潮州。

(《宋史》卷四七,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传》)

《宋史纪事本末·二王之位》则载:

帝至泉州,舟泊于港,招抚使蒲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

(《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八十二,《二王之位》)

以上两书所记略同。然明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此历史事件则评论说:“宋外惧敌师

① 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

③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列传第四十三,《董文炳传》。

之侵，内惕寿庚之叛，不得已而走漳，不得已而走潮，以入海也。当其驻跸福州之初，而已知其势之必至此也。”^①

学者一般认为，蒲寿庚的弃宋投元始于泉州“闭门不纳”景炎帝赵是^②。新近发现，宋黄仲元为南宋殿前司左翼军统领夏璟撰写的《夏宣武将军墓志铭》披露了蒲寿庚新的史料。墓志铭为蒲寿庚“请驻跸”，“张世杰不可”句，亦为顾祖禹的“内惕寿庚之叛，不得已而走漳，不得已而走潮，以入海也”句提供史料证明。墓志铭云：

宣武旧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海云蒲平章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士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之力居多。观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观其所主，知在下之能。蒲平章举最，太史书勋，乃刻符印以偿优劳……若省都镇抚福、泉、兴化镇守。

（黄仲元：《黄四如集》卷四，《夏宣武将军墓志铭》）

从蒲寿庚指挥夏璟“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三句看，蒲寿庚的弃宋投元不是始于泉州的“闭门不纳”赵是。则知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五月，瑞安（温州）之役，蒲寿庚早已指挥夏璟的左翼军，挫败防守瑞安的陈宜中，破坏文天祥守瑞安计划。接着，蒲寿庚又在温陵（泉州的别称）配合夏璟逼景炎帝走潮州。随即，蒲、夏又“捷三阳”（广东的海阳、揭阳和潮阳，即潮州地区），逼宋皇室“以至入海”，南宋败亡。张世杰对蒲、夏在瑞安一役的作用，可能有所觉察，故不同意赵是驻跸泉州。待张世杰在温陵受挫退入潮州，为挽回颓势，于景炎二年（1277年）七月，回军泉州，以图报复，然宋运将终，张世杰已无回天之力。

可见，蒲寿庚在亡宋中所起的作用，比过去史家的看法还要重要，且时间更早。《夏宣武将军墓志铭》提供了蒲寿庚行迹的新材料。联系董文炳《神道碑》，蒲寿庚敢于向董文炳保证，而董文炳也相信蒲寿庚能“保护东南一隅”（即瑞安、温陵、潮州等闽、浙、粤沿海地区）对付张世杰，并且“必保无虞”。这是因为蒲氏除有“家童数千”外，又有南宋负责海防的精锐陆海军——夏璟的殿前司左翼军受他指挥的缘故。蒲寿庚在宋末元初其地位之重要于此可知矣。

四

研究蒲寿庚仕元的事迹，也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课题。据《八闽通志》载：“元以寿庚之功，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考福建平海行省之设在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元史·成宗本纪》记：“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这次在泉州设省是应平章政事高兴的建议，目的是“窥琉球”（台湾），因“泉州与琉球相近”，但不见蒲寿庚之名。所以大德元年，蒲寿庚不可能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

泉州北门外清源山纯阳洞，有一段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篆刻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摩崖石刻，记云：

宋季兹山悉毁……我朝至元十有八载……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

^①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五，《福建读史方舆纪要叙》。

^② 《闽书》卷一百五十二和《元史类编》卷十八。

资之，规制比于曩时……复得信斋万户孙公，心泉之孙一卿蒲公相辑事，故能若是。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元二，《重建清源纯阳洞记》）

这是元人提到蒲寿庚确任行省平章政事的摩崖石刻。但此石刻距蒲氏仕元几达六十年，亦无蒲氏任行省平章政事的确切时间。

然《夏宣武将军墓志铭》云，“海云蒲平章器爱之……蒲平章举最”，连续两次提到蒲寿庚确任行省平章政事。该墓志铭撰刻于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距宋亡二十三年，且既为赞扬夏璟而提到蒲寿庚，又点明蒲、夏的主属关系，这是完全可信的。

据蒲寿庚历官由低位到高位的事实，行省平章政事为其最高官职。考蒲寿庚曾三次任行省中书左丞。第一次，是至元十五年八月，“以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第二次，是至元十八年“诏福建行省左丞蒲寿庚”；第三次，是至元二十一年九月，“诏江淮行省左丞蒲寿庚……等分省泉州”。又据《元史·百官志》称，“至元二十二年，以福建行省并入江西”。则知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福建行省并入江淮行省，又为转输方便，蒲寿庚受命以行省左丞分省泉州^①。这便是蒲寿庚任行省平章政事的记载，但仅隔几个月，行省并入江西，可见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的时间是不长的。

蒲寿庚的长子蒲师文，亦仕于元。据元吴鉴《岛夷志略·序》云：“世祖皇帝既平宋氏，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抚使蒲师文，宣抚诸夷。”又据清丁午《城北天后宫志·封天妃诏书》云：“至元十八年诏曰：今遣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元帅兼福建道市舶提举蒲师文，册封尔为护国明著天妃。”而明嘉靖抄本《泉州南门忠所蒲姓族谱》记蒲师文“大德元年，以文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所以《八闽通志》所谓蒲寿庚“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是把蒲师文误作蒲寿庚。

《元史·世祖本纪》载册封护国明著天妃是至元十五年八月，与《城北天后宫志》所记时间有出入，应以《元史》为准。由于至元十五年蒲师文的“宣抚诸夷”。至元十六年六月，“占城、马八儿诸国遣使”来献^②，蒲师文借其父蒲寿庚“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③的影响，达到出使的目的。蒲氏父子相袭为行省平章政事，对发展元代泉州的海外交通和促进中外关系的发展影响尤大。

《癸辛杂识续集》卷下载：“泉南有巨贾南蕃回回佛莲者，蒲氏之婿也，其家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癸巳岁殂。”“癸巳岁”，为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泉南”为古代泉州的另一别称。“佛莲”即巴林，为波斯湾西岸之伊斯兰教国。所谓：“佛莲”者，即指从巴林来的穆斯林商人，伊斯兰教徒有以其籍贯为人名的习惯。从时间察考，至元三十年与《八闽通志》所谓大德元年蒲寿庚（应为蒲师文之误）“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一事，相距仅有四年，与蒲寿庚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亦仅有10年。可见“蒲氏之婿”亦为蒲寿庚家族的成员，则知元代蒲寿庚家族在泉州的政治、经济实力之雄厚。

^① 吴幼雄《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福建论坛》1988年第2期。

^② 见《元史·世祖本纪》。

^③ 见《董文炳神道碑》。

五

有关蒲寿庚家族成员活动的研究，亦为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桯史》记蒲氏家族先世“本占城之贵人”，久居广州“富盛甲一时”，后“其富已不如曩日”。《闽书》则记蒲寿庚之父蒲开宗，“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蒲开宗于嘉定至绍定间迁徙泉州。因贸易资财捐官有功，南宋政府授予“承节郎”官衔。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蒲开宗捐财并亲自主持重修故泉州郡守倪思祠。为此，郡守真德秀誉之为“能以役自任”之“好义者”^①，又捐财重修泉州城东北郊四十一都长溪桥^②。则知蒲开宗为宋代泉州的一位急公好义的阿拉伯商人。

蒲寿宬《心泉学诗稿》有两首诗提及蒲开宗的坟地，为现今寻找蒲氏家族遗迹提供了可靠的线索。诗录于下。

蒲寿宬“岁暮度朋山岭，登山庵追慕先人，不胜悲怆，因用杨敬夫韵”。诗云：

岁寒霜露感，况复度高深。
云木犹如此，苔矶不忍临。
溪流一线碧，门对两山岑。
含涕危亭曲，遗言尚可寻。

（蒲寿宬《心泉学诗稿》卷四，《四库全书》，集部四，别集类三）

岭后山庄

感慨重来岁月深，手栽松柏已成林。
万山自此无南北，一水长流不古今。
先训叮咛犹在耳，老吾寂寞自沾襟。
君恩已遂祈闲请，莘野归耕是本心。

（《心泉学诗稿》卷五，《岭后山庄》）

诗中提及的“先人”、“先训”，系指其父蒲开宗。则知蒲开宗葬于泉州北门外朋山岭，即今双阳山。这就为追寻蒲氏家族遗迹提供具体的地点。

《八闽通志》记，泉州东南郊外晋江出海处宝觉山上，旧有天风海云楼，又称望云楼，“楼为蒲寿庚建，以望海舶。”《晋江县志·山川》以为非是。然蒲寿宬的诗证明《八闽通志》所记确凿，其诗云：

题海云楼下碧万顷亭
倚阑心目净，万顷一磨铜。
欲画画不得，托言言更穷。
阴晴山远近，日夜水西东。
此意知谁会，鸥边独钓翁。

蒲寿庚号海云，《夏宣武将军墓志铭》和《重建清源纯阳洞记》都有海云名号出现。故天风海云楼（又名望云楼）即海云楼当属无疑，《晋江县志》所记为误。海云楼的作用一如广州的海山

①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二十五，《重建太守倪公祠记》，万有文库。

② 乾隆《晋江县志》卷二，规制志，六，桥渡。记蒲开宗于淳祐六年（公元1246年）重修长溪桥。

楼，专为瞭望海舶的进出港而设。

蒲寿歲出身行伍，从他们的《登师姑岩》一诗可知。登山岩“见城中大阅，恍如阵蚁，因思旧从戎吏，亦其中之一蚁”，感而赋诗云：

晨起扪层巅，苍茫见尘市。

鼙鼓生远陴，壶蠡在幽耳。

遥知细柳屯，于时阅军士。

俯彼万铠群，微哉一窖蚁。

.....

昔在群蚁中，不知蚁是己。

长揖谢孙粮，微笑辞翦起。

蛮触胡为哉，鸡虫今已矣。

醉眼未醒时，此真尺与咫。

更陟最上头，须弥亦芥子。

（《心泉学诗稿》卷二，《登师姑岩感而遂赋》）

诗系触景生情，抒发宦途坎坷的郁抑之情，然亦道出他早先出身行伍，并担任军官。蒲寿歲又是一位受中国文化熏陶甚深的回回诗人。陈垣《西域人华化考》把他列入《儒学篇》，他著有《心泉学诗稿》和《心泉诗余》。蒲寿歲别号心泉，他通过徐懋功交结宋末诗人刘克庄（公元1187~1269年），刘克庄在《蒲领卫诗》一文中介绍尤详，云：

心泉蒲君示余诗百三十，古赋三。前此二十年，君家有陶猗之名，余未之识也。后君家资益落，诛茅泉上，余始诗为赋。又十年，乃见君诗。^①

刘克庄求学于真德秀而逝于宋亡前数年，刘克庄所谓“前此二十年”，蒲家“有陶猗之名”，这印证了《桯史》所记，时蒲家在广州“富盛甲一时”，“其挥金如粪土，舆皂无遗，珠玑香贝，狼藉坐上，以示侈”的记载。这表明在蒲寿庚的祖辈，在广州仍是“陶猗之名”的回回富豪，但因“后君家资益落”，蒲寿歲才转而攻诗赋。即便如此，蒲寿歲仍保有“领卫”的官衔。

蒲寿歲曾作《投后村先生刘尚书》诗赠刘克庄，诗云：

采松北山下，日与樵者亲。

寸尺拾遗坠，时以供炊薪。

朝跻白云冈，暮宿芳草滨。

疏泉溉其本，镜心澄尔神。

（《心泉学诗稿》卷一，《投后村先生刘尚书》）

诗反映了蒲寿歲因家境衰微和宦途不顺，而有心隐居山林，孤芳自赏的心情。刘克庄是深知蒲寿歲心事的，又蒲寿歲曾要求刘克庄为隐居地“泉上”题字，刘克庄在其杂记《心泉》一文中答云：

初，君行山间，得泉一泓，爱之，有会于心，即其所结芦，扁曰：心泉。曰：渴饮泉，饥读书，终吾身于此矣……余非君，安知君之心然，即泉名以求其义，盖有可得而言者。夫泉

^①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一，题跋，《蒲领卫诗》。

至清，挠之则浊，心至虚至明，泊之则昏。善疏泉者，必澄其源，否则末流之弊河汙济矣。善治心者，必端其本，否则毫厘之差舜为跖矣。以此复君，可乎？……君既厌铜臭而慕瓢饮，舍尘居而即岩栖。以心体泉，以泉洗心，于游息之间，备仁智之事，虽圣贤复起，必不麾之门墙之外矣。因次其语，为君勉。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百十二，字说（杂记附），《心泉》）

刘克庄力戒蒲寿宬，“必澄其源”，“必端其本”，并进一步指出“既厌铜臭而慕瓢饮”，那么“虽圣贤复起，必不麾之门墙之外矣”。刘克庄的告诫，有弦外之音，宋末蒲寿宬是否复出，史无定论。明《万姓统谱》记“咸淳七年（公元1271年），知蒲州”。蒲州在山西，时早非宋地，谬误无疑。明《大明舆地名胜志·泉州志胜》记“寿宬授知吉州，不赴”。《广东通志》则记“蒲寿宬，咸淳七年知梅州”。然《心泉学诗稿》有《梅阳寄委顺赵君》、《梅阳郡斋铁庵梅花五首》和《梅阳壬申劭农偶成书呈同官》等诗。梅阳即广东的梅州。壬申，即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则知咸淳七至八年，蒲寿宬确实复出任梅州郡守。宋元鼎革之际，蒲寿宬的复出，说明刘克庄是有预见的。

历史上因正统观念的影响，对回回蒲寿宬的行迹评价颇多微词。但从《梅阳壬申劭农偶成书呈同官》诗的内容看，蒲寿宬是一个循吏，即为一位清廉知州。诗云：

举酒劝尔农，更为我依劝。
车笠虽不同，所谐此孟饭。
或耕在畜畲，或耕在方寸。
膏雨足一犁，田头怯呼唤。
五百维莠骄，胥徒乃蟊患。
与国充耘籽，勿使地蒿蔓。
幻体饥渴同，世味甘苦半。
盘中一粒餐，锄下几滴汗。
光阴驶历快，彼此不可玩。
岂为许行言，劝课在兹旦。
老父倾耳听，童稚绕屏看。
相顾持我语，取信如执券。
安得佣耕人，从今不言倦。

（《心泉学诗稿》卷一，《梅阳壬申劭农偶成书呈同官》）

一个回人的知州，能体味汉族农民的辛苦，理解“盘中一粒餐，锄下几滴汗”。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蒲寿宬身居梅州知州高位，却与当地汉族农民比作“车笠虽不同，所谐此孟饭。或耕在畜畲，或耕在方寸”。这里，蒲寿宬说出了梅州知州与汉族农民同样都是人，都要吃饭，只是分工的不同而已，一个耕在“畜畲”，一个耕在“方寸”罢了。因此，蒲寿宬在劝农诗的第一句云“举酒劝尔农，更为我依劝”。一位封建官员真正有“民为贵”思想，确实是难得的。

蒲寿宬在宋元交替之际的作用。据《闽书》载：“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宬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重纂福建通志》则云，“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

海贼寇泉州境，西域人提举市舶蒲寿成、寿庚击退之”。这表明宋运将终，蒲寿成应运复出，与其弟蒲寿庚击海寇立功，因而成为元朝灭宋争取内应的主要对象。所以，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二月，元将“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成兄弟”^①。

陈垣《西域人华化考》（上、下）曾列举元代大量回人学习汉文化的事例，其中也包括蒲寿成的诗赋成就。就我国东南沿海伊斯兰文化研究而言，可以通过研究蒲寿庚家族的活动来揭示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相互影响的事实。蒲开宗捐资并主持重建宣扬儒学的泉州郡守倪思祠。刘克庄对蒲寿成习汉诗词给予相当的肯定，称他的四灵体诗“变现光怪，脱换骚雅，使退之见之，必引而进之卢孟之间矣”。

蒲寿成的思想受道家的影响甚深。他的《心泉》诗云，“冷冷一涧泉，炯炯千树雪。岁寒铁石心，山中玩芳洁”（卷六）。他对泉州清源山道教纯阳洞寺观犹感兴趣，经常登临栖宿。《心泉学诗稿》有《纯阳洞读书和中山陈礼郎韵》（卷二）、《又题纯阳洞》（卷二）、《题纯阳洞》（卷四）、《题纯阳洞》（卷六）等四首。他以“弄珠寄南海，移文讥北山。出处虽异位，梦觉同一关……羞羨鹤俯仰，空悲马班桓。终南在何许，得去何须还”（卷二，《和中山陈礼郎韵》）诗，抒发了他对仕途不顺和对世俗厌倦的情绪。又以“仰觉云汉低，俯见尘市窄……身骑鵠鵠枝，目渺大鹏翩。更有千载人，幽岩蜕空魄。朝蹕一片云，夜啸百丈石……松槿虽殊途，宇宙同作客”（卷二，《又题纯阳洞》）诗，抒发了他的“理义贵自得，神仙谅非难”（卷二，《和陈礼郎韵》）的道家无为思想。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回回蒲寿成、蒲寿庚兄弟，协力捐财重修清源纯阳洞道、佛寺观。不久，蒲寿成之孙蒲一卿又与万户孙天有（大德间任）捐资再修清源纯阳洞寺观，他们的名字皆列于摩崖《重建清源纯阳洞记》之上，则知蒲一卿亦为一位社会名流。纯阳洞记碑文出于文人兼佛教徒之手，正如碑记所云：“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乃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元初，掌握政权的回海云平章蒲寿庚与其兄蒲寿成，以及蒲寿成之孙蒲一卿，三人先后重建清源纯阳洞佛、道寺观的事实，则知元代泉州的佛、道、儒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相互关系。《晋江县志》记蒲寿成有另一个孙子，云“蒲仲昭，祖心泉，‘故梅州太守，知宋祚将危，隐身读书，遗诗若干卷，刘克庄序之。仲昭世其业而游居于泉’”^②。则知蒲仲昭（字一卿）亦为一位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回回诗人。蒲寿成及其后裔的擅长中国诗赋，是阿拉伯文化在中国受儒、道、释文化影响的典型事例。

自南宋至元朝，中国东南沿海出现长江三州、泉州和广州等三个贸易区，它们与海外都有直接的联系，而以泉州贸易区为中心。有的阿拉伯商人自苏州府太仓、杭州迁徙泉州，有的则从广州迁移泉州。蒲寿庚家族则是从广州迁泉州的典型阿拉伯穆斯林商人，他们对发展中外贸易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大贡献。至今，泉州还保存着中古阿拉伯穆斯林宗教遗址和大量宗教石刻。对蒲寿庚家族事迹的深入研究，是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 《元史》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

^② 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二，人物志，六，文苑，蒲仲昭传。

(二) 元代泉州八次设省与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考

宋元鼎革之际，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主市舶蒲寿庚以泉州城降元，加速南宋政权的覆亡。蒲寿庚降元后，元世祖授他“闽广大都督兵马招讨使”^①，又授“提举福建、广东市舶事”^②。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八月，“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③。这表明元廷十分重视泉州港的海外贸易。元世祖征日本、占城、缅甸、爪哇和元成宗的“觇琉求”等军事行动，泉州港都有特殊的重要地位^④。此后的数十年中，泉州海外贸易仍居于全国首位。

为适应海外交通的发展和频频的军事行动之需要，元廷屡次在泉州设省治。元代泉州设行省的过程，《元史》虽有记载，但颇有遗缺或互有矛盾。至于蒲寿庚是否任行省平章政事官职，也是史学界至今没有解决的问题。本文依据《元史》的记载，并参照地方志书、墓志铭、碑记和摩崖石刻进行考证，务求在元代泉州多次设省治和蒲寿庚任行省平章政事这两个问题上，作些探索。

至元年间泉州五次设省

《元史·地理志》载：“(至元)十五年，改宣慰司为行中书省，升泉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福州路。十九年，复还泉州。二十年，仍迁福州路。”

似乎至元间仅十五年和十九年，泉州两度为福建行省之省府，其实不然，据《元史》其他有关章节记载，至元年间，泉州设省有五次之多。

《元史·地理志》记，至元十五年，泉州设省，“领录事司一，县七”(晋江、南安、同安、德化、永春、安溪和惠安)。而《元史》又有至元十七年春正月，“敕泉州行省”和是年正月，“置行中书省于福州”，以及四月，“以隆兴、泉州、福建置三省不便，命廷臣集议以闻”，“诏忙古带仍行省福州”的记载。由此可见，在至元十八年泉州行省迁往福州前，于至元十五到十七年，泉州首次设省，先为福建行省治所，后又改为泉州行省省府。

《元史·世祖本纪》记，至元十七年五月，“福建行省移泉州”，而是年七月，“徙泉州行省于隆兴。”这就是说，至元十七年五月，“福建行省与泉州行省合并，徙治泉州”。此为泉州第二次设省。但是，仅隔两个月(即五月至七月)，泉州行省就迁徙江西隆兴了。

《元史·世祖本纪》载，至元十八年十月，“于扬州、隆兴、鄂州、泉州四省，置蒙古提举学校官各二员”。则知至元十八年十月，泉州行省已由江西隆兴迁回。而十九年五月，又“并江西、福建行省”，泉州就为江西、福建的省府。直到至元二十年三月，“并泉州行省入福建行省，”省会“仍迁福州路”为止。这是泉州第三次设省。

① 《元史》卷九，本纪第九，世祖六。

② 何乔远撰《闽书》卷一百五十二。

③ 《元史》卷十，本纪第十，世祖七。

④ 《元史·世祖本纪》和《元史·成宗本纪》。

《元史·世祖本纪》云,至元二十一年二月,“以福建宣慰使管如德为泉州行省参知政事,征缅”。可见,此时泉州又已再次设省了。此为泉州第四次设省。

《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一年九月条记:“中书省言:福建行省军饷绝少,必于扬州转输,事多迟误。若并两省为一,分命省臣治泉州为便。诏以中书右丞行省事忙兀台为江淮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其行省左丞忽刺出、蒲寿庚,参政管如德分省泉州。”这说明至元二十一年九月,福建行省并入江淮行省,又为转输方便,蒲寿庚授命以行省左丞分省泉州,行使行省平章政事职权。此为泉州第五次设省。

综上所考,在至元年间,泉州五次设省。如此频繁更置,究其原因,其一,是为了加强镇压福建、江西人民的反抗;其二,是为了对外征战之需要;其三,是为了转输“下蕃使臣进贡货物”^①和军饷的需要。

大德元年至六年泉州第六次设省

据《元史·成宗本记》载,大德元年春(公元1297年),“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而《泉州府志》、《晋江县志》和《福建通志》又云,大德三年,罢福建行省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徙治福州。即在大德年间,仅于一至三年在泉州设省,实则不然。因为据元朝庄弥邵撰《泉州罗城外壕记》云:泉州“或建省或立宣慰司,皇帝龙飞之六载,省并江浙立宣慰司,行省右丞札刺立丁公领使司帅府。”又据弘治《兴化府志》载,莆田县城东厢乌石山上有“左丞雨,右丞雨”的摩崖石刻关于“大德庚子(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春耕乏雨,行省右丞札刺立丁持节过莆,议捐俸修庙学,大雨随至”的记载表明,大德四年,札刺立丁仍任泉州行省右丞,尚未“领宣慰使司帅府”。这恰恰证明《泉州罗城外壕记》所载的泉州设省至大德六年为事实也。此为元代泉州之第六次设省。

至正年间泉州两次设省

元大德以后,泉州是否再设省治,《元史》不载。但福州乌石山元人题名的《焦德裕题名》摩崖石刻,证实至正间泉州仍设省多年,其文曰:“岁玄默敦牂中秋后之二日,闽省参政易阳焦公宽甫,自清源归觐,道福唐。又三日,宣慰秀岩石祥甫,载酒会于乌石之道山亭。申隐信云甫,省郎镇阳毛汉卿,提举东古古纯甫,寓客南洲卞仲元,住山释绍玉与焉。”^②摩崖石刻中之“玄默敦牂”,系至正壬午之称谓。壬午为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自清源归觐”,清源为泉州之另一别称,此说明当时行省设在泉州。又“道福唐(即福清县)”、“宣慰秀岩石祥甫”云云,正说明宣慰司设在福州。题刻记“闽省参政”、“省郎”等官职,考《元史·百官志》,行中书省有参知政事二员,郎中二员,员外郎二员。而宣慰司之属则无是职名。这次泉州设省的具体时间,无考。但至少说明至正二年,泉州已有行省之设了。此次泉州的设省,直至元顺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春正月壬午(朔),改福建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为福建行中书省”,徙治福

^① 《站赤》上册,第77页。元殿阁书庄据《东洋文库》影印《永乐大典》本重印。

^② 陈榮仁《閩中金石略》卷十二,乌石山元人题名十七段,焦德裕题名石刻。

州为止。此为元代泉州第七次设省。

《八闽通志·至正近记》载,至正十七年三月,在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赛甫丁和阿迷里丁驱逐泉州官吏据城以叛”。同时,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与廉访司般若帖木儿也构兵相攻。普化帖木儿赂泉州万户阿迷里丁进福州援之。于是元廷在“至正十八年,复立泉州分省”^①,以控制泉州港。此为至正间泉州的第二次设省,亦即元代泉州的第八次设省。又据泉州清源山弥陀岩一啸台旁,《修弥陀岩记》中有关记述至正二十一年(公元1361年)修寺情况云:“会平章三旦八,御史帖木尔不花,宪使孙三宝,佥事释迦奴,捐财首创,化合众缘,易殿以石。”^②碑记表明,至正二十一年,曾被阿迷里丁所执的三旦八,已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又,至正二十二年燕只不花新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在福州击败行省参政蕃商赛甫丁(赛甫丁航海走泉州);与此同时,泉州也发生万户兼市舶阿巫那袭杀阿迷里丁事件,由此可见,至正十八年,泉州第八次设行省,一直延续到至正二十二年。按,燕只不花者,元顺帝太子爱猷识里达腊之宠臣也,其击败赛甫丁,表明元廷太子派在福建暂时得势。所以在战乱中,泉州港再次设省,其背后都有北京元廷派别斗争的影子。

蒲寿庚曾任行省平章政事

《八闽通志》载,“元以寿庚归附之功,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富贵冠一时”。但考福建平海行省之设在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元史·成宗本纪》记云:“改福建省为福建平海等处行中书省,徙治泉州。平章政事高兴言,泉州与琉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这次徙治泉州,是由于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高兴的建议,但不见蒲寿庚之名。又《八闽通志》的福建平章政事名表,亦不见蒲寿庚之名。可见,大德元年蒲寿庚担任福建平章政事之说,很值得怀疑。

吴鉴为《岛夷志略》作序云,“世祖皇帝既平宋氏,始命正奉大夫工部尚书海外诸蕃宣抚使蒲师文,与其副孙胜夫、尤永贤等通道外国,抚宣诸夷”。又明嘉靖手抄《泉州南门忠所蒲姓族谱》记蒲寿庚的长子蒲师文事迹云,“大德元年,以文功袭职,官为福建平海行中书省”。又清丁午《城北天后宫志·封天妃诏书》,于蒲师文官职作“正奉大夫宣慰使左副都元帅兼福建道(道疑应作路)市舶提举”。序中所说“工部尚书”,大约为蒲师文兼职之一。而《八闽通志》所谓蒲寿庚“授官平章,开平海省于泉州”,可能是把蒲师文误作蒲寿庚。

泉州北门外清源山纯阳洞东侧20米处,有段后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撰刻的《重建清源纯阳洞记》摩崖石刻的碑文说:“宋季兹山悉毁,猱狖宅焉。我朝至元十有八载,四松僧法昙抚迹吁悼而谋复兴。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规制比于曩时。”^③石刻中的“心泉蒲公”,即蒲寿宬,而“海云平章”,即蒲寿宬之弟蒲寿庚,“海云”为其名号。这证明蒲寿庚确实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三,建置沿革表。

② 陈榮仁《閩中金石略》卷十一,元一,《修弥陀岩记》。

③ 陈榮仁《閩中金石略》卷十二,元二,《重建清源纯阳洞记》录文。

此外,必须指出,《重建清源纯阳洞记》碑文,系出于文人兼佛教徒之手,正如碑记所云,“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乃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而元初掌握政权的伊斯兰教徒“海云平章”弟兄协力捐财修纯阳洞的事实,则知元代泉州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相互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另外问题。

蒲寿庚何时官历行省平章政事呢?《八闽通志》谓大德元年“开平海省于泉州”,但《元史》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之后,不再见蒲寿庚事迹,更何论大德元年的“开平海省”呢?《重建纯阳洞记》的另一段记事可作《元史》的很好佐证,其记云:“(至元)二十一年,县召高弟一聰踵其席,遂考故业,屋创未几,嵒木顿朽。聰备肯构之志,勤勤弗怠。越数祀而殿宇辄一新……适丁其时也,复得信斋万户孙公、心泉之孙一卿蒲公相兴辑事,故能若是。”显然,继至元十八年蒲氏兄弟二人修寺观之后,至元二十一年再次修寺,规模更宏大,又历经数年之久。但捐财修寺的却是蒲寿庚之孙蒲一卿,未见蒲氏兄弟二人名字。

《福建通志·人物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夏璟,字元臣,号存斋,泉州人。宋末官思(注:应作“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降元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力居多,蒲平章举最。”温陵为泉州之另一别称。宋末殿前司左翼军统领夏璟参与蒲寿庚降元活动,故元初蒲寿庚极为推举夏璟。此为省志记载“蒲平章”之事例。又据黄仲元撰《黄四如集·夏宣武将军墓志铭》云:“宣武讳璟,字元臣……宣武旧忠训郎殿前司左翼军统领,智足应变,勇足御军,功足决胜,海云蒲平章器爱之。河汉改色,车书共道,帅殷土而侯服,篚玄黄而臣附。是时奔走,先后捷瑞安,捷温陵,捷三阳,宣武之力居多。观其所使,知在上之德;观其所主,知在下之能。蒲平章举最,太史书勋,乃刻符印以赏优劳。”此为元朝最早明确地指出蒲寿庚曾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之石刻。

总之纯阳洞摩崖石刻和《夏宣武将军墓志铭》都指出蒲寿庚(海云)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

据蒲寿庚历官由低位到高位的事实,行省平章政事为其最高官职。考蒲寿庚曾三次为行省中书左丞。第一次,是至元十五年八月,以“蒲寿庚并为中书左丞”;第二次,是至元十八年“福建省左丞蒲寿庚言:诏造海船二百艘,今成者五十,民实艰苦。诏止之”;第三次,为前述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元世祖诏江淮行省左丞蒲寿庚等分省泉州。那么,可以推知蒲寿庚任行省平章政事应是在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之后。又据《元史·百官志》称,“至元二十二年,以福建行省并入江西”。则知蒲寿庚任泉州行省平章政事的时间是不长的。

综上考证,有元一代泉州八次设省,屡设屡废。前至元间,福建、江西人民的反蒙古贵族统治此起彼伏,元廷又频频对外征战。虽然泉州港海外贸易繁荣,但为了政治、军事目的,仍屡徙省治。大德间,为对琉求采取军事行动而在泉州设省。至正间,元廷为太子内禅问题分崩离析,江南农民起义四起,元统治已临崩溃。在此形势下,元廷亟需泉州港课税,以维持国库。为争夺对泉州港的控制权,在泉州又设行省,拉拢和利用在泉州港的阿拉伯人、波斯商人,介入元统治者内部的派系斗争(所谓亦思巴奚兵乱),战乱扩及惠安、仙游、莆田、福清和福州,破坏很大。

蒲寿庚降元后得到元廷的重用。一方面是元廷借用蒲寿庚海上力量以灭南宋;另一方面是元廷借用蒲寿庚之海舶和海外贸易之专长,以满足奢靡之需。董文炳上奏忽必烈曰:“寿庚

素主市舶，宜重其事权，使为我扞海寇，招诱诸蛮臣服。”^①这便是全部写照。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后，蒲寿庚累官至行省平章政事。《元史》成于匆促间，泉州设省记载的讹误和遗漏不足怪矣，蒲寿庚曾任行省平章政事之不载更何足论。

(三) 陈埭丁姓回族的渊源与启示

晋江县陈埭丁姓回族，自始祖丁节斋（公元1251～1298年）于元初“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②，迨元至正末，三传至于硕德（公元1298～1379年），携丁仁庵（四世）“徙居城南二十里许，是为陈江”^③，但因“元季江南方乱，硕德公商贩于外，往来苏、泉之间，未有定居”^④。直至明初，四世祖丁仁庵（公元1343～1420年）方“植业于城南之陈江，因迁居焉，业日以拓，族日以大，子孙至今广被其泽，绵绵无替”^⑤。在丁仁庵率领下，丁姓族人“栉居江上”，又因丁仁庵为人志大，“以才略雄于里中”，原陈江的“故乡巨姓”，虽“著代年远”，自丁仁庵至后，“择其一、二门第相埒者与为宾礼”。自是，丁姓族人与原著陈姓等诸族人，“环江居负海，而海潮所往来处……居民受产以为业”，他们齐心协力，与海争田，以海错为生，共同开发了陈埭，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他们为发展泉州的海外贸易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研究陈埭丁姓回族的渊源，探讨丁姓回族为发展泉州的海上贸易所作的贡献，对发展陈埭的经济，增强丁姓回族的凝聚力，保护陈埭丁姓回族的历史文物，并提高它的历史地位，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无疑地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陈埭丁姓回族族源诸说

明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陈埭丁姓回族第八世丁仪，在《谱叙》中说：节斋公以上，“仪家世莫详矣。”此后，陈埭丁姓回族的先祖问题存在着两种说法，这两种说法，均来源于陈埭《丁氏谱牒》。谱牒云，始祖“节斋公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而同谱的《感纪旧闻》则记嘉靖丙申岁（十五年，公元1536年）丁衍夏（十世）记其伯父“出所藏毅祖手书裱褚一幅……记吾家由来之系示余，其起句曰：由赛典赤回回瞻思丁云云。”则知二说分歧之时间下限，见诸记载的已有四百五十多年。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感纪旧闻》又云，“但依序中语，断以节斋公为始祖……故于赛典赤云云，置之而不究”，但又因确有裱褚一幅记丁氏由来，系由赛典赤回回瞻思丁，为了探究真实，“漫录而示我后人，有四方之志者，博采而考之。”这样，《感纪旧闻》既提出陈埭丁姓回族是赛典赤瞻思丁之后裔的问题，但又“断以节斋公为始祖”。同是丁衍夏，又于《纂述世摸》里云，“断以节斋府君为始，不敢妄有所附也”，“唯节斋府君为有据，已不能得其所自迁矣”。则知丁衍夏并未就陈埭丁姓回族先祖是赛典赤瞻思丁问题作过论断，而是摆出问题，

①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列传四十三，董文炳传。

② 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丁氏谱牒》，1980年油印本。

③ 《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仁庵府君传》。

④ 《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扳谱说》。

⑤ 泉州历史研究会编《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丁氏谱牒》，1980年油印本。

让丁姓后人去“博采而考之”。以上资料表明，陈埭丁姓族谱均承认其有史可据的一世祖是丁节斋。

现代人写陈埭丁姓回族的历史，提到陈埭丁姓是赛典赤瞻思丁的后裔者不少，见诸记载较早的有《晋江文献丛刊》第一辑（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一日出版）德辉《泉州回教概说》云“知其原籍为阿拉伯人，系咸阳王赛典赤瞻思丁之后裔”。此后，诸多历史研究者均从是说，但这些都不是专门性的考究文章，不一一列举了。

第一次考证陈埭丁姓是否是赛典赤瞻思丁后裔的文章，是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海外交通史资料汇编》（第三辑，油印本），署名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调查组的《泉州陈埭丁姓研究》一文。该文引用《陈埭丁氏执斋公图谱》所记，丁节斋卒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并联系1952年泉州城东南城基出土的赛典赤·杜安沙的阿拉伯文字墓碑，该墓碑记载杜安沙卒于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提出“两者逝世的年代，是相差四年，准之常例，谱牒中记载祖宗的生卒年月，常因时间经历久远，后世子孙辗转抄录，每有错误”，据此，“假定陈埭丁氏族谱中所载第一世祖节斋公，就是阿拉伯字碑上的赛典赤·杜安沙的汉名”。但此说一经提出，便得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鼎所长的纠正。

1960年，在泉州东门城附近发现陈埭丁姓回族始祖丁节斋的墓碑，据当地居民说，该墓碑在抗日战争胜利前从东门城基础中掘出，墓碑作汉式，圆顶，辉绿岩雕成，阴刻汉字，碑面上部横刻“大元”，中竖刻“节斋丁公墓”，右下竖刻“泰定四年”，左下竖刻“冬十月立”；墓碑背面较粗糙，竖刻“葬于东塘头灵堂山之原”。丁节斋墓碑的发现，丁节斋即杜安沙之说自然被否定了。1980年，在泉州历史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拙作《陈埭丁姓再研究》（油印稿）一文，即据丁节斋墓碑否定丁节斋即杜安沙。

1983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达生《关于杜安沙碑兼陈埭回族丁姓始祖辨》（打印稿）和1984年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63页）提出“丁姓一世祖名字为丁慎思，慎思与瞻思同音，取重读尾音丁为姓，恰为瞻思丁（Shums-eddin）”。

1984年10月，厦门大学民族调查组《晋江陈埭公社回族调查报告》（油印本，第15页）中综合比较诸说，提出陈埭丁姓回族“一世祖乃由姑苏贾货于闽泉……而姑苏地近扬州，扬州又是我国中世纪时的大商埠，那就不能排除陈埭丁姓一世祖以上的祖先时到扬州经商的蕃客的可能性”。同时，提出陈埭丁姓回族“至少元代其祖宗就已采用汉名汉姓了……这就暗喻了陈埭丁姓的先民已来华相当时间了”的结论。

比较以上诸说，我认为厦门大学民族调查组的分析和推论符合情理，但是缺乏史料证明，这是美中不足之处。本文拟就厦大调查报告的结论的基础上，再提供一些背景材料，让陈埭丁姓回族的先祖来自元代苏州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推论取得较可靠的依据。希望陈埭丁姓回族的族源学术问题，在经过较长期的探讨之后，能找到一个比较科学的结论。

二、丁节斋货贾闽泉的社会背景

宋政权南渡，财政拮据，一切倚办海舶，因此，十分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当时长江下游的南京、镇江、扬州、苏州、嘉兴和杭州，福建的泉州、福州，广东的广州等地，都有阿拉伯人、波斯

人长驻经商。至今，扬州遗留普哈丁先贤墓、仙鹤寺（清真寺），泉州遗留有灵山圣墓和通淮街清净寺，广州遗留有怀圣寺及光塔，杭州遗留有凤凰寺等伊斯兰教遗址，他们有的数世居留，与汉人通婚，逐渐汉化，取汉姓、汉名，使用汉字，但仍保存伊斯兰教信仰及其生活习俗，他们被称为“土生蕃客”或“半南蕃”。他们构成以后我国回族的先祖之一。

入元以后，随着蒙古东征军的到来，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随军东进，定居长江下游的南京、扬州、镇江、苏州、嘉兴、杭州及云南、陕西等地，他们被称为回回人，他们的上层参加了蒙古贵族对中国的统治，参加了元朝的中央政权，以及“诸道”、“行省”的政权并执掌军权。如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圣的后裔，即元初至元年间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瞻思丁和大德年间的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异密乌马儿等，他们的地位优越，高居统治地位，在元朝仍然使用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人名。他们及其部属，亦构成我国以后回族的先祖之一。

元代，泉州与苏州、杭州一带的贸易是十分发达的，元政府在苏、浙一带采取许多发展海上贸易的措施。元初，至元十四年（公元 1277 年）“立市舶司于泉州”，又“立市舶司三于庆元、上海、澉浦，令福建安抚使杨发督之。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①。《马可波罗行纪》载澉浦“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②。《嘉兴府志》记澉浦元代“番舶皆萃于浦”^③。《平湖县志》则记澉浦“番舶凑集，居民互市”^④。又据《元史》载，元初从福州、泉州贩土产到江浙出售者甚多。至元二十一年（公元 1284 年），“设市舶都转运司于杭、泉二州”。二十九年，规定“凡商旅贩泉、福等处已抽分之物……免其输税”。三十年，又定市舶抽分杂禁，“泉州、上海、澉浦、温州、广东、杭州、庆元市舶司凡七所……自今诸处，悉依泉州例取之”。至治二年（公元 1322 年），“复立泉州、庆元、广东三处提举司”，“三年，听海商贸易，归征其税”。泰定元年（公元 1324 年），“诸海船至者，止令行省抽分”。如此等等，则知有元一代，苏、浙、闽、广是以泉州为中心，形成一个海上贸易网的，由元政府实行统一管理。

宋末元初，仙游人林蒙亨作《螺江风物赋》，生动地记载元代泉州港舶来货的贸易盛况，是“胡椒、槟榔、玳瑁、犀象、殊香、百品、异药、千名，木锦之裘，葛布之筒，重载而来轻赍而去者，大率贸白金而置青铜”，待“扶桑日出，阳候波暖，舳舻衔尾……遐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仙游、枫亭出产之蔗糖，万瓮竹络，“千艘挂楫，顺风扬帆，不数日而达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北方之人京尘渴肺，储金宝以待入浦之舟，而往来憧憧若此之类，言之不尽”^⑤。这形象地反映了宋末元初，泉州的贾客繁忙地贩货于江、浙、淮、湖都会之冲的盛况。另一方面，其时江、浙、淮、湖之贾客，亦趋乎刺桐城，其盛况亦如《螺江风物赋》所载，贾客“自远方而来徙家者，复多于穴之蚁、巢之蜂”。则知宋末元初，泉州与江浙一带的贸易往来十分繁荣，江浙贾客确实如蚁如蜂似地“徙家”南来泉州贸易定居。丁节斋就属这一南迁商人群体

① 《元史》卷九十四《食货二·市舶》，1976 年，中华书局。

②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二卷第一百五十一章《蛮子国都行在城》，商务印书馆。

③ 弘治《嘉兴府志》卷十七。

④ 天启《平湖县志》卷一《疆域》。

⑤ 弘治《兴化府志》卷三十二《礼记·艺文志·词赋类》之《螺江风物赋》，有序。

中的一位“土生蕃客”的穆斯林商人。

元代，亦有泉州商人因贸易之便徙居江浙者。王彝《王常宗集·续补遗》记，元至正间（公元1341~1368年），泉州商人孙天富、陈宝生等两人，曾涉异国为海贾，“自高句丽外，若阇婆、罗斛（泰国）……诸国之来王者且飘蔽海上而未已，中国至彼者如东西家然”。后来，这两位泉州商人举家迁徙姑苏，“居吴之太仓”^①。太仓为元代新兴海港城市，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海漕置仓于此，谓之太仓……是时，海外诸蕃亦俱集此贸易，谓之六国马头”^②。太仓的浏河镇有一个古老的港口，叫刘家港，元代相当繁荣，有发达的造船业，元人海运自浏河镇入海，《古今图书集成》亦记太仓州“元为海外番舶市易处，海运从此出口”^③。明初于此漕粟泛海，郑和下西洋即选择此港为起点站。

苏州府太仓县，还保留有咸阳王庙，现在保存有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允许该寺庙存在，即该寺“住持谨守”的照单。今有的学人称此庙为马咸阳王庙，认为赛典赤瞻思丁为郑和的第六世祖。对此还有待考证。

元末明初，姑苏住着一位著名大商人，叫朱道山，也是泉州人。他因“以宝货往来海上，务有信义，故凡海内外之为商者皆推焉以为师”，则知朱道山是居留姑苏的泉州舶商首领，他于明初“率群商人贡于朝”，明太祖嘉纳，盛赞“道山之能为远人先”，于是“海舶集于龙河，而远人之来得以望都城而瞻宫阙”^④。据此，可见元末明初，姑苏与泉州港的贸易关系是十分密切的，有泉州大舶商集团迁徙居留姑苏。

质之《螺江风物赋》所载，则知宋末元初至元末明初，泉州港与江、浙、淮、湖之冲的贸易关系是十分紧密的，有泉州巨商集团迁徙姑苏的太仓州定居，亦有江、浙、淮、湖之贾客（包括穆斯林客商）“多于穴之蚁、巢之蜂”地迁徙泉州定居从事商业活动。

陈埭丁姓回族先祖丁节斋于元初“自苏货贾于闽泉，卜居泉城”。泉州另一个回族行政单位——惠安县白崎回族乡，其保存有《温陵惠邑白奇华山顶前架房梦课公派下郭氏家谱牒》，记其一世祖“德广公，自杭来泉，依例占籍法石，为法石开基始祖”，而白奇郭氏家谱的《仲远公行实》则云，郭氏一世祖郭德广，元末来泉州。可见，惠安白奇郭氏一世亦于元末自杭州来泉州定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泉州的两大回族聚居点的陈埭丁姓和白奇郭姓的始祖，都是元代自江、浙的苏州、杭州迁徙来泉州定居的。

三、丁节斋墓碑的启示

陈埭丁姓回族始祖丁节斋墓碑刻立于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但族谱记卒于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相距二十九年，可能为卒后第二十九年为其子孙重新刻立。百奇郭氏一世祖郭德广的墓碑，于1959年被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馆调查组发现，1978年收回海交馆保存，碑面右上刻“坡庭”，左上刻“百奇”和“晋”、“惠”，正中上部横刻一行阿拉伯

^① 转引自温岭《元代泉州舶商二例》，《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1期。

^②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四《江南六·太仓州》，万有文库本。

^③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六百六十九卷《苏州府部·太仓州》。

^④ 王彝《王常宗集·补遗·送朱道山还京师序》。

语字母，碑中部竖刻“元郭氏世祖坟茔”，系郭氏后裔所刻立。根据墓碑上的一行阿拉伯字母认读，仅是一行阿拉伯语字母，但组不成阿拉伯语的字、词，然根据字母的音读，则为“Yin Go zi ta-gag mou”，即汉语“元郭氏德广墓”的对音。则知这一行阿拉伯字母，它是用来拼写汉语的。这是我国明、清时期西北回民为了便于读《古兰经》和《圣训》，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开始时称“消经”（消化、理解《古兰经》），后音变为“小儿锦”。“小儿锦”是回族穆斯林的一种创造，泉州地区发现“小儿锦”，这是首次，值得注意。

“小儿锦”它不象汉语以北京话音位系统作为拼音的标准，而是使用者按各自的方言去拼写，难怪外地人读不通。此外，汉语拼音的声母，有的可在阿拉伯语中找到相应的辅音，如 f、k，即使不分清、浊辅音和发音部位，也可加上 b、d、g 之类，至于汉语中的舌尖前、后音和舌面音，阿拉伯语音位里没有，就要产生乱代替的现象。还有阿拉伯语没有元音字母，只有元音音符，所以“小儿锦”便出现随意加标意符的现象，这也难怪人们读不通。最后，“小儿锦”没有标调符号和隔音符号，完全靠读者去猜。综上“小儿锦”诸缺陷，百奇郭德广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语字母引出多种译文就不足奇怪了，因为翻译人员都是外地人。但此碑的发现，标志泉州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在西北回族的影响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标志泉州伊斯兰教文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根据丁节斋和郭德广墓碑的异同和它们所反映的社会背景，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几点启示。

其一，陈埭丁姓一世祖丁节斋和百奇郭姓一世祖郭德广等二人，元代分别自苏州、杭州迁徙泉州定居。这表明元代泉州与苏、浙贸易关系之密切，《螺江风物赋》记载和苏州朱道山的泉州商人集团就是证明。

其二，丁节斋与郭德广都是早先居留中国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裔，丁节斋自元初已用汉姓、汉名，则知他的先世已在中国居住多年，当时被称为“土生蕃客”或“半南蕃”。而郭德广于元末迁徙泉州居住，亦使用汉姓、汉名，则知其先世亦在中国居留多年，当时也被称为“土生蕃客”或“半南蕃”。丁、郭二人都是今日泉州回族的先祖。据《苏州府志》记载，苏州城内阊门外有丁家巷，巷内有座元代建清真寺，为西域人所创造，现在该地仍为丁姓聚居区。陈埭祠堂门柱刻有“派衍金阊”句。

其三，泉州陈埭、百奇等两大回族聚居点，在清代都使用过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小儿锦”，并以此为手段，释读《古兰经》和《圣训》。这表明有清一代丁姓、郭姓的回族穆斯林受过伊斯兰的经堂教育。百奇郭姓何时接受经堂教育，学习“小儿锦”呢？据资料记载，当在清康熙己丑间（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郭氏族谱》云，“陈都督讳有功仕于泉，重兴清真教，故宏隆公（十世）复入教”^①。又泉州灵山圣墓清康熙五十一年（公元 1712 年）碑记云，陈有功、陈美发动国子监回族师生捐资修缮灵山圣墓，“甫下车，即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篆”^②。回族官员陈有功、陈美等，借在泉机会，为重振伊斯兰教，聘请阿訇住持泉州清真寺，并在清真

① 嘉庆十二年《百奇郭氏族谱·修葺义斋郭公墓文》（手抄本）。

② 清康熙五十一年陈有功、陈美撰《重立先贤墓碑》，碑立于泉州东门外灵山圣墓。

寺举办经堂教育,教授阿拉伯语、《古兰经》、《圣训》和“小儿锦”。于是,清真寺成为穆斯林的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中心。从此,泉州的回族人民获得学习阿拉伯语字母,学习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方法,即学习使用“小儿锦”的机会。准此以推,则知百奇郭氏一世祖郭德广墓碑上那一行“小儿锦”,系康熙四十八年以后所为,亦即郭德广墓碑是清康熙四十八年,即百奇郭氏十世祖宏隆公重入教之后为郭氏后裔所重刻立。

陈埭丁姓回族也使用“小儿锦”,有据可查的,那是在清末宣统二年(公元1900年),竖立于泉州东门外鹿园的重刻四世祖夫妇墓碑,碑面竖刻“仁菴处士丁公、淑懿孺人庄氏墓”,碑面上部横刻两行大都错写的阿拉伯语字母,亦属“小儿锦”,但因错写太多,猜不出其意。这也反映陈埭丁姓回族,在清末仍有人接受经堂教育,使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

但经堂教育注重阿拉伯文,忽视汉语,不利于回族文化事业的发展。一些伊斯兰教的有识之士,着力改革经堂教育的形式、内容及教学方法,在穆斯林聚居的各大城市,相继创办了新的伊斯兰教学校,如1925年创立成达师范学校(1925年成立于济南,1929年迁北京),1927年创办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1928年成立四川万县伊斯兰师范学校,1930年成立昆明明德中学等等。抗战初期,成达师范内迁桂林,后又迁重庆,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坎坷历程。陈埭丁姓回族,派出自己的子弟,历经艰难,就读成达师范,至今还有数位老先生是成达师范的校友,他们对泉州地区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得以延续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其四,宋元时代,长期居留中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分南北两路进入泉州港贸易。他们对发展泉州港的海内外贸易起了特殊的重要作用。陈埭丁姓、百奇郭姓属北方南下的,而南方北上的以蒲寿庚家族为代表。郑所南《心史·大义略》记,“泉州蒲受耕,祖南蕃,富甲两广”。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云,“泉州太守蒲寿庚者,本西域人,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①。王磐《董文炳神道碑》则云,蒲寿庚“以海舶为业,家资累巨万计,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②。《闽书》则云,“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州”。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云,南宋政府授予蒲开宗“承节郎”官衔,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蒲开宗捐资,并主持重建已故郡守倪思祠,而真德秀誉之为“能以役自任”的“好义者”。从蒲开宗、蒲寿宬、蒲寿庚、蒲师文(寿庚子),蒲一卿(寿庚孙)共四代人,均取汉姓、汉名,他们长住泉州贸易、任职,蒲寿宬还是宋末元初的文学家,擅长汉文诗赋。这一蒲姓家族,是居留中国多年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后裔,他们是自南方北上泉州经商、任职的穆斯林家族,他们亦是今泉州回族的先祖之一。

从陈埭丁姓、百奇郭姓的南下泉州,和蒲姓的北上泉州贸易定居,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宋元时代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到泉州进行国际贸易,是借助居留中国数世,并已逐渐汉化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的后裔支持的。这些居留中国数世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对招邀蕃商来泉州港贸易,曾起过特殊的重要媒介作用。过去,史学界注重研究蒲寿庚家族对发展元代泉州港海外贸易的作用,而今加上姑苏的丁姓和杭州的郭姓阿拉伯人(或波斯人),于元代南下

^① 王磐《藁城令董文炳遗爱碑》,嘉靖《藁城县志》卷八。

^② 王磐《董文炳神道碑》,嘉靖《藁城县志》卷九。

泉州定居经商的史实，我们了解宋元时代的泉州港，不但一个联系上百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贸易大港，是国际贸易中心区之一，而且在国内泉州港与江、浙、淮、湖的港埠，亦组成一个密切的贸易网区，而这个国内贸易网区，亦以泉州港为中心。正如《螺江风物赋》概括的泉州港繁荣景象，是“遐琛远货，不可殚名者，辐辏于南北之贾客”。这样，我们对宋元时代泉州港的国际、国内经济文化地位有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具体的认识。也即元代其先世已来华多年，并已逐渐受汉文化影响的丁、郭、蒲诸姓的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因他们的身份特殊，他们的北上和南下泉州经商定居，对于联系元代海外阿拉伯国家商人到泉州经商，以及发展泉州与苏、浙、淮、湖地区之间的贸易关系方面，曾经起过特殊的媒介作用，证以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记载泉州港的国际、国内贸易地位，是“印度一切船舶……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一切蛮子商人常至此港……然后转贩蛮子境内”^①，则完全一致。这便是我们从探讨陈埭回族渊源的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四）百奇郭姓渊源与经堂教育

泉州回族百奇郭姓、陈埭丁姓的渊源都有过争论。随着泉州回族史研究的深入，争论的问题逐渐获得解决。但是惠安百奇郭姓回族的渊源争论，至今仍然分歧较大。族谱说源于唐代汾阳王郭子仪。本世纪 70 年代末以降，有的同志根据“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的一行阿拉伯字母，认定郭姓二世祖郭子洪为波斯人，并由此而推断郭氏在元代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参予元末对逊尼派（蒲派）的斗争，进而推论元代泉州的什叶派源于至元十九年从扬州调来戍守泉州的三千名合必军。最后得出结论，认为百奇郭姓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不同，意即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为逊尼派（即蒲派）。百奇郭姓渊源如何？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的发现和研究，又引发出泉州回族史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即“经堂教育”制度的问题。什么是穆斯林的“经堂教育”制度，它对泉州伊斯兰教的振兴和增强回族凝聚力等有何影响？这也是本文要解决的另一个新的问题。

—

关于百奇回族郭姓渊源的争论。撰于明宣德间（公元 1426～1435 年）的《毅轩公行实》载，百奇郭姓“先世汾阳忠武王派分，逮及五季之衰，支分叶茂，蔓延四方。”这便是百奇郭姓以汾阳王郭子仪为远祖说的最早记载。但此说缺乏依据，正如同谱所言，“罹于烽火，谱牒遗忘，莫考其绪”。且汾阳王是汉族，为何其后裔信仰伊斯兰教，也缺乏史料说明。

1958 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筹建。次年 4 月，组织调查组对宋元时代泉州海外交通冲要地——法石，进行详细社会调查。据宋朝《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载，“法石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② 调查组先在美山的金厝山下“西墓园”，发现数座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古墓。继而根据惠安《白崎郭氏族谱》提供的线索，对法石圣殿村金二娘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册第二卷第一百五十六章《刺桐城》，商务印书馆。

② 真德秀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万有文库本。

山下的柳公砌进行较系统的调查，并写成调查报告，发表于当年《考古》杂志上。调查过程中，发现一方刻有阿拉伯文字和汉字的回族人墓碑（即今郭德广墓碑）。1978年，郭德广墓碑收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惜已断为两段。该墓碑上的文字由四个部分组成：

1. 右上角竖刻篆体“坡庭”；左上角竖刻篆体“百奇”。
2. 在“坡庭”、“百奇”之间，横刻一行阿拉伯语字母。
3. 在“坡庭”左下刻“晋”字；在“百奇”右下刻“惠”字（因“坡庭”地属晋江县；“百奇”地属惠安县）。
4. 在“晋”、“惠”两字之间的墓碑中部，竖刻楷书“元郭氏世祖坟茔”七个字。

这方墓碑收回之后，正逢泉州出现研究伊斯兰教的热潮，人们对这方墓碑产生广泛的兴趣，许多阿拉伯语专家参加了研究的行列。首批论文在80年代初终于问世了。有的认为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文字的译文是“伊本·土尔·德广贡·纳姆”，并据此推断这是波斯人的名字，该墓主为波斯人^①。有的则译为“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并认为“纳姆”（nam）在波斯文中另一含意为“著名的”。因此这行波斯文可译为“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据此，推断“此墓为二世祖郭子洪安葬之地”^②，亦即此墓碑的主人是郭氏二世祖郭子洪。接着又从“纳姆”波斯文意为“著名的”，推断“伊本·土尔·德广贡·纳姆”被尊奉为领袖、郭系的创始人，据其教义，郭姓子孙只需瞻礼其墓而不必去祭扫灵山圣墓……即要么郭姓与敬奉圣墓的穆斯林派别不同^③。即此墓主系百奇郭氏著名的二世祖郭子洪，属波斯什叶派穆斯林，与元末“金吉与赛甫丁、阿迷里丁同派……反之蒲寿庚、那兀纳则属于逊尼派，来自阿拉伯”^④。

总之，“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的回收保存，引发了对百奇郭姓来源诸多问题的争论，即郭姓祖籍波斯，属伊斯兰教什叶派，与敬奉灵山圣墓的蒲寿庚、那兀纳逊尼派对立；百奇郭姓世祖同“金吉与赛甫丁、阿迷里丁同派，源于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由扬州来的合必军，即波斯军”^⑤。

由此看来，要解决百奇郭姓回族渊源问题的争论，必须从下面五个方面着手。

其一，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是否“源于至元十九年由扬州调来的合必波斯军”；

其二，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是否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战争；

其三，百奇郭姓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派别是否不同；

其四，“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是否郭氏二世祖郭子洪的墓碑；

其五，百奇郭氏世祖是否元末的波斯人。

《泉州府志·军制》确实记载，“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戍列城……扬州合必军，客兵也”，又记至元十九年，“又以湖州翼万户府来戍泉州，……湖州翼

^①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

^② 陈达生主撰《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第57~58页。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③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

^④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

^⑤ 同注①。

万户府，亦客兵也”^①。我国史书的所谓“客兵”，是对地方军而言的，意即外地调来的军队。所以，对“客兵”不能理解为外国军队。查《扬州图经》，亦记载“至元十九年，调扬州射士三千人戍泉州”。“合必”一名，系蒙古人名字，非波斯人名字。从扬州调来戍守泉州的合必率领的三千射士，是蒙古人组成的射士，非波斯射士。故元初的合必军与元末泉州所谓的波斯军战乱无关。

宋末至元末，泉州是否有穆斯林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斗争，甚至发展到元末酿成两大教派长达十年的反复厮杀呢？从伊斯兰教的神学角度讲，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分歧并不大。几个世纪以来，分歧一直潜伏着。自从公元 1502 年，伊朗国王伊斯玛仪以什叶派定为国教，什叶派在波斯国成为多数，势力大增，与逊尼派争正统的斗争才明显化。亦即在十六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什叶派与逊尼派只是潜伏着分歧，而无明显的争斗，因此，早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即南宋中后期及元朝），在泉州港，是不可能出现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杀戮的。即所谓“至南宋末年，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逊尼派形成势力集团……并逐步排斥什叶派”，而“什叶派以赛甫丁、阿迷里丁为首夺逊尼派（蒲）权，控制泉州……逊尼派以那兀纳为首反攻，杀阿迷里丁……什叶派以金吉为首协助陈友定杀那兀纳，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及住宅”^②的大规模、长时间、反复厮杀的说法纯属于虚乌有。也就是说，十三至十四世纪，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没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明显争斗，因此泉州也不可能有宋末及元朝穆斯林两大教派的互相杀戮。

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即赛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纳等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互相残杀，既与至元十九年扬州调来的合必军无关，又不可能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的宗教斗争，那么，元末泉州的十年亦思巴奚战乱是怎样一回事呢？

据《福建通志·元外纪》载，至正十七年三月（公元 1357），发生“泉州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合兵逐泉州官吏，据城以叛。”至正十八年（公元 1358），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与廉访司般若帖木儿有隙，构兵相攻。普化帖木儿以赂泉州万户阿迷里丁进福州援之。至正十九年（公元 1359），阿迷里丁“逼走”泉州赛甫丁，赛甫丁走省城福州，据之。^③这时，惠安人卢琦，因在宁德县政绩显著，时“又兴、泉方用师”，受帅府命“参军事往来二郡（兴化、泉州）间”。至正十九年，卢琦又以年劳擢福建行省照磨盐课司提举（当时福建有海口场、牛田场、上里场、惠安场、浔美场、浯洲场和汭洲场等七所盐场），“时有番商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场盐引自为市。琦曰：是上亏国课，下毒亭民，吾腕可断，牒不可署，竟坚卧不顾”^④。“参省”一职，据《元史·百官志》载，“参议中书省事”，是职“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牒，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⑤。卢琦抵制“以货得参省”番商的破坏元政府盐专卖行为，此以货得参省的番商是谁？竟然权力大到“胁户部”的程度。此事既反映番商在泉州港势力之膨胀，亦反映了元廷对泉州港之倚重。这位任参省之职的番商与至正十九年占据省城福州长达四年之久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军制·元军制。

② 见前引陈达生文。

③ 《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元外纪。

④ 嘉靖《惠安县志》卷十三，人物，卢琦。

⑤ 《元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五，百官一，参议中书省事。

的赛甫丁又是什么关系？可惜史无记载。

可是，赛甫丁的好景不长。至正二十二年（1362），新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合诸军在福州击败赛甫丁，赛甫丁航海走泉州。在同一时间，泉州发生市舶提举司那兀纳袭杀阿迷里丁。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元廷派系斗争的影子。元顺帝年迈倦勤，元廷以高丽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为首的太子派，逐帝左右，广树私人，与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的诸帅派开展激烈的夺权斗争，几经反复倾轧^①。泉州港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便成为两派剧烈争夺的对象（有“番商以货得参省”就是明证）。燕只不花者，皇太子私人之一也。为表彰燕只不花在福建驱逐赛甫丁和利用万户那兀纳杀阿迷里丁的功绩。至正二十四年（1364），皇太子赐他“忠孝文武”四个大字，而燕只不花则“摹勒皇太子所赐忠孝文武”于福州乌石山摩崖之上，以记“储皇之恩赐”。^②这便是元末发生在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的实质，它完全是元廷争夺帝位斗争在省和地方的反映，哪儿有什叶派与逊尼派教派斗争的影子？在这场夺权斗争中，有巨额舶来货品和课税收入的泉州港，便成为争夺的焦点。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赛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纳（当时都有“万户”的武职），只是被元廷利用而已，他们只不过成为蒙古统治者争夺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罢了。

百奇郭姓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是否不同派别呢？前文已述，元末泉州没有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争，因此也根本不存在郭姓与敬奉灵山圣墓穆斯林不同派别的问题。为了深入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查阅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调查材料。材料据百奇郭姓四房二支族谱统计，从婚姻关系看，百奇郭姓回族于明、清两代，与泉州其他姓氏回族的婚姻关系密切。如发现百奇郭姓回民自三世起就娶金、丁、葛、马、黄、迭等姓回族女为妻，其数量多达数十人，尤其与城内清净寺穆斯林联姻，与寺内阿訇联姻。此外，从墓葬地区看，族谱记载百奇郭姓回族归葬灵山圣墓穆斯林墓葬区的也多达数十人^③。所以根本不存在百奇郭姓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不同派别的问题。

百奇郭姓世祖是否波斯人呢？根据“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语字母的认读，发现它仅是一行阿拉伯语的字母，但组不成阿拉伯语的字、词，然根据该行字母的音读，则为“Yin Go Zi Ta-gag Mou”，即“元郭氏德广墓”的对音（闽南方言）。则知墓碑上这一行阿拉伯语字母，是用来拼写汉语（闽南方言）的。这种拼音文字是我国西北回民在明朝后期创造出来的，目的是便于读《古兰经》、《圣训》。开始时称“消经”，即消化、理解《古兰经》，后音变为“小儿锦”。

“小儿锦”不象汉语以北京话音位系统作为拼音的标准，而是使用者按各自的方言去拼写的，难怪外地人读不通。“小儿锦”没有标声调符号和隔音符号，完全靠读者去猜。此外，汉语拼音的声母，有的可在阿拉伯语中找到相应的辅音，如 f、k，即使不分清、浊辅音和发音部位，也可以加上 b、d、g 之类，至于汉语中的舌尖前、后音和舌面音，阿拉伯语音位里没有，就要产

^①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七，诸帅之争。1925 年，商务印书馆。

^② 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乌石山东壁亭记。

^③ 《福建省惠安县百奇回族调查报告》，第 15~16 页，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历史系、复旦大学生物系人类学教研组、上海自然博物馆人类学组联合调查组编印，1983 年。

生乱代的现象。还有阿拉伯语没有元音字母，只有元音音符，所以“小儿锦”便出现随意加标意符的现象，这也难怪人们读不通。“小儿锦”有以上诸多缺陷，那么“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的那一行阿拉伯语字母，引发出多种译文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所有的翻译人员都是外地人。既然墓碑上那阿拉伯语字母的译文不是“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和“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而是“小儿锦”（“元郭氏德广墓”），则墓碑的主人就不是郭氏二世祖郭子洪；而是一世祖郭德广了。既然论断郭德广、郭子洪为波斯人的论据不复存在，那么郭氏非波斯人亦自明。

百奇郭姓世祖郭德广既非唐朝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又非波斯人，那么郭姓的渊源如何呢？据百奇郭氏族谱《郭氏系出》记，“自五季之乱，漂泊无稽，后家于富阳，其地曰郭家村……后因元季受职，以公来泉……因纳室于泉，遂为泉之世家矣”，又据《复遵回教序》云，“我祖自开基百奇以来，曾贮天经三十部，创礼拜寺，尊经重教，认主为本”。可见信仰伊斯兰教的百奇郭姓世祖，在到泉州定居之前，已在杭州府富阳县居住数世。笔者在《陈埭回族史研究》论文集中，曾经提到宋元时代到泉州进行国际贸易的阿拉伯人、波斯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居留中国数世，并已逐渐汉化了的。这些居留中国数世并逐渐汉化的阿拉伯人、波斯人，被称为“半南蕃”。他们对泉州港的繁荣曾经起了特殊的媒介作用^①。如陈埭祖先丁节斋，百奇祖先郭德广，蒲氏的蒲开宗、蒲寿峑、蒲寿庚、蒲师文，金氏的武略将军金吉，李氏的林君和（林李同宗）和燕支苏氏的苏唐舍、苏布伯等都是这类“半南蕃”。在元末的亦思巴奚十年战乱中，新到泉州港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商人，大部分只好扬帆返国，唯有已经汉化了的后裔，在社会上已有根基，外逃又无门路，只好迁移僻静处聚居避难，以后就逐渐形成泉州地区的回族。

这样结论就十分清楚了，第一，“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主人不是百奇郭氏二世祖郭子洪，而是郭氏一世祖郭德广；第二，郭氏一世郭德广不是波斯人，而是在中国居留数世且已汉化了的阿拉伯人的后裔；第三，从“元郭氏世祖坟茔”和那行“小儿锦”判断，该墓碑是郭德广的回族后裔所重刻立的；第四，元末泉州不存在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穆斯林教派斗争；第五，泉州不存在百奇郭姓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派别有什么不同的问题。

二

百奇郭姓回族一世祖郭德广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小儿锦”发现之后，很自然地就引发出一个泉州回族历史研究的新问题，即“经堂教育”的问题。什么是“经堂教育”，它与墓碑上的“小儿锦”有什么关系，它对泉州回族有什么影响？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解决。

我国穆斯林的宗教教育，主要在清真寺内进行。即延聘阿訇，招收“海里法”（即清真寺的学员），进行讲经教学，这种教学形式称为“经堂教育”或“寺院教育”。它是明嘉靖年间由著名的陕西省阿訇胡登洲（公元1522～1597）首创的。这种教育形式的特点是：第一，它是以清真寺为中心，把教育扎根在广大穆斯林之中；第二，学员的年龄、数量、区域和修业年限，均不受

^① 吴幼雄《陈埭丁姓回族的渊源与启示》，载《陈埭回族史研究》，第24～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制约；第三，它的教材是阿拉伯文、波斯文的宗教经典，如《古兰经》、《圣训》之类；第四，为了学员读《古兰经》和学习汉语，“小儿锦”成为西北地区伊斯兰教的一种经堂文字；第五，清真寺内的学员“海里法”，其生活全由当地穆斯林捐助供养，如采取供饭制。我国西北地区穆斯林创造的这种宗教教育制度，在我国伊斯兰教教育和宗教事业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今天，还有不少阿訇是靠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但经堂教育也有它的缺陷，即其学习的内容都是以阿拉伯文、波斯文的经典为主，很少涉及中国文字，知识领域受到很大限制。更有甚者，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文字是属于汉人的文字，回族人不应该学习，这就使得伊斯兰教在我国的传播受到一定的限制。

随着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中出现经堂教育制度，明末以降，东南沿海地区的南京、苏州等地的伊斯兰学者们，却走上汉译伊斯兰教学术著作的道路。这些高度“儒士化”的回族学者，在继胡登洲的经堂教育之后，掀起了使伊斯兰文化经由汉文字这一传播媒介，走出经堂寺院而步入全社会的活动。这些“儒士化”的回族学者，借用曾被经堂教育家们视为异端邪说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反过来又以伊斯兰教义来说明儒家思想。它为汉族广大知识分子了解伊斯兰教文化的真谛，加强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交融、吸收提供了便利条件，它起了丰富中国式伊斯兰文化的效用。这正是经堂教育制度所匮乏的。

反观明嘉靖以后的泉州伊斯兰教和回族的情况，至今未发现明显地受到西北经堂教育制度和南京、苏州地区的汉译著述活动的影响。在明嘉靖、万历间，泉州的伊斯兰教和回族反而出现衰退现象，在回族内部也因受儒化的影响，出现“回儒之争”，这种争论反映在回族谱牒和回族人的墓志铭上。泉州的“回儒之争”，甚至可追溯到明宣德元年（公元1426）的泉州回族祖先的《荣山李氏族谱·垂戒论》。在这篇文章中，它谴责祖先李努“从妻为色目人”，并谴责家族中有“从母为色目人者”。认为信仰伊斯兰教是“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不行其行而行夷狄之行；俾其子孙，胥而为夷”^①。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李贽的族兄林开先（林李同宗）的祖母迭贞勤临终遗嘱曰：“吾父宽方伯，迭铉之孙也。家袭清净之教，而迨其将终也，授其祖教而嘱人以三日葬之。吾于今已老矣，朝夕不幸，葬吾礼亦当如之。”开先拜且泣曰：“敢不唯命是听。”然而，当迭氏逝世后，林开先、林奇材、林载贽等却认为“今乃欲如其命也，则有所大不忍者而侍其情。于是以周公、仲尼之道而葬之”，即以儒教葬仪，但仍按迭氏“其遗命董治棺衾，经营兆塘”，“不先不后”^②的伊斯兰教葬俗三日葬之。又如丁衍夏撰于明万历间的陈埭丁姓回族谱牒《祖教说》，在追述其祖先信奉伊斯兰教的同时，又认为其教“若上世风气之未开然也”，且认为汉化过程是“渐变以合于礼”^③。惠安百奇郭氏族谱《修葺义斋郭公墓文》载，“吾家自开基法石，德广公即从清真教”。而郭氏《复遵回教序》则云，明嘉靖年间，百奇“遭兵燹之间关，掌教失传”，此后数十年间，“遂迷染外教之风，竟蒙昧正教之则”。郭氏《适回辨》则云，“传至八世、九世，乃出教，谅在明万历间”^④。

① 《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第76页，《荣山李氏族谱·垂戒论》，泉州历史研究会编，1980年。

② 明嘉靖三十三年《明登瀛里林大母贞勤迭氏墓志铭》。

③ 《陈江丁氏谱牒·祖教说》，选自《泉州回族谱牒资料选编》第30页，泉州历史研究会编。

④ 郭志超《百奇郭氏谱牒资料辑说》，载《惠安方志通讯》第6~7期，1991年。

泉州宗教石刻

综上所述，泉州回族郭、丁、李诸姓族谱所载，明末泉州的回族普遍出现对伊斯兰教的宗教观念淡化，对用“周公、仲尼之道”的汉化过程，认为是“渐变以合于礼”。亦即在明末清初，西北回族的经堂教育和稍后的南京、苏州地区的“儒士化”回族知识分子的汉译著述活动，似乎未波及泉州地区的回族。这就表明，正当西北的回族，以清真寺为中心，以经堂教育为手段，重兴伊斯兰文化之时；正当东南沿海的南京、苏州的回族知识分子，紧继其后，开风气之先，大兴汉译伊斯兰教学术名著，创建中国式的伊斯兰文化之时。而泉州地区的回族，却在自己的内部谴责自己的祖先“不祖其祖，而祖人之祖”。这种闭塞、衰退状态，还可以从明末清初泉州清净寺的修缮历史表现出来。

明正德七年(公元1507年)，泉州清净寺的修缮，有泉州伊斯兰教“掌教夏彦高、耆旧赵尹璋、蒲景荣、迭元高等，录诸郡志全文，募众以重立”^①泉州《重立清净寺碑》。这次修寺乃回族穆斯林发起，说明伊斯兰教还有一定势力。明隆庆丁卯(元年，公元1567年)，泉州清净寺“木塔坏，知府万庆捐俸，令住持夏东升，教人苏养正等，修塔五层”。这次修尖塔，是靠官府捐俸。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泉州“地大震，楼颓其角。而寺中房屋占住者百余人，污秽破坏。知府姜志礼、知县李侍问捐俸重修。悉驱之出，仍构亭宇。令教人林日耀住持，夏日禹董其役”^②。这次修寺是知府、知县捐俸，其原因是地方官以为清净寺“兹楼之胜，于文庙有关”。撰修寺《募缘疏》及碑记的李光缙，也认为泉州清净寺“峙文庙之东，则如凤有翼而龙有角”。简而言之，泉州地方官修缮清净寺是为了“东壮青龙之左角”^③，是从儒教、道教的观点出发的，是为了增胜宣扬儒道的文庙(即孔庙)。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1年)，“泉州大风，礼拜寺塔圮”^④。此后，泉州清净寺就没有能力修复尖塔了。

综观明嘉靖以降泉州伊斯兰教和回族势力衰落的事实，究其原因，正如有的学人所指出的倭乱、大分散、小聚居，又处在汉文化氛围的包围之中等原因之外。我认为，还必须补充重要的一条原因，即泉州回族与南京、苏州和西北回族缺乏密切的社会联系，即没有普遍出现经堂教育制度和汉译伊斯兰教正宗学术著述的研讨、翻译和宣传的局面。这是导致明末清初全面衰落的重要原因。倘若认为明末清初，泉州缺少出现“儒士化”回族的知识分子，因此没能走上汉译著述的道路，事实说明这是错误的。明末清初，泉州回族的丁姓、李姓，出了不少进士、举人、拔贡。如泉州地区三世登进士者仅三家，丁姓为其一(即丁自申、丁日进和丁启睿)。自明弘治至清乾隆，丁姓回族中进士者二十六人，文人著述三十种。回族李姓的李贽、林奇材(林李同宗)亦都为著名的明末进士。我们从这些回族进士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有振兴伊斯兰教和回族的记述。这些“儒士化”又成仕宦的回族知识分子，他们对泉州回族的汉化过程是从内部起了催化的作用。反观百奇郭氏回族，甚少出现“儒士化”的知识分子，其间虽然出现伊斯兰教中断一百多年，但汉化的过程却比较缓慢。我想，泉州地区回族没能走上汉译著述道路的原因就在这里。

①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1957年，科学出版社。

② 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三、寺观，清净寺。

③ 李光缙、诸葛义编《景壁集》卷十一，《重修清净寺募缘疏》。

④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祥异。

郭德广墓碑上一行“小儿锦”与泉州回族有什么关系呢？这行“小儿锦”的发现，说明百奇郭氏有人接受经堂教育。回族郭氏何时接受经堂教育，史无记载。但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的。据百奇《温陵螺阳奇山郭氏族谱》和《奇山义房郭氏家谱》的《富阳坡庭郭氏家谱序》云，“祖坟崩塌……就于甲戌（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腊月三日，鸠族动工，合修始祖德广公坟茔”。据此，有的同志认为刻“小儿锦”的郭德广墓碑，可能竖立于康熙三十三年的修墓之时。

但据嘉庆十二年，郭导周续谱叙云，“稽吾家前之出教，谅在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2年）”。另据“十世祖宏隆公”生卒年月的附文云，“康熙己丑（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间，陈都督讳有功仕于泉，重兴清真教，故宏隆公复入教”。则知百奇郭氏出教在1602年，复入教在1709年，其间伊斯兰教信仰中断一百零七年。康熙三十三年，那时百奇郭氏已出教九十二年，故不可能有“小儿锦”出现。

康熙己丑年（公元1709年），都督陈有功在泉州重兴清真教，郭氏十世祖郭宏隆重入教，迁入泉州通淮街礼拜寺居住，在清净寺接受经堂教育，学习“小儿锦”，重竖一世祖郭德广墓碑，重振郭氏回族声威，增强郭姓回族的凝聚力。据族谱记载，这时入教者达一百多人。这里有泉州灵山圣墓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都督陈有功撰《重修先贤墓碑》记为佐证。碑记云，“眷顾温陵教门渐替……甫下车，即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篆”，而对灵山圣墓，则发现“兹墓况日颓，低徊残址，虑胜迹湮湮……独力保局，捐资临构”，“筑基址，范福地，呈乡旧父老悦兴”。所谓“延师谏督我教门诸子，学经解篆”，就是一如西北回族穆斯林的延聘阿訇，以清净寺为中心，招收“海里法”（学员），学习“小儿锦”，理解《古兰经》、《圣训》。这是泉州首次发现的回族接受经堂教育制度的记载。修灵山圣墓和清净寺，实行经堂教育，是陈有功重兴泉州伊斯兰教，重振泉州回族声威的重大措施。郭德广墓碑上的那行“小儿锦”刻于此时是适宜的。

此后，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提督马建纪在城内、百奇重兴清净寺。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提督江长贵在泉州延聘阿訇，倡导教务。这些兴复伊斯兰教的措施，多少带有西北回民的经堂教育性质，对泉州伊斯兰教的重兴和回族的振兴，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清代泉州伊斯兰教的几次重兴，都为外地来官的回族穆斯林所倡导，其共同的弱点，正如20世纪30年代张玉光阿訇所言，“只限眼前，未顾及将来；即只饰修拜殿以供礼拜，未置寺产以为当年经费；故人在势兴，人去同逝”^①。

结 束 语

百奇郭姓回族非唐朝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其一世祖郭德广非波斯人，亦非什叶派，更非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有什么不同派别。百奇郭氏的渊源，系在中国居留数世且汉化了的阿拉伯人后裔。明末清初，因泉州回族“儒士化”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没能走上汉译著述的道路。百奇郭姓一世祖墓碑上那一行“小儿锦”，它是西北回民创造的经堂文字。但清朝前期

^① 张玉光《回教入华与泉州回教概况》，载《月华》第9卷，第1期，1937年。

泉州出现的经堂教育,不是靠回族自身强大的支持,而是依靠外地来官的穆斯林的倡导,因此,人在势兴,人去即逝。但是,不可否认,清代泉州伊斯兰教的几次重兴,在清净寺创办经堂教育,对泉州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延续,起了一定的作用。

(五) 论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

元末至正十七年(公元 1357 年)到至正二十六年(公元 1366 年),泉州发生一起持续十年之久的史称“亦思巴奚”战乱。什么是“亦思巴奚”战乱,这场战争的性质如何?史学界先辈历来有异说。1936 年,史家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里提出,这场战争是“波斯军队驻泉州”发起的,该文的题目是《元末泉州波斯戍兵之乱》,并在注释中指出,这场战争反映“外国人在泉州势力之伟大,可知矣”^①。1957 年,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认为这场战争具有“反元起义”性质^②。此后,1979 至 1980 年,朱维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一文提出,驻泉州的波斯人“要在沿海一带,建立一个亦思法杭王国”^③。而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一文提出,驻泉州的波斯人“打算割据泉州港,建立一个所谓亦思法杭的独立王国”^④。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人们对新收藏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一行阿拉伯文字的翻译和研究,又出现新的提法。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一文提出,该墓碑是惠安县白崎乡郭姓回族二世祖郭子洪的墓碑,郭子洪是波斯人。进而推断郭氏世祖在元代属伊斯兰教什叶派,参与元末对逊尼派(蒲派)的斗争,并推断元代泉州的什叶派源于至元十九年(公元 1282 年)调来戍守泉州的扬州合必军。进而得出结论,百奇郭氏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不同,意即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为逊尼派,来自阿拉伯。因教派的不同,终于在元末发生“以什叶派赛甫丁、阿迷里丁为首夺取逊尼派(蒲)的权,控制泉州,包括市舶权。至正二十二年,逊尼派以那兀纳为首反攻,杀阿迷里丁……至正二十六年,什叶派以金吉为首,协助陈友定杀那兀纳,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及住宅”^⑤。

元末泉州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亦思巴奚战乱,是否“驻泉州波斯兵之乱”?是否“反元起义”?是否波斯人企图在福建沿海“建立一个亦思法杭王国”?是否为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之教派战争?是否最终以什叶派的胜利,“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及住宅”而告终?本文拟从“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文字的翻译入手,逐一解答上述几个问题。

一、“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之发现

1959 年 4 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刚筹建,组织调查组对宋元泉州海外交通的重地法石乡进行详细调查。据《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载:“法石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古代中国与伊兰之交通》,第 217~226 页。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1936 年。

②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 59 页,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③ 朱维干《元末蹂躏兴泉的亦思法杭兵乱》,载《泉州文史》第 1 期,第 1~2 页,1979 年。

④ 庄为玑《元末外族叛乱与泉州港的衰落》,载《泉州文史》第 4 期,第 23 页,1980 年。

⑤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第 4 期,1982 年。

城，外足以扼海道”^①。调查组先在美山的“西墓园”，发现数座古伊斯兰教须弥座式石墓。继而根据惠安《白崎郭氏族谱》提供的线索，对法石圣殿柳公砌进行较系统的调查，发现一方汉式墓碑，上刻汉字与一行阿拉伯文字，系一般回族人的墓碑（即今郭德广墓碑）。1978年，该墓碑收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可惜已断为两截。墓碑上的文字由四个部分组成。

1. 右上角竖刻篆体“坡庭”；左上角竖刻篆体“百奇”。
2. 在“坡庭”、“百奇”之间，横刻一行阿拉伯文字。
3. 在“坡庭”左下刻“晋”字；在“百奇”右下刻“惠”字（“坡庭”，地名，隶晋江县；“百奇”，地名，隶惠安县）。
4. 在“晋”“惠”两字之间的墓碑中部，竖刻楷书“元郭氏世祖坟茔”七个字。

这方“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收回后，人们认读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文字有不同的译文，有的认为译文是“伊本·土尔·德广贡·纳姆”，并据此推断，此为波斯人的名字，该墓主为波斯人^②。有的则译为“伊本·库斯·德广贡·纳姆”，认为“纳姆(nam)在波斯文中另一含义为著名的，因此这行波斯文可译为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进而推论出“此墓为二世祖郭子洪安葬之地”^③。又从“纳姆”波斯文意为“著名的”推断“伊本·土尔·德广贡·纳姆被尊奉为领袖，郭系的创始人，据其教义，郭姓子孙只需瞻礼其墓而不必去祭扫圣墓……即要么郭姓与敬奉圣墓的穆斯林派别不同”^④。言外之意即从此墓碑上推知百奇郭氏著名的二世祖郭子洪是波斯什叶派穆斯林，参与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是跟元末“金吉与赛甫丁、阿迷里丁同派……反之蒲寿庚、那兀纳则属于逊尼派，来自阿拉伯”^⑤。

“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文字的翻译，引发了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性质问题的新提法，即郭姓祖籍波斯，属伊斯兰教什叶派，与敬奉灵山圣墓的蒲寿庚、那兀纳的逊尼派对立；郭氏世祖同“金吉与赛甫丁、阿迷里丁同派，源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扬州来的合必军，即波斯军”^⑥。即论证了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为“泉州波斯戍兵之乱”，而其性质则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教派斗争。

二、亦思巴奚战乱的事实和性质

关于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过程，《八闽通志·至正近记》和《福建通志·元外纪》记载尤详。但是，仅凭此二书的记载，不足以解决这场战乱的性质问题。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必须从以下五个方面入手研究，方能得出事实真相。

^①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主人讼事宜状。

^②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又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53~64页，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③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六：回族郭姓家族墓碑石刻，第57~58页，福建省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④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又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53~64页，1984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⑤ 同上。

^⑥ 同上。

其一,什么叫“亦思巴奚”兵?史家张星烺认为,亦思巴奚“乃番号人,非名”,这是对的,但乃不完整。朱维干、庄为玑两位先生认为,是波斯名城亦思法罕,此则不确。努尔《亦思巴奚》一文据波斯语词典提出,亦思巴奚为波斯语“亦思巴呵”、“巴思呵”,意为民兵、骑兵^①。努尔此说近似。《元史·本纪》载,“至正十七年三月,义兵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叛据泉州”^②。据《泉州府志·军制》载,至元间,泉州有上、中、下万户府之设。未见《元史》所谓“义兵万户”之设置。又据《元史·百官志》载:“诸路万户府:管军七千之上……正三品;中万户府,管军五千之上……从三品;下万户府,管军三千之上……从三品……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③亦未见“义兵万户”之军制。

元朝至正间,江淮一带反元势力已如燎原之火。至正五年(公元1345年),元廷为加强控制福建,遣官奉使宣抚,脱脱、王士宏乘机“鹰扬虎噬,雷厉风飞,声色以淫”,致使“闾阎失望,田里寒心”^④。至正十二年正月,闽北“寇逼郡城(福州)……越二十六日”^⑤。至正十二年夏“仙游流贼剽掠泉州”^⑥。至正十三年“泉大饥,民扶携就食”^⑦。至正十四年夏“安溪盗李大,南安盗吕光甫聚众为乱,七月围泉州”^⑧。至正十六年“山寇李大攻同安”^⑨。至正十七年“泉寇伊守礼啸聚复攻同安”。则知上自元廷,下至福建、泉州的地方政府,已自顾不暇,其时形势正如至正二十一年篆刻的《建安忠义之碑》所云:“至正改元之十八年,皇帝重念闽海道远,用兵日久,民勿堪命。”^⑩江淮一带的反元势力与福建地方的反元起义如星火燎原。在此局势下,一方面元廷内部为争夺最高权力的矛盾白热化,即以高丽后奇氏为首的太子派与以扩廓帖木儿为首的诸帅派,展开激烈的夺取最高统治权的斗争,这场元廷的斗争直接牵动到当时全国最大海港——泉州;另一方面,元朝政府为保护泉州港巨额舶来货物和课税,只得起用在泉州经商的阿拉伯、波斯巨商,只要他们向政府交纳额定舶来货品和额定课税,就可授官,掌握实权。如赛甫丁、阿迷里丁两人都因贸易捐官和保卫泉州港有功,在泉州被授予“义兵万户”之武职,掌握了保卫泉州港的地方武装。所谓“义兵”,是为保卫元朝政府,根据临时需要而组建的地方武装;同样,它也根据需要享有正式朝官的品位和权力(这与南宋末年授官蒲寿庚略同)。又如至正十九年,泉州港有一位番商,因捐输大量舶来货品给元廷,被授予参议中书省事朝官(正四品),一时“势震中外”。

故至正年间泉州出现的由阿拉伯、波斯巨商任职的“义兵万户”,实际是元朝政府授予的武职,其任务是协助元政府保卫泉州港的安全。而所谓的“义兵”,即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乡

① 努尔《亦思巴奚》,载《泉州伊斯兰教研究论文选》第48~52页。

② 《元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五,顺帝八,至正十七年。1978年,中华书局出版。

③ 《元史》卷九十四,志第四十一上,百官七。诸路万户府。

④ 《闽诗录》,戊集,卷七,《江西、福建怨谣》。

⑤ 《闽中金石略》卷十二,李世安题名石刻。

⑥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

⑦ 乾隆《泉州府志》卷四十一,卢琦传。

⑧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纪兵。

⑨ 同上。

⑩ 民国《福建通志·金石志》(第45册),石十二,元,建安忠义之碑。

兵、民兵之类。那么，“义兵”之含义与波斯语“亦思巴奚”的意义相近。则知所谓“亦思巴奚”为波斯语的音译，而所谓的“亦思巴奚”战乱，即由波斯人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等人为首的义兵加入其中之战乱。

其二，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是否“源于至元十九年由扬州调来的合必波斯军”？据乾隆《泉州府志·军制》记载，“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戍列城”，又记“至元十九年”，又以“湖州翼万户府来戍泉州……湖州翼万户府，亦客兵也”^①。则知扬州合必军与湖州翼万户府之兵皆为客兵。所谓“客兵”，有人误以为是外国人组建的军队，把扬州调来的合必军误作波斯军队。其实不然，“客兵”是对地方“土军”而言的。“客兵”、“土军”都是正规军，只差别“土军”的兵员为本地籍，“客兵”的兵员为外地籍而已。故“客兵”不能理解为外国军队。查《扬州图经》，有“至元十九年夏四月，遣扬州射士戍泉州”^②。“合必”一名，是蒙古人的名字，非波斯人的名字，亦即扬州调来泉州的三千射士，是由蒙古人率领的蒙古射士，非波斯军射士。从至元十九年到至正十七年，事隔七十五年，查遍元史、省志、地志，未见至元十九年从扬州调来戍守泉州的合必军与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有任何牵连。

其三，宋元时代，泉州是否有伊斯兰教什叶派与逊尼派的两大教派斗争呢？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出现什叶派与逊尼派两大教派甚早，但从神学角度讲，逊尼派与什叶派的分歧并不大。几个世纪来，宗教的分歧一直潜伏着。自从公元1502年，伊朗国王伊斯玛仪把伊斯兰教什叶派定为国教，什叶派在波斯国成为多数，势力大增，与逊尼派争正统的斗争才明显化，亦即在16世纪之前，什叶派和逊尼派有几个世纪潜伏着分歧，而无明显的争斗。因此更不可能在远东的沿海泉州，早在13世纪至14世纪（即宋元时代）出现伊斯兰教两大教派长达十年之久反复厮杀，即所谓“至南宋末，以蒲寿庚为代表的逊尼派形成势力集团……并逐步排斥什叶派。元朝至元十九年调扬州合必军三千人镇泉州……属什叶派……但仍无法与掌握实权的蒲派匹敌”。而“什叶派以赛甫丁、阿迷里丁为首夺逊尼派（蒲）权，控制泉州……逊尼派以那兀纳为首反攻，杀阿迷里丁……什叶派以金吉为首协助陈友定杀那兀纳，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院及住宅”^③。

据《福建通志·元外纪》载，至正十七年三月（公元1357年），发生“泉州万户赛甫丁、阿迷里丁合兵逐泉州官吏，据城以叛”。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普化帖木儿与廉访司般若帖木儿有隙，构兵相攻。普化帖木儿以赂泉州万户阿迷里丁进福州援之。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阿迷里丁“逼走”泉州赛甫丁。赛甫丁走省城福州，据之^④。

正当“兴、泉方用师”的混乱之际，惠安人卢琦受帅府命“参军事往来二郡（兴化、泉州）间”。至正十九年，卢琦又以年劳擢福建行省照磨盐课司提举，秩八品。这时“有番商以货得参省，势震中外，胁户部令下四场盐引自为市。琦曰：是上亏国课，下毒亭民，吾腕可断，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军制，元军制，客兵。

^② 《扬州图经》卷八，至元十九年。

^③ 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派与元末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试探》，载《海交史研究》第4期，1982年。

^④ 同治《福建通志》卷二百六十六，元外纪。

牒不可署，竟坚卧不顾”^①。这里的“参省”，即《元史·百官志》的“参议中书省事”。是职“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牒，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②。此“以货得参省”的番商是谁？他竟然权力大到“胁户部令下四场盐引自为市”的程度，此番商与至正十九到至正二十二年据福州路近四年之久的赛甫丁是什么关系？是否同一个人？可惜史志乏载。但从“有番商以货得参省”事例，联系赛甫丁、阿迷里丁都为“义兵万户”，它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元末朝廷已无力保卫泉州港的安全，必须依靠富有资财的番商协助防守；第二，元末上自朝廷，下至福建行省，直至泉州路，各级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四起，沿海城市犹如汪洋孤岛。特别泉州港有巨额课税收入和舶来货品，元朝各级政府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对外商卖官公行，因此有赛甫丁、阿迷里丁得“义兵万户”，“有番商以货得参省”，又有至正二十二年的泉州市舶提举那兀纳等均为以货得官。这情况，正如《元史》所云：“大抵元之建官，繁简因乎时，得失系乎人……若其因事而置，事已则罢。”^③明乎此，有助于弄清亦思巴奚战乱的性质。

可是，赛甫丁的好景不长。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新任福建省平章政事燕只不花，合诸军在福州击败赛甫丁，赛甫丁“余众航海还据泉州”^④。与此同时，在泉州发生本以番人主市舶的那兀纳袭杀阿迷里丁的事件。这些事件，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的互相残杀，倘若联系社会背景看，这些事件的背后都有元廷派系斗争制约。

元顺帝年迈倦勤，元廷以高丽后奇氏和太子爱猷识里答腊为首的太子派，逐帝左右，广树私人，与以扩廓铁木儿为首的诸帅派展开激烈的夺权斗争，几经反复倾轧^⑤。泉州港巨额的课税和舶来商品便成为两派剧烈争夺的对象（有番商以货得义兵万户、得主市舶和得参省等便是明证）。燕只不花者，皇太子私人之一也。为表彰燕只不花在福州驱逐赛甫丁和在泉州利用那兀纳杀阿迷里丁的功绩，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皇太子赐他“忠孝文武”四个大字，而燕只不花则“摹勒皇太子所赐忠孝文武”于福州乌石山摩崖之阳，以纪“储皇之恩赐”^⑥。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完全是元廷争夺帝位斗争在省和路（地方）、县的反映，哪里有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斗争呢？在这场从上到下的夺权斗争中，有巨额舶来货品和巨额课税收入的泉州港，是为争夺的焦点。泉州的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巨商赛甫丁、阿迷里丁、那兀纳和“以货得参省”的番商等，均因协助元朝政府保卫泉州港有功或以舶来货品捐官，而获得义兵万户、市舶司、参议中书省事等官职。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卷入元统治者的夺权斗争，从根本上说，赛、阿、那等人，只是被元廷利用而已，他们只是成为蒙古统治者争夺权力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罢了。这便是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的实质。

其四，惠安百奇郭姓穆斯林世祖是否为什叶派，他们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所谓逊尼

① 嘉靖《惠安县志》卷十三，人物，元卢琦。

② 《元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五，百官一，参议中书省事。

③ 《元史》卷八十五，志第三十五，百官一，参议中书省事。

④ 《元史》卷四十六，本纪第四十六，顺帝九，至正二十二年五月。

⑤ 陈邦瞻《元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七，诸帅之争。193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⑥ 陈榮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乌石山东壁亭记。

派)是否不同呢?前文已述,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性质是元廷派系斗争在地方的反映,而根本不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斗争,况且在13世纪至14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尚未出现两大教派的厮杀。但为慎重起见,笔者查阅百奇郭氏四房二支族谱,发现明清时期泉州回族之间的婚姻关系十分密切。百奇郭氏回族自三世起就娶金、丁、葛、夏、马、黄、迭等回族之女为妻,族谱有记载的竟多达数十人,特别是与泉州通淮街清净寺的穆斯林联姻更为密切。如明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20年)以后,百奇伊斯兰教重兴,郭姓回族穆斯林与城区清净寺回族穆斯林联姻更为密切,诸如:“十四世成基……娶清真寺张普观长女”;“十四世成谋……娶清真寺马江观次女”;“十四世成龙……娶黄氏,为清真寺内黄文亮次女”;“十五世清祥……娶清真寺葛讳乞观次女”;“十五世清时……继娶清真寺内张应梦长女,十五世清华……娶清真寺内黄聘观长女”,如此等等。泉州清净寺的穆斯林是敬奉灵山圣墓的,百奇郭姓穆斯林在明、清时期与寺内穆斯林联姻,其关系十分密切,这反映惠安百奇郭氏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没有什么不同,亦即他们之间不存在所谓的什叶派(郭氏穆斯林)和逊尼派(清真寺穆斯林)的教派不同。

此外,从泉州穆斯林和回民墓葬的地点看,亦证明宋元时代不存在伊斯兰教两大教派的斗争。据惠安百奇郭姓四房二支族谱记载,明清时期郭氏葬灵山圣墓区的也多达数十人,诸如:“十一世世美公……与妣金氏葬在圣墓灵山公墓”;“十三世拔正公……葬圣墓乡灵山东边”;“十三世汝产公……葬灵山金氏祖妣东边”;“十三世祖汝渊公……葬在圣墓灵山西畔”;“十四世祖成勋……葬圣墓乡灵山东畔”;“十五世清琪,葬灵山义斋公墓埕下”。这里请特别注意,族谱所记“圣墓乡灵山公墓”,则知灵山圣墓自宋至明清就为阿拉伯、波斯穆斯林客商的公共墓葬区。这就有力地证明,惠安百奇郭姓回族穆斯林同样敬奉灵山圣墓,他们与泉州他姓回族穆斯林没有存在教派的不同,郭姓穆斯林不是属于什叶派,而泉州他姓穆斯林也不是属于逊尼派。

其五,惠安百奇郭姓世祖是否波斯(什叶派)人?根据“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那行阿拉伯文字的认读,发现它仅是一行阿拉伯语字母,但组不成阿拉伯语的字、词。然根据这行字母的音读,则应读为“Yin Go zi ta-gag mou”,即汉语(闽南语)“元郭氏德广墓”的对音。则知墓碑上这一行阿拉伯字母,它是用来拼写汉语的。这是我国明朝时期西北回民为了便于读《古兰经》和《圣训》,而创造出来的一种用阿拉伯语字母拼写汉语的拼音文字,开始时称“消经”,即消化、理解《古兰经》,后音变为“小儿锦”。

“小儿锦”,它不像汉语以北京话音位系统作为拼音的标准,而是使用者按各自的方言去拼写的,所以外地人读不通。“小儿锦”没有标调符号,完全靠读者去猜。此外,汉语拼音的声母,有的可在阿拉伯语中找到相应的辅音,如f、k,即使不分清、浊辅音和发音部位,也可加上b、d、g之类。至于汉语中的尖舌前、后音和舌面音,阿拉伯语音位里没有,就要产生乱代的现象。还有阿拉伯语没有元音字母,只有元音音符,所以“小儿锦”便出现随意加标意符的现象,这也难怪人们读不通了。“小儿锦”有以上诸多缺陷,那么“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语字母,引发出多种译文就不足怪了。

“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上那阿拉伯文字是汉语“元郭氏德广墓”的对音,属我国回民创造

的“小儿锦”而非波斯文“著名的库斯·德广贡之子”。那么，该墓碑的主人不是惠安百奇郭氏二世祖郭子洪，而是一世祖郭德广自明。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文字系“小儿锦”，又证明墓主郭德广不是波斯人亦不是什叶派，且与敬奉灵山圣墓的泉州穆斯林没有什么不同，亦即不存在教派的问题。

综上所述，“元郭氏世祖坟茔”墓碑的主人不是惠安百奇郭姓二世祖郭子洪，而是郭氏一世祖郭德广；百奇郭氏一世祖不是波斯人，亦不是什叶派；墓碑上那一行阿拉伯文字是“小儿锦”，可见该墓碑是郭德广的回族后裔重修祖墓时竖立的；元末的亦思巴奚战乱与扬州合必军无关；元末泉州根本不存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两大教派的斗争；惠安百奇郭氏穆斯林与敬奉灵山圣墓的穆斯林完全相同。一言以蔽之，元末泉州的亦思巴奚战乱不是伊斯兰教的教派斗争，不是波斯戍军之乱，不是反元起义，不是波斯人企图建立亦思法杭王国，而是元廷夺权斗争在地方的反映，赛甫丁、阿迷里丁和那兀纳只不过因自身的利益卷入其间，成了蒙古统治者夺权斗争的工具与牺牲品罢了。

三、余 论

上文论述了元末泉州亦思巴奚战乱的性质是元廷夺权斗争在泉州地方的反映，而非伊斯兰教什叶派和逊尼派的两大教派斗争，这是泉州伊斯兰教史的至关重要的问题。元亡之后，泉州港的急剧衰落，有的学人把它归罪于所谓的“波斯戍军之乱”，使阿拉伯、波斯商人“如惊弓之鸟”，再也不敢问津了。现在弄清亦思巴奚战乱性质，这个问题自然明白。

元末明初，泉州出现排外的扫荡，许多外国人的寺庙、坟墓被捣毁。明初修筑城墙时，这些石头构件均被作为城墙基础材料，深埋地下，为何通淮街清净寺独存？人们又从清净寺甬道后石墙高处的阿拉伯文修寺碑记的译文中得知，元代的修寺者为波斯设拉子人；人们又从寺内的元朝撰明朝重刻立的汉字碑中得知，皇庆二年（公元1313年），波斯开才龙城人不鲁罕丁教长航海来泉州，住持这座清净寺，他取汉姓“夏”，叫夏不鲁罕丁，活了142岁。夏不鲁罕丁的儿子夏敕继其父住持这座清净寺，一直到明初，他也活了110岁^①。因此，有的学人又把泉州清净寺的独存至今的原因，归于所谓的波斯什叶派在亦思巴奚战乱中最后取胜，即所谓的“掘逊尼派墓，夷逊尼派的寺及住宅”。现在亦思巴奚战乱的性质既明，这种什叶派最后取胜说自然不能成立。

此外，泉州东郊灵山圣墓也被保存下来；灵山圣墓对面的乐园阿拉伯人、波斯人墓葬区、东门城郊色厝美的外国人墓葬区、东郊仁风街的外国人墓葬也有相当部分被保存下来。这些外国人墓葬一直保存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又说明了什么？新近，从出土的阿拉伯人墓碑译文中发现，有死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的，则知墓主在明朝生活了二十年之久。这又说明了什么？

研究泉州伊斯兰教史时，对元末明初泉州出现的排外运动亦要重新研究，不能简单地下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拾遗上，夏不鲁罕丁传。

结论。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犹太人和欧洲人，中古时在泉州有数百年的通商历史，中外文化有长久的交融，在通商、传教或任官过程中，谁个好、谁个劣，老百姓最清楚，罚不当罪者甚少。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泉州伊斯兰教史、海交史研究者的重视。

二十、泉州古伊斯兰教石刻古阿拉伯文字释读

伊斯兰石刻释读前言

20世纪50年代末，我在开罗大学学习伊斯兰考古期间，曾阅读过吴文良先生所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发现其中伊斯兰教石刻的译文，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当时我曾对已有译文试作核校，并以练习为目的释读了未译部分。1964年曾许诺吴老先生，愿为他修订再版此书承担阿拉伯文石刻的释读。然而，吴老宏愿在“文革”的冲击下未能实现。1979年，吴幼雄先生继其先父遗志，增订此书，再次以译事见委，我于是重新进行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的考释和翻译工作。除对原书引用的25方阿文石刻译文进行核校、补充外，还释读了未经考释的几乎全部阿文石刻。

工作过程中，深感石刻释读之艰难。不仅因有些刻石行文、书法、刻写欠规范，而且不少刻石残断、剥蚀严重，其拓片失真；部分照片摄于涂粉之后，不免失实；最感困难的是，受客观条件所限，无法以刻石实物核对。有时，为释读一个字甚至一个字母，俯首对图数小时而不得一解；或竟历时数周乃至数月，方得一比较合意的解答。由于个人水平所限，一些自以为可以确定的释读，是否能够成立，尚待识者定论、指正。至于自知尚需商酌、难以断定之处，则提出存疑，于文中注明，藉以就教于行家。为便于进一步探讨，谨将我所释读的阿拉伯文释文和中文译文一并付印。尚请读者、专家对照原文或实物，以发现我释读之错误，予以纠正，避免将来以讹传讹，影响历史研究工作。这是我的一点衷心希望和请求。

华维卿

1980年12月

释文和译文中几种符号的说明

- …… 原文字迹不清、难以辨识的字句，用省略号表示。
— 释读存疑的字句或字母，下加横线标出。
×× 原文缺字或辨识不清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用“×”号表示。一个“×”对应一个缺字。
缺字三个以上者，用六个“×”。人名一律用三个“×”表示。
() 原文中的拼写错误或古写法，在其后加括号给出正确写法或现代写法。
(())、[] 原文缺字，根据上下文可以断定的，在双圆括号或方括号中补入。

— 在阿拉伯文行末出现，表示文句未完，紧接下一行。
“ ”、‘ ’， 译文中《古兰经》经文的分章分节或直接引语或专用名词，用双引号标示，在已使用双引号的情况下，加用单引号。

A3. 1

“安拉作证：
除他之外，别无他神。
天使们、学者们同样作证。
他们还作证：
安拉是公正的、全能的、至睿的。”^①
‘安拉满意的宗教是伊斯兰教。’^②”

شَهِدَ اللَّهُ أَنَّ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وَالْمَلَائِكَةُ —
وَأَوْلُو الْعِلْمِ قَاعِدًا بِالْقَسْطَلَ لَا إِلَهَ إِلَّا —
هُوَ الْعَزِيزُ الْحَكِيمُ أَنَّ الدِّينَ عِنْدَ اللَّهِ —
الْإِسْلَامُ

A7

“此地人们的第一座清真寺就是这座吉祥的清真寺，它以悠久、古老而著称，以作为礼拜寺、讲学堂而受人崇拜，以圣友寺为别名。那是在回历 400 年。其后三百年，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古德西，别号哈只·鲁肯·西拉齐，为求至尊安拉之喜悦，将寺修缮、翻新，出资建造高大的拱顶、堂皇的门廊、高贵的寺门、崭新的窗户。于回历 710 年竣工。祈求安拉宽恕他和曾以穆罕默德及其家族之名发誓帮助过他的人。”^③

ان اول مسجد للناس في هذا الارض —
كان هذا المسجد المبارك المسى —
باليعتيق والقديم المكي بالجامع —
والشارح الملقب بمسجد الاصحاب —
وكان ذلك في تاريخ سنة اربعينية —
من الهجرة النبوية بعد ما مضى من —
تاريخه المذكور ثلاثة سنة
عمره و جده و بمعرفه أسس هذا —
الطاقة العالية والرواق الرفيع والباب —
الكريم والشباك الجديد و تمه في —
تاريخ سنة عشر و سبعينية الهجرية —
طلباً لعرضات الله تعالى احمد بن —
محمد القدسي المعروف ب حاجي ركن —
الشيرازي غفر الله له ولمن عاونه ب محمد والله

① 《古兰经》第三章第十八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三章第十九节节录。

③ 此碑文曾由阿文译成法文，又由法文译成英文。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又由英文译成中文。1956 年，北京大学阿拉伯语教授马坚先生由阿文译成中文。此后，还有别的中译文。为便于读者参考，现将张星烺先生和马坚先生的译文分别抄录如下。

张氏译文：

此寺为居留此邦回教信徒之第一圣寺，最大最真，众所宗仰。故其名为“圣友之寺”。建于回教纪元四百年（即公元1009~1010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后三百余年，至回教纪元七百十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至大三年），有耶路撒冷人摩哈美德者，又号泄刺失（Shiraz）之香客，卢克那尔丁（Ruknaldin）其人，有子曰阿合玛特（Anmad），出资修葺古寺，大门上弓形顶盖，进门走道，以及门牖皆焕然一新，盖所以敬上帝者也，祈上帝及圣人摩诃末及其家族以后宽宥彼辈也。

马氏译文：

这一寺是居留在这一邦国伊斯兰教信徒的第一圣寺。最古，最真，众人所崇仰，所以取名叫“圣友之寺”，建于回历四百年。三百年后，回历七百一十年有耶路撒冷人摩哈美德者，别号设刺失的进香客卢克那尔丁，这人有一个儿子，叫做阿哈玛特，出资修葺这一圣寺。大门上的圆顶、顶盖及进门甬道，以及门窗都焕然一新，所以尊敬上主也。祈求上主及圣人摩诃末和他的家族，以后要赦免他们。

对此碑记，我的释读及译文有几点说明，提出如下，以供探讨。

一、关于“建于”两字。过去的译文都一致译为这寺“建于回历四百年”。这个“建”字，在阿拉伯文碑记原文中，虽有其位置，但无其根据。文中此字位置上，我认为不是一个字而是两个字，其阿文的发音为 kane dhalik，意为“那是”。这一考释确有其艰难之处，即 ne 的刻写不太规范，dhalik 的刻写超出了常规。但是如将这里的 ne 与本碑文其他地方的 ne 相比，不难发现其共同之处。至于 dhalik 一字，按常规 lik 应在 dha 之后，但是这里却出现在 dha 之上，且还偏前。这种现象在古体字写法上还是允许的。同样，kane 一字的 ne，按常规也应在 ka 之后，但它却刻在 ka 之上。以上所述便是我对“那是”两字的释读分析。这样，该句子的直译应为“那是在回历 400 年”，意译可考虑为“那是发生在回历 400 年之事”。“建于”和“那是在”这两种提法，其含义显然不同。前者含义明确，仅指建寺年份，后者提法笼统，含义广泛。后者是否包括建造年代，就原文来说，难以断定。以往“建于”两字的译法，就本石刻原文而言，并无确凿的文字根据。

二、关于修寺人的名字。修寺人的全名为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古德西，别名哈只·鲁肯·西拉齐。艾哈迈德是他本人的名字。“本”字义为儿子，所以穆罕默德是艾哈迈德之父。“古德西”为建寺人的家族名（虽也可理解为耶路撒冷人的意思，但这与后面碑文相矛盾，故不能作此解）。“哈只”为曾赴麦加朝觐者之称号。鲁肯（Rukn）也有可能释读为鲁克伯（Rukb）。“鲁肯”此词在阿文中可用作人之称号。“西拉齐”意为设拉子城人。此城（Shiraz）系伊朗波斯湾附近的著名古城。也由此可见修寺人是波斯人。至于“卢克那尔丁”的释读我认为根据不足。如果说“卢克那”的释读有其可能的话，那么“尔丁”是没有根据的。

三、阿文原文中的“拱顶”一字来源于波斯文，因此也可作为修寺人来自波斯的旁证之一。

四、关于几个字的译法。

（一）译文中“本地”的“地”字，其阿文发音为 Ard。凭此字原义，译文中的“本地”也可译成“这国土上”。究竟指的是什么，是指泉州，还是指中国，或另指其他范围，仅从阿文来看，很难确定。如指泉州，从阿文角度讲，更合适的字应是字义更为明确的 Madinh 或是 Balad。碑文就句法结构和个别用词而言，我以为难说是地道的阿拉伯文。例如，Ard 这个字是阳性名词的字形，但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是作为阴性名词用的，用于它的指示名词也应是阴性的 Hadhih，但碑记作者却用的阳性指示名词 Hadha。作者由于用词并不考究而用 Ard 表示泉州城的可能性是有的。此外，看来作者不一定确切知道建寺年代，也不见得有关于全国第一个清真寺的历史知识，因此用 Ard 指全中国的可能性似乎也不大。所以我的译文采用了“本地”两个字。

（二）译文中“圣友寺”的“圣友”两字，阿拉伯文的原文是一个字，其发音为艾斯哈卜（Asshab），其原意为朋友、伙伴。伊斯兰教术语中，有单用“伙伴”一词来表达先知穆罕默德的伙伴、门徒之意的习惯。因此，张星烺先生和马坚先生将其译为“圣友”是十分贴切的，故称该寺为“圣友寺”最好不过。

（三）译文中“礼拜寺”、“讲学堂”两词阿拉伯文原始词义为“召集者”和“解释者”。但“召集者”这个词，在阿文中的引申词义是礼拜寺，也就是把礼拜寺人格化作为召集人们前来做礼拜的人来看待。从这点看，“解释者”这个词，即使在阿文中没有引申词义——“讲学堂”的意思，但作为波斯人，是否也把它人格化，当作向人们解释《古兰经》伊斯兰教学说的人，进而将其引申为“讲学堂”之意呢，是很有可能的，从上下文看也是顺理的。因此，将这两个词分别译成了“礼拜寺”和“讲学堂”。

（四）碑文中，穆罕默德这个人名先后出现两次，第一次出现的是修寺人的父名，碑文结尾处出现则是指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五）我对此碑记的释读，仅根据石碑的拓片，并参看其照片进行的。拓片阿文字迹，就总体来说是比较清晰的。

A10

“‘你们要以易卜拉欣的立足地^①作为礼拜处。[我已嘱咐易卜拉欣和伊司马仪^②]为绕引巡礼者、坚守不离者、跪拜叩头者清理我的房屋’^③。‘当易卜拉欣和伊司马仪建起房基时，他俩说，我们的主呀！求你接受我们所做，你是耳聰目明、无所不知的。’^④”

واتخذوا من مقام ابراهيم مصلى
((وعهدنا الى ابراهيم واساعيل ان)) -
طهرا بيته للطائفين والعاكفين -
والركع السجود
واذ برفع ابراهيم القواعد من البيت -
واساعيل ربنا تقبل منا انك انت -
السميع العليم

A11. 2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确有那么一个时代，
人类还并不存在。
‘是我，用一滴混合液，
创造了人类。
为对其进行考验，
我赋予其听力和视力。
‘我确已为其指引了正道，
他们或是感谢或是拒绝。
‘拒不信道者，
我已为他们准备了，
烈火、镣铐和锁链。
‘虔诚信道者，
他们将喝一杯，
调有“卡夫尔”甘泉。
‘这甘泉，
安拉的奴仆们汲取饮用，
并使其畅流不绝。
‘他们履行誓愿，
畏惧复活日那天苦难普遍。’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هل أتني على -
الإنسان حين من الدهر لم يكن شيئاً -
مذكروا أنا خلقنا الإنسان من نطفة -
أشجار نبتلها فجعلناه سمعاً بصيراً -
أنا هدّيناه السبيل أما شاكراً وأما -
كفروا أنا اعتدنا للكافرين سلا سلا -
واغلاقاً وسعيراً ان الابرار يشربون -
من كأس كان مزاجها كافوراً عيناً يشرب -
بهاء عباد الله يفجرونها تفجيراً يوفون -
بالنذر ويختلفون يوماً كان شره مستطرداً -
ويطعنون الطعام على حبه مسكننا ويتهمها -
وأسير الناس انطعمكم لوجه الله لا نريد منكم -
جزاء ولا شكوراً أنا تحاف من ربنا يوماً -
عيوساً قطريراً فوقاهم الله شر ذلك -
اليوم لقاهم نمرة وسروراً وجزاهم -
 بما صبروا جنة وحريراً متكتفين فيها على -

① 指麦加大房的玄石所在地。易卜拉欣当初站在这玄石上，召唤人们做巡礼。

② 易卜拉欣是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位先知，伊司马仪是他的儿子。

③ 指天房克阿白。至此为《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二十五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二十七节全文。

‘他们抚养穷人、孤儿、俘虏，
出于对安拉的爱恋。’
 ‘我们抚养你们，
完全出于安拉的情面。
 不要你们的报酬，
 也不要你们的感谢。’
 ‘我们只是敬畏真主，
 畏惧复活日那天，
 他对我们皱眉怒眼。’
 ‘安拉会保佑他们，
 使他们那天免受苦难，
 使他们得到青翠，感到欣慰。’
 ‘因他们坚忍不拔，
 安拉赏以绸缎和乐园。’
 ‘在这乐园里，
 他们高座斜倚，
 既无烈日，也无严寒。’
 ‘在他们头顶上，
 绿荫低垂，
 果实随意摘。’
 ‘在他们身边，
 银质的器皿，晶亮的饮杯，
 递去又传来。’
 ‘这晶亮的银质饮杯，
 他们用以畅饮开怀。’
 ‘为他们斟满饮杯，
 调有“赞吉比勒”甘泉。’
 ‘这甘泉是园中之泉，
 又名“塞勒塞比勒”泉。’
 ‘永葆青春的少年，
 往返服侍在他们身边。
 你若见到他们，
 定以为是铺散的真珠宝贝。’
 ‘你若见到那情景，
 定觉得那里就是天堂，
 就是壮丽的极乐世界。’

الآفاق لا يرون فيها شمساً ولا
 زهريراً ودانية عليهم ظلاً لها وللت —
 قطوفها تذليلاً ويطاف عليهم بثانية —
 من فضة واكواب كانت قواريرها قواريرها —
 من فضة قد روها تقديرها ويستقون فيها —
 كأساً كان مزاجها زنجبيلاً علينا فيها —
 تسمى سلسليلاً ويطوف عليهم ولدان —
 مخلدون اذا رأيتمهم حسبتهم لؤلؤا —
 منثوراً و اذا رأيتم شرم رأيت نعيمًا —
 وملكاً كبيراً عليهم ثياب سندس خضر —
 واستبرق و حلواً اساور من فضة —
 وسقاهم ربهم شراباً طهوراً ان هذا —
 كان لكم جزاً و كان سعيكم مشكوراً اانا —
 نحن نزلنا عليك القرآن تنزيلاً فاصبر —
 لحكم ربك ولا تطبع شئهم آشاً او كفوراً —
 واذ ذكر اسم ربك بكرة واصيلاً ومن الليل —
 فاسجد له وسبحه لملاً طوبيلاً ان —
 هولاً يحبون العاجلقويدرون وراهم —
 يوماً ثقيلاً نحن خلقنا هموشدنا اسرهم —
 واذ اشتراكنا بذللنا أمثالهم تهدى ملائكة هذه —
 تذكره فمن شماً تغدا الى رب سليمان وما —
 تشاً ون الا ان يشاً لله ان الله كان —
 عليه حكيمها بد خل من يشاً في رحمته —
 والظالمين اعد لهم عذاباً أليماً

泉州宗教石刻

‘他们身穿绿色绫罗，
还饰以银镯，
真主还赏以圣洁的饮料。’
‘这就是给你们的报偿，
你们的奋勉努力，得到了赞扬。’
‘我已将《古兰经》，
陆续降示予你。’

‘故此，
真主的断言，
你要耐心遵从。
他们中作恶、渎神者，
你不能屈从。’
‘朝朝与暮暮，
你要念颂真主。’
‘夜间，
你要向他跪拜，
长时间地将他颂赞。’
‘有一类人，
他们迷爱尘世，
置复活日的深重于度外。’
‘是我造化了他们，
使他们肢体健全。
只要我愿意，
就可将他们屏弃，以他类人代替。’
‘这是告诫，
谁愿遵从，
可走通向真主之路。’
‘安拉无所不知，明察秋毫。
除了他的意旨，
你们不要别有所欲。’
‘他所中意者，
将进入天堂，得到他的慈恩。
为非作歹者，
他已为其准备了苦刑。’”^①

① 以上为《古兰经》第七十六章全文，共三十一节每节以“”号隔开。

A13. 1

“除了安拉，别无他神。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我将你差遣，
 全是出于对人类的怜悯。’^①
 ‘你们的盟友，是安拉及其使者，
 是谦恭地做礼拜、纳天课的信徒们。’^②
 ‘穆罕默德只是使者之一，
 在他之前诸使者都已逝世。’^③
 ‘穆罕默德不是你们任何个人之父，
 而是安拉的使者，^④
 是最后的一位先知。’^④
 ‘玛利亚之子耶稣说：
 雅各的后裔呀！
 我是安拉派来的使者，
 向你们证实我手中的《旧约》，
 喜报在我之后将有另一个使者，
 叫名艾哈默德。’^⑤
 ‘就是他，
 为了正道和真教，
 派遣了他的使者，
 以便真教胜过所有宗教，
 安拉足以为其预言作证。’^⑥
 ‘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⑦
 ‘为寻求安拉的满意，
 有人自愿损躯。
 安拉对其奴仆是仁爱的。’^⑧
 ‘他是两人中间的一个。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وَمَا أَرْسَلْنَا إِلَّا رَحْمَةً لِّلْعَالَمِينَ
 إِنَّا وَلِهِمْ أَنَا وَرَسُولُهُ وَالذِّيْنَ -
 أَتَمْوَى الَّذِيْنَ يَقِيمُونَ الصَّلَاةَ -
 وَيُؤْتُونَ الزَّكَاةَ وَهُمْ رَاكِعُونَ
 وَمَا مُحَمَّدُ إِلَّا رَسُولٌ قَدْ خَلَتْ مِنْ -
 قَبْلِهِ الرُّسُلُ وَمَا كَانَ مُحَمَّدٌ أَبَا -
 أَحَدٌ مِّنْ رِجَالِكُمْ وَلَكُنْ رَسُولُ اللَّهِ -
 وَخَاتَمُ النَّبِيِّنَ -
 وَإِذْ قَالَ عِيسَى ابْنُ مَرْيَمَ سَأَلْنَاهُ -
 إِسْرَائِيلَ أَنِّي رَسُولُ اللَّهِ الْمُسْتَكْبَرُ -
 مَصْدَقًا لِمَا بَيْنَ يَدِي مِنَ التَّوْرَاةَ -
 وَمُبَشِّرًا بِرَسُولٍ يَأْتِي مِنْ بَعْدِي أَسْمَهُ -
 أَحَمَدُ
 هُوَ الَّذِي أَرْسَلَ رَسُولَهُ بِالْمَهْدِيِّ -
 وَدِينَ الْحَقِّ لِيُظَهِّرَهُ عَلَى الدِّيَنِ -
 كَلَّهُ وَكَفَى بِالْمُشَهِّدِ أَمْ 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وَمِنَ النَّاسِ مَنْ يُشَرِّي نَفْسَهُ ابْتِغَاً -
 مَرْضَاتُ اللَّهِ وَاللَّهُ رَزُوفٌ بِالْعُبَادِ -
 ثَانِي اثْنَيْنِ إِذْ هُما فِي الْفَارَازِ -
 يَقُولُ لِصَاحِبِهِ لَا تَحْزُنْ إِنَّ اللَّهَ مَعَنَا

①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一百零七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五章第五十五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四十四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三十三章第四十节节录。

⑤ 《古兰经》第六十一章第六节节录。其中艾哈默德也指伊斯兰教创始人。

⑥ 《古兰经》第四十八章第二十八节全文。其中真教指伊斯兰教。

⑦ 《古兰经》第四十八章第二十九节节录。

⑧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零七节全文。

当他俩(躲避)在岩洞时，
他对他的伙伴说：
切莫忧伤，安拉和我们在一起。’^①”

A13. 2

“‘安拉是天地之光辉。
好比晶亮的玻璃宫灯，
光亮如明星。
由吉祥的橄榄树油点燃，
这树既不出于东方，
也不出于西方。
纵然尚未点火，
其油几乎发光，
光上加光。
凡愿追求安拉之光者，
安拉定将给其指引正道。
安拉为人们发出训诫，
他是无所不知的。’^②
‘在安拉所允许建立，
并允许在其中念颂其名的屋里，
人们于拂晓、傍晚赞美安拉。’^③”

A13. 3

“‘商业和买卖，
不妨碍他们念颂安拉、做礼拜、纳天课。
他们畏惧心惊眼翻之日。’^④
‘他们的所作所为，
是为求得安拉给予更好的报偿，
给予更多的恩惠。
安拉对他中意的人，
给得不计其数。’^⑤

الله نور السموات والارض مثل نوره —
كشكة فيها مصباح المصباح في زجاجة
الزجاجة كأنها كوكب دري يوقد من —
شجرة مباركة فربونة لا شرقية ولا غربية
يكاد زيتها يضي ولو لم تنسسه نار —
نور على نور بهدى الله
لنوره من يشا ويفرب الله الامثال —
للناس والله بكل شيء علهم
في بيوت اذن الله ان ترفع ويدرك —
فيها اسمه يسبح له فيها

بالغدو والأصال رجال لا تلهيهم —
تجارة ولا بيع
عن ذكر الله واقام الصلوة وابتدا —
الزكاة يخافون يوما تتقلب
فيه القلوب والبعار ليجزيهم الله —
احسن ما عملوا
ويزيد هم من فضله والله يرزق من —

① 《古兰经》第九章第四十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六节全文。其中拂晓和傍晚两词本图缺，补刻在另一壁龛石(A13. 3)上。

④ 《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七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八节全文。

‘安拉及其众天神，
确向先知祝福。
信徒们！
你们也向先知祝福，
祝他万事平安！’^①”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إِنَّ اللَّهَ وَمَا شَكَنَتْ يَصْلُوْنَ عَلَى النَّبِيِّ هَذَا
إِيَّاهَا الَّذِينَ آتَيْنَاهُ مَنَّا صَلَوْا عَلَيْهِ وَسَلَّمُوا
تَسْلِيْمًا

A13.4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不要惩罚我们，
即便我们忘了或是错了。
我们的主啊！
求你不要对我们绳之以重担，
如同你对前人所做的那样。
我们的主啊！
无力承受的重担，
求你不要加负于我们。
求你宽宥我们，
饶恕我们，
怜悯我们。
你是我们的救世主，
求你援助我们，
以对付不信教的人们。’^②
‘我们的主啊！
我们确已听到有人在召唤，
他召唤建立信仰说：
你们应当信奉你们的主。
我们确已信奉了。
我们的主啊！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原谅我们的过失，
将我们同善人一起召归于你。’^③
‘我们的主啊！
凡你已经使者们应允我们的，

رَبِّنَا لَا تَوَلِّنَا إِنْ نَسِيْنَا أَوْ —
أَخْطَأْنَا رَبِّنَا وَلَا —
تَعْلَمُ عَلَيْنَا أَصْرَا كَمَا حَلَّتْهُ عَلَيْنَا —
الَّذِينَ مِنْ قَبْلِنَا رَبِّنَا وَلَا تَعْلَمُنَا —
لَا طَاقَةَ لَنَا بِهِ وَاعْفُنَا وَاغْفِرْ —
لَنَا وَارْحَمْنَا أَنْتَ مُولَانَا فَانْصُرْنَا عَلَى —
الْقَوْمِ الْكَافِرِينَ رَبِّنَا أَنْتَ سَمِعْنَا —
مَنَادٍ يَا يَنْدَارٍ لِلْأَهْمَانِ إِنْ آتَيْنَا —
بِرِّكَمْ فَآمِنْنَا رَبِّنَا فَاغْفِرْ —
لَنَا ذَنْبَنَا وَكَفَرْنَا سَيِّئَاتِنَا —
وَتَوَفَّنَا مَعَ الْأَهْرَارِ رَبِّنَا وَآتَنَا مَا —
وَعَدْنَا عَلَى رَسْلَكَ وَلَا تَخْزِنْنَا يَوْمَ —
الْقِيَامَةِ أَنْكَ لَا تَخْلُفُ الْمِيعَادَ

① 《古兰经》第三十三章第五十六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八十六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九十三节全文。

求你将它赐予我们。
复活之日，
求你不要让我们受耻辱。
你是决不爽约的。”^①

A13.5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
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
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
天地万物，归他所有；
不经他的许可，
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
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
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
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
他的圣椅，包容天地；
天地的维持，他轻而易举；
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②

A13.6

“‘难道你不知道？
安拉使白昼、黑夜相交替，
令太阳、月亮运行定期，
熟知你们所做的一切。’^③
‘那是因为，
安拉的存在是真实的，
除了对他，他们的祈求是徒然的。
安拉是至高、至大的。’^④
‘难道你未曾见到？
船舶靠安拉的恩惠航行于大海，
为的是让你们见到他的神迹。
对每个坚忍者、感恩者来说，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
تؤذن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سي —
السموات وما
في الأ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ع عنده —
إلا باذنه يعلم ما بين أبد وآخر —
وما خلقهم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إلا بما شاء —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وات والأرض
ولا ينوره حفظهما وهو العلي —
العظيم

ألم تر أن الله يولج الليل في النهار —
ويولج النهار في الليل وسخر
الشمس والقمر كل يجري إلى أجل —
سعي وان الله بما تعلمون خبير ذلك
بان الله هو الحق وان ما يدعون من —
دونه الباطل وان الله هو العلي الكبير
ألم تر أن الفلك تجري في البحر —
بنعمة الله ليريمكم من آياته ان فسي —
ذلك لآيات لكل صبار شكور

①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九十四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三十一章第二十九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三十一章第三十节全文。

这里面确有神迹可见。”^①”

A13.7

“‘天地间的万物属于安拉，
安拉是无所不能的。’^②
‘天地的创造、昼夜的交替，
在聪明人看来，
确是神迹。’^③
‘他们站着、坐着、躺着念颂安拉，
他们冥想他对天地的创造。
我们的主啊！
你创造这一切，绝非枉然。
我们赞美你！
求你保佑我们免受火狱的苦痛。’^④
‘我们的主啊！
你让其进入火狱的人，
你确已判了他们受耻辱。
弃正道而自遭灾难的人，
是无人救助的。’^⑤”

A15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他们在议论何事？
议论那重要信息，
他们的意见分歧不一。
不！他们将会了解！
他们终将会了解！
岂不是我已将大地造成床铺，
将山岳造成支柱，
将你们造得成对成双？
岂不是我已使你们有睡眠得以休息，

وَلِهِ مَلْكُ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وَاللَّهُ -
عَلَى كُلِّ شَيْءٍ قَدِيرٌ فِي خَلْقٍ -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وَاخْتِلَافِ
اللَّيلِ وَالنَّهَارِ لَآيَاتٍ لِأُولَئِكَ الظَّاهِرَاتِ -
الَّذِينَ يَذْكُرُونَ اللَّهَ قِيَامًا وَقَعْدَةً -
وَعَلَى جُنُوبِهِمْ وَيَتَفَكَّرُونَ
فِي خَلْقِ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رَبُّنَا مَا -
خَلَقَ هَذَا بَاطِلًا سَبَّحَنَكَ فَقَنَّا -
عَذَابَ النَّارِ
رَبُّنَا أَنْكَ منْ تَدْخُلُ النَّارِ فَقَدْ -
أَخْزَيْتَهُ وَمَا لِلظَّالِمِينَ مِنْ أَنْصَارٍ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عَمَّ يَتَسَاءَلُونَ -
عَنِ النَّبِيِّ الْعَظِيمِ الَّذِي هُمْ فِيهِ مُخْتَلِفُونَ -
كَلَّا سَيَعْلَمُونَ ثُمَّ كَلَّا سَيَعْلَمُونَ أَلَمْ يَجْعَلْ -
الْأَرْضَ هَادِيًّا وَالْجَبَالَ أَوْتَادَ وَخَلَقَنَاكُمْ -
إِزْوَاجًا وَجَعَلَنَا نُوكْمَ سَبَاتًا وَجَعَلَنَا -
اللَّيلَ لِبَاسًا وَجَعَلَنَا النَّهَارَ مَعَاشًا -
وَبَنَيْنَا فَوْقَكُمْ سَبْعًا شَدَادًا وَجَعَلَنَا -
سَرَاجًا وَهَا جَا وَانْزَلْنَا مِنَ الْمَعْصَرَاتِ -
مَا نَجَّاجًا لَنْخُرَجَ بِهِ حَبَابًا وَجَنَّاتِ -

① 《古兰经》第三十一章第三十一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九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九十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九十一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九十二节全文。

有黑夜作为掩体，
有白昼藉谋生机？
岂不是在你们上空，
我已建起了七重穹苍，
还设置了灿烂阳光？
岂不是我已从云层中降下了丰足雨水，
藉以生产谷物、蔬菜，
又使园里花木繁衍？
审判日确是既定时刻，
一旦号角吹起，
你们将群集而至，
天似有门，自行开启，
山若幻景，全然消失。
火狱如设下的埋伏，
是那些作孽者的归宿，
他们将长期留置其中。
在那里，他们尝不到凉爽，
也无什么饮料可用，
只有滚烫的水，黑冷的脓。
这是(他们)该得的报应，
因为他们一向不怕清算，
从来不信我的经文，
也不信我所记录的一切。
就这么自食其果吧！
除了苦刑，我别无可加。
虔敬者，必有所得，
花园和葡萄，
年岁相当的少女，
还有盈樽的甘泉。
在那里，
他们听不到妄语和谎言。
这就是来自真主的报偿，
享受不尽的赏赐。
他是仁慈无比的天地之主，
天地间万物之主，
他们怎能向他申辩。

الغاها ان يوم الفصل كان ميقاتا يوم —
ينفخ في الصور فتأنون أفواجا وفتحت —
السماء فكانت أبوابا وسيرت الجبال —
فكان سرايا ان جهنم كانت مرصادا —
للطاغيين مايا لا بشين فيها أحقادا لا —
يهد وقون فيها بردوا ولا شرابا الا حسما —
وغساقا جزا وفاقا انهم كانوا لا يرجون —
حسايا وكمبوا بما تنا كذاها وكل —
شي احصيائه كتابا فذوقوا فلن —
نزيدكم الا عذابا ان للستقين مغارزا —
حدائق واعناها وكوابع اتراها وكأسا —
رهاقا لا يسمعون فيها لغوا ولا —
كذاها جزا من ربكم عطا حسايا رب —
السموات والارض وما بينهما الرحمن —
لا يملكون منه خطابا يوم يقوم الروح —
والملائكة صفا لا يتكلمون الا من اذن لهم —
الرحمن وقال صوابا ذلك اليوم الحق —
 فمن شاء اتخذ الى ربها مايا انا انذرناكم —
عذابا قريبا يوم ينظر المرء ما قد مت —
يداه ويقول الكافر يا ليته كنت ترابا

精灵、天使循序而立之日，
未得至仁至慈(安拉)的允许，
他们均不得发言，
而且只能发表当言之言。
审判日的确存在，
谁若愿意，
可到真主那里求归宿。
我确已警告过你们，
惩罚临近。
那一天，
每人都会见到，
自己的双手曾经干了什么。
渎神者将说：
但愿我本是尘土。”^①

A16

“愚蠢者将问，
为何让他们^② 放弃原先的朝拜方
向^③？
你^④就说，
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⑤
他所中意的人，
他将他们引上正路。
我还使你们成为适中的民族，^⑥
为的是让你们为世人作证，^⑦
而使者^⑧为你们作证。

سيقول السفهاء من الناس ما لا هم -
عن قبلتهم التي كانوا عليها قل لله -
الشرق والغرب بهدى من يشاء -
إلى صراط مستقيم وكذلك جعلناكم -
آمة وسطاً لتكونوا شهداء على الناس -
ويمكرون الرسول عليكم شهيداً وما جعلنا -
القبلة التي كت عليها إلا لنعلم من -
يتبع الرسول من ينقلب على عقبه وإن -
كان تلكبيرة إلا على الذين هدى الله مهما -
كان الله ليضيع إيمانكم أن الله بالناس -

① 《古兰经》第七十八章全文。

② 指伊斯兰教徒。

③ “原先的朝拜方向”是指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前阿拉伯人朝拜安拉时所面对的方向是麦加的克阿白(即天房)。穆罕默德在麦加时期，面向北做礼拜，因天房克阿白在北，所以朝拜的方向既是克阿白，又是耶路撒冷。但是穆罕默德被迎出走到位于麦加以北的麦地那以后，就不能这样两者兼顾了，他就暂定耶路撒冷为朝拜方向。“放弃原先的朝拜方向”是指将朝拜方向由耶路撒冷改为麦加。

④ 指圣人穆罕默德。

⑤ “东方和西方都是安拉的”，其意思是，安拉无所不在，因此不论面向哪里朝拜都有安拉所在。

⑥ 犹太教偏讲来世，基督教偏讲今世，伊斯兰教兼顾两者，既讲精神陶冶，又讲物质享受，但反对奢侈。“适中的民族”是指伊斯兰教徒。

⑦ “为世人作证”意思是为世人提出证据，证明他们的偏激所在。

⑧ 指圣人穆罕默德。

我之所以确认过你原先的朝拜方
向，

只是为了识别，
是谁顺从使者^①，又是谁背叛。

这^②确是件大难事，
但对安拉所指引的人来说，
却并非如此。

你们的信仰，
安拉决不使其徒劳，
对于世人，
安拉确是至仁、至慈的。^③

我见你反复仰视天空，^④
故我指示你改变朝拜方向，
为你所喜爱的方向。

你把脸转向圣寺^⑤吧！

你们无论在何处，
都把脸转向圣寺吧！
信奉经书的人们必定知道，
这改变是真主降示的真理。
他们的所作所为，
安拉绝不忽漏。”^⑥

لرُؤوف رَحِيمٌ قَدْ نَرِى تَقْلِبَ وَجْهَكَ فِي -
السَّمَاوَاتِ فَلَنْ يَلْتَمِكَ قَبْلَةً تَرْضَاهَا فَوْلَ -
وَجْهَكَ شَطَرَ الْمَسْجِدِ الْحَرَامِ وَحِيتَ -
مَا كُنْتُمْ فَوْلَوْا وَجْهَكُمْ شَطَرَهُ وَانَّ -
الَّذِينَ أُوتُوا الْكِتَابَ لَمْ يَعْلَمُوْنَ أَنَّهُ -
الْحَقُّ مِنْ رَبِّهِمْ وَمَا اللَّهُ بِغَافِلٍ عَمَّا يَعْلَمُونَ

A17. 1

وَانَّ ال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ا مَعَ -
اللَّهُ اَحَدٌ

“清真寺是安拉的，故此，除了安拉，你们
勿在其中祈祷其他。”^⑦

① 指圣人穆罕默德。

② 指改变原朝拜方向(耶路撒冷)。

③ “安拉决不使其徒劳”这段经文是为慰藉那些朝拜方向改变之前曾经跟随使者面向耶路撒冷进行朝拜又已归真的人们而降示的。

④ 穆罕默德出走到麦地那以后，虽然暂时以耶路撒冷作为朝拜的方向，但又希望以当时全体阿拉伯人所共同敬仰的天房(克阿白)作为伊斯兰教的朝拜方向，以利于号召阿拉伯人团结起来。因此他反复仰视天空，祈求安拉给予启示。

⑤ 指麦加的大清真寺。

⑥ 以上为《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四十二、一百四十三、一百四十四等三节全文。

⑦ 《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全文。

A17. 2

“也门艾卜也尼人，虔诚、纯洁的长老奈纳·乌马尔·本·艾哈默德·本·门苏尔·本·乌马尔建造了这座吉祥的清真寺的大门和围墙。祈求安拉满意他、宽恕他。”

بَنَى هَذَا الْبَابُ وَاحاطَتِ الْحَاطِطُ بِهِذَا
الْمَسْجِدِ السَّبَارِكِ الشَّرِيكِ النَّقِيِّ النَّقِيِّ
نَبِيُّنَا عَمَرُ بْنُ أَحْمَدَ بْنُ مُنْصُورٍ بْنُ عَمْرٍ
الْأَبْعَنِيَّ الْمَيْنِيَّ تَقْبِيلُ اللَّهِ مَنْهُو غَفَرَ لَهُ

A18

“清真寺是安拉的，故此，除了安拉，你们勿在其中祈祷其他。”^①

وَانَّ الْمَ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ا مَعَ -
اللَّهُ اَحَدٌ

A19. 1

“清真寺是安拉的，故此，除了安拉，你们勿在其中祈祷其他。”^②‘做好事者，我一定给予报偿。’^③‘只是为了怜悯世人，我才差遣了你。’^④”

×× وَانَّ الْمَ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ا -
مَعَ اللَّهِ اَحَدٌ
××× اَتَأْتَ لَا نَفْسَيْ اَجْرَمُ اَحْسَنَ عَلَيْهِ
××× مَا اَرْسَلْنَاكَ اَلَا ((رَحْمَةً لِلْعَالَمِينَ))

A19. 2

“此清真寺及其建筑物是按×××的吩咐建造的。穆罕默德·本·艾比贝克尔，别名加麦尔丁。”

اَمْرَ بَنِي اَسَمِّيْسَ هَذَا الْمَسَاجِدُ وَعَارِتَهُ -
الْاَجْلُ الْاَعْزَى ((ز)) اَلَا ××
مُحَمَّدُ بْنُ اَبِي بَكْرٍ الْمُلْقَبُ بِجَمَالِ الدِّينِ ×
×××××

A20. 1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⑤死是门，人人都要进去。”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الْمَوْتُ بَابٌ فَكُلُّ النَّاسٍ رَاخِلٌ

A21. 1

“讲台，‘他们的主以他的仁慈、喜悦和乐园向他们喜报，他们将永居其中。安拉那里确有重偿。’^⑥”

سَبِّير
يَبْشِرُهُمْ بِرَحْمَتِنِهِ وَرِضْوَانِ وَجْنَاتٍ
((لَهُمْ)) فِيهَا نَعَمٌ ((لَهُمْ)) مَقْدِرَةٌ ((لَهُمْ)) -
خَا ((لَهُمْ)) فِيهَا اُولَئِكَ ((لَهُمْ)) اَ-
اَنَّ اللَّهَ عَنْدَهُ اَجْرٌ ((رَبِّ)) عَوْظِيمٌ ((لَهُمْ))

^{①②} 《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十八章第三十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一百零七节全文。其中“你”系指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

^⑤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⑥ 《古兰经》第九章第二十一、二十二两节全文。

A21. 2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①死是门，
人人都要进去。”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الموت باب فكل الناس داخله

A22. 1

“[一切生物]都将死亡。[他是永生]
不死的。”^②

((كل حي)) سيمات (سموم)
((وهو حي)) لا يموت

A22. 2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③‘世间一
切，俱将[毁灭]。’^④”

كل نفس ذا ((ثقة الموت))
كل من عليه ((ا فان))

A23. 1

“清真寺是安拉的，故此，除了安拉，
你们勿在其中祈祷其他。”^⑤

وان الم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ا مع الله احدا

A23. 2

“先知——愿安拉为其赐福，保其平
安^⑥——说，谁建造了清真寺，即使简如
沙鸡窝，至高无上的安拉也会在天堂为他
造房。”

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من -
بني مسجدا
ولو بيتل مفعص قطاة بنى الله تعالى -
له بيته في الجنة

A24. 1

“清真寺是安拉的，故此，[除了安
拉，]你们勿在其中祈祷[其他]。”^⑦

ان الم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ا مع × × ×

A24. 2

“……此门已翻新……尊敬的×××
赫瓦杰×××丁×××……求至高无上
的安拉之喜悦……愿安拉宽恕……(回
历)728年×月×日。”

× × × وهذا الباب قد تم تجدده نا
× × × الاجل الكبير خواجه × الدین
× × × ابتغا لمرضات الله تعالى ...
× × × غفر الله
× × × سنة ثانية وعشرين و سبعين

①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全文。

② 第一句里的阿拉伯文似有刻写错误。这两句译文是根据现有字母和缺字空间及上下文推断出来的。

③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全文。

⑥ 按照穆斯林的惯例，每当提到先知穆罕默德时就用这句话为他祝福。

⑦ 《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经文。

A25. 1

“倘若今世有人能永生，安拉的使者^①当是今世的永生者。无一人能逃脱死亡，因此穆罕默德^②遭到死亡之灾。”^③

فُلُوكَانِ فِي الدُّنْيَا بِقَوْلٍ لَا حَدَّ ((رَبُّ لَكَانَ -
رَبُّ)) سُولُ اللَّهِ فِيهَا مُخْلِداً
وَمَا أَحَدٌ يَفْرَمُ الْمَوْتَ فِي ((مَصِيبَةَ الْمَنَّا)) -
بِهَا ((الْمَنَّا)) قَدْ اصَابَتْ مُحَمَّداً

A26. 1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他从不困倦，……”^④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قُّ الْقَيُومُ لَا -
تَأْخُذُهُ سَنَةٌ

A26. 2、A26. 3

“‘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⑤‘对于宗教不要强迫，因为正道与邪路已经分明。谁不拜偶像而信[安拉者就……]’^⑥”

وَهُوَ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لَا إِكْرَاهٌ فِي -
الَّذِينَ قَدْ تَبَيَّنَ الرُّشُدُ ((مِنْ))
الَّغَيِّ فَمَنْ يَكْفُرُ بِالْطَّاغُوتِ وَيُؤْمِنُ -
((بِاللَّهِ))

A27

“你们安宁、放心地进去吧！”^⑦

ادْخُلُوهَا بِسْلَامٍ آمِنِينَ

A28. 、A29

“清真寺是安拉的，故此，除了安拉，你们勿在其中祈祷其他。”^⑧

وَإِنَّ الْمَسَاجِدَ لِلَّهِ فَلَا تَدْعُوا
عَوْا ((تَدْعُوا)) مَعَ اللَّهِ أَحَدًا

A33

“此吉祥之墓系一些穆斯林所修，愿至高无上的安拉保佑他们，重修此墓，藉求至尊安拉之喜悦，重赏二传教者之功德。他俩在铁格木尔时代

عَرَّهُ هَذَا الْمَقْبِرُ الْمَبَارَكُ جَمَاعَةُ مَنْ -
الْمُسْلِمِينَ حَفَظُهُمْ
اللَّهُ تَعَالَى طَلَبًا لِرَعْضَاتِ اللَّهِ عَزَّ -

①② 均指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③ 碑文第一、第二行中间均有缺字，但尚能根据上下文推测出整句含意。

④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⑤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最后一句。

⑥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六节节录。

⑦ 《古兰经》第十五章第四十六节全文。这句话是天堂的天使们对敬畏安拉者说的，指的是进天堂。

⑧ 《古兰经》第七十二章第十八节全文。

来此国家^①，相传为善行者。后寿终，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人们皆信其茔地能广施荫庇，故每遇患难、困扰即前来求助，并嘱眷属于冬季拜谒，来者均能受益，无不平安而归。此碑文写于(回历)728年(公元1328年)斋月。”^②

و جل و جزيل ثوابه
لكرم البشيرين اللذين هذا دخلا -
هذا البلد في زمان التفسير وقيل -
انهما من اصحاب
الخيرات فتوفيا وانتقلوا من الدار -
الغنية (القافية)
إلى الدار الباقيه (الباقيه) الناس -
اعتقدوا مدفنهما بسع
حبابيتهما فازا اشتدت بهم الا مور -
و صعروا (عجزوا)
و تحيروا استعنوا بهما و امرروا اهلهم
بزيارتھما شتاً فاقاروا ورجعوا -
سالمن
و كتب هذا التذكر في رمضان سنة -
ثمان وعشرين و سبعين

① 阿文中 Balad 这个词有国家、国土、国、地方、地区等多种含意，译文仅取了其中之一。

② 此碑文，著名历史学家张星烺先生曾由英文翻译如下：

“这墓是昔日传教此方二先贤的坟墓。二贤者当发克福在位时即来此，有善行，至今尚为人们所称赞，后卒，葬此山，人们怀念他们的德行而思念之。墓有灵异，其有命运不佳或抱病不起者，都来此二贤的保佑，有求必应。每届冬季，常有多人自远方至此墓瞻礼行香，他们归家后，莫不健康逾恒，俱叹行千里而不徒劳。留居此地的伊斯兰教公会，特集资修墓，尚祈上主大发鸿恩，使此二墓永远保存，俾此二贤之骸骨，不致暴露风雨也。时回教纪元七百二十二年勒墨藏月也（即九月。为公元1323年，元至治三年）。”（引自吴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第18页，1957年，科学出版社）

张氏译文，系根据英译文译出，故与碑石阿拉伯文原文有出入。有些地方，如“二先贤”、“命运不佳或抱病不起”、“留居此地的伊斯兰教公会”，等等，原阿拉伯碑文中均无确切文字依据。此外，“发克福”一词的译法，疑问较大。从释读角度看，“发”和“克”是有所依据的，但“福”则根据欠足。我认为“发”有可能是“铁”，“克”如译为“格”更接近其阿文发音，“福”则有可能释读为“木尔”（mur），虽然这不能完全肯定，但本碑文第七行倒数第二字，另有一处“木尔”（mur），两者相对照，非常相似，由此可见“福”释读为“木尔”是可能成立的。“铁格木尔”是否即为“铁穆耳”（元成宗，在位时间为公元1294～1307年），历史学家当可考证判定。

再从发克福一词的含意来看，阿拉伯文有一个发音为 fegfur 的词，是由波斯文的 peg 和 pur 两字演变而来。peg 原意为“神”或“天”，pur 作“儿子”解。阿拉伯文中的 fegfur 一字旧义专指中国的“天子”。假设“发克福”是“天子”之意，碑文原译文就成“二贤者‘天子’在位时即来此”，这种时间概念的表达也有失于笼统、模糊。

我对本碑文的释读，虽有拓片、照片为据，但其书法和刻写多不规范，使不少字母的释读存在很大困难。个别地方只能根据前后文确定。存疑之处，已在阿文字或字母下加横线表示。

A42. 1、A42. 2

“教长，吐特卡·迈努奈·阿明^①·阿里·本·哈桑·本·阿里·卡罗姆^②。卒于(回历)772年^③斋月的一个星期五。求安拉宽恕他及其双亲。”

توفي الامام
التوتقا منون
امين (امير) على بن حسن
بن على القرorum (القزويني)
غفر الله له ولها
لديه (الوالد به) يوم
الجمعة في شهر

رمضان سنة اثنين وسبعين وسبعين

A42. 3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世间一切，俱将毁灭。’^④‘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⑤”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رحيم و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A43. 1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除了安拉，别无他神，除了安拉本身之外，一切都将毁灭。他有绝对的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⑥”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كل
شيء هالك لا وجهمه
الحكم واليه ترجعون

① 阿明(Amin)也可能释读为阿米尔(Amir)。

② 卡罗姆也可释读为格兹维尼(即格兹温人)。古城格兹维尼(Kazvin)位于古波斯境内，今苏联境内，里海以南，北纬约33度，东经50度。

③ 772年也可能是672年，但前者可能性更大。

④⑤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⑥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

A43. 2

“永存属于安拉，万物的生死是命中注定。今世不是安定世界。墓主是哈只^①。×××。卒于 764 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

البقاء (البقاء) لله
حكم السنّة في البرية جار
ما هذه الدنيا بدار قرار
هذا قبر المرحوم الحاجي العالم
الزاهد وتوفي في يوم الخميس
الساد من والعشرين من جمادى الآخر
سنة اربعين وستين وسبعين

A44. 1

“死者——殉教者，埃米尔·赛典赤^②·杜安沙·本^③·赛典赤·乌马儿·本·赛典赤·埃米兰^④·本·埃米尔·艾斯费赫萨拉尔^⑤·杜尔·比克尔，(祖籍)布哈拉人。愿安拉照亮他们的墓穴，使他们得居天堂。卒于 702 年 2 月 9 日。”

المتوفى الشهيد
امير سيد اجل طقانشاه بن
سید اجل عمر بن سید اجل اميران
بن امير اسفهسالار در بکرفی البخاری
نور الله ضجعهم و جعل الجنة —
مشاهد
و كانت وفاته في التاسع من شهر —
صفر سنة اثنا و سبعين

A44. 2

“先知(愿安拉为其赐福、保其平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安拉的使者(愿安拉为其赐福、保其平安)说的是实话。主啊！求你宽宥、怜爱这葬身异土的虔诚墓主。”

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من مات غريب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صدق رسول الله صلی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اللهم تفند بعفوك وغفرانك ورحمتك
ورضوانك صاحب هذا القبر الغريب —
الوجار

① 凡曾赴麦加朝觐者均可用此称号。

② “赛典赤”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汉译名，阿拉伯文原音为赛伊德，艾杰勒(Sayyid ajall)，意为“崇敬的首领”。从碑文看，“赛典赤”是这几代人的尊贵称号。

③ “本”在阿拉伯文中的意思是“儿子”。阿拉伯人名中出现“本”，意味着“本”之前是其本人名，“本”之后是其父亲名，第二个“本”之后是其祖父名，第三个“本”之后是其曾祖父名，依此类推。

④ 埃米兰是阿语单数词埃米尔(王子、首领、酋长之意)在波斯语中的复数词，用作称号，常和单数词埃米尔联用，构成最强语气。

⑤ 艾斯费赫萨拉尔也是称号，意为军队首领。是由波斯语的艾斯费赫(前行者之意)和土耳其语的萨拉尔(军队之意)组成的复合词。最早用在波斯国，后来又传到阿巴斯王朝的巴格达和法蒂美王朝的开罗，成为负责国家军队事务官员的称号。

A45

“杜安沙·本·乌马儿·本·赛典赤。”

طفانشاه بن عمر بن سيد اجل

A46. 1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①死者名艾哈迈德·本·赫瓦杰·哈凯姆……卒于(回历)672年7月^②”

كل نفس ذاته الموت
احمد بن خواجه حكيم ...
شهر ... شهر
تعوز ...
... سنة اثنا وسبعون
ستمائة

A47. 1

“我们确属于安拉，并将回归于他。”^③这是祈求真主怜悯、宽恕的罪人尼纳·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之墓。卒于(回历)704年斋月^④一个星期六的白天。”

انا لله وانا اليه راجعون
هذا قبر المرحوم المذنب الراجي
الي رحمة ربه وغفرانه نهيا
محمد بن عبد الله يعرف بـبلومان
توفي في نهار السبت من شهر الله
سنة اربعة وسبعين

A48

“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这是受人尊敬的青年格兰塔·特勤·本·素丹之墓。卒于(回历)708年7月。”

من مات غريب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هذا (١) الشهد للشاب الاكرم
قرنطا تكين ابن سلطان
هو توفي في شهر تعوز
سنة ثانية وسبعين

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② 碑文中在月份的前后，出现一些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写的非阿拉伯文的文字。

③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

④ 月份名称尚有疑问。

A49

“至高无上的安拉说：‘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①尊贵的、仗义疏财的大长老×××他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愿安拉照亮他的墓穴，并使他的墓地流芳百世，卒于回历 701 年 4 月。”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كل نفس ذات قاتل موت
انتقل من دار الفنا (الفناء) الى
دار البقاء (البقاء) الشيخ الأجل
الكبير منبع الاحسان الى العمة —

(العامة) ولبي السكرمات
الجزيله الامام المكي المحمدي ...
..... وانار الله
مرقه و طيب مشهده في آخر العبد —
الاول —
من شهر ربیع الآخر عام احمدی —
وبسمة
من الهجرة النبوية والرحلة المصطفوية

A50

“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安拉的使者说的是实话。这幸运的墓主、得到至高无上的安拉之宽宥的殉教者名叫侯赛因·本·哈只·格兹维尼^②。求安拉怜悯他、宽恕他。卒于(回历)707 年 2 月 15 日。”

من مات غريب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صدق رسول الله
صاحب هذا القبر المتوفى
السعيد الشهيد إ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حسين بن حاج
القزويني رحمة الله وغفر له
في التاريخ الخامس عشر
من شهر صفر سنة سبع وسبعين

A51

“至高无上的安拉说：‘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③‘人人将尝死的滋味，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كل نفس ذات قاتلة الموت

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② “格兹维尼”的释读可再商榷。从阿拉伯文组词结构看“格兹维尼”意为“格兹温”人[古波斯境内今苏联境内里海以南，北纬约 33 度东经 50 度，有一古城格兹温(قزوین、Kazvin)——见“伊斯兰史地图”阿文版第七页]，由此可见，死者侯赛因的父亲是格兹温城的一位哈只(朝觐过麦加的穆斯林)。

③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①先知(祝他平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祈求安拉宽恕的大长老可敬的教长乌马儿×××已逝世。愿安拉宽恕他。于7××年3月。”

وَانَا تَوْفُونَ أَجُورَكُم بِيَوْمِ الْقِيَامَةِ فَمِنْ زَحْرِ
عَنِ النَّارِ وَادْخُلُ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إِلَّا مَتَاعُ الْفَرُورِ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تَ غَرِيبً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تَوْفَى—

المرحوم الراحل
إلى رحمة الله وغفرانه الشيف الكبير —
الإمام الجليل
عمر بن جابر ... غفر الله له في
شهر ربيع الآخر
سنة ××× سبعين

A52

“他^②是永存的。已从今世转入后世。^③死者叶海亚丁·乌马儿·本·艾哈迈德·大不里齐^④。卒于767年宰牲月8日。”

هو الباقي
انتقل من الدنيا إلى العقى
يعينا الدين عمر ابن احمد القلبي
التبريزى في التاريخ الثامن
من شهر الأضحى ..
من شوال سنة سبع وستين وسبعين

A53

“他已得到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死者花刺子模国人哈比克的后代夏菲·拜莱代夏赫·赫瓦杰·哈只。愿安拉照亮他的墓穴，使他得居天堂。已由毁灭世界来到永恒世界。于希吉来历(回历)722年吉庆的斋月22日。愿安拉赐福于穆罕默德及其全体家族。”^⑤

وصل إلى رحمة المتعال العزيز الشافعي
بلد الشاه ابن خواجة حاج بن حابك —
خوارزمي نور الله
قبره وجعل الجنين ضجعه من الدار الفانية
إلى الدار الباقيه في الاثنان والعشرين —
من شهر الله

①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② 指安拉。

③ 意为人已离开人间，其灵魂已转入阴间。

④ “大不里齐”意为大不里士(Tabriz)人。

⑤ 人名中“哈比克”和“夏菲”的释译存疑。

البارك رمضان سنة اثنان وعشرين -
وسبعين من اللهم
الهجرة النبوية المصطفوية وصلى الله -
على محمد وآلہ اجمعین

A54. 1

“他^①是永生的。已故的长老、殉教者赫瓦杰·加麦尔丁·本·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的怜悯相接。愿安拉照亮他的墓穴。卒于(回历)705年1月13日。”

هو الحي الباقي
توفي الشیخ المرحوم الشهید
وصل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خواجا
جمال الدين بن محمد بن × ابراهيم
نور الله قبره في التاريخ الثالث
عشر من شهر محرم من سنة خمس وسبعين

A54. 2

“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欣然回到你的主那里去吧！’^②‘加入我的崇拜者的行列吧！’^③‘进入我的天堂吧！’^④”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ارجعى الى ربک راضیة
مرضیة فاد خلی فی عبادی
واد خلی جنتی

A55. 1

“这位伟大、慷慨^⑤、受人尊敬的人是殉教者哈只·本·艾阿法贝克^⑥·本·哈只·马利伊^⑦。(回历)时789年8月27日。”

هذا الاجل الكبير الکريم
شهید حاجی بن اغفریک
بن حاجی المالعی
وذلك كله السبع
والعشرون من شهر شعبان
سنة تسع وثلاثون
وسبعين

① 指安拉。

②③④ 《古兰经》第八十九章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全文。

⑤⑥⑦ 均有其他释读之可能。

A55. 2

“他们说，我们确属于安拉，并将回归于他。”^①‘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②”

قالوا اتنا لله واتنا
الله راجعون
من مات غربها
فقد مات
شهدا

A56. 1

“先知(祝其平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离开今世并得到至高无上的安拉之宽恕的死者为瞻思丁·本·努尔丁·本·伊斯哈甘·×××。卒于(回历)725年1月27日星期五。”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ت غربها فقد مات شهدا
من اعرض عن الدنيا وصل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شمس الدين بن
نور الدين بن اسحاقان شهير نسائي
في يوم الجمعة سبع وعشرون من
شهر المحرم سنة خمس وعشرون وسبعينة

A56. 2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除了至强、至睿的他，别无他神。‘安拉所满意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③”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عزيز
الحكيم ان الدين
عند الله لا إسلام

A57. 1

“他^④是永生的。‘人人将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遣回我^⑤处’^⑥。这幸运的被宽恕的殉教者已逝世。

هو الحي الباقي
كل نفس ذاتية الموت ثم إليها ترجعون
قد توفيت اميرة حسن السعيدة —

①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

② “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是先知穆罕默德说过的一句话。英国学者拉宾博士(Dr. C. Rabin)将其译为“他是一个为传教而死亡在异国的人”——见《泉州宗教石刻》1957年版第10页，将这句话理解为专指这位死者，似为不当。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十九节节录。

④⑤ 指安拉。

⑥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全文。

这位著名的可敦是当权者哈桑之女。愿安拉照亮她的墓穴，使她到乐园归宿。她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时为回历 721 年斋月 21 日。愿安拉赐福于穆罕默德及其全体家族。”^①

الشهيدة المرحومة
المغفورة شهيرة خاتون بنت حسن —
الولي نور الله
قبرها وجعل الجنة مضمونها من —
الدار الفانية الى
الدار الباقية في العادى والعشرين —
من شهر
الله المجلل رمضان سنة احادى
وعشرين وسبعين
من التاريخ الهجرى النبوى المصطفوى —
وصلى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وآلہ اجمعین

A57. 2

“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值得赞美，至高无上的安拉说：‘人人将尝死的滋味。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②”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قال الله سبحانه وتعالى
كل نفس ذاقه الموت وانما توفون أجركم
يوم القيمة فمن زحزح عن النار و
اردخل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 ما
الخيرية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الاستاع الغرور

A58. 1

“这是善良的，虔诚的女信徒法蒂美之墓。她是艾哈迈德之女。愿死者得到安拉之怜悯和欣悦。她卒于(回历)706 年安拉的吉祥之月——斋月 13 日。愿安拉赐福给穆罕默德^③及其全体家族。”

هذا قبر المرحومة الصالحة الراكعة
الساجدة فاطمة بنت احمد
تغمده الله بالرحمة والرضوان
توفت في الثالث عشر من شهر
الله المبارك رمضان عظمه
الله بركته لسنة ست و سبعين
من الهجرة النبوية و صلى الله على —
محمد وآلہ اجمعین

① 释文中著名的、当权者之女均可能作其他释读。‘可敦’在刻文中比较清晰，是阿语中的一个外来词，原是土耳其语，用于皇后、夫人之称。可见死者是位较有地位之女性。

②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③ 指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A58. 2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世间一切，俱将毁灭。’^①‘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②”

A59. 1

“从这虚幻世界^③转到极乐世界^④，已与安拉的怜悯相接。死者海迪杰夫人是位幸福、善良、虔诚、弃绝红尘的有钱人，已故萨达鲁^⑤·齐克尔^⑥·穆艾尼丁·伊斯哈甘尼^⑦之女。卒于(回历)736年10月6日。”

A59. 2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⑧

A60

“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相接。死者——幸福的殉教者拜赫莱旺^⑨·亚南·本·卡赛姆，伊斯法罕人^⑩。愿安拉慈悯、喜爱他。安拉于(回历)759年将其留居天堂。

①②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③ 指今世，即人活着时所在的世界。

④ 指来世，即人死后灵魂所在的世界。

⑤ “萨达鲁”用作别号。

⑥⑦ “齐克尔”和“伊斯哈甘尼”的释读存疑。

⑧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⑨ “拜赫莱旺”意为君主、国王。伊斯兰借用此词和地名、族名搭配构成别号(见哈桑·巴夏博士所著的《历史、文献、文物中的伊斯兰别号》第227页~1957年，埃及复兴书店出版社出版)。

⑩ 原音为伊斯法罕尼，意为伊斯法罕(Isfahan)人。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مَنْ عَلِمَهَا فَان
وَيَقِنَّ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أَكْرَامِ

انتقل من دار الغرور الى دار السرور
واتصل الى رحمة رب الفتن —
السعيدة الصالحة —
الساجدة الزاهدة خديجة خاتون —
بنت الصدر المرحوم
ذكر معين الدين اسحقاني في —
تاریخ يوم السادس
من شوال سنة ست وثلاثين وسبعين

كل نفس ذاقه الموت
وانما توفون أجوركم يوم القيمة
فنحزن عن النار وادخل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الا متعة الغرور

انتقل من الدار الفانية الى الدار
الباقيه واتصل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المرحوم السعيد الشهيد
بهلوان يانان بن قاسم اصفهاني
تفمهد الله بالرحمة والرضوان
واسكته بمحبته الجنان في
سنة تسع وخمسين وسبعين

A61

“这是法蒂美可敦^①之墓。他是一位高尚、贞洁的母亲，是阿里·特肯·库哈提之女。求安拉宽恕、满意她。卒于回历 729 年 3 月 6 日星期日……”^②

هذه
قبة الوالدة العزيزة المستورة —
الصالحة فاطمة خاتون بنت —
على تكن الكوحاطي غفر الله برحمه ((ت))
ورضوانه من ست شهر ربى
اول في يوم الاحد سنة تسعة وعشرين
وسبعيناً من هجرة النبوة عليه
الصلوة والسلام در هشت ماه
دوارده خطائني در رسال نهنج

A62. 1

“安拉是最仁慈的。‘在你之前的任何人，我没有让他永生，你若死了，难道他们会永生吗?’^③‘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④‘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⑤先知（愿安拉为其赐福、保其平安）说……愿安拉喜爱他……永恒世界。他已抛弃毁灭世界，来到永恒世界。……至高无上的安拉……回历 777 年斋月 8 日……你们要做礼拜……‘赞颂属于安拉——万物之主。’^⑥”

الله ارحم الراحمين
وما جعلنا لبشر من قبلك الخلد أَفَان —
مت فهم الخالدون كل نفس زائفه —
الموت والياب ترجعون
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المتكران المستعدان للذان
. والذين دخلوا الجنة
. رضي الله عنه التحقوا دار البقاء
. من الأمثال الذين . . . فقد فاز
دار البقاء الأبدية فقد اعرض عن —
الدنيا الفانية قبل الى الآخرة البقاء
.
المعروف . . . الله تعالى
الثامن في شهر رمضان سبع —
وسبعين وسبعيناً من الهجرة النبوية قصوا الصلوة والتضحية —
والزفيرات والحمد لله رب العالمين

① “可敦”为夫人之意。

② 译文最后的省略号为一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又显然不是阿拉伯文的文句。

③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四节全文。

④⑤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节录。

⑥ 《古兰经》第三十七章第一百八十二节全文。

A62. 2

“除他本身之外，一切都将毁灭。”^①先知(祝他平安)说：死在异国，即为殉教而死。萨阿德拉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他宁要来世而不要今世。他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相接。安拉所满意的宗教确是伊斯兰教及其信徒。愿安拉怜悯、宽恕他和穆罕默德^②及其全体家族。”

كل شيء هالك الا وجهه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وت الغريب -
شهادة
انتقل من دار الغاية الى دار الباقيه -
واختار الآجلة
على العاجلة واتصل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
تعالى المغفور المرحوم
سعد الله وان الدين عند ما لا سلام -
وال المسلمين
تفديه الله بالرحمة والغفران
محمد وآلها اجمعين

A63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③”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A64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④死者名曰艾卜法蒂美^⑤。求安拉宽恕他。”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هذا
اسم ابو فاطمة
غفر الله له

①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他本身”，指安拉。

② 指伊斯兰教创始人。

③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⑤ 艾卜法蒂美意为法蒂美的父亲。

A65

“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啊！你是最仁慈的，求你宽恕，怜悯所有的男女穆斯林。”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اللَّهُمَّ اغْفِرْ وَارْحِمْ لِجَمِيعِ
الْمُسْلِمِينَ وَالْمُسْلِمَاتِ بِرَحْمَتِكَ
بِأَرْحَمِ الرَّاحِمِينَ

A66

“他是独一无二、战无不胜的安拉。”^①‘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②先知(祝他平安)说，权柄属于安拉……”

هُوَ اللَّهُ الْوَاحِدُ
الْقَهَّارُ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ي وَيَقِنُ وَجْهَ
رَبِّكَ ذِي الْإِجْلَالِ وَالْأَكْرَامِ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الْطَّلْكَ لِلَّهِ أَمَانًا وَسَلَامًا
.....
.....

A67. 1

“永生属于安拉。‘人人将尝死的滋味。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③”

الْبَاقِي لِلَّهِ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وَإِنَّمَا تَوْفِيُنَّ أَجْوَرَكُمْ
يَوْمَ الْقِيَامَةِ فَمَنْ زُحِّزَ عَنِ النَّارِ
وَادْخُلَ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إِلَّا مَتَاعٌ الْفَرَوْرُ

A67. 2

“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① 《古兰经》第三十九章第四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A68

“他是永生的。已从今世到后世。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相接。死者名哈瓦杰·阿里·本·奥斯曼。愿安拉宽恕他。卒于(回历)759年第四个月禁月^①6日。”

هو الباقي
انتقل من الدنيا الى العقى
واتصل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خواجه على بن عثمان ..
تفمدء الله بالغفران في السادس
من المحرم الرابع في شهر
سنة تسع وخمسين وسبعينة

A69

“他^②是永存的。已从今世到后世。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相接。死者哈只·赫瓦杰^③·侯赛因·耶勒基·西拉菲^④。卒于回历764年10月15日。”

هو الباقي
انتقل من الدنيا الى
العقى واتصل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حاجي خواجه حسين المرحوم
بلکی سرافی فی التاریخ الخامس
عشر من شوال سنة اربع و ستين و سبعين و سبعين

A70

“他是永生的。瞻思丁·穆罕默德·伊本·伊兹丁·大不里齐^⑤他已从今世到后世。时卒于吉祥的斋月7月20日。”

هو الحي
انتقل من الدنيا الى العقى
شمس الدين محمد ابن عز الدين
الشيرازی فی التاریخ العشرين من
شهر الله الام رب جمادی ((٦)) الله

① 伊斯兰教历一年有四个禁月，即回历1月、7月、11月、12月。禁月中不许开仗。第四个禁月即12月。

② 指安拉。

③ 赫瓦杰(Khewajh)原是波斯语，意为先生、教师、商人、长老等等，在伊斯兰世界用作人的称号。

④ 侯赛因·耶勒基·西拉菲的释读存疑。其中西拉菲意为西拉围(又名尸拉夫和撒那威)人。

⑤ “大不里齐”意为大不里士人。

A71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①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胡斯娜·易司马仪小姐卒于(回历)764年斋月。”

كل نفس ذاتة الموت
انتقل من الدار الغانية
إلى الدار الباقيه الآنسة
حسنی اسماعیل الخال في شهر الله
سنة اربع و ستين و سبعمائة

A72. 1

“.....回历 715 年”

.....
سنة خمسة عشر و سبعمائة الهجرية

A72. 2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人人将尝死的滋味。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②”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نفس ذاتة الموت
وانما توفون اجركم
يوم القيمة فمن زحزح
عن النار وادخل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 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
 الا متع ((الفرور))

A73. 1、A73. 2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人人将尝死的滋味。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③”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نفس ذاتة الموت
انما توفون اجركم
يوم القيمة فمن زحزح
عن النار وادخل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 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الا متع الفرور

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

A74. 1、A74. 2

“至高无上的安拉说：‘在你之前的任何人，我没有让他永生，你若死了，难道他们会永生吗？’^①‘人人将尝死的滋味，我用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②先知（愿安拉为其赐福，保其平安）说……卒于（回历）788年……”

قال الله تعالى
وَمَا جعلنا البشر من قبلك الخلد —
أَفَانْ مَتْ فَهُمُ الْخالِدُونَ كُلُّ نَفْسٍ أَئِنَّ
الْمَوْتَ وَنَبِلُوكُمْ بِالشَّرِّ وَالْخَيْرِ فِتْنَةً —
وَالْيَنَا تَرْجِعُونَ
قَالَ النَّبِيُّ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سنتان وثمانينقوسبعد (مائة)

A75. 1、A75. 2

“他是永生、永存的。这是幸福的殉教者穆罕默德·本·迈斯乌德之墓。他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相接。卒于（回历）726年12月25日。真主啊！……”

هو الباقي
هذا قبر الشهيد السعيد المرحوم —
وصل
إ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محمد بن مسعود —
توفي
في يوم الخامس والعشرين من ذى الحجة
سنة ست وعشرين و سبعين
اللهم

A76

“地^③。‘不论以前还是以后，凡

①②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四、三十五节全文。

③ 据吴幼雄先生说，有位在华工作的阿拉伯专家曾将本碑文第一行的“地”字，释读为爱资哈尔。这一释读，从字形看虽有可能，但从字义来说，爱资哈尔是埃及开罗的一个古老清真寺的名字，单独用在此处显得欠合情理。如作人名用，似乎也不太可能，因为死者名已出现在碑文正文。当然，“地”字单独用在这里，其用意不清楚，同样显得欠合情理，也只是从字形看有些可能。碑文中中文“蕃客墓”的字样引起了我的推想，不知是否可能用它连同最后一行的“墓”字来表达“墓地”之意。为何“地”字在前“墓”字在后，则是由阿拉伯文的组词规则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地”与“墓”的字体同属一种，其刻写水平较低，而碑文其余的字形却明显另属一种字体，其刻写也具有一定艺术性。且“地”字所占的位置颇为狭窄，将“墓”字刻在“蕃客墓”三字之下也很为奇特。看来这两个字极有可能是立碑之后某个时候增刻的。对整个碑文内容并无影响。

泉州宗教石刻

事只有安拉知道。^①死者阿卜杜拉·
阿里·穆罕默德·本·哈桑。墓^②。”

الارض
لـك الامر
من قبل ومن بعد
المتوفى عبد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بن الحسن
القبر (الصبر)

A77

“这是侯赛因·本·穆罕默德·
赫拉蒂之墓。祈求安拉怜悯他。卒
于(回历)567年4月13日”

هذا قبر حسين بن
محمد الغلاطي رحمة الله
توفي في شهر ربيع الآخر
مغض منه ثلاثة عشر يوماً
في سنة سبعة وستين
وخمسة سنة

A78

“元郭氏德广公的墓”^③

اين قوز دقاد تا مو

A79

“已转到后世，转到永恒世界。
殉教者(安拉的)奴仆×××伊卜拉
欣·西拉菲^④×××”

انتقل من دار العاقبة الى
دار الباقيه العبد الشهيد
××× ابراهيم سرافي

① 这两句按我的释读，则是《古兰经》第三十章第四节经文的摘录。上述阿拉伯专家将其释读为“安拉是今世和来世之主”，显然是不恰当的。

② 这位专家还将最后一行的“墓”字释读为“埃及”，似较牵强附会。“埃及”一词是不应带冠词的，然碑文中此字明显带冠词。此字除可释读为“墓”外，也可能释读为“耐心”。如是“墓”字，其用意已在前注中阐明。如是“耐心”，其含意可能是与碑文中“凡事只有安拉知道”相呼应。这段经文及其后数节经文内容的背景是：当时，波斯人战胜了罗马人，阿拉伯人中崇拜偶像的多神教徒为之欢欣鼓舞，并说，如同没有天书的波斯人战胜有天书的罗马人一样，没有天书的我们将战胜有天书的伊斯兰教徒。针对这种说法，经文谈到“数年之后”罗马人将转败为胜。先知穆罕默德曾将“数年”解释为三至九年。史实是罗马人在败于波斯人之后第九年重新兴起，战胜了波斯人。碑文中引用的经文，意在号召人们要有耐心，一切听从安拉的安排。因而碑上加刻“耐心”字样以与经文相呼应是顺理的。但与释读为“墓”字相比较，似不如释读“墓”字为好。姑存疑，供读者进一步探讨。

③ 此碑所刻一行阿拉伯文字，从单个字看，几乎没有一个具有完整的字义，从整体看，在阿拉伯语里并不成文。联系碑上所刻中文，与“百奇、坡庭、惠、晋”均无关系。但与“元郭氏世祖坟茔”却有令人注目的关系。所刻阿文按其特地标明的读音符号，其读音为：“yin go zi degangong ta mu”。据说这位郭氏世祖为郭德广，那么，degangong 便可认为就是“德广公”的对音。进而碑文所刻阿文可认为就是用阿文字母拼写的“元郭氏德广公的墓”的对音。换言之，即为“元郭氏世祖坟茔”之意。

④ “西拉菲”的释读存疑，其意为西拉围人。

A80. 1

“阿布贝克尔·本·侯赛因 ××
×。卒于(回历)719年4月1日。”

ابو بكر بن حسين . . .
تاريخ اول . . شهر ربيع
الآخر سنة سبع عشرة وسبعين

A80. 2

“……对他^①的判决不可抗拒。
祈求安拉怜悯他以及说话诚实者。”

ل桴ائية ××
ولا مانع لحكمه
وبرحم له ولمن قال امينا

A81. 1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先知
(祝他平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
教]而死。”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ت غريب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

A81. 2

“永存属于安拉。除了安拉,别
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البقاء 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A82

“这是孱弱、贫苦母亲之墓。求
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她是赛义
德××本·赛义德·穆罕默德·
哈姆达尼的母亲。死于……”

هذا قبر امة الضعيفة
الفقيرة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والدة السيد
البرتني بن السيد محمد
الهمدانى توفت في
×××××

A83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世间一
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هق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 • • • •

^① 指安拉。

泉州宗教石刻

是永存的。^①先知(祝他平安)说……他说(祝他平安):人世间,起初是逗留,中途是艰难,最后是毁灭。他说(祝他平安):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

وَقَالَ عَلَيْهِ السَّلَامُ الدُّنْيَا أُولَئِكَ بَقَاءٌ
وَأَوْسِطُهَا عَنَا وَآخِرُهَا فَنَا وَقَالَ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 تَغْرِبُهَا فَقَدْ مَاتَ —
شَهِيدًا

A84

“孱弱的少妇范夏赫之女海迪杰死于×××年4月28日星期日清晨。”^②

توفت الجارية الضعيفة
خدبة بنت فانشاد
يوم الاحد ثمانية والعشرون
من شهر ربيع الآخر
وقت الضحى من شهور
XXXXXX

A85

“……(回历)780年”

.....
سنة ثمان وسبعين

A86

“已故长老费赫里·易卜拉欣×
×死于……”

توفي الشیخ المرحوم
فخری ابراهیم ×××
XXXXXX

A87

“永存属于安拉。‘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③”

الباقي لله
كل نفس ذاتية ((الموت))

A88. 1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④先知(祝他平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

كل نفس ذاتية الموت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ت غربه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①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② 碑文中死者逝世年份,字迹已完全残缺,无从辨认,故用三个叉号表示。除此之外,此碑文字迹可以释读,含意也较完整。马厚恩先生在1957年版《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中的译文将年份译为“回历四百年”,若说有其根据,只可能刻在此墓碑的残缺部分。现有泉州伊斯兰宗教石刻的年代都在回历六、七百年上下,如马译“四百年”确有其根据,则此墓碑的历史价值就非同一般了。但是就碑文现存字迹看,并无年份可考。如果此碑残缺部分尚未发现,“卒于回历四百年”之说当应推翻。

③④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A88. 2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A89

“……虚幻世界。……永恒世界……”

.....
دار الفرور
.....
الْأَبْدِيَّةِ الْأَعْرَاضِ مِن
فِي دَارِ الْبَقِيَّةِ
.....

A90

“×××贝克尔×××6××年 10
月×日祈求安拉宽恕他及其双亲。”

×××بَكْر×××
×××عَشْرَ شَهْرَ شَوَّالَ
×× سَتْمَائَةَ غَفْرَ اللَّهِ لَهُ وَلَوَالِدِيهِ

A91

“无比威严、仁厚之××，愿安拉
赐福给穆罕默德及其全体家族。”

××الْجَلَالُ وَالْأَكْرَامُ وَصَلَوةُ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وَآلِهِ وَاصْحَافِهِ

A92. 1

“除了安拉之外，一切俱将毁灭。”^①先知(祝他平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他已离开这虚幻世界^②来到极乐世界^③。已与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相接。死者塞德尔·艾杰勒·凯比尔^④×××。”

كُلُّ شَيْءٍ هَالِكٌ إِلَّا وَجْهُهُ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تَ غَرِيبًا —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اعْرُضْ عَنْ دَارِ الْفَرَرُورِ إِلَى دَارِ
السُّرُورِ وَوَصِّلْ

①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

② 指今世。

③ 指来世。

④ “塞德尔·艾杰勒·凯比尔”并非死者名字而是其称号。“塞德尔”可作一切事物之“前部”、“首位”解，因此，凡享有威望和地位者用其作为别号。“艾杰勒”意为“尊敬的”。“凯比尔”意为“大的”、“重要的”。三者联用是伊斯兰惯用的尊贵称号之一。埃及奴隶王朝时此称号用于国王侍从、大商人、手工业主。此碑另一面的“达鲁”之后可估计残缺“花赤”两字。“达鲁花赤”又作“达鲁噶齐”，意为长官(见1947年中华书局印行的《辞海》合订本第1328页)。笔者认为此词来源于蒙古语的“达鲁嘎”(darga)。dar是“压”的词根，ga是“者”的意思，联在一起的引申词义为长官。“达鲁噶”与“达鲁嘎”音相近。“艾杰勒”(ajall)在“赛典赤”这个历史人名里，它完全等于汉字的“赤”(赛典赤原是阿拉伯文中的 Sayyid-ajall)。“齐”和“赤”音也相近。综上所述，阿文中的称号“塞德尔·艾杰勒·凯比尔”与汉语中的“达鲁花赤”都是死者的称号，词义相近。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رحمة الله) -
تعالى الصدر الاجل الكبير ×
××××

A93

“除了他自身之外，一切都将毁灭。他有绝对的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①

كل شيء هالك
لا وجه له
الحكم واليه
ترجعون

A94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②……卒于回历 751 年……愿安拉赐福于文盲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全体家族，并保其平安。”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بقى وجه ربكم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
.....
... انتقل من دار الغرور
سنة احدى وخمسين وسبعينة -
من الهجرة النبوية
.....
و صلى الله على النبي الامي محمد واله
اجمعين و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A95

“这是哈只·纳萨衣的女儿法蒂美之墓。愿安拉赐福于文盲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全体家族，并保其平安。”

هذا قبر فاطمة
ابنت (ابنة) الحاج النسائي
رحمها الله تعالى ورحم
في ترحم عليها وعلى جميع
المسلمين وصلى الله على محمد النبي
الامي وعلى آله وسلم تسليماً كثيراً

①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其中三个“他”字都是指安拉。

②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96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你说，安拉是独一无二的；安拉是万物所依赖的；他没有生育（儿女），也没有为（父母）所生育；他是无以类比的。”^①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قُلْ هُوَ اللَّهُ أَحَدٌ إِنَّ اللَّهَ الصَّدِيقُ
((لَمْ يَلِدْ)) وَلَمْ يُوْلَدْ وَلَمْ يَكُنْ كَفُوا أَحَدٌ

A97

“死于热恋^②，即为殉教而死。”

مَنْ مَاتَ مِنْ
الْعُشُقِ فَقُدِّمَ
مَاتَ شَهِيدًا

A98

“真主啊！他的善行请接受，他的罪过请宽宥、赦免。”

اللَّهُمَّ وَمَا أَبْدَى
لَهُ مِنْ حَسَنَةٍ فَتَقْبِلْهُ
مِنْهَا وَمَا أَبْدَى لَهُ
مِنْ سَيِّئَةٍ فَتَجَازِرْهُ
وَاعْفْ عَنْهَا

A101

“[他^③赐予我们]安居之地，我们在乐园里随意居住，对已尽义务者来讲，这是多好的报酬！”^④

((وَأَوْرَثْنَا)) الْأَرْضَ نَتَبَوَّأُ مِنَ الْجَنَّةِ —
حِيثُ نَشَاءُ فَنَعِمْ أَجْرُ الْعَامِلِينَ

A102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⑤

كُلُّ نَفْسٍ ذَا قَةُ الْمَوْتِ ثُمَّ الَّذِينَ تَرَجَّمُونَ

A103

“[在乐园里，他们将享有]永恒的安乐。”^⑥‘他们将永居其中。安拉那里确有[重偿]。’^⑦”

نَعِيمٌ مَقِيمٌ خَالِدٌ بَنْ فِيهَا أَبْدَانٌ —
اللَّهُ عَنْهُ

① 《古兰经》第一百一十二章全文。

② “热恋”之对象理当是安拉和伊斯兰教。

③ 指安拉。

④ 《古兰经》第三十九章第七十四节节录。

⑤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全文。

⑥ 《古兰经》第九章第二十一节节录。

⑦ 《古兰经》第九章第二十二节全文。

A104

“祈求得到至高无上的安拉之怜悯者×××”

الراغي الى رحمة الله تعالى ×××

A105

“安拉创造世人，然后又将其再造，然后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①

الله يبدى الخلق ثم يعده ثم واليه -
ترجمون

A106

“祝你们平安！凭你们所做，你们进天堂吧！”^②

سلام عليكم ادخلوا الجنة بما كنتم تعملون

A107

“他是永生不死的”

وهو حي الذي لا يموت

A108

“加入我奴仆的行列！进入[我的天堂！]”^③

((قاد)) خلي في عبادى واد ((خلي))

A109

“××墓。其中只是殉教者。”^④

القبة وما هو الا فيه من كان يشهد

A110

“你无比威严的主”

ربك ذو الجلا ((ل))

A 111

“除了他本身之外，一切俱将毁灭。他有绝对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⑤

كل شيء هالك الا وجهه له الحكم -
واليه ترجعون

① 《古兰经》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全文。其含意为：世上人都是由安拉所创造，今世人死后安拉在来世又使其复活再生，死人复活之后再被遣送到安拉那里进行审判，清算他在尘世时的所作所为。

② 《古兰经》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八十九章第二十九、三十节全文。

④ 释文中有多处存疑。

⑤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

A 112

“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①

((وَهُوَ)) قَوْمٌ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لَا لِ))

A 113

“一切活着的，都将死去，[而他是]
永生不死的。”^②

كُلُّ حَيٍ سَيُوتُ ((وَهُوَ)) حَيٌ لَا يَمُوتُ

A 114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我用祸福考
验你们。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③

كُلُّ نَفْسٍ ذَايَةٌ الْمَوْتُ وَنَبْلُوكُمْ بِالشَّرِّ –
وَالخَيْرُ فِتْنَةٌ وَالْيَنَا تَرْجِعُونَ

A 115、A 116

“虔诚的信徒们，他们生活在乐园、
天堂。”^④“享受着真主的赏赐。真主保
佑他们免受火狱的折磨。”^⑤“[凭着你们
过去所做]你们[尽情地]吃吧！[喝
吧！]”^⑥

أَنَّ الْمُتَقِينَ فِي جَنَّاتٍ وَنَعِيمٍ –
فَاكِبُ ((بَ))
نَ (فَاكِبِينَ) بِمَا أَتَاهُمْ (آتَاهُمْ) –
رَبِّهِمْ عَذَابُ الْجَحِيمِ كَلُو ((ا)) –
وَاسْرَبُوا هَنِئُنَا بِمَا كُنْتُمْ تَعْمَلُونَ ())

A 117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世间一
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
是永存的。’^⑦贫穷的母亲——穆萨·本
·阿里·穆萨之女法蒂美卒于 1 月 3 日
星期六。”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مَنْ عَلَيْهَا –
فَانٌ وَيَمْقُنُ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تَوْفِتَ –
الْأُمَّةُ الْفَقِيرَةُ فَاطِمَةُ
بَنْتُ مُوسَى بْنُ عَلِيٍّ الْمُوسَى يَوْمُ السَّبْتِ –
الثَّالِثُ مِنَ الْمُحْرَمِ مِنْ

A 118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
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⑧先知(祝他平
安)说：死于异国，即为殉教而死。祈求
安拉宽恕他。”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مْقُنُ)) وَجْهُ رَبِّكَ –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قَالَ النَّبِيُّ عَلَيْهِ السَّلَامُ مَنْ مَاتَ
غَرِيبًا فَقَدْ مَاتَ شَهِيدًا غَفَرَ اللَّهُ لَهُ

①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全文。

② 现碑文中缺“而他是”几字，但隐隐约约可见其痕迹。“他”字指安拉。

③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④⑤⑥ 分别为《古兰经》第五十二章第十七、十八、十九节全文。

⑦⑧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119

“安拉创造世人，然后又将其再造，然后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①

الله يبد و الخلق ثم يعده ثم اليه ترجعون

A 120

“我们属于安拉，并将回归于他。”^②

اتا لله و اتنا اليه راجعون

A 121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③

كل نفس ذاتة الموت

A 122

“一切生物，都将死去，他^④却是永生不死的。”

كل حي سيموت و هو حي لا يموت

A 123

“除了他本身，[一切俱将毁灭]。”

((كل شيء . حال)) ك الا وجه

A 124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⑤

((كل من عليه)) ا فان و يبقى وجهه -
((رب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A 125

“.....玻璃[宫]灯.....”^⑥

((ال)) مصباح في زجاجة الزجاج ((جهة))

A 126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主之本身]是永存的。”^⑦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 يبقى و ((جهة)) -
((رب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① 《古兰经》第三十章第十一节全文。其含意为：世上人都是由安拉所创造。今世人死后安拉在来世又使其复活再生。死人复活之后再被遣送到安拉那里进行审判，清算他在尘世时的所作所为。

②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伊斯兰教徒凡遇死人之事，惯用这句话来劝慰自己或他人。

③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④ 指安拉。

⑤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⑥ 《古兰经》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五节节录。

⑦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A 127

“[他有]绝对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①

((لَهُ الْحُكْمُ وَإِلَيْهِ تُرْجَمُونَ))

A 128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②

كُلُّ مَا فِي الْأَرْضِ يَوْمًا وَلَيْلًا ((رَبُّكَ))

A 129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س))

A 130

“他^③有绝对判决权。”

لَهُ الْحُكْمُ ((م))

A 139

“这是通向……之路”

هُوَ السَّبِيلُ إِلَى

A 140

“今世[不是]安定世界”

((لَيْسَتْ)) هَذِهِ الدُّنْيَا بِدَارٌ قَرَارٌ

A 142

“今世……”

الْدُنْيَا

A 143

“萨德尔丁·迈哈茂德·格兹威尼^④”

صَدْرُ الدِّينِ مُحَمَّدُ القزوينِيُّ

A 144

“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他们却不知……”^⑤

يَعْلَمُ مَا بَيْنَ أَيْدِيهِمْ وَمَا خَلْفَهُمْ وَلَا —
يَعْلَمُ ((وَمَا يَعْلَمُ مِنْ عِلْمٍ لَا يَعْلَمُ شَيْئًا.))

①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③ 指安拉。

④ “格兹威尼”意为格兹温(kazvin)人。

⑤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A 145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①‘世间一切，俱将毁灭。’^②”

((كل نفس)) ذائقه الموت كل من -
عليها فا ((ن))

A 146

“安拉的使者”

رسول الله . . .

A 147

“当遭到祸患之时，他们说，我们属于安拉，并将回归于他。”^③

اذا اصابتهم مصيبة قالوا اتنا لله -
اتنا اليه راجعوا ((ن))

A 148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④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 ن و يبقى وجهه -
ربك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A 149

“[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⑤

((من زحزح عن ال)) نار و ادخل -
الجنة فقد فاز و 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
لا سلطان ((ع الغرور))

A 150

“不经他的许可，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他的圣座]包容[天地]”^⑥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ه الا باذنه -
يعلم ما بين ايديهم وما خلفهم -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الا بما -
شاء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وات والارض))

A 151

“一切生物，都将死去，他^⑦却是永生不死的。”

كل حي سبوت وهو حي لا يموت

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
⑥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⑦ 指安拉。

A 152

“金盘和金杯在他们之间递去传来。乐园中有令人想望的享受。”^①

((بِطْ)) اف عَلَيْهِمْ بِصَحَافٍ مِّنْ ذَهَبٍ -
وَكَوَافِرٍ فِيهَا مَا تَشْتَهِيْهُ (تشتهيـ) -
الا نفـس و ((تَلْذِيـ الا عَيْنَ))

A 153

“这是异乡人哈米德丁·凯拉玛尼^②之女法蒂美之墓。卒于回历××年6月20日。”

× × × عنون هذا قبر للغريب فاطمة -
بنت حميد الدين الكرمانـي فـيـ -
العشرين من جـمادـى الـآخـر

A 154

“[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③“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④

((الـ)) نـيـا الا سـنـاعـ الغـرـورـ كـلـ مـنـ -
عـلـيـهـاـ فـانـ وـيـقـىـ

A 155

“万物都将死去，他却是永生不死的。”

كـلـ شـيـ سـيـوـتـ وـهـوـ حـيـ لـاـ يـمـوتـ

A 156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他们说，我们属于安拉，并将回归于他。’^⑤求安拉怜悯他……”

بـسـمـ اللـهـ الرـحـمـنـ الرـحـمـيـ ((بـمـ))
((قـاـ)) لـواـ اـتـاـ لـلـهـ اـتـاـ اـلـ ((بـهـ))
راـجـعـونـ تـفـمـدـهـ
الـلـهـ بـالـرـحـمـةـ وـالـرـضـوانـ

.....
.....

A 163. 1

“复活之日，[你们才全数得到报酬]。谁能免入地狱而进天堂。”

((وـ اـنـسـاـ تـوـفـوـنـ اـجـورـ)) كـمـ يـوـمـ الـقـيـامـةـ -
فـنـ زـحـزـحـ عـنـ النـارـ
وـادـ خـلـ الـجـنـةـ

① 《古兰经》第四十三章第七十一节节录。

② 丁·凯拉玛尼的释读存疑。

③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二章第一百五十六节节录。

A 163. 2

“才算获得成功。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①

A 164. 1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我用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②
‘敬畏真主者安居在天堂，那里有花园，有甘泉，他们身穿绫罗花缎相见。’^③”

A 164. 2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④‘敬畏真主的人们，他们生活在乐园里，那里绿树成荫，流水潺潺，果实可口。凭着你们过去所做，你们尽情地吃吧！喝吧！”^⑤”

A 170

“穆罕默德是你的奴仆，是你的使者。真主啊……”

A 172

“他是永生不死的。已从毁灭世界转入永恒世界。死者是贾尔杰尔姆^⑥哈只×××的后代古图布丁·雅各布·凯里姆拉。求安拉怜悯他。卒于(回历)709年12月。”

فَقَدْ فَازَ وَمَا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إِلَّا مُتَاعٌ —
الْغَرْرُور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وَنُبْلِوْكُمْ بِالشَّرِّ —
وَالْخَيْرُ فَتْنَةٌ وَالْهَنَاءُ تَرْجِعُونَ
إِنَّ الْمُتَقِّنِينَ فِي مَقَامٍ مِّنْ فِي جَنَّاتٍ وَعَيْنَوْنَ —
يُلْبِسُونَ مِنْ سَنْدَسٍ وَاسْتَبْرِقُ مُتَقَّا بَلِيسِنَ

كُلُّ مَنْ عَلِمَهَا فَانَّ وَبِقِيَ وَجْهُ رَبِّكَ —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أَكْرَامِ —
إِنَّ الْمُتَقِّنِينَ فِي ظَلَالٍ وَعَيْنَوْنَ —
وَفَوَّاكِهِ سَا يَشْتَهِيُونَ كُلُّوا وَاشْرِبُوا
هَنِيَّنَا بِمَا كُنْتُمْ تَعْمَلُونَ

... وَإِنْ مُحَمَّداً أَعْبُدُكَ وَرَسُولَكَ —
اللَّهُمَّ نَزَّلْتَ بِكَ وَإِنْتَ خَيْرٌ

هُوَ الْحَيُ الَّذِي لَا يَمُوتُ
إِنْ تَنْقُلْ مِنْ دَارِ الْفَنَاءِ إِلَى دَارِ الْبَقَاءِ
قَطْبُ الدِّينِ بِعِقْدَبَ مِنَ الْكَرِيمِ اللَّهِ —
بْنُ حَاجِي جَارِ جَرِي
يُعْرَفُ × × غَفَرَ اللَّهُ لَهُ تَوْفِيَ فِي —
ذُو الْحِجَّةِ سَنَةٌ تَسْعَ وَسَبْعَمَائَةٍ

① 与 A163.1 合为《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四十四章第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七十七章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节全文。

⑥ 贾尔杰尔姆为地名。

A 183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①

A 184. 1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除安拉本身之外，一切都将毁灭。他有绝对的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②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天地万物，归他所有；不经他的许可，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③”

A 184. 2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④‘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他的圣座，包容天地；天地之维持，他轻而易举；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⑤”

A 185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
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
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
天地万物，归他所有；
不经他的许可，
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
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
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

كل نفس ذاتة الموت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كل شيءٍ هالك الا ووجهه له الحكم -
والله ترجعون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تأخذوه -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ي السموات وما في -
الا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 ما لا -
بإذ ((نه))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هق وجه ربك -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اكرام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الا بما -
شا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وات والارض -
ولا يئود محفظتها وهو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
تأخذو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سي -
السموات وما في الارض من ذا -
الذى يشفع عنده الا باذنه يعلم -
ما بين ايديهما خلفهم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الا بما شاء وسع -
كرسيه السموات ((والارض))

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⑤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
他的圣座，包容天地。”^①

A 186

“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②

A 188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你无比威严、仁厚之主是永存的。”^③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我用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④

“一切生物，都将死去。”

“他^⑤是永生不死的”

((يَهْقِي)) وَجْهُ رَبِّكَ ذُو الْأَجْلَالِ وَالْأَكْرَامِ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وَيَهْقِي وَجْهَ ((رَبِّكَ -
ذُو)) الْجَلَالِ وَالْأَكْرَامِ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وَنُبْلُوكُمْ بِالشَّرِّ -
وَالْخَيْرُ فِتْنَةٌ وَالْبَيْنَا تَرْجِعُونَ

كُلُّ حَيٍ سَيِّمُوت

وَهُوَ حَيٌ ((لَا يَمُوتُ))

A 189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天地万物，归他所有；不经他的许可，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⑥

“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他的圣座，包容天地；天地的维持，他轻而易举；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⑦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تَأْخُذُ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ي -
السَّمَاوَاتِ وَمَا فِي الْأَرْضِ مِنْ ذَا -
الَّذِي يَشْفَعُ عَنْهُ إِلَّا بِأَذْنِهِ

- يَعْلَمُ مَا بَيْنِ أَيْدِيهِمْ وَمَا خَلْفَهُمْ -
وَلَا يَعْلَمُ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إِلَّا بِمَا -
شَاءَ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اوَاتِ وَالْأَرْضِ -
وَلَا يَئُودُ حَفَظَهُمَا وَهُوَ الْعَلِيُّ -
الْعَظِيمُ

①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七节全文。

③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二十七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⑤ 指安拉。

⑥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上半节。

⑦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下半节。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然后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①

“今日权柄属于谁？属于独一无二、战无不胜的安拉。”^②

A 191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天地万物，归他所有；

不经他的许可，[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

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他的圣座包容天地；天地的维持，他轻而易举；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③

“除了安拉，别无他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A 192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天地万物，归他所有；不经他的许可，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他的圣座，包容天地；天地的维持，他轻而易举；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④

كل نفس ذا وقة الموت ثم الينا ترجعون

لمن الطك اليوم لله الواحد القهار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تأنذ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ي -
السموات وما في الأ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ه لا

بأنه يعلم ما بين أيديهم وما -
خلفهم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علمه -
إلا بما شاء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وات -
والارض ولا يئود حفظهما وهو -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لا إله إلا الله محمد رسول الله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
تأنذ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ي -
السموات وما في الأ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 إله إلا بأنه يعلم ما بين أيديهم -
و ما خلفهم ولا يحيطون بشيء من -
علمه إلا بما شاء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وات -
والارض ولا يئود حفظهما

وهو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① 《古兰经》第二十九章第五十七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四十章第十六节节录。

③ 前三段合在一起构成《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全文。

A 193

“世间一切，俱将毁灭。”^①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②

“除安拉之外，不要崇拜其他。除他之外，别无他神。除了他本身之外，一切俱将毁灭。他有绝对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③

“他是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不论今世或来世，赞颂属于他。他有绝对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④

كل من عليها فان

كل نفس ذاته الموت

ولا تدع مع الله آتها آخر لا آلة إلا
هو كل شيء هالك إلا وجهه لـ الحكم
والله تترجمون

وهو الله لا آلة إلا هو له الحمد في
الاولى والآخر وله الحكم واليه تترجمون

A 195

“奉至仁至慈安拉之名。

‘他们说：

我们的主啊！

我们确已信道了。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使我们免受火狱的苦痛。”^⑤

‘他们是有耐心的人、

诚实的人、

虔敬的人、

好施的人、

在黎明时乞求宽恕的人。”^⑥

‘安拉作证：

只有他才是神。

天使们、学者们也同样作证。

他们还作证：

安拉是公正的、至强的、至睿的。”^⑦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ذين يقولون ربنا إلينا آتنا ((ف)) -

أغفر لنا ذنبينا وقنا عذاب النار -

الصابرين والصادقين والقانتين -

والمنافقين

والمستغفرين بلا سعار شهد الله -

إنه لا آلة إلا هو والملائكة وأولوا -

العلم قائمًا بالقسط لا آلة إلا هو -

العزيز الحكيم

① 《古兰经》第五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全文。

②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全文。

④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七十节全文。

⑤⑥⑦ 分别为《古兰经》第三章第十六、十七、十八节全文。

A 196

“敬畏真主的人们，
被成群结队地领向天堂，
直至他们到达那里。
天堂的门被打开，
看守者对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
你们已变得纯洁无染，
请进天堂并永居其中吧！”^①
‘他们说：
赞颂属于安拉！
他已为我们践诺，
赐予我们安居之地。
在这天堂，
我们如愿地居住。
对已尽义务者来讲，
这是多么好的报酬！”^②
‘你看那众天使，
他们围着宝座，
赞颂他们的主。
他们，
被公正地作出了判决。
(信徒们)说，
赞颂属于安拉——万物之主！”^③

A 197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
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
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
天地万物，归他所有；
不经他的许可，
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
他知道他们面前、背后的一切，

و سيق الذين اتقوا ربهم واللس -
الجنة زمرا حتس اذا جا وها -
و فتحت ابوابها وقال لهم خزنتها -
سلام عليك طبتم فادخلوها خالدين -
وقالوا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صدقنا -
وعده و اورثنا الارض نتبأ مسن -
الجنة حيث نشا فنعم جر العاملين -
وترى الملائكة حاففين من حول العرش -
يسبحون بحمد ربهم وقضى بهم -
بالحق و قيل الحمد للعربي العالمين

.....

الله لا آله ا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تأخذ من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في السموات وما في الارض

عندما لا ياذنه يعلم ما بين ابدا وهم -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①②③ 分别为《古兰经》第三十九章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节全文。

他们却不知道他之所知，
除非他愿意让他们获知；
他的圣座，包容天地；
他至高无上、伟大无比。”^①

وَمَا خَلْفَهُمْ وَلَا يُعِظُّونَ بِشَيْءٍ مِّنْ —
عَلَهُ إِلَّا بِمَا شَاءَ وَسَعَ كَرْسِيهِ السَّمَاوَاتِ —
وَالْأَرْضَ ((وَلَا يَئُودُهُ حَفْظُهَا))

وَهُوَ الْعَلِيُّ الْعَظِيمُ

A 199

“人人将尝死的滋味。”^②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A 200. 1、A 200. 2

“这是迈哈茂德·本·亥姆宰·夏菲之墓。(回历)700年7月。”

هَذَا قَبْرُ مُحَمَّدِ بْنِ الْهَمَزِ الشَّافِعِيِّ —
فِي تَوْزُّعِ سَنَةِ سَبْعَمِائَةٍ

A 201

“安拉，除他之外，别无他神；他永生不灭，操劳不息；他从不困倦，无需睡眠；天地万物，归他所有；[不经他的许可]，无人能[在他面前]说情。”^③

اللَّهُ لَا إِلَهَ إِلَّا هُوَ الْحَيُ الْقَيُومُ لَا —
تَأْخُذُهُ سَنَةٌ وَلَا نُوْمٌ لَهُ مَا فِي —
السَّمَاوَاتِ وَمَا فِي الْأَرْضِ
مِنْ ذَا الَّذِي يَشْفَعُ ((عِنْدَهُ إِلَّا بِإِذْنِهِ))

A 202

“一切生物，都将死亡。‘人人将尝死的滋味。我用祸福考验你们。你们将被遣归我处。’^④”

كُلُّ حَيٍ سَيِّمَتْ
كُلُّ نَفْسٍ ذَائِقَةُ الْمَوْتِ وَنَبْلُوكُمْ بِالشَّرِّ —
وَالْخَيْرُ فِتْنَةٌ وَالْهَنَاءُ تَرْجَمُونَ

A 253

“我信仰安拉，信仰他固有的名称和属性。我接受他的全部教律。”

أَمْتَ بِاللَّهِ كَمَا هُوَ بِاسْمَاهُ وَصَفَاتِهِ وَقَبْلَتِ —
جَمِيعُ أَحْكَامِهِ

①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二章第二百五十五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二十一章第三十五节全文。

A 281

“这是异乡人殉教者之墓。死者穆罕默德·夏赫·本·夏赫·花刺子米^①。他已得到真主的怜悯。愿安拉宽恕他和男女信徒。卒于(回历)707年斋月星期四。”

هذا قبرة (قبر) الشهيد الغريب
محمد شاه بن شاه خوارزمي
الى رحمة ربها غفر الله
له المؤمنين المؤمنات توفي
يوم الخميس رمضان
سنة سبعين وسبعين

A 282

“除了他本身之外，一切都将毁灭。他有绝对判决权。你们将被遣归于他。”^②……于(回历)760年3月20日。”

كل شي هالك
لا وجهه له الحكم
واليه ترجعون
.....
... في يوم العشرين من
شهر ربیع الاول سنة ستين وسبعين

A 285. 1

“……于(回历)702年……”

.....xxx
.....xxx
... في سنة اثنا وسبعين

A 285. 2

“仁厚……只有安拉……穆罕默德确是……”

الاكرام x
الله وحد x
ان محمد ع x

A 297

“[他们在真主那里的报偿就是]永居临河[伊甸园]，安拉喜爱他们，[他们也喜爱安拉。这里敬畏真主者的所得。]”^③

((تجرى من تحت))تها الانهار خالدين -
فيها ابدا رضى الله عنهم ((م ورضوا -
عنهم ذلك لمن خشن ربها))

① “花刺子米”意为花刺子模国人。

② 《古兰经》第二十八章第八十八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九十八章第七节节录。

A 298. 1、A 298. 2

“‘但敬畏者却并非如此。’^①‘(安拉说):奴仆们啊! [今日你们]无需恐惧，’^②”

“[这是]凭你们过去所做而得居的[乐园]。”^③

الا المتقون يا عباد لا خوف على ((يكم -
اللهم ولا انت تحزنون))

((و تلك الجنة التي او)) رشتوها بما -
كنت تعملون

A 313

“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假的享受。”^④

((وما)) الخيرة (الحياة) الدنيا الامتع -
الفرود

① 《古兰经》第四十三章第六十七节节录。
 ② 《古兰经》第四十三章第六十八节节录。
 ③ 《古兰经》第四十三章第七十二节节录。
 ④ 《古兰经》第三章第一百八十五节节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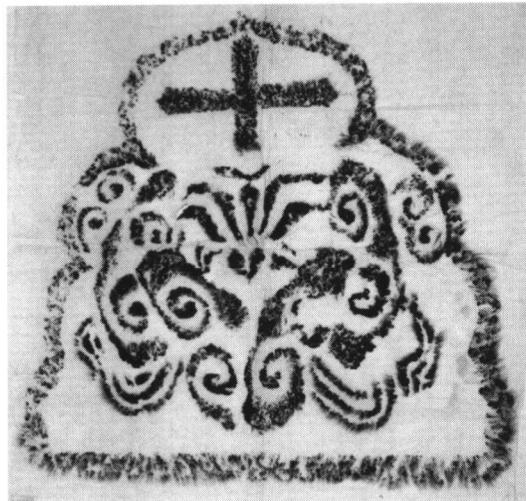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泉州古基督教

一、泉州古基督教石刻

B 1 古基督教墓碑



B 1



B 1 拓片

碑高 50.5 厘米、底宽 52.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石作尖拱形。石面浮雕一朵莲花，花上竖立一个十字架。莲花的下面与四周有密云围绕，云的两旁涌出两股云气。1939 年，在泉州东门城楼外月城挖掘城基时所获。

B 2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 52 厘米、底宽 5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石作尖拱形。石面上刻一个十字架，竖立在一团密云之上，从云两旁涌出二道云气。这碑是 1944 年，在泉州东门外离色厝美约 100 米的一个园圃矮墙上发现的。它是 1940 年，泉州东门城垣拆卸时搬运到这里的。碑面的十字架及密云等浮雕，大部分被一层石灰遮盖住，可以看出它是曾被砌在建筑物上面的。

此碑和阳玛诺(Emmanuel Diaz)著《唐景教碑颂正诠》中最后两页的木刻版《泉州古圣架碑式》第一图(甲)很类似^①。

^① 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诠》，崇祯甲申岁(公元 1644 年)武林天主堂梓(杭州刊行)，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公元 1878 年)重镌，上海慈母堂藏板。



B 2



B 2 拓片

B 3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 51 厘米、底宽 56.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石作尖拱形。尖拱下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竖立在一朵莲花上，莲花下两旁另有两朵莲花分向左右。花的四周不刻密云，而刻连续分出的植物枝叶交曲图案。1946 年，在泉州东门城外围城楼基内距地面约 2 米深处掘获。与此碑同出土的还有一根圆形大石柱和一个砌有石雀替的碑石。石柱用白花岗石琢成，高约 4 米。柱旁捡到宋龙泉窑瓷片很多。砌有雀替的碑，是辉绿岩石琢成的，雕工精致。我们推想，这石柱、石雀替和这方十字

架碑石之间必有关系，似乎是由同一个建筑物上拆下来而埋入城墙底下的。这一方石刻与《唐景教碑颂正诠》内“泉州古圣架碑式”木刻版图样(乙)相同。1959 年，移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和保存。



B 3

B 4 跛坐羽翼天使墓碑

碑高 53 厘米、底宽 5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石作尖拱形。在石面的尖拱下，浮刻一个十字架，其下雕刻一位四翅羽翼的飞天，趺坐在密布的云朵上面。飞天头上戴冠，缯带飞扬，有如官帽的帽翅；双手在腹际捧持圣物，圣物由一朵小莲花和莲花上的十字架组成。此外，这位四翅羽翼飞天的肩上还有飘带飞起，两旁亦有飘带两端在云朵上飞扬。

此碑石是前厦门大学教授张星烺、陈万里于 1926 年到泉州考古时，在西班牙神父任道远 (Sarspin Moya) 的指引下，在通淮门街(俗称涂山街)奏魁宫小庙内墙壁上发现的。据说这石

碑是清末建庙时由地下掘获,因上面刻有“佛像”,认为是祥瑞之物,而把它砌在庙内墙壁上。当地人称它做“蕃丞相”。

泉州古时雕刻佛像很盛,到处可见,故有“泉南佛国”之称。至今在建筑房屋时,常掘出有石雕的神像,老百姓均称“佛像”,多把它砌在墙壁上。现今,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被砌在墙壁上的“佛像”。本碑石,则应该是元代基督教徒所遗留的墓碑石。



B 4



B 5

B 5 跌坐羽翼天使墓碑

碑石作尖拱形,高50厘米,底宽53.3厘米。尖拱下镂空(此类墓碑都在尖拱下浮刻一个大十字架)。碑面浮雕一位跌坐男性天使,面部丰满,头戴“惹草”^①形图案装饰的冠帽,两耳垂肩。天使披云肩,身着宽袖袍,开襟,两袖随风飘起,两臂与手不裸露,两手于腹前,捧一朵盛开的莲花,花上承托一个十字架。胸前有饰物,肩后有两对展开的羽翼,羽翼后有飘带。天使趺坐于从两旁和下面涌的云端。如果除去两对羽翼和十字架,其状颇如元代石雕的菩萨坐像。

墓碑系辉绿岩石雕成,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顶之墓碑。1975年,泉州东门外仁风街下祠居民在水渠边(护城河)建屋掘获,随即为仁风街25号居民曾国泰收藏,置于家里庭院北墙下。1988年1月,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杨钦章先生运回馆藏。

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古时有两座大祠堂,专供寄存灵柩,东部一座叫顶祠(即李公祠),西部一座叫下祠。这方古基督教墓碑即在下祠旧址出土。仁风街区古为阿拉伯人墓葬区,因毗邻色厝美的古基督教墓葬区,故两种宗教石刻在这个地区都有发现。

^① 李诫《营造法式》卷三十二,小木制作图样。1929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B 6

B 6 古基督教墓碑

这是一方古基督教尖拱形墓碑。碑高 52.5 厘米、底宽 5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正中浮刻一朵盛开的莲花，花瓣上有几颗露水珠，十分形象逼真，莲花上承托一个大十字架。莲花和十字架的两旁和下面，有密云上涌承托。整个尖拱形碑面的十字架、莲花和密云，和碑底以及碑两侧的连续弧曲的边框，结构谨严，构图新颖，是古基督教艺术石雕的一件精品。

1987 年 11 月 3 日，在泉州城东郊东岳庙地方筑屋出土，遂运回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

B 7 羽翼双飞使墓碑



B 7

这是一方十分奇特的尖拱形古基督教墓碑。高 51 厘米，底宽 56 厘米，厚 7.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面正中两侧，各浮雕一位四翅羽翼飘带飞天，两侧的飞天均以双手共同捧持“圣物”，“圣物”状似刻有仰覆莲瓣的莲台，莲台底下有柄。莲台上有彩云，彩云承托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上竖立着一个大十字架。“圣物”两侧各有自上而下的密云涌出。飞天手臂裸

露,面部朝向正面,头戴冠,头顶各浮刻一个小十字架。飞天的下方也浮雕自上而下的密云涌出。从整个碑面看,捧持“圣物”的飞天,似乎飘浮在空际云端。这种形式的古基督教尖拱形墓碑,为泉州历年来所仅见。该碑原砌于泉州城东北郊后茂村魏姓村民屋后墙上,因参观者益多,后卸下保存。后茂村,原地名后墓,后来改后茂,是宋元时期基督教徒的墓葬区。该石刻于2004年12月9日移泉州市博物馆保存。

B 8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53.5厘米、底宽51厘米,背面粗糙,厚约9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作尖拱形,上尖下宽。碑面尖拱下浮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有密云扶托,密云下涌出两股云气。此碑可能是元代基督教圣方济各派教徒的须弥座祭坛式墓碑石。1957年3月,在泉州南较场附近三教铺林姓宅中掘获。是年,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B 8

B 9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52.5厘米、底宽54厘米、厚9.5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作尖拱形,上尖下宽。碑的尖拱下正中,浮雕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之下有由大朵的白云组成的“密云”,“密云”向上涌起。每朵云上部突起,两边向内回卷,其状如急腾上升,十分形象。此碑应是古基督教圣方济各派教徒的墓碑,属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墓顶石碑。1958年,于泉州东门圣山(色厝尾)附近农民宅中发现,是十多年前由东门城基掘获的。



B 9

B 10 《唐景教碑颂正诠》中的泉州古十字架石碑

在泰西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oz S. J.)所著的《唐景教碑颂正诠》一书中，附有三幅木刻版图。此三幅图是三方古十字架碑刻，其记载如下：

闽泉州府城仁风门外三里许东湖畔，旧有东禅寺。郡志云：唐乾符中，郡人構庵居僧齐固。广明元年更名东禅，后废。近寺百武许，有古十字石，在田畔，未有识者。于崇祯十一年二月，吾主复活之四日，教友因拜墓见之，三月望前，同教者恭奉入圣堂云。



B 10



B 11

B 11 《唐景教碑颂正诠》中的泉州古十字架石碑

《唐景教碑颂正诠》书中记载如下：

闽泉州城水陆寺中，有古十字架石，为大司寇苏石水先生之太翁所得。崇祯十一年二月中，教友见之，于吾主受难之前日，奉入圣堂。按郡志，水陆寺，唐玄宗六年建，今废。

B 12 《唐景教碑颂正诠》中的泉州古十字架石碑

在图的左右附字二行。其右：“泉郡南邑西山古石圣架碑式”。其左：“万历己未出地崇祯戊寅摹勒”。

《唐景教碑颂正诠》书中对其记载如下：

圣架兹古石，置温陵东畔郊，年代罔知，往来无睹。崇祯戊寅春，因余兴怀，帝心鉴格，昭示郡朋获之，爰请铎德竖桃源堂中。张赓记。

此书末附有按语一段：

水陆东禅二寺，皆起于唐。十字碑石，亦悉于该寺内外得之。是十字架即不能遽指为唐以前所有，亦当与景教碑先后有也。

以上所记的三方古十字架碑石，都发现在同一个年代。其中 B 10、11 与 B 2、3 的形式相同，但绝非同一石刻。因泉州近七十年来所发现的古十字架石刻很多，其中有许多在雕刻的方法、内容及形状大小皆相同。B 2、3 的碑石都是从城墙础石底下挖出的。查泉州城垣由砖换石的年代在明初^①，而 B 10、11 的石刻乃为明末出土的。清代虽曾数次修城，但只是修缮城垣倾塌部分，未对基础重新翻建，故十字架石刻不可能是在清代填入而后来又重被掘获的。

《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正诠》又载：

迨大明万历崇祯间，于闽之泉州，掘土得石，上勒十字架之形。又于近地得石亦然。今并竖温陵堂内。自唐距明，既阅今古，繇闽去陕，又极西东，乃碑刻多证，流行惟旧，于兹益信。^②



B 12

^① 见《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② 见阳玛诺《唐景教碑颂正诠》，光绪四年岁次戊寅重镌，上海慈母堂藏版。

可见中世纪泉州基督教是甚兴盛的。

B 13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2000 年,在泉州城内古民居的踏勘调查过程中,发现中山中路 235 号明代顾珀故宅后院

还竖立一方嘉靖二十三年(公元 1544 年)顾珀撰刻的石灰岩石碑,称《修顾氏祠堂记》,碑高 129 厘米、宽 90 厘米。碑座高 29 厘米、宽 118 厘米。石碑内容是记载重修祖祠的过程。碑记中还有一段“得一石记”,记录重修祖祠时从地下出土一方奇石,可惜对奇石没有任何描述。现在庭院里的古老龙眼树下,有六七个石柱础,其中一个即本图所示。正中浮刻一个十字架,下有盛开莲花,莲花下有浮刻云朵承托。十字架上有“华盖”,盖沿垂下四条璎珞。柱础石系白花岗石雕成,高 54.5 厘米,圆径 49 厘米。

据房主云,此雕刻十字架圆形柱础石,系 1994 年建三层小洋房时从地下出土,同时出土的还有现存庭院里的几个同类型石柱础。此外,在庭院的西侧,还发现一座三层须弥座式石墓,辉绿岩石雕成,底层刻如意状六足,第二层刻覆莲瓣,第三层刻连续传枝图案。据房主云,这座石墓早就在这里。这座庭院与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所记述的“南大街某医局屋内墙基上也砌有一块残断的墓顶石……在石的前端圆拱下,浮雕一个十字架竖立在一朵莲花上”的记载,似乎有某种联系。因为此庭院与“某医局”仅一墙之隔,此砌十字架石刻的墙还在。

一墙的两面就发现两方十字架石刻和一座须弥座式石墓,还有明嘉靖间著名文人顾珀撰写的“得一石记”。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现今的中山中路 235 号有可能是宋、元时代的一座景教寺院。

至于这方圆形柱础十字架石刻,是古基督教何种建筑的构件问题。有的学者认为古基督教视十字架为神圣,不可能作为柱础使用,而应该是景教徒“舍利塔”的构件。但从此柱础石的高度和直径的比例看,又不像是塔式建筑的构件,而且,此十字架柱础石的后面十分粗糙,分明是这一面靠墙壁,这是证明其为柱础石的有力证据。况且,同时出土的同类柱础石还有多个。所以,我们倾向于认为此十字架石刻,是古基督教寺院的建筑构件,而此出土地点有可能是宋、元时期的一座古基督教(景教)寺院。

B 14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公元 2002 年夏,泉州文庙前进行环境整治,拆迁菜市场和民居,于文庙前右(西侧)的民居庭院里,发现了这一件圆柱形十字架石刻。石刻系白花岗岩石琢成。高 55 厘米,底径 54 厘米,顶径 50 厘米。石刻呈圆柱形,顶部亦呈圆形,圆柱正面浮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交叉处有一颗圆珠,十字架上方有“华盖”。“华盖”有两层,两旁各有两条璎珞垂下,盖顶有圆形饰物;在十字架下有一朵盛开的莲花,承托着十字架和“华盖”。

从石刻圆柱形状,特别是圆顶的特征看,此石刻可能是古基督教塔式建筑物的顶层构件,但也不排除是塔式墓葬的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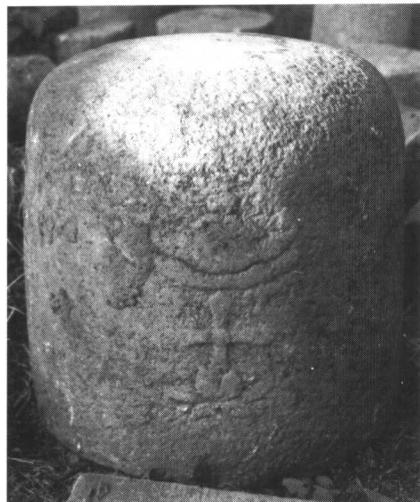
B 15 古天主教安德鲁·佩鲁亚斯主教拉丁文墓碑

碑高 54 厘米、宽 4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1946 年,在泉州通淮门靠近龙宫的城墙基础内掘获。原碑顶作尖拱形,但被打石店石匠琢去,碑面的飞天及十字架亦一起被琢毁,好在抢救及时。碑面尖拱下浮雕两个有飘带的飞天,扶持着一个“圣物”,上面刻一朵莲花,在莲花上竖立一个十字架。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调往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碑面上阴刻拉丁文字九行。第一行前刻一小十字架,文字自左至右横写。我们以前所获的阿拉伯字或叙利亚字碑石,都是自右至左写的,至于这方碑石,文字自左至右横写,是一般拉丁语系文字的写法。文字刻得很小,年久磨泐,很难句读。经多方设法,始得约略看出一些字母。据英国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等不完全的句读是:

十 Hic (in PFS) sepultus est
 Andreas Perusinus (de
 Votus ep. Cayton).....
ordinis (fratrum
 min.)
(Jesus Christi) Apostolus

(in mense).....
 M (cccxx) xii 十^①



B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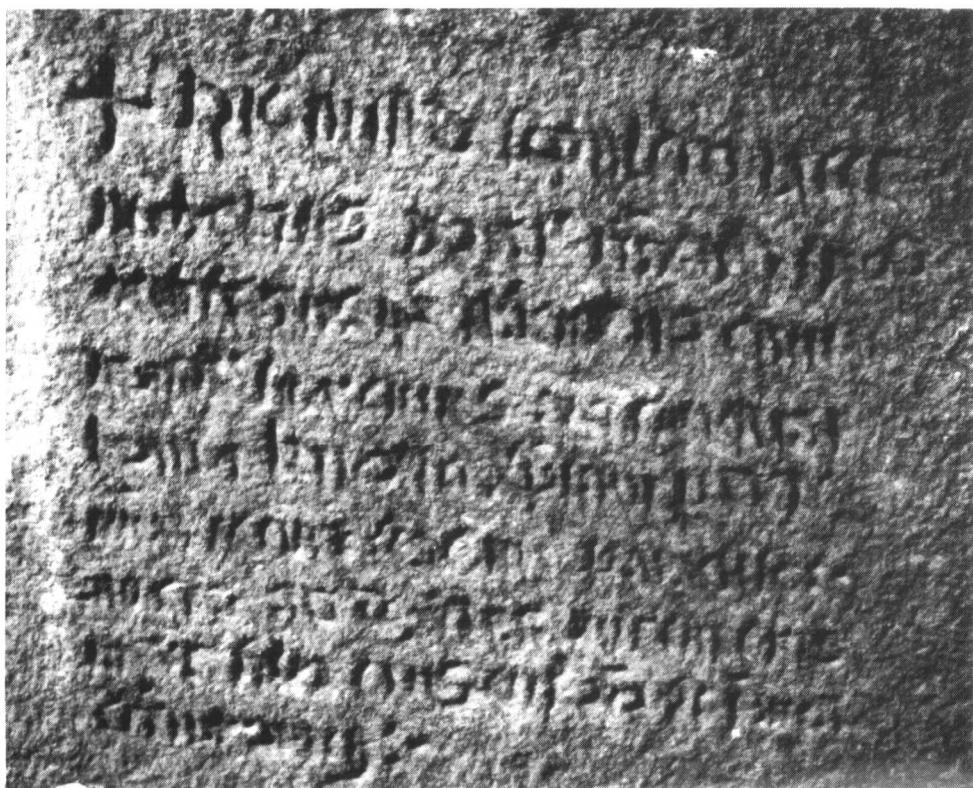
^① 约翰·福斯特《刺桐(泉州)城墙的十字架石》(英文),《皇家亚洲学会会志》,1954 年,第 1、2 期,第 11 页。



B 15.1



B 15.1 拓片



B 15.2 墓碑碑文

把拉丁文字翻译做汉字，它的不完全句读是：

十主的……………圣谕

安德利亚斯·贝鲁斯鲁斯

刺桐城，教会的神职……

……授予圣爵……

…………

……(耶稣基督的)主教

…………

……(为纪念)……

千(百百百十)**十二****十**

据以上文字，知此碑可能是在元代曾任泉州圣方济各会主教安德肋·贝鲁亚的墓碑。按《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载，公元1294年(元至元三十一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Nicholas IV)曾派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John Monlecorgino)到中国的北京做传教工作。内容节引于下：

委任乔伐尼蒙高味诺做刚巴里克(北平)总主教，兼东方全境宗主教；又由三位枢机，祝圣了七位方济各会修士，做主教，好教他们到中国去祝圣乔伐尼，和做他的助理。这七位方济各会的主教，是安德肋·贝鲁日亚(Andrea da Perngia)、日辣多·阿布意尼(Gerado Albuini)、贝来格理诺·加斯歹劳(Peregrino da Castello)、尼各拉·庞谢(Nicola da Banzia)、安德肋西·亚细西(Andreucci I'Assisi)、伍立克·冯赛弗里笃(Ulric von Seyfridsdorf)和奇耀谋·味拉诺伐(Guglielms da Villanova)。最后一位，是否到中国，我们不能知道，但无论如何，他是在1327年，死在得利斯带(Trieste)主教任上的。其他的六位，于1307年(大德十一年)秋间，启程前往。其中有三位，就是上述七人中最后提及的三位，都在印度死了。余下的三位，于1313年(皇庆二年)到了中国，祝圣乔伐尼做上都总主教。

这位新任总主教，于1313年，在刺桐(福建泉州)添设了一个主教区。派日辣多做第一任主教。那里的大圣堂，是一个有钱的亚美尼亚太太出资建造的。……1318年，刺桐第一位任主教日辣多·阿布意尼逝世，贝来格理诺·加斯歹劳便奉派做了他的继任人。可是他又在1322年间去世了。他的后任是安德肋·贝鲁亚。这位主教到任后，又造了一座圣堂，一座规模较大的修院。这些新建筑刚完工，安德肋主教，也在1326年(泰定二年)上病故了。而且他去世后，竟没有人继续他的职位。^①

又据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有关于刺桐主教安德鲁(即安德肋)的一段记载：

安德鲁或与北京总主教约翰·孟德高维奴不甚相得，故以后往中国南方之泉州也。安德鲁似不能专心传教，不惯中国生活，年迈思归故乡，故于公元1336年(至元二年)复

^① 德礼贤著《中国天主教传教史》，万有文库本，第38~40页，193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随蒙古大使由陆路西归故里也。^①

根据《中国天主教传教史》记载,说明安德鲁是死后埋葬在泉州的。我们所获的这方石碑,如果正是安德鲁主教的墓碑,那么张氏所说安德鲁随元使西返故里的事便有问题了。

这方墓碑石,仍是我国已发现的最早的天主教(圣方济各派)拉丁文字石刻^②。因为石刻磨泐,纪年已有些模糊,它有可能是公元 1332 年,也有可能是 1327 年。无论怎样,它比 1952 年在扬州发现的同类拉丁文字石刻的年代早十多年。

这方石刻的发现,说明早在公元 14 世纪初,欧洲天主教(圣方济各会派)徒,不远万里,远涉重洋,梯航泉州。它也说明,有元一代,天主教在泉州的盛行。

B 16 古天主教徒海田拉丁文墓碑



B 16



B 16 拓片

碑石已残断。长 56 厘米,高 15 厘米,厚 12.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中阴刻古拉丁文字一行,录于下: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二册《中国古代与欧洲交通》,第 129 页,辅仁大学丛书。

② 见夏鼐:《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一文,载于《考古》1979 年第 5 期。

HA TIAN SUR NAMELT

头两个字,刻的是死者的名字,可知他名叫海田。后面的两个,译文是“姓名”。这是一方古代天主教教徒的墓碑石,即元代在泉州的基督教圣方济各会派(Franciscans Mission)教徒的墓碑石。这又是数十年来,第二次在泉州发现的古拉丁文字石刻。此碑的发现,再一次说明了在中世纪,欧洲人曾经在泉州居住过。根据石刻形状判断,这是一方须弥座式石墓正面的墓石。1964年秋,发现于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农户家,据云是十多年前在山上挖黄土时掘出。

B 17 高昌城人乌斯提克·塔斯汗墓碑



B 17. 1



B 17. 2 照片之二

碑高36厘米、宽30.3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四周未雕花纹,碑顶作圆拱形。圆拱上部稍凹陷,且很粗糙,似乎是建墓时砌于石中,其外面应该还有龛石。碑面上部浮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四端的叶片上各有三个圆珠。这是在全部发现的十字架石刻中最特殊的一方,因为它没有雕刻天使、火焰、云片等。十字架下面阴刻十一行叙利亚文字。1943年,在泉州仁风门(东门)外东教场附近的园圃中获得,是十年前东门城垣拆卸时掘出的。

据英国人施鄂(Dr. Segal)及古德曼(Mr. Goodman)说,这石碑的文字是聂斯脱利叙利亚字(Nestorian-Syriac)。但其中混有中亚细亚或东部亚洲的方言语音,所以他们也不能全部理解,据他们不完全翻译是:

1. B̄SM' B'WBR' WRWH'DQWD̄S'

In 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Ghost.

2. 'LKSNDRWSS' S' MRD HL
Alexander Sasa(?) lord(?) believer
3. KLHG'LT. RM' WN'.. DHLT'
religions
4. T' BTSS' ' . R'WM. L' ..
Tabt (place name?) S[a] sa(?)
5. ' .. G. M. 'LTHHT' BRS'S'
Son of (?) Sasa.
6. P'LHGW TQH.. S. ' T'.
^{F T C L}
7. G. G'K.. YWM'T'K.. N day came(?)
8. 'L TM. H.. T' ' . 'NBT'PW Fu(?)
^{F U}
9. 'NTWN P'HH.. ' . T'P You(masc. pl. ?)
^F
10. TG W^UR.. L H^UN PWT.. paganism(?) Amen.
11. .. W. T.. T.. LT'PYL. M'MYN

古德曼(Mr. Goodman)对碑文中的几个字作较肯定的翻译,摘录于下:

5. ... GTM.. LTHT ' DS. W
beneath
7. ... G. ' . YWMN' YT'QB'N to-day
10. TGY DWNLHNPWT'.. paganism
^{R F I}

综合他们的不完全翻译,翻译成中文的不完全译文是:

1. 奉天父、圣子、圣灵的名
2. 亚力山大,萨沙(?)主(?)奉侍者
3. 宗教
4. Tabt(地名?)萨沙(?)
5. 萨沙的儿子
6.
7. 日子来临(?)
8. 甫(?)
9. 你(男姓. 指多数?)
10. 信奉异教
11. 阿孟。

但根据译文“奉父、子、圣灵的名”一句，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它是景教“三为一体”的教义。因此，可以推知，这方碑碣，无疑是景教徒的墓碑石。

关于这方碑碣，牛汝极先生有较肯定的译文，他说：“十字架下刻有 11 行叙利亚文聂斯托里字体拼写叙利亚语和回鹘语，其中，第 1 行为叙利亚文叙利亚语，其余 10 行为叙利亚文回鹘语。”碑文的汉文译文是：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
亚历山大帝王纪年
1613 年(即公元 1301 年)，
桃花石纪年牛年十
月二十六日。高昌
城人图克迷西·阿塔·艾尔
之子乌斯提克·塔斯汗
在他六十七岁时，
来到刺桐城并
完成了上帝的使命。

他的灵魂将在天国安息。阿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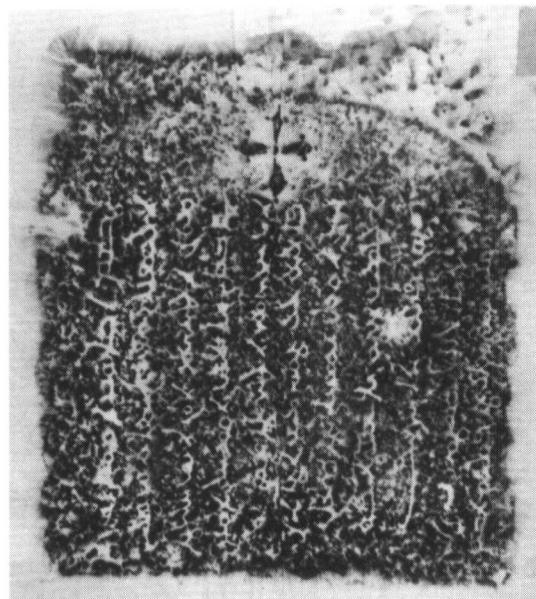
很可惜，牛汝极先生在文章里没有发表叙利亚文回鹘语碑文的析文，如果把析文一并发表，那就更清楚了。

最后，牛汝极先生在把扬州和泉州的叙利亚文和回鹘文景教碑铭解读后，提出“泉州景教经南印度由海路来自波斯的根据不充分”，“这些景教徒大多为古代操突厥语的民族，准确的讲主要是回鹘人的后裔畏吾儿人”。以上看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足之处。的确，泉州的景教自海路传入之说，尚找不到实物证明。可是泉州发现的景教碑的情况很复杂，有的则是完全使用汉字和汉人姓名的，而且完全按汉人的习俗刻写墓碑，即分明是汉人的景教徒。

B 18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塚石长 86 厘米、高 31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作长方形，顶端刻一横额，横额上刻两位飘带天使，头戴僧帽，共同以两手扶持着十字架，十字架下有一朵莲花。横额下有阴刻的二十五行叙利亚文字。塚石的两端浮刻卷云图案。1947 年，在泉州东门城基内掘得。根据我们的推测，它是由一座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的石墓上拆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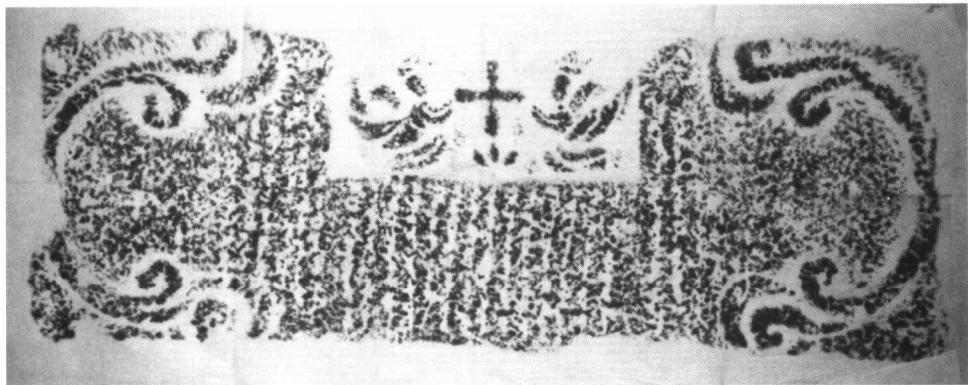
^①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74~75 页。



B 17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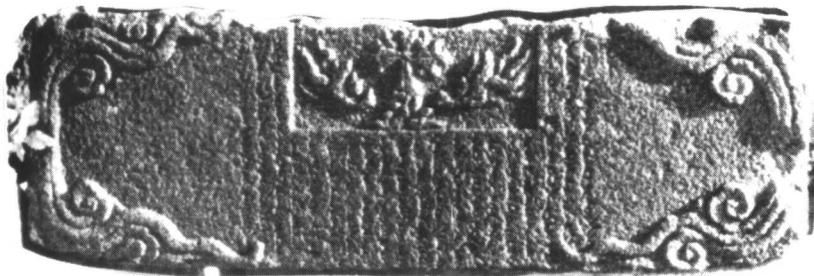


B 18 塚石局部：叙利亚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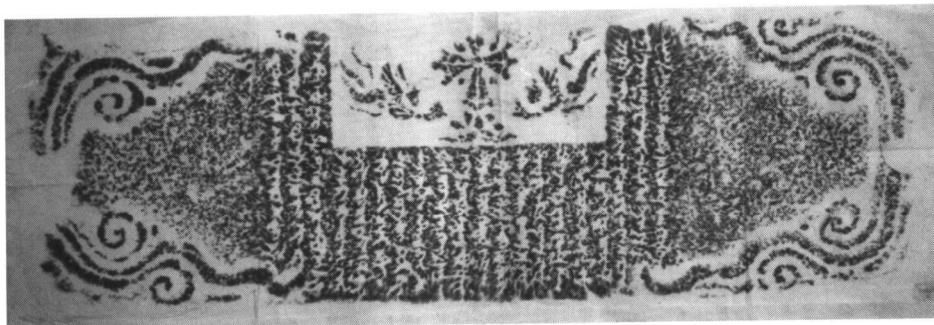


B 18 拓片

B 19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B 19. 1



B 19.1 拓片



B 19.2 塚石局部:叙利亚文字

塚石作长方形,长92厘米,高31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塚石的顶端刻一横额,额内浮雕一个十字架,竖立在一朵仰莲上。十字架的交叉处有一个圆珠,不但十字架的四端有圆珠,而且十字交叉的内角也有圆珠。两旁各有一位带羽毛翅膀的天使,双手捧着礼物,向着十字架奉献。横额的下面有阴刻的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二十一行。碑的两端浮刻卷云。1946年冬,在泉州通淮门(涂门)靠近小东门的城基内掘得。这种石刻是一种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前的三方主要石塚之一。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20 须弥座祭坛式墓塚石

塚石长72厘米、高27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塚石的左右两端附有间柱,间柱的雕刻精细,形状特别,每一间柱各刻四朵莲花,互相对称,状似佛教的仰覆莲台座,有可能是受佛教雕刻艺术的影响。石面四周浮雕有连续卷曲图案。石面中间有阴刻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十五行。1951年,在泉州北门与东门城墙交界处建筑泉州师范学校校舍时掘获。它是属于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古墓上的主要塚石。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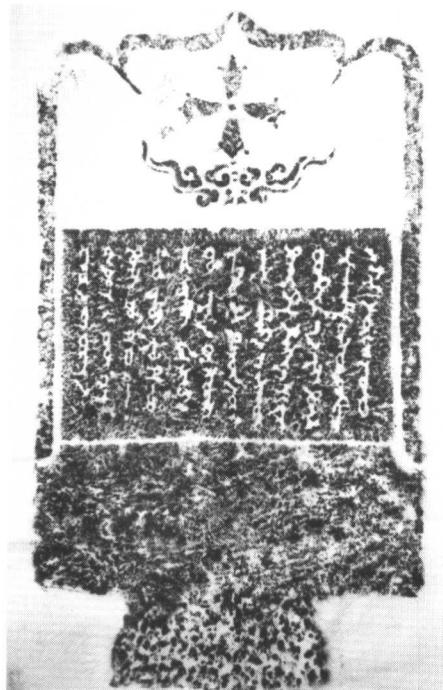
B 20

B 21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 56 厘米、宽 33.5 厘米、厚 6.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雕工精细，是一方尖拱形的墓碑石。碑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各端皆有三个圆珠形凸起，其下有云朵，左右有自上而下二股涌云；云朵以下有阴刻的十二行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碑的背后阴刻五行汉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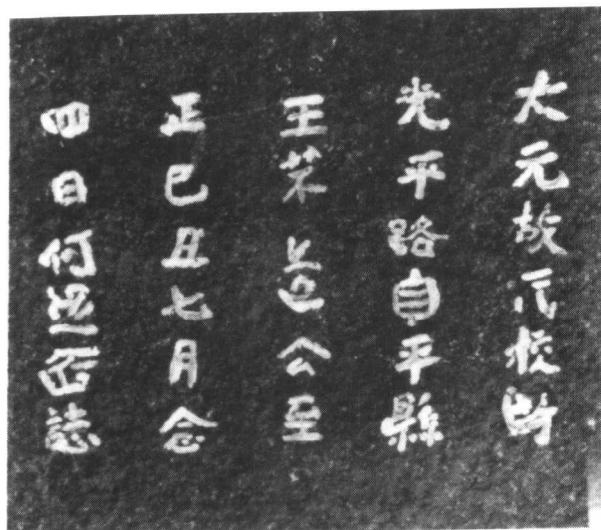
B 21.1 墓碑正面



B 21.1 拓片



B 21.2 墓碑正面局部



B 21.3 墓碑背面局部

大元故氏校尉
光平路阜平县
王莽道公至
正己丑七月念
四日何□□志。

至正己丑，是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 1349 年）。此碑的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其中亦混有东部亚洲的方言语音。据英国人古德曼（Mr. Goodman）的不完全翻译是：

1. BSM'B'WBR'
2. WRWH'DQWD^{SH},
3. . NG BW'ZQW Y
4. DZ'LYHGGWSZKW
5. GM ZPY NGBNG ZS.
6. K YKHNT YB. G..
7. LNDN ST....
8. KL YN T,H G.B ZDL
9. SW'D'SSG'R'N

our land 我们的土地

10. K [?] [?] DYSDT.....
11. Y'YNY' T'BG KD. S[?]. B^{??}.
12. ... S. , KLLWLWB

这方石刻,是1946年在泉州北门城基内掘获的。根据译文“奉父、子、圣灵的名”一句,知道它是景教“三为一体”教义。所以,这方碑石应属景教徒墓碑石。



B 22

B 22 颀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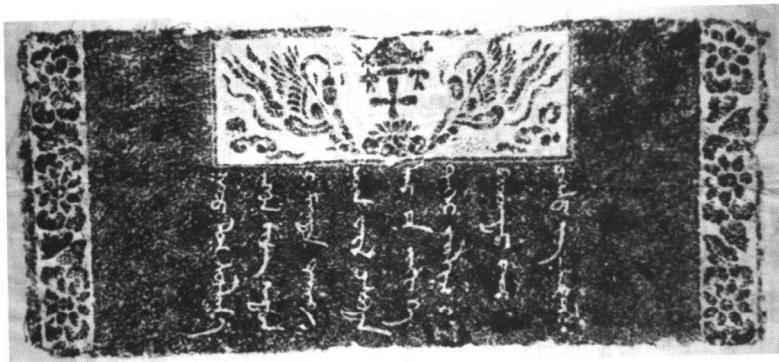
堵石已残。残高24厘米,残宽20厘米,厚6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这是一方比较特殊的古基督教墓石刻。从残存的部分看,墓石的下边和右边都被破坏。其上部应该左右各有一位“飞使”,手捧“圣物”朝向中间的十字架。但现仅存左侧的一位双手捧“圣物”的飞使和残存的一朵盛开的莲花的两片花瓣。飞使无羽翼,亦无明显的飘带,头上未戴帽,作翱翔状。飞使之下阴刻八行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被破坏的部分可能也有与之对称的飞使和叙利亚文字)。这是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堵石之一。1960年,

出土于泉州东门城基。1973年,吴文良先生的遗孀刘婉如捐献给泉州市文物保护委员会,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23 也里可温教徒贵玛尔达公主墓碑



B 23



B 23 拓片

碑长 66 厘米、高 29 厘米、厚 14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正中上部，刻一长方形横额，额内正中浮雕一个“华盖”。“华盖”顶部两旁翘起部分，各浮雕三个珠状装饰物。“华盖”下部两端各有垂下的璎珞。“华盖”下是一个浮雕的十字架，十字交叉处有一颗珠。十字架竖立于一朵盛开的莲花之上，莲花下有四朵梅花承托。这个由“华盖”、十字架、莲花、梅花等物组成的“圣物”，两旁各有一个浮雕的生有四翼天使，用一条丝带拉紧承托着。天使的手臂裸露，肌肉丰满。天使身上飘带迅疾飘扬，羽翼展开，疾飞云端。天使头戴中国古式官帽（乌纱帽）。天使之下，均有浮雕的浮云。

横额下，在碑面的正中阴刻竖行文字八行。1980 年 11 月，据中央民族学院耿世民先生认读，认为是古回鹘文。碑的两端浮雕连续花朵图案。全碑雕工精细，为数十年来泉州地区发现的羽翼飞天石刻中，最为精致、生动的，也是最典型的一方石刻。

此碑应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前面的主要石堵之一。1941 年，于泉州北门城角虎头山因居民筑屋掘地出土，一起出土的还有几方墓石。

初曾怀疑是摩尼教碑碣。因为碑的正中上部横额的当中，浮雕一个“华盖”，“华盖”是佛教饰物。十字架是基督教物。摩尼教本集合佛教、祆教及基督教等而成。1907 年，英人斯坦因在敦煌石窟秘室发现大量唐代的佛教、基督教的经书，其中有“一卷很好的卷子，上面是用突厥字写的摩尼教祈祷圣诗”^①。可见，在唐代，摩尼教、佛教、基督教等三教，在敦煌能够很好地相处。这种和睦相处，还见诸石窟秘室发现的景教经典之《序听迷诗所经》中，如今日基督教徒所称为“神”者，均称为“佛”，又如“人急之时每称佛名”，再如“圣上宫殿于诸佛求得”等，皆是。

在向达著《中外交通小史》载：

景教翻经的景净并曾与佛教徒名般若（般若三藏法师）者共同译过胡本《六波罗蜜多经》，虽然“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所以批评者说所译的《六波罗蜜多经》“虽称传译，未获半珠”。但是景教教士初到中国，和佛教僧人混杂往来的情形却可以窥见一斑。^②

① 向达译《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第十三章，秘室中的发现，第 152 页，1936 年，中华书局印行。

② 向达《中外交通小史》第七章，景教与也里可温教，第 61 页，1930 年初版，商务印书馆发行。

就其雕刻艺术上看。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正面之十字架下，亦有佛教之莲台。

唐、宋、元之景教徒，“接受地方民族之宗教习惯，及受佛、道二教之影响，遂以中国佛教徒所用之‘卍’、‘卐’附加于十字架徽章上，为消灾延寿之护符，乃至使用之”^①。

泉州已发现元代汪古部人西雷蒙景教主教的墓碑石，本墓碑又可能是回鹘文字拼写方言。所以这方碑石，引起我们很大的兴趣。

在整整的七十年中，泉州就出土了五方刻有“华盖”的墓碑石，还出土一方刻有“大德黄公、年玖叁岁”和一方刻有“柯存诚、侍者长”的带有佛教名词的景教墓碑石。它们都是受佛教影响较深的景教碑刻。在雕刻艺术上，特别是本碑表现得更具典型，“华盖”、莲花是佛教物，飞天、十字架是基督教物，梅花和乌纱帽则是中国人所喜欢的。

1927年，原济南邮务长聂克逊(F. A. Nixon)^②在外套(今鄂尔多斯)^③搜集到千枚元代景教徒青铜十字。这些十字架的特点，是十字之交叉处有一颗珠，有的十字架之四个叶片之间各有一颗珠，或每个叶片的末端有三颗珠。值得注意的是，泉州也发现有这种饰珠的十字架墓碑石，而且已被证明为叙利亚字母拼写突厥语和叙利亚文拼写中亚、东亚方言。可见，泉州元代的景教与汪古部、畏吾儿等是互有关系的。

由是观之，历年来泉州出土的古基督教墓碑石，其中有许多也是十字架之交叉处有珠的，这说明是属景教墓碑碣。所以，十字架是否有珠，亦是判定是不是景教碑的条件之一。

1980年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夏鼐所长邀我赴北京，增订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住王府井大街考古研究所。为了翻译此碑文，在夏鼐所长的推荐下，我与考古所黄展岳先生于是年11月，前往中央民族学院拜访耿世民先生，请求他帮助认读碑文。据耿先生说，碑文系回鹘字母，但不知其义。

该碑照片未在家父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刊布。首先是我发表在《考古》杂志1988年第11期^④；其次，杨钦章先生在《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发表；复次，是德国学者H. J. Klimkeit在他的《丝绸之路上的基督教艺术》^⑤一文中发表，还注明“感谢耿世民教授惠赠此照片。此碑具体发现地点我们并不明了”；再次，朱谦之先生的《中国景教》也收录该碑照片。

记得1988年《考古》杂志发布该照片后，有荷兰、德国和法国的学者委托厦门大学的教授向我了解这方墓碑的情况，我均一一作答，满足研究者的要求。

1995年12月，法国突厥学家James Hamilton博士和牛汝极先生联名于《学术集林》发表《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景教)墓碑研究》^⑥一文(这是他们1994年已用法文发布过的)，我们始得了解该景教碑刊布后世界学术界反响的全貌。

据1995年哈密屯和牛汝极两位学者对本碑八行回鹘文的记音、转写、译文如下：

① 佐伯好郎著，胡立初译《中国绥远出土之万字十字架徽章》，载于《齐大季刊》第五期，第192页，1934年。

② 同上书，明义士《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序》。

③ 外套。在今鄂尔多斯北，黄河北岸诸地，唐时为天德军，金、元间为汪古部地。

④ 吴幼雄《福建泉州发现的也里可温(景教)碑》，载《考古》1988年第11期。

⑤ H. J. Klimkeit, Christian Art on the Silk Road, 1992.

⑥ 哈密屯(James Hamilton)、牛汝极合著《泉州出土回鹘文也里可温(景教)墓碑研究》，载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五，1995年12月，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

记音和转写：

1. *xwɔp lωx̥ xwβ l̥x̥ n̥*
qup-luγ xuβ(i)l γ-(a)n
2. *'rk'kwn̥ nyŋk x'dwm̥*
ärkägün-niŋ xa dun
3. *y m'rd' t'rym̥*
-i marda tärim
4. *xwyn yyl čxšpwd'*
qoyñ y ilč(a)xš(a)puda
5. *"y mn̥ 'yky k'*
ay man iki-kä
6. *tnkry y'rlyx̥ y*
täŋ ri yarlı γ-i
7. *pwytwrdy' x̥r*
bütürdi aγ(i)r
8. *čšmd x̥'' x̥'r wl̥*
čšmd-qə a γ ar ol

汉译文：

(1~2) 幸福而圣洁的也里可温教徒的贵妇

(3~4) 玛尔达公主，于羊年(1331年)腊月，

(5~6) 满，二日完成了上帝

(7~8) 的使命。她已升达神圣的天堂。

2003年，牛汝极先生又在《世界宗教研究》杂志上发表文章，内有本墓碑的译文，他说：“下面是我们标音、转写和译释”：

幸福而圣洁的也里可温教贵妇马尔达公主，于羊年(公元1331年)腊月，满，二日，完成了上帝的使命。愿她在神圣的天堂(安息)。^①

B 24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B 24

①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5~76页。

块石长 83 厘米、高 1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左、右两端无间柱，但刻两个榫位。碑面浮刻一丛图案化的牡丹花，花和叶均图案化作卷云状。这种雕刻是很奇特的，雕刻细致、精美。这方石刻，应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上的石块。

B 25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B 25

块石长 83 厘米、高 1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的左、右两端，各刻一个榫。石面浮雕一枝花，花朵分明是莲花，花瓣上还有水珠，可是花叶却不是荷叶。石刻的花叶显然被图案化了。雕工精致。这方石刻亦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

B 26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B 26

块石长 83 厘米、高 1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两端各刻一个榫。石面浮刻一丛牡丹花，当中有一朵盛开的牡丹花，两旁各一个花蕾。这方石刻，也是属于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

B 27 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B 27

堵石长 83 厘米、高 1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的左、右两端各刻一个榫。石面刻一丛茶花，中间一朵茶花，两旁各刻一朵茶花、花蕾对称。这方石刻也属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墓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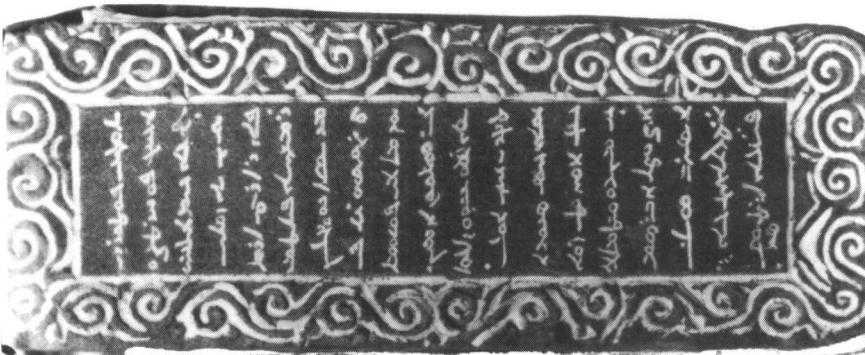
以上四方石堵(B 24、25、26、27)于 1941 年一起从泉州东门、北门交界处城基掘获。这四方石刻的形状，皆仿作“月梁式”，从堵石的形状到雕刻的图案、花枝，皆见之于宋李明仲《营造法式》“木制作月梁式”^①。现存泉州的寺观木作建筑，仍可见到这种类型的雕刻，如泉州南门城的天妃宫。

B 28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堵石长 67.2 厘米、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的四周浮雕连续卷曲花纹，正中阴刻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二十行。可以推断出，这方石刻是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堵之一。1945 年，在泉州北门城基，与 B 54 石刻一起出土。1959 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调运至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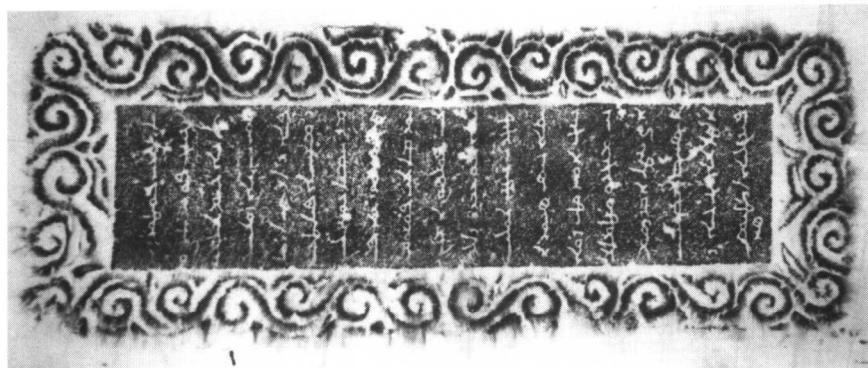


B 28.1



B 28.2 塚石涂粉后的照片

^① 李诫《营造法式》，法式卷三十和卷三十四。192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B 28 拓片

B 29 古基督教墓碑



B 29

碑石宽 45.5 厘米、高 21 厘米、厚 11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碑的正中浮雕一朵莲花，莲花上竖立一个十字架。原碑的边缘都被琢毁。它原是一方古基督教墓的十字架碑刻，经后人改琢为他用，所以十字架的以上及以下部分都被毁去，但十字架及莲花的浮雕依然完好。这碑是在 1937 年拆城时所得，后砌在泉州南街马路阴沟里。1953 年修理路沟时，翻挖石块，才被发现。

B 30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堵石长 47 厘米、高 2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刻的右侧大半已残断，残存的左端浮雕身穿波斯僧服的飘带飞天，飞天双手捧着供物，面向右边。1946 年，在泉州北门城基内掘获。



B 30

B 31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堵石长 75 厘米、高 2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长方形，左右两旁各有一间柱。在两柱的中间浮雕着两个飘带天使，头上各戴一顶似僧帽样子的冠，耳下挂有垂环，僧袍的袖口特别宽大，肩上各有飘带。两位天使合捧着“圣物”。“圣物”自下而上，由巾状物、盘、莲花座和十字架组成，雕工精细。



B 31

1946 年，在泉州靠近通淮门的小东门城基内，距地面约 5 米深处掘获。一同出土的有“嘉定三年修城官砖”数十方，以及外国人石墓的墓顶石十三件。那些墓顶石，比其他各处所发现的粗大，又多是白色花岗石琢成的，而且石的两端都不刻花纹或文字。

至于碑上天使的服装，有几种说法：有的认为它是带有浓厚的波斯僧人衣冠的样式；有的以为它是波斯萨珊王朝时代的僧人服装，而受马其顿亚历山大以后的希腊文化的影响；有的以为它是纯中国式的僧侣服装而受到浓厚的佛教艺术的影响。我们根据这方石雕的样式来看，它是属于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堵之一，是安置在前面的三方主要石堵之一。根据推断，这一方石刻，恰是砌置在正中的，其左右应该还有两方有文字的雕刻，可是已经不见了，但仍可推知它们很可能是叙利亚文字的石堵。因此我们说它是属于聂斯脱利（Nestorian Christian）教派的基督教十字架墓石。至于碑刻上所雕的飘带天使，是古基督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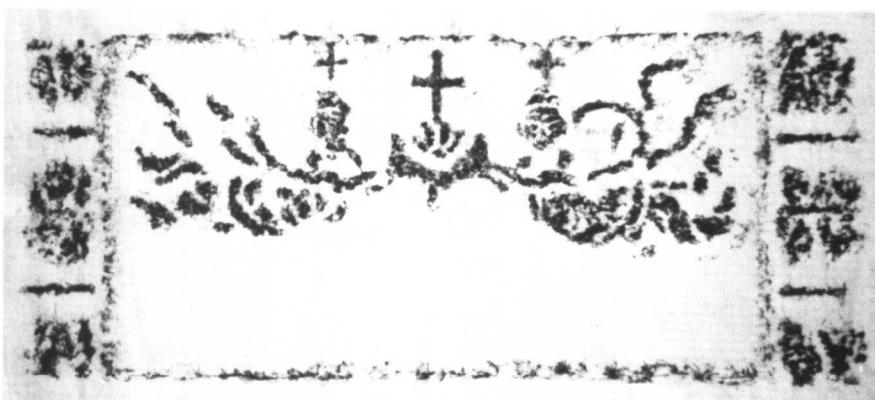
传说中的天使在中国的演化。又因聂斯脱里派曾以波斯为传教根据地,泉州的聂斯脱里教主要也是由波斯通过蒙古大军而高昌、而汪古部路线传入的,因而天使的雕刻手法,就不免会带有一些波斯及中国的艺术色彩了。本墓碑于1973年8月23日,由吴文良先生的遗孀刘婉如捐赠给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存泉州市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32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堵石长67厘米、高27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石质粗糙。堵石的两端附有间柱,间柱上浮雕重叠仰覆莲瓣。石面的正中自上而下,由十字架、盛开的莲花和承托物组成“圣物”。“圣物”的左右,各有一位飘带飞使,伸出双手扶持着。飞使头顶各有一个小十字架。右边飞使头顶上的小十字架风化较甚。飞使头戴僧帽,顶上有螺髻,耳大垂肩,两臂裸露,作轻盈状翱翔的姿态。此石是古基督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正面的主要石堵之一。1943年,发现于泉州东门石料店。据石匠说,系是年从东门与北门交界处的城基掘出的。



B 32



B 32 拓片

B 33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长 98 厘米、高 27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石面的正中浮雕一束荷花，左边浮刻一只飞鸽，右边刻一只栖于地上的鸽子。这两只鸽子的形状，与 1929 年聂克逊(F. A. Nixon)在鄂尔多斯天德军丰州汪古部所获元代基督教青铜十字上铸的鸽子形象极其相似。1936 年秋，在泉州东北角城隅城墙里掘出。一同出土的，还有一批青、白花岗石雕成的须弥座祭坛式墓石。因此，这方石刻可能是一方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垛之一，或者是一方基督教堂的建筑石刻。



B 33

查《新约》马可福音“耶稣受洗”，说的是：

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在约旦河里受了约翰的洗。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①

鸽子，基督教视为圣灵之象征，即耶稣受洗时自天降临之圣灵。元代泉州的景教与汪古部的景教有密切的关系。此石的发现又提供了一件物证。

B 34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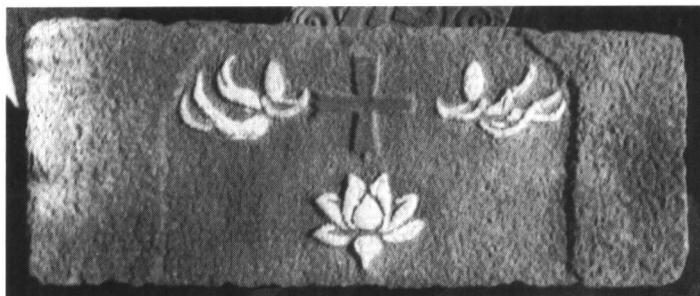
B 34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① 《新约》，“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九、十和十一节。

塔石长 77 厘米、高 2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塔石呈长方形，两端附有圆柱。石面的正中上部，浮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有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盛于一个盘中，盘下垫有巾状物，巾的三个角下垂。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完整组合的“圣物”。“圣物”的左右各有一个飘带“飞使”，共同以双手捧“圣物”。“飞使”头顶各有一个小十字架，头戴冠帽，帽顶有螺髻。两耳大而垂肩，且各有珠状饰物。“飞使”的服饰与佛教的僧衣类似，且有披肩。“飞使”身体肥硕，手不裸露，作半跪飞翔状。飞使的形象受佛教飞天雕刻艺术的影响较大，可能是古基督教传说中的天使在中国的演化。此石属于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塔之一。1948 年，发现于泉州东门吊桥附近城基。1973 年 8 月 23 日，吴文良先生的遗孀刘婉如捐赠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35 古基督教墓碑

碑石长 73 厘米、高 29.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就整个石面看，在正中似乎刻一龛状凹入，其中浮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两旁有两个头戴僧帽的双翼飞天，朝向十字架，双手向前伸出，作扶持状。十字架下刻有一朵仰莲花，这朵莲花的雕刻方式与一般景教墓碑上莲花的雕刻方式不一样，它采用写真的创作手法。这朵莲花下部没有白云承托。因此，我们很自然地联系到泉州开元寺镇国塔基座佛传图释氏出家的石刻画像。这些佛传图石刻共有三十九方，其中有一方叫做“牧女献糜”，石刻中就雕有一朵莲花，被云彩托住，其造型与本基督教墓碑石上的莲花十分相近。



B 35

“牧女献糜”的故事，是说有两个牧牛女，向一个苦修的菩萨献上牛乳。这时，忽然有一朵莲花神妙地长出来，花下有云彩顶托着。这是表明祥瑞的意思^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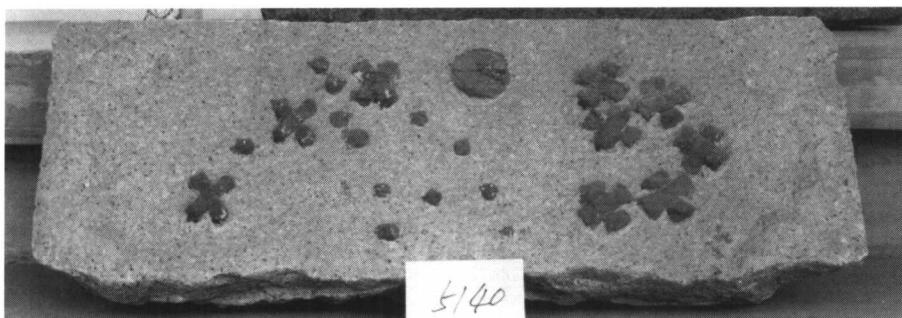
我们根据十字架飞天和莲花的雕刻方式，判断这方石刻属景教徒墓碑。从这方墓碑石的发现，使我们可以了解到宋、元时代，泉州景教雕刻艺术受佛教影响之大。

1956 年 12 月，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农民宅中发现。1957 年 3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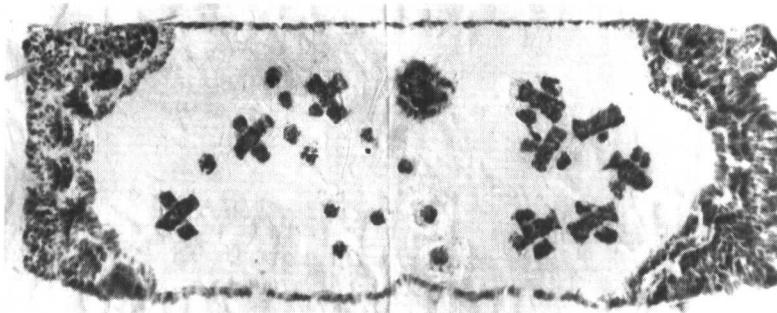
① 见 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刺桐双塔)，G. Ecke(艾克) and P. Demieville(戴密微)，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late 34, E base 9, 1935。

B 36 须弥座祭坛式墓垛石

垛石呈长方形，无间柱。长 75.3 厘米、高 27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石面左、右两端刻中国营造法式的“单卷如意头”^①，碑面正中上方，浮雕一个圆球，疑为太阳。圆球的右下方浮雕六个小十字架，排列呈弧形；圆球的左方和下方，亦浮雕十字架，但只剩下三个较完整的，其余的只剩下十字架星星点点的叶片。此碑可能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垛之一，或者是景教教堂的建筑物。但对于十字架簇拥太阳的含义，仍然不清楚。1952 年冬，在泉州东门城基掘获。1954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B 36



B 36 拓片

B 37 元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失里门主教墓碑

碑高 56 厘米、宽 49 厘米、厚 9.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尖端部分已被琢去。碑面磨光，碑右阴刻直书的聂斯脱利叙利亚文字两行，碑左阴刻汉字两行（共五十三个字）。碑背亦磨光，但不刻文字。这方墓碑石原填入泉州城墙基础，1940 年在泉州通淮门拆卸时由城墙下挖出。以后流散，至 1954 年 12 月，才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铺乡被发现。它是一方元

^① 《营造法式》，卷第三十三，单卷如意头。1928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

泉州宗教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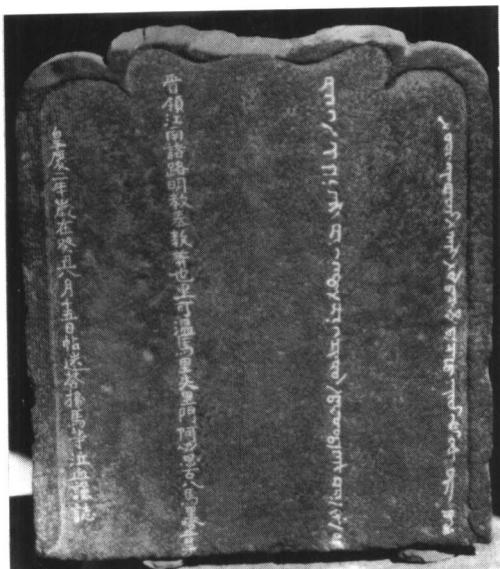
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一个特设高级僧侣的墓碑石。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调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保存。碑左两行汉字是：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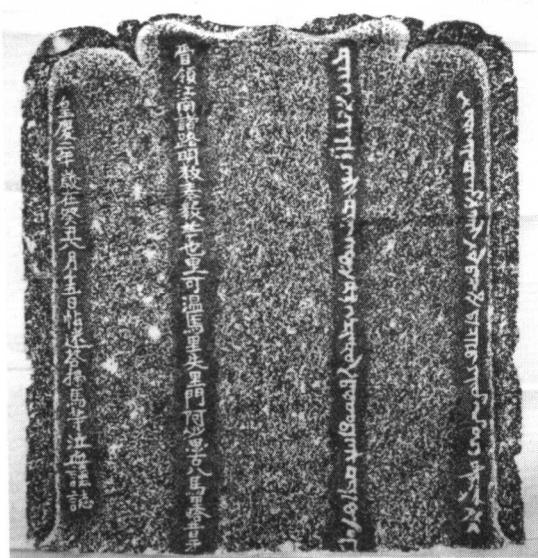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明教，就是摩尼教。秦教，就是景教，或称聂斯脱利教，它是基督教的别派。也里可温则为蒙古人称呼景教和天主教的名称。

关于这方碑石，曾有许多学者作过介绍和研究。



B 37 元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
失里门主教墓碑



B 37 拓片

1956年，厦门大学庄为玑教授初作介绍，但他的碑文抄本脱落“八”和“哈”两字^①。

195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L. C. Goodrich 教授，介绍了庄先生的文章，并对此碑加以考释^②，认为此碑文是献给两位墓主的。

1963年，日本顺天堂大学村山七郎教授，为进一步研究此碑，致函郭沫若院长，索取本碑拓本，并把他的研究成果列于信中^③。

1964年，村山氏把获得的拓片和研究成果，用德文发表于《乌拉尔阿尔泰研究年鉴》^④。

1964年，埃诺奇(K. Enoki)在《东方基督教会》(L Oriente Cristiano)发表《中世纪时代中

① 《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第46页。

② 《美国东方学会会志》JAOS, 第77卷, 第3期, 1957年, 第161~165页。

③ 1963年6月10日，日本顺天堂大学、日本语言学会委员村山七郎，致郭沫若院长信中表示：“很希望能够得到并发表图108的拓本”并“愿将所得结论，述之于中国学者”。

④ 村山七郎《泉州出土的突厥语景教墓碑》(德文)，载《乌拉尔阿尔泰研究年鉴》35卷，D分册，1964年，第395页。

国的聂斯托利基督教》一文,也认为这碑文是献给两位墓主的^①。

1980年,英国刘南强先生在《基督教之觉醒》一书中,对本碑文进行译析。刘先生与夫人认为本碑文是献给一个墓主的^②,并提出墓主在13世纪80年代到中国。

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在《考古》发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对碑文内容进行详细考释,并由我提供本墓碑的拓片^③。

2003年,牛汝极先生在《世界宗教研究》杂志发表《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一文,对本碑叙利亚文回鹘语部分进行标音、转写和译释。同时,提出墓主大概在13世纪80年代到中国^④。

1981年,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对碑文作综合性的、深入一步的考释。

现综合村山七郎两次对碑文的考释于下^⑤。村山氏认为,这方碑刻是用叙利亚文字拼写突厥语的。用拉丁字母拼写,大致如下:

mahi-ail-lar-ning mar-i hasya mar-i Šilemūn episkupa-ning

kabra-si ol(德文版作 qabra-si ol)。

ut kui yil sak(i)Z(in)(德文版作 sāk(i)z(n))č ai-ning on bis-ta...yalavac-i ca bitimis(德文版作 pis-tā bašlap keliu Zauma bitimiš)。

逐字注释于下:

mahi 推想为叙利亚文的“宗教、信仰”的意思。但在叙利亚的辞典上得不到证实。[德文版云:但在苏联境内七河(Semirijetschie)地区的叙利亚景教墓碑有 malimna 和 malimnatha,都作“信仰”的意思。]

ail-lar 是突厥语“村”的意思。[德文版云:lar 为多数结尾词,也许是吉利吉斯的“村子”,故大胆假定它为“教区”的意思。]

-ning 是突厥语的属格接尾辞。[德文版云:ning 为突厥语名词所有格词尾。]

mar-i 的 mar 是叙利亚语的“师、主”的意思,附在后面的-i 为突厥语接尾词。

[德文版云:mar 是叙利亚语的尊称(犹汉语的先生).]

i 是突厥语第三身名词的语尾。

hasya 是叙利亚语“僧职人员”的意思。

mar-i 与前面的 mar-i 相同。

silemūn 是死于泉州的聂斯脱利主教的名字。

episkupa=希腊语的 episkopos“主教”(英语 bishop)。

kabra 是叙利亚语“墓”的意思。[德文版云:qabra-si 中 qabra 是叙利亚语“坟墓”。]在突

① Accademia dei Lincei anno 361, quaderno 62, Rome 1964.

② 见刘南强(Samuel N. C. Lieu)著,林悟殊译《华南沿海的景教徒和摩尼教徒》,注释①。发表于《海外交通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93页、95页、100页。

③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载《考古》1981年第1期。

④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⑤ 《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厥人看起来,这个字和 mar 都是外来语。sī 是突厥语所有格的语尾,相当于汉字的“之”字。是突厥语“所有者的墓界”。

ol 是突厥语的单位,本来是“那个”的意思。可是在古回鹘语文书中作 copula(……是也)。[德文版云:ol 原为指示代名词,但在东突厥语中是作连系词使用。]

ut 字,在ヤミレチレ发掘的聂斯脱利教徒突厥人的墓碑上(叙利亚文突厥语)是“牛”的意思,按照突厥语的正确语形,应作 ud。[德文版云:ut 相当于汉字的“丑”,原义是“牛”。]“牛”、“丑”分别是十二生肖和地支的第二位,所以“癸牛年”即“癸丑岁”。七河地区景教墓也把 ud 作 ut。

kui 是“癸”的译音。

Yil 是突厥语的“年”。

säk(i)z(in)č ai-ning 是突厥语“第八月的”。

on bis-tä 突厥语“在十五(日)”。

yalavac 是突厥语“使者”的意思。

cä 意义不详。

biti-mis 是突厥语“书写”的意思。

根据以上的解释,知道这是一方用叙利亚文拼写突厥语的碑刻,大致与汉文的内容是一致的。

汉字的句点应这样标就对了,即:

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érkoun mar-i Silemun episkupa mar-i hasya

译意是:“基督教徒(聂斯脱利派教徒)师 Šilemun 主教师僧”的意思。

综上所述,这方碑碣的译文如下:

据日文:“在公元 1313 年,聂斯脱利教主教失里门(ミレムレ)师,死于泉州”。

据德文版:“这是僧侣先生教区(?)的教长(主教)失里门先生的坟墓”。

在 12 世纪,突厥语族中的汪古、客烈、乃蛮等三部,早就接受了中亚传入的景教。如以后客烈部的王汗,西方人称为长老约翰^①。成吉思汗兴起后,征服客烈、乃蛮,蒙古略金地,他们随蒙古南下,惟汪古归附蒙古,仍保留原民族的特点。汪古部有天德军丰州汪古、净州天山汪古和云中汪古等三部分。他们都使用突厥语。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艾不盖河、锡拉木伦河等处,发现许多汪古部的景教墓碑铭文,有的是叙利亚语的,有的是借叙利亚字母拼写突厥语的,有的在叙利亚语单词后加上突厥语 sī^②。本碑的情况恰恰与上述情况相同。景教来源于叙利亚,叙利亚语是景教徒的官方语,因此景教徒丧葬铭文也用叙利亚文书写,但他们不甚精通叙利亚语,所以往往夹杂突厥语法习用的语尾之类。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本碑刻上的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很可能是 14 世

① 张星烺译《马可孛罗游记》第 100 页,1936 年,商务印书馆。

② 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的研究》第二卷,第 422 页和 430 页。

纪汪古部人所作。

再从“扫马”名字看，这方失里门墓碑也可能与汪古部有关系。

扫马(Sauma)不是中国名字，是叙利亚常用的(聂斯脱利派)人名，它的意思是“禁食得子”，表示十分虔诚的意思。13世纪末，有拉班·扫马(Rabhan Suama)，他是有名的聂斯脱利基督教徒，生于北京，畏吾儿人。他和马可(Marc)曾于(公元1287~1288年)游历欧洲^①。这个记载，最先是于1888年以叙利亚语文本在巴黎刊行，1895年由J. B. Chabot译成法文，后J. A. Montgomery与S. W. Budge译成英文。最先叙利亚文本称扫马和马可是东突厥人。伯希和氏则考证马可是汪古部人^②。可见扫马名字在东突厥(也即汪古部)人中，是基督教徒的常用名字。

扫马名字，在国内文献上也有记载。在元代，有个很有名的汪古部马氏家族。元好问在为马氏祖先写的《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载：

君讳庆祥，字瑞宁，姓马氏，以小字习里吉斯行。出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因家焉。太宗尝出猎，恍惚间见金人挟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视。因罢猎而返，敕以所见者物色访求。或言：上所见殆佛陀变现，而辽东无塔庙，尊像不可得，惟回鹘人梵呗之所有之，因取画像进之，真与上所见者合。上欢喜赞叹，为作福田以应之。凡种人之在藏获者，贵为平民，赐钱币纵遣之。君之祖讳迭木儿越哥，父把骚马·也里黜，又迁净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边堡，互市所在，于殖产为易。君家勤俭，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能通六国语，并与其字书识之，泰和中试补尚书省译史。^③

另外黄溍《马氏世谱》也有一段重要记载：

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斯脱利贵族。始来中国者和录深思……辽主道宗咸雍间……道宗欲官之，辞不就，但请临洮之地以畜牧。许之。遂家临洮之狄道。和录深思生帖木尔越歌，以军功累官马步军指挥使……惟称之为马元帅，因以为氏。帖木尔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伯索麻也里束生习礼吉思，一名庆祥……凡诸国语言文字靡不通。^④

以上两段引文，说明如下几个问题：

一、关于马氏族源和宗教信仰。“花门”，即回鹘。“西域”指西迁后回鹘人住地。可见马氏汪古部为回鹘人，先居临洮狄道，后迁辽东，而后又迁净州天山。他们信仰聂斯脱利基督教。

二、关于汪古部的文字。马氏能“通六国语”，任“译史使者”。当时汪古部使用的文字复杂，比如20世纪30年代所发现的汪古部聂斯脱利基督教徒墓铭文^⑤和近五十年发现的丰州

^① 明义士《马可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J. M. Menzies Christianity in China in Marco Polo's time)，《齐鲁大学季刊》第5期，第178页，1934年。

^② 摩尔《155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1550, London S. P. C. K, 1930年, 第94页, 注2)。

^③ 元《遗山先生集》卷二十七，《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光绪七年重镌本。

^④ 《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四十三。

^⑤ 见《华裔学志》第三期，第232~250页，1938年出版；第四期，第305~308页，1939年出版。

万部华严经塔的题记^①中，就有汉字、八思巴文字、回鹘文字、八思巴字拼写汉语、叙利亚语、叙利亚字拼写突厥语等。远在中国东南部的泉州，近七十年来，也发现元代聂斯脱利基督教徒遗留的墓碑，碑上所刻文字，一如汪古部所在地所发现的。据此，我们推测，元代泉州的景教徒，有相当部分是来自汪古部的。

三、从聂斯脱利基督教徒名字看。引文中提到的习里吉斯和习礼吉思，是同一个名字的不同音译，英文叫 George(乔治)，即马庆祥。而把骚马与伯索麻，也是同名的异译，即 Sauma(扫马)，是马庆祥的父亲名字。都是一般景教徒的名字。至于马氏家族如何以马为姓氏，《马氏世谱》所载只可作汪古部汉化的证明，但不能说明马姓的来源。因为姓马是从马习礼吉斯(马庆祥)开始，而不是从其父扫马开始。所以马庆祥的姓马，是宗教原因。竖立泉州失里门主教墓碑的景教徒也叫扫马。汪古部一些景教徒的名字，与泉州景教徒墓碑上所见的名字一样。因此，我们推断，帖迷答扫马等立的失里门墓碑石，是汪古部基督教徒曾来驻泉州的物证。

四、净州地“近接边堡，互市所在”，此地为元岭北行中书省和林和内地交通要道，由于贸易致富，提供了南下的经济基础。

《元史·亦黑迷失传》记，至元十二年，亦黑迷失奉使八罗李国“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国师，即教士。名药即圣油，是耶稣墓前的灯油。可见当时元廷是信仰景教的。至元二十九年，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奉命征爪哇，就从泉州后渚港出发。亦黑迷失是畏吾儿人，可能就是汪古部人。如果这个推测不误，那么既有汪古部人南来任官职，一般景教徒跟随南来也是很自然的了。

关于失里门和帖迷答名字的问题。查《元史同名录》，有载：

《元史》名失列门者七，昔列门者二，失烈门、失里门者各三。^②

本碑刻上的失里门(Silemun)，可能是同名的异译，为一般聂斯脱利基督教徒的人名。

《至顺镇江府志》里的“失里河”^③(应是失里门之误)，是不是此碑上的失里门，那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已。

至于帖迷答(Timothy)是否可认为是大卫(David)的异译问题。1908年，斯坦因曾在敦煌石室获得一卷按叙利亚文格式书写的中文赞颂诗，名叫《景教三威蒙度赞》(即今基督教赞美诗《普天颂赞》的第二首)，在卷末载列许多基督教的圣者与书籍，其中有“多惠法王”、“多惠圣王经”^④。“多惠”即中文对 David 的音译，即大卫。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主教设于何时，探讨这个问题，对了解泉州景教的发展情况不无帮助。《元典章》载：

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准中书省咨，礼部呈奉省判集贤院呈，江南诸路道教所呈，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及行将法篆先生诱化，侵夺管

① 见《文物》1977年第5期，第59~60页。

② 汪辉祖《元史同名录》卷二十六。

③ 《至顺镇江府志》卷九，《大兴国寺》条。

④ 明义士《马哥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齐大季刊，第五期，第175~176页，1934年。

领，……照得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近年以来，因随路有一等规避差役之人，投充本教户计，遂于各处再设衙门，又将道教法箓先生侵夺管领，实为不应……移咨本道行省，严加禁治……依上禁治施行外，行移合属并僧箓司也里可温掌教司，依上施行。^①

此段记载，虽然反映了也里可温教发展之迅速，因此与道教发生争执，但也说明大德八年以前，江南诸路还没有“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主教之设。

最后，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其一，本碑的失里门(Šilemun)是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主教，他的墓碑由聂斯脱利基督教徒“帖迷答扫马”等一群人竖立。这是否说明，当时泉州只有景教，而没有明教(摩尼教)。其二，数十年来，在泉州所发掘的古基督教墓碑石，不论它是属于圣方济各会派的，或者是聂斯脱利教派的，它们的主要标志，是在其墓碑上都刻有十字架。可是这方身兼两教职务的失里门的墓碑石，却惟一地没有刻十字架。这是否摩尼教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与基督教的认识不一致的缘故。摩尼以为耶稣基督是光明的化身，“并以神圣的痛苦使世人得度，但他并不相信耶稣曾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以为犹太人是拿错别人去钉的。耶稣不是肉体的人，无论如何是拿不到的”^②。这是一个宗教史的问题，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附录：日本村山七郎氏致郭沫若先生的信

郭沫若先生：

向未职荆，而冒然致函于先生左右，深为失礼，诸祈谅解。鄙人在日本顺天堂大学教语言及德语；并在教育大学教俄语，是专攻阿尔泰比较语言学的。现任日本语言学会委员。

今次去函动机，是由于读吴文良氏编《泉州宗教石刻》所引起的：对其中所著录的一件碑文，研究之后，深感兴趣。愿将所得结论，述之于中国学者。

在吴氏这本极为重要的文献中所发表的图版 108，为汉文两行、叙利亚文两行所构成。

汉文的内容，吴氏在 P46 上读为：(句点也是按照吴氏的标法)

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皇庆二年岁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扫马等泣血谨志。

很遗憾，这个句读是不正确的。原碑文上并没有句点。

例如按照下面的读法，就对了。

也里可温、马里、失里门、阿必思古八、马里哈昔牙。

这就是 èrkoun mar-i Šilemun episkupa mar-i hasya 的译音是：“基督教徒(聂斯脱利派教徒)师 Šilemun 主教师僧”的意思。

我对于用叙利亚文所写的文书，仔细研究了以后，知道是用突厥语写的。用叙利亚文所写的突厥语，也还有一些地方不甚清楚。大致如下。

mahi ail-lar-ning mar-i hasya mar-i Šilemun episkupa-ning kabra-si ol. ut kui yil sak

^① 《元典章》卷三十二。

^② 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三期，第 394 页，1928 年 6 月版。

泉州宗教石刻

(i)z (in)c ai-ning on bis-ta... yalavac-i ea biti-mis.

mahi 推想为叙利亚文的“宗教、信仰”的意思,但在历来叙利亚语的辞典上,得不到证实。ail-lar 是突厥语“村”的意思。

-ning 是突厥语的属格接尾辞。mar-i 的 mar 是叙利亚语的“师、主”的意思。

附在后面的-i 因为在他的前面有 mahi ail-lar 应该是突厥语的接尾辞。hasya 是叙利亚语“僧职人员”的意思。

mar-i 与前面的 mar-i 相同。Šilemun 是死于泉州的(A.D.1313 年)聂斯脱利主教的名字。episkupa=希腊语的 episkopos“主教”(英语 bishop)。kabra 是叙利亚语“墓”的意思。

ol 是突厥语的单位,本来是“那个”的意思,可是在古回语文书当中作 eopula(“……是也”)。

ut 字,在セミレチレ发掘的聂斯脱利教徒突厥人的墓碑上(叙利亚文突厥语)是“牛”的意思。按照突厥语的正确语形,应该作 ud。

kui 是癸的译音。

yil 是突厥语的“年”。

sak(i)z(in) c ai-ning,“第 8 月的”(突厥语)。

on bis-ta“在十五(日)”(突厥语)。

yalavac-i 是突厥语“使者”的意思。

cä 意义不详。

biti-mis 是突厥语“书写”的意思。

叙利亚文突厥语的碑文,大致上汉文的内容是一致的。

根据我于上述的解释,碑文的内容为:在公元 1313 年,聂斯脱利教主教西雷蒙(ミレムレ)师,死于泉州。

图 110,吴文良氏认为是“摩尼教碑石”:毫无疑问,这应是景教墓碑石。吴氏文中云幡幢上有:“大德黄公年玖叁岁”(P47)八个字。按“大德”是 episkupa 的译文,其本意为聂斯脱利教的主教。按照蒙古人的发音是将 Šilemun 念作 Širemu 的,在(华夷译语)上是这样标明的。蒙古语中的 Šira 是“黄”的意思,推想因此之故,称 Šilemun 主教为“大德黄公”。假如这个推测是正确的话,在皇庆二年(公元 1313 年)死去了的 93 岁的西雷蒙(Šilemun),应该是公元 1220 年诞生的。

吴文良氏引用了《至顺镇江府志》。其中所引的“马里哈昔牙麻儿失里河必思忽八”,我怀疑很可能是“马里哈昔牙麻儿失里门(mar hasya mar Silenun)阿必思忽八”的讹误。又吴氏引文用的太子也里那延,原文为也可那延,蒙古语中的 yeke noyan 是“大官人”。

吴文良氏在文中的这些讹误之处,若和其出版这一重要文献的伟大贡献来比,几乎是微不足道的。由于这一著作的发表,使我才有可能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同时,在中国宗教史的研究上,也是必有其一定的贡献的。

若是能够办得到的话,我们很希望能够得到并发表图 108 的拓本。

我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拟在 Ural-Altaische Jahrbucher 上面发表(已将原稿送交该杂志的编辑部),我想,这对于中国学者,也会是有用的。谨此奉闻。

在百灵庙附近,从才ニク一一部族遗迹中所发现的十字墓石,其上有用叙利亚文突厥语所写碑文,我已将考释的结果,在 1963 年 6 月 7 日在东京举行的第八届国际东洋学者会议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也预定在 ural-Altaische Jahrbucher 上发表。(Martin 江上波夫搜集)。很愿意知道,中国方面对这一资料,有什么成果与作品。

以上,拉什书此,读起来难免有费解之处。一个从未曾见过先生的人,写了这样一封潦草的信,自觉非常失礼,谨祈谅解,顺祝健康。

村山 七郎谨启
东京都世田谷区北泽 5-811

B 38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 40 厘米、宽 3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碑中央浮雕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交叉处有一朵五瓣的梅花。十字架上面刻“华盖”,在“华盖”的四角下垂着四条穗状的璎珞,“华盖”顶上刻有一颗火焰珠。在十字架的下面,还浮雕一朵大莲花。1943 年,在泉州北门城墙挖掘基础时发现。我们曾怀疑它是摩尼教徒的遗物,因为它除十字架外还刻有佛教常用的“华盖”,且在顶上刻有佛焰。但是,经过与同类型景教墓碑(特别是刻有文字的墓碑)作对比,我们断定它属于景教徒的墓碑石。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38



B 38 拓片

B 39 大德黄公墓碑

碑高 42 厘米、宽 3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周围刻有一种简单的连续传枝的图案花纹。碑正中再刻一个尖拱形框，尖拱下浮雕一个“华盖”，它的左右还有两条穗状的璎珞下垂。“华盖”的下面，浮雕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还有一朵莲花。在莲花的下面左右两侧，浮雕有两幅“幡幢”，“幡幢”上分别阴刻汉字，共八字：

大德黄公

年玖叁岁

石刻因年久，字已有些模糊，但仍可辨析。在“幡幢”下面，也各浮刻两朵小莲花。1947 年，在泉州北门城垣基础内掘获。我们曾怀疑它是摩尼教徒的墓碑石，现断定它属景教墓碑。墓碑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日本村山七郎氏认为，“大德黄公”其中的“大德”是叙利亚语 episkupa 的译文，其本意即聂斯脱利的主教^①。村山氏的解释是对的。唐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多处提到“大德”一词。景教在泉州受佛教的影响甚大，一些名词往往取自佛教，如 B40 墓碑石上“侍者长”之



B 39



B 39 拓片

^① 村山七郎《致郭沫若先生的信》，1963 年 6 月 10 日，见本书第 402 页；村山七郎《泉州出土的突厥语景教墓碑》（德文），载《乌拉尔阿尔泰研究年鉴》35 卷，D 分册，394～396 页，1964 年。

类。按佛教的“大德”一词,为“僧侣、和尚”之义,在中国多用来尊称有地位的僧人。所以,本墓碑石上的“大德”也可作“教士”解释。“大德黄公”,即景教“教士黄公”之意。

村山氏又认为,蒙古人把 Šilemun 读作 Širemun,在《华夷译语》上是这样标明的。蒙古语中的 Sira 是“黄”的意思。据此,村山氏推论出帖迷答扫马等立墓碑石上的 Šilemun(西雷蒙)主教,为本墓碑石上的“黄公”,他们是同一个人。从而进一步推算出 Šilemun(西雷蒙)主教是诞生于公元 1220 年。对此,夏鼐先生已有考证^①,说明 Šilemun(西雷蒙)与“黄公”是两个人而不是同一个人。关于一墓两碑的问题,在泉州的伊斯兰教阿拉伯文字墓碑石上曾经发现过,如赛典赤·杜安沙墓碑即是。至于景教是否有一墓两碑,则未发现。不过在此补充说明一点,即 Šilemun(西雷蒙)主教的墓碑石,是获于泉州城东南通淮门外津头铺古代外国人的墓葬区附近的城墙。“大德黄公”的墓碑石,是获于泉州城北门古代外国人的墓葬区附近的城墙。两个墓葬区的距离约 3 公里。因此,他们更不可能是同一人。

B 40 侍者长柯存诚墓碑



B 40



B 40 拓片

^① 夏鼐《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载《考古》1981 年第 1 期。

泉州宗教石刻

碑高 42.2 厘米、宽 27 厘米、厚 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碑面的正中刻尖拱形凹入，上部浮刻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浮雕一朵带花萼的莲花，莲花下阴刻六个汉字：

柯存诚

侍者长

汉字下碑的底部又浮刻一朵开放的大莲花。碑顶和两旁的边缘均浮刻连续卷曲花纹。

“侍者”，原是佛教僧侣的称号。侍者长，可能是佛家称高级僧侣的称号。景教因受佛教的影响，所以一些名词大多与佛教相同。柯存诚，可能是景教教士的姓名。1955 年 8 月，在泉州东门城基掘出。是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B 41 叶氏墓志碑

碑高 42.2 厘米、宽 32.3 厘米、厚 9.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石顶的尖拱已被琢去，两侧边框浮雕波状云纹连续图案。碑面正中再刻一个尖拱形框，尖拱下浮刻一个十字架，两旁各有一个头戴僧帽的飘带飞天，共同扶持着“圣物”。“圣物”自下而上是由巾状物、盘、梅花、莲花及其承托着的十字架组成。飞天之下，碑的正中，阴刻两行蒙古八思巴文字，左右又各有一行汉字：

至大四年辛亥

仲秋朔日谨题



B 41



B 41 拓片

全碑雕刻十分精美。1940年，在拆卸泉州北门城时由城墙中挖出。1943年，在泉州北门城边的乱石堆中发现。这是第一次发现刻有八思巴文字的十字架石刻。由碑的形状及底边看来，可以知道它是由一座基督教徒的石墓上拆卸下来的。该碑于1954年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藏。

2003年，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牛汝极教授经过释读，认为这两行八思巴文应读为：“叶氏墓志（是一位姓叶的女子之墓）”^①。

B 42 易公刘氏墓志碑

碑高40.5厘米、宽31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的尖拱已被凿毁，除底边外，其余三个边刻有连续卷曲花纹。碑的正中刻有一个尖拱形框，尖拱下浮雕一个四端作剑锋形的十字架，十字架下浮雕卷云图案。再下面阴刻蒙古八思巴文字二行，其左右又各有一行汉字：

时岁甲子

仲秋吉日

碑上的“时岁甲子”，可能是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此方碑刻，1948年在泉州北门城基内掘获。2003年，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牛汝极教授对两行八思巴文字的释读为“易公刘氏墓志（易先生的夫人刘氏之墓）”^②。



B 42



B 42 拓片

①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②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第79页。

B 43 凯珊·居延女儿云之墓志碑

碑高42厘米、宽28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顶尖拱已被毁，其形制，花纹及雕法与前二碑大致相同。碑面正中尖拱内，雕一个四端作剑锋形的十字架，下面雕一朵莲花。碑的下部阴刻蒙古八思巴文字两行。1954年，在泉州北门城垣基础内掘获。



B 43



B 43 拓片

以上三方刻有八思巴文字的墓碑，承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蔡美彪先生翻译并说明如下：

1. 这三个碑的文字都是八思巴、蒙古字。

此种文字通常可有两类，我以前称之为甲类和乙类^①，甲类音写蒙语，乙类音写汉语。此三碑文字均属乙类。

2. 元代习见的八思巴字乙类碑刻，往往是蒙古字与汉字并书，蒙古字即汉字的对音。泉州的碑亦两种文字合刻，乍一看来，与习见之例甚合，但细审其音读，则蒙、汉字完全无关，其例不多见。

3. 乙类字但音译汉语，并不能区别汉字之同音字，故此类碑刻如无其他资料相参证，要辨其音，但殊不易确指其字。今暂拟字如次，确切与否，尚待考稽。

第一碑(B 43)音读：

① 见《北大蒙文碑拓序目》，《国学季刊》，七卷，三号。

Kaj Šan zèu jen kó tshi' uin mú.
拟字：开 珊 朱 延 珂 子 云 墓。

按：开珊为山西文水名镇。

第二碑(B 42)音读：

Jè gun liw tsi mu zi.
拟字：易 公 柳 济 墓 址。

第三碑(B 41)音读：

Ye Ši mu zi.
拟字：叶 氏 墓 址。

以上拟字虽未必切，但殊不能以之对阿拉伯语或蒙古语名，则此三墓主当均为汉人名字无疑。元代泉州汉人信奉景教者当在不少，不足怪也。

2003 年，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牛汝极教授，对本墓碑的两行八思巴文释读如下：“凯珊·居延女儿云之墓（凯珊·居延的女儿名为云的墓志。可孜、珂子、可訾为回鹘语 qiz-i 姑娘、女儿之译音。云，可能是其名或者爱称。此墓碑主人大概来自畏吾儿家庭）”。^①

B 44 翁叶杨氏墓道碑

这是一方阴刻蒙古八思巴文字和汉字的古基督教墓碑，它又是泉州发现的第四方古基督教八思巴文字的墓碑。石碑辉绿岩石雕成。碑高 41.3 厘米、宽 27 厘米、厚 7.8 厘米。1985 年 11 月，泉州城东北郊后茂村农民王根培拆除旧房屋从墙上卸下，随后泉州华侨大学叶道义先生收集保存，1987 年捐赠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碑面浮雕双重尖拱，在双重尖拱间浮雕 4.5 厘米宽的连续卷云图案。在尖拱内上部浮雕十字架，下有交曲上涌卷云承托，其形式近似西安《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碑额的十字架雕刻。卷云下阴刻线围成一个竖立的长方形框，框内阴刻两行蒙古八思巴文字和两行汉字，汉字内容是：

延祐甲寅

良月吉日

即延祐元年（公元 1314 年）。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一文，认为本碑的八思巴文字翻译为“翁叶杨石墓道”^②。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一文，对以上四方八思巴文字墓碑（B 41、B 42、B 43、和 B 44）的翻译如下：“叶氏墓志（是一位姓叶的女子之墓）；易公刘氏墓志（易先生的夫人刘氏之墓）；凯珊·居延女儿云之墓（凯珊·居延的女儿名为云的墓志。可孜、珂子、可訾为回鹘语 qiz-i 姑娘、女儿之译音。云，可能是其名或者爱称。此墓碑主人大概来自畏吾儿家庭）；翁叶杨氏墓道（叶先生的夫人杨氏之墓）。就是说，这四方墓碑均是献给女性的。中国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徒墓碑主人也多数是女性，这一

^①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 年第 2 期，第 79 页。

^② 照那斯图《元代景教徒墓志碑八思巴字考释》，载《海外交通史研究》1994 年第 2 期。



B 44



B 44 拓片

点耐人寻味”^①。

元朝有基督教徒在泉州任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或达鲁花赤。《元典章》记，大德三年（公元1299年）完泽丞相奏过，“前福建等处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陈言一件，那里官人每富户有势的人，每将百姓每田地占，省交百姓每做佃户不交当杂泛差役”^②。阔里吉思即英文的George，今汉语译作“乔治”或“佐治”。《马可·波罗行纪》记载的出身于长老约翰血统的高唐王汪古部人阔里吉思即为聂斯脱利派教徒，在他的辖地里形成一种“有治权之基督教徒，构成一种阶级，名曰阿儿浑（即也里可温）”^③。至顺《镇江府志》有“达鲁花赤兼管内劝农事阔里吉思，也里可温人，少中大夫”^④。泉州惠安县也有达鲁花赤名叫阔里吉思^⑤。《元典章》提到的福建行省平章政事阔里吉思，在《元史》有传，云“阔里吉思，蒙古按赤歹氏……大德二年（公元1298年），改福建行省平章。未几……改福建道宣慰使、都元帅”^⑥。按泉州自大德元年至大德六年为福

① 牛汝极《从出土碑铭看泉州和扬州的景教来源》，载《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2期。

② 《元典章》卷二十五，户部十一，影避，休遮护当差事。

③ 冯承钧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1卷，第73章，《天德州及长老约翰之后裔》。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④ 至顺《镇江府志》卷十四。

⑤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七，文职官下，惠安县达鲁花赤、县尹。

⑥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列传第二十一，阔里吉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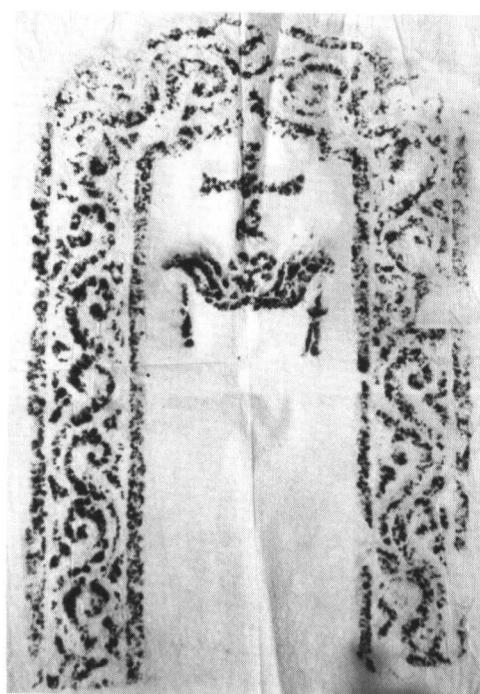
建平海行中书的省会^①，这位蒙古基督徒在泉州任职，对泉州也里可温教兴盛必有相当的影响。

B 45 古基督教墓碑

碑高 45 厘米、宽 30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碑顶作尖拱形，三面绕以图案花纹。在碑面正中又刻一个尖拱形框，尖拱下刻一个十字架，在十字架下有云朵，云下有盘状物承托，左右各垂着两条璎珞。下面的文字，因石质粗糙疏松，多已风化剥落，不可辨认。1943 年，在泉州北门城基内掘获。就这碑的雕刻形式看来，它是一方须弥座式石墓的墓碑石。



B 45



B 45 拓片

B 46 古基督教墓永思碑

这是一方汉人景教徒墓碑，辉绿岩石雕成。墓碑作尖拱形，有边框。碑高 52 厘米、宽 33 厘米、厚 8 厘米。碑面尖拱之下阴刻横书二字，以下竖刻汉字五行。2003 年 5 月，洛江区城东镇霞美村农民筑屋地下出土。碑文录文于下：

永思
考君三学士林公尊神
祖妣九居士苏氏懿神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六，文职官上，分省。又见乾隆《晋江县志》卷十六，词翰，元庄弥邵《罗城外壕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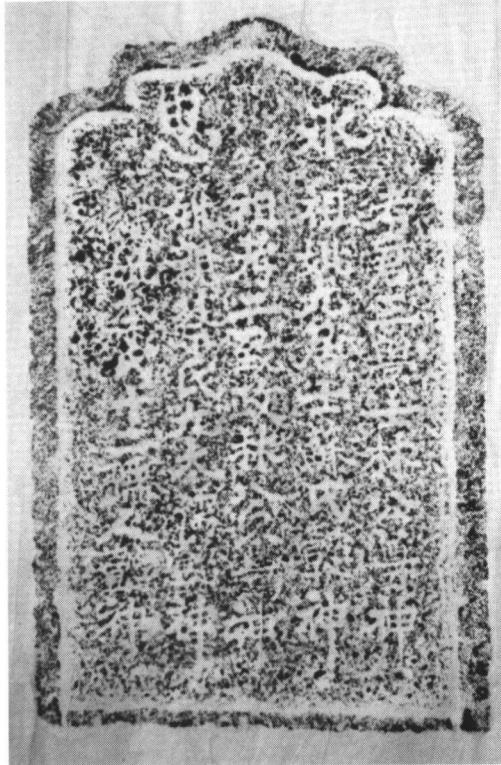
祖考二致政林公尊神
妣亲蔡氏九太孺懿神
继妣李氏十二孺人懿神

这是一方儿女辈为父母、继母和祖父、母所刻立的墓碑。《礼记》云：“大夫之妻曰孺人”。《铁围山丛谈》记：“宋政和中，改县君号为室人、安人、孺人。”^①明、清时，职官七品以下封孺人。致政，犹言致仕，谓不闻政事也。《礼记》云：“七十致政”，谓还君事也。学士，有两个意思：其一、是指学者；其二、指官名，魏晋六朝掌撰述、编纂之官称学士。唐置学士院，专掌制诰，为清要之职，后有侍讲、侍读、直学士等品秩之分。居士，原为道艺处士，后以称奉佛之士。唐、宋时加居士，则不必全属于奉佛之人。大抵绝意仕进，而又自别于方外之谓也。故方外之称儒者，亦曰居士。尊神，专称男性祖先神；懿神，专称女性祖先神。懿，温柔圣善之谓，多以称女德。太孺，古俗称尊长之尊长曰太。

该墓出土时有墓圹，系青灰砖砌成，底铺青灰砖。墓圹的耳室特别长，整体平面呈十字架形，十字的端点和十字的交叉处，各放置一个骨灰瓮。骨灰瓮系青瓷制成，每瓮底填有上百个唐朝开元年号铜钱，又每个瓮旁置两个宋代铜礼器双耳壶和一个铜三足香炉。双耳壶浮雕龙



B 46



B 46 拓片

① 宋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1983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

和雷纹。墓圹上盖以石板。可惜出土时全部骨灰瓮已被乡民击碎。

从墓碑的铭文看,完全是儒家的礼仪称呼;从明器看,也是儒家的礼仪;从骨灰瓮看,它是二次葬的证明。但从尖拱形墓碑看,它是外来宗教石刻,不是伊斯兰教就是景教。但我们更倾向于属汉化了的景教墓碑,但是墓碑不刻十字架,而以“永思”两字替代,这是值得人们寻味的。

B 47 戴舍王氏十二小姐为故妣二亲立墓碑

1994年1月,在福建省泉州市城区发现一方有纪年的古基督教墓碑(属聂斯脱利教派,即景教)。墓碑呈尖拱形,辉绿岩石雕成,保存完好,碑榫完整。

(一) 墓碑的介绍

碑高52.5厘米、宽25.5厘米、厚8.5厘米。碑的背面琢平,碑的正面沿碑周缘浮雕1厘米宽的边框。整个碑面分为上、中、下和碑榫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从上而下的高度分别为23.5厘米、13.5厘米、7.5厘米、8厘米,比例和布局合理,是泉州历来所发现的基督教碑之突出者。

上部:碑面正中浮刻一个尖拱状的龛,龛之上部及左、右,留出5厘米宽的地方,上刻《营造法



B 47



B 47 拓片

式》所谓的“海石榴华枝条卷成”图案^①。龛内浮刻高 9 厘米的十字架，十字架下刻有云朵承托。

中部：碑面琢平，刻成一高 13.5 厘米、宽 23 厘米的平面长方形框，框内竖阴刻七行汉字，内容是：

至元丁丑
郭氏十太孺
故妣二亲
陈氏十太孺
正月日吉
戴舍王氏十二小姐
丙戌仲秋壬申

中部文字内容可分为左右两个部分。右起第一至五行为“故妣二亲”郭氏、陈氏合葬时间；左侧二行为“戴舍王氏十二小姐”重立墓碑的时间。

下部：浮刻一条 1 厘米宽的横线与中部隔开，形成一个高 7.5 厘米的横长方形框，框内浮刻卷曲云纹图案。

碑榫：高 8 厘米，保存完好。

（二）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

元朝有前至元和后至元两个年号。前至元，即元世祖忽必烈的年号，亦即景定五年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 1264~1294 年）；后至元即元顺帝的年号（公元 1335~1340 年）。

前至元有丁丑年，即至元十四年，亦即南宋景炎二年（公元 1277 年）；前至元也有丙戌年，即至元二十三年（公元 1286 年）。但是，后至元有丁丑年，即后至元三年（公元 1337 年），而无丙戌年。由此可以推断，本墓碑的纪年当均属前至元无疑。

（三）本碑属二次葬或合葬重立墓碑的问题

本墓碑的碑文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至元丁丑 正月吉日”，是为“故妣二亲”“郭氏”“陈氏”等两位“十太孺”的合葬时间。宋元时期，泉州盛行二次葬。不久前泉州发现一方尖拱形墓碑，碑首刻“永思”，下刻□□□□尊神、懿神等五人的姓氏，墓圹中并有骨灰罐、青铜器、铜钱，这显然是二次葬的墓碑。二碑相比较，我倾向于前碑为合葬重立碑。

其二，“丙戌仲秋壬申”为“戴舍王氏十二小姐”替其“故妣二亲”合葬重立碑的时间。

（四）墓主属宋属元的问题

据《宋史纪事本末》载，景炎元年（公元 1276 年）“十二月，蒲寿庚与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而元军于十二月初八日（公元 1277 年 1 月 13 日）抵泉州。

《宋史纪事本末》又记，“景炎二年……二月……时北方有警，元主召诸将班师……三月……陈璘起兵复兴化……七月，张世杰以元军既退，自将淮兵，讨蒲寿庚”^②。

① 《营造法式》卷三十三，彩画作制度图样，上。

② 《宋史纪事本末》卷一百八，二王之位。

这就是说，元军自景炎元年十二月初八日进入泉州城，到景炎二年二月撤离泉州城，元军进驻泉州城的时间，充其量只有两个月左右。

而墓主郭氏、陈氏两人合葬的时间是景炎二年正月，时距元军进驻泉州城仅仅一个月左右。假设郭氏、陈氏二位孺人是随元军进入泉州的随军家属，且她们两人于一个月内先后逝世，这似乎是不大可能的。况且，元军因有蒲寿庚、田子真的投降，所以进驻泉州城是没有经过战斗的，这样郭氏、陈氏在一个月内相继去世就更不可能了。按汉人的习惯，是父母辈当中，一人逝后，停柩家里或寺庙，等待数年或数十年后，待另一人死亡，然后一起合葬。这就表明墓主郭氏、陈氏是生活于南宋中后期的泉州基督教徒。

按儒家的礼仪，大夫的妻子称孺人。《礼记》云，“大夫之妻曰孺人”，以表示妻子属于丈夫。又据《铁围山丛谈》载，宋政和中（公元1111～1118年）诏：“改县君号为室人、安人、孺人”^①。

据以上历史情况和墓碑文内容推断，重立碑（或二次葬立碑）的王氏十二小娘的丈夫姓戴，是泉州地方的士大夫阶层，但在重立墓碑之前已去世。本墓碑是王氏十二小娘在婆婆郭氏、陈氏合葬九年之后重立的墓碑（或二次葬后立碑）。

可以这样认为，生活于南宋中后期的泉州汉人基督教（景教）徒戴家的郭氏、陈氏，相继逝世，并于元至元丁丑年（公元1277年）正月合葬。那时，元军刚刚进入泉州，旋即北撤。七月至九月，有张世杰和畲军包围泉州城长达三个月，城外坟地悉遭破坏，而逃入城里的百姓，亦遭“丁丑风尘冒倾洞，全家投城，粒价日穷，死者万计，罄囊莫给”^②之厄运。迨至至元丙戌年（公元1286年），戴舍王氏十二小娘才为其“故妣二亲”坟墓重立碑（或二次葬立碑）。

由上史实表明，南宋中后期，泉州就有基督教的活动。而在这之前，一般学者都认为泉州的基督教（景教）是随蒙古军力南下带来的。南宋中后期泉州有汉人基督教（景教）的活动，这与当时泉州是著名的国际贸易海港的地位是相称的。

（五）本墓碑发现的意义

其一，本墓碑是泉州发现的纪年最早的基督教墓碑。过去，泉州发现的有纪年的基督教墓碑有1313年的失里门主教墓碑和1306年的吴咬哆呢嗯主教书塔石。而本碑的纪年是1277年，为南宋景炎二年。

其二，本墓碑墓主为长江以南福建泉州的汉人基督教徒。碑文内容完全依据儒家的礼仪规定撰写，如立碑者王氏十二小娘，称其婆婆为“故妣二亲”，又写明二亲的辈份是“十太孺”。碑末还点明自己的身份是属于“戴舍”，这完全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妇女从属丈夫的儒家礼仪。无论从二人合葬之风俗，或碑面行文“故妣二亲”居中，而立碑者小字辈“王氏十二小娘”铭文居左等形式看，均纯粹为儒家礼仪形式。这是迄今可以肯定的南宋中国南方汉人的基督教（景教）墓碑。

其三，本碑证实在南宋中后期，泉州港就有基督教（景教）的流行。学术界一般认为，基督教（景教）势力是随蒙古军力自中亚、内蒙和华北等地再度向东南传播，因此，在江苏扬州、福建泉州发现的基督教（景教）徒墓碑的纪年都是在元代。由此，学术界多数人得出结论，泉州

^①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一。

^② 吴家庭《延陵黄龙吴氏族谱》，黄龙族一世祖礼公旧墓志铭。黄龙吴氏修建委员会，1989年重修。

发现的许多基督教(景教)徒墓碑的墓主,不是中亚人,就是回鹘人、汪古部人,或蒙古人,就是没有发现福建泉州的当地汉人。所以,他们据此论断,说景教随元军传入泉州,只流行于社会上层(色目人、蒙古人),因为元朝统治的时间短暂,尚来不及扩展至民间,故元亡基督教随之而消灭。如今,“戴舍王氏十二小娘”刻立的基督教(景教)墓碑的发现,推翻了学术界的结论,表明南宋中后期,在中国东南方的著名海港——泉州,就有基督教(景教)的传播。

其四,亲人合葬为中国古代的葬俗,二次葬亦为中国的葬俗。“戴舍王氏十二小娘”刻立的墓碑,表明是合葬(包括二次葬)“故妣二亲”二位“太孺”,而前文提到的泉州新近发现的一方宋代尖拱形墓碑,则是二次葬三位“懿神”、二位“尊神”(B46)。宋元时期,泉州这种合葬现象也在伊斯兰教徒中出现。20世纪60年代,泉州发现一方伊斯兰教徒合葬的墓碑,碑面上部刻“黄公墓,百氏坟”,下部用阿拉伯文刻写合葬的时间为回历700年(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碑的背面刻《古兰经》文。这里的“黄公”,当为泉州地方的汉人,“百氏”应为波斯、阿拉伯的妇女。这一方面表明伊斯兰文化已融入泉州的汉族文化;另一方面表明泉州以其博大的胸怀,接纳了伊斯兰文化,并通过合葬风俗表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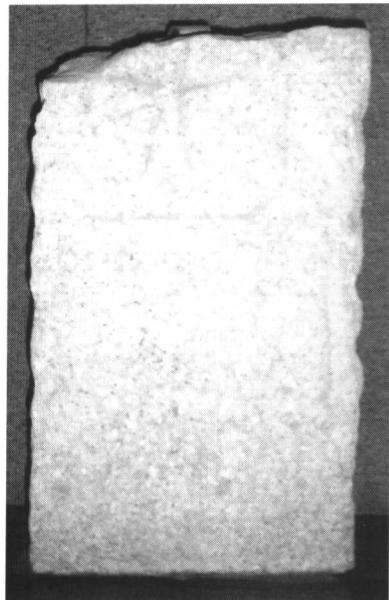
其五,本墓碑的十字架与祖先崇拜的共处,让我们联想起,具有海洋心胸的泉州人吸纳外来宗教文化的方式。即以早已深深扎根于人们心中的佛教的“佛”,以善意和慈善为出发点,来理解和吸收外来宗教文化。如公元1306年泉州的基督教主教吴唆哆呢嗯碑云:“匪佛后身,亦佛弟子”,这里以佛称耶稣;公元1281年,印度教徒掘伯鲁马尔,在泉州创建湿婆神庙,得到御赐执照,湿婆像称“御赐佛像”;泉州晋江草庵的元代明教(摩尼教)徒,为祈祝双亲在天之灵早入明界,称“早生佛地”;泉州宋代的伊斯兰教徒,称招呼教徒入寺做礼拜的宣礼塔为“叫佛楼”。如此等等。泉州人这种慈善的胸怀和吸收外来宗教文化的方式,是多元一体文化的一个典范。

本碑的“戴舍王氏十二小娘”刻立的“故妣二亲”基督教(景教)合葬墓碑,是泉州发现的首例古代基督教徒合葬墓碑,它表明宋代基督教尊重泉州汉人传统的祖先崇拜习俗。它再一次证实,宋代泉州人的海洋心胸、海洋性格,既接受西方基督教文化,成为基督教的虔诚信徒,却又巧妙地把西方基督教文化融入汉文化的礼俗之中,用台湾“中研院”院士李亦园先生的话说,是古代泉州人做到“各美其美”,又“美其人之美”。宋元时期,泉州地方这种东、西文化的互相尊重,这种多元文化的胸怀,保护了阿拉伯和西方文化“基因的火种”^①,并巧妙地把它们揉合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这是全人类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在今日全人类追求“全球化”的过程中,古代泉州人所表现出来的“普世价值”观,确实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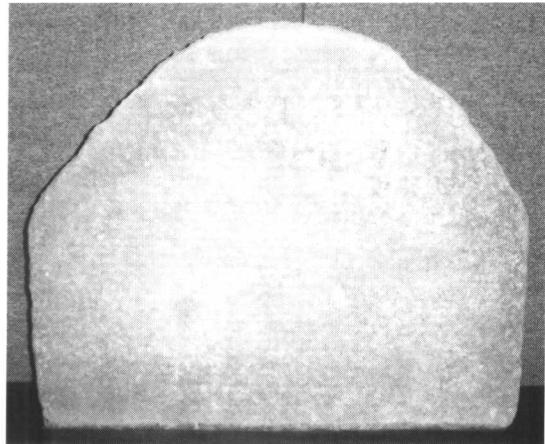
B 48 古基督教墓碑

碑的上部和左、右侧皆残缺,白花岗石雕成。碑残高49厘米、残宽28厘米。碑的左上角浮刻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外有阴刻的框,十字架的上部也受损。因残缺太多,难以断定此碑的原来的形状。1978年,在泉州涂关门外津头铺乡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① 李亦园《释论“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内在文化意涵》,载《泉州港与海上丝绸之路》(二),第31~39页,中国航海学会、泉州市人民政府编,2003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B 48



B 49

B 49 古基督教墓碑

碑保存完好,碑顶作弧形,近似泉州地区汉族人墓碑。碑宽70厘米、高59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浮雕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浮刻一朵盛开的莲花。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50 须弥座祭坛式墓堵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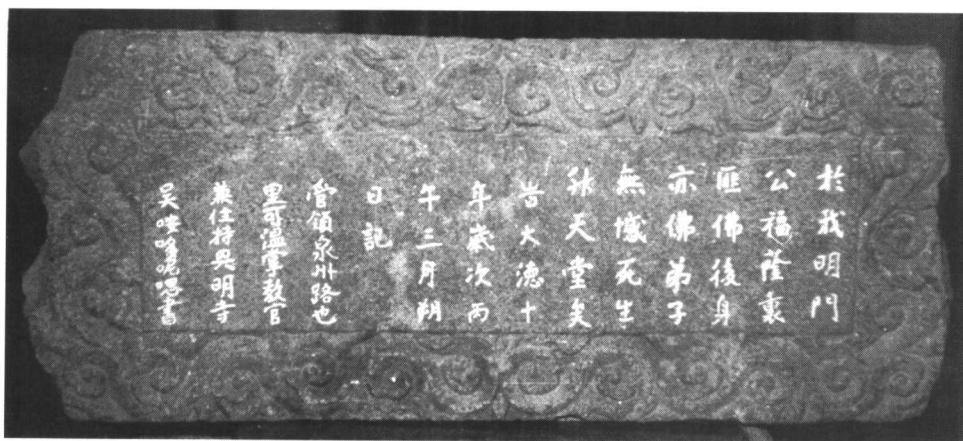


B 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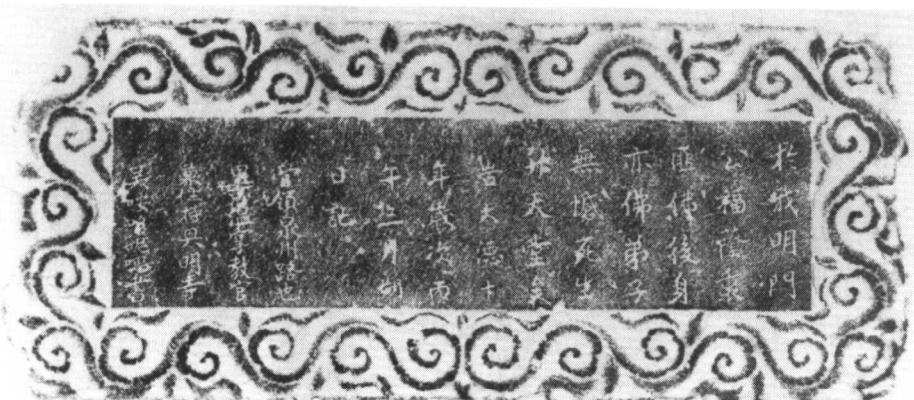
这是一方景教徒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主要石块。辉绿岩石雕成。块石的右侧大部缺失，左端有间柱，间柱雕刻重叠仰覆莲瓣。石面有条横向的阴线，把石面分作上、下两个部分。上部浮雕一位飘带飞天，手臂裸露，手上托一个盘，盘下垫以巾状物，盘中有一朵开放的莲花，莲花承托一个十字架。飞天头戴毡帽，帽顶有一个小十字架。墓石的下部残存阴刻二十一行叙利亚文字拼写的突厥语。墓碑残长42厘米、高23.5厘米。公元2002年，在泉州南郊的晋江市池店镇池店村发现。据云系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华侨建屋，从泉州购买城墙基础石作材料，因上刻有十字架和“佛”像而弃置不用。先存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2004年调运泉州市博物馆展出。

B 51 元代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兴明寺住持吴咬哆呢唎书须弥座祭坛式墓块石

墓碑系辉绿岩石雕成，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1984年11月，泉州华侨大学叶道义



B 51



B 51 拓片

同志在泉州涂门外津头埔村水渠闸门边发现。碑长 61 厘米、高 25 厘米、厚 10 厘米。碑面围绕 6 厘米宽的连续卷云纹浮雕图案，中刻长方形框，琢平，阴刻竖行汉字十四行，正文字径 2 厘米，碑文录下：

于我明门，公福荫里。匪佛后身，亦佛弟子。无憾死生，升天堂矣。时大德十年岁次丙午三月朔日记。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住持兴明寺吴咬哆呢嗯书。

从墓碑的铭文看，本碑明显是一座须弥座祭坛式石墓中的几方墓碑之最后一方，可惜前面的墓碑尚未发现，无以了解墓主的姓名、身份和生平。然而，此碑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元代泉州也里可温教的历史提供了极宝贵的原始材料。

墓碑的头六行汉字为对死者的“赞颂诗”，每两行为一句，共三句，句的末字押韵。则知诗的作者“吴咬哆呢嗯”是具有一般汉文诗词常识的，然从赞颂诗的内容看，则谈不上什么文采，尽是聂斯脱利教教义的宣传。

赞颂诗的“公福荫里”一句，句末的“里”字，为元朝典型的官方公文的语尾用字。“福荫里”则为蒙古官方文件开头的赞词。因此，疑碑文的撰书者“吴咬哆呢嗯”是谙于汉文字的回鹘人或汪古部人。

汪古部有部分名人的先世是西域回鹘人，如汪古部的马氏家族^①。汪古部在十二世纪接受中亚传入的景教，且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蒙古人称之为“汉人”。二十年代，山东济南邮务长聂克逊(F. A. Nixon)在内蒙古包头一带和华北，收集两千多枚汪古部也里可温教徒使用的青铜十字徽章^②。汪古部使用的文字较复杂，比如 20 世纪 30 年代所发现的汪古部聂斯脱利基督教徒墓铭文^③，和新中国成立后发现的丰州万部华严经塔的题记^④，其中就有汉文字、八思巴文字、回鹘文字，以及八思巴字拼写汉语，叙利亚语，叙利亚字拼写突厥语等。夏鼐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碑》一文里，考证墓碑主人“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的失里门(Šilemun)主教是汪古部人，该墓碑是用叙利亚字拼写突厥语的，碑上也有两行汉文^⑤。远在中国东南部的泉州，近数十年来所发现的元代也里可温教徒遗留的墓碑，碑上的铭文，一如上述汪古部人遗物。据此，则知元代泉州的也里可温教徒，有相当部分是来自汪古部的。

景教传入中国后，受佛教的影响很大，无论从经文的字句，以及名词，乃至日常用语，大都仿效佛教经典及佛教通用名词。如西安的《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称景教教堂为“寺”；称景教主教曰“僧”或“大德”。1907 年，英国人斯坦因到西域考古，在敦煌千佛洞发现的景教《序听迷诗所经》中，亦发现景教对崇拜的神称“佛”，如“人急之时每称佛名”、“众生理佛不远”、“圣上宫殿于诸佛求得”等。

延至元朝，也里可温教徒对崇拜的神仍称“佛”，如本碑的赞颂诗句“匪佛后身，亦佛弟

① 元《遗山先生集》卷二十七，《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光绪七年重镌本。

② 明义士(James. M. Menzies)：《汇印聂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序》，载《齐鲁大学季刊》，第 3、5 合期，1934 年。

③ 《华裔学志》第 3 期，第 232~250 页，1938 年出版。又见第 4 期，第 305~308 页，1939 年出版。

④ 《文物》1977 年第 5 期，第 59~60 页。

⑤ 《考古》1981 年第 1 期，第 59~62 页。

子”。元朝的官方文件也称也里可温教徒崇拜的神为“佛”，《元史·文宗本纪》云，“天历元年九月……又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御殿作佛事”^①。

元朝的也里可温教袭用释家词语的现象，还从泉州发现的其他也里可温碑中窥见。《泉州宗教石刻》图 110，是一方聂斯脱利教徒墓碑，上阴刻“大德黄公 年玖拾叁”；同书，补图 18，亦是一方聂派墓碑，阴刻“侍者长 柯存诚”^②。“大德”、“侍者”均为佛教名词。本碑的吴咬哆呢恩是“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兼兴明寺住持”，“住持”一语也是佛教词语，即总持事务之僧。

关于碑文中的“也里可温掌教官”的职属问题。元朝设司掌领也里可温教甚迟，据《元史·百官志》记，至元二十六年（公元 1281 年），置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③。《元典章》记，大德八年（公元 1304 年），“温州路有也里可温，创立掌教司衙门，招收民户，充本教户计”，侵犯了道教的利益，引起诉讼。为此，礼部判文云，“江南自前至今，止有僧、道二教，各令管领，别无也里可温教门”。则知江南也里可温教为新教门，故礼部规定“随朝庆贺班次，和尚先生祝赞之后，方至也里可温人等”^④。

江南也里可温教为后起教门既明，其发展之迅速值得注意。至顺《镇江府志》记镇江一地有七座寺。此外，杭州、扬州也有也里可温教寺。泉州发现的逝于皇庆二年（公元 1313 年）的“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等”的宗教高级官员失里门主教，则是崇福司掌领下的高级属官。本碑文的撰者吴咬哆呢恩，则是“管领泉州路也里可温掌教官”，是为地方路、州的宗教官员，并兼有宗教职务，“住持兴明寺”。

此外，关于本碑文的撰者吴咬哆呢恩属何教派的问题。“吴”为汉姓，咬哆呢恩即汉语安东尼思，也即拉丁语 Antonius。陈垣《西域人华化考》曾列举回鹘人、汪古部人华化取汉姓的事例。

西安《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叙利亚文人名表中有 Adam，即拉丁语 Adamus。此外，还有“瑜罕难”即“约翰”；“卢伽”即“路加”；“明泰”即“马太”；“牟世”即“摩西”；“多惠”即“大卫”；“宝路”即“保罗”^⑤。此等皆为西方天主教人名。

1294 年，受罗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派遣，孟德高维奴到北京布教。迟至 1313 年，孟德高维奴在罗马教皇的帮助下，在福建刺桐（泉州）添设一个主教区，日辣多为第一任主教。延至 1326 年，泉州有三座天主教教堂，这皆见诸外国载籍。这些教堂有一座是亚美尼亚一位富有妇人所建，另一座为意大利人安德肋·佩鲁亚斯主教所建^⑥。至今未发现元代泉州天主教对聂斯脱利教派施加影响的痕迹，故吴咬哆呢恩主教不是西方人，亦不属圣方济各会派。

泉州发现的聂斯脱利教派石碑多于罗马天主教石碑，但泉州聂派有几座教寺，并未被中外史籍记载。幸得吴咬哆呢恩碑，证明元代大德十年（公元 1306 年），泉州曾经有一座聂斯脱利教教堂，称兴明寺，它填补了这段历史的空白。本碑又是泉州发现的有纪年的年代最早的古基督教墓碑。

① 《元史》卷三十二，本纪第三十二，文宗一，1976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② 吴文良《泉州宗教石刻》第 47 页，图 110。又第 93 页、补图 18。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

③ 《元史》卷八十九，志第三十九，百官五，崇福司。

④ 《元典章》礼部卷六，典章三十三，也里可温。

⑤ 明义士《马可孛罗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载《齐鲁大学季刊》第 3、5 合期，第 176 页。

⑥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第二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元时基督教在中国之状况》，1930 年，辅仁大学出版。

B 52 须弥座式石墓

B 52. 1

这座断裂的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发现于泉州市区中山中路 235 号顾珀（明嘉靖间泉州著名文人）故宅，B 13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也发现于此。石墓长 194 厘米、高 40 厘米。底层刻如意状六足，二层浮刻覆莲瓣，三层刻凹框，未刻文字或花纹。辉绿岩石雕成。在顾珀故宅的庭院里，还发现一方辉绿岩石雕成的须弥座式石墓的残件，很可能是同一座石墓的另一残件。

B 53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墓石已残断。残长 72 厘米，高 1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中浮雕一位有翼飞使，双手捧“圣物”，展翅疾飞云际。飞使耳长垂肩，飘带飞舞，头戴冠帽类似中国古代的官帽，冠顶有一个小十字架，犹如后世所见天主教主教所戴。“圣物”自下而上，由巾状物、托盘、元宝状物和十字架等组成。飞使的前后有浮雕的密云上涌。此碑是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第四层墓石。1961 年，获于泉州开元寺水陆寺地下。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52. 2 石墓另一残件



B 53

B 54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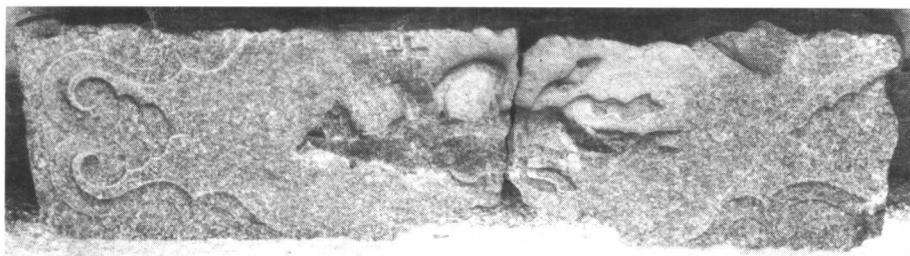
碑残长 51 厘米、高 1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它是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第三层或第四层的石刻。石刻已残断。墓石右端浮刻卷云，其左侧浮雕一位羽翼飞使（但飞天的头部已被琢去），头上有一个小十字架，两手捧着“圣物”。“圣物”自下而上由巾状物、盘、仰莲花和十字架组成。1945 年，在泉州北门城基距地面 2.5 米深处掘获。在同地还掘出一方叙利亚文字的石刻和三块外国人石墓上常见的莲瓣图案石刻。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54

B 55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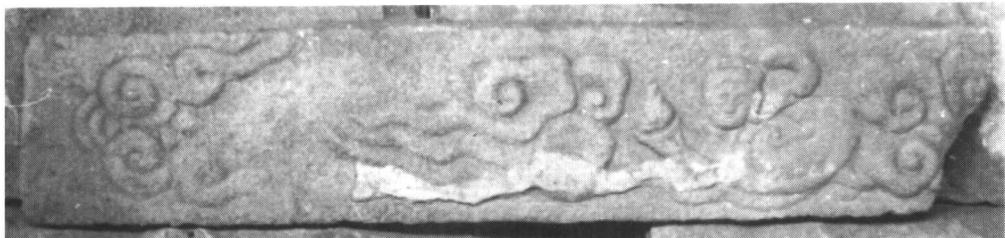
墓石残长 80 厘米、高 22.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碑已断裂为左右两块。石面的两端浮刻



B 55

中国式的如意头图案，中间浮雕一飘带飞使，双手捧着“圣物”，飞使头上还浮刻一个十字架。1949年发现于泉州东门城基。1955年9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B 56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B 56

这是一方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石。墓石的右端已断残，残长69厘米，高12.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面的左端雕刻如意状图案，中间在两片云朵中浮雕一位飘带飞使。1942年，在泉州东门城基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57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B 57

这是一条中间已断裂的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的顶石，残长92厘米，高26.7厘米，底宽30.3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墓顶石的两侧面都刻有连续传枝的图案花纹。石的尖拱形前端，浮刻一个十字架，下面还有一朵浮雕的莲花，十字架交叉处刻一颗珠。1940年，在拆卸泉州东门城时获得。就石刻发现的地点及十字架的雕刻形式看来，它很可能是一方元代圣方

泉州宗教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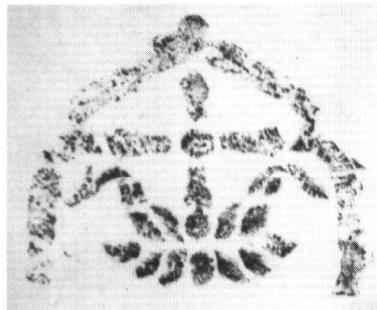
济各教派的墓顶石。1955年8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B 58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与上图同，也是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原长135厘米，但后半部已断残。墓顶石正面作尖拱形，高20厘米，底宽24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它的尖拱下十字架的四端作剑锋形，下面浮雕一朵莲花，有两片叶左右衬托，墓顶石的两侧浮雕云朵。1947年，在泉州东门城楼基址内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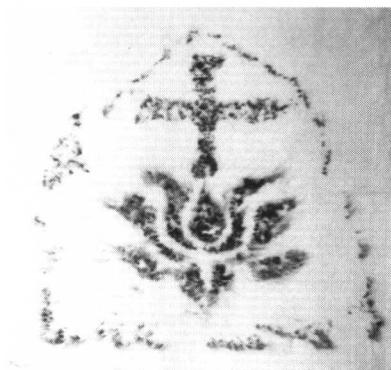
B 58 正面拓片

B 59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石残长63厘米、高24厘米、底宽27厘米。白花岗石琢成。正面作尖拱形，尖拱下浮雕一朵莲花，莲花上面竖立一个十字架。1949年，在泉州北门城基内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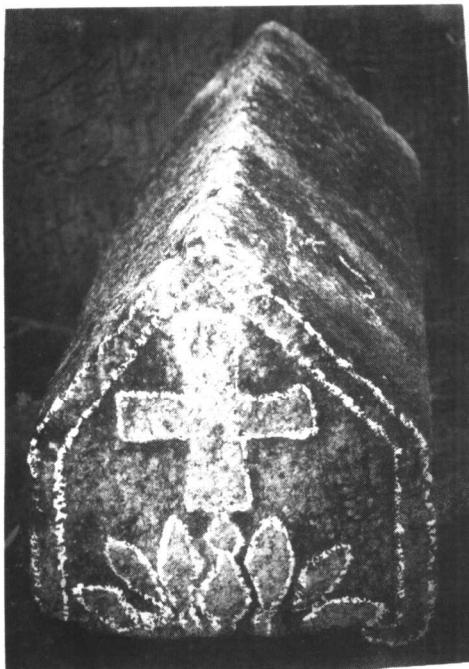
B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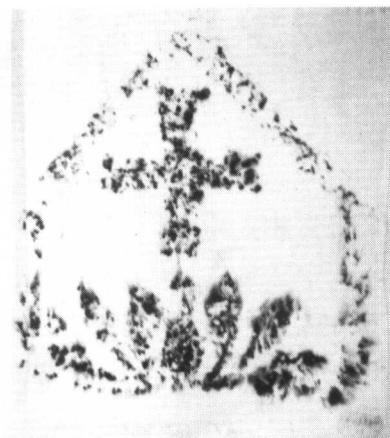
B 59 拓片

B 60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石残长 55.5 厘米、高 28 厘米、底宽 25.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正面作尖顶，尖顶下浮雕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雕工简陋，石质粗糙。1950 年，在泉州北门城基内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60



B 60 拓片



B 61

B 61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墓顶石长 58.5 厘米、高 20.5 厘米、底宽 20.5 厘米。白花岗石琢成。石质粗糙。正面作尖拱形，未雕边框。尖拱下浮刻十字架及莲花。1936 年，在拆卸泉州北门城时获得。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62

B 62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这是一方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正面作尖拱形。正面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上的十字架已模糊。底宽 20 厘米，高 1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这方墓顶石，比一般的为小，可能是孩童石墓上的墓顶石。1943 年，北门城垣附近虎头山农民筑厕所时掘获。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63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完整的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墓高 1 米余，分五层。由下向上，第一至第四层是用一块完整的白花岗石雕成，第五层为墓顶石，已断为二截，坠落在离石墓不远的地方。为拍摄照片，把它们抬上石墓，重新拼合。1939 年，发现于泉州东门外色姓坟地（俗名色厝美）。



B 63

1944 年遭到破坏。现在那里仍存留着不完整的白石墓三座。1945 年，乡民在该处开垦荒地时，将其埋没在地下了，但遗迹仍可寻觅。

B 64 须弥座式石墓

这是一座古代基督教徒的须弥座式石墓，墓顶石已遗失。它的形制及雕刻方法，以及各层的花纹，多与伊斯兰教的石墓相同。不同的只是墓的第四层不刻阿拉伯文字，且石墓中心不凿空。我们所谓的“墓顶石”，就是安置在这种石墓上面作为最上层的构件。



B 64

B 65 德济门瓮城基础中的建筑石柱



B 65

泉州宗教石刻

本图有近四十根圆形石柱,有的石柱上还凿有榫孔,石柱直径自 30 多至 40 多厘米不等。这么多的宗教建筑石柱被集中填埋于泉州南门城德济门月城(即瓮城)东南角基础,这种现象在泉州还是首次发现。据推测,可能是明初增筑德济门月城时,把元末、明初战乱中被毁的外国人宗教寺庙建筑构件,作为建城基础材料而埋入地下。1984 年,泉州城东北角最后一段城墙(今泉州城基路泉州师范学院旁)拆除,在城基础也出土一大批(大约 30 多根)白花岗石圆柱,直径都在 40 多厘米,长度有的达 4 米以上,这些可能都是外国人宗教寺庙的建筑构件,于明初筑城时被埋入城基础的。

B 66 德济门瓮城东侧基础中的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2001 年,泉州南门天后宫(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前开辟广场,在拆除民居平整土地时,发现古代泉州南门城德济门遗址。9 月,经福建省博物院考古队发掘清理,发现城门遗址进深 14.10 米,分前后二门道,最宽 4.10 米。门道路面用长条形、方形及不规则形石板铺墁。门道跨内濠沟处铺架大石条,长 4.15~4.45 米,宽 0.28~0.58 米,厚 0.38~0.47 米。门道路面均凿有防滑凹槽。残存的城门建筑南北长 36.50 米、东西宽 49.10 米。城墙内外皆砌石,城基宽 4.80 米、残高 0.5~1 米。其月城(即瓮城)呈半月状,外侧东西长 41.10~43.60 米、南北宽 22.4,基宽 4.20~4.40 米。月城外有环城濠沟。月城门开在西侧,进深 5.60 米,设有前后二门道,最宽 3.10 米^①。

此外,遗址还出土不少修城砖、陶瓷标本、瓦等,及 13~14 世纪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佛教的石刻,以及 14~19 世纪的铁炮。

据史载,11 世纪时德济门外“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②。13 世纪时太守游九功沿晋江增筑翼城以为蔽^③。13 世纪中期,著名诗人刘克庄盛赞德济门内外商业盛况是:

闽人务本亦知书,
若不耕樵必业儒。
唯有桐城南廓外,
朝为原宪暮陶朱。^④

1352 年,监郡偰玉立拓南罗城接沿江翼城,改镇南门为德济门。元末,泉州发生“亦思巴奚”兵战乱十年,外国人宗教寺庙、坟墓大都被毁坏。明洪武初年,德济门城墙如同泉州全部城墙一样增高、加厚,并增筑月城(即瓮城),德济门城亘“增高五尺、基广俱二丈四尺,内外皆砌以石”^⑤。因此,在战乱中毁坏的外国人宗教寺庙和坟墓的建筑构件,被利用作为城墙基础石而被埋入地下。

B66. 1 照片上可见三方古基督教墓顶石。其左侧的一方(亦即 B66. 2 照片上左侧一方)

① 《泉州德济门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福建省博物院、泉州市文化局,2002 年。

② 宋晁公遡《鸡肋集》卷六十二,行状,朝散郎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官杜(纯)公行状。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翼城。

④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十二,诗。

⑤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罗城。

正面(见 B66. 3)浮刻尖拱形边框,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两侧各有叶片陪衬,花上承托一个剑形叶片的十字架。墓顶石系白花岗岩石雕成。石长 160 厘米,底宽 30 厘米,高 26 厘米,比一般墓顶石长 10 多厘米,可见这座须弥座式石墓的体量较大。

该墓顶石的奇特之处,在于其背面竟然浮刻伊斯兰教的标志“云月”(见本书 A 261)。这样,在同一方墓顶石上刻有两种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标志,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关于这方石刻,泉州文物研究中心唐宏杰先生在《泉州德济门出土宗教石刻浅析》一文,提出这“两种宗教图案共存的墓顶石可能属于一座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合葬墓”,又云“在宋元时期的泉州,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某种形式的融合是真实存在的”。最后下结论:这“是宋元时期泉州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通婚的确凿见证,他们死后亦一块合葬于泉州”^①。



B 66. 1



B 66.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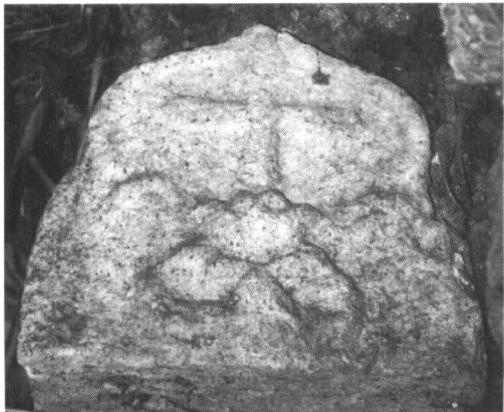
^① 唐宏杰《泉州德济门遗址出土宗教石刻浅析》,载《海交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中国海外交通史研究会、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合编。



B 66.3



B 66.4



B 66.5

据《多桑蒙古史》记，“忽必烈从皇后察必可敦言，信奉佛教”，“然对于基督教、回教、犹太教悉皆尊重。基督教徒举行大祭之日，忽必烈召之至，焚香后，亲吻其福音书。曾云：诸国所崇拜之大预言人有四，曰耶稣基督、曰摩诃末、曰摩西、曰释迦牟尼瞿檀，彼皆礼之，而求天佑”。此外，忽必烈还“笃信星术，汗八里城中豢养有星者或卜人约五千人，基督教人、回教人、中国人皆有之”^①。这表明蒙元统治者对各门宗教并无歧见，在他们眼里各门宗教的矛盾都不存在，所以“彼皆礼之，以求天佑”。

旭烈兀自灭报达（今巴格达）后，即其地建立伊儿汗国、奇卜察克汗国和察哈台汗国。其伊儿汗国辖有波斯全境，其西取道阿拉伯可通非洲，其西北取道叙利亚可通欧洲。旭烈兀诸子孙践汗位者，与欧洲、非洲之交通事例最多，且诸子孙亦有欧、亚通婚和回、耶通婚之事例，甚至有人既崇耶又奉回的事例。

旭烈兀灭回教，礼耶教；其子阿八哈娶东罗马王之女马利亚，以兵击埃及回教王比拔尔斯以援助十字军；阿八哈之子阿鲁浑崇耶教废回教；阿八哈之弟台古塔尔曾受耶教洗礼，名尼古拉斯，后崇信回教；阿鲁浑之弟盖喀图崇回教；盖喀图从弟贝杜崇回教；阿鲁浑之子合赞娶小亚美尼亚王森巴德之女，改奉回教仍优礼耶教；合赞之弟合尔班答，娶东罗马王之女马利亚，并曾受洗礼入耶教，后改回教；合尔班答之子不赛因奉回教。

阿鲁浑两次通使西欧。第一次于1285年5月致书罗马教皇哈奴留司第四，要求与西欧基督教人合力攻埃及回教，且自言其祖母及母为基督教徒。其祖旭烈兀及父阿八哈，皆礼敬基督教人，彼自身亦颇从耶教。

由是观之，蒙古旭烈兀诸子孙有多人是回

① 冯承钧译、多桑著《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四章，第482～485页，193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耶通婚和回耶兼奉的，而且上行下效。他们这种行为从宗教角度上看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都发生在蒙元统治者身上。从这一点上看，泉州首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标志共存于一方墓顶石上，就不足为奇了。据此，我更认为此墓顶石的墓主，他是一位生前信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蒙古人。从须弥座式石墓的规制看，一座石墓只葬一个人，不可能葬两人。所以本墓顶石的两种宗教徒的夫妻合葬的可能性可以排除。泉州也发现过伊斯兰教夫妻“合葬”（见本书 A 72“黄公墓百氏坟”的事例，但它必须是两座并列的须弥座式石墓，而不是合于一圹之中或两圹一石墓。

至于本墓顶石的发现，是否证实“宋元时期的泉州，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某种形式的融合”呢？答案是否定的。蒙古人的个人既信仰基督教，又信仰伊斯兰教是个人行为，或者说是“求天佑”的政治需要，说不上是两种宗教的融合。例如 B 37 失里门主教的墓碑，墓主既是基督教的僧官，又是管摩尼教的僧官，但我们不能据此墓得出元代基督教与摩尼教“有某种形式融合”的结论。又如我们不能依据 B 39 的“大德黄公”、B 40 的“侍者长”、B 51 的“匪佛后身，亦佛弟子”等景教碑里的佛教词语，而断定景教与佛教有“某种形式的融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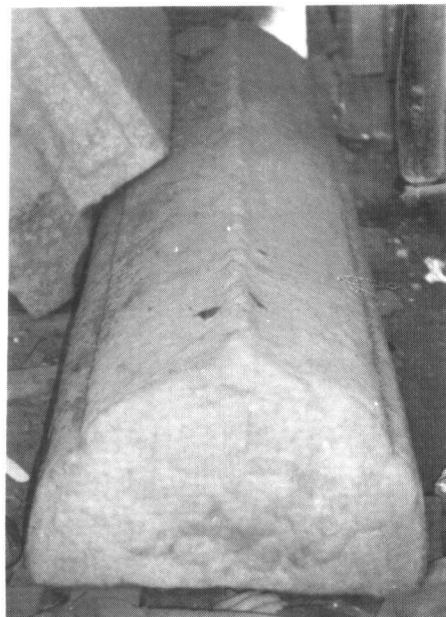
蒙元统治者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兼奉的态度，与宋、元时期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多元文化的文明，与对各门外来宗教采取宽容、兼收并蓄、“各美其美”的态度，有许多相通之处。所以，我们在研究宋、元泉州多元一体文化现象的时候，同时要注意到蒙元统治者建立地跨亚洲、欧洲大帝国这个大历史背景对泉州这个东南海港的影响。

B66. 4 是 B66. 1 照片上中间（亦即 B66. 2 照片上右侧）的一方墓顶石，白花岗岩雕成。长 148 厘米，底宽 31.3 厘米，高 24 厘米。正面雕刻尖拱形，浮刻一朵大莲花，两旁各有一叶片，莲花上承托着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叶片刻成剑形，十字架交叉处有一颗珠。

B66. 5 是 B66. 1 照片上右侧的一方墓顶石，白花岗岩石雕成。长 135.5 厘米，底宽 27 厘米，高 24 厘米。正面尖拱形边框内浮雕一朵莲花，莲花两旁各有一叶片，莲花上承托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叶片刻成剑形。

B 67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这是一方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墓顶石。石长 147 厘米、底宽 32 厘米、高 23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正面浮刻尖拱形边框，其中浮雕左、右两股涌云，上承托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叶片刻成剑形。1986 年在泉州东门外仁风街居民筑屋出土，现存泉州师范学院泉州学研究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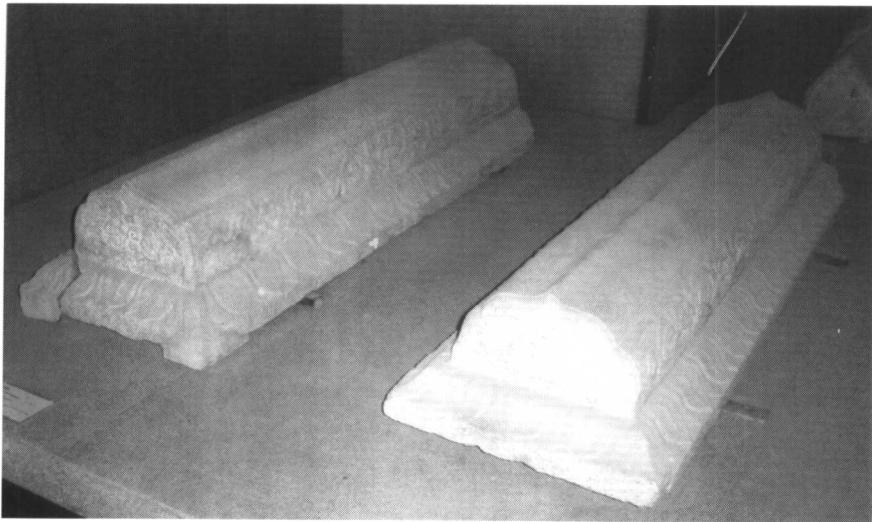


B 67

B 68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照片上是两座并列的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的第四层和第五层(墓顶石)。

右边一座,须弥座式石墓的第四、五两层,是用一块白花岗石雕成的。石长 168 厘米、底座宽 52 厘米、高 30 厘米(墓顶石长 1.49 厘米)。正面刻尖拱形,其下部浮刻左、右两股涌云,上承托剑形叶片的十字架。底座(第四层)浮刻覆莲瓣。墓顶石的两侧浮刻连续传枝图案花纹。



B 68

左边一座也是须弥座式石墓的第四、五两层,用一块白花岗石雕成。石长 165 厘米、高 28 厘米、底座宽 52 厘米(墓顶石长 1.48 厘米)。正面浮刻尖拱形,其下部浮刻左、右两股上涌的密云,上承托十字架,十字架叶片刻成剑形。墓顶石的两侧浮刻连续传枝图案花纹。浮雕覆莲瓣的第四层两端残缺。

1978 年 2 月,泉州城东门(仁风门)吊桥增建石桥券孔,在原护城河西岸(石砌岸)壁施工时发现这两方古基督教须弥座式石墓构件。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69 须弥座式石墓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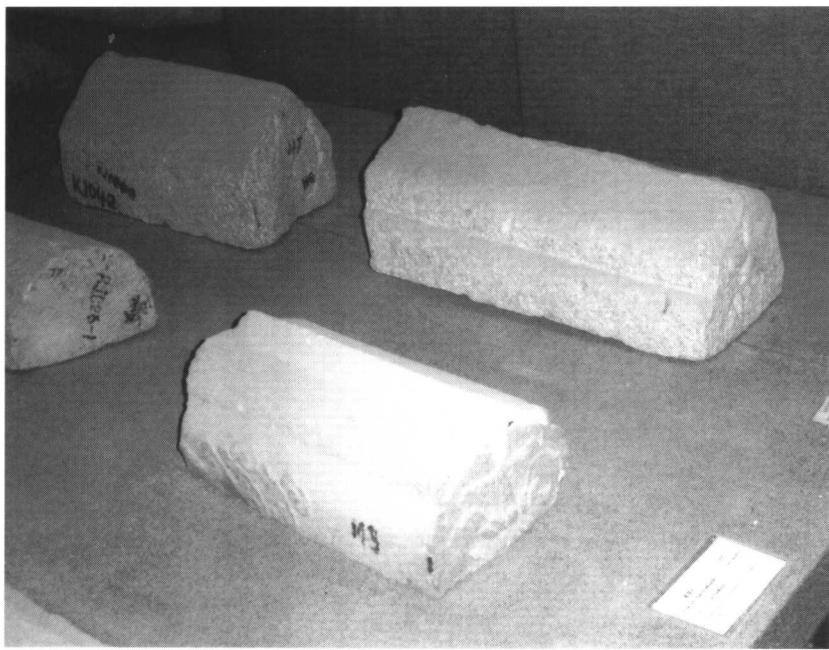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座古基督教徒须弥座式五层石墓的上面三层,第一、二层缺失。第三层素平;第四层作斜面,素平;第五层为墓顶石,正面刻成尖拱形,其浮刻“圣物”,由一朵莲花承托一个十字架,十字架叶片作剑形。这座石墓的三层由一块白花岗石雕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南草坪。



B 69

B 70 须弥座式墓墓顶石

照片前排左一为辉绿岩雕成的古基督教墓顶石,石的两侧浮刻密云,正面浮刻莲花、十字架;前排左二为白花岗石雕成的古基督教墓顶石,正面作尖拱状,浮雕莲花和十字架;后排左



B 70



B 71

一墓顶石雕作圆拱形，但正面已受损；后排左二墓顶石，正面雕成尖顶，正面的边框、十字架和莲花大部受损。后排两方古基督教墓顶石系白花岗石雕成。以上四方古基督教墓顶石残件，现均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B 71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墓石高 60 厘米、直径 48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圆柱形墓石顶部和底部稍圆，而非平面，圆柱正面浮刻一个剑形叶片的大十字架，十字架下浮雕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下还刻有花萼。圆柱右侧被凿两个洞，可能是后人为改作他用所为。这方巨大的圆柱形古基督教石刻，可能是宋代或元代景教徒的舍利塔形式的墓葬石刻构件。从石刻稍圆的顶部看，它可能是最上层的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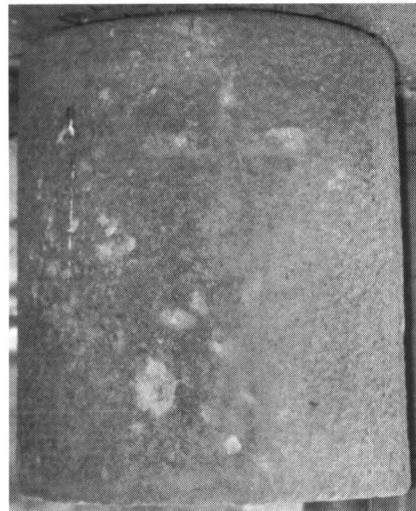
这一圆柱形景教徒舍利塔形式石墓构件，于 1996 年在泉州城东北郊赐恩山下后茂村（原地名后墓，后改名后茂）发现，其地距泉州城东北古城墙不足 400 米。后茂村是宋元时期泉州基督教徒的墓葬区，此前在这里已发现几方古基督教徒墓碑。这方圆柱形景教墓石，今仍保存在后茂村蔡姓居民家里。

B 72 圆柱形十字架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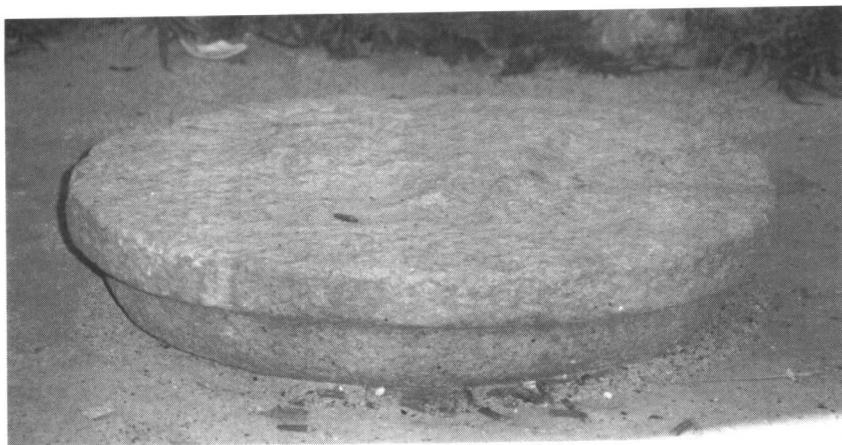
墓石高 60 厘米、直径 48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圆柱形墓石顶部稍圆。圆柱正面浮雕一个大十字架，十字架下浮刻一朵盛开的六瓣莲花。这方古基督教墓石与图 B 71，同属宋元时期景教徒的舍利塔形式石墓的构件。1996 年在泉州城东北郊赐恩山下后茂村发现，现存后茂村蔡姓居民家里。

B 73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墓石呈圆形，外直径 69 厘米，内直径 61 厘米，高 15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此巨大圆盘形石刻，与图 B 71、B 72 在同一地点发现，可能是古基督教舍利塔形式石墓的底座。现该石刻保存于后茂村蔡姓居民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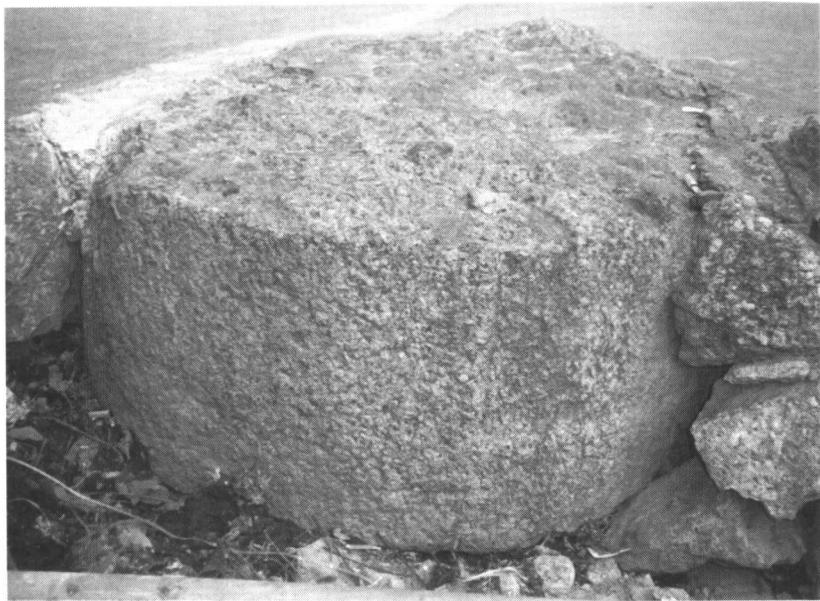
B 72



B 73

B 74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墓石直径 74.5 厘米、残高 38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石的上部被凿毁，右侧刻有凹入方 66 框，被砌于路旁水沟边。据石质和形制判断，可能是景教徒舍利塔形式石墓的墓顶石。此石砌于后茂村蔡姓居民家西南方向的水沟边，距蔡宅不足 30 米。



B 74

B 75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墓顶石已被从中间凿开,直径 74.5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从石质和尺寸看,有可能是图 B 74 的上部。墓石顶部雕刻两圈隆起,正中刻凹入圆孔。可能是宋元时期景教徒舍利塔形式石墓顶部的石构件。此石现在砌于后茂村蔡姓居民西南方 30 米处的水沟边。



B 75

B 76 古基督教石墓构件

圆柱形墓石,直径 50 厘米,残高 45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圆柱的正面下部浮雕对称的上涌云朵,云朵承托着一朵盛开的花朵。花朵上应该有十字架,但上部已被破坏。圆柱上部被削去一角,并且被凿空,改作舂米的石臼。现被弃置于后茂村蔡姓居民家西南方向 30 米处的水沟边。它可能是宋元时期景教徒舍利塔形式石墓的墓顶石。



B 76

二、附录

(一) 元代在泉州的基督教派别

中世纪时代，在中国的基督教派别，有聂斯脱利派(Nestorian Christians)及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Francicans Mission)。聂斯脱利派创于叙利亚人聂斯脱利(Nestorius)，他在公元431年任主教，但同时埃及又有一个教派叫西利尔派(Cyril)和聂派对抗。东罗马皇帝曾经召集两教派开过一个会议，打算给他们调解，就是有名的以弗所(Ephesus)会议，但终不成功，结果是禁止聂派传教。聂派受这一打击，在西方就逐渐失去了力量。至公元489年，在叙利亚境内的聂派教会完全绝迹。此后，聂派教徒就纷纷向东方传教，其教徒多集中波斯境内，一时波斯成为聂派教会的根据地。唐初，聂派教徒由陆路东行传入中国，这就是当时的所谓景教。景教因其最早传入中国，所以他们在中国的教堂及教徒也最多。泉州自唐中世历五代至南宋，对外交通早就很发达。当时波斯商人很多到过泉州，于是聂派也随之到达泉州。在元代以前，这一教派在泉州还不很盛行，因而不为人们所注意。至元代，泉州的聂派渐渐兴盛起来。泉州的景教，除了自波斯由海路传入外，最近由于地下出土的景教碑刻上的叙利亚文字不断地被翻译出来，因此我们又发现，在元代泉州的景教还有另一路，是由陆路传入的。这些陆路来的景教徒多是突厥人，他们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随蒙古军南下，一直到南方的大港泉州。他们卒葬泉州，墓碑石上有的刻叙利亚文拼写的突厥语，有的用叙利亚文字拼写中部亚洲未被认识的方言，有的则直接用回鹘文字刻于墓碑上。当时泉州曾成为景教徒集中的中心地区，蒙古贵族有很多崇信景教的。蒙古人称景教为也里可温，其后凡基督教徒及教士、主教也都被称为也里可温了。据《元史》载：“天历元年，命也里可温于显懿庄圣皇后神殿作佛事”^①，可知这里的也里可温已成为基督教僧侣或主教的通称了。又如在泉州通淮门外所获的皇庆二年碑碣，也刻有“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也里可温……”，可知这里的也里可温也就是景教的名称了。

圣方济各教派，大约是元朝中期才传入中国的，这一教派首先在北京传教，以后渐次及于中国南部的泉州。1313年，在刺桐(泉州)添设一个主教区，日辣多为第一任主教，有阿美尼亚妇人建的大圣堂一座^②。1322年，意籍圣方济各会士和德里(Odoric)从泉州登陆，遇到两座圣方济各会修院^③。1326年，泉州圣方济各会主教安德鲁又完成一座规模较大的圣堂^④。1347年，马黎诺里(Marignolli)到泉州，记叙泉州有圣方济各会教堂三所，教堂附近设有工厂及货

^① 见《元史》卷三十三，文宗本纪。

^② 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8~40页，万有文库本，193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③ 见《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38~40页。

^④ 同上。

栈一所^①。1946年,我们又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城基,发现用拉丁文刻写的圣方济各会派驻刺桐主教安德鲁的墓碑石。

过去中外史家都以为泉州在元代以前没有基督教。其理由以为《马可波罗游记》中记中国的事情很详细,在马氏所到的各个地方,凡看到有基督教教堂或教徒的就必有记载。但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这里讲刺桐(Zailuen)^②》的一章里,始终未言及泉州有基督教,因此说泉州在元以前没有基督教。但是,在英国人摩尔氏(A. C. Moule)所著的《155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一书中有如下的记载:

另一方十字架石刻,是在公元第八世纪,当福建省南部的刺桐城重建城墙时,在城墙的6英尺高处发现的。它很端正地被砌置在朝向东边的方面。……按照《西班牙多密尼根会的历史》(History of the Spanish Dominicans in China)一书中说:“许多教堂的残余建筑物被用于重建城垣,很多十字架石被砌在城墙上。泉州的禄蒸门是建于南唐保大时期(公元943~958年)^③”。

但是据《泉州府志》载,禄蒸门建于康熙二十年^④。根据以上记载,可知泉州在公元8世纪以前即有基督教的教堂之说是不可靠的,这可说明泉州在唐中叶,基督教就已经传入之说是错误的。

在本书所搜集的十字架石刻中,哪些是属于西方基督教派(圣方济各派),哪些是属于东方教派(景教派)呢?若仅从十字架的雕刻来分别它们,确是不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中间都有互相影响。我们初步认为:B1、2、3、4、5、6、7、8、9、10、11、12、16是属于西方的圣方济各教派。其余如B13、14、17、18、19、20、21、22、23、28、30、31、32、33、34、35、36、37、38、39、40、45、46、47、48、49、50、51、54等刻有天使莲花与十字架及叙利亚文字的石刻,多属于东方教派的景教,也就是蒙古人所谓的也里可温教了^⑤。B41、42、43、44刻有八思巴文字的十字架石刻,也属东方景教的范围,它们可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冒称汉姓或汉人的信奉景教的墓碑碣。至于那些墓顶石的十字架与莲花的雕刻,则东、西两个教派的雕刻艺术往往相同,很难分别其是属于哪一教派,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二) 未经拍摄的十字架石刻

1. 泉州南门天后宫前某烟店墙上,砌有一墓顶石的残段,白花岗石刻成,上面雕有莲花,

① 见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174页,辅仁大学丛书。

② 见张星烺译《马可波罗游记》第336~338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

③ 见摩尔《1550年前基督教在中国》(英文)Christians In China before the Year of 1550, by A. C. Moule. III. The Zaitun Crosses And other Relics. pp. 83~84. London, The Macmillan Co. 1930年。

④ 见《晋江县志》卷二,城池载:泉州子城建于“唐贞元以前,年代莫考,旧志误为唐天祐三年筑。今据欧阳詹北楼记改正”。又《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载:泉州子城,“周围三里百六十步,为门四,东曰行春,西曰肃清,南曰崇阳,北曰泉山”。又载:崇阳则直位于正南,“康熙二十年提督杨捷重建崇阳门楼,改门曰丽正,楼曰禄蒸”。所以禄蒸门即崇阳门,俗称南鼓楼。

⑤ 见约翰·福斯特《刺桐城墙的十字架》(英文)Crosses from the walls of Zaitun. p. 20. by John Foster.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花上有十字架。此石是十多年前南门城拆卸时,由城墙内掘出的,后与普通石块混在一起而被砌在墙上。

2. 泉州东街相公巷一家住宅厅后地上,铺有一方白花岗石,高、宽各 62 厘米左右,中央浮雕一个十字架,十字架的形式与 B57 同。是一方由泉州北门城墙上掘出来的十字架石刻。

3. 泉州北门街都督第巷口路上,铺着一块残断的十字架碑石。十字架的形状很大,十字架的正中刻有一个圆圈,十字架各端作剑尖形,但已残破,仅存四分之三。它也是由拆北门城楼时所掘获的,后铺在巷口路上。

4. 泉州东街蔡巷中心小学后门石墙上,砌有一方残断的辉绿岩石,石上雕两位天使合扶一个三角形的“圣物”,其上竖立一个十字架,天使的帽上各刻有较小的十字架,雕工精细,但已残断。这是最近小学修筑校墙时,在挖东门城垣础石时所获,后砌在学校墙上的。

5. 泉州南大街吴祝三医局宅地的围墙基上,也砌有一块残断的墓顶石,白花岗石琢成,在石的前端圆拱下,浮雕一个十字架竖立在一朵莲花上。此石是在 1930 年掘地筑围墙时出土的。

6. 泉州东门外仁风街旁边有条宽约 3 米多的水沟,两旁都筑以石块。在石块的最下层,我们发现一连六座的基督教徒大白石墓,很完整,从第一级至第四级都刻有图案花纹。它们同被填在沟底,作为基础石。其中夹着一条墓顶石,前端刻着一个小小的天使,手上捧着一个十字架。它和这六座大石墓同被浸在水底。1955 年因天旱水涸,始被发现,现在又被浸在水底了。

我们所发现和搜集到的泉州古十字架石刻,到现在为止,就有七十多方,至于已经被破坏了的或尚埋在地下未被发现的,一定还有不少,由此可以看出古时泉州基督教兴盛情况的一斑了。

(三) 关于元代泉州安德肋所建天主教堂的遗址问题

关于中世纪泉州安德肋建筑的基督教堂的遗址问题,也须一述。因为这是多年来历史家所注意的问题。在我们所获及所发现的十字架碑刻及石墓,多得之于泉州城的东隅和北隅,特别是在城垣的东隅与北隅交界处所得最多。色厝尾这个坟地,很可能就是元代基督教圣方济各会主教在城外所建的教堂遗址。其理由如下:

1. 公元 1326 年正月,驻泉州意大利籍主教安德肋·贝鲁亚(Andrew of Perugia)致其本国僧正瓦尔敦的遗书中说:

余乃于附近小林中建美丽教堂一所。堂距东城仅四分之一英里而已。^①

我们若以今日色厝尾坟地所处的地点看,其距城的远近正与安德肋·贝鲁亚信中所说的符合。

2. 我们所获的十字架碑石,多在东隅与北隅交界处,色厝尾的位置,恰好就在这一个地点。而且我们所发现的两座刻有十字架的墓顶石的须弥座式石墓,也是呈露在这个地方。

^① 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 174 页。1930 年,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

3. 1943年,我为家人在色厝尾营造墓圹,在掘地时,曾出现一层铺地的青砖,及零星石板。询之该乡民,据说此地本为古时大厝(大厦),后因“犯罪”,被明朝官兵进剿拆毁,所以变为坟地。他们在这一地点种园掘地时,也经常掘到砖石这一类的建筑物。

4. 色厝尾的北隅,20世纪50年代还一直是泉州天主教徒的墓葬地。今日泉州天主教徒还把这一地方叫做“圣山”。

以上乡民所说的“古时大厝”被毁,我们推测可能是指元末明初的排外事件及反蒲之役。据侨居在泉州的天主教传教士西班牙籍任道远(Sarspin Moya)说:泉州在宋、元时代的基督教徒常和伊斯兰教徒混葬在一起,并引色厝尾的南北隅墓地为证。又说:几十年前,有一个名叫阿耐司(Arnaiz)的传教士,在灵山圣墓捡获一方刻有十字架与阿拉伯文字的石刻残段,因而说中世纪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曾经混合过,故其墓葬也可能合葬在一起。甚至说圣墓就是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徒合葬的坟地。有不少人为此说所影响。但据我们二十多年来的观察,实际情形并不如此。阿耐司在圣墓所获的所谓十字架阿拉伯文字残石,或者是一方叙利亚字石刻残石,当然不能就据此以立论。查伊斯兰教与基督教,自来即居于对立地位,其教既不可能混合,教徒死后也不可能混葬在一起。安德肋遗书中明白说:

萨拉森(阿拉伯)人改信吾教者,至今无一人。

然偶像教徒来受洗礼者,前后甚众。……然萨拉森人至今仍无一人弃其谬教,而改信正宗者。^①

这段引文,足以说明在元代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未曾混合过。在元代,它们不但未曾混合过,而且居留泉州的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还一直是互相仇视的。今试引当时马黎诺里(Marginolli)《奉使东方录》中的一段记载,就可知道。

中国疆土广大,……国中有大城三万,又有一城名刺桐,是大商港,面积广阔,人口众多。我教在此有教堂三所,财产富厚,又建浴室及栈房各一所,以存储商人往来货物。又有两口钟,为我在该城所命铸者,铸成举礼,悬挂于萨拉森人的居留地之中央……^②

马黎诺里为基督教传教士,他明知伊斯兰教徒最恶钟声,意欲触怒伊斯兰教徒,故特意把钟悬于其居留地之中央,以引起伊斯兰教徒之恶感。这便说明中世纪伊斯兰教徒与基督教徒确未曾混合过,其遗骸更决无合葬在一地的可能。色厝尾南北墓地,在当时必有树林或房屋障隔,其后房屋毁塌,树林砍伐,故已打成一片。这是以后的事,自不能以今日情况来看昔日。至于城中的基督教教堂遗址,在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的《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一节中已有著述,今不再赘。

① 转引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134页,1930年,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

② 转引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古仪中国与欧洲之交通》,第174页,1930年,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

第三部分 泉州古摩尼教(明教)

一、泉州古摩尼教石刻

C 1 晋江华表山元代草庵摩尼教遗址

图中间三开间石构翘脊寺庙为草庵寺，左侧有走廊，右侧的二层建筑为僧舍。草庵寺右侧廊沿悬挂一个大铁磬，前有一座焚帛炉。草庵寺前崖下的树丛中直立的六根大石柱，就是龙泉岩倒塌后的遗物。图中左侧崖下为进入草庵寺的石路。草庵寺位于泉州市区南部 23.7 公里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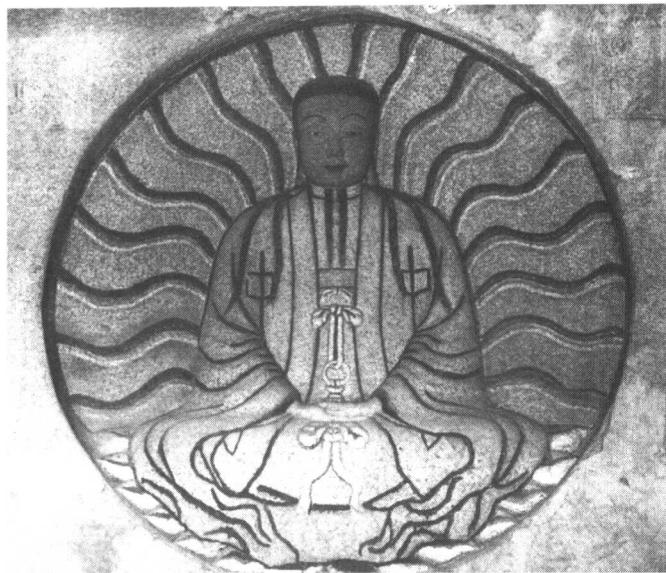
C 1

C 2 晋江华表山元代草庵石雕摩尼佛像

草庵寺内摩尼光佛造像浮雕于崖壁上，造像散发披肩，面相圆润，下巴有两道长须，身穿宽袖衣裳。两手重叠，掌心向上，趺坐。像高 154 厘米，像后有佛光，佛光直径 168 厘米。



C 2.1 草庵内景



C 2.2 草庵内之摩尼光佛

C 3 晋江华表山草庵明代崖刻

距草庵前约 20 米处，有一块巨大岩石，石上刻横书“劝念”二字，其下直书四行，为：

清净光明
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
摩尼光佛。



C 3 草庵摩尼教信条崖刻

落款：“正统己丑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信条正文十六个大字字径约30厘米。摩崖下系草庵信众的骨灰瓮，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此岩石被凿毁，今已无存。

C 4 晋江华表山草庵元代碑记

摩崖碑记刻于摩尼佛像头部的左右两侧，碑记各高29厘米、宽各22厘米。因碑记面积小，字径小，又刻字较模糊，所以出现两种拓本。一为20世纪60年代初泉州市文管会辜恩来先生（制拓片专业人员）亲手操作的拓片；一为21世纪初年晋江市博物馆粘良图先生亲手操作的拓片。以上两位先生制作的拓片文字内容稍有出入，为慎重起见，两幅拓片一起刊用，以作研究时备用。录文如下。

20世纪60年代初拓片（C4.1）：



C 4. 1

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润四学世生界者。

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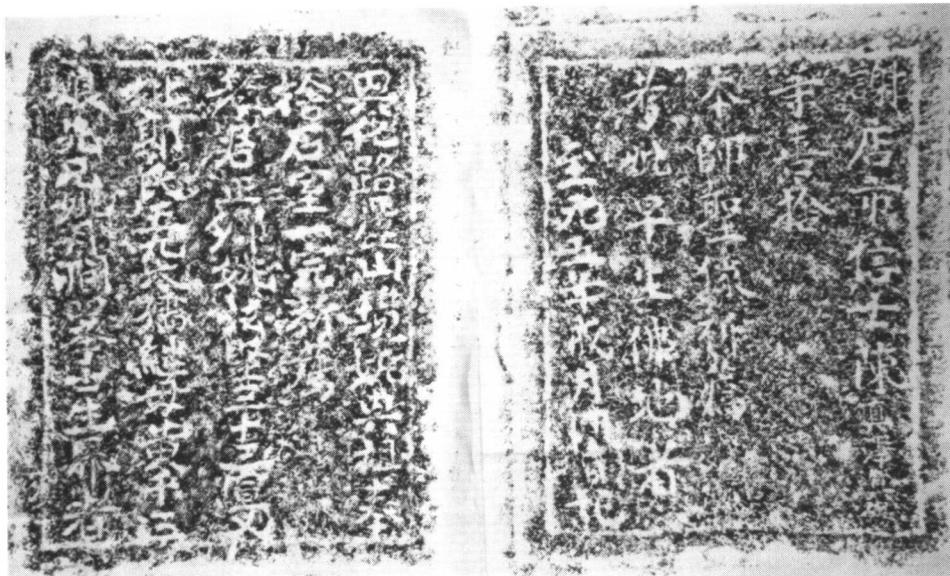
至元五年戊月四日记。

21世纪初拓片（C4.2）：

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等，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

至元五年戊月四日记。

兴化路丽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考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千三娘、先兄姚月润四学世生界者。



C 4.2

二、附录

泉州晋江华表山元代草庵及摩尼教的研究

草庵在晋江西南部，距泉州城区 23.7 公里处的华表山上。山因双峰耸立如华表故名，俗名石刀山。庵建于元代，规模不大，有楼阁僧舍，全部以花岗石砌成。庵中正厅奉祀摩尼光佛一尊，高 154 厘米。佛趺坐，发披肩上，下巴有两道长须，背后有佛光，其直径为 168 厘米。佛像白花岗石刻成，外妆金身。在摩尼光佛石像圆龛的上方左右两侧，分别砌有小型石碑记，碑高各 29 厘米、宽各 22 厘米。

右边石碑，阴刻汉字五行，共五十二字。内容是：

兴化路罗山境，姚兴祖奉舍石室一完，祈荐先君正卿姚汝坚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继母黄十三娘、先兄姚月润四学世生界者。

左边石碑，阴刻汉字五行，计三十四字。内容是：

谢店市信士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祈荐考妣早生佛地者。

至元五年戊月四日记。

在草庵前约 20 米地方，有一块自然大岩石壁立于此，石上勒着十多个大字，字径约 30 多厘米，正书。内容是：

劝念

清净光明

大力智慧

无上至真

摩尼光佛。

落款是：“正统己丑年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书立”。

庵旁有泉，其后有石级直达山巅。下有玉泉岩，旁有华表亭，今已废，仅存柱础石而已。庵下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时所植。但照我们观察，它们仍是明时遗物。根据以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所谓“草庵”就是摩尼教所在地。庵中正厅所奉祀的为摩尼光佛。但泉州佛门居士及一些寺僧和地方人士皆言：华表山的草庵摩尼光佛，是释迦牟尼佛的讹称。我们的看法是：

1. 释迦牟尼佛在每一位佛教徒的印象中是非常深刻的，决不至于将“牟尼”误写为“摩尼”。

2. 从佛像的雕塑看，也和释迦牟尼佛的造像大不相同。释迦造像多雕塑成慈眼低垂，鼻梁高畅，双颊圆润，且头上有肉髻、螺发，无长发披垂，唇上可有髭，而下頰无须。今日在草庵所见的摩尼佛造像，无肉髻、螺发，而长发披于两肩，且有须髯长垂至胸际。其背后的光轮，也和释迦牟尼佛背后的佛焰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

3. 凡佛寺所在地，其刻石往往刻有劝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等句子，从未见有劝念：“清净光明”等句的。查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①一文，在论及摩尼对其信徒定下的信条时，引 A. V. W. Jackson(约克逊)^②文章的一段，现录于下：

信四大尊严，就是神，神的光明，神的威力，及神的智慧。神的名字是荣耀的，他是光明天国的王；他的光明便是日月；他的威力便是五明使，即净气、妙风、妙明、妙水、妙火；他的智慧便是圣教。

接着文章又引摩尼教《宁万经》云：

若电那勿^③具善法者，清净光明，大力，智慧，皆备在身，即是新人，功德具足。

由以上两段引文，说明草庵石刻“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句是摩尼为摩尼教徒定立的信条。所以，草庵是摩尼教遗址当属无疑。

4. 查《余店(即谢店)陈氏族谱》(手抄本，向本乡族人借出)，有“建草庵石佛，不吝资财，立有石碑，垂裕后昆于不朽”几句，对照碑文“奉舍石室一完”和“陈真泽立寺，喜舍本师圣像”二句是相符的。新疆发现的摩尼教《忏悔文》^④(Khuasluanift)总共十五条，都是听者(一般的摩尼教徒)应行的法程。第十一条是“不施舍或误施舍的忏悔”，证以《余店陈氏族谱》载的“建草庵，不吝资财”句，正符合摩尼教徒应循法程。

5. 泉俗纪念释迦牟尼佛诞生日(其实是纪念观音菩萨的诞辰)是农历二月十九日。而今日泉州南门外纪念摩尼光佛诞辰，却是在农历四月十六日。这样看，纪念佛诞生的日子也各不同。草庵的摩尼光佛，就是摩尼教的遗址，可无置疑了。

^① 许地山《摩尼之二宗三际论》，燕京学报，第三期，第384～385页，1928年6月版。

^② 见《燕京学报》第三期，第384页，(注)：A. V. W. Jackson: Contributions to the Knowledge of Manichaeism 引 Flügel 译文(J. Amer. Orient. Soc. Vol. 44, No. I. p. 70)。

^③ 摩尼教徒分两种，即电那勿和听者。电那勿(Denavar)意译为“属于本教之诚信者”，他们是僧侣、教师，是真正摩尼教徒。

^④ 见《亚洲学会杂志》(J. R. A. S.)1911, pp. 277～314. Von Le Coq.

泉州宗教石刻

关于摩尼教传入中国时代，《闽书》说是始于唐高宗朝，但《佛祖统纪》则说是始于延载元年（公元694年），此在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已有详论。明何乔远《闽书·方域志》有如下的记载：

华表山与灵源山相连，两峰角立如华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时物也。祀摩尼佛。……当唐高宗时，行教中国，至武则天时，慕暗之弟密乌没斯拂多诞，复入见。群僧妒赞，互相击难。则天悦其说，留使课经。作大云光明寺奉之。……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教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受倡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人士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师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象遂传闽中。真宗朝，闽士人林世长取其经以进，授守福州文学。皇朝太祖定天下，以三教范民，又嫌其教门上逼国号，摈其徒，毁其宫。户部尚书郁新，礼部尚书揭隆奏留之，因得置不问。今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庵后有万石峰，有玉泉，有云梯百级诸题刻。

上述《闽书》所记载的草庵，到今日还存在。八十年前，张星烺、陈万里二位先生曾到此访问，因走错了路，未能找到。遂以为“所谓摩尼教遗址者，并无残迹遗存，仅山地一片而已”。其实不但草庵尚存在，即摩尼光佛像，也巍然趺坐在庵中。只是记中的“玉泉、云梯百级”等遗迹，则已无处可寻了。

摩尼教即明教，是公元3世纪波斯人摩尼所创立的，是参杂佛教、景教及拜火教等教义而成的。以基督、佛陀、琐罗斯德、那亚、亚伯拉罕等为教中的先知，以摩尼自身为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业而降生的。因其主张光明、正义，反对黑暗、剥削，不容于当时波斯的统治者，被剥皮死。其信徒将其教传入波斯境外及小亚细亚一带，更传至东罗马以至非洲北部，复东传入中国。元末，信奉白莲教的农民起义军领袖韩山童，就曾自称做“明王”。山童死后，其子韩林儿继之，称“小明王”。后朱元璋杀韩林儿，做皇帝，仍采用明教的教义，定国号叫做明，明就是摩尼教徒中所说代表光明的“明”。上面所引《闽书》所载“皇朝太祖定天下，以其教门上逼国号”，可知朱元璋建立的王朝与他当初假以起义的“明教”教义，发生了矛盾，所以就“摈其徒，毁其宫”了。

泉州城北门外，传说有呼禄法师墓，在老君山下。南宋朱熹有与同僚谒奠北山呼禄法师墓的诗^①。诗云：

联车陟修坂，览物穷山川。
疏林汛朝景，翠岭含云烟。
祠殿何沉邃，古木郁苍然。
明灵自安宅，牲酒告恭虔。
肸蠁理潜通，神蚪亦蜿蜒。
既欢岁事举，重喜景物妍。
解带憩精庐，尊酌且流连。
纵谈遗名迹，烦虑绝拘牵。

① 见《泉州府志》卷六，山川，清源山条，清同治庚午重刊本。

迅晷涼難留，歸軫忽已暮。

蒼蒼暮色起，反旆東城阡。

但我们在老君山下搜寻多次，毫无所获，仅见大石刻老君坐像一尊与巨松数株而已。

20世纪80年代以降，泉州及其周边地区不断发现摩尼教(明教)的遗址、遗物和文献，因此对摩尼教(明教)的研究有很大的发展，取得可喜的成绩。在泉州虽然找不到呼禄法师的墓葬，但却发现五代时的一段史料，即徐铉著《稽神录》里有关泉州五代摩尼教(明教)活动的记载。文云：

清源都将杨某，为本郡防遏营副将，有人见一鹅负纸钱入其第，俄化为双髻白发老翁，变怪遂作。二女惊病，召巫立坛治之，鬼亦立坛作法，愈甚于巫，巫惧而去。后有善作魔法者，名曰明教。请为持经一宿，鬼乃唾骂而去。^①

这原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却反映五代时泉州有摩尼教(明教)的活动。清源郡，系泉州五代时的别称。这个故事表明五代时摩尼教处在非法的地位，故改名明教，并与民间巫术相结合，逐渐改变原来摩尼教的性质，变成民间驱鬼逐魔的民间宗教。这是泉州地区最早出现“明教”名称的记载。

北宋时，摩尼教经文曾经两次被误选编入官方承认的《道藏》，到明代重修《道藏》时才纠正过来。宣和二年(1120年)，温州等地有许多“狂悖之人，自称明教，号为行者”，他们“各于所居乡村，建立屋宇，号为斋堂，如温州共有四十余处”^②。福建人庄季裕撰《鸡肋篇》云：“事魔食菜，法禁至严”，然信众愈多，“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③。据其说法，温州的摩尼教(明教)是由福建传播去的。如今温州市的苍南、平阳、瑞安、乐清、洞头等县，有许多居民讲闽南话，这与宋代明教传入温州地区有关。有的学者查阅苍南县金乡区瀛桥《项氏宗谱》，发现其先祖为避闽王曦之乱，自闽南迁移平阳；温州市瓯海县川沙《周氏族谱》记，乾道二年(1166年)温州洪水，溺死数万人，奉旨“徙福民实其郡”。所以有的学者认为这些移民来自福州和泉州^④。

1989年春，温州市苍南县文物部门在括山乡下汤村一座破庙附近发现一方《选真寺记》摩尼教(明教)碑，林顺道先生以碑文校以《彭氏宗谱》，于1997年1月将《选真寺记》碑文发表于《中国文物报》，碑文云：

彭之居西北道三百余步，有宫一区，其榜曰：选真寺。为苏邻国之教者宅焉，盖彭氏之先之建所也。

碑记刻于元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寺可能建于南宋。此外，还有建于南宋末年的苍南县金乡区炎亭的明教寺——潜光院，与选真寺均为南宋末年的明教寺。据《平阳县志·神教志二》记载，“潜光院在炎亭，选真寺在彭泉山，皆金舟乡”，金舟乡即今苍南县金乡、钱库等地。所以有可能这两座明教寺院为泉州的移民所创建。倘若果真如此，那就更有意思了。

^① 徐铉《稽神录》卷三，清源都将。

^② 《宋会要辑稿》，刑法二，禁约。

^③ 庄季裕《鸡肋篇》卷上。

^④ 周梦江《从苍南摩尼寺的发现谈温州摩尼教》，载《海交史研究》，1990年第2期，第73页。

南宋时，诗人陆游在福建宁德、福州任官，他在《老学庵笔记》里说：“闽中有习左道者，谓之明教。亦有明教经甚多，刻板摹印，妄取《道藏》中校定官衔贅其后。”^①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62年），陆游在《应诏条对状》中云：“妖幻邪人……两浙谓之牟尼教……福建谓之明教”。“至有秀才、吏人、军兵亦相传习。其神号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号。白衣乌帽，所在成社。伪经妖像，至于刻板流布”。陆游请求有司将明教的“经文印版，会州县寻根，日下焚毁”^②。并令明教徒自首，对告发者给予重赏。

南宋时温州的明教徒使用“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而福建的明教也有所谓的“伪经妖像”。这表明南宋的福建和温州的明教都出现了偶像崇拜，且与民间信仰互相融合，而不同于原来的摩尼教了。

1979年，泉州晋江草庵寺前20米处，出土刻有“明教会”黑釉瓷碗一只，口径18.5厘米、高6.5厘米，底高0.08厘米。碗内阴刻“明教会”三个字，字径6~7厘米。此处，还出土60多块黑釉瓷碗残片。1982年11月，在晋江磁灶大树威古窑址瓷层底水沟边，发现一块阴刻“明”字的黑釉瓷碗残片。1983年6月，在同窑址山上发现一块阴刻“明”字的黑釉瓷碗残片。其“明”字的字体，黑釉瓷碗的质地，与草庵所发现的黑釉瓷碗一样。因此，草庵出土的“明教会”黑釉瓷碗有可能是磁灶大树威窑的产品^③。

1988年6月，莆田涵江镇的福州至厦门公路93公里处路旁，发现一方明教石碑，残碑长105厘米、宽77厘米、厚19厘米。碑上阴刻“(明)大力智慧，(真)摩尼光佛”，其中“明”、“真”两字大部残缺。碑左下部落款是：“□□□都转运盐使司上里场司令许爵乐立”。^④据考“场司令”一职设置于延祐二年^⑤（公元1315年），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改“分司”。因此这方石碑应刻立于延祐二年以后，洪武二年以前。1990年12月，在莆田涵江区政府礼堂前面的阴沟盖石上，再次发现明教石碑残件，残长74厘米，残宽53厘米。碑上阴刻“清净光”三个字，以及“明”字上半部。此残碑发现地点，距1988年6月发现残碑的地点仅百米左右之遥。更有意思的是此碑与前碑是同一方碑的两个部分。如若本碑的“明”字的上半部分与前碑明字的下半部接合，刚好是同一个“明”字^⑥。以上两方明教残碑，现存莆田陈文龙纪念馆。

综上所述，摩尼教于唐会昌后传入泉州，五代改名明教，变为驱鬼逐魔的民间宗教。宋代繁荣于福州，并由福建流向两浙。元代，温州、泉州、莆田是明教活跃地区，故泉州发现1313年“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失里门主教墓碑^⑦。泉州、温州亦是摩尼教（明教）最后的消亡地。

①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

② 陆游《渭南文集》卷五，应诏条对状。

③ 黄世春《福建晋江草庵发现明教会黑釉碗》，载《海交史研究》1985年第1期，第73页。

④ 陈长城《莆田涵江发现摩尼教碑刻》，载《海交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117~118页。

⑤ 乾隆《莆田县志》卷三，《建置·公署》。

⑥ 程德鲁《涵江又发现摩尼教残碑》，载《海交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52页。

⑦ 见本书第二部分“泉州古基督教”，B37。

第四部分 泉州古印度教

一、泉州古印度教石刻

D 1 印度教寺石匾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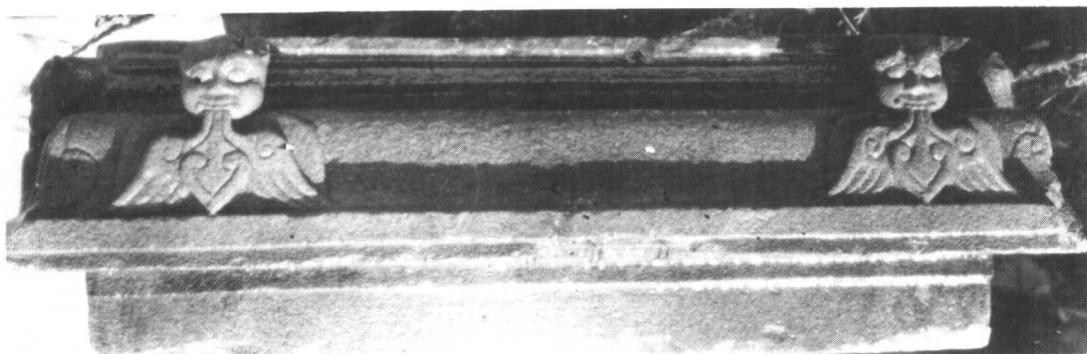
石刻高 45 厘米、长 11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它属于印度教寺的石匾额的上部，其中部和下部都已遗失，仅剩下这一额顶。此额顶的正中刻一小横匾，匾内浮雕“御赐佛像”四字。匾的左右各刻一飞天，飞天的头上有三重发髻，两耳垂肩，蜂腰，手臂圆润丰满，飘带迅疾飘拂，作疾飞状，手扶“御赐佛像”匾。手臂和飘带，都用了透雕法，雕刻手法生动而有力。两飞天的左右，又各刻一圆圈，圆圈内趺坐一神像，头上也有三重发髻，束腰袒胸，双手合十于胸前。圈外左右有花朵，下方有卷云围绕。现在残存的石匾额部分，大约仅为全石刻的四分之一。石刻原被嵌入在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正中大门门楣上的横木枋和斗栱的中间。但这一方石刻，显然和开元寺内的佛教建筑物并无关系。元末寺院遭战乱破坏，我们推想它很可能是在明初重建时，由另一已毁的印度教寺庙内移来而嵌入此处的。这方石刻，本来被大雄宝殿的一方大木匾额所遮蔽。1945 年，木匾额被风刮坏坠地，石匾额才被发现。



D 1

D 2 半兽半鸟形门楣石

石长 102 厘米、进深 45 厘米、高 2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上刻层层叠涩，高低不等，下面刻一条深约 3 厘米的槽，在槽旁刻一排莲瓣纹。其左右两端各雕一个半兽半鸟形（兽首鸟身），在两只翅膀的中间刻一心形，在鸟兽形浮雕的下面，又刻叠涩四层，往下渐收。发现这样的石刻有三条，其大小略同。1946 年，掘泉州通淮门城墙基础时所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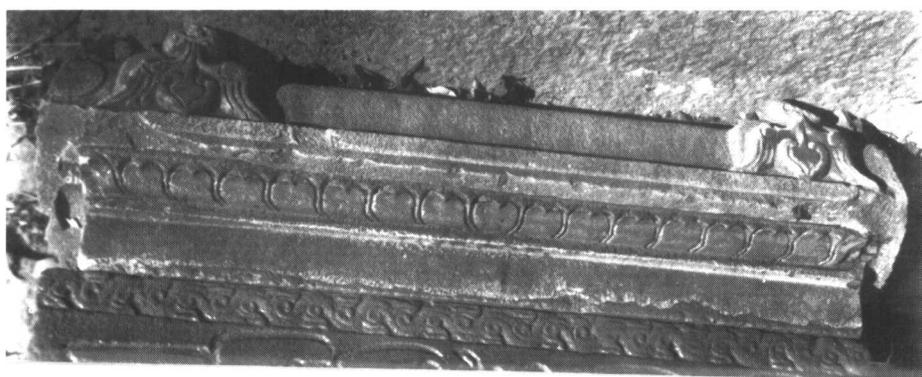


D 2.1



D 2.2 局部：半兽半鸟形

D 3 半兽半鸟形门楣石



D 3.1

石长 98 厘米、进深 44 厘米、高 2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刻下部浮雕一列仰莲瓣，石刻上部两端各雕一个半兽半鸟形。1955 年 12 月，在泉州小东门外东湖畔掘获，出土时与一方阿拉伯文字伊斯兰教须弥座祭坛式石墓的石块叠在一起。这可能是明初修筑泉州城墙时遗弃于湖畔的。



D 3.2 局部: 半兽半鸟形

D 4 印度教寺石横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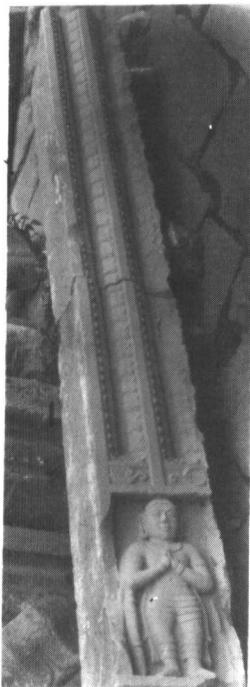
石长 128 厘米、高 22 厘米、厚 33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左边已残断，它是一座建筑物上的石横枋。1946 年，由泉州通淮门城基础内掘获。石的前后部的两边，雕刻花纹图案，上面边缘刻莲瓣，下刻海棠花图案。推测它是一根天花板顶下的横枋，或者是一个门框的顶部。左边还有一个约 4 厘米长的石榫凸出，很明显可以看出这刻有榫的一端，是接合在一根石柱上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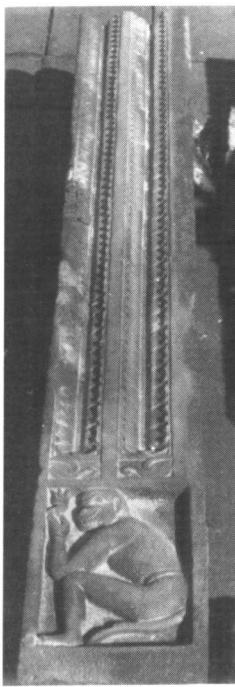
D 4

D 5 印度教寺门框石

石高 200 厘米、宽 25 厘米、厚 2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门框石的正面刻两道很深的竖向沟槽，沟槽的两边均刻莲瓣纹。其下方雕刻一个身体健壮的武士，两耳及肩，袒上身，饰臂钏、腕钏，下着裙，双手合十于胸前，右肘下置一棒形武器。这门框石是在 1943 年拆卸泉州通淮门城垣时，由城墙内挖出的。



D 5.1



D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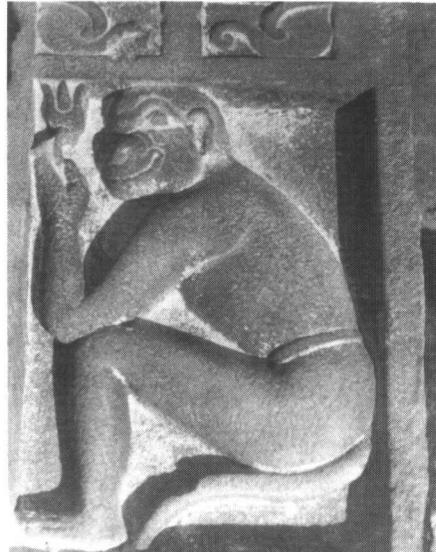
D 5.2 局部: 武士

D 6 印度教寺门框石

石高 200 厘米、宽 25 厘米、厚 29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门框石,正面刻两道竖向深沟槽,槽两边刻莲瓣纹。石的下部则雕一猴王,左手持一三叉戟。此石是 1947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内掘获,与 D5 门框石出土于同一地点,石刻的大小尺寸、样式及雕刻方法相同,可能两石是同一个建筑物的门框石。就雕刻的内容看,它们是印度古代史诗中拉马耶那(Ramayana)在帮助苏格里瓦(Sugriva)战胜委里(Vali),使哈奴曼(Hanuman)恢复“猴国之王”的地位的故事。如此,则 D6 图中是右边门框石,D5 图中就是左边的门框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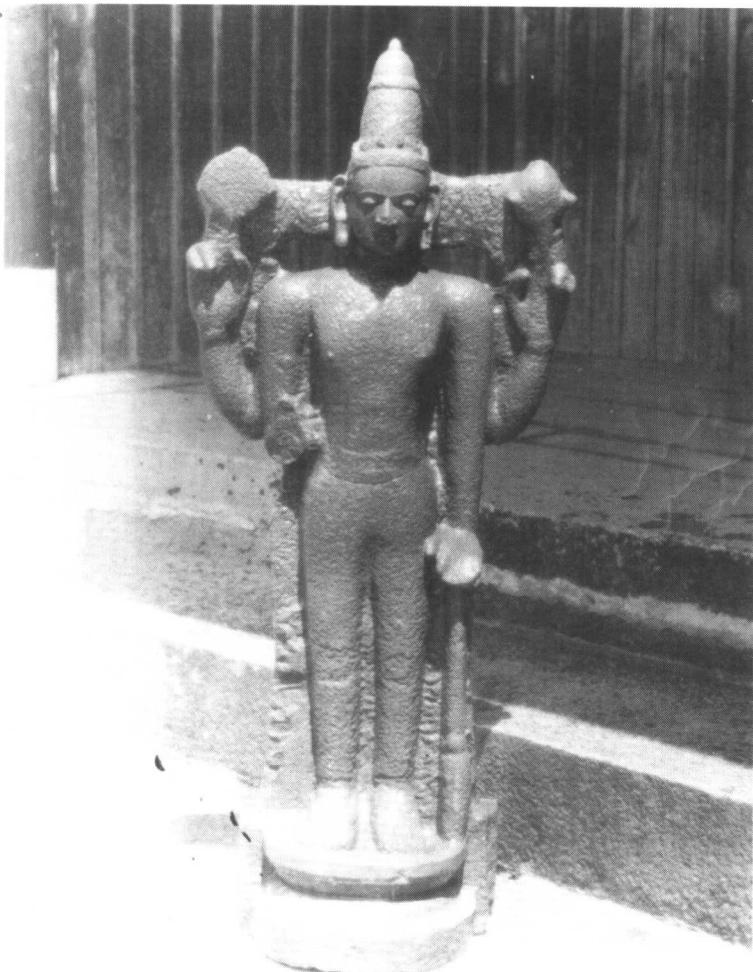
D 7 毗湿纽石造像

像高 115 厘米(包括莲台)。辉绿岩石雕成。头戴一尖顶高冠,两眼下视,高鼻梁,大耳,秀口,圆颐,神情庄严而宁静。有四臂,右上手持圆盘,左上手执法螺。右下手伸出,作无畏手印;左手下垂,按一棒。右手掌、肘部分虽已断折,但仍能表达出端丽的姿态。上体袒裸,下体



D 6.1 局部: 猴王

似有罗裙束住，立在一个半月形的束腰圆台上，台座底部有榫卯。石虽粗糙，但雕刻的手法简朴、圆熟。看来这座神像全体的表面，似曾用油泥塑过，而妆过金身的。因泉州许多大小佛像，因为石质较粗，多内部是石刻，表面塑一层薄泥，然后妆金身。1934年，在泉州南较场（蒲寿庚花园故址，俗称番佛寺地方）掘获。它很可能是一尊印度教三主要神祇之一的毗湿纽（Visnu）神像。石雕神像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7

D 8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古印度教石柱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檐下，有辉绿岩石雕成的古代印度式和锡兰式的石柱两根。其中东侧石柱高2.48米。柱杀作十六角形，但柱顶、柱中、柱下三部分皆削成四方形。在四

方形的四面，各刻一圆圈形，圈内浮雕一些在印度和锡兰流传的印度教神话故事，但也有一些雕刻中国古代常见的图案。

以下各图(D8.1~5)都是这根柱子上的石刻。在印度库玛拉要弥著的《泉州印度式雕刻》^①一文中，对这些雕刻的内容，有过一些介绍，以下各图石刻内容皆据此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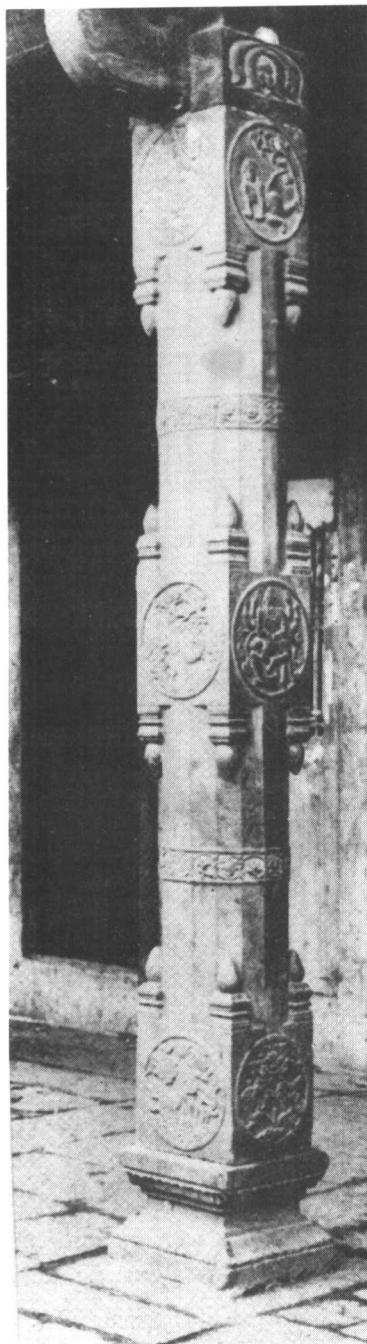
图D8.2中刻一象被水怪鳄鱼擒获之状。石刻内容系叙述印度一段有名的神话，“解放象王”的故事。故事是说：象及鳄鱼(或叫二金仙rsis)本来同是毗湿纽的信士，因见憎于其他神祇，被贬为象及鳄鱼，于是尽失其本来信仰。当象在河中饮水时，鳄鱼啮其足而掠之，彼此互斗，直至千年。其后，象再记起上帝，以鼻举莲花向毗湿纽祈求垂救，毗湿纽即时骑金翅鸟现身救象，并杀死鳄鱼，此二物遂各得救。以上故事，也曾见于古时尼泊尔的绘画中。

图D8.3中刻毗湿纽骑金翅鸟。毗湿纽有四臂，左手拿圆盘，右手持法螺；下两手作“无畏手印”(abhaya varadamudrā)。金翅鸟除有翅膀外，全体作人形，用其两手托住毗湿纽的双足作飞奔状。雕刻内容与上图故事相连续，此即毗湿纽骑金翅鸟现身救象的情况。

图D8.4中刻一人被缚在一个木臼上，木臼挂在树的中间。此系印度古代著名故事 Kṛṣṇa Līlā 中的一段。其内容：童子 Kṛṣṇa 系身于两棵 arjuna 树中间的一重木臼上，以防其恶作剧，他就用力拖木臼至树间，骤然用力拖倒魔树，连根拔出，于是附身在树上的 Kubera 的两个孩子(Nalakuvara 及 Manigriva)，遂得脱魔树而获救。

图D8.5圆圈内刻毗湿纽之“人狮”，他具有八臂，各手执有法螺、圆盘及其他法宝，他正抓到凶魔(Hiran yakaśipu)放在其膝上，用手擘裂凶魔的肚子。

此柱其他圆圈内多刻花草图案，如茶花、蔷薇、鹿猴教子、双凤等。



D 8.1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
东侧石柱

^① 见库玛拉要弥著，刘致平译《泉州印度式雕刻》，《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第67~71页，1934年。



D 8.2 东石柱南面中部鳄鱼啮象足故事



D 8.3 东石柱南面上部毗湿纽骑金翅鸟现身



D 8.2 拓片



D 8.3 拓片



D 8.4 东石柱西面上部童子拉倒魔树故事



D 8.5 东石柱西面中部毗湿纽的人狮擘裂凶魔身体



D 8.4 拓片



D 8.5 拓片

D 9 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古印度教石柱

此为大雄宝殿后廊两侧石柱,与东侧石柱形制相同。石柱高 2.50 米。以下各图(D9. 1~6)为石柱的局部,分别雕刻古印度教的神话故事内容。

图 D9. 2 中石刻的内容,是说 cira-harāṇa 牛女(Gopi)衣服被窃的故事。石刻中有七个女子浴于阎摩那河(Yamunā),祷于 Kātyāyani,并祝 Kṛṣṇa 能做她们的丈夫。这时, Kṛṣṇa 将她们的衣服拿走,登树上端坐,众女很着急,皆裸体至树下乞求,才把衣服还给她们。这故事是一个比喻,凡求见神的人,必须放弃一切,用赤裸裸的心灵去乞求,才能得到幸福。

图 D9. 3 中石刻中的内容,是说 Kṛṣṇa 战胜 Nāga Kāliya 的故事。Nāga Kaliya 曾占据阎摩那河中的一个漩涡,以致河水受毒,累及附近的村镇。Kṛṣṇa 与之狠斗,才把他击败。图中即 Kṛṣṇa 战胜后吹笛舞蹈之状,其身边有二牛,另有一条五头蛇,缠其身上,上空有毗湿纽给他的法宝圆盘、法螺等物。此柱雕刻者,对故事殆有误解之处,以致将 Kṛṣṇa 作平时吹笛状,立莲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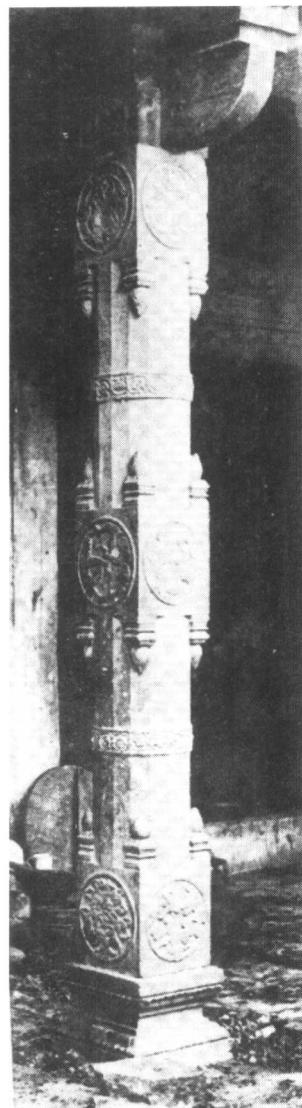
图 D9. 4 中石刻圆圈内居中刻四臂的毗湿纽,坐在莲座上,旁边有两个 Śaktis (Lakṣmī 及 Bhūmi Devi) 坐在座旁生出的莲花上。毗湿纽的右下手紧握其拳(本应握莲花),右上手高举圆盘,上左手执法螺,左下手握棒。这种毗湿纽的化身叫 Janārdana。

图 D9. 5 中在圆圈中刻 Śaiva 立覆莲花台上,具有四臂,身穿 dhoti,手持三叉戟、鼓、神圈、兜鍪等法宝。头发分披左右。发长垂过腹,大概以右边代表“恒河”,左边代表“新月”。这是用 Śaiva 故事为题材的一种雕刻。

图 D9. 6 中圆圈内刻两个角力的人,互扯手足作“卍”字形。这石刻内容,是指 Kṛṣṇa 及 Cāṇūra 或 Balarāma 及 Muṣṭika 的角力,故事见于《印度古代美术》(Cunningham Stupa of Bharhut)一书中。

其余各面多刻茶花、菊花、双狮戏球及佛教艺术中的生命树等。

以上开元寺的两根古代印度式和锡兰式石柱,就柱子的雕刻形式和雕刻内容看,均与佛教无关。它是属于古代印度印度教寺的建筑遗物。因此,我们估计,它可能是元末亦思巴奚兵乱失败后,印度教寺被毁,恰好明初重修开元寺,而被移置于开元寺的。



D 9. 1 开元寺大雄宝殿
后廊西侧石柱



D 9.2 西石柱南面上部阎摩那河
七女出浴故事



D 9.3 西石柱南面中部 Krsna
战胜 Nāga Kāliya 故事



D 9.2 拓片



D 9.3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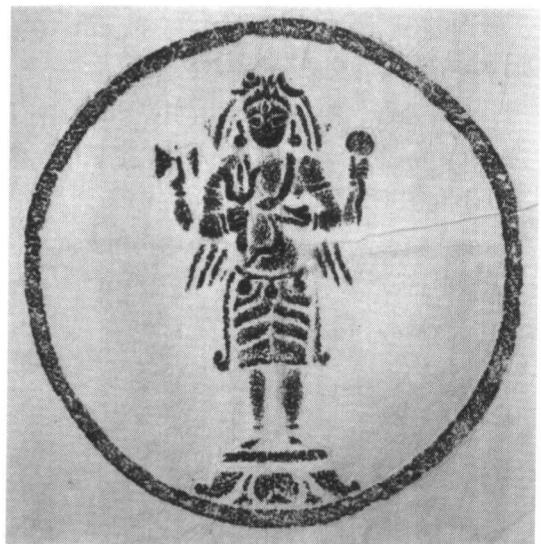
D 9.4 西石柱西面上部毗湿纽的化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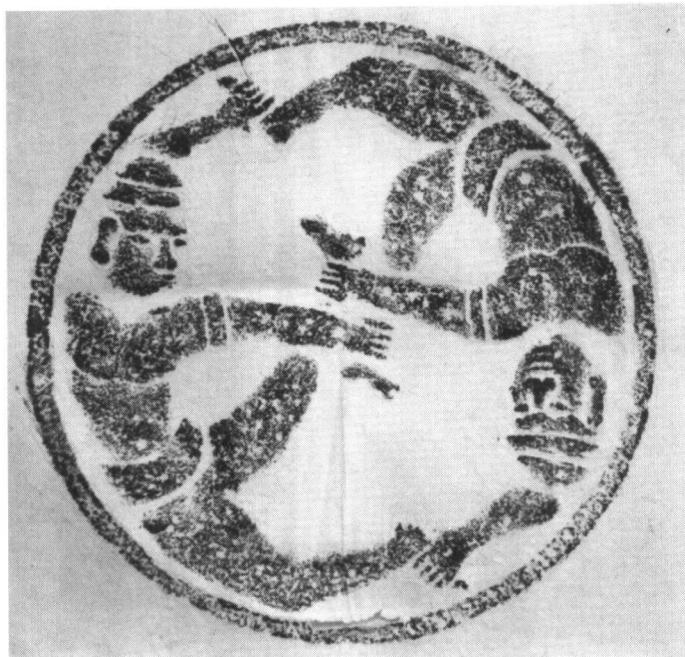
D 9.5 西石柱西面中部 Śaiva 及恒河、新月故事



D 9.4 拓片



D 9.5 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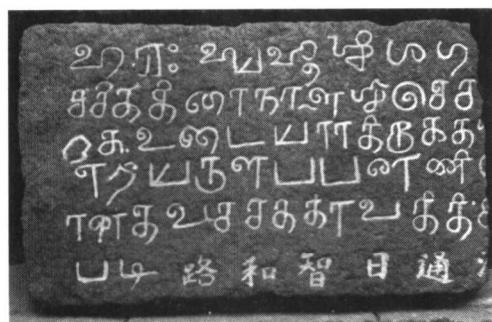
D 9.6 西石柱东面中部角力者(拓片)

D 10 捏伯鲁马尔创建湿婆神庙泰米尔文字碑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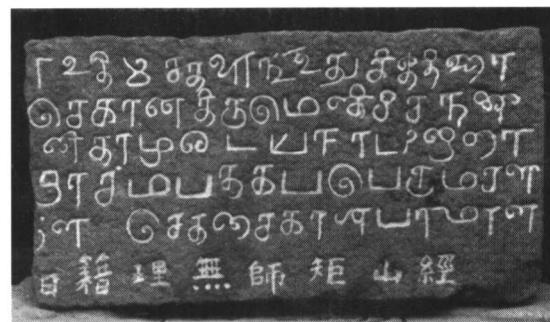
图 D10. 1, 碑高 32 厘米、宽 55 厘米、厚 11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阴刻六行印度泰米尔文字, 其下阴刻一行汉字。

图 D10. 2, 碑高 32 厘米、宽 55 厘米、厚 11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阴刻五行印度泰米尔文字, 第六行阴刻一行汉字。

1956 年 12 月, 在泉州南门伍堡街民房内发现, 是年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1964 年 3 月, 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韩槐准认定是印度文字石碑, 但据末行汉字, 怀疑是印度佛教碑刻。图 D10. 1 和图 D10. 2 原为一碑, 很可惜, 当吴文良先生发现此碑时, 它已破损断裂为二段。



D 10. 1



D 10. 2

1981年,日本国大阪大学斯波义信教授曾临厦门大学,对此碑文进行认读,译文如下:

向庄严的褐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哲帝莱月(即公元1281年4月),港主掘伯鲁马尔,别名达瓦浙哈克罗·瓦帝格尔。由于察哈台——罕的御赐执照,据此,乃被庄重地把乌帝耶尔·嘶鲁迦尼——乌帝耶——那依那尔神灵敬请入座,并愿吉祥的察哈台——罕幸福昌盛。

按此译文的“察哈台——罕”,即元世祖忽必烈。碑文纪年为公元1281年,正是忽必烈在位时间。译文“褐罗”为“湿婆”的异译。译文“港主”一词,未见文献记载。可能元初印度商船到泉州港贸易的数量特多,因此元廷命印度商人为港主,主持中外贸易事宜。

同一方泰米尔文字石碑,日本国东京大学辛岛辛教授又翻译如下:

向庄严的合罗致敬,愿此地繁荣昌盛。时于释迦历1203年(公元1281年)奇帝莱日(4~5月)的奇帝莱之日,圣班达·贝鲁玛,别名达瓦·查库拉瓦蒂(尊称)蒙契嘎察伊汗的御赐执照,为了契嘎察伊汗的健康,建造了乌代耶尔·铁尔迦尼·舒拉代耶尔神的神像。^①

按,此译文的“合罗”,亦即印度教的湿婆神。按辛岛辛的说法,是元世祖忽必烈的长子曾患疾病,而泉州的印度商人为了建印度教寺,立碑效忠元廷,祈求忽必烈之子恢复健康。但是“契嘎察伊汗”是谁?无可稽考。

这方泰米尔文字石碑可能与南印度的马八儿国有关系。《元史》云,“海外诸蕃国,唯马八儿国与俱蓝足以纲领诸国,而俱蓝又为马八儿后障,自泉州至其国约十万里”。又云“世祖至元间,行中书省左丞唆都等奉玺书十通,招谕诸蕃。未几,占城、马八儿国俱奉表称藩”。又云元廷使臣哈撒儿海牙与杨庭璧,“(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自泉州入海……四月,至马八儿国新村马头,登岸。其国宰相马因的谓:官人此来甚善,本国船到泉州时官司亦尝慰劳,无以为报,今以何事至此?”^②可见元初马八儿国与泉州的海外交通十分频繁。

马八儿国在南印度,是泰米尔人的居住区,流行泰米尔文字。南印度的泰米尔纳德地区为寺庙之乡,其中尤以湿婆神庙宏大规模著称。南印度泰米尔诸王朝,历史上多次向东南亚发展势力,如11世纪的朱罗王朝征服缅甸、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教随之在东南亚流播。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是10至14世纪的东方大海港,马可·波罗曾记:“印度一切船舶运载香料及其他一切贵重货物咸莅此港”。^③因此,元初由泰米尔人在泉州创建湿婆神庙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此外,图D.1的印度教“御赐佛像”门楣石,可能与本石碑记载的“御赐执照”存在着某种联系。然碑文汉字“路和智日通□日籍理无师矩山经”或“经山矩师无理籍日□通日智和路”是什么意思,还有待研究。

^① 日本辛岛辛《十三世纪末南印度与中国之间的交流》,副标题为“围绕泉州泰米尔石刻与《元史·马八儿等国》”,昭和63年,汲古书院出版。

^② 《元史》卷二百十,马八儿等国。

^③ 冯承钧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中册),第156章、刺桐城,第609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D 11 天妃宫寝殿前廊古印度教石柱

泉州南门天后路天妃宫寝殿前廊庑下，有辉绿岩石雕成的古代印度式石柱两根（D11 和 D12），各高 2.21 米。其雕刻形式与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回廊檐下的古印度式石柱相同。

从这两根石柱的雕刻形式看，它属于印度式，但就石雕图案（见图 D11. 2、D11. 3、D11. 4）看，大部分是中国的艺术雕刻题材，但其中也混杂有印度的蛇形雕刻。

这两根柱子的形式，与天妃宫的整体建筑形式和风格，毫无共同之处。

《泉州府志》卷十六有载：

明永乐五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镇守官重新其庙。自是节遣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官，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国，率以祭告祈祷为常。

又同书同卷载：

天后宫，在府治南门内，宋庆元间建，明永乐十三年奉奏修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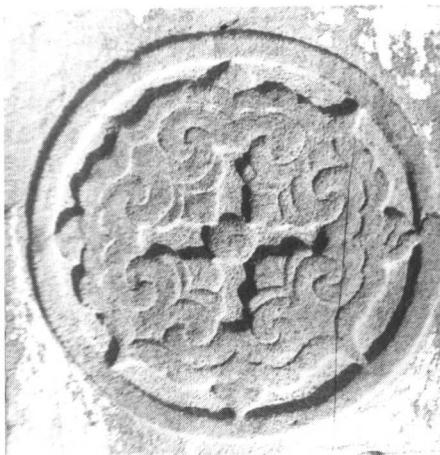
由是，泉州天妃宫才有远较其他沿海天妃宫大得多的规模。

这两根印度式石柱，可能是明初天妃宫拓建时移置于此的。



D 11. 1 天妃宫寝殿前廊东侧石柱

D 11. 2 东石柱东面中部雕刻图案



D 11.3 东石柱东面下部雕刻图案



D 11.4 东石柱南面中部雕刻图案



D 12 天妃宫寝殿前廊古印度教石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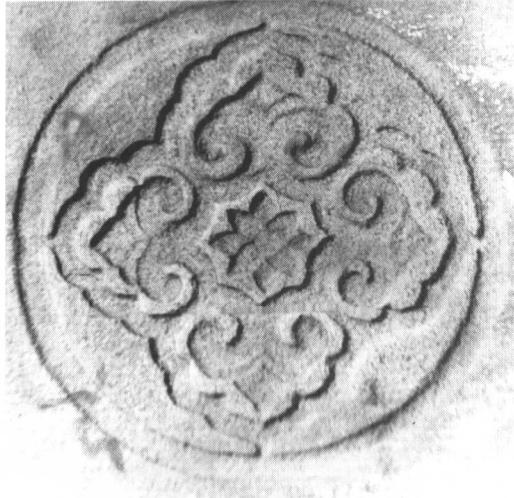


D 12.1 天妃宫寝殿前廊西侧石柱

D 12.2 西石柱南面下部雕刻图案



D 12.3 西石柱南面中部雕刻图案



D 12.4 西石柱东面下部雕刻图案

D 13 古印度教石柱

此石柱的样式、大小及雕刻方法，与开元寺大雄宝殿后廊檐下石柱完全相同。柱的上部已残断，中、下部的四方形及十六角形石刻尚完整。上面雕有圆圈，圆圈内有浮雕的图案花纹。石柱中部(D13. 2)正中圆圈内有两个角力的人，互扯手足，呈卍字形。在二角力者的中间各有一根棒形物，这与开元寺西石柱东面之中部的雕刻有些不同。由此也可以证明，开元寺大雄宝殿后檐下二石柱，确非开元寺中的原有物，而是由他处移来的。

这一根石柱，是1946年在泉州通淮门(俗称涂门)城垣靠近南较场一段的城基下距地面约3米深处掘出的，与这根石柱同时出土的还有十多方斜形莲瓣的石刻及两块柱头石。测量结果，可能这种柱头石是石柱的柱头。石柱顶上虽残断，但以后发现柱头顶有一个榫，而这两个柱头石的下部都有一个卯。且石柱顶的榫和柱头石底下的卯，大小均同，可能此柱头石即是这种石柱的顶上的构件。其构筑情况可见图D13. 3。

D 14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这是两方古印度式石柱的残段，辉绿岩石雕成。各高62厘米、宽32.5厘米。柱的四个面一样，各刻一个圆圈，圆径27.2厘米。圈中浮刻中国式图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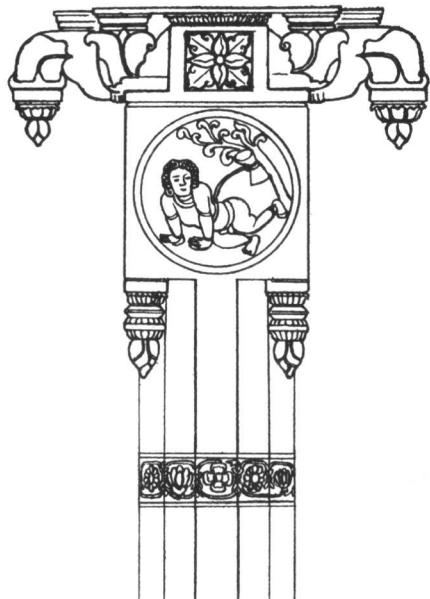
但柱被凿断，改作他用。顶端被改琢作葫芦状，四角的含苞莲花蕾也被琢短，改作伊斯兰教徒坟墓的装饰物。这两方残断的印度式石柱，最早发现于泉州东门外乐园，后搬迁灵山圣墓。



D 13.1



D 13.2 石柱细部：角力者



D 13.3 柱头石与石柱接合的复原图

D 15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D 14



D 15

D 16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石柱残段高 69 厘米、宽 31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柱的四个面中的圆圈内，均雕刻花卉图案。这一残段，是石柱的顶部。1956 年 11 月，在泉州通淮门外津头埔获得。据乡民云，是数年前从城基中掘获。1956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D 16



D 17

D 17 古印度教石柱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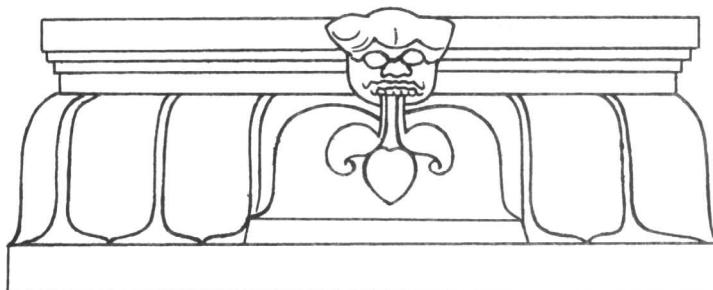
石柱的左边和下部已残断。残高 100 厘米，残宽 24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这是柱石的上部，圆圈中浮刻的莲花图案还清晰可见。现砌于泉州南城涂门街棋盘园某姓居民家石墙上。据云为数十年前拆卸通淮门一带城垣时，运来砌于墙上的。

D 18 半兽半鸟形石刻

石刻高 24 厘米、宽 52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上雕刻斜形莲瓣，中间雕一兽首鸟身形，与 D2 上所刻半兽半鸟形相同，但兽首已被琢去。1946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内掘获，它可能也是印度教寺中建筑物的构件。



D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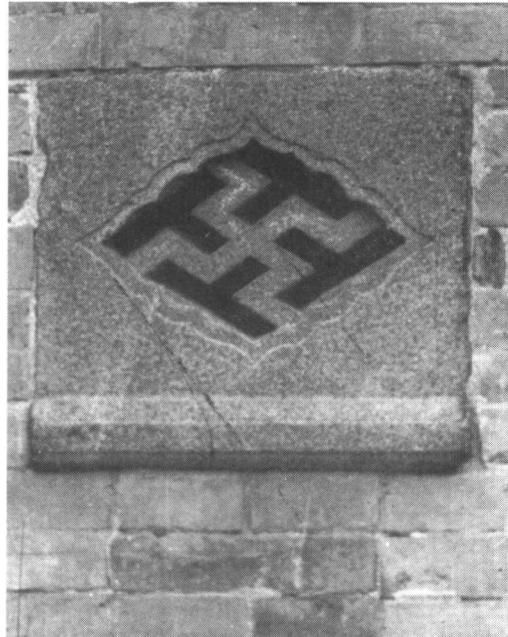
D 18 复原图

D 19 印度教寺钩栏板万字石刻

石长 36 厘米、高 3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正中透雕“卍”字(右旋)，下刻三条几何形直线，石面稍凹入。1941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垣挖出。在印度尼西亚峇厘岛的古印度教寺，亦有类似万字形的雕刻。

D 20 希腊式柱头石

石作正方形，边长 45 厘米、高 2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每边各刻两层，下层为阴刻几何纹和覆莲瓣图案，上层为阳刻仰莲瓣。其形式和希腊的哥林多式柱头相同。照片下的另一石，系垂注式希腊式柱头石。



D 19



D 20

D 21 希腊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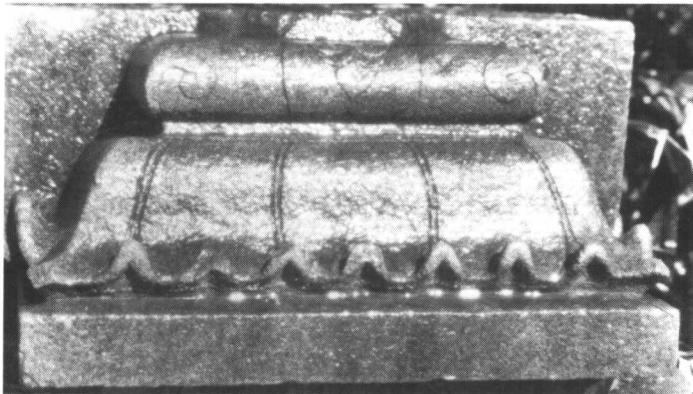


D 21

石刻高 28.5 厘米，顶面长 59 厘米、宽 51.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刻分四层，自上而下依次收小。低层雕五角形柱位；第二层的转角处雕刻“如意头”。第三层浮雕重叠仰莲瓣。1955 年，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城基掘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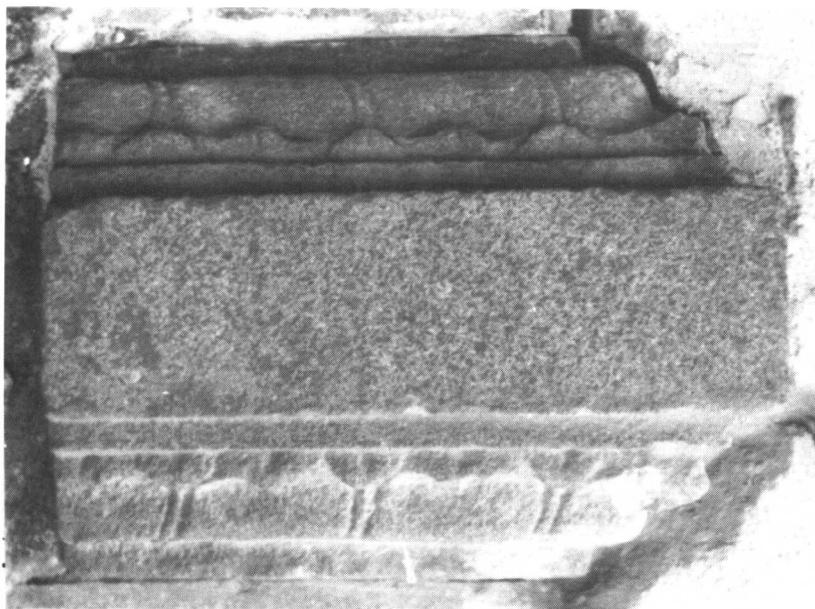
D 22 希腊式柱头石

希腊哥林多式柱头石之二。石长 45 厘米、高 3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其雕刻形式与图 D20 相同,不过雕刻部分仅及其半,因为这方石刻是砌于石墙上的。此种石刻,自 1938~1947 年,在靠近泉州南较场的城基内共发现七方。在南较场棋盘园附近的释迦寺墙基下,还有十多方古印度教柱头石,其中有的与本图石刻类似的。这些寺里墙基的印度教石刻,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寺僧修寺时就近购买通淮门城基石而填入的。



D 22

D 23 直角形转角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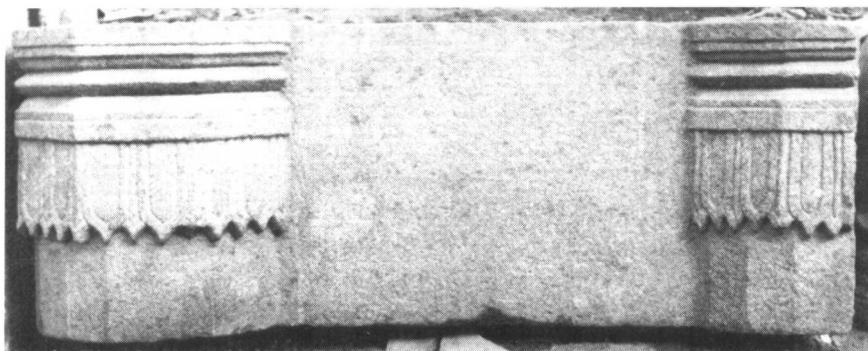
D 23

泉州宗教石刻

石刻长宽各 28 厘米、高 2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的上部刻覆莲瓣，下部刻仰莲瓣。1945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掘获。现在石刻砌于居民墙上。

D 24 希腊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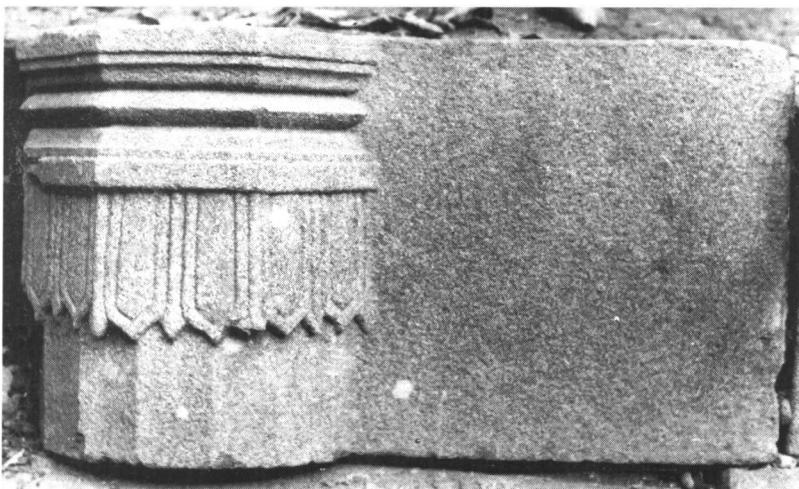
石刻长 71 厘米、高 26.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位在石的左右两端。左边为转角柱头，雕刻希腊式剑形垂注，上部杀成五个角、五个面。右边柱位，杀成三个角，三个面，可能其余柱头部分与另一石联缀成，或砌于石墙上。两个柱头位置的距离，仅有 34 厘米，可见这座已毁灭的印度教寺石柱之多，构筑形式之奇特了。1945 年，在泉州南较场附近掘获。



D 24

D 25 希腊式柱头石

石刻长 51 厘米、高 26.6 厘米、厚 2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头位置在石的左边。柱头上部杀成五个角，呈五个面，每面宽 10 厘米。上部雕刻对称仰覆几何纹；中部刻剑形垂注；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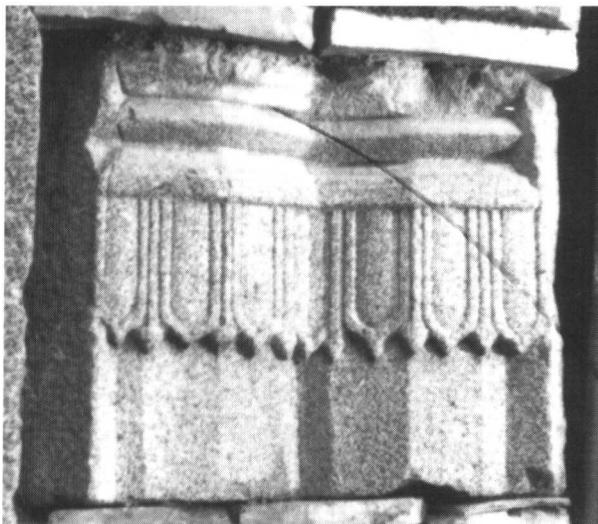


D 25

部杀成十一个面,每面稍凹入,面宽4厘米。此为转角柱头石。1945年,在泉州南较场附近城基础掘获。

D 26 希腊式柱头石

石刻长33厘米、高25.2厘米、厚29厘米。辉绿岩石琢成。雕刻两个相连柱头位置,下雕剑形垂注。似是转角柱头石,但更可能是出于建筑美观的原因。1948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掘得。



D 26



D 27

D 27 希腊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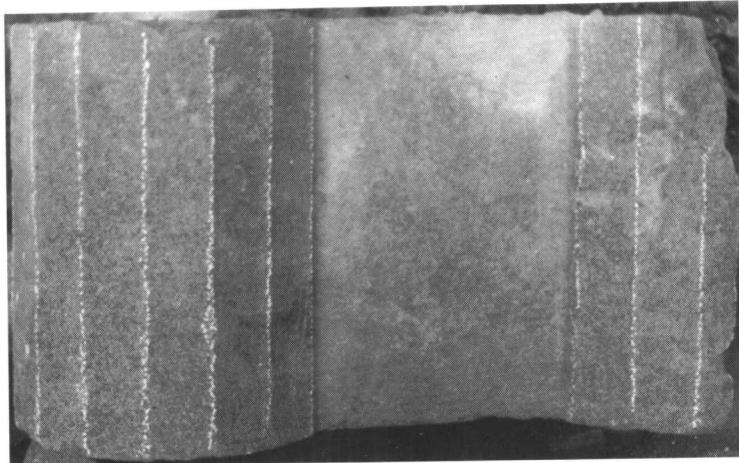
石刻作五面五角形,高28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刻系一方砌于墙上石块的伸出部分,石顶刻仰覆莲瓣,中层刻剑形的垂注,下层杀成五个面。与此石相似的柱头石有七方,同于1945年,在泉州南较场附近城基础掘获。

D 28 希腊式柱头石

石刻长47厘米、高28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左边是转角柱头,杀成十一个面,每面宽4厘米,石面微凹入。右边柱头,只有四个面,其余可能与另一石接合或砌入石墙。两个柱头位置的距离,仅有17厘米。可见这座印度教寺柱子之多和建筑之奇特了。1952年,在泉州南较场附城基础掘获。

D 29 印度式柱头石

石刻长46.5厘米、高28.3厘米、厚25.3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左边为转角柱头,杀成十一个面,每面宽4厘米,石面微凹入。右边柱头位置,雕刻一个印度式雀替,雀替的仰莲瓣



D 28



D 29

下,浮雕一个长仅 3.5 厘米、宽 2.5 厘米的下垂花蕾,雕工精美。这是一方比较特殊的石雕,像这样的石雕,自 1947 年至今,已发现三方。这方石刻,是 1947 年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城基础掘获的。

D 30 印度式柱头石

石刻长 68.3 厘米、高 26.8 厘米、厚 27.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头位置在石的右端。柱头顶作正方形,其形式与开元寺、天妃宫四根印度式石柱类同。柱头的两个面各刻一个圆盘,直径为 14.5 厘米,盘中浮雕花朵图案。柱头三个转角处,浮雕仰覆对称几何纹雕刻,下各浮刻一朵下垂的花蕾。柱头下杀成十一个面,每面宽 4 厘米。这是一方印度式转角柱头石。1946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掘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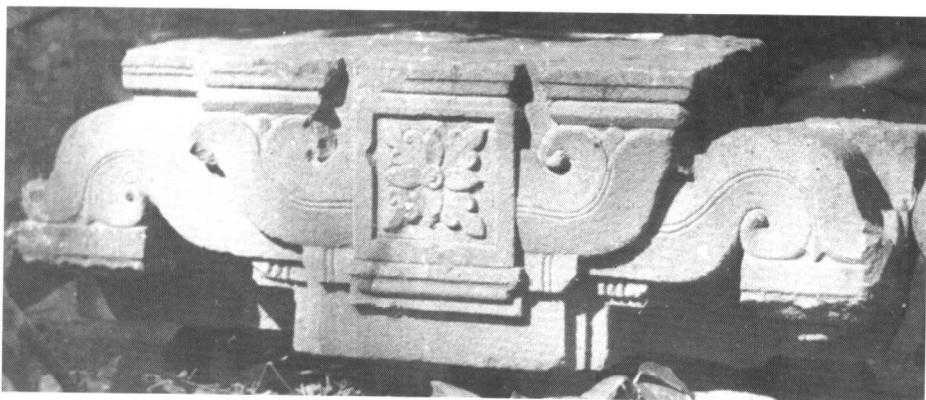
D 30.1 印度式柱头石



D 30.2 柱头石正面

D 31 印度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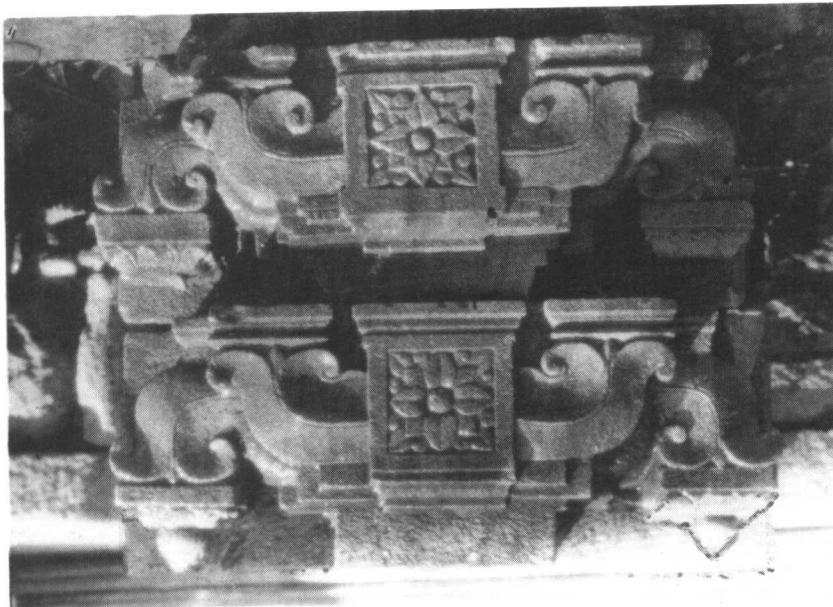
石刻长 81 厘米、高 27 厘米、厚 39.8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刻正中刻一正方形格，每边各长 14.3 厘米，格中浮雕四瓣花叶图案。以方格为中心，分别向左、右各伸出二花朵式石臂，一向上，一向下。向上花朵形石臂承托上面的建筑物。向下花朵形石臂，下端花瓣之下刻有花蕾。这是属于印度式的花朵形柱头石。1945 年，掘获于泉州通淮门城基础。



D 31

D 32 印度式柱头石

这是两方叠在一起的印度式花朵形柱头石，与上图(D31)比较，只有雕刻的图案和线条有些不同。图中下面一方柱头石的花蕾，尚保存完整。此二石均在 1938 年，从泉州南较场附近城基础掘获。



D 32

D 33 印度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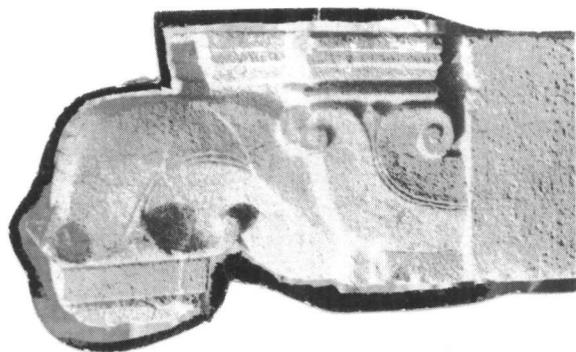
石长 90 厘米、高 3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在石的顶上，刻一方形平面，前后两面各刻卷瓣花朵及方格内的四瓣花叶图案，左右两旁作花朵式石臂向上、向下伸出。此种柱头石共发现五方，可能都是古印度式的十六角形石柱顶上的柱头石。



D 33

D 34 印度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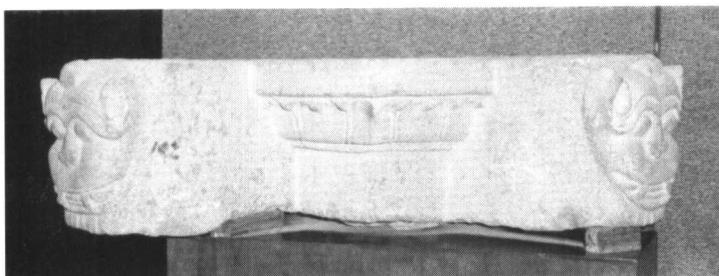
花朵形石梁长 9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雕刻和上图略同，惟下垂的花蕾已断毁。石的下部还有一个方形卯孔，深约 5 厘米。这是一方印度式的柱头石，上面应砌有一根石横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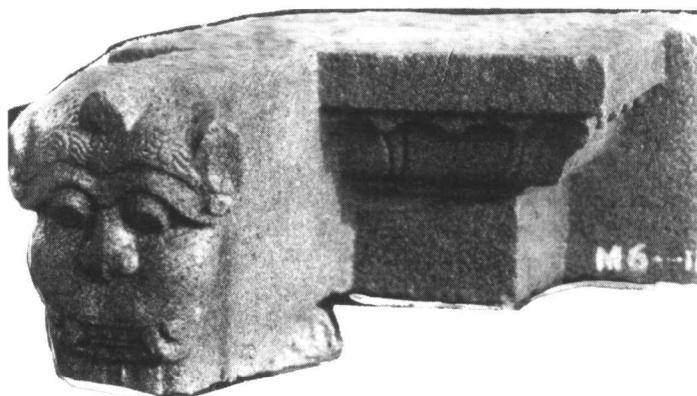
D 34

D 35 兽面形柱头石

柱头石高 28 厘米。顶面略作正方形，边长 45 厘米。柱头底下还有凸出的方形石榫，长、宽各 5 厘米。石的两边各刻有仰莲瓣。柱头石左右两侧各伸出一条石梁，长 40 厘米，末端各刻一兽头。两侧的兽头面部有所不同；其一张嘴露齿，另一闭唇仅龇出獠牙。辉绿岩石雕成。从石刻的总体看，它可能是一座印度教寺的转角柱头石。1939 年，在泉州涂门城基础内掘获。



D 3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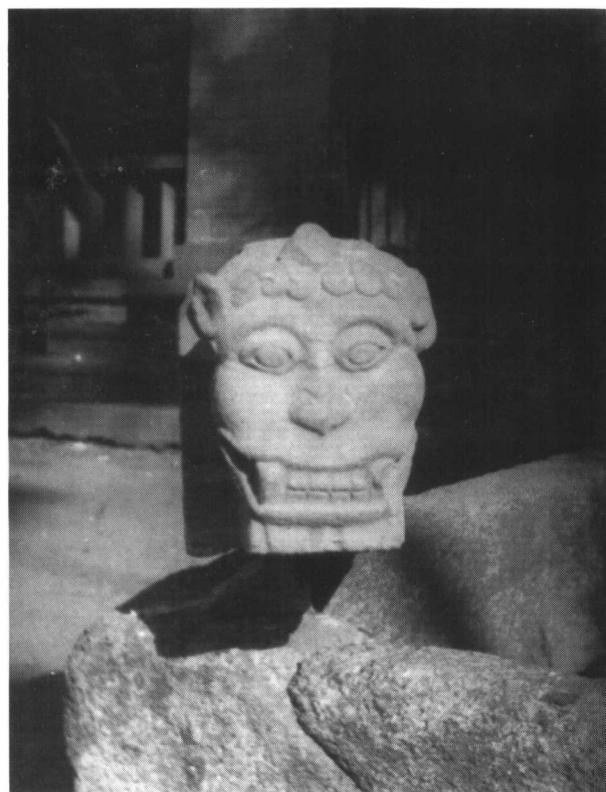
D 35. 2 兽面形柱头石左端



D 35.3 柱头石兽面细部

D 36 兽面形柱头石

石刻长 61 厘米、高 18 厘米,兽面高 16 厘米、宽 14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1943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垣掘获。1955 年 12 月,移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保存。



D 36.1 柱头石正面



D 36. 2 兽面形柱头石

D 37 兽面形石刻

1992年3月,泉州开元寺戒坛进行重修,于戒坛西侧回廊地下出土十一方古印度教石刻,其中兽面形石刻有六方,分别介绍如下。

D37. 1图中,兽头顶长一个角,双耳高耸,露牙,嘴里吐出气体在胸前构成羽翼形对称图案;中间垂下一个心形雕刻。下部基座刻剑形垂注。左侧石刻高59厘米、宽55厘米,右侧石刻高58厘米、宽40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37. 1



D 37.2

D37.2 图中,左侧石刻高 53 厘米、宽 41 厘米。右侧石刻高 57 厘米、宽 4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侧石刻胸前,浮刻握拳的双手,与另三件石刻有所不同。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38 兽面形石刻



D 38.1 兽面形石刻

D 38.2

D38.1 图中,石刻辉绿岩石雕成。高 54 厘米,宽 54 厘米,厚 62 厘米。胸前浮刻打结垂带,垂带下悬挂心形图案饰物。现存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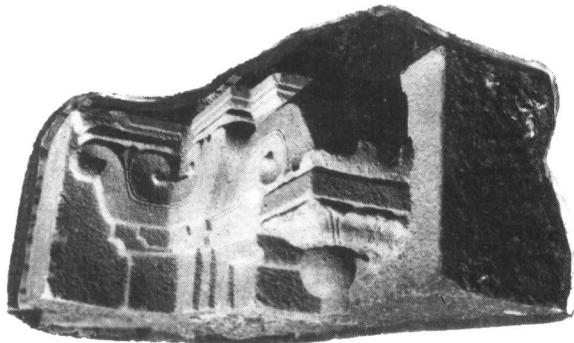
D38.2 图中,石刻辉绿岩石雕成。高 53 厘米、宽 41 厘米、厚 68 厘米。现存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

D 39 印度式柱头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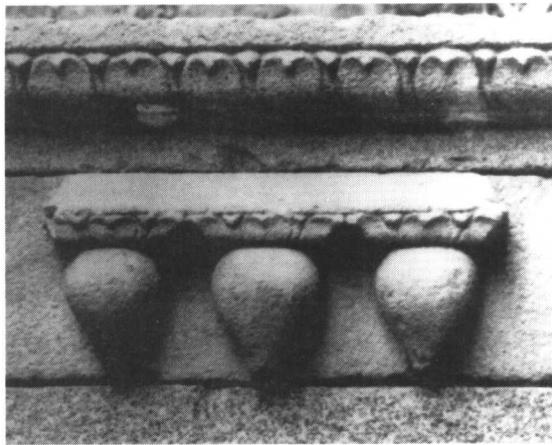
石刻高 3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转角柱头石,转角处雕一个花朵式石臂伸出,末端又雕花朵雀替。1945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内掘获。

D 40 印度式石雀替

石长 44 厘米、高 2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刻下面仰莲瓣之下雕成三个略似花蕾形物,尖端朝下,可能是一个印度式寺庙建筑物上的雀替石。1940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内掘出,至 1954 年才被发现收回保存。



D 39



D 40

D 41 印度式石雀替

这是一方印度式石雀替,高 52 厘米,宽 4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上部的雕刻与罗马式柱头石略同。下部雕有两层仰莲瓣,末端刻一花蕾。1952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墙边掘地时获得。现存厦门大学历史系人类博物馆。



D 41



D 42

D 42 印度式石栏杆柱头

这是一件残断的印度式石栏杆的构件，犹如栏杆望柱的柱头。石刻高 29 厘米，中部杀成 6 个面，每面宽 9.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上部浮雕重叠覆莲瓣，覆莲瓣上似乎是花萼。1951 年，在泉州南较场附近城基础出土。2001 年 9 月，在清理泉州南门城墙德济门遗址时，也发现同类型的完整的石栏杆构件。

D 43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所发现的七方这一类石刻，均作屋脊状。立面呈“人”字形，上部顶上雕刻两个圆圈，圆圈中浮刻花朵，顶面平，但 D43 顶面似加砌一尖拱形墓顶石，系后人所为。圆圈两侧，左右垂脊带有弧度，向两旁斜下，有上下数层，至屋檐处回卷，如云头状。两垂脊间的屋面（或墙面），常常刻着交曲云状纹、折枝花朵或心形图案。1945~1948 年，所发现的七方这一类型石刻，均白花岗石琢成，但形制大小不一。它们可能是亭式屋盖，或者是壁龛上的建筑物。就其雕刻艺术源流看，它们更像混合希腊和印度艺术的犍驮罗式佛塔上的雕刻。2001 年 9 月，在清理泉州南门城墙德济门遗址时，也出土一方同类龛顶屋脊形石刻。



D 43

D 44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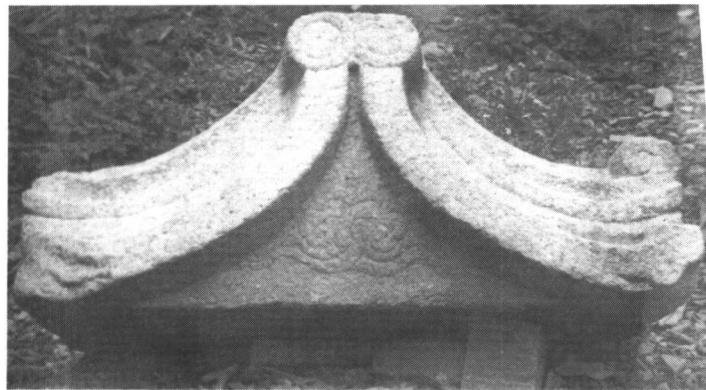
D 44

D 45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D 45

D 46 古印度教屋脊形石刻



D 46

D 47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石刻作四方形，高60厘米，宽6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全体刻成一屋宇状。屋顶有脊，屋脊的两端回卷起翘，脊上左右饰云龙。屋顶中间刻一个如钟形的宗教标识。屋宇顶之下，左右各有石柱，柱头略似古希腊式，柱头下承以莲花，柱身方形，刻有云纹图案。两柱外侧还各立一座塔，塔的下部有两根石柱，塔身作圆形，圆形中间刻图案花纹，塔顶有相轮三层。龛内右侧刻一尊四臂神像，头发上竖，前两手合十于胸前；后两手，一手持鼓，一手持兜鍪，趺坐



D 47

在仰覆莲座上。龛内左侧竖立一座塔状的“磨盘”，印度语称 Linga，“磨盘”下有仰覆莲座。这方石刻，是叙述婆罗门教三个主要神祇之一的大自在天王(Sjiwa)湿婆的化身，在男性生殖器的象征物前坐禅入定的故事^①。据厦门大学林惠祥先生说：这种塔状物是由古代印度人所崇拜的性器官模型演变而来的，所以叫它做“磨盘”，是因为它们的形状近似的缘故。在今日印度仍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石刻。该石刻于 1959 年调运南京博物院。

D 48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石刻的大小及轮廓形状与 D47 略同，只是龛内雕刻的内容不同而已。龛中右侧刻一尊神像，头上有螺髻，两手合十在胸前，头后有一圆形项光，趺坐在莲座上。其左边也有一座塔状的“磨盘”。这方石刻的故事内容，是叙述婆罗门教的大自在天王湿婆(Sjiwa)以另一种化身，在男性生殖器象征物前坐禅入定的故事^②。



D 48

D 49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石刻的大小、轮廓形状，与 D47、48 同。石龛内正中雕刻一四臂神像，面貌丑恶，怒发冲冠，右脚踩在一个伏卧在地上的人背上，左腿高高跷起。后二手各持有法宝，如兜鍪、火焰等物。左右两旁，站立着两个袒裸上体的女神，右边的一身，其头上有螺髻，两耳垂肩，一手下垂，一手握有棒状物；左边的一身则头发直竖，耳上有耳环，双手下垂，掌心向外。这方石刻是叙述毁灭之神大自在天王湿婆(Sjiwa)的妻子杜尔迦(Durga)改变形貌，战胜巨魔，将其踩在

^① 见吴世璜《印尼史话》，1951 年，椰城世界出版社。

^② 吴世璜《印尼史话》，1951 年，椰城世界出版社。



D 49

足下的故事^①。

D 50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龛中雕一尊四臂神像，袒裸上体，蜂腰，下着裙，趺坐。上两手持法宝，如环和矛等。右下手则作无畏手印，左手已残断。其置身于一朵大莲花中。这方石刻，是记叙保护之神遍照天神毗湿纽(Visnu)的妻子德斯威里伸张其四臂，趺坐在一朵怒放的莲花瓣中的故事。



D 50

① 吴世璜《印尼史话》，1951年，椰城世界出版社。

上述四方石刻中,D47 至 D50,是清代嘉庆年间居民掘地建屋时所获,因其刻有神像,遂即砌在墙上,其地靠近南较场(即今日泉州汽车站),以后有人把它们移砌在一个土地祠内墙壁上。1935 年,泉州洪水为灾,土地祠的墙屋倾塌,居民把它们移置在吴鲁的祠堂内。新中国成立后,移至开元寺内,由文物管理委员会保存。

这方石刻是 1943 年在泉州南岳街义泉宫发现的,地点也靠近南较场,距上述三方石刻发现地点不远。此四方石刻,就其石质、形状及雕刻内容看来,可能同是一座寺庙的建筑遗物。从雕刻的内容看,它是印度古代婆罗门教的故事。因此,我们断定此四方石刻属于印度教寺的建筑遗物。

D 51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石刻形制大体与 D47 相同,只是龛中浮刻一座莲台高高竖起,莲台上放置“磨盘”。在莲台和“磨盘”左右,各刻一尊神像趺坐在仰覆莲座上。在龛顶的钟形宗教饰物上,雕有狮子头形像。此方石刻可能与湿婆崇拜有关。石刻高 47 厘米,长 58 厘米、厚 21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1984 年,于泉州涂关门外东海乡下围村水渠边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51



D 52

D 52 古印度教龛形石刻

石刻高 48 厘米、长 65 厘米。1987 年 7 月,在泉州南门外晋江市池店村发现。石刻砌于池店村旧街道兴济亭壁上,当地村民把它当作观音崇拜。石刻中刻袒胸湿婆神像,头发直竖,两耳饰物垂肩,蜂腰,坐于仰莲台上。右腿盘起,左脚垂下,踩着一个仰卧者的头部。四臂,后两手在身侧举起;前两手平抬于胸前,各执法器。前右手所执长矛(矛已断)刺中地上仰卧者的胸部。湿婆两侧各站立一尊神像,皆蜂腰、耳垂及肩,头上有螺髻。

D 53 半兽半鸟形石刻

石刻系辉绿岩石雕成。石刻的中部偏上刻一条凹槽,分上下两个部分。下部刻图案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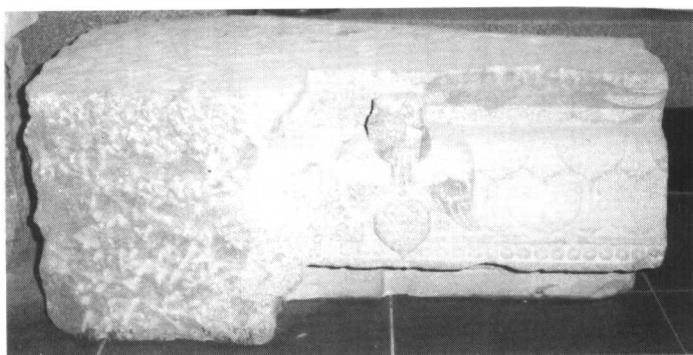


D 53

覆莲瓣,左边浮雕半兽半鸟形。兽面状如1992年3月在泉州开元寺戒坛西侧回廊地下出土的兽面印度教石雕(见D37、D38)。由兽口里吐出的左右两条云气,组成左右羽翼,中间垂线悬挂一个心状物。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54 半兽半鸟形石刻

石刻系辉绿岩石雕成。可能是一方转角石刻,石面分三个层,上层雕几何形直线槽;下层雕一排联珠;中层浮雕四层覆莲瓣。左边浮刻半兽半鸟形,但兽头已被破坏,羽翼及双层心状物完好。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54

D 55 印度式柱头石

这方印度式花朵式柱头石,不同于D31至D34的花朵式柱头石,如左边的雀替凸出石面较低;右边的雀替则朝向右面,可见这是转角处的构件。可惜石刻中部图案花朵雕刻被破坏。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56 印度教寺建筑石构件

石刻辉绿岩雕成。长61.5厘米,宽27厘米,厚21厘米。石刻分为六个层面,上层浮雕覆莲瓣;以下5层刻成几何形的面,每面凹入。1936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出土。



D 55



D 56

D 57 印度教寺门框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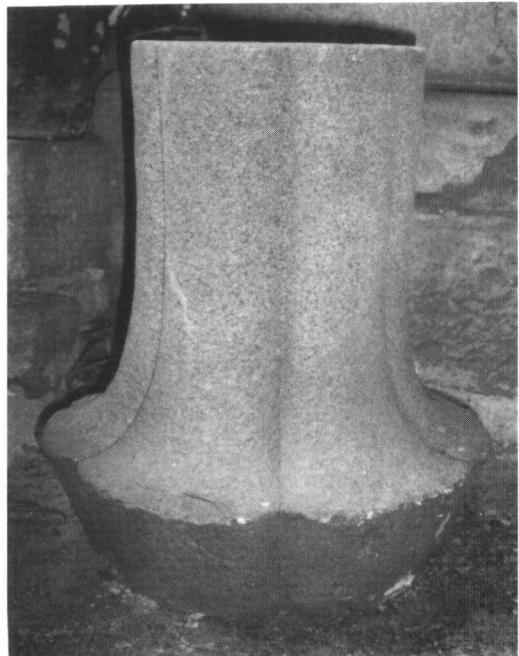
石残高 85 厘米、宽 32.5 厘米、厚 2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刻的正面，中间在长方形框内浮刻连续图案花朵；右边浮刻莲瓣纹。石的下部浮雕交缠蛇形图案，图案的右侧浮刻莲蕾一个。2001 年 9 月，在泉州南门城德济门遗址出土。现存泉州天妃宫。

D 58 印度教寺柱础石

柱础高 51 厘米、底径 35 厘米、顶径 27.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础顶平面呈六瓣花朵，有六条弧线贯通柱础底，自上而下渐向外展出。至距地面 11.5 厘米处又向内作弧形收缩，形成瓜瓣形状。其造型奇特，为泉州发现的印度教寺构件中所仅见。



D 57



D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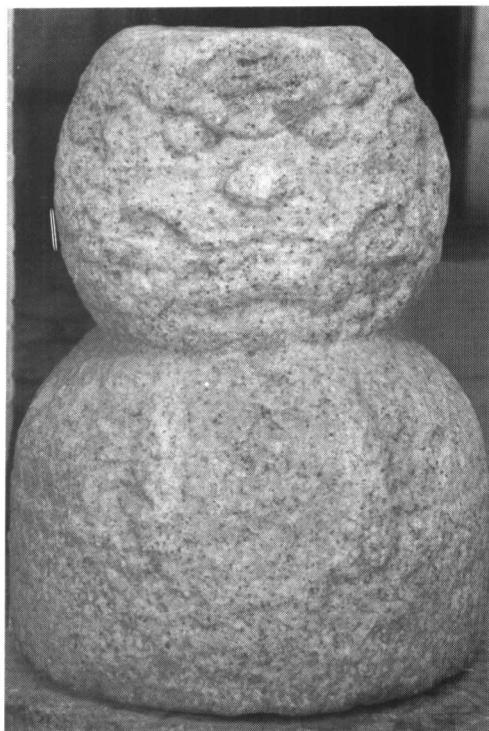
D 59

D 59 印度教寺建筑石构件

本图系砌于民居墙上及弃于地上的五方印度教寺石构件。地上的两方石刻,左边一方雕刻莲瓣;右边一方为杀成六个面的转角柱石。均为辉绿岩石雕成。

D 60 古印度教狮形石雕

此方石狮造像于上世纪 80 年代,在泉州城北模范巷“世相公宅”出土。造像高 45、底径 33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狮头浑圆,但顶被削平。狮面两眼圆睁,胡须向上跷起。狮头两旁浮刻卷毛。狮子额头上,阴刻一个汉字“王”。狮身项下有左右各一条领带下垂,狮身有一圈饰物。“世相公宅”正是 15 世纪锡兰君长邪巴来那的后裔居住的地方。狮头刻“王”字,表示已渗入本地民俗的避邪成分。

**D 61 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D 60



D 61 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石刻作长方形，高 50 厘米，宽 70.5 厘米，厚 1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发现于泉州城内靠近北门街的县后街白狗庙旁，砌在一个焚纸炉上。石面上浮雕着一头象，象头上戴一顶小帽子，背上还挂着镫踏，它用鼻子向左边树下的“磨盘”(Liṅga)献花，“磨盘”座下有云朵围绕。据《泉州印度式雕刻》一文记载：

“此故事谓树林中，Śiva-Liṅga 每日受一白象以花水顶拜。又有蜘蛛一，亦在 Liṅga 之上织网，以防树叶零落 Liṅga 之上。象以蛛网为不雅观，屡次去之。如图上所刻象足下及 Liṅga 下之云、花等物，或即象征扯下之蛛网。蜘蛛怒，攒象鼻中。象创痛甚，乃往来摇摔其鼻，以至于死。蜘蛛亦随亡。蜘蛛再世，遂为 Śaiva 之圣者 Kōc-ceṅgamān。”^① 石刻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62 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此石刻与 D61 同出于白狗庙旁的焚纸炉上。辉绿岩石雕成。宽 68 厘米，高 43.5 厘米，厚 25 厘米。石中刻一牛，牛的腹下有一个“磨盘”，右边有一棵树，树下趺坐一尊者(已损毁)。据《泉州印度式雕刻》一文中记载：

“此似述 Periya Purāṇa 书中之 Śaiva 圣者 Candeśa 故事。Candeśa 生为婆罗门，幼时见牧人痛笞孕牛，心甚不忍，遂自荐为之牧牛。每当母牛食草时，彼则默然入定，牛与 Candeśa 亲甚，竟不复思其犊。Candeśa 见乳溢流，欲以奉 Śiva(即上帝)，乃以泥沙作 Liṅga(磨盘)，以鲜美乳供之。牛受虔诚感化，亦均自动以乳敬神。惟村人怒失乳，使 Candeśa 之父覩其子。其



D 62 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①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1934 年。

父所见，即石刻上所刻的尊者傍树坐（石刻上的尊者，于清末被日人琢去），一牛乳 Liṅga 并舐之如其爱犊。父怒，击其子，子亦还击创父。事后 Caṇḍeśa 依然入定。于是 Śiva 及 Parvati 遂现身尊者之前，以代替其父母焉。”^①此石刻于 1959 年十周年国庆前夕，调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现藏故宫午门西甬道内。

D 63 古印度教祭坛石卧狮

石刻长约 70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狮头雕一凹入圆孔，为嵌珠之用。狮背阴刻“东后六”三个汉字。石狮下部刻有阳具。石狮后还有一个榫位，可能是祭坛石亭上的建筑构件。1930 年，在泉州北门小山丛竹附近居民掘地筑屋时获得，随即收回保存。



D 63

查《明史》有记载锡兰王不刺葛麻巴忽(Parakkama-Bahu VI)于明宣德八年(公元 1433 年)遣使入贡于中国。

天顺三年(公元 1459 年)，王葛力生夏刺·昔利巴交刺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②又《泉州府志》载：

世拱显，字尔韬，号小山，晋江人，本锡兰君长巴来那公之后……设教于小山丛竹亭。

执经问难者，屡满户外。^③

又《晋江县志》载：

小山丛竹书院，在府城隍庙旁，地处高埠，其气独温^④。

最早发表，并肯定图 D61、62 为古锡兰印度教神话传说，当推 1934 年瑞典学者戴密微(P. Demiéville)。其次，是 1935 年德国学者艾克(G. Ecke)于《刺桐双塔》发表“牛、磨盘、林加

①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1934 年。

②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外国七，锡兰山。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文苑，世拱显传。

④ 乾隆《晋江县志》卷四，学校志，(五)书院。

与尊者”的故事。1950年10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林惠祥教授,在《一九五〇年厦门大学泉州考古队报告》里,也提及这两方古锡兰印度教神话石刻。

白狗庙地处小山境(铺与境是明朝泉州基层行政单位的名称,境是最小基层行政单位)。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印度教崇拜狗,称狗为印度洋山神。在中国未见公然以狗命名寺庙的。图D60、61、62、63的石刻均在小山境发现和出土。《泉州府志》又记“锡兰君长巴来那公之后”的世拱显,在小山丛竹(即小山境内)设书院。现在小山境再发现“世相公宅”。1998年10月,清末由泉州外迁台湾彰化县的世氏后裔,来泉州寻根、谒祖,带来“世氏族谱”,记载“世氏小宗祠在城东北一峰书街”。一峰书街也在小山境。以上所有发现,表明锡兰王邪巴来那之后裔,曾在泉州城东北小山境建印度教寺庙、建小宗祠和建书院。

D 64 印度教寺石卧牛

石牛身长60厘米、头高39.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牛脖子上套有项圈,圈上有饰物。牛后部刻一长方形凹孔,孔内浮刻阳具。牛头上牛角不甚明显。石牛全身磨光,可能是长期被当作孩童的玩物造成的。1932年,在泉州东街南俊巷发现。1963年,南洋考古学家韩槐准先生建议收回保存。韩先生认为,印度教崇拜牛,视牛为神圣。这石卧牛与新加坡大坡大马路印度教寺庙围墙上的牛塑像相近,因此它可能是印度教寺在泉州的遗留建筑物。据《诸蕃志》卷上《南尼华啰国》载:

人早晚浴……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悉涂牛粪,相尚以此为洁。

又元汪大渊著《岛夷志略·华啰国》载:

俗怪,民间每创石亭数,四塑以泥牛,或刻石为像,朝夕讽经,敬之若人佛焉……几所坐之坛,所行之地,及屋壁之上,悉以牛粪和泥涂之,反为洁净。

印度教石卧牛的发现,证实了在元代泉州的确存在过一座颇具规模的印度教寺,或者存在过印度教祭坛之类的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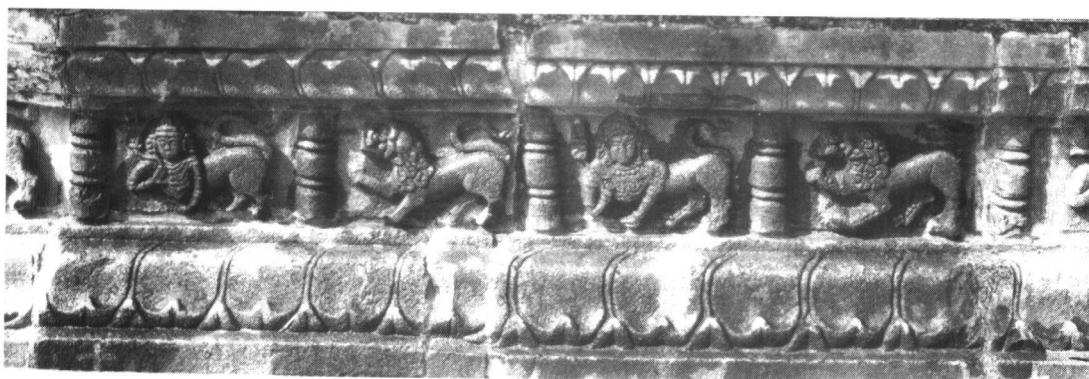
D 64

D 65 开元寺大雄宝殿月台古印度教须弥座石刻

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前月台须弥座，全是辉绿岩石琢成。石刻的束腰上，刻狮子和人面狮身（梵文 simha 及 narasinha），两种形象间隔排列。石阶的东面有狮子及人面狮身像浮雕 36 个，阶的西面则有狮子及人面狮身像 37 个。浮雕画面之间以间柱相隔。须弥座的上、下，则分别刻斜形仰莲瓣和覆莲瓣。狮子和人面狮身石刻，各一身为一组，长 38 至 40 厘米不等，高 21 至 22 厘米不等，且包括其上的须弥座斜形仰莲瓣，由一块辉绿岩石雕成。



D 65.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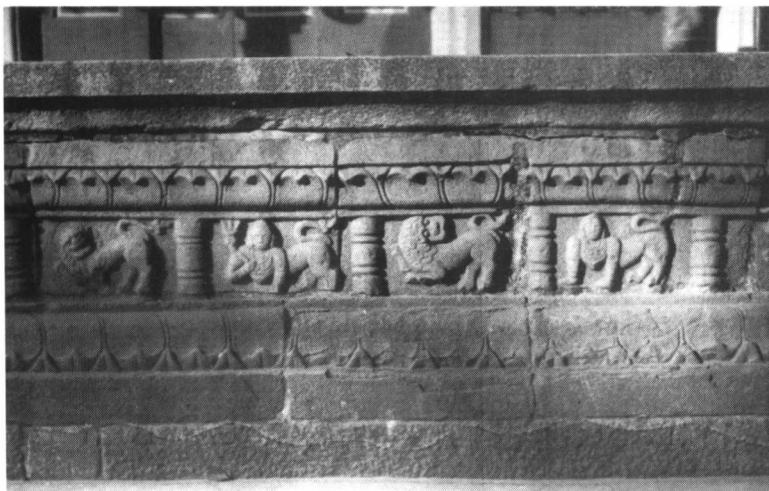


D 65.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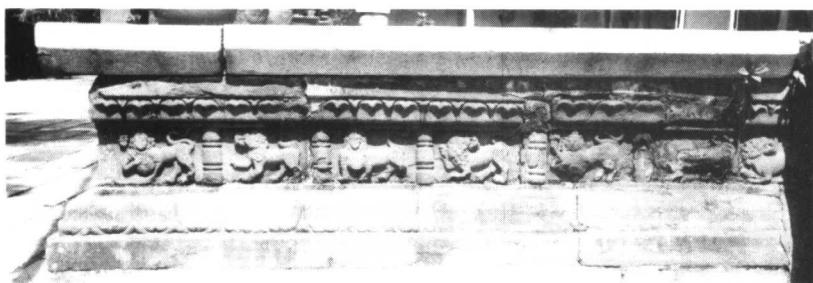
这种人面狮身的雕刻艺术，最初导源于埃及，其后由埃及传到希腊，再随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向东传至印度，然后由印度传入泉州。石刻中的人面狮身和狮子，形状、姿态各不相同。这些石刻原本与开元寺的建筑形式和风格均无关系，应是由一座印度教寺拆下而移入的。



D 65.3



D 65.4



D 65.5



D 65. 6



D 65. 7

D 66 印度教寺柱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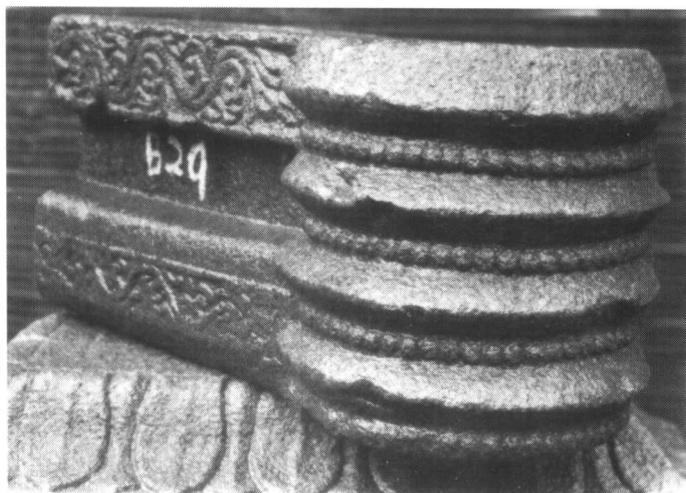
石长 55 厘米、高 25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在柱础石右边相连的石座正面，刻一个状若人面的狮头。这个狮头的状貌，与 D60 的狮头近似，也与印度尼西亚爪哇东部的日惹附近所见的印度教塔上的狮面雕刻有相似的地方。这方石刻，于 1920 年在泉州南较场城垣拆卸时掘获。



D 66

D 67 印度教寺柱础石

石高 2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的右端雕成圆柱形,共四层,每层雕刻一圈联珠环绕之,其左边和石座相连。1928 年,在南较场一带城墙拆卸时所获。



D 67

D 68 印度教寺柱础石

石长 70 厘米、高 23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此为转角石刻,有两个柱础位置,柱础左边为一个刻覆莲瓣的六角形柱础,右边为一个方形的柱础。右边柱础的正面两边均刻盘蛇图案,中间凹进处,雕刻一株牡丹花。1945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内掘获。历年来,发现这类型的柱础石共有四方。



D 68.1



D 68.2 右边柱础

D 69 印度教寺柱础石

石刻长 64.5 厘米、高 26 厘米、厚 2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础位置在石座的左边，作六角形。柱础刻三层覆莲瓣。1947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掘获。



D 69

D 70 印度教寺柱础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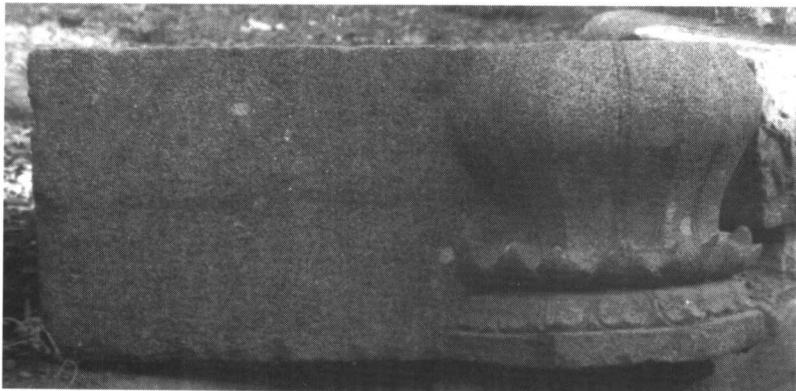
石刻长 58 厘米、高 25.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础位置在石座的右边。柱础作五角形，刻三层覆莲瓣。这方柱础石雕刻的处理方法，是柱础位只雕刻一半露于石外。1947 年，泉州通淮门城基础掘获。



D 70

D 71 印度教寺柱础石

石刻长 66 厘米、高 29 厘米、厚 2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柱础位置在石座的右边。柱础作六角形。从上至下，刻二层覆莲瓣，上层覆莲瓣的尖端翘起，与 D68、69、70 略同。1947 年，在泉州通淮门城基础掘获。



D 71

D 72 印度教寺柱础石

石高 2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柱础略作六角形，上层雕大莲瓣，下层雕细莲瓣。这方石刻，在 1947 年泉州通淮门城基础内掘获。与此同型的石刻共发现六方。



D 72

D 73 印度式蛇形纹石刻

这是两方同一类型的古印度式蛇形纹石雕刻。石块大小一样，长 72.2 厘米，高 28.3 厘米，厚 21.7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块的左右两端，正面、侧面分别雕刻蛇形纹图案，图案组织在统一中富于变化。现在石刻砌于墙基。图 D73.1 为石刻的整体外观。D73.2~4，拍摄石刻的细部。1946 年，在泉州通淮门附近城基础掘获。



D 73. 1



D 73. 2



D 73. 3



D 73. 4

D 74 印度式蛇形纹石刻

石块长 72 厘米、高 29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石上刻有方形图案，每石刻三方图案。1947 年，由泉州通淮门城墙基础内掘获。它们可能是印度教寺建筑中的石刻构件之一种。据厦门大学林惠祥教授说，这是一种蛇形演变而成的图案，在印度古建筑物上也曾见到这种雕刻。像这样的石刻，陆续在泉州东门及通淮门交界处的城墙地基里发现的已有五方。



D 74. 1



D 74. 2



D 74. 3

D 75 古印度教大独石柱

泉州临漳门外，距石笋桥约0.25公里的龟山上，道左有一根直立向上的圆锥状石刻，高3.15米，底座圆周长4米。由六段白花岗石缀合而成。顶部圆钝，尖端下部稍膨大，渐下渐粗。整个石刻的外貌，状如男性的生殖器官，俗呼“石笋”。据《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一）古蹟》载：“石笋，在临漳门外山川坛西，石卓立二丈许，江在其下，故名笋江。”笋江及石笋桥即由此得名。宋王十朋有诗云：“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黄龙窟宅占江头，呼吸风涛势湍紧。”^①可见这根石笋，老早就有了。当地乡民传说它是从北门外的清源山，在某一天的夜间，突然飞下来的。但照我们的看法，它实在是一根石祖。石祖在古时是被人们作为崇拜的对象。按《晋江县志》载：这根石笋，“宋守高惠连以私憾击断为二。明成化中守张嵒补而属之。”^②

有人认为印度崇拜男性生殖器是很流行的，推测这也许是北宋时印度人的文化遗迹。最近见到泰国王宫附近一座印度人寺庙的一根大独柱石的照片，它也有1米多高，状似泉州的“石笋”。南洋考古学家，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韩槐准认为，华南在秦汉以前尚未或极少接触中原文化，从事工商活动的印度第三阶级毗耶(Vaisia)，已逐渐通过越南，把印度教传入华南以至福建。泉州除发现元代印度教寺外，还于北门发现该教的祭坛遗物。更发现泉州有膜拜狗将军石雕像的。《涅槃经》十六，有“牛狗外道”一词或“持牛戒狗戒”等语。所以对泉州的

① 见《泉州府志》卷十，桥渡和《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一）古蹟。

② 见《晋江县志》卷十五，古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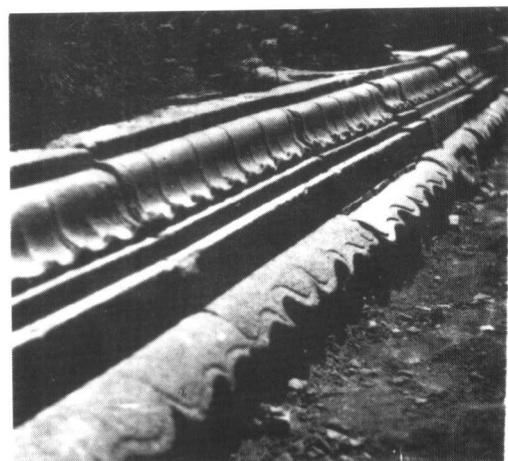


D 75

大独石柱就不能孤立地看待,它很可能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在泉州的遗物,甚至说它可能是秦汉以前的遗物。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前,附近居民仍流传崇拜这石祖,相信可以使不育的妇女怀孕,使家畜繁衍、五谷丰登。这与印度教的崇拜“林加”、“磨盘”的意思相近,因此韩槐准先生的看法值得认真探讨。

D 76 印度教寺建筑基座石刻

泉州通淮门城垣掘获的几十方雕刻有莲瓣及其他图案花纹的古印度教辉绿岩石刻,按它们原来的建筑形式拼合成为一长列的建筑物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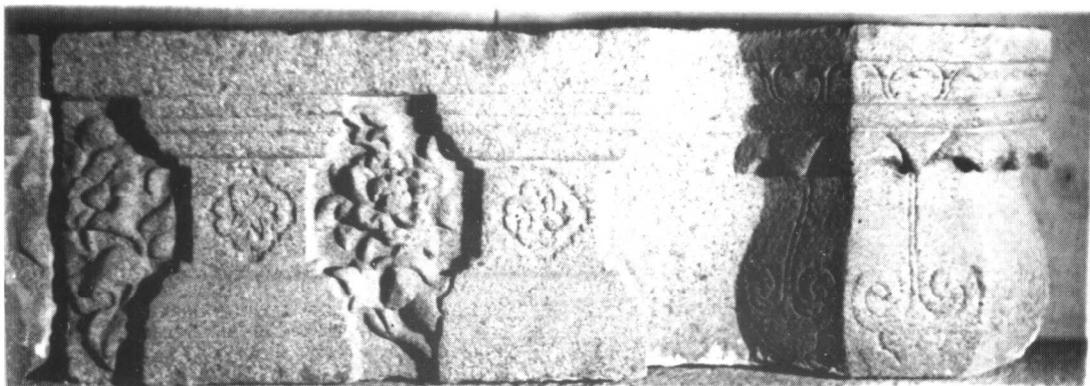
D 76

泉州宗教石刻

座。这样的石刻，是在泉州城的东南隅城垣上及基础内所掘获的，至少在千方以上。这类石刻，很可能是从印度教寺中拆卸下来的。

D 77 印度教寺柱础石

本图与图 D68 为同一类型的印度教寺柱础石。石材和尺寸大体相同，只是雕刻的图案略有不同。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这类石刻在通淮街释迦寺亭子基础上有多方；上世纪 80 年代津头铺乡农民在迁建房屋时也出土许多方，但随即被埋入房屋基础下。



D 77

D 78 印度式蛇形纹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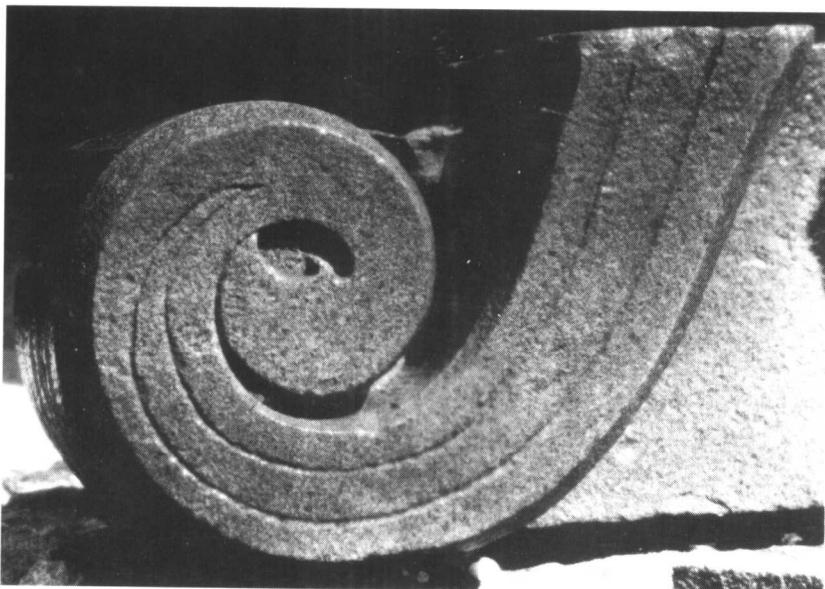
石长 45 厘米、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边已残断。它是一方须弥座上的石块，石面有浮雕蛇形变体的几何纹图案。1943 年，在泉州奎霞巷内民屋墙壁上发现的，可能与印度教寺有关。



D 78

D 79 古印度教石刻

石刻长 66 厘米、高 41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刻为一卷瓣花叶，其上原坐着一位女神，袒裸上体，细腰挺胸，双手合十于胸前。女神像于掘获时被破坏。石刻现藏某姓家中，仅剩一瓣花叶。它是和一些印度教寺石刻同时出土的。1947 年，在泉州通淮门靠近小东门的城基础内掘获。



D 79

D 80 锡兰王裔“世家坑”墓地

泉州城东北郊清源山余脉的东岳山，自古以来是墓葬地。在东岳山的西北方向，有一条山沟称“世家坑”。此地是明朝锡兰王子率领的使团成员及其后裔的墓葬地，发现有世氏墓碑 23 方，其中冠以锡兰国籍者 8 方。为什么锡兰王裔会卒葬泉州呢？

据《明实录》记：

永乐七年(公元 1409 年)，(郑)和等初使诸番至锡兰山，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锡兰山；遂诱和至国中，令其子纳颜索金银宝物，不与。潜发番兵五万劫和舟，而伐木拒绝，绝和归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觉之……由间道急攻土城，破之，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遂以归。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而无知，命姑释之，给予衣食；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①。

^① 《明实录》卷一百十六。

福建省长乐市区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云：

永乐七年……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①

随郑和下西洋的费信，他在《星槎胜览·锡兰山国》云：

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彩妆、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建石碑，以崇皇图之治，赏赐国王头目。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我正使太监郑和等深机密策，暗设兵器，三令五申，使众銜枚疾走，夜半之际，信炮一声，奋勇杀人，生擒其王。至永乐九年归献阙下。寻蒙恩宥，俾复归国，四夷悉钦”。^②

经过此役，锡兰山国贡使来贡不绝。最后一次入贡，系“天顺三年（公元 1459 年），其王葛力坐夏，昔利把交刺惹复遣使来贡”^③，嗣后不复至。

这里有个问题弄不清楚。当亚烈苦奈儿被留于中国而未被释归之前，永乐皇帝曾“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这个“贤者”当名邪巴来那，且遣使册封为王。册封时间为永乐十年。可是《西洋朝贡典录》说永乐“十年，诏谕其国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正统十年，国王遣其臣耶把刺漠的里哑等朝贡。天顺三年，其王葛力坐夏，昔利把交刺惹复遣使来贡。”^④这些记载表明永乐十年以降至天顺三年，锡兰君长名字有几个。

据《锡兰简明史》记：

僧诃罗文著作中没有记载波罗迦罗摩巴忽六世如何获得政权的详细情况……我们从中国史料中获悉，他是由中国皇帝提名，在郑和的海军支持之下登位为王的。中国史料中明白记载，僧诃罗族战俘在中国朝廷所推举之人为邪把乃那或耶把乃那，后来被称为不刺葛麻巴忽刺批，即波罗迦罗摩巴忽·罗阇……波罗迦罗摩巴忽于是在公元 1436 年、1445 年及 1459 年，陆续派遣使节前往中国，以资应付。中国史传中所记载最后一年派遣使节的锡兰国王的名字（按即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译者），和现存资料中所说波罗迦罗摩巴忽的任何别名或称号，都不相同。但是当时锡兰没有别的统治者可以派遣这一使节。向中国朝廷报道的名字必然是波罗迦罗摩巴忽在其统治后期所具有的称号，但是今日存在的任何官方文件或文学作品，均未提及这一称号。^⑤

但是，乾隆《泉州府志·文苑·世拱显传》记“世拱显……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康熙癸巳（康熙五十二年，公元 1713 年）举人。”^⑥又注明这些材料“采世氏家传”。

根据台湾彰化世氏家谱，泉州世氏于“道光间客游台彰，家礪溪。”族谱记泉州世氏来源如下：

① 见福建省长乐市南山寺郑和史迹纪念馆陈列的《天妃之神灵应记》碑。又见本书“第一部分伊斯兰教”泉州灵山圣墓郑和行香碑“附录”。

② 费信著、冯承钧校注《星槎胜览校注》，前集，锡兰山国。1954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③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卷中，锡兰山国第十五，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④ 黄省曾著、谢方校注《西洋朝贡典录》卷中，锡兰山国第十五，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

⑤ 锡兰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纳著，李荣熙译《锡兰简明史》下册，第十七章，科提王国直至公元 1505 年，第 494~498 页。1972 年 8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⑥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国朝文苑，世拱显传。

一、说泉州世氏是锡兰山君长巴来那之后。

(一)《重修族谱序》：“吾祖系锡兰山巴来那公之后……为国使来华人贡，蒙留京……国用不敷……遂家温陵”。“温陵”为泉州之别称。

(二)《锡兰祖训》：“吾祖以锡兰君世子充国使……来华人贡……赐留京……归途温陵，爰此山水，遂家焉。”

二、说泉州世氏是锡兰山君长巴来那人。

(一)《锡兰支系》：“我开基祖本锡兰国君长，讳巴来那……钦赐姓世，授四夷馆通事，入闽……迁泉(州)建祠郡垣……公原配蒲氏。”

(二)《锡兰人房历代系》：“我始祖巴来那公，由锡兰君长入闽，为四夷馆通事”。

台湾彰化世氏族谱重修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同一族谱对泉州世氏的始祖却有不同说法，而且二说都可从泉州1996年12月出土“明使臣世公孺人蒲氏墓”和“通事世公慈淑谢氏墓”等两方墓碑得到证明。

还有一个问题，即居留泉州的锡兰王裔是信仰佛教还是信仰印度教呢？在明朝补入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僧迦逻国佛牙精舍》条云：“大明永乐三(应为七)年，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法，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可见，那时锡兰锁俚国王阿烈苦奈儿，以及其治下的社会是不信奉佛教的。阿烈苦奈儿所信奉的宗教，是流行印度和锡兰的被佛教称为“外道”的印度教。

又据明朝黄省曾著《西洋朝贡典录》云，锡兰山国“其王锁俚之人，修浮图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国人咸灰牛粪涂其体，食惟其乳，死则埋之。自王以下，晨用牛粪涂其居，而后礼佛。”^①这里记载的锁俚人“咸灰牛粪涂其体”和“晨用牛粪涂其居”等皆为印度教的习俗。

2004年4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郑和研究》杂志编委会主编时平教授，偕同南京电视台一行到泉州寻访、拍摄郑和史迹。据时平教授称，他们为摄制郑和史迹纪录片，到斯里兰卡寻访郑和史迹，发现一个新的问题，即郑和到达锡兰山国时，锡兰分为三国，一为信仰佛教地区，一为使用泰米尔文字的信仰印度教地区，一为信仰伊斯兰教地区。而郑和到锡兰登岸的地点，正是使用泰米尔文字的信仰印度教的地区。所以锡兰王亚烈苦奈儿等是印度教徒，故郑和要劝其“远离外道”。又郑和为表示对锡兰人信奉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尊重，



D 80

^①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中，《锡兰山第十五》，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

永乐七年(公元 1409 年)在 Calle 地方刻立用汉字、泰米尔文字和波斯文字的石碑。汉字碑文的内容是表示对佛陀的敬献及所送香礼的清单;泰米尔文字碑文的内容是对毗湿纽的敬献;波斯文字的内容是表示对安拉的敬献。我们在本书伊斯兰教部分已述,郑和是伊斯兰教徒,同时是佛教徒,但他对印度教也尊重。今天,三种文字的石碑仍保存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里。

综上所述,留居泉州的锡兰王裔,应该是天顺三年(公元 1459 年)来华人贡的昔利把交刺惹,他们取名字的第一个字“昔”为姓,“世”与“昔”谐音。锡兰王亚烈苦奈儿及王室均信仰印度教,因此昔利把交刺惹居留泉州后,他本人或后裔在泉州城北小山境建印度教寺庙——白狗庙。至第四世孙世华(裕斋公)建置产业在“晋江东关外世家坑,土名世厝埔”(《台湾彰化世氏族谱》)。

D 81 使臣世公墓碑

墓碑高 133 厘米、宽 47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刻汉字,内容是:

明
使臣世公 爳人蒲氏 墓。
孙华立。

1996 年 12 月,石碑在泉州东岳山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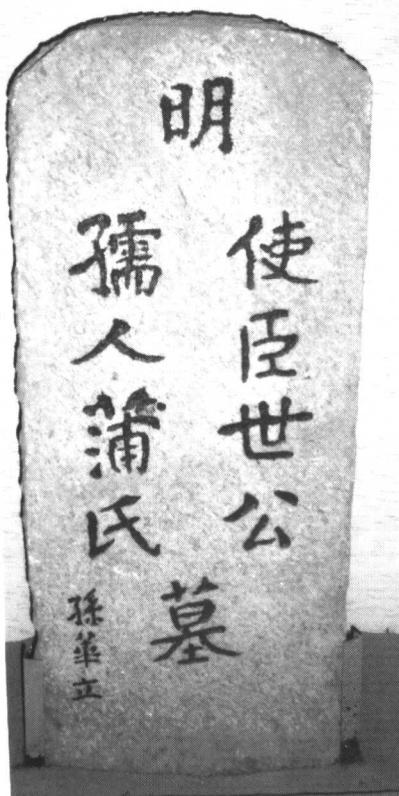
据台湾彰化《世氏族谱·锡兰人房历代系》载,四世长房裕斋公“建置产山在晋江东关外世家坑……安葬一、二、三世祖考妣,为一大穴,后竖三石墓碑。”又墓碑有“孙华立”三字,“华”即世华。据乾隆《泉州府志·节孝》云,世华妻童氏系“节妇授七品秩”^①。乾隆《泉州府志·贞节》记:“世华妻童氏,年二十五夫歿……嘉靖二十三年(公元 1544 年)旌表。”^②而道光《晋江县志·学校》载:“明旌表授七品散员世华妻贞节童氏。”^③

由上引述则知,建置世家坑者为世华,合葬世氏一、二、三世祖者亦为世华,刻立“使臣世公”墓碑者还是世华。可见,世氏一、二、三世祖墓原来不在世家坑,或许已经湮没,故四世长房世华置产重立祖坟墓碑。而墓碑上“使臣世公”可能就是锡兰王裔昔利把交刺惹其人。而墓碑上的“竃人蒲氏”,有的学者以为是阿拉伯人或波斯人,因为宋元时期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国人习惯简称为蒲氏。有的学者还推论碑上的“蒲氏”是回族人。其实不一定,宋、元、明时期,中国人也习惯称从海上丝绸之路来的人为“蒲氏”,那就局限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了。所以本墓碑上的蒲氏,也有可能是锡兰人。此外,在探讨“蒲氏”的国籍时,还要考虑到宗教因素,印度教徒与伊斯兰教徒是不通婚的。况且,明永乐五年(公元 1407 年)明成祖颁布保护伊斯兰教敕谕后,回族恢复族内通婚习俗,与异教徒通婚更是不可能。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四,学校二,节孝。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六,列女一,贞节。

③ 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四,节孝贞烈。



D 81



D 82

D 82 通事世公墓碑

墓碑高 134 厘米、宽 37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碑面阴刻汉字：

通事世公 慈淑谢氏 墓

前一墓碑“使臣”姓世，这方墓碑“通事”也姓世，可是只有锡兰王裔才姓世，这位“通事”是谁？而台湾彰化世氏族谱说“通事”是邪巴来那，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假设这位“通事”为锡兰“使臣世公”之子，倒有其可能。

D 83 锡兰世氏祖茔碑

碑高 45 厘米、宽 50.5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面琢成有肩弧顶，阴刻：

锡兰

世氏祖茔

1996 年 12 月在世家坑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83

D 84 锡兰世氏墓碑

碑的下半部残缺,残高 25.5 厘米,宽 35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弧顶,碑面阴刻:

锡兰

世氏.....

据残存碑铭可知为锡兰世氏家族某人的墓碑。1996 年 12 月在世家坑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84

D 85 锡兰故考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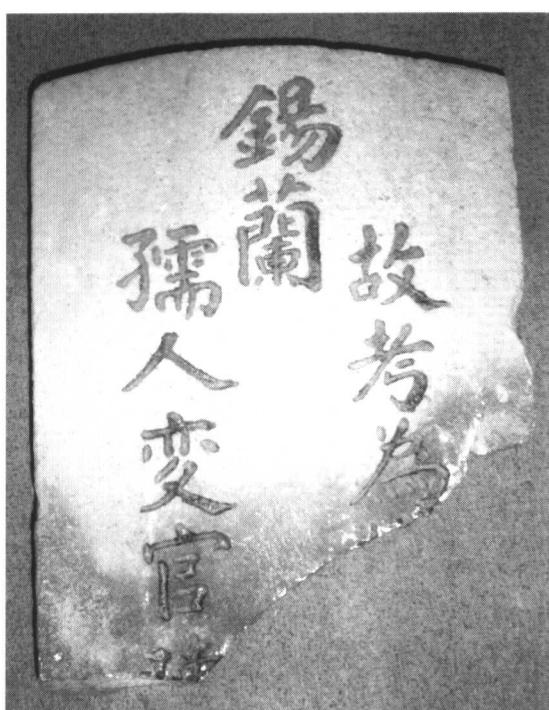
碑的下部残缺,残高 45.5 厘米,宽 34.5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弧顶,碑面阴刻:

锡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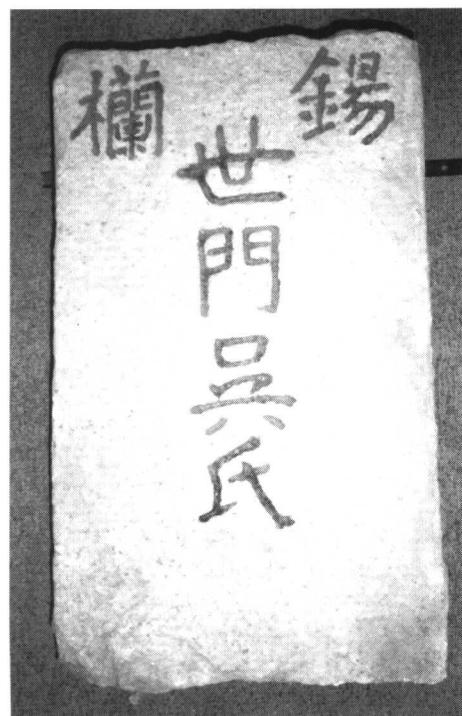
故考为……

孺人变官□……

1996 年 12 月在世家坑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85



D 86

D 86 锡兰世门吴氏墓碑

碑顶已残缺,原来应为弧顶。残高 43 厘米,宽 24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面阴刻

锡兰

世门吴氏

此碑系嫁入世氏家门的吴姓妇女之墓碑。1996 年 12 月在世家坑发现,现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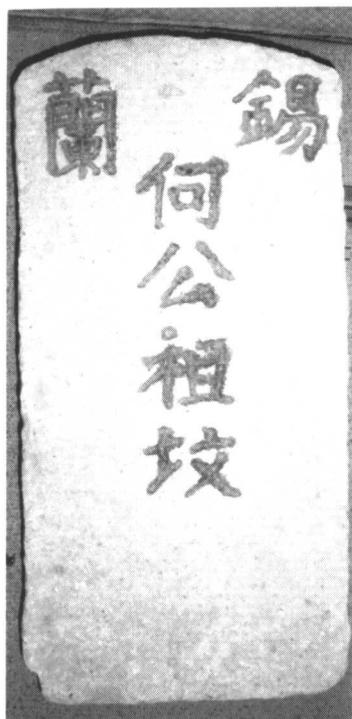
D 87 锡兰何公祖坟碑

碑高 44 厘米、宽 21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面阴刻:

锡兰

何公祖坟

锡兰王裔取汉姓“世”，但这里有“何公”，是否锡兰使团的其他成员改汉姓“何”，亦有可能，且存疑。1996年12月在世家坑发现，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87



D 88

D 88 锡兰宗什敦岸世公祖茔碑

碑高64.5厘米、宽23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面阴刻：

锡兰

宗什 敦岸

世公祖茔

据台湾彰化《世氏族谱·寻源之图》载，“宗什、敦岸”为十五世，宗什为三房，敦岸为四房。但族谱把敦岸作“宗晏”。1996年12月在世家坑发现，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89 锡兰考开仕世公祖坟碑

碑高38厘米、宽48.2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面阴刻：

锡兰

皇清

考开仕世公 姮顺懿林氏
祖坟
翰林院庶吉士外甥孙
杜中士勒石

杜中士，据道光《晋江县志·选举志》载，系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进士，“庶吉士，改授礼部主事”。^①又如台湾彰化《世氏族谱·锡兰祖训》有一条“产女宜收养也”的祖训，其中举两个例子说明，云“吾祖简斋公有二女，一为黄文简公太夫人，一为何镜山大夫人。皆弛赠岳父母一品诰封，戴纱帽穿红袍，至今泉人以为美谈。此后子孙须恪守祖训生女勿溺。自必感召天，和无使我祖专美于前也夫。”

黄文简公，即为黄凤翔，系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榜眼^②。何镜山，即何乔远，系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进士^③，《闽书》的作者。则知居留泉州的锡兰世氏女，有多人与士大夫阶层联姻的。1996年12月在世家坑发现，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D 89

D 90 锡兰孙振世公祖坟碑

碑高79厘米、宽34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碑面阴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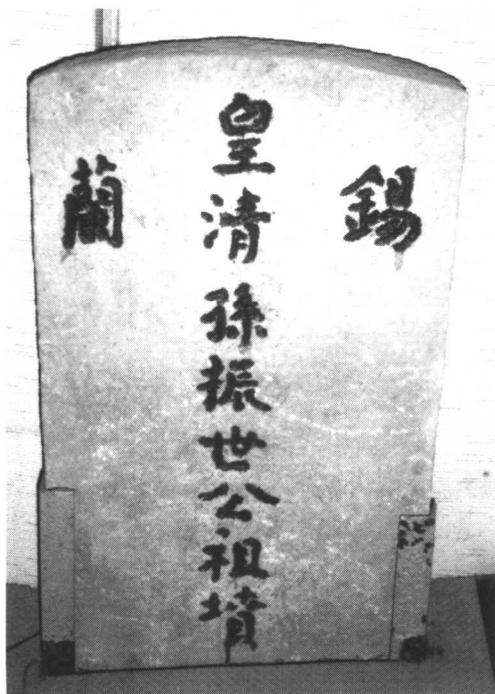
錫蘭
皇清 孙振世公祖坟

1996年12月在世家坑发现，今存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① 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选举志·进士。

② 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选举志·进士。

③ 道光《晋江县志》卷三十，选举志·进士。



D 90

二、附录

(一) 婆罗门教的传入和泉州的印度教寺

关于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专著,我国翻译出版甚少。此教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已弥漫于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间,我国海南岛也被波及,仅仅由外国学者研究而发表的若干著作,如《印度尼西亚史》、《马来亚史》、《占婆史》和《扶南史》等,以及从近年我国学者翻译的零星译文略窥一二而已。查婆罗门教所崇拜最主要之神为大梵天王(Brahma)、遍照天王(Vishma)和大自在天王(Sjiwa)。此三大神皆骑动物。大梵天王骑鹅,遍照天王骑鹰,大自在天王骑公牛。然此三神之中,信徒尤重视大自在天王,可能牛的崇拜与此有关。据《涅槃经》十六,有“牛狗外道”一词,谓“六种苦行外道”之一,“持牛戒或狗戒”,云云。或者此教的拜牛及拜狗与此有关。

南洋考古学家韩槐准先生认为,海南岛临高县毗耶神坛一史事,以及海南岛、雷州半岛、合浦、廉州等处盛拜的石狗公,似是古代婆罗门教的第三族姓的毗邪(Vaisya)商人崇拜婆罗门神的遗迹和遗风。有的学者认为,广东、广西一带的俚人亦有崇拜石狗的风俗。但泉州人崇拜的石狗公称“毗舍爷”与 Vaisya 同音。所以有可能是早期印度“毗邪”阶层传入了狗的崇拜。

查毗耶(Vaisya)，我国佛教经典的译名甚多，有毗舍、吠奢、吠舍和婢舍等等。秦汉以前，离海南岛不远的占婆(占城)，即沾染印度教(婆罗门教)，则海南岛亦被沾及亦属可能之事。且海南岛至西汉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始立为朱崖儋耳郡地。“儋耳”二字的命名，乃由于当地有印度教徒尚垂耳(以法穿耳孔使长大)习惯。在《后汉书·南蛮》中，有朱崖儋耳的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缠之，垂肩三寸”，尤为可信(现在新加坡垂大耳的印度教徒，华侨多称之为“大耳孔”)。

经外国学者研究，当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印度航海商贾，每到地中海沿岸诸国运商品，如古人视为至宝的琉璃珠等货。在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发现公元前四五世纪的埃及式琉璃珠，皆为印度的商人运来的遗物。可能我国湖南、广东和云南等处战国、西汉墓葬出土的西方式(或称欧洲型)的琉璃珠，其中一部分似是从北部湾(东京湾)流入的，亦可能属印度毗耶阶级由西方输来之品，广州南越王墓的发现就是证明。

秦汉以前，中原通南海之路，是利用汉水经湘江，越一段湖南与广西间的短程陆路，再利用漓水经西江、容江、廉江，自合浦入海。至秦始皇，再以人力开一运河于湖、广间，名灵渠，尤利于交通。汉以后，中原始利用赣江，并利用壮江，由广州入海。故埃及式琉璃珠在湖南、广东出土最多。

关于我国所称婆罗门教，这一名词可能是因循各佛教徒的译经，如《大唐西域记》等。其实，婆罗门从属印度教门中之第一族姓(亦称种姓或阶级)而已，依英文应名为 Hinduism(印度教)。我国佛教经典尚无定名，统称为外道、异道或涂灰。此教分为四族姓，依《梵汉字典》译音是：

- (一)婆罗门(Brahmana)
- (二)刹帝利(Kchattriya)
- (三)吠奢(Vaisya)
- (四)首陀(Sudra)

不过其英文译音各有差异。

至于此四族姓有阶级含义，依玄奘著的《大唐西域记》卷二《族姓》所述云：

若夫族姓殊者，有四流焉：一曰婆罗门，净行也，守道居贞，洁白其操。二曰刹帝利，王种也，奕世君临，仁恕为志。三曰吠奢，商贾也，贸迁有无，逐利远近。四曰戌陀罗(首陀)，农人也，肆力畴陇，勤身稼穡。

关于这个问题，商务印书馆发行的《远东史》上册第42页和英国人 Louis Renou 著的《Hindusim(印度教)》一书第53页亦略为述及。

又世界上所有宗教，崇拜神祇最多的，首推婆罗门教(印度教)，据称有三亿三千万个(参阅丁福保著《佛学大辞典》及吴世璜著《印尼史话》)，几乎无所不拜，禽兽类最崇拜者是牛。至于牛的崇拜的含义与表征，在 L. Renou 著的《印度教》一书之第18页 worship of the cow 亦略述及。在英人著的《印度百科全书》cow 条记载尤详。

至于对狗的膜拜，也是婆罗门教的遗风。我国的海南岛、雷州半岛、合浦等处都有雄狗的石刻像(称石狗公)。韩槐准先生收集数只石狗公。临高县的毗耶神坛，原是一石狗公。此等

石狗雕刻，多是尖口。在爪哇印度教石器遗物中，亦有此类型的，当地人称为 Gunong Kidul（意为印度洋山神）。泉州地方也有膜拜狗将军的，而且亦有尖口石狗公雕像（可惜已被破坏），此似是早期又一婆罗门教在泉州地方的遗物与遗绪。

韩槐准先生认为，婆罗门教似在秦汉以前，或在东周中期，其势力已初植于越南南部，故汉初其势力曾建一印度教统治之国家于此，可能为印度教第三阶级专司工、商之毗耶所创。其教似秦汉时在华南作蠕动式的传播，其教苦行的教徒已把其教传播于华南（参阅雍正年刊《广东通志·卷六十四·杂事·琼州府毗邪》）。海南岛之崇拜石刻狗神（参阅《棘林杂俎》、《湧幢小品》），《后汉书·南蛮传》关于朱崖儋耳（即海南岛）之“渠帅贵长耳，皆穿而缠之垂肩三寸”的记载，皆为印度教的遗风（有的学者认为是百越族的风俗）。广东各寺庙于前门的神桌下，每拜一狗式石神，可能即佛徒所称之外道（即印度教）。泉州的膜拜狗将军雕像等，似均亦属印度教的遗风。

韩槐准先生认为，华南在秦汉以前，尚未接触或极少接触中原文化，致印度教司工商之第三阶级毗耶派，逐渐由越南传入，可能仅传到福建而止，其时期可能由战国而至秦。证以《梁书·扶南传》记“俗事天神……二面者四手”的记载，正吻合。自佛教兴盛而后，南洋群岛各地崇信的印度教皆已式微，逐渐被佛教取而代之，惟印尼之峇厘岛至今尚崇信印度教耳。

泉州临漳门外的“大独石柱”，高3.15米，底座圆周长4米。过去我们曾怀疑它“或者是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延续的遗迹”，因为查阅“印度文化的图录，却未曾见过有这么大的石祖”。最近见到泰国首都曼谷王宫附近的一座印度人建的寺庙前一根“大独石柱”的照片，该石高1米多，直立向上，顶部圆钝，石柱上还缠绕许多彩色绸带和套上制作精巧的花圈（大概是崇拜者的供物）。虽然比泉州的“大独石柱”小得多，但其形状相似。因此，似乎可以肯定泉州的“大独石柱”是古代印度人的一种崇拜遗物，我更怀疑它是古代印度婆罗门教在泉州的遗物，也就是说它可能是秦汉以前的遗物。

印度教是印度古代社会的产物，它有没有传到中国来呢？文献上很少看到记载。据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的，唐季雍译、金克木校的《摩诃婆罗多的故事》一书，在其序言里说“婆罗门教并没有传到中国来”^①。但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的南北朝时代佛教雕刻群中，发现婆罗门教的石雕神像。云冈石窟的第8窟，俗称佛籁洞，有前后二室，在后室人口之穹窿拱腹部东侧，有浮雕毗湿纽神像，有五头、六臂，乘坐金翅鸟。左右六只手各执弓、鸡、日月轮等法宝。在毗湿纽神像的对面，即洞窟之西侧，有浮雕湿婆神像，三头、八臂，手中分执葡萄、弓、日月轮，乘坐牛^②。这是北方地区重要的婆罗门教主要神祇石雕神像踪迹。证以《魏书》的“乌苌国婆罗门解天文吉凶之数”正吻合。

在泉州，近七十年来陆续从地下出土和发现许多有关印度教的神话故事石雕造像和寺庙、祭坛建筑构件，其数量多达数百方。这还不包括那些出土以后，又被居民当作墙基础石材埋入地下的那些部分。仅泉州涂关门外（即通淮门外）津头埔村民于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迁

① 拉贾戈帕拉查理改写、唐季雍译、金克木校《摩诃婆罗多的故事》。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② 史岩《东洋美术史》上卷，第二编，第11章《中国佛教美术全盛时期》，第218~219页。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建时，几乎墙基础均为印度教寺庙、祭坛的构件。如石栏板、门窗石、门框石、屋盖形龛顶石、壁龛石、希腊式柱头石、石横梁和石雕造像等。从这些出土或被发现的石刻形状、大小及所雕刻的美丽花纹图案看来，它们可能是由一座颇具规模的寺宇或一座祭坛上拆卸下来的。

再就石雕的人物中心内容来看，它们多与公元前10世纪印度的有名文学作品《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耶那》两部东方民族最伟大的史诗有关。例如：毁灭之神大自在天的妻子多尔迦在改变形貌，战胜巨魔将其踩在足下；保护之神遍照天的妻子德斯威里伸张其四只手臂，趺坐在一朵怒放的莲瓣中；湿婆化身坐禅入定在象征男性生殖器的座前；七个女子入浴于阎摩那河，衣服被盗窃，乃裸体往求索还；象王和水怪奋战；保护之神遍照天骑金翅鸟救象王，杀死水怪；那迦和那基妮在水中遇神龙；英雄罗摩耶那在帮助苏格里瓦战胜委里，使哈纳曼仍旧做猴国国王的故事；西塔和恒河新月；顽童拉倒魔树；十臂人狮擘裂凶魔希兰那迦的肚皮；基斯那和甘尼巴的角力；白象与蜘蛛的斗争；甘地沙代替牧人放牛……等十多方神话故事石刻（见本书D5、6、8、9、61、62）。这些神话故事的中心内容，大多涉及这两部东方民族的伟大史诗。

仔细观察这些出土及发现的神话故事石刻的内容，似乎是出于古代侨居在泉州的外国人所授意，而雕刻的艺术及作风上，则多出于泉州当地石匠之手。因此，在雕刻上常可以看到揉合有许多素为我国人民所喜爱的传统图案花纹，如：双凤朝牡丹、狮子戏球、生命之树、鹿猴教子、海棠形图案菊花及荷花图案等。此外，在石刻上又带有相当浓厚的古希腊艺术作风。如：哥林多式柱头石、半人半兽柱础石、半兽半鸟门楣石、人面狮身堵石、以及用变体蛇形作为图案的祭坛石等。

尽管学术界曾有“婆罗门教并没有传到中国来”的说法，但是泉州为什么会发现了这么多有关这一宗教的石刻呢？是不是印度教曾经直接传入泉州呢？1956年，我在编写《泉州宗教石刻》一书时，对此问题也曾稍稍涉及，但尚未作较全面而深入的探索。前文已经说过，泉州有早在秦汉以前的婆罗门教遗物“大独石柱”，又有石狗公的雕像，这些都是婆罗门教（印度教）在泉州的早期的遗物，而思想文化上又有对石祖的崇拜和对狗将军的膜拜，这些都是古印度教的遗风。下面就泉州七十多年所出土和发现的印度教遗物，结合对遗址的探索，来谈谈元代的印度教寺、祭坛和明代的印度教祭坛等问题。

1959年1月间，在泉州城西北隅平水庙泉州幼儿师范学校的建筑工地上，在距地面约1.50米深处，又掘出有关印度教的寺庙建筑石刻一批，共十二方。有希腊式柱头石，有转角柱头石，有半人半兽门楣石，有蛇形图案石雕。承蒙该校教导主任叶启东同志和总务主任付祖顺同志通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移存。这批石雕，全为辉绿岩石琢成，但比之历年来在通淮门出土的同类石刻，则有形制较小、雕工更精细这两个特点。可见，在元代泉州的印度教祭坛或寺庙不止一所。

泉州在南朝陈文帝天嘉三年（公元563年），就有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泉州西门外九日山翻译《金刚经》的记载^①。五代时，印度人释知亭、释朝悟，先后来泉州，寓居泉州开元寺内^②。

^① 见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九日山。

^② 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五，方外。

北宋太宗雍熙时(公元984~987年),又有印度高僧嚩婆者航海来泉州^①,得到当时侨居在泉的外国商人的资助,在南门城附近建立一座寺庙,叫宝林院。南宋时,印度僧人天锡,来泉州任开元寺住持,并负责继续主持修造开元寺东边镇国塔的第五层,砌合塔尖,完成该塔的建筑^②。元代初期,南印度马八儿国王孛哈里因和他的父王不睦,曾偕其妃来泉州侨居甚久,于返国途中卒于海上(见伊理渥《印度史》)。

以上所举的例子,大多是泉州地方文献所见的一鳞半爪。这些来泉州的印度人或翻译佛经,或建筑寺庙,他们似乎和印度教的传入泉州没有多大的关系。有人怀疑,北宋印度僧人嚩婆者来泉州所建的宝林院,可能就是一座印度教寺,并且资助这位僧人建寺的外国商人,也必都是信奉印度教的印度商人。但我们至今尚不能找到关于这一问题的有力证据。此外,就我们历年所发现或出土的有关印度教的石刻,在花纹图案及雕刻的手法和作风上看来,它们大都是元代的作品,与宋代的石刻作风也显然有所不同,这是肯定的。

据泉州民间传说,元代泉州南门城附近有一座“番佛寺”或叫“番善寺”。所谓“番佛寺”,可能是寺宇的建筑或佛像的雕刻以至寺宇里的祭坛的布局等与一般的佛刹不同的缘故。如果我们的猜测不会有多大的差错,就应该进一步调查,看看这一座番佛寺是否就是印度教寺。

首先,从发现实物的地址看。在南门城附近的蒲寿庚故宅遗址的东北隅,有一口池塘,泉州人叫它做番佛寺池。1934年发现的印度教三主要神祇之一的毗湿纽石雕造像,就是在这里掘出来的。稍后,又连续在距离该池塘不远的城垣基础内,掘出了许许多多有关这一宗教的石刻。清末出土而将其嵌在一座无祀宫墙上的三方印度教龛形石刻,也是在这个地方发现的。这样,实物发现的地点与民间的传说正相符合。因此,所谓“番佛寺”,可能就是一座印度教寺了。

至于这座婆罗门教寺的建筑形式及规制怎样,因寺早已毁灭,无人能知道。但据我们多年来所发现与汇集的石刻及其他各类型的石材来仔细加以观察、比较,它与今日所常见的佛刹露台上的须弥座石刻大不相同。它是与印尼爪哇东部的日惹附近所见的“婆罗浮屠塔”或“塔婆”的形制相同的。特别是那些砌在“浮屠塔”上的顶层及下层的大型石块和泉州所发现的半人半兽石刻、人面狮身石刻、须弥座石刻、屋脊形石刻和龛形石刻等,极相类似,而且在泉州所发现的这类石刻的数量极多。如果是一座中国式的佛刹建筑,其须弥座石刻就不需要那么多,更何况兼发现有这种宗教的造像毗湿纽呢!这样,元代在泉州的“番佛寺”,就是一座印度教的“婆罗浮屠塔”式的建筑物,它和普通的佛庙建筑不同,是一座奉祀婆罗门神的寺庙。

公元1956年,我们在泉州南门五堡街发现一方断裂为二的刻有印度泰米尔文字和汉字的石碑。经日本大阪大学斯波义信等翻译,碑文内容是1281年修建湿婆神庙(见本书中D10)的记载。这明白地告诉我们,元朝初期泉州有一座印度教敬奉湿婆神的神庙,其创建者也是印度人。这座湿婆神庙是不是“番佛寺”,或者是另一座印度教寺?而且,这方印度泰米尔文字石碑系白花岗石雕成,与泉州印度教寺所有的建筑构件均为辉绿岩石雕成不一样,相

① 见《诸蕃志》卷上,天竺国。

② 见乾隆《泉州开元寺志》,东塔。但有的学者考证,说天锡非印度僧人。

比之下石碑显得粗糙、简陋,似乎不很相称。这是必须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以上主要考证元代泉州的城南确曾存在一座印度教教寺。但是近七十多年来,在泉州城范围内,发现印度教寺或印度教祭坛的建筑石刻,却几乎从南到北都有。现在依自南至北顺序简述于下。

泉州南门城天妃宫的两根印度教寺的柱子(D11、D12),是一座已毁的印度教寺的建筑构件,它肯定也是从别处移来置于此地的。它与天妃宫的整体建筑形式毫不相干,正如泉州开元寺大雄宝殿的那两根印度教寺石柱一样。无论是天妃宫的印度石柱,或者是义全后街一座无祀宫发现的印度教龛形石刻(D47、D48、D49、D50),或者通淮门城基发现的大量这类宗教石刻,或者中山南路侨光戏院附近发现的同类石刻,它们可能都与城南一所印度教寺有关系,这是可以肯定的。

可是,1932年又从东街南俊巷某姓人家发现一方印度教石卧牛雕刻。据南洋考古学家韩槐准先生提供的资料说,这只石卧牛的雕刻与现存新加坡大坡大马路(South Bridge Road)的一座印度人建筑的印度教寺围墙之巅的牛的塑像很相近。因此,1963年根据韩槐准先生的建议,移泉州海交馆保存。

在东部亚洲的中南半岛上,远在8世纪以前,阿拉伯人尚未到占城的时候,印度商人及僧侣曾大批来此居留,其时又正值印度国内佛教衰落,婆罗门教乘时复兴的时期。随着印度人的到来,印度的婆罗门教也跟着传入占城,占城曾一度成为婆罗门教流行的地区。《宋史》有一段记载:

多黄牛、水牛,而无驴,亦有山羊,不任耕耨,但杀以祭鬼。将杀,令巫祝之曰:“阿罗和及拔”。译云:“早教他托生”。^①

这里所记的“巫”,可能是婆罗门教的僧侣。“早教他托生”,也可能是婆罗门教的“轮回转世”的说明。这证明当时婆罗门教在占城盛行。

关于印度教对牛的观念,是目牛为纯洁及神圣(pure and holy)。不但不食其肉,且以牛粪或牛粪灰涂于额为吉祥。宋赵汝适著的《诸蕃志·西天南尼华啰国》有云:

多称婆罗门以为佛真子孙,屋壁坐席悉涂牛粪,相尚以此为洁。

又元汪大渊著的《岛夷志略·华罗国》其中有载:

俗怪,民间每创石亭数,四塑以泥牛,或刻石为象,朝夕讽经敬之若人佛焉。仍以鲜花、灯烛为之供养。凡所坐之坛,所行之地,及屋壁之上,悉以牛粪和泥涂之,反为洁净……语言諧謔,以檀香牛粪搭其额。

此外,明巩珍著的《西洋番国志》、马欢著的《瀛涯胜览》中所述的锡兰国、柯枝国、古里国,皆书人以牛粪烧灰,涂身、涂额,以及涂墙壁等。此等皆印度教徒的行为。但文中每谓“藉此以敬佛”,乃著书者不能辨别印度人于奉佛教之外,尚奉印度教。此习俗,现今印度教徒尚遵行。因此,泉州发现的石卧牛,也是印度教寺的建筑遗物。

特别是1959年,继泉州城西北隅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建筑工地发现的一批印度教石雕之

^① 《宋史》卷四百八十九,列传二百四十八,占城国传。

泉州宗教石刻

后，同年在城西北隅的泉州培元中学工地也发现同类型印度教石刻数方，它们的形制都比在通淮门发现的同类型石刻小而雕工更精细。很明显，它们与通淮门出土的同类型印度教石刻不是出于同一座寺庙或祭坛。这能不能说明泉州城的西面、北面另有印度教的祭坛一类的建筑呢？

据志书记载，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锡兰君王邪巴来那（Parakhna-Bahu Raja VI）之子来中国，谒见中国皇帝，并以王子的身份，得在泉州置府第。锡兰王子当时所置的府第是在泉州今天的什么地方？地方志书没有记载，也没有这方面的传说。只是在《泉州府志》载：

世拱显，字尔韬，号小山，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康熙癸巳（公元1713年）恩科举人……纂《十三经注疏》，多与拱显互相参订……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屡满户外^①。

后来，拱显又自己改为庄姓，很显然，这时他已经汉化了。

由上记载，使我们知道世拱显的先世是锡兰国王子的后裔，他深研和精通中国文学，考中举人，并且曾设教学场所在泉州城北的小山丛竹亭（其地址即现在模范巷城隍庙后的小山丛竹亭）。这样，锡兰王子在泉州建府第的所在地，便有了初步的线索。但这只是地方志书上的文字记载而已，还没有实物的证据。

1925年，就在泉州城北，宋代朱熹讲学的小山丛竹亭附近的模范巷与县后街的交界处的一座小庙（白狗庙）旁的一座焚帛炉墙壁上，我们发现两方以印度古代的民间神话故事传说为内容的石刻。一方为白象和蜘蛛斗争的故事石刻（D61）；另一方为牧人和牛的故事（D62）。这两个印度教故事都盛行于古代的锡兰。1930年，又于小山丛竹亭附近民居地下，出土一件石雕卧狮（D63），狮头刻一凹入圆孔，可以镶珠子，狮背刻汉字“东后六”三个字，石狮尾部有一个榫。因此，可能为印度教祭坛亭子的建筑物。在同一地，同时出土几方辉绿岩石雕刻成的印度教须弥座石构件。

这样，地方志书上记载的地方和实物发现的地址，皆指同一地。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明天顺三年，锡兰王邪巴来那之后裔在泉州建置府第和创建的印度教祭坛的地址，是在今日泉州城北的小山丛竹亭附近的地方。这个推论得到了证实。1998年12月，台湾省彰化县世氏后裔到泉州谒祖墓，带来世氏族谱，据谱云：“我祖遂家温陵（泉州的别称）南街忠谏坊脚，有大宗祠，后被火；城北一峰书街亦有小宗……基址尚存。”族谱所云“一峰书街”即今模范巷，亦即白狗庙至小山丛竹亭这一小片宅地。寺庙崇奉狗，并以狗命名寺庙，且狗神俗称“毗舍爷”。所以我们怀疑白狗庙是一座供奉印度教狗神的寺庙，它与锡兰王裔居住此地有关系。

（二）泉州锡兰王裔和遗址发现记

吴幼雄

一、锡兰王裔在泉州的初次发现

1925年，泉州地方史学家吴文良先生发现城北县后街、模范巷交界处白狗庙焚纸炉上砌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清《文苑·世拱显传》。

着两方印度教石刻^①。1930年,德国学者艾克(G. Ecke)和瑞典学者戴密微(P. Demieville)从厦门大学到泉州考古,特地考察了这两方石刻,并断定石刻内容是古代流行于锡兰的印度教神话故事。

1934年,戴密微在北平发表了题为《泉州印度式雕刻》一文,对泉州白狗庙这两方古代锡兰印度教石刻的故事进行考证。认为第一方石刻是“象、蜘蛛与磨盘、林加”的故事,故事内容是象每天以花水顶礼膜拜“林加”(印度教象征为男性生殖器),蜘蛛亦在“林加”之上结网,以防树叶零落“林加”之上。象以为蜘蛛结网不雅观,屡次去之。蜘蛛怒甚,钻入象鼻中,象受创痛巨,乃往来摇摔其鼻,以至于死亡。石刻上的“磨盘”象征女性生殖器官。第二方石刻是“牛、磨盘、林加和尊者”的锡兰古代印度教的故事,内容是说婆罗门甘地沙见牧人痛笞孕牛,心甚不忍,遂自荐为之牧牛。牛受其感动,竟不复思其犊。牛自动以乳敬神,即石刻上有一头牛以乳喂“林加”,并舐之如爱其犊。石刻右边的尊者即婆罗门甘地沙^②。

1935年,德国学者艾克在伦敦出版《刺桐双塔》(英文版)一书,在附录的图版里有泉州白狗庙焚纸炉上砌的“牛、磨盘、林加与尊者”的锡兰印度教石雕,其图片说明译文如下:“此图似乎是牛呈献乳汁给林加;牛和林加是表示牛为林加解忧。现在石刻是在泉州开元寺东北方的小神庙墙上。”^③艾克仅发表“牛、磨盘、林加和尊者”的石刻,而没有发表另一方“象、蜘蛛与磨盘、林加”的石刻。因此,有的学者以为艾克只见到一方石刻。其实,这是艾克的遗漏,艾克把泉州的锡兰印度教石刻仅作《刺桐双塔》一书里的附录图版处理,这个小遗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况且,泉州白狗庙的这两方古代锡兰印度教石刻是砌在一起的,不可能只见其一而不见其二。

1950年10月,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林惠祥教授率领考古队到泉州考古,其考古报告云:“在城北模范巷,现在嵌在一个大字纸炉上……浮雕……一方雕刻一头大象,象前面有一个大石盘的下层,磨心特别大……象鼻卷花状物放在磨心上。又一方雕一头母牛,在牛腹下也有一个同上的石盘,磨心抵牛的乳房,牛也回头舐磨心。笔者于一九四八年到泉州考古时,瞥见这二件东西,大为惊异,知道便是印度的生殖器崇拜物……笔者当时自以为是第一次发现这物,但不曾发表。后见艾克的《泉州双塔》书中也有其中一方石刻的像,大约是有牛的,且也注明是生殖器崇拜。另一个有象的大约艾克未见过。”^④

1954年,泉州白狗庙这两方印度教石刻从炉壁上卸下保存。当时,泉州吴文良先生从乾隆《泉州府志·文苑·世拱显传》发现锡兰王裔在泉州的记载,这段记载又注明“采世氏家传”。这是文献记载锡兰王裔在泉州的确凿证据。世拱显传云:“世拱显,字尔韬,号小山,晋江人,本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康熙癸巳(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恩科举人……李光坡延为西席,遂得领其指授,究心经学,光坡纂《十三经注疏》,多与拱显互相参订……设教于小山丛竹亭,执经问难者屡满户外……七邑人士远不能执贽者,为文会必驰赴斋中。雍正

^① 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第315页,1993年6月,鹭江出版社出版。

^② 戴密微《泉州印度式雕刻》,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五卷,第二期,1934年出版。

^③ 艾克、戴密微《刺桐双塔》(英文版),《总论》,四,《全书备忘》,《备忘图版》第21页和图版69C。

^④ 林惠祥《一九五〇年厦门大学泉州考古队报告》,载《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第147页。

泉州宗教石刻

己酉(雍正七年,1729年),观风整俗使刘公师恕赠以‘绩学砥行’之额。壬子(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郡守郭公延修府志,举乡饮正宾,授永定教谕。以老疾辞,寿八十三终。所著有《四书管窥》、《诗经辑要》及《诗文集》。”^①

吴文良先生从戴密微、艾克、林惠祥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又从乾隆《泉州府志》的记载,以及《明史·锡兰山》、《明史·郑和传》、《星槎御览》、《西洋番国志》、《明史实录》和《瀛涯胜览》等的记载,结合多年来自己在小山丛竹亭附近发现的石卧狮、须弥座祭坛石刻和小山境白狗庙崇祀白狗神(狗,印度教称印度洋山神),得出“泉州白狗庙可能是一座锡兰人兴建的印度教寺庙的结论”。1964年,原北京故宫博物院韩槐准院长,以他在爪哇、占城、广东和海南岛发现的印度婆罗门教(印度教)石狗公石雕,支持吴文良的论点。于是,吴文良在城区和白狗庙周围的小山境进行调查,仅发现通淮街东鲁巷释迦寺有清代世氏地契,那时,人们极力避免沾染海外关系。1965年,韩院长邀请吴文良于1966年共同调查泉州、广东、海南岛的婆罗门教遗迹,寻找泉州世氏后裔,但因“文化大革命”而未果行。此后,吴文良逝于“文化大革命”(1969年),韩院长亦于1972年仙逝于京城。

二、二次寻觅锡兰王裔热潮

1986年初,中央文化部外联局亚洲处,曾向福建省《泉州晚报》社转达斯里兰卡政府代表团查询15世纪中叶锡兰王子在泉州的事迹一事。《泉州晚报》亦刊载寻访锡兰王子在泉州的消息,但未发现新的线索。

1986年6月29日,泉州傅金星和陈日升两位先生在《泉州晚报》发表题为《锡兰王子在泉州》的文章,唤起泉州史学界搜寻锡兰王子史事的热情。

1986年秋,漳州第一中学历史教师陈自强(泉州籍),谙于地方史研究。他据《泉州府志·世拱显传》和《明史·外国列传·锡兰山》的记载,来泉州追寻锡兰王邪巴来那的后裔,他奔赴泉州市公安局户籍股,寻找姓“世”的人家,可是又落空了。这期间,泉州有的历史爱好者,通过各种渠道到通淮街东鲁巷释迦寺借阅“世氏地契”。但地契只记载清代世氏的支裔在东鲁巷居屋范围的四至,没有记载世氏与释迦寺的关系。可是,有的学者据释迦寺保有清代世氏地契,推断世氏原是信仰佛教,进而推论世氏因信仰佛教,故把厝契献给释迦寺。但是,这些推论缺乏史实依据。

锡兰国王邪巴来那在泉州的后裔,原先是信奉佛教或者印度教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据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引影印《碛砂藏经》中配补的《明永乐北藏本》的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一《僧伽逻国佛牙精舍》条云:“大明永乐三年,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供养。郑和劝国王阿烈苦奈儿敬崇佛法,远离外道。王怒,即欲加害,郑和知其谋,遂去。”^②可见,那时锁俚国人的锡兰王阿烈苦奈儿,以及其治下的社会是不信奉佛教的,锡兰国王所信奉的宗教,即流行于印度和锡兰的被佛教称为“外道”的印度教。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五十五,国朝文苑,世拱显传。

② 转引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第102页,1995年9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据明朝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云，锡兰山国“其王锁俚之人，修浮图教。重象暨牛，私解者辟……国人咸灰牛粪涂其体，食惟其乳，死则埋之。自王以下，晨用牛粪涂其居，而后礼佛”^①。这里记载的锡兰人“咸灰牛粪涂其居，而后礼佛”，均是印度教的宗教习俗。锡兰人的“重象暨牛”也是印度教的习俗。至于《西洋朝贡典录》所记锡兰国王“修浮图教”，则是中国人不谙印度教，把印度教的寺庙和祭坛误作佛教的浮图罢了。

2004年4月，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郑和研究》编委会主编时平教授等一行到泉州寻访、摄录郑和史迹。据时平教授称，他们为摄制郑和史迹记录片，到斯里兰卡寻访郑和史迹。发现一个新问题，即郑和到达锡兰山国时，锡兰分为三国，一为信仰佛教地区，一为使用泰米尔文字的信仰印度教地区，一为信仰伊斯兰教的地区。郑和到锡兰登岸的地点，正是使用泰米尔文字的信仰印度教的地区。所以锡兰王亚烈苦奈儿等是印度教徒，故郑和要劝其“远离外道”。又郑和为表示对锡兰人信奉印度教、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尊重，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在Calle地方刻立用汉字、泰米尔文字和波斯文字的石碑。今三种文字的石碑仍存锡兰国家博物院中。

《明实录》亦记，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郑和等初使诸番至锡兰山，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辑睦邻国，屡邀劫其往来使臣，诸番皆苦之。及和归，复经锡兰山；遂诱和至国中，令其子纳颜索金银宝物，不与，潜发番兵五万劫和舟，而伐木拒绝，绝和归路，使不得相援。和等觉之……由间道急攻土城破之，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遂以归。群臣请诛之，上悯其愚无知，命姑释之，给予衣食；命礼部议择其属之贤者立为王，以承国祀^②。

福建长乐南山寺《天妃之神灵应记》云：“永乐七年……道经锡兰山国，其王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星槎御览》还有末句“四夷悉钦”）”^③。此后，锡兰山国贡使入贡不绝五十多年。

在二次寻觅王裔的热潮中，李玉昆先生据《明史·锡兰山》记载“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来贡，嗣后不复至”句，推断“天顺二年锡兰王派王子昔利把交刺惹奉使中国，住在泉州。成化二年（公元1466年）国王去世，王位被外侄继承，留居泉州的锡兰王子昔利把交刺惹不得回国，定居泉州”^④，并以其名字第一个字“昔”（“邪”、“昔”、“世”谐音）为汉姓。至此，二次寻觅锡兰王裔的热潮告一段落。即找到锡兰王子的真实姓名，与《泉州府志·世拱显传》的记载吻合。

三、追寻锡兰王裔的第三次热潮

第三次追寻热潮主要围绕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发现锡兰王裔世氏墓葬地、锡兰王裔墓碑；其二，追寻泉州世氏后裔。

① 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中，《锡兰山第十五》，198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

② 《明实录》卷一百十六。

③ 见福建长乐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之神灵应记》碑。

④ 转引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第102页，1995年9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

1996年12月初,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刘志诚先生在泉州城东北郊东岳山发现锡兰世氏墓葬区“世家坑”崖刻、“世嘉坑石桥”刻字,并发现“锡兰故考×××孺人×××”等世氏墓碑五方。12月10日,《泉州晚报》记者以“泉州发现明代锡兰国王后裔墓地”为标题的简短报道,披露了这个重大发现。19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林德民先生在《泉州晚报》发表题为《揭开中斯历史关系之谜》的短文,引《明史》说明,并附六幅照片,简约考证锡兰王裔确实在泉州,并提出王子葬何处,王子后裔今何在的疑问^①。

1998年6月,一女子打电话给市长办公室和晚报社,自称是锡兰王裔。她对报纸上说世氏“在泉州消失达百年”的提法,和世家坑坟地遭开发的破坏表示愤慨,但没有留下姓名和地址。其实,这位世氏女子早与刘志诚先生和关心世氏历史的谢长寿先生有过接触。据她说,她从电视台播放的世家坑遭开发破坏的情景,引发了她向市长办公室和晚报社打电话的。她的公开表露身份,是与亲戚商量后决定的。据她介绍,她的高祖有姐妹三人,无兄弟,于是招许闯入赘,故从曾祖起,采用复姓“许世”,曾祖称“许世九”、祖父“许世水”、父“许世静波”,自己称“许世吟娥”。曾祖、祖父辈皆逝于菲律宾。祖母健在,77岁,居泉州西街。父健在,居香港。据她透露,泉州白狗庙是世氏的祖庙,她关心白狗庙的重修,前往上香,直至最近她才对董事会暴露身份。自此,年仅35岁的许世吟娥,成为泉州的新闻人物,采访者络绎不绝。

6月,泉州通淮街118~120号的林金铮先生,因房屋拆迁而整理旧地契,发现原来他家里保存的地契是乾隆四十八年世氏卖断给阮氏的契约,后阮氏又卖断给林氏,保存至今日。这样,乾隆间世氏的居屋就被发现了。

同样是6月,刘志诚先生又于东岳山世家坑发现“明使臣世公孺人蒲氏墓”碑和“通事世公慈淑谢氏墓”碑。这两方墓碑的发现,表明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锡兰王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刺惹遣使团来中国后,此使团不曾回国,就在泉州定居,并取汉字“世”为姓^②。那么,墓碑上“使臣世公”是谁呢?那就是《泉州府志·世拱显传》说的“锡兰山君长邪巴来那公之后”,即锡兰王子无疑了。“明使臣世公”墓碑,是其孙世华于嘉靖间重新刻立的,《泉州府志·学校》有世华简历,可见原墓碑已湮没。

1998年,台湾彰化同胞来泉州旅游,偶然看到《泉州晚报·海外版》报道泉州发现锡兰王裔墓葬地和王裔“许世氏”的消息,联想到彰化同乡有姓“世”的朋友,遂把报纸稍回彰化。彰化的世氏后裔见报后,欣喜若狂,连夜召集家族成员聚会,并决定派出世来发、世家旭父子俩人,携带《世氏族谱》到泉州寻根、谒祖坟^③。

12月27日,彰化县世氏父子到达泉州,受到泉州锡兰王裔“许世氏”的热烈欢迎,新闻媒体跟踪报道。次日,世来发父子到泉州城东郊东岳山“世家坑”拜谒祖坟,并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参观收集在一起的锡兰世氏祖先墓碑。

① 《泉州晚报》1996年12月19日,第5版。

② 吴幼雄、黄伟民、陈桂炳主编《泉州史迹研究》,第166~167页,1998年6月,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③ 《泉州晚报》1998年12月29日,第一版。题为“台湾世家后裔携族谱来泉寻根,两岸世家宗亲隔百年故地重聚”。

1996年,泉州谢长寿先生在同窗好友廖渊泉先生的帮助下,加入寻觅锡兰王子后裔的调查和研究活动。他们俩人儿时的居住地,即清朝住泉州的锡兰王裔世拱显居住地——小山境,他俩利用本籍的优势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调查。果然在中学同窗的蔡淑贞家,访得她家的后院一片残垣断壁荒地称“世相公宅”,据云该荒地为“绝户”所有,数十年来无人敢占据,遂为荒地。又在中学同窗苏淑英家里(在世相公宅旁)发现一尊人形狮头石雕像,据云是上世纪80年代筑屋时由地下出土^①。

“世相公宅”的位置,与台湾彰化《世氏家谱》所记“世氏小宗祠在城东北一峰书街”完全吻合。而祀奉毗舍耶(印度教称印度洋山神)的白狗庙,也在小山境,在一峰书街旁。因此,谢先生以“世相公宅”和世相公宅出土的人形石狮头雕像作为白狗庙是一座锡兰王裔创建的印度教寺庙的物证。

1998年11月,谢长寿先生汇集十二年来泉州研究锡兰王裔的文章十多篇(近十万字)编辑成书,书名《温陵白耆庙》,由白耆庙理事会付梓出版。该书是一本追寻锡兰王裔在泉州历史的书,是一部追寻明初中国与锡兰友好关系的书,又是一册追寻明代印度教在泉州的遗址、遗物的书。总之,该书是研究明代泉州海外交通史、外来宗教史和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书籍。

2000年4月18日,斯里兰卡佛教部副部长艾德维拉·普列马拉特尼,偕该国学者赫特拉奇与郝·维民等两人到泉州访问。他们一行参观、考察泉州东岳山“世家坑”。艾德维拉·普列马拉特尼说:“这座古墓是斯里兰卡传人之墓已经毫无疑问,它很可能就是锡兰王子之墓”。他表示将促成斯里兰卡有关方面,协助中方考古专家进一步研究这座古墓,并表示“这将是一件意义特别重大的事”。

而赫特拉奇与郝·维民等两位学者,认为古墓前的一对造型特别的石狮,其雕刻的风格“系锡兰国科堤王朝前的亚巴忽瓦王国时代的狮雕造型,年代大约在14世纪末,即中国明朝初期”。而古墓前墓桌上雕刻的“呈交合状的蛇形图案石刻,更是典型的锡兰国图腾,名纳格布图瓦(Nagapptuwa),它寓意着人丁繁盛,是一种崇拜、祭祀祖先的象征”^②。

2003年2月,斯里兰卡文化部邀请泉州和台湾彰化的锡兰王子后裔,赴锡兰王子的家乡访问,在访问过程中,当地政府官员还表示,如果泉州的锡兰王裔许世吟娥,愿返故土定居,可拨出土地赠予,以便建屋。中斯两国人民的情谊感人至深,且源远流长。

四、关于泉州锡兰王裔的后续研究

泉州追寻锡兰王裔经历七十多年,可喜的是基本弄清锡兰王裔的墓葬区、居住处、历代人物和族谱。但是还有若干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如为什么锡兰王裔要居住泉州?“使臣世公”是谁?“通事世公”是谁?锡兰王裔信仰什么宗教?白狗庙是印度教寺有什么直接证据?以及彰化《世氏族谱》的研究等一系列问题,都是今后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① 谢长寿主编《温陵白耆庙》,第72~80页,1998年11月。

^② 《泉州晚报》2000年4月29日,第一版,题为《世家坑古墓是斯里兰卡传人之墓》。

(一) 锡兰王子居留泉州的原因、王子名字和居处

台湾彰化《世氏族谱》修编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而泉州世氏迁台湾,时在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

在彰化《世氏族谱》里,有四处提到锡兰王子居留泉州的事,列举于下。

1. 《重修族谱序》云:

吾祖系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明永乐年间为国使来华人贡,蒙留京读书习礼,月给廪饩甚厚。厥后国用不敷,将各国使给资回去,我祖遂家温陵(泉州的别称)南街忠谏坊脚。有大宗祠,后被火;城北一峰书街亦有小宗(即前文所述的“世相公宅”和世拱显讲学处),数年前被功兄载亨折卖,基址尚存(与调查“世相公宅”遗址的情况吻合)。

2. 《锡兰人房历代系》云:

我始祖巴来那公,由锡兰国君长入闽,为四夷馆通事。传一、二、三世,至四代再生三男,分为天、地、人三房。长房裕斋公建置产山在晋江东关外世家坑,土名世厝埔。

3. 《锡兰祖训》云:

吾祖以锡兰君世子充国使,于前明永乐间来华人贡,蒙赐留京读书习礼。阙后归途经温陵,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传三世,生三子,分为天、地、人三房。旧有大宗祠在泉城内南街忠谏坊脚,因被回禄而废,而城北一峰书街有小宗,被孽侄再亨毁折,至今先灵无所式凭。

4. 《锡兰支系》云:

我开基始祖本锡兰国君长,讳巴来那。于明初钦赐姓世,授四夷馆通事,入闽□□,迁泉建祠郡垣南街都谏坊。公原配蒲氏,至四世始生三男,分天、地、人三房。

如果我们将《世氏族谱》里四处记载锡兰王裔入泉州的原因、王子姓名和职务等列表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有趣的问题。

《重修族谱序》:“吾祖系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为国使来华人贡,蒙留京……国用不敷……遂家温陵”。

《锡兰祖训》:“吾祖以锡兰君世子充国使……来华人贡……赐留京……归途温陵,爱此山水,遂家焉”。

《锡兰支系》:“我开基祖本锡兰国君长,讳巴来那……钦赐姓世,授四夷馆通事,入闽……迁泉建祠郡垣……公原配蒲氏”。

《锡兰人房历代系》:“我始祖巴来那公,由锡兰国君长入闽,为四夷馆通事。”

综上表列,《谱序》言“吾祖系锡兰山君长巴来那公之后……为国使来华人贡”;《祖训》言“吾祖以锡兰君世子充国使……来华人贡”。二说没有矛盾,可以理解为锡兰来华人贡使臣是锡兰王巴来那之子,且有泉州出土的“明使臣世公墓”碑作证。

但是,《支系》和《历代系》却记“我开基祖本锡兰国君长,讳巴来那”,和“我始祖巴来那公,由锡兰君长入闽”。而且二处均记“授四夷馆通事”。这就是说,锡兰君长邪巴来那亲自来华。如果锡兰王邪巴来那不是亲自以通事身份来华,或由第二位王子以通事身份来华,而受永乐皇帝“钦赐姓世,授四夷馆通事。”墓碑“通事世公”的“世”字就无从解释。此说又有泉州出土

的“通事世公墓”碑为证。

此外，泉州东岳山世家坑世氏坟地，还出土一方“锡兰何公祖坟”墓碑。这表明锡兰使团成员有的改“何姓”。这反证改“世姓”，必然与锡兰王邪巴来那有关系。

综上所述，结论只能是明初来华人贡而居泉州的锡兰使臣是锡兰君长邪巴来那之子，而“通事”却是锡兰君长邪巴来那本人。换一句话说，即明初锡兰君长与其王子，一以通事身份，一以使臣身份共同来华人贡，后被赐姓世，居留泉州，但这又于理不合。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以后锡兰王位被外侄篡夺，使臣和通事不能返国之说也可以联系得起来。

反之，如果说《世氏族谱》所载的锡兰国君长邪巴来那任通事，与其子任使臣一起来华人贡说有误。《世氏族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又为什么《世氏族谱》允许两说并存？这是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至于锡兰“使臣”、“通事”为什么要居留泉州呢？《谱序》云，因“国用不敷”，“我祖遂家焉”。而《祖训》则云，因“爱此地山水，遂家焉。”比较二说，《谱序》说比较符合事实。但是，更主要的是其时市舶司仍置泉州，居住泉州容易得到海外信息；倘若返国，也要从泉州放洋。直至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市舶司由泉州移置福州。

关于锡兰王裔在泉州的聚居处所问题，《谱序》说，泉州“南街忠谏坊脚有大宗祠”，“城北一峰书街亦有小宗”；《祖训》则说“大宗祠在泉城内南街忠谏坊脚”，“城北一峰书街有小宗”；《支系》亦云，“迁泉建祠郡垣南街都谏坊”。三处说法相同，仅坊名有异，查道光《晋江县志》，“都谏坊，为给事中周良寅立”，“俱在崇名铺”^①。道光《晋江县志·人物志》有周良寅传云：“隆庆辛未（五年、公元1571年）联捷进士，历官户科给事中”。因“奏请疏通钱法”、“上惜费疏”及对张居正“六科会议疏留，寅独不署”，遭“向所不合者”谪迁，“解组归”^②。故用都谏坊和忠谏坊均无误。

都谏坊，在崇名铺，已毁。崇名铺，地处今中山中路南段，全长100多米。即从今中山中路的花巷开始，向南延伸至涂山街十字路口的西侧一带^③。崇名铺是古泉州城的中心地带，是繁华的商业区。锡兰王裔建大宗祠于都谏坊脚，得有较大财力。

《谱序》和《祖训》均记“城北一峰书街有小宗祠”。一峰书街即《泉州府志·文苑·世拱显传》里的世拱显的住处。世拱显，因居小山境而号小山。今小山境地名仍存，南自白狗庙起，向北至泉州市第三医院，现称模范巷，全长200米左右。南宋朱熹曾在小山境植竹建亭讲学，明代罗伦建一峰书院讲学，康熙间世拱显也于此设教。世拱显为世氏第十一代，“讳小山公”。今“小山丛竹”石牌坊仍存，而“世相公宅”遗址现已为外来移民建屋居住，但还留有数百年前的古龙眼树数株。然小山境的世氏印度教寺庙却因受民间信仰神明的渗入，至今保存。

（二）关于《锡兰祖训》的问题

据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世氏第十六代孙世文莱写的《重修族谱序》云：“敬录祖训

^① 道光《晋江县志》卷十二，古迹志（坊宅附），城中坊，明坊。

^② 道光《晋江县志》卷四十三，人物志，宦绩之四。

^③ 陈垂成《泉州旧城铺境稽略》，泉州城厢旧铺境图。泉州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0年出版。

十六条，以为后人遵行”。然《世氏族谱》里仅有《锡兰祖训》七条。节录于下：

其一，祖宗宜尊敬也。要求在彰化世氏子孙“有能如人者，内地祖仙坟茔务须归去设□，此后或三年一往或五年一行，尽孙子之职”。

其二，坟茔宜巡视也。定“每年于清明、七月十五日，诸子弟有年至十岁以上者，父兄宜相率登山各处巡视”。

其三，祭祀□□也。规定“祭品不可专用冷物”，并要求“小心烹调，不可草率。谨之慎之”。

其四，主祭宜嫡长也。规定“庶子虽年高，不得与争”，“螟蛉之子，纵有顶戴荣身，不特不得与争”，“凡事依礼而行”。

其五，匹偶宜审择也。“凡娶妇嫁女，务必耕读人家，工、商亦可。至如娼优、隶卒，虽富埒王侯，莫与论。”“甚至有大伯接弟妇，小叔通兄嫂，此等灭天理，败俗伤风，断不可容，閭族共诛”。

其六，立继宜本宗也。规定“立继须择同宗之人，一脉感通方能格享”，“盖异姓之不享，古今一致也”。

其七，产女宜收养也。引《易经》曰：“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倘彼也生女不养，尔亦产女弗育，则乾坤亦几乎息矣”。且举例明万历间黄凤翔的太夫人和何乔远的大夫人皆锡兰世氏女，都因为婿贵“赠岳父母一品诰封，戴纱帽，穿红袍，至今泉人以为美谈”。

从以上七条《锡兰祖训》的内容看，均属中国儒家传统习俗，不见有海外传入之文化成份。锡兰世氏驻泉州，人丁不多，传至清光绪年间，已有十七代，历年几五百。其间也出了一些儒官，如嘉靖间的举人世华，为七品散官；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713年）的举人世拱显，授永定教谕；有雍正间的书法家世腾云。从《锡兰祖训》可知，世氏已完全汉化。

综上所述，泉州寻觅锡兰王裔事迹历经七十多年，终于有了结果。这个过程的前期是从寻找锡兰传入的印度教开始的；中期是追寻锡兰王裔和考证锡兰王裔来华史事；后期是寻觅锡兰王裔的住处、墓葬和王裔的现状，并对遗址、文献进行后续研究。

锡兰王裔居留泉州是与郑和下西洋伟大壮举紧密联系一起的。泉州地处福建东南沿海，是郑和下西洋必经之地，灵山圣墓还保存着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的郑和行香碑。最近调查发现，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泉州人还有泉州永宁卫指挥干八秃帖木儿、泉州卫百户邓回。光绪年间邓回后裔立的邓回墓《示禁碑》也被发现。此外，泉州惠安县东园镇琅山村海边，也发现郑和庙（俗称三宝庙）。泉州后渚港对岸的白奇回族镇，也发现郑和堤和其他郑和史事。晋江深沪海边发现三宝街和三宝日、月井。如此等等。

追寻泉州锡兰王裔的史迹的意义，既为纪念郑和伟大的和平航海壮举，又证实15世纪时，泉州还是一个重要海港；明初印度教再度传入泉州；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友谊源远流长。

第五部分 泉州古佛教

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泉州就有佛教寺庙——建造寺。南朝时,天竺高僧真谛三藏曾到建造寺翻译佛教经典。唐、五代时,泉州海外贸易繁荣,文化发展,兴建数十座佛教寺庙,出现不少高僧,翻译大量经典。如开元寺、安福寺、镇国东禅寺、普照寺、福先招庆院。至今,泉州还保存有唐、五代的石佛和经幢。宋代,虽然朝廷倡导儒、道、释合一,然泉州佛教随着海外贸易的繁荣而继续发展,寺院积累巨大财富,兴起大规模的建寺、建塔、造桥工程,如开元寺的镇国塔、仁寿塔和洛阳桥、安平桥、石笋桥、凤屿盘光桥、普利通大桥、玉澜桥和苏埭桥等大型石桥,都有僧人倡导。明清时期,泉州佛教逐渐衰微,然开元寺僧木庵追随隐元和尚,东渡日本传临济黄檗法系。

E 1 重修后的开元寺唐大中八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该唐代八面石经幢,1935年发现于泉州西门外,1953年移回开元寺里的水陆寺保存。21世纪初,补上新构件,重竖于开元寺大雄宝殿前东侧。图为该经幢及补上新构件后的现状。

经幢白花岗石琢成。通高1.80米,作八角形,每面宽24厘米。每面刻字七行,楷书,行六十四字。由于年久剥蚀,字多漫漶。经幢有两面均刻10厘米宽的直线槽一条。据清末陈榮仁《闽中金石略》考证:

一面凿成直缝,似当时嵌于塔上者。建幢之地当为前代寺观,寺废而幢存,故孑然无辅耳。^①

1935年夏,泉州遭特大洪水袭击,经幢被洪水冲倒,以后被弃于西门吊桥下,作为水闸柱石之用。1953年,被抢救移入泉州开元寺保存。1955年12月,我们又在泉州西门外原石经幢处,掘获石经幢石刻一方,上刻佛像八尊,但佛像多已风化,耳、目模糊。它应是这座唐经幢散失的石刻。1956年3月,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惠祥,移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保存。

由于这座经幢的佛像石雕的发现,陈榮仁提出此经幢似是“嵌于塔上者”的说法有误。这是泉州最古的石经幢,亦为泉州少有的唐刻。

现在根据《闽中金石略》,将经幢文字节录于下:

尊胜陀罗尼经幢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 弟子卢□□□□拾二千文

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者,婆罗门僧佛陀波利。仪凤元年(公元676年),从西国来至此土,到五台山,次遂五体投地,向山顶礼,曰:“如来灭后,众□潜灵,唯有大士文殊师利,于此山中,□引□生,教诸菩萨。波利所恨,生逢八难,不睹圣容,远涉流沙,故来敬谒。伏

^① 陈榮仁《闽中金石略》卷一,唐,尊胜陀罗尼经幢。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



E 1.1



E 1.2 经幢铭款细部

乞大慈大悲，普覆令见尊仪。”□已悲泣，□□□□顶礼，礼已举头，忽见一老□□山□□□作婆罗门语，谓僧曰：“法师忆存慕道，追访圣踪，不惮劬劳，远寻遗迹。然汉地众生多造罪业，出家之辈亦多犯戒律。唯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能灭□恶业，未□法师□将此经来不？”僧曰：“贫道直来礼谒，不将经来”。老人曰：“既不将经，空来何益？纵见文殊，亦何必识师？可倒向西国，取此经来，流传汉土即是。众圣广□□□济幽明，报诸佛恩也。师取经至此，弟子当示师文殊师利菩萨所在”。僧闻此语，不胜喜跃。遂裁抑悲泪，至心敬礼。举头之顷，忽□□老人(下阙七字)心念倾诚，回还西国，取佛顶尊胜陀罗尼经至。永淳二年(公元 683 年)，回到西京，具以上事，闻奏大帝，大□遂将其本，入内请□□□□法师(下阙十三字)此经，施僧绢三十疋，其经本禁在内不出。其僧悲泣，奏曰：“贫道捐躯委命，远取经来，情望普济□生，救援苦难(下阙二十字)含灵同益”。帝遂留翻得之经，还僧梵本。其僧得梵本，将向西明寺，访得善梵汉语。僧顺贞奏：“共翻译(下阙二十一字)五台山，于今不出。今前后所翻两本，并流行于代，小小语有不同者，幸

勿怪焉”。至垂拱三年(公元 687 年),□□寺(下阙二十四字)留,一如上说,志静遂就三藏法师,谘受神咒。法师于是口宣梵音,经二七日,句句□□□□梵音(下阙二十七字)别翻者是也。其咒句稍异于杜令所翻者。其新咒改定其错,并注其音。讫□有学者幸详焉。(下阙七字)于(下阙十九字)说。其翻经僧顺贞,现在住西明寺。此经救拔幽显,不可思议。恐学者不知故,具录委曲(下阙二十四字)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罽宾沙门佛陀波利奉诏译。(下经文和信众捐资姓名略)朝议大夫使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上柱国薛凝、都押牙将仕郎□太常寺奉礼郎骁骑尉谢愁、押牙吴□、押牙陈元度、押牙兼都虞侯林弘□□、押牙□□、团练管干许庶□□□……

大唐大中岁次甲戌(公元 854 年)五月八日建。乡贡进士欧阳偃、沙门文中共书。镌字人卢淮、董政□越、卢□□脩己等募缘树立。

以上经幢里提到的官职名称,《闽中金石略》已有考证,在此不赘言。经幢信众题名有 200 多人,有地方各级官员,有百姓;有男人和女人,女人则有一娘、二娘……十二娘不等。这是研究唐代泉州佛教和民俗的第一手资料。

E 2 唐大中八年经幢石雕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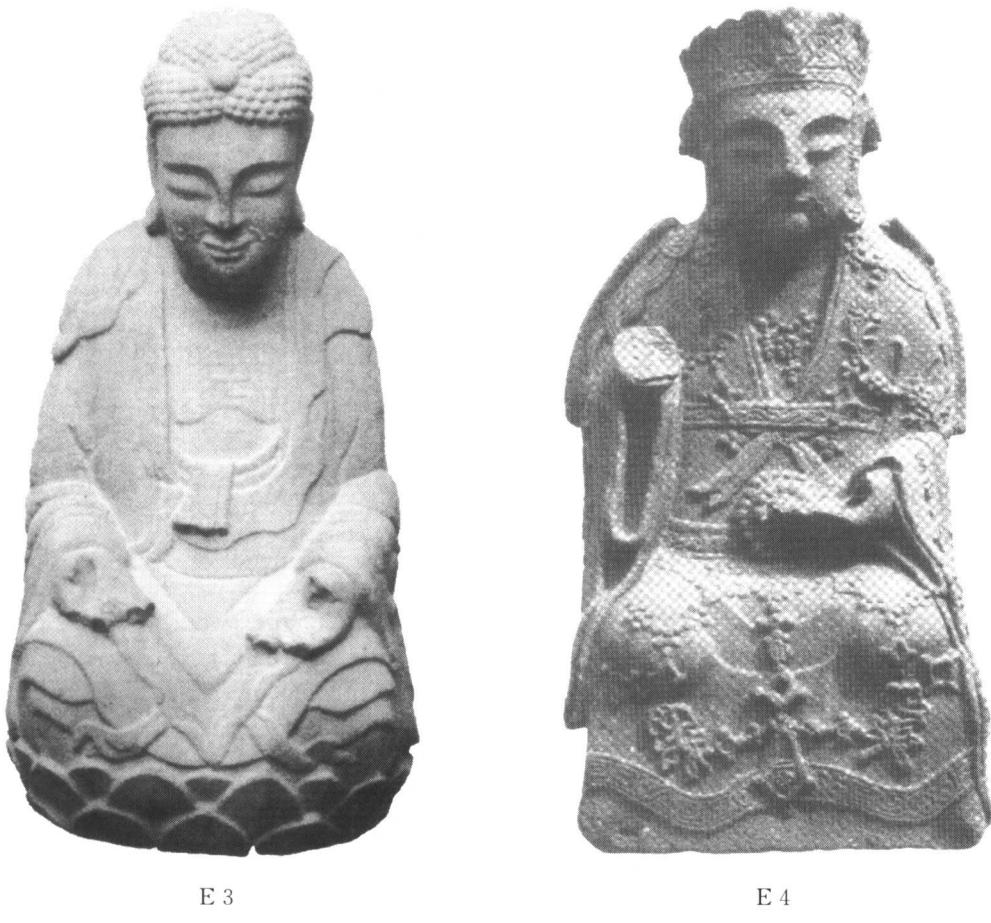


E 2

石刻作八面,系经幢构件,每面刻一个凹入石龛,龛内浮雕佛像,但因年久风化,佛像面目模糊不清。白花岗岩石雕成。现存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

E 3 开元寺唐代石雕佛像

石像高 78 厘米、肩宽 31 厘米、座宽 41 厘米。辉绿岩石琢成。原存泉州开元寺内的水陆寺,同保存的还有几尊佛像。佛像慈目低垂,耳长及肩,有胡髭,趺坐于复瓣仰莲座上。但佛像的手指皆遭破坏。佛像现存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



E 3

E 4

E 4 开元寺唐代石雕观音像

观音石雕像高 68 厘米、座宽 3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原存泉州开元寺内的水陆寺。观音作男相，有胡髭。脸庞丰满，耳长及肩，有耳饰。观音戴宝冠，冠上正面刻佛像。观音坐像的正面和背面，布满整串的花朵、璎珞和结带。有披肩，但右手残缺。现存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

E 5 开元寺唐代石雕佛像

石像高 77 厘米、肩宽 34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原保存于泉州开元寺之东侧的水陆寺内。佛像慈目低垂，耳长及肩，趺坐于仰莲座上。佛像右手缺失，左手指部分残缺。面庞慈祥，并浮刻胡髭。现存泉州开元寺佛教博物馆。^①

① 图 E 3~5，照片均原载于泉州开元寺编委会编《泉州开元寺》，1999 年，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



E 5

E 6 开元寺宋代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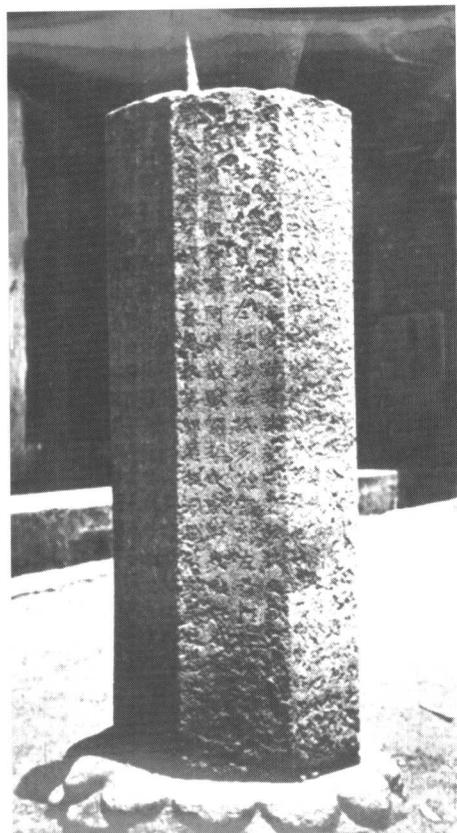
经幢用白花岗石雕成。作八面，每面宽25厘米，面竖刻四行经文，行二十七字，楷书。经幢高143厘米。经幢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僧元绍等所建，僧宗美记之，林巽书之。据《闽中金石略》记：“幢书在水陆寺，寺废乃移诸开元寺”。又云：“考《吟窗杂录》引《历代吟谱》云，宗美晋江僧，有诗六百篇，曰《晋江集》，盖僧之能文者。咒文与承天寺淳化幢、天圣幢，均系沙门不空译本。末题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盖又出于杜行儕、波利诸本外矣。”^①

图E 6.2照片为1978年所摄，其时残存经幢原石保存于开元寺内的水陆寺庭院内，而E1唐代大中八年幢则藏于屋内，与法石乡发现的五代观音石雕立像并列。

^① 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卷三，宋一，水陆寺陀罗尼经幢。



E 6.1 21世纪初修补复原后重竖于
开元寺大雄宝殿前西侧的经幢



E 6.2 残存的宋代经幢



E 7

E 7 五代石雕观音像

1964年10月,在距市东南约7.5公里的赤山水库工地(法石附近)上,发现了石造观音立像一躯。惜发现时,整躯造像已被凿为五段,惟上半身尚完好。石像背面勒汉字二行,楷书,文云“开平三年十月十三日”。石高180厘米,像高170厘米、肩宽50.2厘米。立姿,赤脚踏于莲台上。

石像仪容相当俊美,颇具神韵,双手叠于胸前。衣褶刻划浅而不失流畅。从头部及腰际所残留的灰泥及金箔看,曾在石雕像的表面用灰泥加工重塑,尤其衣带及胸际璎珞上,用灰泥重塑的遗迹更宛然可见。闽南古时石雕造像大多如此。

按开平三年(公元909年)为后梁朱温帝号,因知此

石像是泉州甚至是闽南较早的佛教雕刻。它较之九日山西峰上刻于宋乾德三年(公元965年)的石造阿弥陀佛像,尚早五十多年。

观音石像,原置于法石滨海的赤山乡山上的小庙中。该地为晋江水流出口,是古代航行东南亚各国的海外贸易船舶出入泉州港的必经之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载:

法石寨去城一十五里,水面广阔,寨临其上,内足以捍州城,外足以扼海道。^①

观音菩萨,以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著称的神明,在沿海一带曾被视为保护航海的女神。《泉州府志·坛庙寺观》有一段有趣的记载,它说明了泉州海神天妃取代海神观音,和取代九日山通远王神的过程。文云:

神居莆阳之湄洲,都巡检愿之季女也。生有祥光异香,资慧颖悟,能知休咎长,能乘席渡海,常乘云游于岛屿。人呼曰神女,又曰龙女……宋太祖雍熙四年九日二十九日升化,是后常朱衣翩旋飞行水上,累著灵验。宋庆元二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觉全,梦神命作宫,乃推里人徐世昌倡建。实当笋江巽水二流之汇,番舶客航聚集之地。时罗城尚在镇南桥内,而是宫适临浯浦之上。自是水旱盗贼,有祷辄应,历代遣官齎香诣庙致祭。明永乐五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其庙。自是节遣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官,出使琉球、暹罗、爪哇、满刺加等国,率以祭告祈祷为常。^②

在天妃海神传说出现以前,凡出入泉州港的大船小舸,例须先到法石观音庙中去行香顶礼,祈求航海平安。但从天妃神话传说出现,佛教僧人觉全和里人徐世昌则建庙以祀天妃。观音的神权,遂为天妃所夺,终至为天妃所代替。所以庙宇从宋以后,日趋冷落,终于被废弃,后人竟不知其曾经有过的繁盛。

奉祀海神,是一种迷信行为,但在古代社会,它确是泉州人民习惯于过航海生活的现实反映。此石刻造像的发现,对进一步研究泉州在宋代以前的海外交通历史,提供了很重要的实物资料。

此照片摄于1964年。如今,此观音石雕像仍保存于泉州开元寺里的水陆寺佛殿中。

E 8 开元寺南唐保大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宝盖石雕残件

经幢由石灰岩石雕成,八角八面,经幢宝盖石上浮雕四尊飘带飞天,但宝盖石已断为五块,檐角皆破损。宝盖中心刻一圆圈,直径48厘米、厚12厘米。飞天头戴宝冠,面庞丰满,耳垂及肩,上身右袒僧祇支,戴项圈,飘带绕肩、臂飘扬,腰系长裙,双脚裸露,体态轻盈。飞天手臂饰臂钏、腕钏,左手皆托供盘,而右手有的拈花紧贴胸前,有的则以手掌抚于胸前。从飞天整体的丰满形象看,表明仍然保有唐代飞天雕刻艺术的传统。

1982年8月,强台风袭击泉州,泉州开元寺拜庭巨榕折断,击倒树下的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造的婆罗门金涂式石塔,经幢、宝盖飞天及经幢其他构件,在塔身及塔基里被发现。

^①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1937年万有文库版。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



E 8.1 经幢宝盖石雕残件之一



E 8.2 经幢宝盖石雕残件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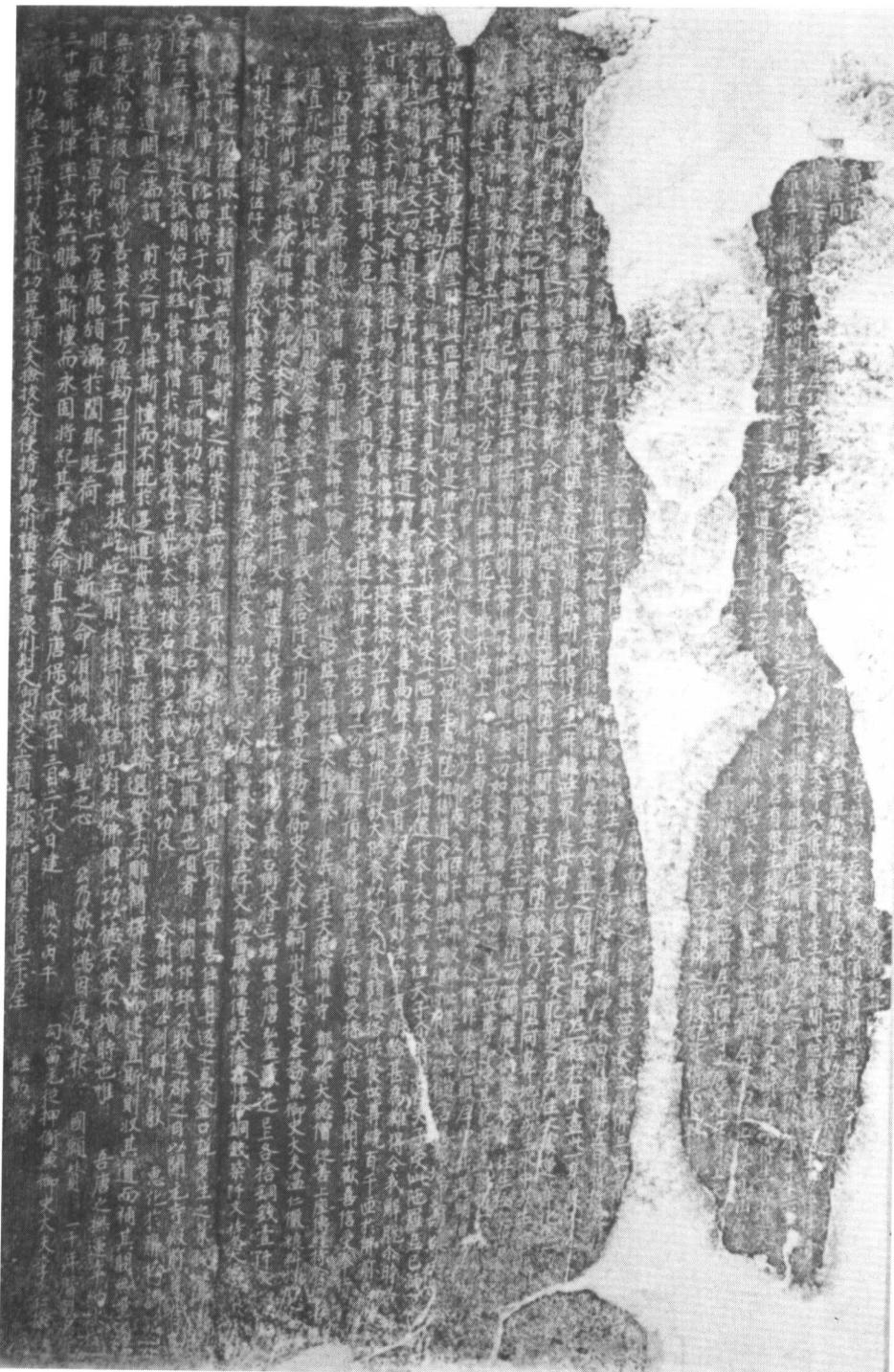
E 9 开元寺南唐保大四年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拓本

经幢八角八面,每面宽19厘米,通高120厘米。表面磨光,竖刻文字七十六行,文字摘录于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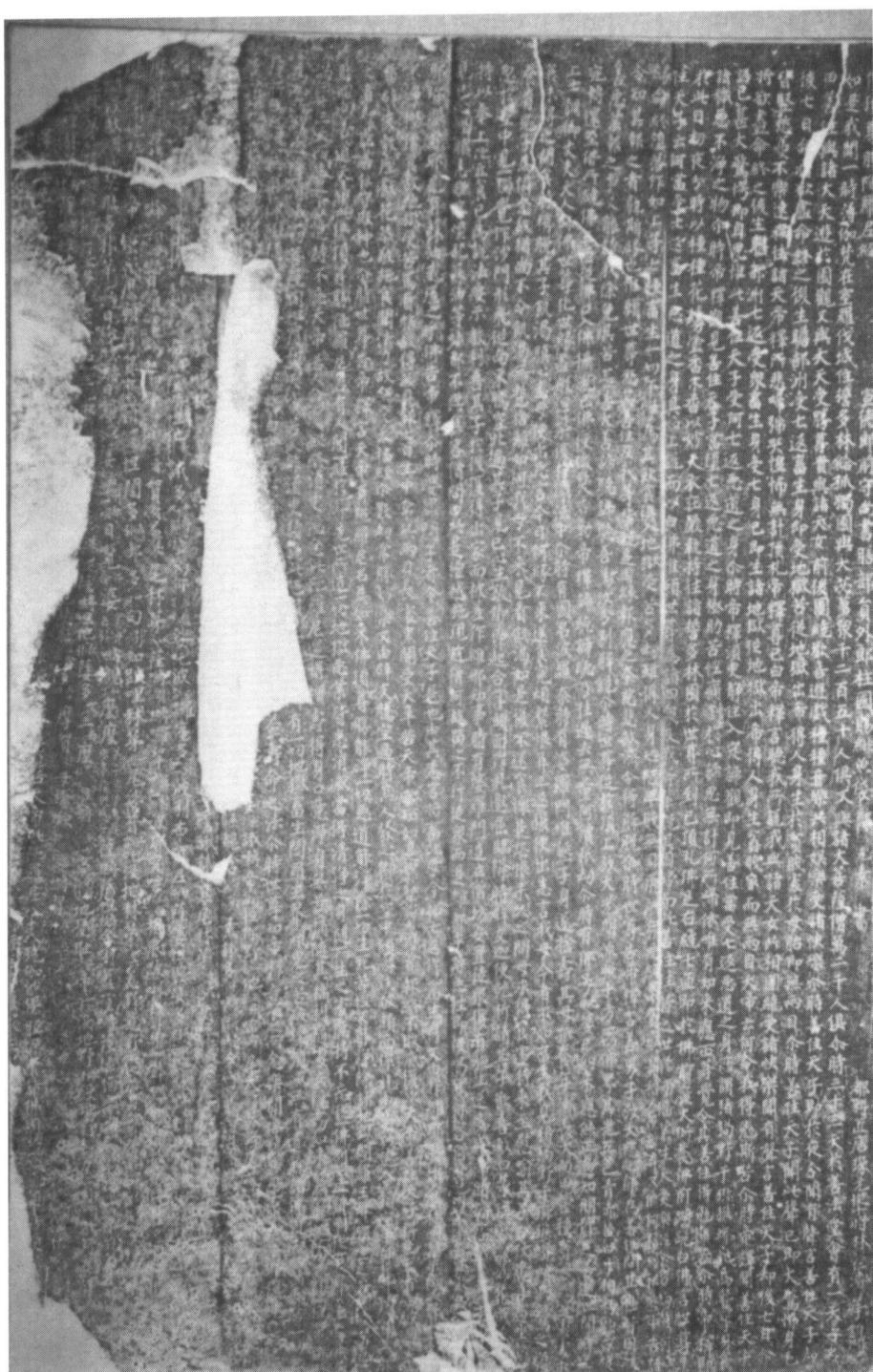
第一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宣德郎前守尚书膳部员外郎柱国赐绯鱼袋郑元素书,都料将唐琛元、从十将林仁濬等镌”。

第六十五行:“管内僧正临坛匡教大师赐紫守涓、管内都监长讲经论大德赐紫道昭、监寺讲经论大德赐紫惟岳、寺主大德僧惟守、都维那大德僧从善上座传经持念□□□”。

第六十六行:“通直郎检校尚书比部员外郎柱国赐紫金鱼袋王传嗣,舍见钱参拾阡文。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粮料将御史□□”。



E 9.1



E 9.2

第六十七行：“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兼御史大夫陈匡俊，已上各舍伍阡文，转运将许延祐元从，押衙杨匡轸，右衙大将王蟠，军将唐弘益、严迅，已上各舍铜钱壹阡文□□□”。

第六十八行：“権利院使刘拯，舍伍阡文。管内威仪临坛大德神毅、讲贊法慧大德赐紫文展、粥院□□大德惠斌、各舍壹阡文勾当。取幢传经大德神悟，舍铜钱柒阡文。持念大德□□”。

第七十一行：“幢而左无对峙，遂发诚愿，始议经营。请僧于浙水募缘、召匠，于太湖采石，徙移五载，竟未成功。及太尉琅琊公……”。

第七十二行：“访萧寺遗阙之端，谓前政之何为，构斯幢而不就，于是遣舟航远，泛置琬琰。俄臻选敏手以雕镌，择良辰而建置，斯则收其遗而补其阙，无量胜□”。

第七十五行：“三十世宗祧，俾率土以共瞻，与斯幢而永固。将纪其事，爰命直书。唐保大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建，岁次丙午 勿当元从押衙兼御史大夫李仁检”。

第七十六行：“功德主英谋叶义定难功臣光禄大夫检校太尉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 王继勋”。^①

王继勋，王延政从子，闽天德三年（公元945年），留从效杀叛臣黄绍颇，擢任泉州刺史，请度僧、设坛，又于次年建造此《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经幢除主要部分刻经文以外，又刻记施舍建经幢人的姓名，其中有许多官员，如“州司马专客务兼御史大夫陈光嗣”、“州长史专客务兼御史大夫温仁俨”、“军事左押衙充海路都指挥使兼御史大夫陈匡俊”、“権利院使刘拯”和“光禄大夫检校尉持节泉州诸军事守泉州刺史御史大夫上柱国琅琊郡开国侯食邑一千户王继勋”等。以上官职，多为史书所缺。经幢的发现，可为五代史职官补白。经幢上的官职如“专客务”、“充海路都指挥使”、“権利院”等官名和机构，都反映了五代时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因此，经幢是泉州海上交通史的重要实物材料。

经幢构件上的浮雕飞天，皆赤足裸露，身体修长，保留着唐朝飞天雕刻的风格，是很好的艺术品，经幢铭文还记载，造经幢的石灰岩，是“请僧于浙水募缘、召匠，于太湖采石”。可见建造此经幢的石料是选用著名的太湖石，且经过五年的辗转运输，仍未完成，可知其历程是十分艰难的。经幢上诸多泉州地方官员的施舍记载，从一千文、五千文、七千文到三十千文不等，这反映了五代时泉州以刺史为首的地方官的崇信佛教，而他们建造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也是颂扬他们的功德碑。

经幢题名的泉州开元寺僧人，其中的释道昭、释文展等两人，在《紫云开士传》里有传记。释道昭传云：“唯识大师道昭者，泉州晋江人也……唐天祐中，昭谒雪峰义存禅师……天德二年，留从效以指挥使起义兵，王继勋知州事，表请度僧、设坛，以昭临之……置真书《唯识论解》八十卷，具存有魏晋笔法”。^②而释文展传云：“文展老宿者，不知何许人也，居泉之开元。法兴，谢去人间事，闭门而生……州刺史王延彬高之，致以北禅辞去庵西山罗汉洞，再命展乃积薪自焚”。^③

^① 经幢录文据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泉州文史》第9期，1986年12月出版。

^② 释大圭《紫云开士传》卷二，唐季。

^③ 同②

E 10 开元寺镇国塔

泉州开元寺，始建于唐垂拱二年（公元 686 年），初名“莲花道场”，后改称“兴教寺”，再易名“龙兴寺”，开元二十六年，改为“开元寺”。

紫云大殿，是开元寺的主要部分，始建于垂拱二年，后毁。乾宁四年（公元 897 年）重建，宋绍兴二十五年（公元 1155 年）毁。元代重修。明以后多次修葺。

镇国塔与仁寿塔，俗称东西塔，对峙于紫云大殿前的东、西方，相距约 200 米。从构筑风格看，不仅保留宋代手法，而且还带有地方色彩。如阑额之下两旁出雀替，栌斗和交互斗上出如意状头。昂的砍法不似唐、辽、宋的琴面式、披竹式，而只刻作曲线。这些都是建筑的特色。

据《开元寺志》^①载，镇国塔为唐咸通六年（公元 865 年）建，初系木塔，凡五级。宋天禧中（公元 1017~1021 年）改作十三级。绍兴乙亥（公元 1155 年）灾。淳熙丙午（公元 1186 年）僧了性重建。宋宝庆三年（公元 1227 年），僧守淳改为砖塔，凡七级。嘉熙二年（公元 1238 年），僧本洪易以石，仅一级而止。僧法权继之，至第四级。天竺讲僧，乃作第五级及合尖。前后历十三年始成。

塔纯为花岗石仿木构建筑，作八角式五层檐。通高 48.24 米。八角形每边长 7.8 米。塔平面分为外壁、回廊和塔心八角柱三部分。实心塔柱，每边长 1.87 米。其余各层平面构造同一层。塔北坐而南向。

塔基须弥座束腰部分，系用辉绿岩石浮雕释迦牟尼出家故事等石刻三十九幅（原四十幅，其中一石早年遗失）。

塔身每层回廊之外围栏杆及钩栏石板。塔的每层外壁转角处都立有粗大圆石柱，柱上有大方形栌斗。门及壁龛的位置如下：第一层，在东、西、南、北各设有入口的券形门，其余四面各设一个方形壁龛。第二层，门、龛位置与第一层互换。第三层、第五层的门、龛位置同第一层。第四层同第二层。

每层各壁龛及券形门的两侧，都隐出椽柱和横枋，并在各八角面雕有生动的大型天王、比丘和菩萨石刻像十六尊。具体安排如下：

第一层刻天王、力士。第二层刻罗汉金刚。第三层刻佛弟子、菩萨。第四层刻韦驮、达摩。第五层刻世尊、护法等。雕工古朴，刀法深劲有力，表现出宋代的手法和作风。

腰檐斗拱系五铺作耍头造。倚柱上施琴面阑额，两额之间左、右各出雀替，额隐出栌斗和道拱。第一跳上施罗汉枋，第二跳上直接承橑檐枋，但无令拱，并用昂嘴形耍头。转角铺作下用方形栌斗，两侧亦有方形角，附有角斗在其上，其做法为补间铺作。

八角实心体塔心，以横梁斗拱与塔的外墙相连结，使重心集中，屡经历代飓风和地震的袭击，仍不倾斜变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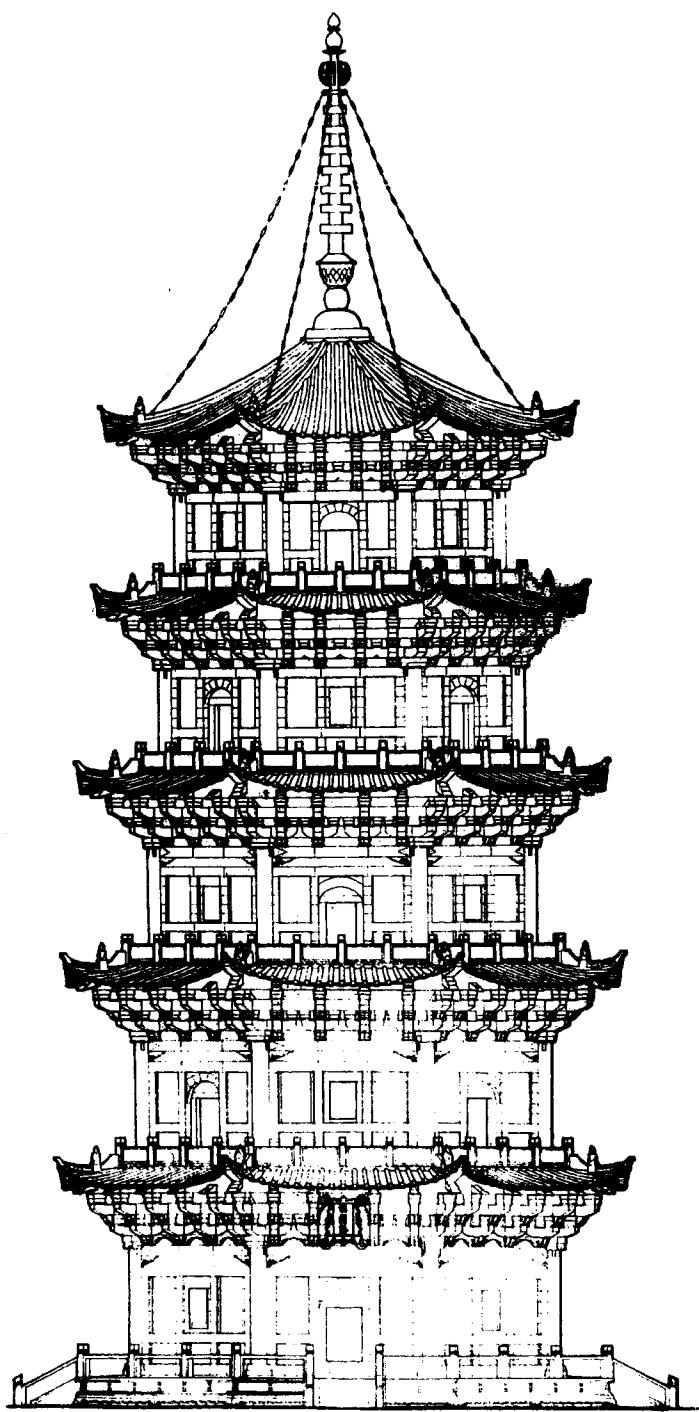
每层挑檐的角脊上，都刻置一尊怒目按剑的立体石武士，全塔有四十尊，每层的八个翘角之下，各嵌有铁栓，是用以系铜铃的，但铃早已遗失了。塔顶有尖刹，是由一个巨型石覆钵，一个刻有瓜瓣的大扁圆形石球，一个铸有仰莲的生铁钵和七重铁相轮合组而成的。尖顶用合金葫芦形宝珠，并系以八条铁索链条。

① 释元贤《温陵开元寺志》，建置志，东塔。1927 年重刻本。



E 10

— 54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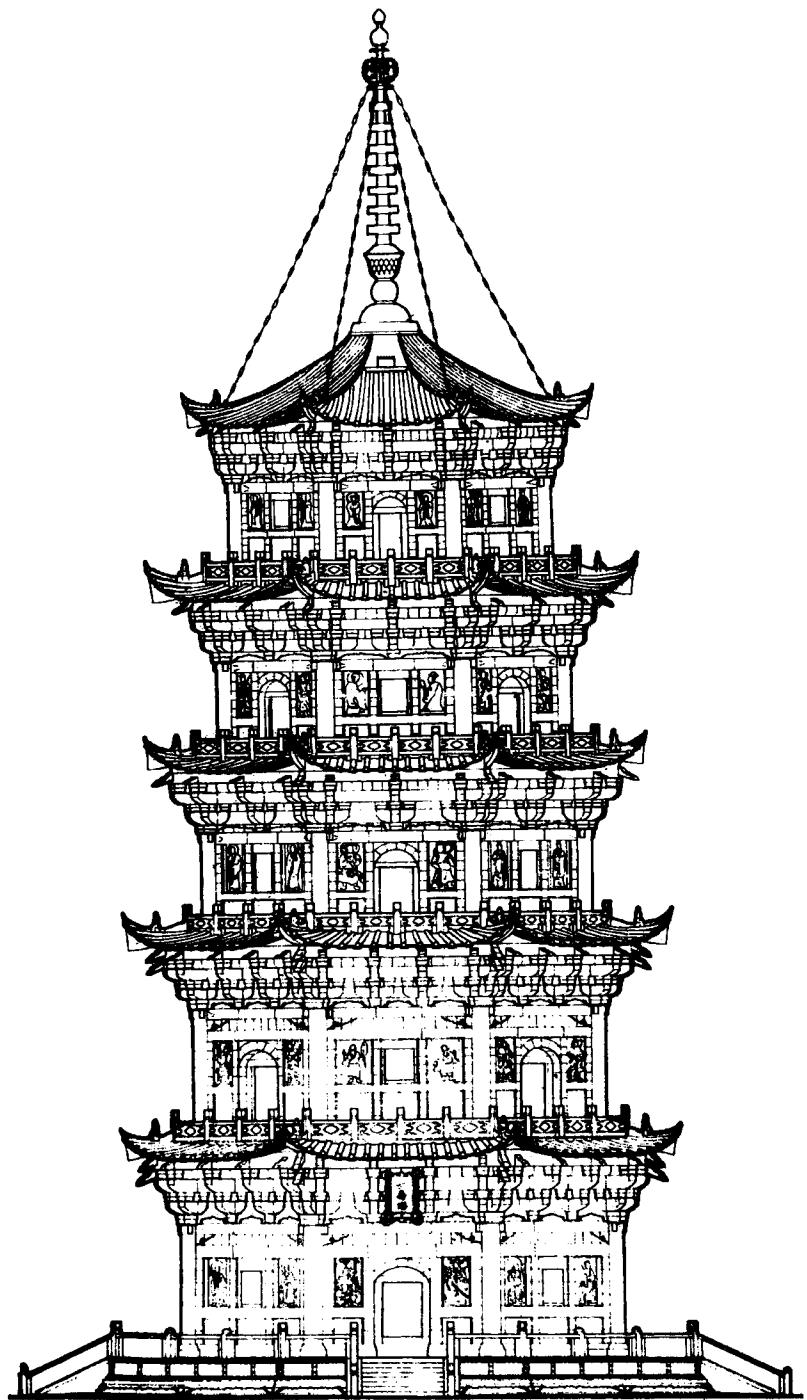
E 10 正立面图^①

① 此立面图转引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主编《泉州古建筑》第 66 页。1991 年 2 月,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 11 开元寺仁寿塔



E 11



E 11 正立面图^①

① 此立面图转引自泉州历史文化中心主编《泉州古建筑》第 67 页。1991 年 2 月，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仁寿塔。五代梁贞明二年(公元 916 年)王审知建,初为木塔七级,号“无量寿塔”。宋政和间改为砖塔。绍定元年——嘉熙元年(公元 1228 年~1237 年),改建石塔。先镇国塔十年而成。通高 44.06 米。

塔的外壁柱顶用转角铺作,其柱头栌斗及交互斗不出如意头,泥道拱上刻出柱头枋。第二跳华拱正心出叠涩一层承屋檐。第三层以上转角铺作的第二跳华拱头交互斗,不出昂状物。补间铺作第二跳华拱之上作真要头。塔基须弥座束腰,浮雕花卉、双狮戏球等。其余建筑规格,大体与镇国塔同,但略小而已。

E 12 开元寺宋代金涂式石塔

两座形式特殊的石塔中的一座。二塔坐落在泉州开元寺大殿前拜庭的两侧,均为“金涂式”塔,亦称“宝箧印经式”塔,通高各 5.48 米。方形基台底部每边长 1.92 米。基台之上为须弥座;其上的塔身第一层每面刻四个佛龛,龛内刻坐佛;第二层每面刻圆拱形龛,龛内浮雕一铺佛像。龛外塔身上部四个转角,雕有带翅膀的怪兽,其形态颇似唐墓出土的魁头俑。塔顶为方形石盖,四个转角有竖起的蕉叶。蕉叶石面上刻卷云和佛教故事。顶心为覆莲盆上有多重相轮和尖顶。

关于这两座塔的建造年代,据东侧石塔须弥座上所刻:

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绍兴乙丑七月题。

王思问舍钱三十贯,乙酉重修。

绍兴乙丑为绍兴十五年(1145 年)。厢,附城一带之地谓之,如城厢。据《晋江县志·都里》载:泉州“宋分五乡(厢)”。^①

1982 年 8 月,台风摧折塔旁巨大的榕树,树干击倒石塔,发现一尊鎏金观音铜像,“由葫芦顶神帐、佛像和须弥座三部分组成,通高 15.5 厘米……正面刻人字形帐面,背面从右至左,由上而下有五十二字分成五行



E 12

^① 乾隆《晋江县志》卷一,都里。

泉州宗教石刻

的阴刻楷书：‘泉州右南厢宣明坊女弟子 柳三娘与夫主梁安，共舍宝塔一座永充供奉，合家人口等增延福寿。时绍兴十五年六月 日，弟子梁安题。’”^①

E 13 开元寺宋代金涂式石塔



E 13

^① 林宗鸿《泉州开元寺发现五代石经幢等重要文物》，载《泉州文史》第9期，泉州市历史研究会、泉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1986年12月。

E 14 开元寺拜庭东侧石塔群



E 14

这是泉州开元寺拜庭东侧的四座小石塔，每座底部基台作四方形，其上分三层，六角形束腰基座和圆形束腰基座之上，第三层为塔身，作圆球形，两面凿龛，龛中浮雕佛像。塔顶有多重相轮和宝珠形尖顶。全部构件用白花岗岩石雕成。

E 15 开元寺焚帛炉

通高 3.25 米。辉绿岩石雕成。基座作八角形，束腰处壸门内作双龙戏珠。炉身作仰莲状，炉盖作覆莲状，并刻狮子。盖沿有铭文云：

时癸亥年六月日志



E 15

从明代木刻屏风“紫云双塔”的画面上看，此焚帛炉于清代略有改建。仔细观察炉盖，可以明显地看出，其雕刻风格和手法与炉身的雕刻不同。

E 16 开元寺石构小塔

石塔下有方形基台，六角形须弥座底部有六个如意状足，上有仰覆莲束腰圆座，塔身作圆球形，两面凿龛，龛中浮刻佛像，佛像为胸像。塔顶有八角形檐，塔刹有多重相轮。石塔竖立于大雄宝殿后西侧。



E 16



E 17

E 17 开元寺内水陆寺石塔构件

泉州开元寺内水陆寺庭院中保存一些小型石塔的构件。从构件的仰覆莲瓣的雕刻艺术风格看，它们都是宋代佛教石塔的构件。全部构件由白花岗岩石雕成。

E 18 开元寺内水陆寺石塔构件



E 18

附录：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

《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录文：

混沌死而天地生，道德销而仁义作。情车业网，始脉旋波。天谓洛龟河龙，文有生而不文无生，乃产金圣人于西国。钻智慧火，乾烦恼海。理不吾吾而一贯生生。其姿电燿于周室，其波泓漾于汉代。乃是馆移鸿胪城崇白马，斯有寺之始也。寺制殿象王者之居，尊其法也。其后金地莲扃周旋四海，鸟飞兔走，或故或新。至如神运之灵莫灵矣，亦靡得而岿然。则我州开元寺佛殿之与经楼、钟楼，一夕飞烬，斯革故鼎新之数也。

初仆射太原公，以子房之帷幄布泉城，以叔度之袴襦纩泉民。而谓竺乾之道与尼、聃鼎，宜根乎信而友乎理。矧开元宇五十载之圣容，实寺之冠。洎帅闽也，愈进其诚，繙经三千卷，皆极越藤之精，书工之妙。驾以白马十乘，送以府僧，迎以郡僧，置兹之楼。既而蜀雨不飞，识者以为物之尤罕，留于世敬之至必动乎神。是必为地祇所搜，龙宫之索，不然者曷？与斯故新之数期，厥理则明，我宜悄然不已。仲弟检校工部尚书，为兹郡之秋也，武则拍孙吴之背，文则席夏商于前。而复龙虎之内，以埙以箎，大聳孟龙之旨。乃割俸三千缗，鸠工度木烟岩云谷。之杞、梓、楩、楠，投刃以时，趋功以隙，食以月粟，付以心倕。不期年而宝殿湧出栋隆，旧绮梁修新，虹八表四隅，悉半乎丈。柱盛镜础，方珪丛斗，楣承蟠螭，飞云翼拱，文榱刻桷，镠轡权桠。或经纬以开织，或丹覆而缬耀。晶若蟾窟，窠如鳌背。风夏触而秋生，僧朝梵而谷应。升者骨冰，观者目波。而五间两厦，昔之制也。

自东迦叶佛、释迦牟尼佛，左右真容，次弥勒佛、弥陀佛、阿难迦叶、菩萨卫神。虽法程之有常，而相貌之欲动。东北隅则揭钟楼，其钟也新铸，仍伟旧规。西北隅则揭经楼，双立岳峰，两危蜃云，东瞰全城，西吞半郭。霜韵扣而江山四爽，金字骈而讲诵千来。是知天地日月鬼神，不欲一存其物，将有待于后人也。设使斯殿也斯楼也不有之，故其何以新？我公之作之为其何以布之哉？三略六韬流通贝多，戈霜剑雪为甘露洁信，莫智之所措也。既毕，召化内之缁锡，数迈于千斋，而落之累中。慈云五色，慧日重轮，谭者以为梵天之宇化于是矣，灵山之会俨于是矣。我公之猝试大理评事，宋君曰骈才，推博古识洞真如，请立贞珉垂于不朽。公以小儒不佞俾刻斯文。僧正临坛，大德僧宣一，桑门之关键者，曰寺有记忘之矣。垂拱二年，郡儒黄守恭宅，桑树吐白莲花，舍为莲花道场。后三年，升为兴教寺，复为龙兴寺。逮元宗之流圣仪也，卜胜无以甲兹，遂为开元寺焉。尝有紫云覆寺至地，至今凡草不生其庭，大矣哉！自垂拱之迄开元，四朝而四易号，及（句）谅兆水于木，垂云薤草（谓叠莲之与云草），天启地灵。之如是，则开元实寺之冠，斯又冠开元焉。金圣人无为也，尧舜亦无为也。诚参错其道，巍巍圣仪，永与诸佛如来俱，岂不其然？愚是以奋笔于一公之说。

乾宁四年丁巳冬十一月日记。

碑文为唐监察御史莆田黄滔撰写。这方碑刻早已无存。宋淳熙三年，杨万里为《黄滔集》

作序曰：“莆阳黄君沃，又遗余以其祖御史公文集，其诗尤奇。”又曰“欣然刻印，以供士君子之好古书者，其又可尚也夫”。^①

这方碑刻记载泉州开元寺始建、修建和原建筑状貌的许多史料，是研究泉州开元寺和研究唐代泉州丝织业的重要资料。

E 19 安福寺石雕造像



E 19

20世纪90年代，安福寺进行修缮，在寺前土台下出土六尊石佛造像，均辉绿岩石雕成。从石佛的雕刻风格，判断其雕刻年代自唐至宋。图为六尊石佛收藏于寺内的情况。

据万历《泉州府志》记：“安福寺，在三十三都龙首山下。唐垂拱间建，今废。”^②而乾隆《泉州府志》则记：“在龙首山麓，唐垂拱三年（公元687年）建，名安福院。元至正间毁，僧智妙重建。明洪武二十四年改为寺。正统、天顺间相继修，后废。”^③则知其创建仅晚泉州开元寺一年。

E 20 安福寺唐代石雕阿弥陀佛像

石像高89厘米、肩宽32厘米、座高25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佛慈目下垂，脸部较长

① 唐黄滔《黄御史集》杨万里序，清康熙版本。又见崇祯释元贤《温陵开元寺志》，艺文志，碑记。

② 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寺观宫庙类，安福寺。而《八闽通志》卷七十七，寺观条记“唐嗣圣三年建”。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晋江县（附郭）。



E 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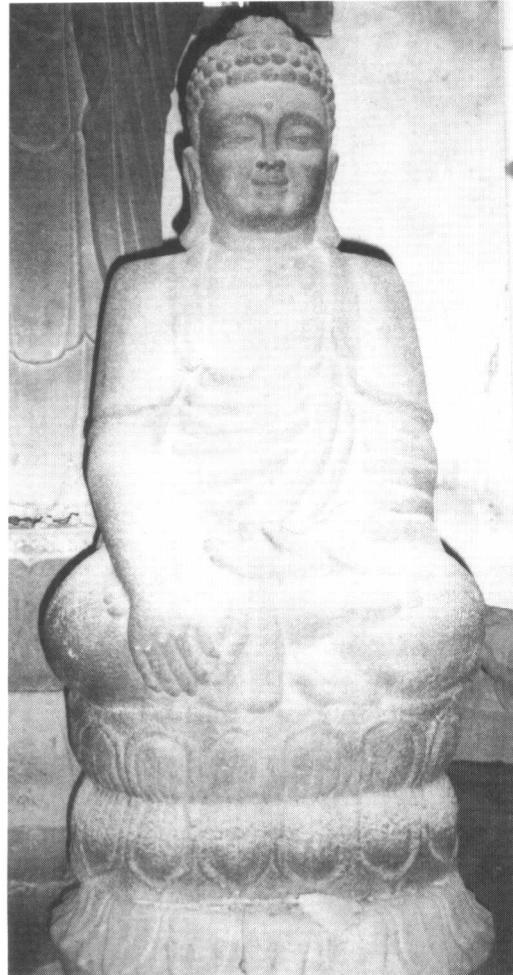
而有胡鬚。右手缺损，头有肉髻螺发，耳长垂肩，袖宽及莲台。趺坐于仰莲座上，莲座下雕刻云纹。

E 21 安福寺宋代石雕佛像

石佛像高 122 厘米、肩宽 43 厘米、莲座高 2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佛脸部宽阔、丰满，耳长垂肩，趺坐在仰覆莲台上。食指与拇指相捻，两手相叠，平放于盘起的腿上，脚心向上。



E 21



E 22

E 22 安福寺宋代石雕迦牟尼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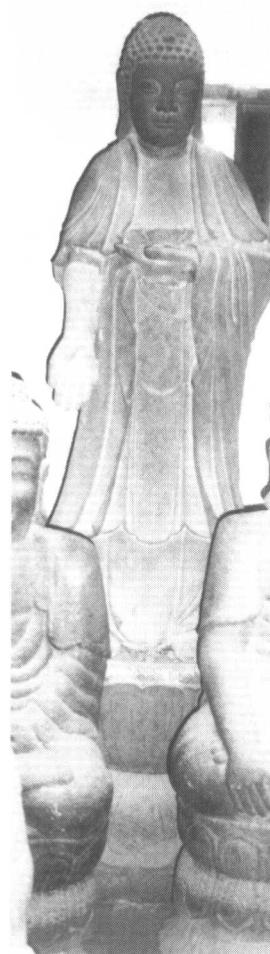
石佛像高 123 厘米、肩宽 46 厘米、莲座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佛右手前垂作降魔相之触地印，左手平置于腹前，脚心向上。趺坐于仰覆莲台上。

E 23 安福寺宋代石雕佛像

石像高 119 厘米、肩宽 46 厘米、莲座高 26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佛雕刻风格与 E 21、22 类同，趺坐在仰覆莲座上，两手相叠作禅定相之定印。



E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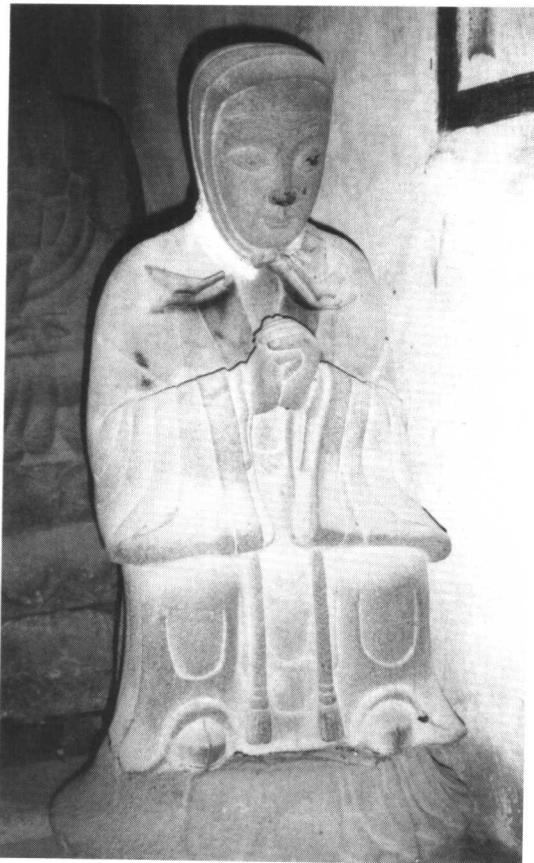
E 24

E 24 安福寺唐代石雕佛立像

石佛像高 165 厘米、肩宽 50 厘米、莲台高 61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右手下垂，左手托钵。耳长垂肩，脸形较长，有胡髭，双脚踏于仰覆莲台上。

E 25 安福寺宋代石雕造像

石像高 83 厘米、肩宽 36 厘米、莲台高 17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戴头巾，眼睛下视，两手抱拳于胸前，倚坐，鞋外露。双腿之间有两条垂带，座下是覆莲台。



E 25

E 26 承天寺宋代石经幢

承天寺，一名月台寺。“在崇阳门东南……周显德中”^①（公元954～959年）建，初名南禅寺。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赐名承天寺。历代屡有重修。现寺为现代重建。规模仅次于开元寺，为闽南名刹。寺有宋泉州太守王梅溪题承天寺十奇诗石刻，为明天启丙寅张瑞图书。寺中有石经幢五座，其中宋建两座。有一座经幢上刻着：

皇宋改元淳化之二载（公元991年），泉城寿宁寺……今圣上严建是幢一座。因此，知此幢为北宋初所建。

承天寺另一座经幢文字摘录如下：

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启请……时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岁次乙丑六月二十三日立。^②

此经幢与丰州镇尊胜陀罗尼经幢，同为北宋时期建造。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

② 陈榮仁《閩中金石略》卷三，宋一。



E 26

此为 1940 年的照片，照片中的大雄宝殿为清代建筑，大殿前庭院有四座宋代石经幢。大雄宝殿毁于“文化大革命”，石经幢保存下来。

E 27 承天寺宋代石经幢



E 27

照片左边石经幢，即淳化二年（公元 991 年）建的经幢；右边的石经幢，即天圣三年（公元 1025 年）的石经幢。

E 28 承天寺宋代七佛石塔



E 28 承天寺宋七佛石塔

泉州承天寺大门通道旁，有七座宋建石塔。关于这些石塔，有一些奇特的传说。据《泉州府志》记：“七佛石塔，宋景德中（公元 1004~1007 年）僧祖珍建。间植榕树，砌石栏之。至今苍蝇止塔者，首悉下向；榕根不出石栏；栖禽无矢污。”^①如今七佛塔仍存，古榕树仅剩一株而已。七佛石塔今仍为泉州承天寺一奇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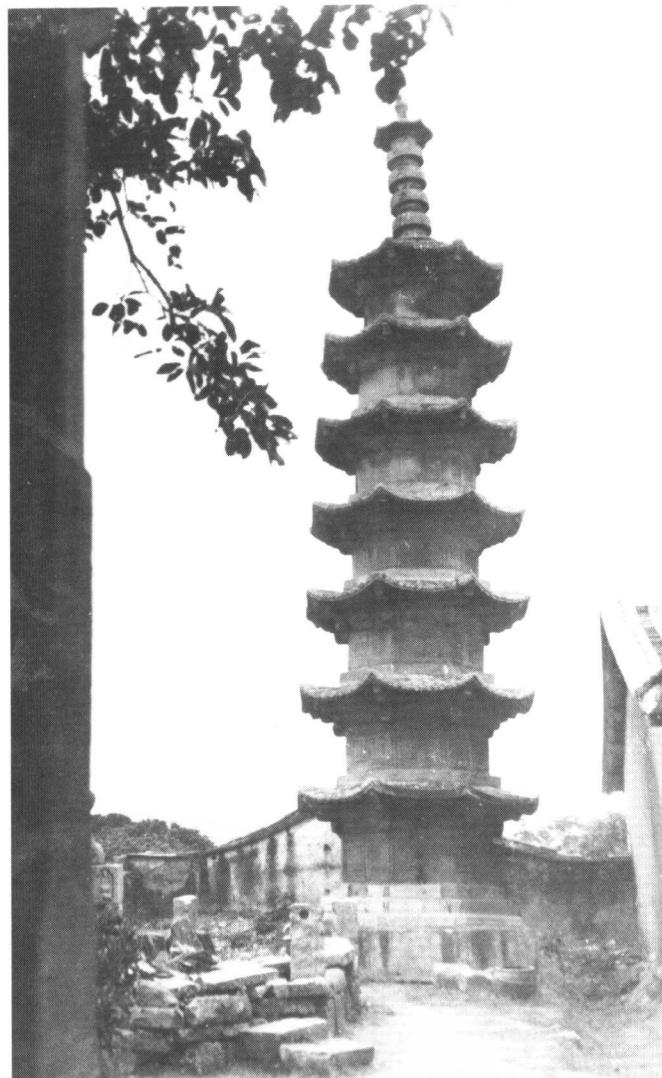
E 29 崇福寺应庚塔

崇福寺在泉州城东北隅。据《泉州府志》云：“宋初，陈洪进有女为尼，以松湾地建寺”。^②又《八闽通志》云：“地有晋松四株，枝干特异，旧名松湾”。^③又《府志》云，宋初陈洪进拓罗城包之，名千佛庵。太平兴国中（公元 976~984 年），赐名崇胜。至道中（公元 995~997 年），改名洪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承天寺。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

③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七十七，寺观，泉州府晋江县。



E 29

钟。元祐六年(公元 1091 年),改名崇福。寺内北面有宋建实心石塔一座,名为“应庚塔”。八角七级,每层有龛,龛内刻佛像和图案。塔顶有多重相轮的塔刹。应庚塔长期倾斜,2003 年落架按原样重修,在塔基座中发现许多熙宁年铜钱。

E 30 崇福寺石构小塔

石塔建于宋,底层为方形弥座,刻如意状头四足。上叠圆形束腰莲座。塔身作圆球形,两面凿龛,龛内刻趺坐佛像,塔顶有八角檐和多重相轮的塔刹,以及宝珠刹尖。全部构件取材白花岗岩石。



E 30

E 31 石狮宝盖山万寿塔

万寿塔，又名关锁塔，俗称姑嫂塔，在晋江石狮、永宁之间的宝盖山上。通高 21 米。平面作八角形，共五层，白花岗石砌筑。自西北面拱形门入。塔空心，入门右侧有石级绕上。每层叠涩出檐，塔顶为葫芦刹。据《泉州府志·山川》载：

宝盖山，在二十都，距郡城东南四十五里，俗名大孤山……绝顶有石塔，名关锁塔。关锁，水口镇塔也。高出云表，登之可望商舶来往。宋绍兴中，僧介殊建，又俗谓之姑嫂塔。《闽书》：“昔有姑嫂嫁为商人妇，商贩海久不至，姑嫂塔而望之，若望夫石然。”^①

又《八闽通志》载：

在永宁里二十都。上有石塔甚宏壮，商舶自海还者，指为抵岸之期。^②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川，宝盖山。

^②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七，地理，山川，泉州府晋江县。



E 31

宋代泉州海外交通发达。万寿塔矗立宝盖山巅(海拔 206 米),面临大海,登塔顶俯瞰,东南的围头、深沪湾,东北的石湖塔、石湖港和西北的泉州湾等,尽收眼底。由此可见,万寿塔既有为佛教镇风水的作用,又可瞭望海舶进出泉州港,还起了航海标志的作用,是宋元时代海舶进出泉州湾的航标。1961 年、1981 年、1996 年和 2002 年,多次重修。

E 32 石狮金钗山六胜塔

六胜塔,亦名万寿塔,因其所在地叫石湖乡,俗呼石湖塔。据《泉州府志·山川》载:

金钗山在二十二都,距郡城东南三十里,两峰延袤数百丈,若钗股然。上有六胜塔。《泉南杂志》:宋政和初,僧祖慧、宗什等,以其地类明州育王山,募缘为石塔,壮丽几拟开元镇国、仁寿二塔。^①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川。



E 32

该塔建筑式样,几同泉州城内二塔,全部用白花岗岩石构成,五级八面。通高31米。每级有四门、四佛龛及十六尊天王像。因僻处海滨,多已风化剥蚀。该地是宋、元时代番舶出入寄碇之地,《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载:

石湖寨取城五十里,南镇与北镇相对,城下之水从此入海,潮汐所通,实为本府内门。^①

可见石湖在宋代海外交通位置之重要了。且因年久失修,耸立海滨,风化较速,很多石檐都已断折,惟斗拱、横枋尚完好。塔的正面入口华带石牌上刻“万寿塔”,牌右面刻“檀越锦江凌恢甫立”。左面刻“至元二年丙子腊月建”。其塔座于1937年被拆毁移作建筑炮垒之用,因此塔基都呈露出来。1954年,南京工学院中国建筑研究室张步骞先生等到泉州考察,认为石湖塔是元建,但保存了一些北宋的手法。1961年、1982年和2002年多次重修。

^①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八,《申枢密院措置沿海事宜状》。

泉州宗教石刻

六胜塔从大体上看，如泉州开元寺二塔，但其结构有如下特点：

一、每层外壁转角处砌有圆柱。其门窗位置，第一层除在东、南、西、北四面各设人口外，所余四面辟成窗形佛龛。第二层则与下层错开，于东、南、西、北四面设佛龛，而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四面设门。第三层、第五层与第一层同，第四层与第二层同。这种砌筑法，在遗存实物中最早见于苏州市罗汉院双塔上，壁体重量分布均匀，甚为合理。门、龛两侧，皆隐出棟柱、横枋，并在各个壁面雕有天王、力士，颇有宋代雕刻风格。

二、腰檐斗拱系五铺作卷头造，其补间铺作每间用一朵，先于柱上施琴面阑额，额上隐出栌斗与泥道拱。第一跳上施罗汉枋。第二跳上直接承橑檐枋，无令拱，并用昂嘴形耍头。转角铺作下，用圆莲形栌斗，圆栌斗两侧并有方形附角斗，其上做法则一如补间铺作。

三、塔由外壁、围廊及塔心三部分组成。自门入内即回廊，廊以内为塔心，塔心作八角形实体。底层东、南、西、北面设有佛龛。从残存的痕迹看，扶梯系设于回廊内。

再仔细观之，该塔构筑特色还有如下几点：

其一，塔的八隅所用圆柱无卷杀，粗笨。外檐额枋断面肥圆（开元寺二塔的瘦高），且出头卷杀已有元代霸王拳式样，在手法上似乎较晚。

其二，转角栌斗作圆莲花形，与泉州城北的城隍庙等相类同，而开元寺二塔的则是较早期的栌斗式样。

其三，全部石雀替的雕刻，比开元寺双塔繁复。

按八角形楼阁式砧石塔，最早见于唐末、五代，而有宋一代使用最广。六胜塔的塔心与外壁分开，门窗位置逐层变换，以及壁面等的处理，大体是北宋时期的做法，与泉州开元寺二塔如出一辙，而由于风化较烈，更显古拙。

至于塔本身元建而存有北宋手法，则可作如下解释。即一代文化之变迁，多先发生在当时文化、政治中心，然后再向各地传播。由于时间和空间关系，就产生了地点比较偏远的，所受影响较晚，而当中心地域有了新的变动时，偏远地点也常多还保存着前此时期的手法。上述北宋手法，最早都发生于中原汴梁一带。福建或因位于东南边隅，传播路途遥远而变化迟缓，因而在元代建筑上尚保存北宋手法。

说明六胜塔是元代建造的证据。除底层华带石牌左所刻“至元二年丙子（公元 1336 年）腊月建”之外，在塔的第二层横梁上刻有“岁次丁丑（公元 1337 年）十月题”。第三层石横梁上刻有“檀越凌恢甫鼎建，岁次戊寅（公元 1338 年）十月题”。第四层石横梁上刻“檀越凌恢甫鼎建，岁次己卯（公元 1339 年）正月题”。第五层则刻有“岁次己卯（公元 1339 年）三月题，檀越凌恢甫鼎建”。这样，塔的建筑年代就明确了。石塔建成，费时四年。

E 33 金井西资岩造像

西资岩，位于晋江金井镇小三村之西南。一名卓望大石佛寺。《晋江县志》记：“初建莫考。宋绍兴十八年、明天顺三年和乾隆二十八年重修。”^①寺庙建筑结构类同晋江东石的南天寺，但规模略小。1935 年改为混凝土仿木构建筑，20 世纪 80 年代改砖木结构。大殿后壁依

山岩凿一龛，高 6.54 米，宽 14 米。龛中雕刻立佛像五尊（现在仅存中间三尊），正中佛像最高，达 4.60 米，肩宽 1.60 米。三尊佛像妆金身，赤足踏莲台，保留唐朝遗风。本照片摄于 1978 年。



E 33.1 正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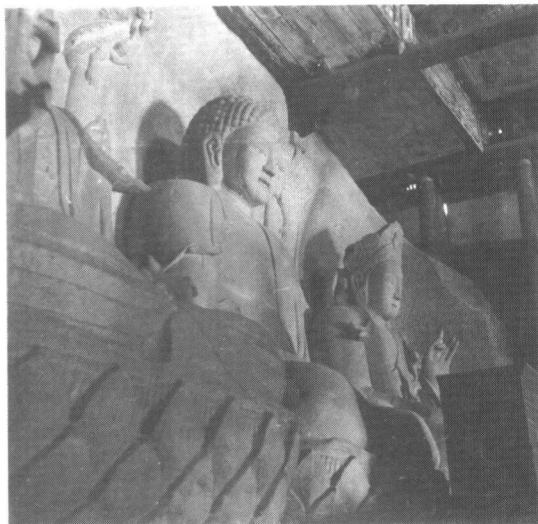


E 33.2 侧视

E 34 东石南天寺造像

寺位于晋江东石乡南天村北面 2 公里的岱山南坡。据《泉州府志·山川》载：“宋嘉定中，僧守净镌弥陀、观音、势至三尊。”^②大殿的后壁，依岩壁凿一龛，高 8 米，宽 18 米。龛前雕大型石佛三尊。正中为阿弥陀佛造像，佛头高 1.58 米，头前后宽 1.17 米，额头宽 1 米，佛耳长 70 厘米、宽 26 厘米。坐佛实高 5.02 米、宽 3 米，加上莲座，通高 7.02 米。佛像头顶有肉髻、螺发，两耳垂肩，趺坐于莲座，胸前有“卍”字佛号。龛里三佛像间有浮雕龙柱隔开。

右边佛像为观音菩萨，左边为大势至菩萨。大小亦如弥陀造像。观音、势至均头戴花冠。观音右手捧净瓶，置于腹前，左手在左肩前扬起，掌心向外。势至左手置于腹前，执经卷，右手扬起在右肩前，掌心向外。三石佛雕工精美，为古代石雕之珍品。



E 34.1 南天寺阿弥陀佛三尊像

① 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五，杂志三，寺观。但《八闽通志》卷七十七，寺观载：“西资院，在十四都卓望山。宋季建”。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川一，岱峰山。



E 34.2 大势至菩萨像



E 34.3 观音菩萨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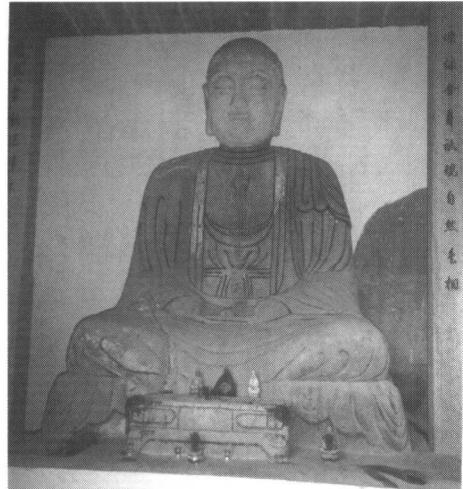
据南天寺后壁右侧摩崖的康熙三十八年《重兴南天禅寺碑》记载：“岱山石佛岩，离城五十里，泉之晋江名胜也。宋嘉定丙子，一庵净师过此，夜见峭壁灿光三道，是山萃众岳之灵，遂募镌弥陀、观音、势至三尊，建造殿宇，因就石佛为号……”。因知三石佛为嘉定九年（1216年）所镌。旁有“泉南佛国”四大字摩崖石刻，为僧守净书刻^①。

现在南天寺系木构建筑，寺内布局分山门、前殿、大殿及廊庑诸部分，占地约1000平方米，为清代建筑形式。

E 35 九日山石佛岩五代阿弥陀佛像



E 35.1



E 35.2 维修后照片

① 乾隆《泉州府志》和乾隆《晋江县志》的山川部分均误作宋“王十朋书”，实为僧守净所书、所刻。事见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五，方外，文云：“嘉定中，又尝镌石佛于安平岱峰山，刻‘泉南佛国’四大字于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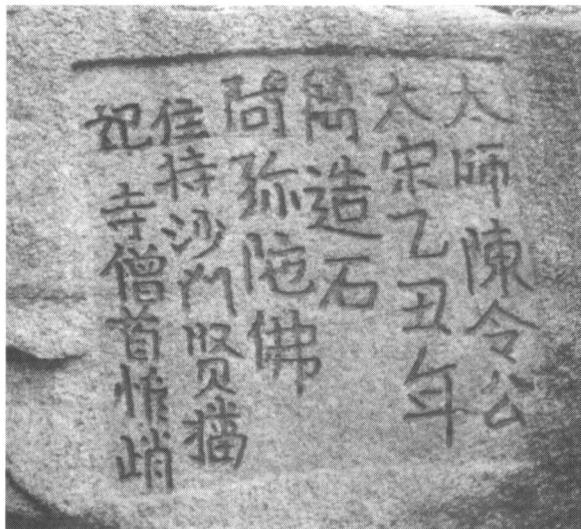
石佛岩，在南安九日山西峰顶，因天然岩石雕造阿弥陀大佛一尊，故名。佛结跏趺坐，双手相叠在腹前置于腿上，身披袈裟，胸前开敞，双领下垂，气势雄健，宛然唐风。高4.5米，肩宽1.5米。外建方形石室保护。

E 36 九日山石佛岩北宋题记

石室后边岩石上，阴刻楷书六行，纵70厘米，横74厘米，字径10~14厘米。石刻风化较严重，但字迹尚可辨读，文云：

太师陈令公
大宋乙丑年
镌造石
阿弥陀佛
住持沙门贤播
记寺僧首惟峭

考“大宋乙丑年”，为宋太祖赵匡胤乾德三年（公元965年）。查《宋史》乾德二年，授洪进为检校太傅，后加太师。因知此石佛为五代陈洪进据泉、漳二州时（公元946年后）所倡镌。石佛面部，因屋顶长期坍塌，风化严重。眼、鼻、双耳等都剥落无存，惟佛身上所披袈裟衣褶及手印尚很分明。它是闽南最早的石刻造像之一。



E 36 九日山石佛岩北宋题记

《闽书》载：石佛岩陈洪进因山石镌佛焉，故名。传朱文公有题石佛岩诗：

卧草埋云不记秋，
忽然成殿坐岩幽。
纷纷香火来求福，

不悟前生是石头。^①

《泉州府志》、《闽书》均说此诗是南宋朱熹所作，可是宋《王文忠公文集》曾载此诗，而《朱子全集》中则未之见。其为宋泉州太守王十朋所作甚明。

E 37 九日山僧墓

在九日山西峰。系一座式样古朴的方形基座的墓塔，上为圆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印度窣堵波的原始形式。通高 2.40 米，基座每边长 1.50 米。塔身正面砌一个龛。它可能是唐、宋时代，延福寺僧人圆寂后葬骨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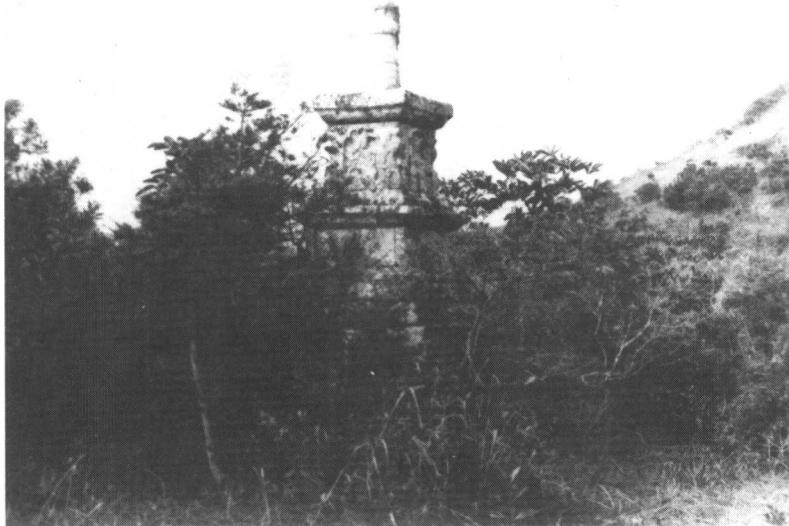
延福寺，原在丰州镇西门外，距九日山二里许，西晋太康年间建，始称建造寺。拘那罗陀曾到寺译经。唐大历三年（公元 768 年），寺移建九



E 37

日山下，遂改名延福寺。“宋乾德间（公元 963～968 年）陈洪进增建……支院故有五十余区。元丰间（公元 1078～1085 年），合为大禅寺。”^②

E 38 九日山宋代方形石塔



E 38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二，九日山。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延福寺。

在九日山西峰。通高3.80米。顶层四面各刻尖拱形佛龛，龛内浮刻佛教故事。从石雕手法和风格看，是宋代的遗物。现此石塔已毁。

附录：宋曾会《修延福寺碑铭》

夫山川之秀者，闽中为胜绝。闽中之胜者，清源为灵异。故其著，地形辨土，脉阴协于鬼谋。凭高峰俯空谷，幽居于佛刹者，其惟建造乎。东去郡城十五里，南去大海三十里；左则南安属邑，市人之所游集；前则晋江通津，海潮之所吐纳。独其西北冈阜连络，若虎而蹲，若龙而奔，黛滴兰喷，藏烟泄云，自远而来，豁然屏开。双峰对峙，中坦数里，疑其融结之初已张本乎。造寺也，始晋太康九年，在县西南。至唐大历三年，移建于斯，会昌废之，大中复之。五年，赐其额。有沙门宣义者，谕众以谕财。邑父老洪玉、丁潜同谋，而市基庵岩院落，总五十有四。得锡额者，凡二十有一。故其托平地，瞰悬崖，架石梯，跨涧水。高与下相叠，背与面相倚。草树阴森，藤萝交盘，檐窗隐映。以回合钟磬，春容以遐举。楼台轮奂乎半空，门径委曲于绝顶。每海日明天，籁生虹霓挂峰。苔藓萦壁，逍遙澹泞，若在鹫岭沃洲之上。虽劳尘俗，虑至而颖脱，曾不知心因境静境逐，心闲优之游之，真趣自得允。所谓东南之美，为幽人之窟宅，造化之功，开后世之基址。故唐之周朴、张为，聆风嘉尚，寄诗美之。其大殿者，唐咸通中，将取山材，先斋祷，次忽遇人指其处，果楩、楠、杞、梓者。是夕，又梦许与护送。既而，一日江水暴涨，其筏自至，了无遗失。大壮既隆，目为神运。自开宝中，连帅中令陈侯，割俸增饰，兼重建三门焉。其东南隅，别立奉先，报劬劳于考妣也。寺之讲堂者，先是，连帅鄂国留公造。经藏于招庆禅刹。功既成而财有余，陈侯继旧治，补遗事。乾德中兴建立，至端拱中，寺用常住作亭于前。因以集讲学，而示宏敞也。殿之前，众作石幢、石塔以引翼之。殿东南，钟楼者，周广顺中，募众财而造之，荐冥祐于舍识也。殿之西北，星宿堂者，济南郡夫人建之，资景福于陈侯也。寺之东，东浴室者，劝郡缘而构之，用以涤外尘而植净因也。讲堂东，影堂者，通判团练使陈侯奉孝终于此也。西堂五百罗汉者，邑尹翁、留二君，劝吏民以植福也。东峰亭基，唐相姜公辅左迁是邦，寻幽致而营栋宇也。西峰亭石佛者，独标奇形控压列岫。唐徵君秦系，昔为隐君，勒篆曰：“高士峰”。乾德中，连帅陈侯，镌而为像，择僧尸之峰之下，构以亭，因石为炉、碾、盆、砚，皆系之遗物也。亭之右，古松二株，偃蹇盘屈，异于常者。昔寺未迁，有老僧独坐，志之谓晋时所有。今或天地阴晦，有龙盘攫其上也。北峰之南，白云井者，泉味甘凉，爽人肌骨，唐进士傅笋，寄褐在兹。旭旦汲之，见云履波涌，中有龙跃者也。井之左檀越林者，青葱聚秀。昔殿甫成，夜有神人拥徒历观，俄隐。是所，今阴雨中有灯自明也。林之下菩萨坑者，出水盘石莫测，其源奔湍漱响，有圣僧时见也。坑之右石龛者，危岩虚室，人迹罕到，无等禅师，昔常宴居。唐大中中，郡守问道，留偈旌德，今犹存也。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梁普通中（公元520~527年），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凡得法要分为人师者，由大悲至岩头，由观音至朱溪，由天主至隆寿，由西庵至昭庆，皆是寺所自出者。乃作铭曰：

天地成气，融结著形。山泽之秀，东南炳灵。通海流润，排空耸青。中有佛宇，昭然福庭。唯禅之门，亦觉之路。本乎虚空，孰为坚固。运以慈心，拔其苦趣。瞻此仪形，与之齐度。巍峨月殿，重叠云楼。石径几泐，烟岩半浮。松寒不夏，桂暖长秋。仿佛鹫岭，依稀沃洲。缅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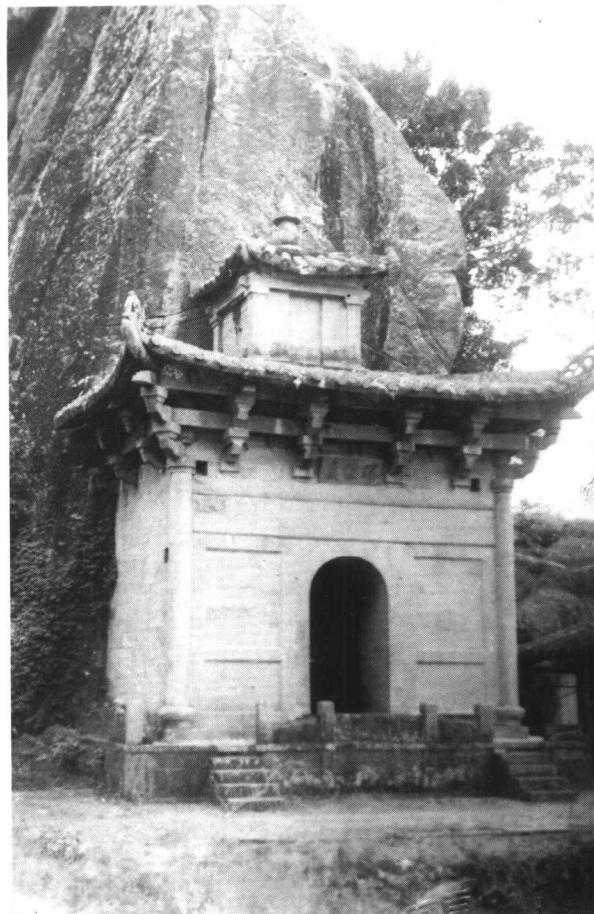
泉州宗教石刻

圣贤，杳然长逝。盼蠻鬼神，聿来加卫。古物斯存，灵踪益炽。发挥宝乘，振灼遐裔。真人出兮，书轨大同。诸佛来兮，教法载隆。梵刹维新兮，郡邑其东。勒铭丰碑兮，昭融帝功。

（录自《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延福寺条，清乾隆二十八年版）

E 39 清源山瑞像岩石室

图为泉州北门外清源山瑞像岩的石室。石室内造佛像。



E 39.1 外景

释迦瑞像，系就天然岩石依崖雕凿而成，作立姿。高4米，宽1.5米。神态庄严肃穆，慈祥大方。左手下垂，掌心朝外，作与愿印；右手举至肩前作施无畏印。头顶肉髻、螺发，周身刷金。像成，建石室护之，“以蔽风雨”。

瑞像岩石室内摩崖上石刻题记称：“大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岁次丁卯，众造释迦瑞像，于其季十一月廿七日讫工。”

石室左侧壁上有石刻阴文《重兴瑞像岩记》，记载宋、明两代修建石室的经过，由明朝明威将军泉州卫指挥金事李潮书丹。录文于下：



E 39.2 瑞像岩石雕释迦立像



E 39.3 重兴瑞像岩记

重兴瑞像岩记

瑞像岩者，泉北山之名刹也。岩称瑞像何哉？按郡乘宋元祐间，林道者夜梦人令镌释迦氏于天柱峰之上，且示镌者姓名。及旦，镌者魏周至，果与梦符。像成，构堂以蔽风雨，额匾瑞像岩，得美名始于是矣。由宋迄今几经兴废，至是又坏。大明成化癸卯，前都纲惠禧法云首座，默传二师，相与谋新之，议以克合。于是入山市村，渡海伐石，筑窑冶以范砖瓦，百尔阮备，乃涓是岁六月二十七日兴工，明年八月初一日落成。堂宇轩墀，庖厨寝舍，皆焕然一新，规模壮观，视昔有加。二师兴复之功可谓至矣。因是遣其徒戒振居焉，朝夕焚修，祝天朝庙美于无疆。是举也，知所以尊君而亲上矣，可无纪耶？默传师介子弟太学生庄槩及儒士江源清来求记。予直书其兴废之颠末。如右云。

赐归遗老广东德庆州判官白里庄楷撰

明威将军泉州卫指挥金事李瀚书

弘治二年，岁直己酉九月载生明，住山比丘宗元勒石。

E 40 清源山赐恩岩宋代石雕观音像

赐恩岩在北门外后茂乡，寺傍山而筑。依山石刻观音坐像一尊，高4米，肩宽1.92米，头戴宝冠，冠上有化佛，六道垂发分披两肩上，双手切合，掌心向上，慈眼低垂，周身刷金。宋元祐间(公元1086~1094年)刻。《泉州府志》载：“《闽书》：唐赐许刺史稷之山也。传宋李文肃隐此，朝恩四及，故名。《淳祐志》：元祐间，民夜见光相，镌白衣观音像于岩端。”^①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川一，赐恩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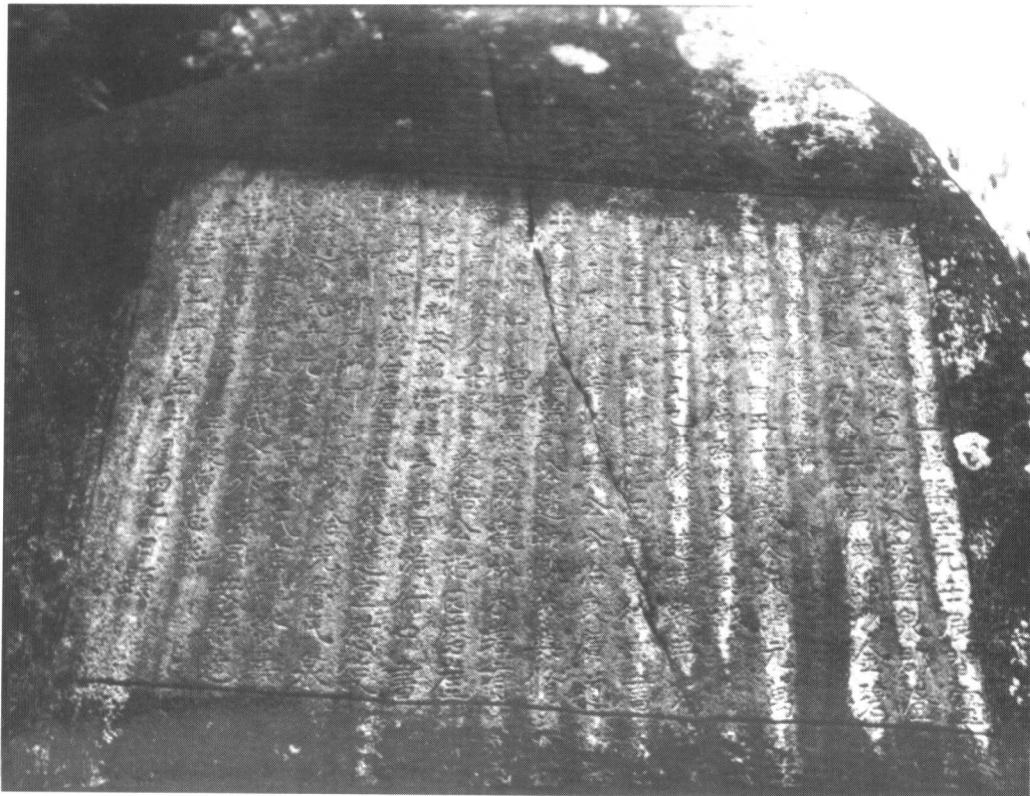
E 40 清源山赐恩岩宋石雕观音像

E 41 清源山碧霄岩三世佛像



E 41. 1

三佛像均趺坐于莲座之上，周身刷金，头有肉髻、螺发，面庞圆润丰满，慈祥大方，头后有项光、背光。佛龛宽6米、高3米，佛像通高2.5米许，雕凿于摩崖之上。居中为现在佛，其左侧左手托钵者为过去佛，其右侧为未来佛。佛堂亦依岩而筑。许多年前，暴雨后山崩，堂屋连地皮塌毁。现在佛像露天高悬于20多米的山崖上。1988~1991年重修。



E 41.2 碧霄岩重修摩崖记

碧霄岩摩崖刻石题记(图E41.2)，高2米，宽2.5米，楷书，十九行，行十六字。文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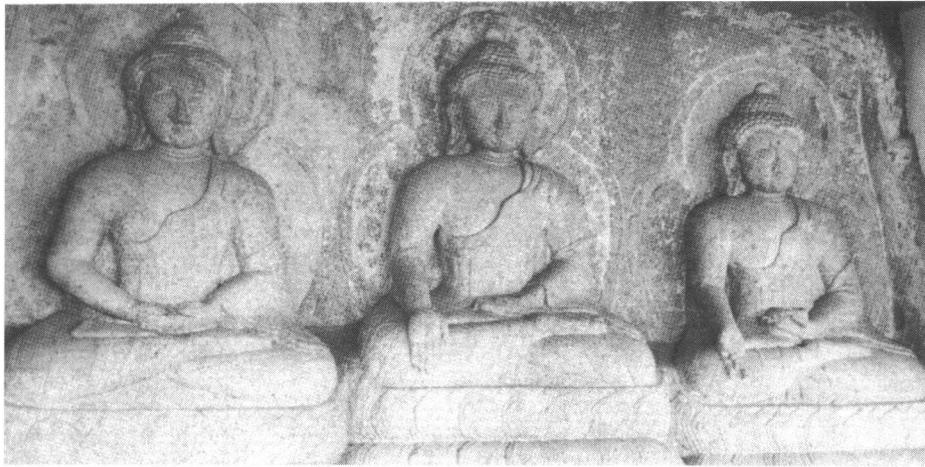
透碧霄为北山第一胜概。至元壬辰(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间，灵武唐吾氏广威将军阿沙公来监泉州。登兹岩而奇之，刻石为三世佛像。饰以金碧，构殿崇奉，以为焚修祝圣之所。仍捐俸买田五十余亩，入大开元万寿禅寺，以供佛瞻僧，为悠久。观其报国爱民之诚可见，已厥后岁远，时艰弗克葺治。至正丁未(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秋，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般若帖穆尔公分治东广，道出泉州，追忆先伯监郡公遗迹，慨然兴修，再新堂构，山川增辉，岩壑改观，林木若有德色，而况于人乎。暇日，获陪公游，因磨崖以记。

郡守新安郑潜拜手书，同游行中书省理问官忽纳台唐吾氏、广东道宣慰使司同知副都元帅阿儿温沙哈儿鲁氏、泉州路达鲁花赤元德瓮吉刺氏、官讲资寿教寺讲主智润及广威公外孙同安县达鲁花赤寿山与焉。

主岩僧志聰

时至正二十七年十月丙午日题^①

按阿沙一名，见诸《泉州府志》卷二十六，并注明为至元间任。但碧霄岩的始建和修缮，地方志皆未载。“唐吾”，即唐古特，亦即西夏。



E 41.3 碧霄岩三世佛像的原貌

图 E41.3 系剥去佛像外表灰泥后，重现的三世佛像的原貌。

摩崖记里的“唐吾氏”和“瓮吉刺氏”，皆蒙古人的部族名称，表明该官员的籍贯。《元史·百官志》载，元时泉州为上路，设达鲁花赤一员，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由蒙古人担任。崖记里的监泉郡“唐吾氏威武将军阿沙”，即为泉州路达鲁花赤。泉州碧霄岩寺庙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由蒙古人阿沙所创建，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再由蒙古人福建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般若帖穆尔重修，此事皆不载入泉州地方志书，摩崖记可为地方志书补缺。达鲁花赤阿沙一名，见诸《泉州府志》^②，然郡守郑潜，地方志书则不见其名，惟福州鼓山元人诗刻有“至正二十年……金事新安郑潜……同游鼓山”^③。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崖壁上的三世佛像不同于一般的佛像。从外表看本与一般寺庙佛像无异。不知多少年前，山体滑坡，原有庙堂连同山体塌落，今三世佛像高悬在陡峻的山崖之上。20世纪90年代初，清源风景区修缮碧霄岩，以钢筋混凝土依山搭架，重建佛堂，从佛像身上灰泥剥落处，发现灰泥塑佛像里是石刻佛像的原作。为恢复文物的原貌，剥去外表灰泥，重现三世佛像的原貌。原来三世佛像是宽肩、隆胸、束腰的趺坐佛像，一定程度上保留犍陀罗式雕刻艺术的影响。希腊系的艺术和印度佛教艺术相接触，而于公元1世纪产生了一种新型的艺术，也可以说是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因它在印度西北犍陀罗地区发祥，所以后人称它为犍陀罗式艺术。犍陀罗式艺术雕刻不但流播印度、东南亚，而且通过大月氏东渐影响中国的西藏，及通过葱岭经天山南路与北路两道入玉门关和阳关，而达于中国内地。

① 崖记录文依据实地考察抄录，并与照片校对。又见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二，但《闽中金石略》录文有四个字错漏。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六，文职官上。

③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一，鼓山元人诗刻五段。

蒙古兴盛时，西欧诸帝国沉迷于复兴基督教之梦想，屡兴十字军东征，希望消灭西亚、东欧之回教。其时，伊儿汗国攻灭中亚回教国，所以罗马教皇屡遣教士东行，希望联合蒙古两面夹攻消灭回教国。蒙古人采取远交近攻，因此，有马可·波罗偕其叔父来华，并奉大汗忽必烈之命，与罗马教皇通使之事。时蒙古戡定青海、川藏、吐蕃，僧侣声势大振，西藏的佛教——喇嘛教为大汗忽必烈所接受，因而转移其眷顾基督教之目光，而别注目于喇嘛教，于是蒙古族遂一变为黄衣佛号之民族。

喇嘛教是公元8世纪印度那烂陀寺大德莲花生，将印度秘密教（密宗）教旨与西藏的巴思教教旨互相融混，而产生的一种适合西藏社会的新教。“喇嘛”，藏语意谓“无上”，即汉语的“上人”。西藏喇嘛僧侣谙练巫术，与蒙古的神巫祭风雪迷信相近。蒙古人信仰神佛茹荤，其僧侣又食肉，他们“食时，取肥肉涂神及神妻神子之口”^①。“病时，巫者杀猪狗以禳”，平时“每晨杀猪以祭”^②。他们日常生活多以“肉乳为食”，“氈帐为居”，“皮毛为衣”^③。他们的日常生活近于西藏人的生活方式，所以喇嘛教容易被接受。在关外时如此，入关后还如此，上自帝王，下至吏民，多愿倾囊建庙，以资焚修。

泉州清源山碧霄岩的三世佛像是蒙古人泉州达鲁花赤阿沙所创建，其雕刻艺术与喇嘛教和犍陀罗式艺术有关。元统一中国过程中，把喇嘛教带入华北（以北京为中心）、内蒙和西北地区。然而，江南地区少有发现喇嘛教的遗址。泉州碧霄岩三世佛像的发现，因此文物价值就更高了。

E 42 清源山弥陀岩石室和石雕阿弥陀佛立像



E 42.1 清源山弥陀岩石室

①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69章，鞑靼人之神道，1936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② 《大金国志》卷三十九。

③ 又见《马可波罗行记》上册，第69章，鞑靼人之神道。

寺宇全部石构，面阔、进深都是一间，约10米见方。檐下柱顶与横梁间用斗拱。正面当中开一拱门，上勒“洞天别现”。石室外有庭，庭上建实心塔两座。石室右岩上嵌刻一碑，记元代石佛、石室之雕刻与建筑。室内依山石刻阿弥陀佛立像一尊，通高5米，宽2米。周身刷金，头结肉髻，面庞丰润，右手下垂，左手平放胸前，手心向上。身披袈裟，赤足踏莲，造型慈祥肃穆，端庄大方，雕工精细。



E 42.2 石雕阿弥陀佛立像



E 42.3 妆修后的阿弥陀佛立像

附录一：元朝《修弥陀岩崖记》

摩崖高3米、宽1米，楷书，八行。在泉州北门清源山弥陀岩一啸台旁。文云：

弥陀岩年深屋弊。金陵僧觉成云游来泉，会平章三旦八、御史帖木尔不花、宪使孙三宝、金事释迦奴，捐财首倡，化合众缘，易殿以石。建台塔，改堂宇，再精琢佛像涂金，始末四春。郡士孙世宽，舍田充焚修香灯费，以此功德，回施众生，共证菩提者

任役智通 寿坚 兴安 惠崧 善衍 善清 善泰 善真 善良 妙实 法善
法义 义祥 惠性 法立 志遂 正弼 志光 师安 本康 法日 了一 智信
宗受

赞成吴觉曰、张君义、周天柱、徐留住、吴君举、郑觉、照志、坚师、印德省、法念、宗贵、自本。

大元至正二十四年甲辰中和日告功立石。

附录二：元朝《重建清源纯阳洞记》

摩崖高2.08米、宽1.03米。上刻汉字二十四行，字径3厘米。在泉州北门清源山上纯阳洞寺东面20米处。寺内另有一较小的石碑，所记一致，可能是前一摩崖石刻的重刻，碑上

凡“蒲”字，皆被琢去。清末陈棨仁《闽中金略》有录文。以后寺废，1936年此二碑刻重被发现。碑文照录如下：

重建清源纯阳洞记

天下山川岩洞幽胜之处，必仙佛所庐，佛或因仙而居，仙或因佛而显，乃相与成物外之风致也。泉之清源上洞，宋绍兴间有道人裴其姓者，来自江东，日戴通草花行歌於市曰：“好酒吃三盏，好花插一枝。思量今古事，安乐是便宜”。或邀之饮，率三酌而止。俗颇异之，忽连月冥测攸往。既而，樵者于洞石室中，见锁骨拱手端坐，草花委其前方，知尸解于此。邦人即其骨肖像事之，并创屋以祀群仙，扁曰“纯阳”。始游玩者弗悟道人寄意于花酒之外，以为实嗜于尔也，岁时竞携酒肴以渎之，箫筑以噪之。识者咸谓山川时运之未享，俾灵逼奥域鞠为花馆酒台，岂称道人清净无为之旨哉！爰议室之左，构殿以奉普陀大士，设蓍龟筴以遗土庶之乞灵。肇酒之风遂弭，福利之誉日彰，亦犹闽之升山兰若，乃任真君上升之地，其境物胜概，为一方所推美。鼓钟香火愈久愈炽，前谓因依者其此类矣。暨宋季，兹山悉毁，猱狖宅焉。我朝至元十有八载，四松僧法县抚迹吁悼而谋兴复。适心泉蒲公同其弟海云平章协力捐财以资之，规制比于曩时，无虑十百后。廿一年县召高弟一聰踵其席，遂考故业，屋创未几，嵒木顿朽。聰奋肯构之志勤勤弗怠。越数祀而殿宇辄一新，度四大部则有阁，容□息则有堂，应真阁、观空楼继而成之。考石记叁拾处，莳杉松数万本，缭石墉贰千余丈以防野烧。开新田貳拾余段以为蒸尝。凡石记、内佣、垦田，地与诸家寺观无间。时或天空云淡，徙倚层栏，吟啸舒怀，一观千里，群峰□遥，若旌纛幢节霞佩翱翔，若磬折匍伏翕走海水弥漫，如帝青宝，如吠琉璃。舟子凫鷀出没空阔，近远崇庳，千态万状。王摩诘郭熙辈，神疲腕脱，摹写莫懈，视山之精庐，栉比爽垲壮丽而莫之与京，噫！聰之作较师之功，岂谓有加欤！亦气运之当亨，仙依佛而益显。适丁其时也，复得信斋万户孙公，心泉之孙一卿蒲公相兴辑事，故能若是。聰生晋邑瑶林，授经四松，号石门。住山余三十年足不越限，行苦业，白时人以有道目之。岁庚午，诫其徒契因主洞事。癸酉夏，五奄化全躯空于山之胁。越甲戌，因以佛仙二殿犹欠翻盖，乃撤修之，门楼弊漏，因重新之。聰师化孙府，所有晋江三十都东山渡旧埭修筑，受种子貳拾石，构庄屋以备来，费统钞二百二十锭，复捐衣资及化十方，赎置三十九、四十一、二都田地肆百伍拾余亩有奇。因原所自当归功与师，恐没其名，请予状其颠末。予日前县师之功，有乡先生傅公记之，今予师之功，不求之当世名笔，予安能发挥以信与人？力辞而力请不已，乃语之曰：兹山岩壑幽胜，户知为泉城冠，予不赘陈也。若夫寄傲尘表，谢绝王侯，鸟兽同群，耕种自乐，此肥遁之士也。吾徒固以是为极，则耶开田，则阐先百丈之大义，种松则泽，古石门之微言，悟清净无为之理，了仙佛异派同源。倘于是得尔师之心，则一竹一木一水一石皆不刊之铭刻，讵必肤浅之词，以托永久之传哉。

大元至元四年龙集戊寅孟冬日万安禅寺用平智泰撰。

壮敏侯孙彦方、孙长安书篆。

考证《重建清源纯阳洞记》碑文，可以纠正许多志书记载的错误。碑文记载元代三次修造清源纯阳洞的时间和捐资者的姓名，现按时间顺序排列于下：

泉州宗教石刻

第一次修造佛寺，是至元十八年（公元 1281 年），蒲寿嵒、蒲寿庚协力捐财。

第二次修造佛寺，是元庚午四月（即天历三年，公元 1330 年），万户孙天有^①，蒲寿嵒之孙蒲一卿相兴辑事。

第三次修造佛寺，是元甲戌（即元统二年，公元 1334 年），向孙府化缘。

最后，立碑时间是后至元四年（公元 1338 年）。

查蒲寿庚降元，是在宋景炎元年十二月初八日（公元 1277 年 1 月 23 日），南宋灭亡是祥兴二年（公元 1279 年），而蒲氏兄弟列名修造佛寺，是在至元十八年，距降元四年，距宋亡二年。由此可知，蒲寿庚降元后，蒲寿嵒并非《闽书》所载“事成，乃佯着野人服，入法石山，若无与其事者”^②，亦非《八闽通志》所载“寿庚武人寡谋，其计皆出于兄寿晟（嵒）所筹划，部署决策既定，佯著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之意”^③，更非日人桑原氏所云“蒲寿嵒（嵒）于其晚年时，因慑于舆论攻击，曾隐居泉州府东南之法石山，寄迹于风月之间”^④。从碑文记载，可以看出蒲寿嵒不是“自称处士，示不臣二姓”，亦不是“畏时议”的人，而蒲寿庚亦不尽是“武人寡谋”。这样，我们对《闽中摭闻》、《清源文献续编》所言，蒲寿庚降元后，蒲寿嵒“亦居甲第”和《泉州忠所蒲姓族谱》：“迨元至元二十三年丙戌三月间，世祖遣御史程文海诏求江南人才，公（寿嵒）赴试，中第一甲第一名”的记载，也就不能完全视为野草之言，不屑一顾了。

纯阳洞第二次修造，是在天历三年，由万户孙天有和蒲寿嵒之孙蒲一卿出资。可见在元代蒲、孙二家关系密切。证以《泉南杂志》“我太祖皇帝禁泉州蒲寿庚、孙胜夫之子孙不得齿于仕，盖治其先世导元倾宋之罪，故终夷之也”，一前因，一后果，正相吻合。蒲一卿名不见郡县志。《晋江县志·卷十二·文苑》有“蒲仲昭，祖心泉”的记载。这说明，元代蒲寿嵒有两个孙子在泉州，或蒲一卿即蒲仲昭。但《泉州忠所蒲姓族谱》世系表中，有寿嵒之子师孔，子二，一日崇训字立卿，一日崇诰字立命卿，可能石碑上一卿名称，就是师孔的长子。

或许有人要问，在《后村先生大全集》和《心泉学诗稿》，有宋尚书刘克庄与蒲寿嵒互相赠和的诗。刘颂扬寿嵒有“心泉”性格，似能以泉洗心，以心体泉。又《心泉学诗稿》和《钓矶诗集》有蒲寿嵒与拒不仕元的邱葵之间的赠和诗和邱悼蒲的诗，似乎寿嵒完全是一个只寄情风月，不问世事的陶癖隐士。对此问题，石碑载文为我们提供最好的回答，即蒲氏兄弟二人的修造佛寺之事和寿嵒的寄情风月的处士风度，证明他们都能以风雅饰吏治。这与日人藤田氏的考证“寿庚稍有风雅气”^⑤，也是吻合的。关于蒲氏兄弟和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据现有史书的记载，皆明朝人所作，惟有此石刻是元朝人所作。特别要指出的，是此石碑上的纪年准确。它为我们研究元代泉州海外交通历史和多元宗教文化提供了极好的资料。

① 《泉州府志》卷二十八，武职官载：“万户孙天有，大德间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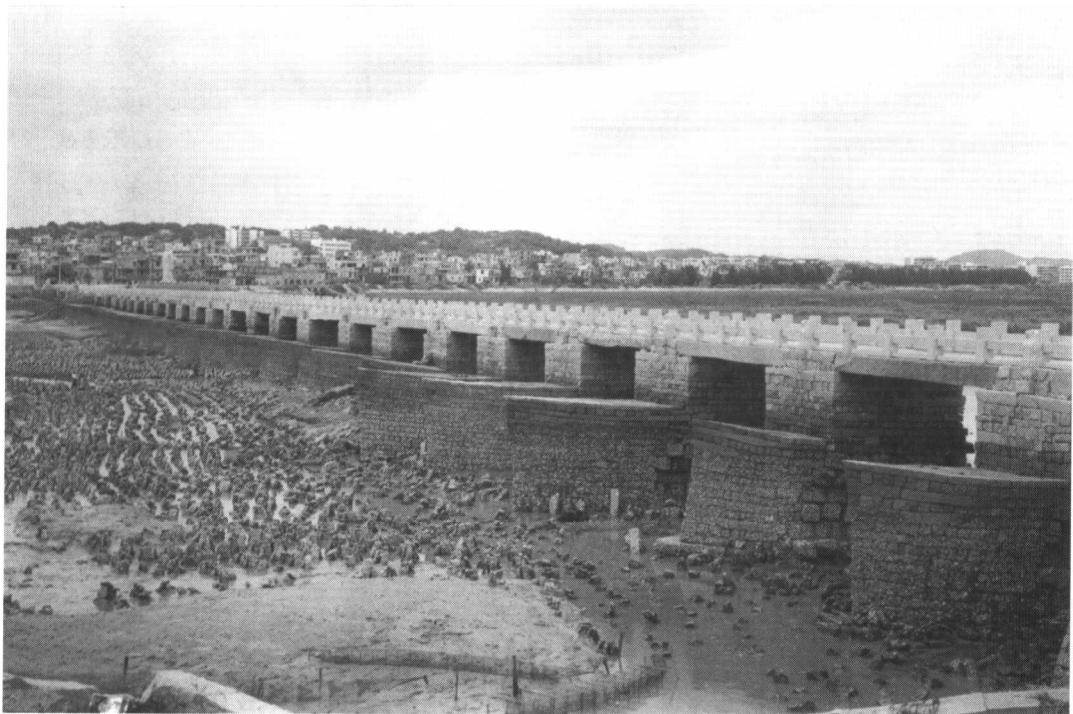
② 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蓄德志》。

③ 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八十六，拾遗，泉州府，宋。

④ 冯攸译，桑原骘藏《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本文五。

⑤ 《蒲寿庚考》日人桑原氏著，陈裕青译，第 210 页，注九，“定武兰亭”。

E 43 万安桥佛教石雕



E 43.1 万安桥现状



E 43.2 万安桥扶栏石狮



E 43. 3 万安桥上宋代金涂式石塔毁坏后的残存构件,上刻佛教故事和佛像

万安桥,因跨洛阳江,一名洛阳桥。宋庆历初,郡人李宠始甃石作浮桥。“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守蔡襄建”^①。现存桥长834米、宽约6米,尚存桥墩三十一座。石梁每条长约11米、宽约1米、厚约0.8米。据《泉州府志》载,“桥中有台,又有济兴亭,宋宗室赵不贻书额。又有‘泉南佛国’亭”^②。又载知州蔡襄造桥功迄,“三岁度一僧掌桥事”^③。又记因“盖闽水怒而善崩……多设神像香火甚严”^④。而知州蔡襄写的《万安渡石桥记》也记参加造桥“职其事者……浮图义波、宗善”等。因此,万安桥上建有许多佛教观音亭、金涂式石塔和小石塔以镇邪压桥。此外,桥上两旁栏杆皆浮刻石狮,狮头朝外以辟邪(如图E43. 2)。此外,古人为了对付大自然的飓风和海浪,除请求佛祖保佑之外,又在桥头建水神庙——真武庙、义波庙和通远王神庙等祀之。

图E43. 3系万安桥佛教建筑残留构件,是在修桥时从水底出土的,有的构件上面还生长着牡蛎壳。如今,这些宋代佛教石雕构件,存放于桥南蔡襄纪念馆。

①、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桥渡,万安桥。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桥渡,引《泊宅篇》。

④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桥渡,引《闽部疏》。

E 44 石笋桥宋代石塔

石笋桥，在泉州城临漳门外，俗呼浮桥。据《泉州府志》载，“宋皇祐初，郡守陆广造舟为梁，名曰履坦，一名浮桥……绍兴二十年，僧文会始作石桥，长八十余丈，翼以扶栏”。^①又据明朝《朱鑑重修石笋桥纪略》载，“绍兴二十年，僧文会作石桥一十六间，长七十丈五尺，广一丈七尺。翼以扶栏，镇以浮屠，如桥之长夹之”。^②

以下照片均摄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



E 44.1 临漳门外的石笋桥全貌

图 E44. 2、E44. 3 系桥上的金涂式石塔。

图 E44. 4 中的石塔底座方形，而上部为圆形。

图 E44. 5 中同样是底座方形、塔身圆形的小石塔。以上所有石塔，均建于桥墩之上。

在图 E44. 6 中，这些石构件上多有精美的佛教雕刻，保存在泉州开元寺内。图 E44. 7 中为守护桥头的石雕护法神像，如同现实中的将军形象。现在这些石雕构件已移泉州市博物馆保存和展出。

^{①、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桥渡，石笋桥。



E 44.2 石笋桥上的金涂式石塔和方形小石塔



E 44.3 石笋桥上的金涂式石塔



E 44.4 石笋桥上的石塔



E 44.5 石笋桥上的石塔



E 44.6 石笋桥金涂式石塔构件



E 44.7 石笋桥桥头石雕护法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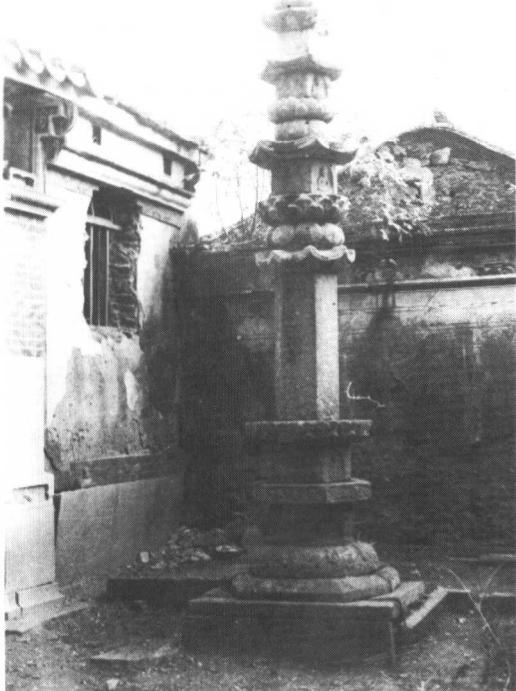


E 45

E 45 宋代顺济桥石雕守护神

顺济桥，在泉州德济门外，“宋嘉定四年，郡守邹应龙造石桥，长一百五十余丈，翼以扶栏，以近顺济宫，因名顺济，俗呼新桥”^①。明朝时，何乔远修桥记云：“桥之前累石为堡，以临重渊，维上有台，浮屠截然，石人有二介。”^②图中为守护桥北之石将军造像。顺济宫，即海神天妃宫。

E 46 开元寺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E 46



E 47.1 重修后立于承天寺的石经幢

经幢通高3.6米。作八角形，幢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但多剥蚀，系宋天圣九年（公元1031年）所建。清陈棨仁《闽中金石略》有录文云：

天圣九年岁次（下阙）智贤北清凉院僧智贤奉为四恩三有（下阙）律临坛，智辨沙门（下阙）管内僧判充左街（下阙）管内副僧正讲上生经，赐紫沙门宗□管内僧正（下阙）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桥渡，顺济桥。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桥渡，顺济桥。



E 47.2 原在通天巷的宋代石经幢
幢，移至承天寺保存。上世纪 90 年代，承天寺重修后，该经幢竖于承天寺北面。

临坛。^①

可知陀罗尼经幢为北宋天圣九年，开元寺清凉院僧智贤募缘所创。

E 47 通天巷宋代石经幢

泉州北门通天巷石经幢，平面作八角形，通高近 7 米。幢石每面宽 20 厘米、高 1.48 厘米，上刻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文，但文字均已剥蚀。经幢造型完美，雕刻精致。自上至下的三层挑檐下和翘角上，均雕刻飞天，具有宋代的风格，与南安丰州桃源宫宋天圣三年石经幢类同，但造型略小而已。“文化大革命”期间，为防止破坏，泉州市原市长王今生先生佣工卸下该经

E 48 丰州镇北宋石经幢

据《福建通志》载，经幢建于北宋天圣三年（公元 1025 年）。通高约 7 米。共分七层。基座为八角形须弥座，八面各雕力士。束腰雕飘带飞天，精美生动，但多风化磨泐。须弥座上施八角形水波纹平座，平座之上置覆盆，覆盆上第一层浮雕双龙戏珠。第二层浮雕各种姿态的伎乐天。第三层浮雕佛像。第四层刻尊胜陀罗尼经文，上横刻“奉为今上皇帝造佛顶幢一座资崇圣寿”十六大字，其他文字多已剥蚀，内容摘录如下：

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启请

稽首千叶莲华座摩尼殿上尊胜王……今有泉州南安县，清信女弟子，葛门陈二十二娘……圣像，下冽寒泉（下阙十字）之福，十二娘……夫葛二十七郎，洎 考妣二亲追荐夜台……同保平安，特抽囊贿虔于当境神仙坊……井一口，上刻 佛顶尊胜陀罗尼……见闻回向，由是中严 圣像，下冽寒泉……之福。

时天圣号之三裸孟秋二十（下阙）^②

由是证实此幢为宋天圣三年所建。第四层至第六



E 48

① 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卷三，宋一，开元寺陀罗尼经幢。

② 陈荣仁《闽中金石略》卷三，宋一，桃源宫尊胜陀罗尼经幢。

层施用挑檐翘角，并间用仰莲石雕一朵。幢身每面浮雕佛像，挑檐下每面浮雕轻盈的飞天。第七层幢身与檐均作方形，每面雕佛像，出檐雕飞天。幢顶作葫芦状。

丰州镇陀罗尼经幢，造型优美，为泉州现存宋代石经幢的典型。经幢和井现在完好保存在南安市丰州镇北门外桃源宫。

E 49 云托日石刻

石刻高 55 厘米。石底下有石榫，但已折断其半。辉绿岩石刻成。石雕上部是一个圆鼓形如太阳状，其下有数缕云气烘托，正反面雕刻相同。此石雕原是竖立在一只石象背上的。该石象现为泉州东门外吕姓所有。象背上有一个卯孔，其大小与此石雕底下的榫适相配合，惜石象鼻及耳多已残缺。1935 年，在泉州东门城仁风门城楼拆卸时所获。



E 49

这种云朵承托太阳石刻，还见之于泉州开元寺镇国塔须弥座束腰石刻佛传图“兜率来仪”。瑞士考古学家戴密微(P. Demiéville)对这幅石雕故事内容考证时，涉及云朵承托太阳石雕之事。他说：

皇后 *Māyā* 做梦，菩萨从天上降下来，是一个长鼻象，有六个象牙。从她的右边身体进入到她的子宫里去。在雕刻上，*Māyā* 左边靠着桌子休息，右边是空的。依照传统说法，这也是对的。照法国和中国的记载，都是这样说的。象是腾云的，背上托住一个盘子，盘子也有云彩托住。按《太子瑞应本起经》所说，象的头上顶着“冠日之精”。在《佛本行经》里记载，菩萨坐在象背上，被比喻为“日精之明珠”，或叫做“日光明入腹”。^①

这一研究涉及佛传故事中的著名的情节，即摩耶夫人夜梦菩萨乘六牙白象入胎而受孕。

① 见 The Twin Pagodas of Zayton (刺桐双塔)，G. Ecke (艾克) and P. Demiéville (戴密微)，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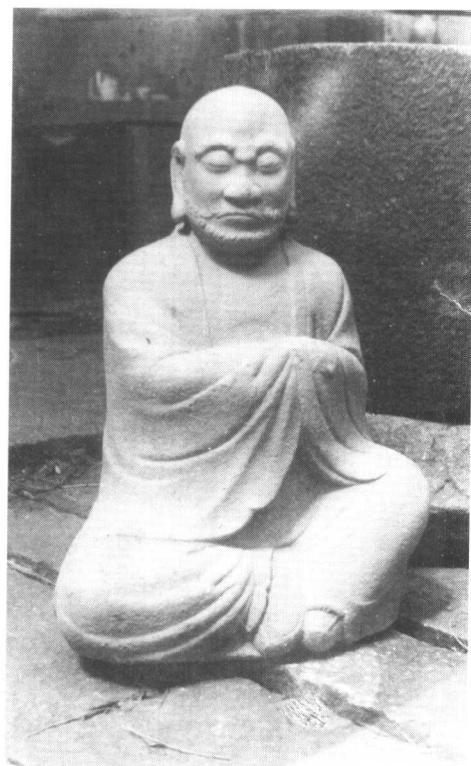
这一故事为我们理解这白象背上的“日之精”，提供了启示。

E 50 榕桥乡宋代释迦立像

位于泉州南安榕桥乡，石像依山岩雕成，在山岩上雕一个龛，龛中雕释迦立像。像高近6米，右手下垂，左手平放胸前，赤脚踏于仰覆莲台上，是泉州地区大型的石佛雕像之一。照片上，在佛像一侧站立的是笔者吴幼雄。



E 50



E 51

E 51 宋代石雕达磨像

雕像高58.3厘米、肩宽22.3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光头，高鼻，满口须髯，闭目静思，双手合抱胸前，拢于宽袖中，大衣裹体，僧鞋外露，衣褶刻划简朴流畅。这是泉州地区所发现形体最大的达磨造像。1937年，在泉州城东北角崇福寺附近民居出土。

达磨，南天竺国之刹帝利种也，父王曰香至，达磨为第三子。梁普通元年（公元520年），达磨泛海至广州，梁武帝迎之到建业。后渡江之魏，止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号壁观婆罗门。大通二年（公元528年）圆寂，葬熊耳山。今嵩山有达磨洞，相传达磨面壁处。

E 52 宋代石雕罗汉像

佛弟子，像高 69.2 厘米、肩宽 27.8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这尊雕像，似乎是一个虔诚的修行者。身穿宽袖僧衣，足履僧鞋，坐在一块岩石之上。胸前肋骨条条凸出，大概由于长期修行的缘故吧。右手执经卷，左手举起，摸在刻有卷发的头顶上。面部表现出若有所悟的喜悦心情，形象传神。雕刻的题材似与佛涅槃有关，因此怀疑它来自宋代天竺僧在泉州城南所建的宝林院。1936 年，在泉州南门城附近居民家中发现。据云，是十多年前从附近地下掘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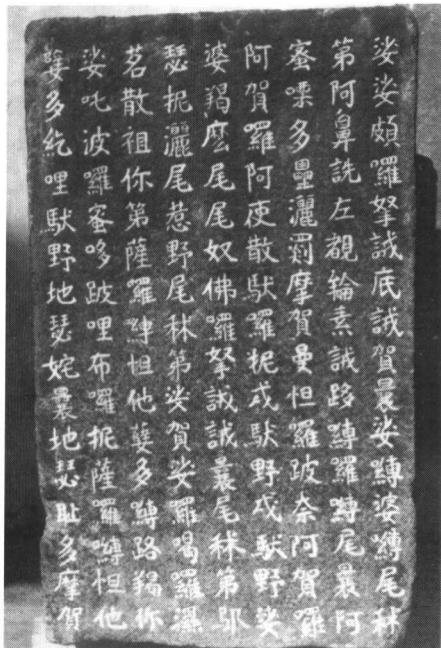


E 52

E 53 宋代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

经幢平面作正方形，辉绿岩石雕成。经幢高 55 厘米，四面各宽 32 厘米。正面浮刻释迦牟尼坐像，头后有项光，趺坐在一朵仰莲上，面庞丰润，两耳垂肩，身披袈裟，左手抚膝，右手扬起作施无畏印。佛像高 25 厘米，莲台高 15 厘米。各面均阴刻经文。除第一、四面（图 E 53.1 和图 E 53.4）外，其余两面（图 E 53.2 和图 E 53.3）各刻经文咒语九行，行十六字，楷书。首行云：“加句灵验佛顶尊胜陀罗尼。”最后一面末行刻：“嘉定八年岁次乙亥（公元 1215 年）六月十四日造。”

1944 年，在泉州小东门附近居民家掘获。由于长期深埋地下，故佛像与文字完整保存。这是泉州地区发现惟一的方形陀罗尼经幢，也是惟一用辉绿岩石雕刻的经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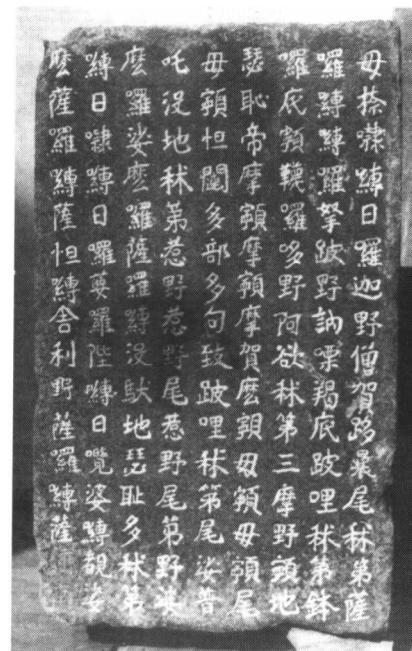
E 53. 2



E 53. 1



E 53. 4



E 53. 3

E 54 宋代力士柱础

这是一件泉州仅见的大型力士石雕。高 82 厘米, 肩宽 34 厘米, 跪膝高 29 厘米, 头顶直径 29 厘米。白花岗石雕成。力士头发直竖, 用宽带束起, 额上有深深的皱纹, 眼大而眼皮下垂, 鼻大, 嘴阔, 耳大过肩, 裸上身, 腰系战裙, 作胡跪姿态, 全身作用力状。赤脚, 右膝屈起, 右手抚于膝上; 左膝跪地, 左手撑于胯上。足踝、手腕均带环饰。毫无疑问, 这力士是佛教的雕刻, 就手法看, 是宋代的风格, 它与泉州开元寺仁寿塔基座的力士有些类似。1946 年, 于南门城附近城基掘获, 为某姓居民拾回家中当作盆花座。1949 年初收回保存。

从泉州南门城基发现这大型力士柱础, 说明宋代泉州南门城附近必有大型佛寺。《诸蕃志·天竺国》载:

雍熙间(公元 984~988 年), 有僧啰护哪航海而至, 自言天竺国人。番商以其胡僧, 竞持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 买隙地建佛刹于泉之城南, 今宝林院是也。^①
我怀疑这力士柱础与这座宝林院是有关系的。



E 54



E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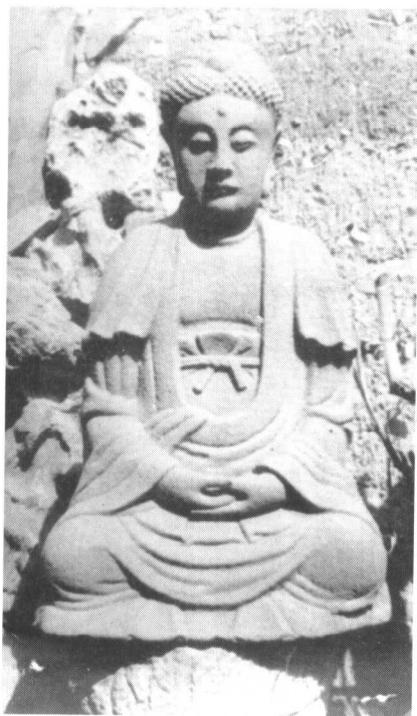
① 冯承钧撰《诸蕃志校注》卷上, 志国, 天竺国, 1956 年 10 月, 中华书局出版。

E 55 宋代石雕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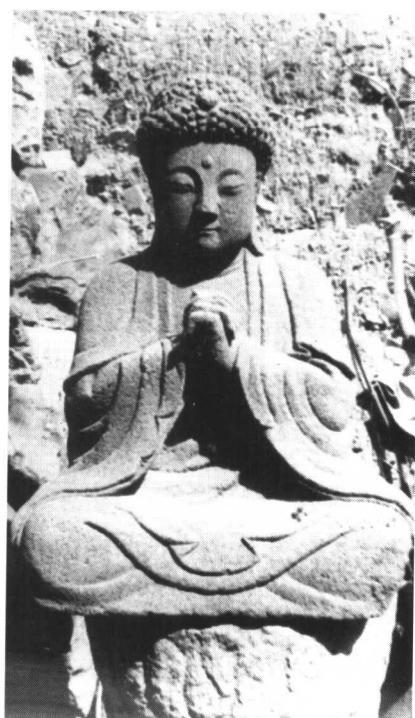
像高 58.3 厘米、肩宽 22.3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1928 年，在泉州北门连理巷一座残破的小宫里发现。原石像外塑泥灰，妆金身。小宫坍塌后，泥塑金身脱落。造像坐姿，雕刻线条简单。头上戴风帽，披覆两肩。风帽中间刻有一个圆形饰物。双手相叠，平放腹前，双腿盘起趺坐，悬裳覆盖台座上部。面部表情显得十分文静。该小宫是祀奉其他神祇的，与这尊石像毫不相干，亦毫不相称，石像应是从别处移来，泥塑刷金后加以供奉的。就雕刻手法看，较古朴，应是宋初的雕刻。

E 56 明代石雕佛像

石像高 57.8 厘米、肩宽 2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双手相叠平放在腹前，作定印，神态静穆，线条流畅。



E 56



E 57

E 57 明代石雕佛像

石像高 46 厘米、肩宽 22.2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双手抱拳于胸前，面庞圆润，趺坐。

E 58 宋代石塔、经幢构件

这是四方宋代石塔、经幢的石刻构件。自上而下，第一方为石塔挑檐翘角石刻，四角各刻羽翼天人，天人两手交叉于胸前。第二方为八面经幢石刻，高 26 厘米，每面宽 20 厘米，分别

泉州宗教石刻

刻不同舞姿的伎乐天。第三方为普通经幢的石雕仰莲。第四方为八面经幢上相间雕刻的佛像和文字，其中四面刻佛像，皆为坐佛，另四面分别镌刻“风”、“调”、“雨”、“顺”，共四个字。



E 58

E 59 宋代石经幢构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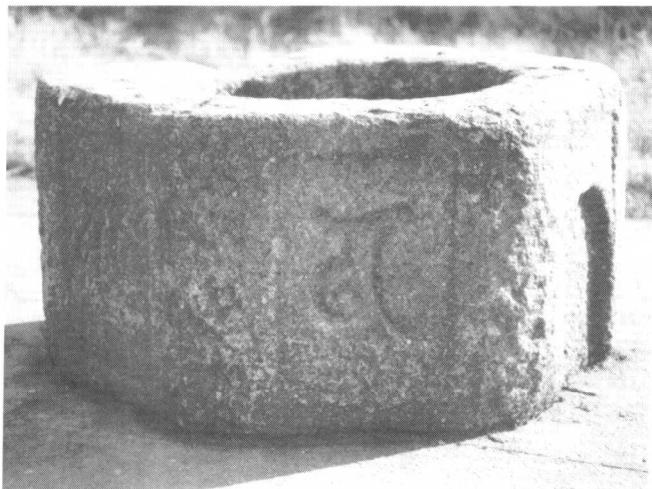
石刻八角八面，高 24 厘米，每面宽 13.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每面刻一龛，龛中各刻佛像一尊，佛趺坐于须弥座上。以比较坚硬的辉绿岩石为材料建佛教经幢，在泉州较为少见。



E 59

E 60 梵文佛塔构件

石刻八角八面，高 28 厘米，面宽 16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八个面中有两个面刻一个凹入的圆拱龛，其余六个面各刻印度梵文及一种符号。此构件系佛教小石塔的组成部分，现在已被改作井口之用。现存泉州德济门天妃宫妈祖寝殿后。



E 60

E 61 佛教石塔构件



E 61

石构件略呈球形，略作瓜瓣状。由两个半球形合成，是小石塔上层的塔身部分。石刻高56厘米、直径63厘米。在球面的中部刻一个尖拱形的龛，龛中浮刻一尊佛的胸像；另一个半球亦同。龛高38厘米、宽31厘米。每个半球刻三个瓣，全球合为六瓣。白花岗石雕成。

E 62 元亦黑迷失所立一百大寺看经碑

碑高3.5米、宽1.15米、厚0.11米。页岩琢成。碑字镌于一方明嘉靖年间重修县学碑记的碑阴，它原是一方元代的石碑，明时被改琢为重修晋江县学碑，元刻碑记，尚可认读，只是碑的四周都被琢短，缩小了许多，因而碑右的第一行字及碑底的一些字，都被琢削，陷入石趺中，无法看到。此碑是1935年在晋江县学内发现的。抗战期间，这一方由元碑改成的明碑，被琢成三段，多成碎片，不能成材，因弃置不用。后在此地倾倒垃圾，碑遂被埋没于垃圾堆下。1935年，泉州晋江县学改为医院，在建院舍时，才重被发现，但三截中已失其一了。此碑在清末陈棨仁的《闽中金石略》中已有收录，但录文有许多错漏。福建莆田县黄石镇重兴寺，原来亦有一方元代亦黑迷失所立一百大寺看经碑，碑为辉绿岩石琢成。1972年，经实地探访，重兴寺仍在，但已改为小学校址，石碑已于1958年作为修水渠材料而毁灭了。



E 62. 1



E 62.2

现根据《闽中金石略》录文，校对石碑，略有增改。碑分上、中、下三层。文云：

钦奉圣旨立碑(此六字《闽中金石略》缺)

(第一行阙)

(上阙)贤院使领会同馆事

伏以鹫岭山中，四十九年，云行雨施。龙宫藏内，五千余卷，玉转珠回。爰分深浅之机，故有偏圆之说。八部咸仰，以无缘慈摄化众生。六度齐修，以大施心利乐群品。感王臣之敬服，亘今古以流通。伏念亦黑迷失，自幼年钦奉：

世祖薛禅皇帝，宣唤历朝，委用至今。

圣恩莫报，特发诚心，谨施净财，广宣梵典，上□□□。(以上三十一字《闽中金石略》缺)

世祖薛禅皇帝

完者都皇帝

曲律皇帝圣恩，端为祝延

今上皇帝圣寿万安；

泉州宗教石刻

皇太后、皇后齐年。

太子千秋，诸王文武官僚同增祿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佛日增辉，法轮常转。敬就都城西京、汴梁、真定，河南汝州、常州，顺德府明州、补陀山朝里，宁夏路西凉府、甘州，两淮、江浙、福建诸路一百大寺，各施中统钞壹佰定。年收息钞，轮月看转三乘圣教一藏。其余寺院、庵堂、接待，或舍田、施钞，看念四大部华严、法华等经，及点照供佛长明灯。谨写西天银字经一藏进上。

当今皇帝，回赐大都普庆寺看读。仍就都城创吉祥法王寺一区，瞻寺地一顷，栗园一所，印经一藏，施钞贰佰定。又以中统钞一百定，就嘉兴路崇德州，置苗田一百二十五亩，岁收租米一百石，舍入杭州灵芝寺。续施钞二百定，与泉州承天、开元二寺。以上置田出息为岁念藏经费。又将元买兴化路仙游县，租田二千余石，散施泉州、兴化各处寺院，递年看转藏经。其斋疏以岁收子粒多寡为率。然则，财法无尽，因果俱彰，施心□于虚空，本无住相。惠性通于历劫，普导含灵。极真际以庄严，尽刹尘而回向。仍为祖祢宗亲同超佛地。次冀亦黑迷失，偕室中夫人荼荼，身宫康泰，寿命延长，福禄荣迁，子孙昌盛，万行功圆之日，百年报满之时，普与法界众生，同证萨婆苦海。

(下蒙古文二行)

延祐三年十月 日记报答

(注：以上是上层，记文三十二行，行三十七字，楷书。)

看大藏经

正月 大都路 大圣安寺 竹林寺 承华普庆寺 河南白马寺 杭州路 仙林寺 明庆寺 灵隐寺 妙净寺
二月 □□□ □□集寺 北崇国寺 汝州香山寺 朝里宁夏路汉宗仁王寺
杭州路净慈寺 径山万寿寺 上天竺寺 福州开元寺
三月 大都路 天昊天寺 太子寺 汴梁诏相国寺 宁夏路汉家寺 福州
路 东禅寺 鼓山寺 兴化路 大广化寺 大华严寺
四月 大都路 大悯忠寺 香山永安寺 真定隆兴寺 宁夏路 汉众大觉寺
兴化路 龙华寺 光孝寺 囊山寺 能仁寺
五月 大都路 大万安寺 宝塔寺 西京奉恩崇德寺 宁夏路番众承天寺
泉州路 承天寺 崇福寺 光孝寺 北藏寺
六月 大都路 大庆寿寺 承天祐国寺 宁夏路番众□□寺 补陀山寺
泉州路 大开元寺 水陆寺 法石寺 延福寺
七月 大都路 大崇国寺 大崇寿寺 双泉寺 西凉府 畏委普照寺 泉
州路 积善寺 西禅寺 香积寺 招福寺
八月 大都路 延寿寺 智全寺 圆明寺 潭柘寺 泉州开元寺 封崇寺
白沙灵应庵 兴化水陆寺 昭福寺
九月 大都护国仁王寺 大万寿寺 西仰山寺 亦怜真觉寺 甘州番众冈家寺
真定临济寺 兴化长兴寺 泉州明心寺 福州西禅寺 甘州汉众如来寺

十月 大都路 大海云寺 下生寺 甘州番众设的众寺 西凉番众河西大道院
福州路 大报恩寺 雪峰寺又一藏 杭州灵芝寺 建宁后山万寿堂

十一月 大都路 大报恩寺 千佛寺 崇福寺 延洪寺 大都姚法师寺 毛法
师寺 河西毛法师寺 双加失里院使寺

十二月 荆州、顺德府开化寺 杨州天宁寺 平江承天寺 镇江金山寺 大仰山
寺 吉祥法王寺 大弘法寺 焦山寺

看四大部经 杭州路贾寺 杭州灵芝寺 庆元阿育王寺 庆元湖心寺 福州神
光寺 泉州清源洞

看华严经 兴化祇园接待 惠济接待 竹林接待 万寿接待 报恩接待 招福
寺 静居庵

看法华经 太平庵 明庆庵 大梦岩 斗东堂 圆通庵 永庆庵

接待往来僧众 永庆庵 般若庵 泉州楞伽接待 清源齐云洞 衢州祥福寺

点照长明灯 杭州明庆寺 径山万寿寺 补陀洛迦山寺 杭州灵芝寺 福州南
报恩寺 瑞光岩 泉州清源洞

以上计一百大寺看大藏经,六寺看四大部经,一十八处看华严经、法华经、接待往来,
七处点长明灯。

(注:以上是中层,凡四十八行,行书。)

天下有三达尊(下阙)

公独存焉,法(下阙)

其难者,公兼得焉,公以宿植之,善(下阙)习于老师宿儒(下阙)不忘(下阙)入观朝
政。

列圣眷用,位极上,公(下阙)国恩遍入,佛刹手探(下阙)摩(下阙)子善恶(下阙)前矣
(下阙)奉 御炉之香开,施之(下阙)作广大佛事,皆(下阙)无穷,此王宝(下阙)者也。敬
(下阙)三年十月 日(下阙)元孝住持传法沙门(下阙)。

(注:以上是下层,系僧徒颂德之词文,多剥泐,且被破坏。凡十九行,行十余字,行书。)

今上皇帝圣寿万安,舍中统钞壹仟定,每寺壹拾定,看念藏经,羊儿年记。^①

查《元史·亦黑迷失传》有,亦黑迷失四次逾海出使,即至元九年、十二年,两次“奉世祖命
使海外八罗李国”。至元十二年,曾“与其国师以名药来献”。国师,即元廷的也里可温教士。
名药,即圣油,也即耶稣墓前的灯油。

至元二十一年“复命使海外僧迦刺国,观佛钵舍利”。至元二十四年“使马八儿国,取佛钵
舍利”。

又《元史·世祖本纪》载有,至元二十九年二月“以泉府太卿亦黑迷失、邓州旧军万户史
弼、福建行省右丞高兴并为福建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将兵征爪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军士二
万人”。八月,“亦黑迷失乞与高兴等同征爪哇,帝曰:亦黑迷失惟熟海道,海中事当付之,其兵

^① 陈棨仁《闽中金石略》卷十一,元一,1934年,中华书局出版。

泉州宗教石刻

事则委之史弼可也”。

又载至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三省军会泉州。十二月，自后渚启行”。同年（公元 1292 年）欧洲人马可波罗伴送蒙古科克清公主嫁于波斯，也由泉州后渚港放洋。

至元三十年（公元 1293 年）十二月“平章政事亦黑迷失、史弼、高兴无功而还，各杖而耻之，乃没其家资三之一”。

本碑为元代亦黑迷失，征爪哇失败施钞一百大寺看经资福之记，盖请于朝，故额云“钦奉圣旨立碑”。据《元史·亦黑迷失传》载，亦黑迷失是畏吾儿人。元俗崇奉释氏，据《元史纪事本末》载：

延祐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庭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①

其君也如此，则臣下之宣经创寺又何异焉。

四大部经者，涅槃部、华严部、般若部、宝积部。其碑末曰“羊儿年”者，即元时蒙古、色目人，多以属相纪岁，盖仁宗延祐六年（公元 1319 年）己未也。

① 陈邦瞻编《元史纪事本末》卷十八《佛教之崇》，第 114 页，1935 年，商务印书馆。

第六部分 泉州古道教

泉州城北清源山是道教胜地。据《泉州府志》，清源山寒山岩左有大道岩芭蕉洞，秦时方士大道，修真此洞，“后人供奉之，名大道岩。”西晋太康年间（公元280～289年），在府治南建第一个宫观——白云庙（即玄妙观）。唐朝时在行春门外建紫极宫。五代时，陈洪进兴建奉先观。名道士、道教学者谭峭，被南唐主赐号“紫霄真人”，后回归泉州清源山紫泽洞修炼，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尸解于紫泽洞，有《化书》存世。宋代，出现大批宫观，如天庆观、广孝观、净真观、柏庭观、碧虚观、东岳行宫、法石真武行宫、清源山纯阳洞、北斗殿和真君殿。知州亲自撰文祭祀道教神仙。法石真武行宫是宋代知州祭祀海神的地方。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知州真德秀亲自撰文《蔡真人诰碑》，祀清源山神仙。

真德秀，福建浦城县人，原姓慎，因避宋孝宗讳而改姓真。庆元五年登进士第，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和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先后两次任泉州知州。他是南宋比较廉洁的官员。他第一次守泉离任时，“番商拥道攀送，以大炮炷于州治之门，香闻阖府，相与涕泣而视之”。绍定五年再任时，“迎者塞路，深村百岁老人扶杖而出，城中欢声动地”。宋代泉州知州被以后老百姓立祠纪念的有五人，真德秀是其中的一位。真德秀又是一位著名的理学家，他积极主张儒、道、释合一，为政治服务。他撰写的《蔡真人诰碑》，反映了他的理学思想。《蔡真人诰碑》早已湮没，碑文保存在真德秀《真西山文集》。文云：

嘉定十一年十月三日，有诏。泉州清源洞冲应善利灵济真人，加昭博之号，为八字真人。先是，十年夏五月不雨，臣始至官，问仙祠宫之著验章灼者。咸以真人对。臣亟祷焉。未几，遂雨。是年冬旱，臣往祷焉，又雨。越明年，春洎秋，膏泽时至，田高下硗腴皆告稔。米斗百钱，黄馘槁项之叟欢曰：昔未曾有也，非真人之灵，实大庇吾土，顾安获此哉？于是相帅以其事白于州，州谂于郡使者，下其书旁郡审覆之，如本州言。乃以闻，天子嘉焉，命有司摭其名之显且大者，以旌真人之功。呜呼！美哉！谨按真人蔡氏，世传其系，出晋司徒文穆公漠，文穆八世孙夔，节度岭南归，至泉以歿，子孙因家焉。真人事唐，为金部员外郎太原守，晚弃簪绂，隐于州北之北山，修辟谷炼气之术，以方技济人。既仙去，岁久而其灵愈彰。皇朝崇宁中，始封虚应先生。绍兴九年，封冲应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灵济，至是遂加昭博焉。

臣窃观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说者，大抵以希长年，蕲福应，往往受媒方士，为百代嗤。惟我圣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浮屠氏与山川祠庙之灵，惟能时雨旸，弭灾沴，有功于人者，乃始赐号名秩祀典。否则虽奇怪诡特，有不与焉。盖志在斯民，而不自为，此其所以跨绝前代也。惟真人之清虚淡泊，未尝震耀威福，以警动世俗耳目，而民之归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亦犹有道君子，为善于幽隐阒寂之地，不求人知，而卒不可掩，岂不尤可贵也哉！

臣既以所下制书刻之梓，而又叙其本末，使后世知圣朝所以宠命真人，而真人之所以膺受宠命者，其大指盖如此，以备清源故事云。十二年八月甲子朔，具位臣真某记。^①

宋代理学对泉州的真人信仰影响甚深。中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的儒学，历经先秦儒学、两汉经学、宋明理学三种基本形态。宋明理学以儒、道、释互补为格局，最终确立中国文化的传统，即称“三教合一”。宋代理学得到统治者的提倡。从朱熹门生泉州知州事真德秀的泉州清源山《蔡真人诰碑》，便可洞察宋代理学思想与“真人”崇拜的关系；而“真人”的崇拜，适合封建统治者宣扬的“君权神授”与“受命于天”的理学思想。且看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真德秀的《蔡真人诰碑》。

首先，真德秀点明写《蔡真人诰碑》的原因，是宋宁宗皇帝加封蔡真人“昭博”之号，为八字真人。接着说明真人受封审批的过程和条件，即知州根据下属报告真人灵验的情况，“下其书旁郡审覆之”。如果旁郡真人灵验情况与本州一样，则上奏天子，由天子赐真人封号以嘉焉。然而赐封号的真人是有所选择的，首先真人必须是“其名之显且大者”。蔡真人其先世“出晋司徒文穆公谋”，其次“真人事唐，为金部员外郎太原守”，且弃官“隐于州之北山，修辟谷、炼气之术，以方技济人”，完全符合皇帝赐封号的条件。

再次，真德秀点明宋代对真人加赐封号与前朝不同，用以强调宋理学主张的君权受命于天，以作神主的政治主张。先指出“前世人主，崇尚道家神仙之说者，大抵以希长年，蕲福应，往往受媒方士，为百代嗤”。然后强调“惟我圣朝，受天眷命，以作神主。凡老氏、浮屠氏，与山川祠庙之灵，惟能时雨旸，弭灾沴，有功于人者”，都可以“赐号名秩祀典”。否则，“虽奇怪诡特，有不与焉”。最后，还表明皇朝对真人的赐封“盖志在斯民，而不自为，此其所以跨绝前代也”，而真人所以被朝廷赐封，在于真人“清虚淡泊，未尝震耀威福，以警动世俗耳目”。如此，则“民之归仰自不能忘，朝廷褒封之典，自不能已”。这样，就把人民的愿望和精神寄托，与封建统治者的君权“受命于天”的理学思想，通过对真人的封号和祀典形式统一起来。如此，朝廷赐真人徽号越多，政权与神权的结合就愈紧，加上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心理状态，有宋一代，泉州对清源山蔡真人的崇拜愈盛。泉州清源山蔡真人于“崇宁中，始封虚应先生。绍兴九年，封冲应真人。二十三年，加封善利。乾道三年，又加灵济。至是遂加昭博焉”。这就是宋代泉州地方官员利用朝廷对真人的赐封号机会，使政权、神权与老百姓寄托心理三者紧密结合的一个典型事例。

明代，一方面视道、佛为异端，但又强调“神道设教”以助教化。清代，在“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思想的指导下，各种宫观、神祠纷纷修建，地方官员、绅士，或董其役，或为其撰写碑记、匾额、楹联。

古代，泉州的道教又往往与民俗结合一起，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如一年一度的“普度”。“普度”的风俗是混合道教、佛教之说而形成的。有的学者认为它是佛教盂兰盆会的别称，又是道教中元节的变形。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按宋代的祭祀仪式，是“委州府差官洁

^①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三十四，题跋，《蔡真人诰碑》。

斋致祷……毋得出谒、宴饮、贾贩及诸烦扰”。^①其组织和祈求形式,是在知州主持下“环诸里数百人之众,并斋心而洁虑,冀赦过以除愆,或以土农工商,斲安生业,或为祖先追拔冥途”。^②或为祭祀阵亡官兵。可见,宋代“普度”仪式是很严肃的。至明代,除州、县设祭外,又加里社祭祀,“祭物牲酒随乡俗置办,其轮值会首。及祭毕,会饮”,“每岁轮一户为会首”。^③改变了宋代的“洁斋行事,毋得宴饮”的严肃规定。于是,中元节的祭祀活动扩及里、社、乡,“普度”祭祀逐渐转化为民间风俗。至清末,地方封建势力利用中元节“普度”会首权力,往往为了私人恩怨,蓄意挑起铺、境之间的械斗,即造成泉州历史上有名的“东西佛”械斗(两大势力集团的械斗),数十年不息。光绪年间,地方有识之士提出禁革“普度”陋俗。有人提出废除城里铺、境行政区划;有的提出改造乡村区域;有的提出普及乡村教育,如此等等。以上叙述便是道教中元节“普度”变成陋俗的发展过程。

泉州地区道教的遗迹保存下来的较少,原因是全真派道观因为没有香火,衰退得较早。而正一派因为崇拜鬼神,逐渐与民间信仰结合一起。所以泉州道教的石刻,相对保存较少,故本书保留的道教石刻照片也是比较珍贵的。

F 1 清源山老君岩石像



F 1 清源山老君岩石像

① 《宋史》卷一百零二,礼,五。

②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四十九,附:青词,《中元仙游建醮青词》。

③ 嘉靖《惠安县志》卷十,典祀。

石像高 5.63 厘米、宽 8.01 厘米、厚 6.85 米。由一块天然白花岗岩石雕成。据《泉州府志》记,清源山下有“羽仙岩,在罗、武二山之下,今名老君岩。石像天成,好事者为略施雕琢。宋时,罗山下有北斗殿;武山下有真君殿。朱子尝游于此”^①。雕像颓顶,两眼深邃,席地而坐,衣褶简朴而富有动态;两耳扇向前,下垂,长髯飘拂;右腿盘于前,左腿屈起;右手扶于石矶之上,左手平放左膝上,全体神态作安详思考状。原石像上有殿堂覆盖,明代塌毁。石像雕刻艺术系北宋风格,是我国现存最大的道教老君造像。

F 2 玄妙观石雕道教神仙像

石略呈正方形,宽 47 厘米,高 45 厘米,厚 14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石正面右边浮刻图案,左边刻长方形凹入框,框中浮雕一位站立仙姑,仙姑头上绾髻,云肩,披飘带,穿长裙,腕饰钏,双手捧一个带座的瓶,可惜瓶的上半部已遭破损。瓶之上有残断的树枝,左上角是卷云。仙姑膝下有一仰头的麒麟,身后有层层山峦。雕刻的内容可能是道教的神仙故事,雕工精细。



F 2.1 玄妙观神仙像石雕正面



F 2.2 玄妙观神仙像石雕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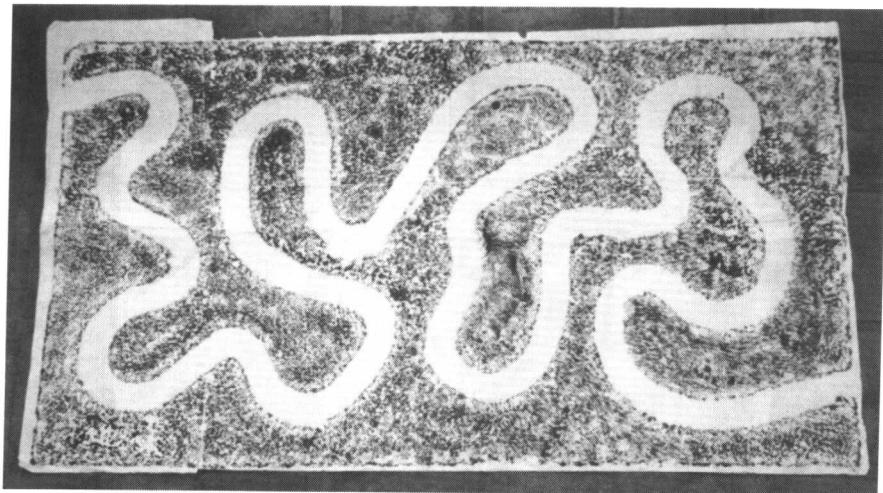
石背面左边浮刻图案,右边长方形凹入框中浮雕一位老者,老者头上束髻,垂带飘拂。老者站在地上,右手捻须髯,左手放于背后,侧过身回首注视腰间所系葫芦里飞出的一只兔子。老者的右上方斜出一枝蟠桃,已部分残缺。画面的左上角有一个花满月。老者着长衫之外,裤腿于膝下扎紧。这可能是与月兔有关的道教神仙故事。

这是一方少有的两面道教石雕艺术品,艺术风格应属明代。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山川,老君岩。

F 3 法石山云麓村三翁宫石刻

石长 165 厘米、高 94 厘米、厚 16 厘米。白花岗岩石雕成。石面雕刻一条宽 5 厘米、深 2.5 厘米的曲沟，左右各有一个出口，石刻的两头似乎还有小水池相连。在石刻的左下方，阴刻“天地”两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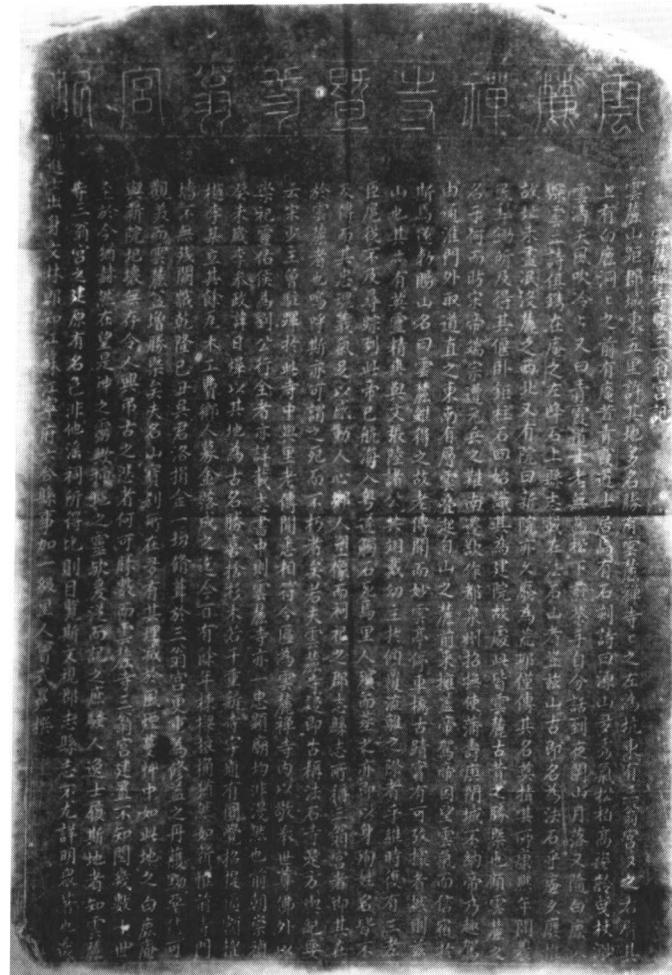
F 3.1 三翁宫石刻拓片

1968 年秋，我与泉州幼儿师范学校傅祖顺老师，骑自行车到法石山踏勘云麓村阿拉伯人蒲寿庚遗迹，不料却意外地探访到云麓村白鹿洞、白鹿庵和云麓禅寺及三翁宫的遗址。在白鹿洞前山坡的梯田里，发现这方石刻仰卧在荒弃的田地上。据老农介绍，此石自古以来就在这里，因为太大无人搬得动。我随即刷拓得此石刻拓片。

据我国道家的太极说，以为太极散为万汇，惟天为最大，地次于天。道教则认为“地祇，天地位矣，五岳四渎脉终之相贯也，精神之相系也。坤维也，间生忠臣烈士。金百炼而愈坚也，水百折而愈东也。”^①此石刻“天地”两字，正象征了道教对天地的解释，表明此石刻系道教的遗物。据《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碑云：云麓禅寺“东有三翁宫……右上有白鹿洞，洞之前有庵，昔青霞道士居焉……宋帝端宗，遭元兵之难南迁，欲作都泉州，招抚使蒲寿庚闭城不纳……东南有层云叠起……帝因望云气，而信宿于斯焉。遂勒赐山名，曰‘云麓’……复有三老臣扈从不及，寻踪到此，帝已航海入粤，遂触死焉。里人殡而葬之……而其忠魂义气，足以感动人心，乡人塑像而祠祀之。”^②故本石刻有可能是三翁宫用以象征“五岳四渎脉之相贯也，精神之相系也。坤维也，间生忠臣烈士”之说的遗物。

90 年代，此石刻移到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保存。有人认为是伊斯兰教石刻；有人认为

^① 见本书，第七部分《泉州古民间信仰》，G13，泉州东门外凤山《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碑。
^② 见附录。



F 3.2 《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碑拓片

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清玩的“曲水流觞”。考宋朝《营造法式·流盃渠》的形式，有“国字流盃渠”和“风字流盃渠”。^①按流盃渠的起点和终点是紧紧并排靠在一起的，而本石刻的两个出口是在左右两端。因此，更确定本石刻是道教天地之说的象征性作品，故应是三翁宫的遗物。三翁宫的历史和灵迹。道光《晋江县志》卷六十九，寺观志，《城外寺观》有详细记载。

附录：《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碑

碑高 62 厘米、宽 42 厘米。页岩雕成。云麓在法石山左，是一个不大的村落，云麓禅寺建于法石山的山腰，寺已部分倾颓，其右庑墙上嵌有一方碑记，碑额横刻篆字“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碑文如下：

① 李诫《营造法式》卷二十九，流盃渠第五。

云麓禅寺暨三翁宫记

云麓山距郡城东五里许，其地多名胜，有云麓禅寺。寺之左为坑，东有三翁宫，又之右臂其上，有白鹿洞。洞之前有庵，昔青霞道士居焉。有石刻诗曰：“源山多秀气，松柏高姿龄，曳杖渺云涛，天风吹冷冷。”又曰：“青霞道士老无齿，松下煎茶手自分。话到夜阑山月落，又随白鹿入深云。”二诗俱镌在庵之左峰石上。县志载：在法石山者，岂兹山古即名为法石乎！庵久废，惟故址未尽泯没。麓之西北又有院，曰新院，亦久废为荒邱，仅传其名，莫指其所。康熙年间，农民犁锄所及，得其偃卧矩柱石四，始识其为建院故处。此皆云麓古昔之胜概也。顾云麓之名于何？而昉宋帝端宗，遭元兵之难南迁，欲作都泉州，招抚使蒲寿庚闭城不纳。帝乃趣驾，由通淮门外取道直之。东南有层云叠起，自山之麓前来拥盖帝驾。帝因望云气，而信宿于斯焉。遂敕赐山名，曰“云麓”。虽得之故老传闻，而妙云亭、停车桥古迹，实有可考据者。然则，兹山也，其亦有英灵精爽，与文、张、陆诸公，共翊戴幼主于倾覆流离之际者乎。维时，复有三老臣扈从不及，寻踪到此，帝已航海入粤，遂触石死焉。里人殡而葬之。亦即以身殉，姓名皆不及传，而其忠魂义气，足以感动人心，乡人塑像而祠祀之。郡志、县志所称三翁宫者，即其在于云麓者也。呜呼！斯亦可谓之死而不朽者矣！若夫云麓寺疑即古称法石寺，是《方舆纪要》云，宋少主曾驻跸于此寺中。与里老传闻悉相符。今匾为云麓禅寺，内以敬奉世尊佛，外以崇祀灵佑侯，为刘公行全者，亦详载志书中，则云麓寺亦一忠显庙，均非漫然也。前朝崇祯癸未岁，李参政讳日燦，以其地为古名胜，喜舍杉木若干，重新寺宇，题有“圆觉招提匾额，檀越李某立”。其余瓦木工费，乡人募金落成之。迄今百有余年，栋梁榱桷犹然如新，惟前寺门墙，不无残阙。岁乾隆己丑，吴君洛捐金，一切修葺，于三翁宫更重为修盖之，丹甍黝垩，尽可观美，而云麓益增胜概矣。夫名山宝刹，所在多有，其埋灭于风烟蔓草中，如此地之白鹿庵，与新院圮坏无存，令人兴吊古之悲者，何可胜数。而云麓寺三翁宫建置，不知阅几数十世，至于今犹赫然在望，是神之灵欤，抑地之灵欤！爰从而记之，庶骚人逸士，履斯地者，知云麓寺三翁宫之建，原有名色，非他淫祠所得比。则目览斯文，视郡志、县志不尤详明众著也哉！

赐进士出身文林郎，知江苏江宁府六合县事加一级，里人曾式冕撰。

F 4 泉州府城隍庙照墙雕饰

城隍的崇拜甚早，据传《周礼》腊祭八神之一的水（即隍）庸（即城）为城隍的雏型。城隍是古代神话传说中守护城池的神灵，以后为道教所信奉。泉州府城隍，在府治北，宋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建。府城隍对面照墙上，用琉璃和砖雕组成大幅图像。它虽不是石刻，却是泉州保存下来的珍贵道教艺术雕塑品，俗称麒麟壁。壁长20米左右，中间是用琉璃制成的大型麒麟，栩栩如生；右边砖雕山石、花木，其间有松、鹤、鹿；左边则有象和凤凰等。“文化大革命”期间，为避免遭到破坏，由王今生市长主持，移置泉州开元寺西塔北面，今保存完好。



F 4

F 5 石湖村金钗山东岳庙牌坊

据《石狮市志》载,泉州石狮石湖村东岳庙创建于唐代,“中供奉东岳大帝,左为观音,右为



F 5

文昌帝君。明正德二年(公元 1507 年),倭寇入侵,夷为平地。清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锦江富户欧阳捷重建”^①。庙距石湖塔数十米,俯瞰石湖码头。石牌坊结构简朴,分二层。顶层两边刻狮子,但已风化。底层两旁各雕一尊武士门神,手持剑,身穿盔甲。就石门神的雕刻艺术风格看,比旁边石湖塔上浮雕神像更为古老,应为宋代的石雕像。此照片摄于 1953 年,石牌坊基本完好。今牌坊已无存,惟石雕门神尚存。

^① 《石狮市志》卷二十五,风俗、宗教,第二章第一节道教,(六)东岳庙。石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1998 年 9 月,方志出版社出版。

第七部分 泉州古民间信仰

古代泉州地区除了有道教,以及外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和佛教以外,还有如汪洋大海的民间信仰和各种神明。所谓民间信仰,从广义上说,可以属宗教信仰的范畴,但从严格意义上说,它又不是宗教。民间信仰的神明有自然神、人物神,也有道教和佛教的神明,甚至还包括鬼,可以说包罗万象。这些民间信仰神明,随着移民有的分灵台湾地区,有的分灵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因为篇幅限制,本书只选取海神通远王、天妃,医神保生大帝,忠义、财神关羽,以及王爷神明等,作简要说明。而通远王海神在宋代对泉州的海外贸易影响甚大,遗存较多,文化内涵丰富,故作详细的考述。

一、九日山通远王祈风摩崖石刻

福建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历史文化名城,自公元 6 世纪起,即与海外诸国发生通商关系,有关这方面的史迹遗留甚多,九日山上的祈风摩崖石刻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九日山,在泉州市西郊外,属南安市丰州镇,位于晋江下游北岸,距市区 7 公里,有公路直通山下。它是唐、宋时代泉州有名的风景区之一。晋江流经山前,山水秀丽,岩石壁立。山有东、西两峰,各高约 90 米,两峰上各筑平台,建庙宇于其上。唐代名贤如秦系、姜公辅及诗人韩偓等,先后隐居寄迹于此。据吴兴刘氏《闽中金石志·泉州墨妙堂记》有:九日山,自晋以来,士大夫避世氛多游憩赋咏于此。至唐而益盛,笔墨与兹山并传”。明黄文炤《九日山志》也载:“群山拱抱,林木苍郁,山上有晋松百余章,又有石佛岩等三十六胜迹。”《泉州府志·山川》则载:“以重九日登高于此,或云有道人言,吾自戴云山来此,九日乃到,因名。”^①但据泉州民间传说,谓宋幼帝(赵昺)奔泉州,守臣蒲寿庚闭城不纳,幼帝避居山上九日,故名九日山。诸说以第一说较可信。

九日山名胜古迹虽多,但多因年湮代远,破坏废坠的很多。1963 年,泉州市和南安县的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联合调查中,发现丰州镇农民在旧城址挖础石修水渠,从 3 米多深的地下,掘出刻字的不规则形大石块,上刻“绍定四……会延(福寺)”及“淳熙丁未□□夏”,字径约 7 厘米至 10 厘米。2004 年,泉州闽南建筑博物馆从丰州镇街道上的店铺门口,收集到一块扁圆型的巨大天然岩石,上刻:

宣和五年(1123 年)癸卯岁
翻经石(字径 30 多厘米)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

无量寿宝塔

□肃□郑□□

这表明九日山上的“翻经石”被移作修城石材使用。九日山摩崖石刻所以大部分被毁灭,可能是明代丰州筑建石城时,曾到山上去采伐岩石的缘故。《泉州府志·城池》载:

南安县,在府城西十五里,旧无城。明嘉靖三十七年,倭警。知县涂光裕失守。夏汝砾继之,始甃石为城。……周七百七十四丈有奇。^①

在倭寇陷丰州镇的情况下,封建官吏就近凿石建城防倭,是极可能的。这是东峰摩崖石刻被严重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

至今留存山上古人留名题字摩崖石刻还很多。特别是那些有关宋人为当时航行于波斯湾和泉州港之间的“番舶”举行祈风典礼的记事石刻最为重要。它是古代我国海上和海外贸易的历史见证。可是,这批摩崖石刻大多年代久远、风化严重、文字剥落不少,兼以在旧社会,人为破坏亦多。现存山上题字不是为苔藓所掩盖,便是被藤蔓所附生。其在山下者,则被泥沙所淹没。1963年,福建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委托南安县人民委员会,清理摩崖石刻。摩崖题字,逐字用胶漆描红。对各段石刻进行丈量,并将各段石刻的字句逐一抄录与登记。这项工作,从9月上旬开始,12月下旬竣工。

在工作过程中,发现被湮没的宋淳熙十三年泉州太守林枅为唐代越南人姜公辅修筑坟墓的摩崖石刻。在西峰悬崖上,还发现了前此从未为人所知的宋咸淳二年泉州市舶使王茂悦和郡太守赵希咤为番舶举行祈风的石刻一段。前者已湮没亘百年,学者及专家因研究姜公辅问题,曾数度到九日山遍寻不获。后者则曾于九十多年前,外国学者著书立说,错认为王茂悦于宋末任泉州市舶使为不可能^②,后经国内学者反驳,迄今未有结论。这两件石刻的发现,不但给我们对九日山摩崖石刻的研究填补了空白点,也为今后探讨泉州海外交通历史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九日山延福寺,建于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但据1938年《重修福建通志·名胜志·南安县》载,“寺始创于晋太康七年”。它是福建省创建最早的名刹之一。《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转引《名胜志》云:“晋太康间建,去山二里许。唐大历三年,移建今所”^③。这就是说,唐大历三年之前,寺在丰州城西门外,距九日山二里许,但那时寺称建造寺。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才迁建九日山下之南面。在九日山上有一胜迹,叫翻经石。《泉州府志·卷七·山川》转引《名山记》云:“梁普通中(公元520~527年),僧拘那罗陀,尝翻金刚经于此。”

关于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来泉州寓居延福寺翻译金刚经的事迹。据宋朝曾会《重修延福寺碑铭》载:

夫山川之秀者,闽中为胜绝。闽中之胜者,清源为灵异……古金刚经者,昔天竺三藏拘那罗陀于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道经兹寺。因取梵文,译正了义,传授及今,后学赖也。^④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一,城池。

^② 日本桑原骘藏著、冯攸译《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本文四,考证七,蒲八官人条。

^③ 黄仲昭《八闽通志·寺观条》误为“大历三年建”。

^④ 见《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延福寺宋曾会《修寺碑铭》。

这样看来，则拘那罗陀似乎是由海上来中国，途经泉州，才顺便登陆，到九日山延福寺寄寓的。如所记不误，则拘那罗陀是由印度航海到泉州，而后才到南京的。但据《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载：

拘那罗陀，陈言亲依，或云波罗末陀，亦（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篇》第六册《古代中国与印度之交通》，第202页，作“译”）云真谛，本西天竺优禅尼国人。群藏广部，罔不措怀。艺术异能，偏素谙练，虽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远涉艰关，无惮夷险，历游诸国，随机利见。梁武皇帝德加四域，盛昌三宝。大同中，敕直使张汜等送扶南，献使返国，仍请名德三藏、大乘诸论、杂华经等。真谛远闻行化，仪轨圣贤。搜选名匠，惠益氓品。彼国乃屈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以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公元548年）闰八月，始届京邑。陈武永定二年（公元558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泛舶往棱伽修国^①，道俗留之，遂停南越。天嘉六年^②（公元565年），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梁安郡治在今湖北黄安县南，此外梁安应为传写之误），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又循人事，权止海隅，已而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以太建元年（公元569年）遘疾卒。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馆陈列室第一部分，以《续高僧传》所记，拘那罗陀于“天嘉六年（公元565年），又泛小舶至梁安郡，更装大舶，欲返西国……已而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返广州”，作为泉州海外交通有文字记载的开始。其根据则以为“梁安郡，可能为晋安郡之改称，或为晋安郡之误”。但考梁武帝子纲（简文帝），元帝子方智，陈文帝子伯宗，都曾被封为晋安郡王。足见晋安郡在梁、陈时并未改为梁安郡。再根据明黄仲昭《八闽通志》载：“梁置南安郡后，以晋安、建安、南安三郡隶东扬州”，这里也不见有梁安郡的名称。这样，梁安郡是不是晋安郡的改称或误记，是值得怀疑的。因此，作者认为除以上所引宋延福寺碑铭外，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可靠的资料。若按宋朝曾会《修延福寺碑铭》所记：“梁普通中，泛大海来中国，途经兹寺”的时间为准。这印僧是路过福建沿海，直接由泉州登陆，到延福寺寓居，并从事翻经工作，然后才到广东去的。这与《续高僧传》所记“沿途所经，乃停两载”一句也连接得起来。可能他所停的两年中，有一部分的时间是花在居留延福寺翻译经书的。延福寺是建于晋武帝太康九年（公元288年），有了这座寺，拘那罗陀才有可能来此寓居并译经书。在真谛三藏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的《后记》中，记他“经游闽越，暂息梁安，太守王方赎乃勤正心法，性爱大乘，仍于建造伽蓝请弘兹典”。建造伽蓝，或云“建造寺”，即延福寺的前身之称。拘那罗陀的确来过建造寺，而建造寺僧侣，很早就与印度高僧有了海上的联系和往来，也说明当时泉州港和印度之间已

① 棱伽修国。在今马来半岛暹罗以西，缅甸领有的德那萨灵。《梁书》卷五十四作狼牙修国。《隋书》卷八十二，赤土国传作狼牙须国。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作郎迦戌国。即外国人所称马来半岛北部的 Lankāsuka 国。

② 关于拘那罗陀来泉州是在梁武帝普通中，在《泉州府志》卷十六、《南安县志》卷四十八、《福建通志》卷九及《太平寰宇记》所载皆同。惟《续高僧传》说是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而到达南海（广东）是太清二年。考大同十二年四月即已改元，则此年无八月。从时间上说，所记可能有误。

有海程航线了。

九日山现存摩崖石刻七十七段，其中宋刻五十九段，元刻六段，明刻九段，清刻一段，此外不明年代者二段。其中，记载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和市舶司为番舶举行祈风典礼的题名石刻有十段。从时间上说，祈风始于元丰年间^①，但未见北宋祈风石刻，所有祈风石刻的时间都在南宋。这是因为宋朝政治中心南移，不得不大力发展南方经济和发展海外交通，并奖励海外贸易，以补偿财政上的不足。所以，南宋一代泉州港的国际贸易较北宋繁盛，因而为番舶举行祈风典礼的次数也比北宋为多。或者北宋祈风石刻均已被破坏，或者祈风活动以石刻记其事乃由南宋开始。

但泉州地方志书，记载宋代泉州人航海出国进行国际贸易的并不很多。最为突出一例，是宋绍兴八年，福建莆田龟湖古白杜村方氏祠堂内的《祥应庙记》，记载了“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艰阻，往返曾不期年，获利百倍。前后之贾于外蕃者，未尝有是”^②。可见和朱纺同时出国的，为数即已不少。

地方志书，记宋代外国人浮海来泉州经商的则较多。如《泉州府志》载：

陈偶，字君举，沙县人……熙宁八年，召知开封府属。新法行，请外知泉州。以治行闻，召见改惠州。元丰五年，复知泉州。旧法，番商至，必使诣广东，否则没其货。偶请立市舶司于泉，诏从其议。^③

又如《泉州府志·夏不鲁罕丁传》载：

寺宋绍兴创也。先是，郡守陈公偶，请置市舶于泉州，终宋世向其利。胡贾航海踵至，富者赀累钜万，列居郡城南。于是纳只卜穆喜鲁丁建兹寺。^④

再如《泉州府志·真德秀传》载：

嘉定十年，知泉州。时番舶惧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遂岁增三十六艘。^⑤

以上所说的“胡贾”、“番舶”，除了外国船、外国商人外，还有可能一部分是外国商人搭乘中国船，或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船运货来中国做生意的。近七十年，在泉州出土的有关宋代波斯人、阿拉伯人墓碑石，就是他们航海来泉州的见证。

宋代为什么要举行“祈风典礼”呢？因为古代船舶，不论其如何巨大，设备如何周全，都要依赖风力来航行。特别是泉州一港，“兼每岁自八月以后至六月以前，风信不顺，即无贩莅及海南回舶到岸”^⑥。因此，在封建制度下，神权发达时代，泉州一港的举行祈风，显得更为重要^⑦。另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灵乐祠。

② 见刘尚文《莆阳金石初编》卷上，《祥应庙记》，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福州版。新中国成立后，该碑移莆田城关三清殿保存。1959年，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陈列室第五部分“中国人民渡海出国及在海外的活动”，就展出《祥应庙记》的拓片。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一）。

④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十五，拾遗上。

⑤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一）。

⑥ 见《宋会要辑稿》第八十六册，职官四十四，市舶司项。

⑦ 见《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刘铭恕《泉州宗教石刻三跋》。

外,清末刘尚文在《莆阳金石初编》中为《祥应庙记》写跋文,跋文里的几句话,也很能说明问题的,他对宋代航海求神之举评论说,“隆兴二年,神加封威烈夫人,封淑静。淳熙间,神加灵润夫人,亦加承济。皆记以后事也。反覆兹碑,窃叹尔时权臣奄寺,盗权于内……政治不修,亟亟于百神之祀何欤然?”^①

因此,宋代泉州的郡守和提举市舶司,每年多有为番舶举行祈风典礼之举。如宋绍兴间福建提举市舶林之奇云:

夫祭有祈焉,有报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祷。报也者,所以后神而答其赐。祈不可以为报,而报不可以为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岁举,事祀典于神则异乎,是于夏之祈,有冬之报。于冬之祷,有夏之报。^②

如林之奇所记,一年两次祈风,为夏祈冬报,冬祈夏报。然泉州九日山祈风石刻有淳熙十年十月的“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和淳祐三年四月的“祷回舶南风”的记载。可见,宋代泉州的祈风是遵循夏祈冬报,冬祈夏报之例。

又林之奇的《拙斋文集》卷十九,又有《祈风文》云:

象齿南龟,远出岛舶。以舟为趾,重泽冈隔。沙阜石幢,涩如芒刀。以风为翼,万里一瞬。勃勃蓬蓬,怒号法海。以神为虚,立谈而改。羽盖云车,貌然浩荡。以礼为介,厥应如享。惟风必期,岁有常信。今虽袭礼,匪常之徇。吏之守职,两年为期。官满则去,位难出思。神所庙食,与天地通。民享利泽,厥望不穷。某也,终更行,且还里。席神庇庥,曰既久矣。神之歆否,愿以帆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浆,为舟预请。指望飈南,留神引领。

又宋朝泉州太守王十朋有赠提舶生日诗:

正阳之月懸不作,气候清和满寥廓……雍容敷奏天颜喜,小试舶台良不恶。北风航海南风回,远物来输商贾乐。日边知己皆达官,行矣归持紫荷橐。^③

又《祈风次韵》云:

蠲初欲雨下俄沛,风不待祈来已熏。瑞气遥看腾紫帽(泉州名山),丰年行见刈黄云。大商航海蹈万死,远物输官被八垠。幸有舶台贤使者,端能薄敛体吾君。^④

宋嘉定至绍定间,真德秀两次守泉时,主持祈风典礼,有祈风文如下:

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⑤

宋朝刘克庄《后村大全集》载:

① 见刘尚文《莆阳金石初编》卷上,《祥应庙记》跋文。

② 林之奇《拙斋文集》卷十九,祈风文。

③ 见宋王梅溪忠文公文集》卷三十一《赠提舶生日诗》。

④ 同上书,卷三十八,《提举延福(寺)祈风道中有作次韵》。

⑤ 见《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十,万有文库本,商务印书馆发行。

温陵为闽巨屏，旧称富州，近岁稍趋凋敝，或谓非兼舶不可。^①

清乾隆《泉州府志》载：

赵崇度，嘉定间提举市舶。先是海商货至，官竞刮取，命名“和买”，实不给一钱。于是，商舶滋少，供贡缺绝。崇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和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②

据上所引，足见南宋泉州地方政府之费用，主要靠向番舶征税。所以南宋一代，泉州地方官吏的祈求信风，奖励海外贸易，对维持其封建统治政权，具有极其重要意义。这正如宋赵汝适在《诸蕃志》自序里说的：“于是，置官于泉广，以司互市。盖欲宽民力而助国朝”。这里所谓“宽民力”实无其事，而“助国朝”则为事实。九日山的祈风石刻，常见刻有祈风文是：“遵彝典也”、“遵令典也”、“修岁祀也”和“遵故事也”等辞句。而真德秀在祈风文中，则直接说明祈风是：“国有典祀”，证明祈风一事，在有宋一代，特别是南宋，已被定为国家重要祀典之一了。

九日山祈风典礼的仪式又是怎样的呢？据宋李邴《九日山水陆堂记》所载，可见当时祈风仪式之一斑。记云：

泉之南安有精舍，曰延福。其刹之胜为闽第一。院有神祠，曰通远王（即昭惠庙）。其灵之著，为泉第一。每岁之春冬，商贾市于南海暨番夷者，必祈谢于此。农之水旱，人之疾病亦然。车马之迹，盈其庭，水陆之物充其俎。戕物命不知其几百数焉。已而散胙，饮福，觴豆杂进，喧呼狼藉。有禅师慧邃，以绍兴元年尸是院。其持身也静而通，其莅众也简而严。逋责之，未偿者偿之；规绳之，未举者举之。未几，院之徒循循焉。异前之为，惟神祠仍旧。师愀然曰：吾教以杀牲为大戒，神依佛而守焉。犹人之于家、于乡者，而弗从其教可乎？此非神之意，特人狃于习俗耳……于时辟祠之左为屋，若干楹环其外，中设十六位，堂宇靓严，绘事焕列……作于（绍兴）四年十二月，成于五年六月……自是，凡祈谢于此者，其牲饔牢饩鲜稿之费，易之为水陆会，救物命岁不知几千万。人不作罪业而作福业，神不享福报而享净报，其利益不既大矣乎。^③

从上所记述，可知宋代祈风仪式，最初是用牲肉致祭海神通远王，礼毕，乃散胙饮福。后因慧邃禅师之提议，才改为陈列花果之水陆会。

按，李邴，钜野人，崇宁五年进士，累官参知政事。后除资政殿学士（提举洞霄宫），寓泉州凡二十年，遂家焉。与黄冠张读等友善，好游佳山水，以诗自娱。著有《草堂前后集》一百卷^④。李邴所记，为其所亲见，由此可知宋代官吏和海商祈风礼节情况之一般了。

关于宋代泉州地方官吏兼领市舶的问题，略考于下。《泉州府志》转引《宋史》记云：

掌番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元祐初，诏福建路于泉州置司，仍委

^① 见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十六。

^② 见《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一），提举市舶司。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二），九日山条。

^④ 乾隆《晋江县志》卷十三，人物志，流寓。

逐处知州、通判、知县、监官同检视，而转运司总之^①。

但据《宋史·市舶司条》有记：凡遣舶、祷风之役，自郡太守以下，皆与祭事。旧制虽有市舶，多州郡兼领。元丰间，始归转运司。后再置而旋废。大观元年又置。建炎初，复归转运司。绍兴二年，复命知州兼领。寻又改由提举茶盐司兼领。

我们在泉州文庙大成殿西庑下，发现有宋绍兴七年张读撰、李邴书、赵奇题额的《泉州重建州学记》。赵奇官衔勒：“左朝请郎提举福建路茶事常平等公事兼市舶”。但《闽书》记绍兴间任泉州提举市舶者十六人中，未见有常平茶盐司之名。又九日山的“淳祐丁未仲冬……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石刻，说明此时又恢复到元祐以前“郡守兼市舶”的旧制了。端平以后，规章又多改变，因而历史记载也不翔实。我们从九日山所见的几段祈风石刻，就已经可以找到宋代市舶司专管对外贸易事务与知州，或转运使兼领的交替情形和交替时间的线索了。

最后，关于九日山的向神明祈求航海顺风的宗教信仰历史原因。据《泉州府志》转引《闽书》云：

山故有三十六奇，曰神运殿。唐咸通中（公元860～873年），寺僧建殿，求材于永春之乐山，遇一叟指引其处。是夕又梦许护送至。既而一日江水暴涨，其筏自至，若神运然，故以名殿，曰灵乐祠。宋时市舶祈风处。^②

又《泉州府志·坛庙寺观》云：

灵乐祠，在县西九日山中……众神之作灵岳祠，名殿神运。宋封神通远王，赐额昭惠。嘉祐中（公元1056～1063年），泉（州）大旱，守蔡忠惠祷雨辄应，奏加封善利王。寻加广福、显济。从神曰陈益，封仁远王；曰黄志，封辅国忠惠王。陈益，其先东汉人，宋熙宁（公元1068～1077年）西夏之警，诏求勇敢士，郡守辟益为巡辖官。元丰间（公元1078～1085年），从守祈风南安延福（寺）神运殿，睹庙貌森严，显灵奇异，誓舍身为佐，遂植杖立化。僧泥躯奉之。淳祐中（公元1241～1252年），封仁福王。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提举张祐陛辞朝廷，颁御香诣殿焚之。^③

以上记载九日山延福寺灵乐祠水神通远王的灵验和被加封的过程（包括从神被加封），也记载九日山延福寺神运殿的祈风仪式始于元丰间（公元1078～1085年），则知宋代泉州九日山延福寺灵乐祠的海神通远王崇拜盛极一时。入元朝之后，其地位迅速被女海神——天妃所取代，几至消亡。如今，泉州较有影响的崇拜通远王海神的昭惠庙有洛阳桥南的昭惠庙、安平桥头安海街上的昭惠庙和南安英都镇的昭惠庙。

以下将按年代顺序，略考九日山上的十段宋代摩崖祈风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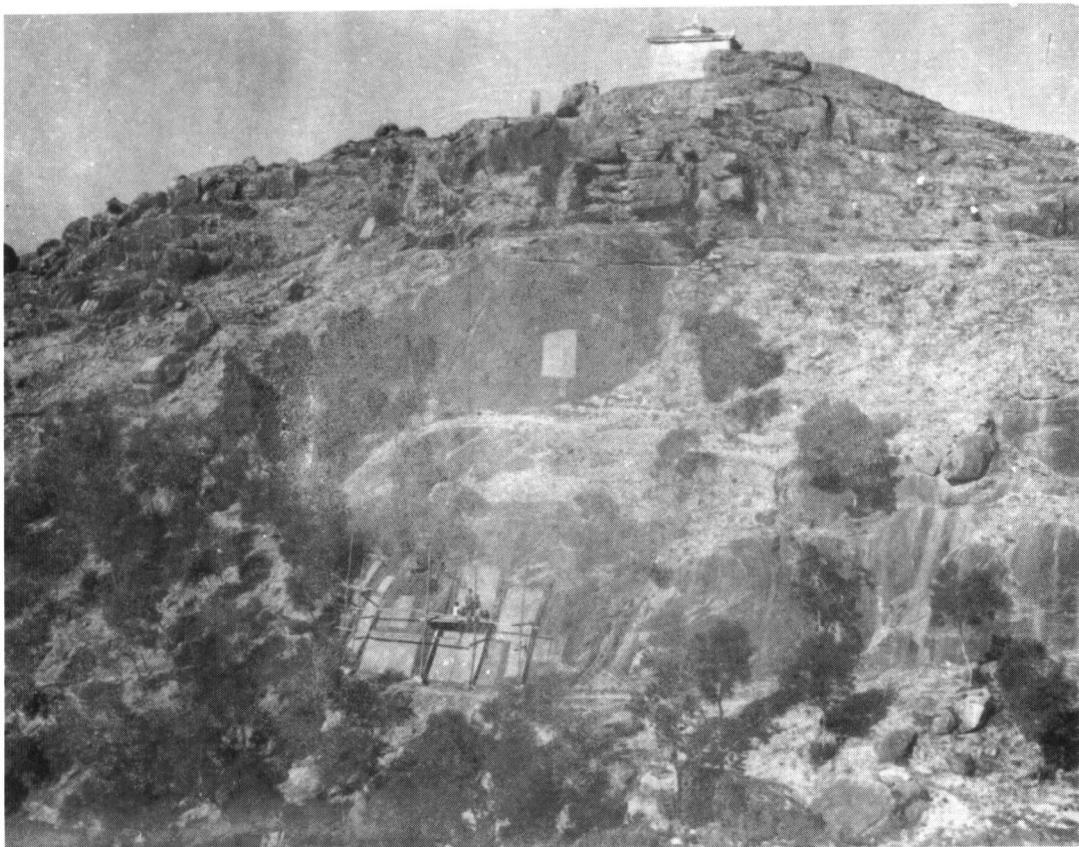
G 1 九日山西峰祈风摩崖

1963年，福建文物管理委员会拨款，委托南安县人民委员会清理、整修九日山祈风摩崖石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六，文职官上，宋诸司。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七，山川二，九日山。

③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灵乐祠。



G 1 九日山西峰祈风摩崖

刻。从9月上旬开工，于12月下旬竣工，历时4个月。图为施工的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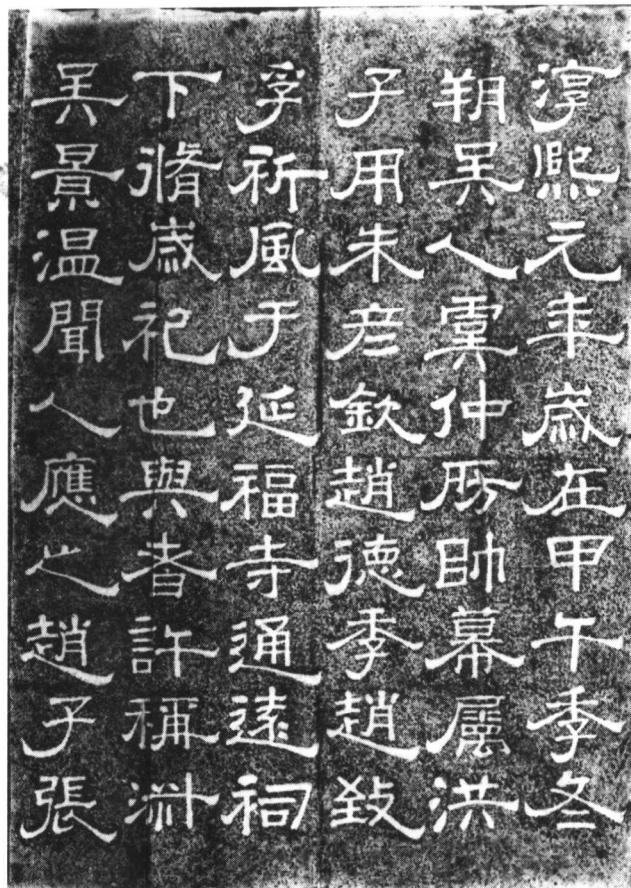
G 2 淳熙元年虞仲房等祈风石刻

西峰。南宋淳熙元年(公元1174年)虞仲房等祈风摩崖石刻高148厘米、宽107厘米，字径17厘米。阴刻，隶书六行，行十字。石刻保存完好，亦是珍贵的书法作品。文云：

淳熙元年，岁在甲午季冬朔，吴人虞仲房，帅幕属洪子用、朱彦钦、赵德季、赵致孚，祈风于延福寺通远祠下，修岁祀也。与者，许称淑、吴景温、闻人应之、赵子张。

按，《福建通志·职官志·宋一》载，虞仲房，名似良，吴郡余杭人，淳熙元年任泉州提举市舶。《浙江通志》说他是黄岩人。又《书史会要》云：“似良号横溪，自称宝莲山人……官至监察左藏东库，善篆隶”。据李巽岩《说文五音韵谱后序》说：“余杭虞仲房，能为古文奇字，声溢东南，凡江浙匾榜与其他金石刻，多仲房笔然”（清陈檠仁《闽中金石略》卷四有转载）。楼钥《攻媿集》卷一，有《送虞仲房赴潼川漕》诗云：

向来郎曹天咫尺，引身闽山接商舶。贾胡叹仰清节高，雾中望见越王石。
因知虞仲房是当时一位比较廉明的市舶司使。



G 2 淳熙元年虞仲房等祈风石刻拓片

G 3 淳熙十年司马伋等祈风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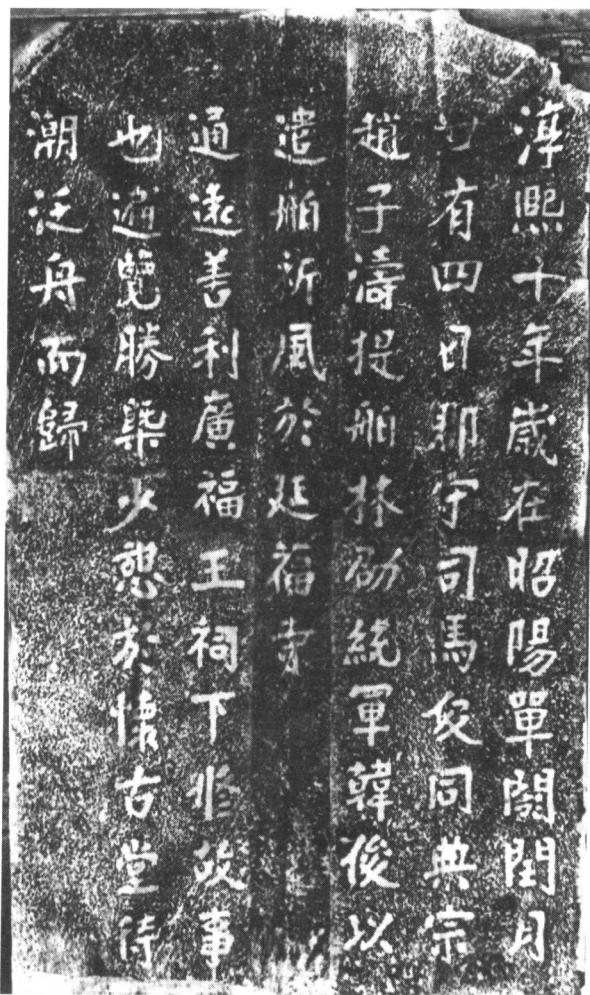
西峰。南宋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司马伋等祈风摩崖石刻高260厘米、宽149厘米,字径15厘米。阴刻,正书七行,行十二字。石刻风化严重,石面有裂缝,但字迹尚清楚。文云:

淳熙十年,岁在昭阳单阏闰月廿有四日,郡守司马伋同典宗赵子涛、提舶林劭、统军韩俊,以遣舶祈风于延福寺通远善利广福王祠下,修故事也。遍览胜概,少憩于怀古堂,待潮泛舟而归。

按,司马伋,字季思,夏县人。淳熙九年,以宝文阁侍制,起知泉州。陆游《渭南集》云:“南渡后,以温公无后,以其族人伋为温公曾孙。”《宋史·司马光传》云:“建炎八年,录曾孙伋,补承务郎。”^①

赵子涛,时知南外宗正司。

^① 建炎只有四年,此处的“建炎八年”时间有误。



G 3 淳熙十年司马伋等祈风石刻拓片

林劭(《福建通志》和《泉州府志》均误作“邵”),时任泉州提举市舶司。

韩俊,开封人,宋孝宗亲擢为统制,取军有良将风。

九日山下,延福寺左侧,原有通远王庙一幢,横额勒“昭惠庙”三字。作者少时,尚及见之。庙中祀海神通远王。后因太守蔡襄奏请,加封为通远、善利、顺济、广福王。从这几个词看来,它们都与宋代泉州的海外交通有关。《泉州府志·坛庙寺观》及《南安县志·舆地·九日山》等均记载:“陈益,其先东汉人。宋熙宁,西夏之警,诏求勇敢士。郡守辟益为巡辖官。元丰间,从守祈风南安延福神远殿,睹庙貌森严,显灵奇异,舍身为佐,遂植杖立化,僧泥躯奉之。淳祐中封仁福王。宣和二年,提举张祐陞辞朝廷,颁御香诣殿焚之。”从此以后,凡出入国的大舶小舸,当发航以前,都争趋庙宇中祈安,然后启碇。遂群奉为海神,称通远王神。元代遂为天妃海神所代替。

宋泉州知州王十朋有《善利王庙诗》:“有德于人庙貌崇,我来端为谢年丰;曰暘曰雨皆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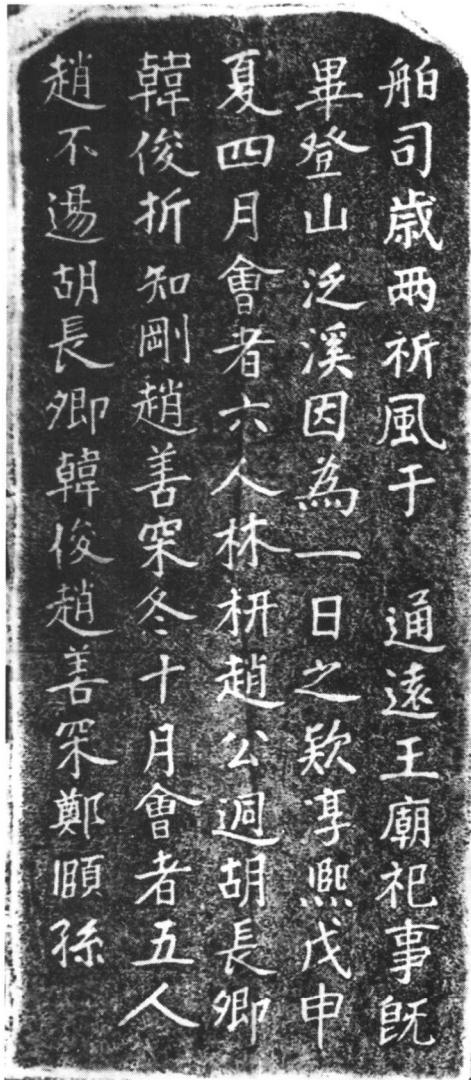
力,不止南风与北风。”

宋真德秀做泉州太守时,不但曾在九日山主持祈风典礼,也曾在泉州通淮门外海滨法石村的真武殿(今仍存),主持祭海神真武大帝。九日山祭文有《海神通远王灵著王祝文》:“庶几万舶安行,群生嘉赖。某之所以图报于神者,其敢弗虔”(见《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五十)。

至今,泉州、南安民间,仍在传说当时航海家往庙中祈求航海船货平安的热闹盛况。因此,庙中香火曾盛极一时云。信奉海神,虽然是一种在封建时代的迷信行为,但它的的确确是古代泉州劳动人民航海生活的现实反映。

摩崖石刻的“昭阳单阙”,古代癸为“昭阳”,卯为“单阙”。癸卯,即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

G 4 淳熙十五年林枅等祈风石刻



G 4 淳熙十五年林枅等祈风石刻拓片

东峰。南宋淳熙十五年(戊申,公元1188年)林枅等祈风摩崖石刻高185厘米、宽78厘米,字径10厘米。阴刻,正书五行,行十五字。石刻风化严重,且石面有裂缝三处。文云:

舶司岁两祈风于通远王庙,祀事既毕,登山泛溪,因为一日之款。淳熙戊申夏四月,会者六人,林枅、赵公迥、胡长卿、韩俊、折知刚、赵善采。冬十月,会者五人,赵不遏、胡长卿、韩俊、赵善采、郑颐孙。

按,林枅,字子方,莆田人。登绍兴二十一年进士,补闽县主簿。淳熙十二年,除直秘阁为福建转运判官兼知泉州。“以清德律贪,除诸邑无名科敛。讼牒盈庭,剖决不滞,一时豪强敛迹。莆(田)泉(州)密迩,亲故不敢干以私。后帅闽,卒,民立祠以祀。”^①

赵公迥,字仲和,晋江人,时知南外宗正司事。

胡长卿,时任泉州提举市舶。

韩俊,河南开封人。《泉州府志·名宦一》载:“沉鸷有谋,淳熙中……孝宗亲擢为统制。临遣谕以久任在军二十四年,拊御训齐,有古良将风。”时任泉州左翼军统制。

折知刚,淳熙间任泉州通判。

赵善采,名不见志书记载,他可能是宋宗室成员。

此石刻记事,是九日山摩崖石刻中最有代表性的一段,也是山中仅有的一段记述福建提举市舶司,在一年中为海舶举行两次祈风典礼的摩崖石刻。它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宋人的祈风是必须按照季节来举行的。因为古时的船舶都是帆船,航行必须依赖风力。大约蕃舶自南海启碇,必须俟每年农历四、五、六月间,发西南季风之时,如本石刻“淳熙戊申夏四月”的记载。反之,由泉港发航往南海诸国者,则须候至每年农历十、十一、十二月间,发东北风之时,如本石刻“冬十月”的记载。

因此,每年的农历四、五、六月和农历十、十一、十二月,这几个月中间,都是航行南海的蕃舶最活动的时候。如果商舶到了南海之后,不可能很快地结束贸易活动,以致耽误了夏季的季候风之时令,那就必须停留在南海。一直要等候到第二年的夏季,才能启航返国。这样的事,在当时就叫“住蕃”,或叫做“压冬”。一般地说,进行一次海外贸易,就需要有一年以上的时间停留在南海。

G 5 嘉泰元年倪思等祈风石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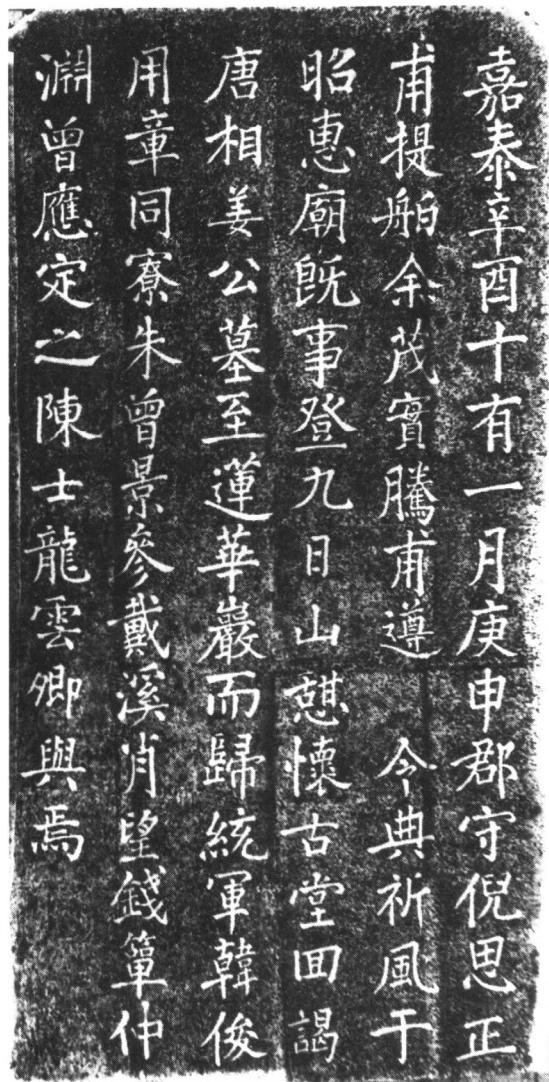
东峰。南宋嘉泰元年(辛酉,公元1201年)倪思等祈风摩崖石刻高196厘米、宽100厘米,字径10厘米。阴刻,正书六行,行十五字。石刻保存良好。文云:

嘉泰辛酉,十有一月庚申,郡守倪思正甫,提舶余茂实腾甫,遵令典祈风于昭惠庙。既事,登九日山,憩怀古堂,回谒唐相姜公墓,至莲华岩而归。统军韩俊用章,同寮朱曾景参、戴溪肖望、钱筭仲渊、曾应定之、陈士龙云卿与焉。

按,倪思,字正甫,归安人。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知泉州。新学校,修城郭,浚河渠,造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九,名宦一,宋,知州。

桥梁，葺候馆，立养济院，百废俱兴。史书称其屡触权臣，三黜不变。真德秀将守泉州，贻书问政，思告以“毋崇宴觴，毋艳琛货，民以安静，俗以俭化”^①。思歿有年，德秀为祠而祀之，曰：“泉之旧守，得祠者众矣。有岁久而废者，有能今存焉者……而于其中有三人焉，不求祠而民祠之，曰忠惠蔡公、忠文王公，而公其继也。”^②



G 5 嘉泰元年倪思等祈风石刻拓片

在有宋一代，曾任泉州太守，其政绩至今为泉州人民所怀念并建祠以纪念他们的，只有蔡襄、王十朋、倪思、真德秀和邹应龙等五人而已。其中蔡襄倡建洛阳桥，邹应龙倡建顺济桥，工

①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集》卷二十五，《重建太守倪公祠记》。

② 同①。

程都异常艰巨。真德秀和王十朋，则在泉州勤农业，兴水利，发展海外交通，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有较大的贡献。《泉州府志·名宦一》记载真德秀“嘉定十年，知泉州，时番舶懼苛征，至者岁无三四。德秀至郡，首宽之，遂岁增三十六艘”。可见真德秀对发展海外交通是做过贡献的。在封建统治阶级中，以上几个郡守都是比较廉明的官吏。《宋史》也有他的传记。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庆元中，通判泉州。与郡太守信安刘颖共同编撰《清源志》七卷。

余茂实，名见《泉州府志·文职官上·提举市舶》及泉州北门外瑞象岩西壁倪思诗跋题刻。

韩俊（见“淳熙戊申林枅等祈风题名石刻”）。

朱曾，时通判泉州。

钱筭，时任节度推官。

曾应、陈士龙二人之名，不见记载。

本段石刻，《闽中金石略》虽曾收入，但是漏脱甚多。

G 6 嘉定十六年章株等祈风石刻

在西峰摩崖上。南宋嘉定十六年（癸未，公元1223年）章株等祈风摩崖石刻高251厘米、宽136厘米，字径8厘米。阴刻，正书八行，行二十二字。石刻风化严重，有几个字字迹模糊。文云：

嘉定癸未孟夏二十六日戊戌，东阳章株敬则，寿春魏□叔子，山西杨世勋元功，三山林力行勉之，郡人留元圭持中，括苍何处德常之，合□陈亿曼卿，蒲阳王彦广居之，清漳郑名卿坤辅，句水戚达先兼叔，嘉禾陆相同甫，蒲阳黄筌德言，即墨于达卿兼仲，天台应基子履，开封赵汝□千里，三山赵与官清叟，三山南璿士登，以祈风于昭惠祠下，因会于延福，登山瞻石佛，访隐君亭，少憩怀古而归。期而不至，浚仪赵善解载卿，蒲阳刘辉叔元览。

按，章株，字敬则，东阳人。登淳熙十一年（公元1184年）进士。嘉定间，知泉州军州事（《闽中金石略》误章株为“章持”）。时州多舶货，“株与知州真德秀毫发不染。二人去州之日，番商拥道攀送，以大炮柱于州治之门，香闻阖府，相与涕泣而祝之”（见《福建通志·名宦·宋一》）。

林力行，嘉定间通判军州事。

留元圭，字持中，晋江人。为留正之孙，明何乔远《闽书》有传。但《闽书》和《泉州府志》误其字持中为“粹中”。据石刻所记，可以改正志书上的错误。父鑑，使金，以门功荫授承奉郎，主管南外睦宗院。时典笺奏礼文，悉其所裁定。知建安县，卒于官（见《泉州府志》卷三十八，封荫，以及卷四十六，循绩）。

王彦广，莆田人，登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进士。嘉定间知南安县令（见《闽书》）。

郑名卿与王彦广，系同年进士（见《闽书·选举志》）。

赵与官，燕王德昭裔（见《宋史·宗室世系表》）。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以宗子正奏。嘉定十六年宰惠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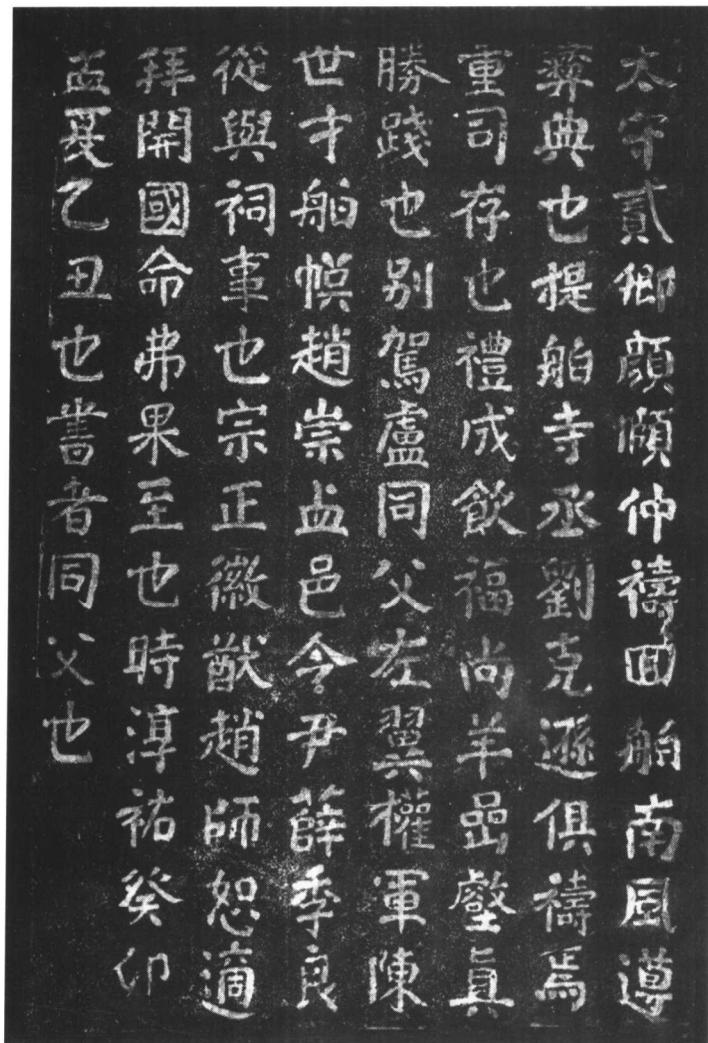
G 6 嘉定十六年章棟等祈風石刻拓片

赵善輒，时知南外宗正司事。

刘辉叔，字元览，莆田人。时任安溪县丞。《泉州府志·文职官下·县丞》有列其名。宋安溪县丞名表中，虽列其名，但不写其籍贯。可能他是因事来泉州，泉州官吏邀他共同参加祈风典礼的。

G 7 淳祐三年颜颐仲等祈风石刻

石刻位于西峰摩崖上。南宋淳祐三年(癸卯，公元1243年)颜颐仲等祈风摩崖石刻高220厘米、宽150厘米，字径15厘米。阴刻，正书八行，行十三字。石刻风化严重，裂缝颇多，但字迹还很清楚。文云：



G 7 淳祐三年颜颐仲等祈风石刻拓片

大守貳卿顏頤仲，禱回舶南風，遵彝典也。提舶寺丞劉克遜俱禱焉，重司存也。禮成飲福。尚羊岩壑，真勝踐也。別駕盧同父，左翼權軍陳世才，舶幕趙崇益，邑令尹薛季良從與祠事也。宗正徽猷趙師恕，適拜開國命，弗果至也。時淳祐癸卯孟夏乙丑也。書者同父也。

按，颜颐仲，字景正，龙溪人，漳浦郡侯宣奉大夫颜师鲁之孙。师鲁字已圣，登绍兴间进士，以龙图阁直学士再知泉州，凡三年……始至，即蠲舶货，诸商胡贾，尤服其清。颐仲以祖荫补官，历宁化尉，西安丞知县事（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九《颜师鲁传》）。委转运干办公事，迁通判临安府。端平元年，出知岩州。时钱楮中半之，令初行，吏民震怒。颐仲曰：“郡入纯用楮，而责民以现镪，是其所无也”。忤旨获戾。二年，入为司郎丞，摄金部官，除直秘阁两浙转运判

官。嘉熙元年，除广西转运判官。首奏乞罢海外琼崖儋耳四州盐本钱及二十五州身丁钱云：“丁钱始于五季，每丁十文，既而加倍至于十倍、百倍。米亦如之。远民以有身有事为累，窜于蛮徭族，逸为盗贼，实官吏驱使之然。乞并蠲免，皆报可”。四年，以直宝谟阁，知宁国府。淳祐改元，除浙东提刑，起知泉州，以秘阁修撰兼福建提刑。二年，起知泉州。去日，民攀卧塞途。四年，起知温州。明年，迁右文殿，知广元府沿海制置使，悉蠲细民沙岸罢桃花、定海官渡钱。浚六十里渠及慈溪定海港堰。六年，升集英殿。七年，除宝章阁侍制。因岁饥，遣舶百余艘往广州收籴，仍奏乞常平二万余石以赈之，全活四、五万。十二年，以刑部侍郎召，言：“臣历闽浙被水之郡，建、剑、衢、严，愿更加赈恤”（见乾隆二十七年，杨景素《龙溪县志》卷十五，颜颐仲传及《后村大全集》）。

刘克逊，字无竞，号西墅，为刘克庄之弟。以父任，补承务郎，监海口镇，调沙县丞，升古田令。未几，出知潮州，寻除提举福建市舶。在其任内，“严禁官吏向番商强买。明谕番商，番商闻风并集，舶计骤增”（见《福建通志·列传·宋十一》）。擢知泉州。因知刘克逊也是当时一个较廉洁的官吏。福州鼓山有宋嘉定己卯年，刘克逊题瑞岩过来桥石刻（见《闽中金石志》卷十）。

赵崇岳，为太宗子，简王裔（见《宋史·宗室世系表》）。

薛季良，字传叟，兴化人。时宰南安。著有诗文集《千林漫稿》。

赵师恕，太祖子，燕王裔。时知南外宗正司（见《宋史·宗室世系表》）。

卢同父，嘉熙间，任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见《泉州府志》卷二十六，宋职官表上）。

石刻上有“遵彝典也”句，应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祈风是“遵照外国人的典例”去举行的意思，因为我国古时只有祈雨之俗，向无祷风之制。因此，他们说九日山这些祈风石刻，是宋代泉州地方的高级官吏，为尊重当时来泉州进行国际贸易的外国商人的风俗习惯，和外商共同祈风的记事。他们的根据是：古人的“彝”字与“夷”字相通用，例如《诗经·大雅》：“民之秉彝”亦作“民之秉夷”。又如《古文精言》有：“民之秉彝”。《孟子·告子上》则作“民之秉夷”。又《难蜀父老》有：“彝狄殊俗之国”（见《古文精言》）。但《文选》皆作“夷狄殊俗之国”。又如汉赵佗，在《报文帝改帝号书》有“蛮彝大长，老夫臣佗”。但《中国名人大字典》则作“蛮夷大长”。唐韩愈的《原道》有：“诸侯用彝礼则彝之，彝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见《古文精言》）。但《古文观止》皆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外，福建的武夷山，亦作武彝山等等。以上诸例，都是彝典就是所谓“遵照外国的典制”的辩解理由。

以上他们所举事例，乍一看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之影响所及，最近学者多赞成此说。他们认为：“九日山的祈风，也就是祈求番舶回帆的顺风。而为什么有这一祈风的习惯呢？九日山祈风石刻明白地指出，是‘遵彝典也’。可见这是尊重亚、非各国商人来泉州所带来的风俗，宋代地方官把它当为‘彝典’，在九日山举行祈风活动”。^①他们的这种意见，乍一看来，也似乎言之有故，持之成理。但倘若进一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问题决非如此简单，值得进一步探讨。这里我提出个人对九日山宋人祈风石刻上所见的“彝典”问题的几点不同看法，以就正于

^① 见《泉州港古迹研究》一文，载于《考古学专题》，第86页，“九日山在旧泉州的历史地位”，庄为玑、叶文程著，厦门大学考古民族学教研室印。

国内专家及史学界的同仁。

(一) 从中国历来的士大夫阶层说,他们多具有不同程度的大国主义观点,他们狂妄自大地轻视外国人,诬称他们为“蛮夷”。单就这点看,则宋代泉州地方的最高统治者,决不可能自己说他们的祈风活动是为着遵照,或者说是仿照“蛮夷”的典制来举行祈风祭神的。

(二) 我国文字中的彝字,除作为彝器解外,一般都作为“常”字用。如常典、常制等。所以把“彝”和“夷”混用者,是因为古人以彝字与夷字的发音相同,而夷字的笔画较简单,故有时用夷字代替彝字。

至于用夷字来作为“东方蛮夷”解释,是到了清朝才开始有的。因为清代皇室,他们本身就是“东夷”。明朝人每称他们为“建夷”或“辽夷”。清人入关统治中国以后,曾有一个相当的时期,非常忌讳夷字,曾正式下过命令,将夷字一律改为彝字。文人每于有意或无意中,误将夷字直书不讳者,均遭严厉处分。例如清乾隆二十年,江西人胡中藻案中,乾隆皇帝于宣布胡中藻所谓罪状时,即有“眼下训平夷”一条罪状。这可以为证。

有的人认为,《谕巴蜀檄》、宋本《史记》、《汉书》(均见百衲本)都作“蛮夷自擅”。韩愈的《原道》,在宋世经堂本及东雅仿宋刻本都作“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见四部备要本)。他们所举的这些书名及字例,可能都是清代的版本。所以每逢夷字,都被改为彝字。这样,宋代泉州的地方官吏,无需,亦不可能避讳夷字,已如上言。至于《孟子》作“民之秉彝”,阮元校本《十三经注疏》皆作“民之秉彝”。但古版本亦均作“秉彝”者,就是因为笔画较简单,而且字音相同的缘故。

(三) 如果我们参看九日山上的其他宋代祈风石刻,则可发现主持祈风者所记述的,说祈风是“遵故事也”、“修岁祀也”、“遵令典也”等。由此看,则“遵彝典”,解释为“遵照常典”自较为恰当。

(四) 从泉州地理形势及宋代政府向人民剥削的税收上看,泉州港的祈风也有其重要意义。因为古代帆船,主要是靠风力,按照季节驾驶的,没有顺利的风,航船时间就要愆期。特别是泉州一港,“兼每岁自八月以后,至六月以前,如风信不顺,即无贩蒞及海南回舶到岸”。^①可知在封建制度下,神权极盛的时代,泉州港的祈风,似较当时国内其他港湾更为重要。其次,宋代,特别是南宋初(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政府的总税收年最高达一千万缗,而市舶收益竟占二百万缗,达到总税收的五分之一。南宋曾两任泉州的名太守真西山,有“祈风文”一篇,写道:

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番舶也。舶之至,时与不时者,风也。而能使风之从律而不愆期者,神也。是以国有典祀,俾守土之臣,一岁而再祷焉……俾波涛晏清,舳舻安行,顺风扬帆,一日千里,毕至而无梗焉。是则吏与民之大愿也。谨顿首以请。^②

于此益见,在宋一代,特别是南宋,泉州地方官吏之为番舶举行祈风典礼,已被列为国家重要祀典之一了。换句话说,泉州地方官吏之所以要每年往九日山,去举行祈风祭神活动,除了上述意义之外,就是根据国家的“彝典”(即常典)去为番舶祈风的。

^① 见《宋会要稿》职官,市舶司项。

^②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五十,《祈风文》。

(五)如果说泉州地方官吏,每年要邀同番商到九日山上参加祈风,则照常理说,应该在石刻上要有外商首脑的名字才对,但我们读遍九日山东、西两峰有关祈风的石刻十段,参加祈风祭神及宴会活动的人员,从他们的姓名及籍贯考之,他们全是中国官吏,没有发现任何一方刻有外国商人名字的石刻。这证明所谓“邀集外国商人,共同举行祈风”是没有根据的。

这样看来,则九日山上祈风石刻中的“彝典”应作常典,而不应作“外典”解释。不过此项例行祀典直至南宋覆亡的前夜,已被地方官吏视为游山玩水,并举行野餐的例行事务了。证以咸淳丙寅,赵希咤、王茂悦等祈风石刻,有“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这便是最好的说明。

G 8 淳祐七年赵师耕祈风石刻



G 8 淳祐七年赵师耕祈风石刻拓片

石刻位于西峰摩崖。南宋淳祐七年(丁未,公元1247年)赵师耕祈风摩崖石刻高174厘米、宽77厘米,字径13厘米。阴刻,正书三行,行八字。石刻保存完好。文云:

淳祐丁未仲冬二十有一日,古汴赵师耕以郡兼舶祈风遂游。

按,据本段石刻所记,赵师耕做泉州知州兼领提举市舶司,系在淳祐丁未(淳祐七年,公元1247年),但《泉州府志·文职官上》误刊为淳熙七年(公元1180年)。从时间上说,相差几达七十年之久。这段石刻的记载,可以改正地方志书的谬误。此外,石刻上的淳祐的“祐”字作“祐”和祈风的“祈”字作“禱”,均以“宀”旁作“彑”旁,可能是古体字或为笔讹,尚不可知。

查泉州市舶司,始立于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在立司以前,凡对外贸易事务,都为郡太守所兼领。元丰间,归转运司兼管。但从市舶司设立以后,对外贸易事务全归市舶司专管,太守少再干预。及绍兴二年,又改为知州兼领。不久,又归提举茶盐司兼管。例如张读撰《泉州重建州学记》碑文中,其题额者为赵奇,衔勒云:“左朝请郎提举福建路茶事常平等公事兼市舶”。又碑文第一句是“清源郡学,以绍兴丁巳闰十月甲申重建”,“绍兴丁巳”为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这说明绍兴七年,市舶司的职务还是由茶盐司兼领。但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又归市舶司专管。这里,赵师耕又“以郡兼舶”,证明在这个时候,又改由知州兼领市舶了。这样看来,恢复市舶司,以专门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大约是在绍兴七年以后,后再改以郡太守兼管市舶,是在端平(公元1234~1236年)以后的事。证以西峰摩崖石刻“宝祐戊午(六年,公元1258年)四月辛卯,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一语,使我们知道,从端平以后的二十五年中,对外贸易还是以郡太守职而兼市舶司的事务。一直到南宋末期的咸淳二年,又有“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祷风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赵希咤安宅,提举继事眉山王楠茂悦”(见西峰摩崖咸淳丙寅祈风石刻)。因知度宗咸淳(公元1265年)以前,泉州的市舶司又恢复了。可能就是因为市舶司的设立,经常和郡太守兼领交替进行,所以志书没有详细的记载。但就九日山上的祈风石刻题名记事看,也可以知道当时交替的大略情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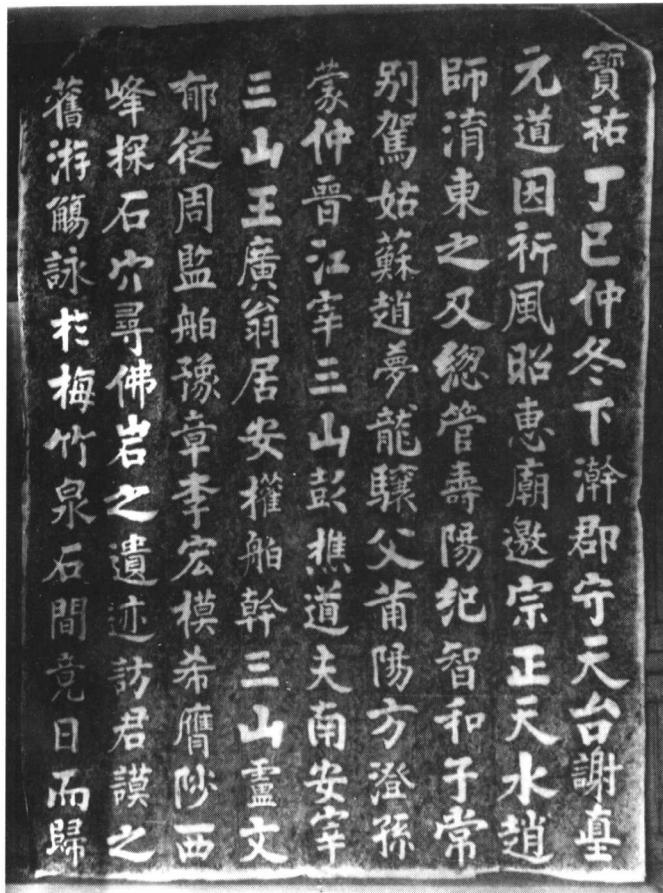
G9 宝祐五年谢埴等祈风石刻

西峰。南宋宝祐五年(丁巳,公元1257年)仲冬谢埴等祈风摩崖石刻高290厘米、宽200厘米,字径19厘米。阴刻,正书九行,行十四字。石刻有三四处裂缝,其余保存完好。文云:

宝祐丁巳仲冬下浣,郡守天台谢埴元道,因祈风昭惠庙,邀宗正天水赵师渭东之,及总管寿阳纪智和子常,别驾姑苏赵梦龙襄父,莆阳方澄孙蒙仲,晋江宰三山彭樵道夫,南安宰三山王广翁居安,权舶斡三山卢文郁从周,监舶豫章李宏模希膺,陟西峰,探石穴,寻佛岩之遗迹,访君摸之旧游,觞咏于梅竹泉石间,竟日而归。

按,谢埴,名见《宋史》及《福建通志·职官·宋二》。宝祐四年,任泉州知州(见《泉州府志·文职官上》)。

方澄孙,字蒙仲,《泉州府志·名宦传》误为“方蒙仲,字澄孙”。又《泉州府志·文职官·通判名表》中有“方蒙仲”和“方澄孙”二人名字。一说是莆田人,淳熙间任;一说是莆田人,淳祐间任,摄守兼舶。竟误将一人分为两个人。实际上,方澄孙是字蒙仲,“莆田人,淳祐七年进士,由国子监出为泉州通判,摄郡守篆,兼司(市)舶。剔除蠹弊,黥籍舞文之吏不得逞。终秘



G 9 宝祐五年谢埴等祈风石刻拓片

书丞。所著有《通鑑表微洞斋集》(见《闽书》及《泉州府志·名宦一》)。《福建通志·名宦传》亦见方澄孙之名,其误亦和《泉州府志》相同。此石刻的发现,可以改正志书上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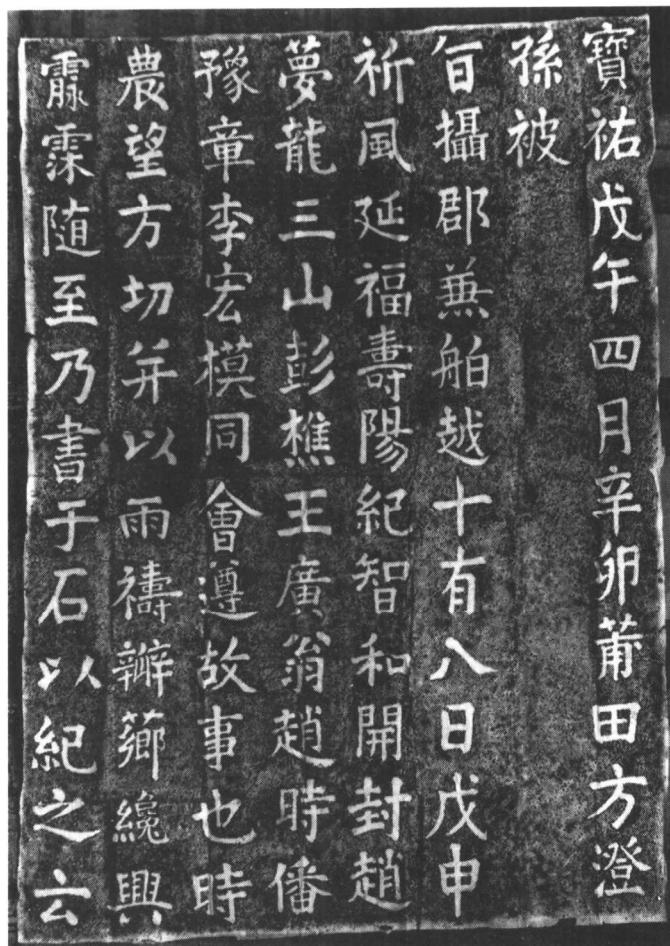
王广翁,福州人,其时任南安县令。

其他如宗正赵师清,总管纪智和,别驾赵梦龙,县令彭樵,监舶务李宏模等人之名,均不见于省、郡、县的记载。可见地方志书缺漏是相当严重的。

关于总管的官职。查宋大观元年,始置总管的官职,以知州兼领。《文献通考》云:马步军都总管,以节度使充之,副总管则以观察以下充之。有止管一州者,有管数州者,有兼管两路至三路者,或以文臣知州,管勾军马事。绍兴二年,始罢郡守带兵职。后又诏两浙、江南、福建、广东,得依三路各置总管。

G 10 宝祐六年方澄孙等祈风石刻

石刻在西峰摩崖上。南宋宝祐六年(戊午,公元1258年)方澄孙等祈风摩崖石刻高237厘米、宽166厘米,字径15厘米。阴刻,正书八行,行十二字。石刻裂缝很多,风化厉害。文云:



G 10 宝祐六年方澄孙等祈风石刻拓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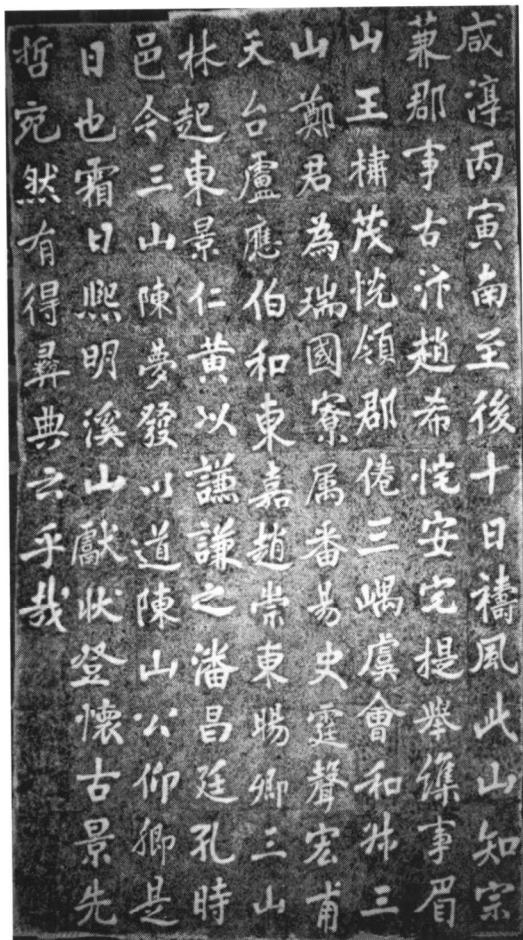
宝祐戊午四月辛卯，莆田方澄孙，被旨摄郡兼舶，越十有八日戊申，祈风延福。寿阳纪智和，开封赵梦龙，三山彭樵、王广翁、赵时僕，豫章李宏模同会，遵故事也。时农望方切，并以雨祷，瓣蕘才兴，霖霖随至，乃书于石，以纪之云。

按，石刻所列知州及参加祈风典礼的官吏，多与宝祐五年谢埴等祈风石刻同。

G 11 咸淳二年赵希咤等祈风石刻

石刻位于西峰摩崖高处。南宋咸淳二年(丙寅，公元1266年)赵希咤等祈风摩崖石刻高300厘米、宽177厘米，字径17厘米。阴刻，行书九行，行十五字。石刻保存完好。文云：

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祷风此山。知宗兼郡事古汴赵希咤安宅，提举继事眉山王櫨茂悦，领郡倦三嵎虞会和叔，三山郑君为瑞国，寮属番易史霆声宏甫，天台卢应伯和，东嘉赵崇东旸卿，三山林起东景仁，黄以谦谦之，潘昌廷孔时，邑令三山陈梦发以道，陈山公仰卿。是日也，霜日熙明，溪山献状。登怀古，景先哲，宛然有得，彝典云乎哉。



G 11 咸淳二年赵希咤等祈风石刻拓片

按,《泉州府志·文职官上》,于宋提举市舶司职官名表中,从北宋元丰间起至南宋淳祐间止,列举历任福建泉州提举市舶使官名,计有徐确至张理等八十四人,其中不见王茂悦的名字。明高岐著《福建市舶提举司志》于宋市舶司提举职名表中,亦仅列至南宋宝祐间为止。《八闽通志》中所举亦然。《新修福建通志》则从徐确起,至德祐间蒲寿庚及林逵,计九十一人,亦未见有王茂悦名字。

从宝祐(公元1253~1258年)以后,历任福建市舶使的职名表都付诸空白。因此,曾任泉州提举市舶使的王茂悦之名就被漏掉了。元初,周密所著的《癸辛什识》卷上,有关于王茂悦的记事如下:

林乔,泉州人,寓信州。得罪押回本贯,与蒲舶交,借地作屋。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林受其白金(白银)八百锭,许为之言。既而王罢去,蒲并攻之,且夺其所借地。

这就是说,当王茂悦做泉州提举市舶使的任内,有一个名叫蒲八官人的官员,因犯了海外

贸易船舶漏税的罪过，而林乔由蒲八官人身上受取白金八百锭，面许要代向市舶使王茂悦身上进行贿赂。日本人桑原骘藏著，冯攸译《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第四章，考证七，蒲八官人条（1929年商务版，第161~162页），曾引用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所记王茂悦事说：

不可仅凭《癸辛杂识》之一记事（况其解释颇觉暧昧不明），而即轻率否定《宋史》之说。况如《重纂福建通志》、《八闽通志》卷三十、《福建提举市舶司志》等书中，皆未见市舶使王茂悦之名。准是以观，则以上所引用《癸辛杂识》之本文，或因句读错误，而应改为：“王茂悦，为舶使蒲八官人者，漏舶事发”者乎？若然，则市舶使当为蒲八官人矣。既曰官人，必有相当之身份。既曰蒲舶，必与市舶有关。要之，认蒲八官人为市舶使，固无不可也。据《宋史》所记，则蒲寿庚自西历1245(6)年至1275年，任泉州市舶使约三十年间。若1265(6)年之泉州市舶使为蒲八官人，则吾人不得不认定蒲八官人与蒲寿庚，必为同一人也。

说明确些，就是桑原氏认为，当时在泉州任市舶使的是蒲八官人，蒲八官人者谁？就是蒲寿庚，而不是王茂悦。这样说，似乎王茂悦在宋咸淳初年，未曾存在过的样子。他的理由是如果当时任泉州市舶使的是王茂悦，则与历任泉州提举市舶司亘三十年的蒲寿庚，从时间上说，是有冲突的。桑氏这些考证，未免太武断了一些，也缺乏根据。近人刘铭恕先生认为，桑原氏对王茂悦的考证，其所以会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桑原氏未能细心通读《癸辛什识别集》的缘故^①。我很同意刘先生的看法。

考“王楠，字茂悦，号会溪。初知彬州，就除福建提举市舶，其归也，为螺钿卓面屏风十副，图贾相（贾似道）盛事十项，各系之以赞以献之”（见《癸辛什识别集》卷下，钿屏十事）。

观此，则王茂悦之任泉州市舶使，自不待今天九日山摩崖上王茂悦题名石刻的被发现，就已经可以肯定了。更何况石刻中王茂悦的题字明显地说：“咸淳丙寅，南至后十日，祷风此山。”这就使我们更明确地知道，王茂悦之任泉州市舶的时间，是在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而蒲寿庚之任泉州提举市舶使，是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两者相差整十年。明何乔远著《闽书》卷一百五十二，其中有关于蒲寿庚平定海盗，以功授闽广招抚使，总诸蕃海舶的事说：

蒲寿庚，其先西域人。总诸番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歲，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以上《闽书》所记，应怎么理解它呢？我认为《闽书》的这段记载是说，蒲寿庚，他的先祖是西域人，而居住在广州，专任和海外诸国互市的事务。到了寿庚的父亲蒲开宗的时候，才移徙泉州。至咸淳末年，才和他的兄弟蒲寿歲合击海寇，有了功劳，累官至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一直至端宗景炎二年，宋政府就授给蒲寿庚以福建、广东招抚使，并总管海外通商船舶的官职。假如这样理解没有错误，则《宋史·瀛国公本纪》所记：“是（益王）欲入泉州，招抚（使）蒲寿庚有异志。初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这里所指的“初”，很可能是蒲寿庚的先祖“初居广州，总诸番互市”的时代。如果结合《新修福建通志》所载：“咸淳十年，海寇犯泉州境，西域人提举市舶蒲寿歲、寿庚兄弟击退之”。从这一段记载来看，就更可以知道

^① 刘铭恕《泉州宗教石刻三跋》，《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蒲寿庚兄弟在泉州击退海寇的时间，是在南宋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而他始任“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的时间，是在景炎二年（公元1277年）。至于王茂悦之任泉州市舶使，则已早在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从时间上看，两者并没有所谓的“冲突”，这是很明显的事。据此，则决不能因为《宋史》说：“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擅番舶利者三十年”，遽认为这段记事与《癸辛什识》所载相冲突，进而否定王茂悦曾任泉州市舶使和蒲寿庚管领泉州市舶的年代，最后作出不正确的结论：“蒲八官人就是蒲寿庚”。实际上，王茂悦是一个谄事贾似道的无耻贪污官僚，也是权臣贾似道的党羽。他和当时主谋策划其弟蒲寿庚叛宋降元的蒲寿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心泉学诗稿》卷二有《上市舶监丞王会溪》诗一首（王茂悦号会溪）。又有舶使王会溪，郡太守赵见泰的《九日（山）领客枉顾山中》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韵十首。这足见他们两人关系之密切了。

此外，于咸淳二年，参加泉州市舶使王茂悦祈风的官僚，还有同时代任泉州太守的宋宗室赵希咤，和当时做南安县令的陈梦发等十多人，他们的姓名都见于同时代的地方志书中。所以我们凭什么理由去否认王茂悦任泉州提举市舶使的年代呢？上面引用过，近人刘铭恕先生对桑原氏考证的评语说，他的考证之所以错误，是由于“未能细心通读《癸辛什识别集》的缘故。”其实桑原氏在考证的同时，也未能细心通读明何乔远《闽书》卷一百五十二《泉志》的记载，所以他在引用时仅用：

蒲寿庚，其先西域人……寿庚少豪侠无赖。咸淳末与其兄寿峩平海寇有功，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景炎元年，授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

这里，桑原氏把《泉志》中“总诸番互市，居广州，至寿庚父开宗，徙于泉”等重要语句视为无足轻重，把它疏漏掉了，而代之以省略号。我认为，桑原氏所忽略的，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这就使得他会错误地认为，蒲寿庚本人的任泉州市舶亘三十年之久，其时间包括度宗咸淳的整个年代（公元1265～1274年）。这就难怪他会硬把蒲八官人当为蒲寿庚。这么一来，王茂悦的任泉州提举市舶司一事，很自然地就被错误地否定掉了。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一种机构名称。提举，是管理的意思。市舶使，则为官职的名称。这就是说，在市舶司中设市舶使，以管理对外交通贸易事务，或叫提举舶事。从形式上说，它略同于今天的海关。

本段石刻题字，不写“提举舶事”，而写“提举缵事”。“缵”音即入切，读为“曠”，“蛮夷货名也”^①。这就是说“提举缵事”，是管理外国进口货物的意思。因知“提举舶事”与“提举缵事”其涵义相同，一样是管理从外国由海舶运载来我国的货物，以及与此有关的事务的意思。

综观九日山上有关宋代泉州地方官僚为蕃舶举行祈风的摩崖石刻，从时间上说，以王茂悦的祈风题名石刻为最晚的一段。咸淳以后，即不再见，它也许是宋一代泉州市舶使为蕃舶举行祈风典礼中最后一次了。推测其原因，可能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当时元兵已经节节南下，樊城、襄阳次第陷落。宋都城临安已有朝不保暮之势。祈风典礼，就在无形之中停止了。这是很自然的事。

^① 《康熙字典》未集中，系部。1920年，上海昌文书局石印。

(二) 元人统一中国后,虽仍在泉州设置市舶提举司,且曾大力提倡对外交通贸易。因此,元代泉州港的海外交通贸易,其繁盛程度遂远超宋代,成为当时世界最大国际贸易商港之一。但终元之世,未见再有为蕃舶祈风之举,这可能是因为元帝国建立后,对外贸易政策已有所改变。同时,元人已经统一中国,国家经济自不像偏安于东南一隅的南宋那么拮据,以至于如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百二十《海外诸蕃》所载“(宋)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和宋泉州太守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云“本州窃见南风正时……而福建提舶司正仰蕃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那样的困乏窘境吧?

(三) 此外,元人的风俗习惯与宋人截然不同,可能也是元代不再为蕃舶举行祈风的原因之一。

(四) 元代在泉州路的达鲁花赤,除最后一任的契玉立比较有汉文学素养外,其他可能都不大懂汉字。市舶提举之任命,又大多以色目人充之。甚至路总管亦多用色目人。至于以汉人任提举或总管者,无一知名之士。汉文学更非他们所擅长,所以即使曾有祈风之举,亦不可能有题刻遗留后世。

(五) 当时的色目人,大多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这也决定他们不可能学中国礼制去拜中国的神像。

以上所说,仅是推测而已。是否如此,尚有待于专家指正。

赵希咤,于南宋度宗咸淳二年,任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兼郡太守职。但《泉州府志》宋名宦及文职官名表中,皆不列其名。南外宗正司知宗正司事的职名表中,亦不载其名,而只在《泉州府志·学校》载有:“咸淳中,(泉州府学)殿毁,守赵希咤重建。”同志、同卷接着又引“洪天锡记”云:“岁冬十月辛巳(考南宋度宗咸淳共十年,即公元1265~1274年,其中无‘辛巳’年,可能‘辛巳’为‘己巳’之误),泉州大成殿火,宗正行守事赵侯希咤,以兵救正,故得不毁。”这里地志所载,恰好与本摩崖石刻题名记事及赵希咤的任职时间、官衔、官职相吻合。

二、天妃的崇拜

天妃,清代封天后,俗称妈祖。据《泉州府志》载,泉州“天后宫,在府治南门内,宋庆元间建”。又引隆庆《泉州府志》记载云:

神居莆阳之湄洲屿,都巡检愿之季女也。生有祥光异香,资慧颖悟,能知休咎。长能乘席渡海,常乘云游于岛屿,人呼曰神女,又曰龙女,以其变化尤著于江海中也。宋太祖雍熙四年九月二十九日昇化,是后常朱衣翩旋飞行水上,累著灵验。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泉州浯浦海潮庵僧觉全,梦神命作宫,乃推里人徐世昌倡建。实当笋江巽水二流之汇,番舶客航聚集之地。时罗城尚在镇南桥内,而是宫适临浯浦之上。自是水旱盗贼,有祷辄应,历代遣官斋香诣庙致祭。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以出使西洋太监郑和奏,令福建守镇官重新其庙。自是节遣内官及给事中行人等官,出使琉球、暹逻、爪哇、满刺加等国,率以祭告祈祷为常。

泉州宗教石刻

《泉州府志》又引明嘉靖间郡人顾珀《重修天妃宫碑记》云：

吾泉有灵济天妃宫，创自宋庆元间，奠于郡城之南，浯江横其前，三台拥其后，左法石，右紫帽，亦郡中形胜地也。国朝永乐十三年，少监张谦使渤泥，得平州，发自浯江，实杖神麻。归奏于朝，鼎新之……宫实郡城诸水会归之处，盖堪舆家所谓水口关系非轻。遂捐己资，协以众募，令予概董其役……珀承乏太常时，伏读成祖文皇帝御制碑文，若日仰惟。皇考太祖高皇帝，肇域四海，际天所覆，极地所载，咸入服章，怀来神人，幽明循职。朕承鸿基，罔敢或怠，恒遣使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尊以礼义，变其夷习。其初使者回奏，涉海浩渺，风雨晦明，洪涛巨波，惊心骇目。乃有神人飘飘云际，以妥以侑，旋有红光飞来舟中，已而烟消霾霁，风恬浪息，张皇荡舡，倏忽千里。咸曰此天妃之神也。显示灵应，朕嘉乃绩，特加封号，建庙龙江之上。《礼记》所谓有天下者，祭百神之意也。则今日神之祀，不为蹈宫之修，不为移文之刻，不为诬视。彼欲图形胜而庐其居者，不亦惑乎，是为记”。^①

以上《泉州府志》的一段引文，写明泉州天妃崇拜的由来，泉州天妃宫创建的原因和创建的时间，以及天妃神明的灵验与护航国家使节郑和的事迹。而顾珀《重修天妃宫碑记》，除记建宫时间外，也记天妃护国家使节航海的事，并特别论述明成祖朱棣为南京龙江天妃宫御制碑文之事。可见，明代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员，都重视崇奉天妃的，并以天妃神明的灵验为他们所谓“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尊以礼义，变其夷习”的好大喜功、自以为是的目的服务。

宋代，泉州的天妃信仰也很盛行。绍定年间（公元 1228~1232 年），真德秀第二次守泉州，海盗自南而北劫掠海船。其时，“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而福建提举司正仰番船及海南船之来，以供国课，今为贼船所梗，实切利害”^②。为此，知州真德秀向天妃陈述祈请的目的，是“凡航海之人，赖以为司命，是用有谒焉”；或“况航海之人，仰恃以为司命，是用抵遣官僚，敬伸忱祷”^③。

嘉定十一年（公元 1218 年），真德秀第一次守泉州，海盗自江洲南下，剽掠海上。为此，真德秀向九日山通远王神陈述“鲸波浩渺，实为危道，非神力助顺，岂能必济”，于是“乞灵于大神，伏唯挤狂寇于立败之途，导王师以必胜之机，一网尽获，庶几万舶安行，群生嘉赖”^④。

从宋代泉州知州真德秀，既崇拜天妃，又崇拜通远王海神的事实，表明宋代通远王和天妃的崇拜是同时存在的。只是，对通远王的崇拜列为国家常典，而对天妃的崇拜尚未列入国家常典。元朝，情况突变，惟海神天妃屡受朝廷赐封号，其他海神则默默无闻。于是，有元一代，惟天妃海神独秀。明初，因海上贸易需要和永乐、宣德间的郑和七次下西洋等需要，对天妃的崇拜又被推上一个新的高峰。明清时期，天妃的崇拜随移民东渡台湾，如鹿港天后宫就是从泉州分灵去的。

据《泉州府志》载，康熙十九年平定台湾，神涌潮济师，敕封护国庇民妙灵昭应宏仁普济天妃。二十三年，封天后。五十九年，特予春秋致祭。……国朝将军施琅征海，师次于此，神有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十六，坛庙寺观，天后宫。

②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十五，《申尚书省乞措置收捕海盗》。

③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五十，《圣妃宫祝文》。

④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五十，《海神通远王灵著王祝文》。

助顺功。康熙二十四年，遣礼部郎中雅虎致祭。由上则知，天妃女海神为古代航海者所创造，又给航海者以无穷的力量。其迅速传播又是与历朝统治者因需要而褒封分不开的。

最后，交代天妃女神的来源。据绍兴二十年（公元1150年）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载，“墩上之神，有尊而严者曰王，有晰而少者曰郎，不知始自何代；独为女神人壮者尤灵，世传通天神女也。姓林氏，湄洲人。初，以巫祝为事，能知祸福，既歿，众立庙于本屿。”又云“岁水旱则祷之，疫疠祟降则祷之，海寇盘亘则祷之，其应如响。故商舶尤借以指南，得吉卜而济，虽怒涛汹涌，舟亦无恙。”^①这是已知的最早的崇拜天妃的碑记。

廖鹏飞，生卒年未详，福建仙游人。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特奏名进士。

G 12 泉州南门清《重修天后宫碑记》



G 12

^① 蒋维锬编校《妈祖文献资料》，一，宋廖鹏飞《圣墩祖庙重建顺济庙记》。199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

泉州宗教石刻

石碑系白花岗岩雕成，竖于天后宫拜庭东侧。碑文内容，道光《晋江县志》卷十六，祠庙志，天后庙条录有全文。

三、保生大帝的崇拜

保生大帝，又称大道公，原名吴本(tāo)，系北宋初名中医。据《泉州府志》记，生于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业医济人。无贵贱，按病受药，如矢破的，或吸气嘘水以饮，虽奇疾沉疴立愈。景祐年间(公元1034~1038年)卒，知者肖像供奉……乃创祠祀之。水旱疾疫，款谒如响，部使者以庙额请，赐名慈济。”^①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漳州人尚书颜师鲁“奏请立庙”。泉州人宰相梁克家，“以庙额为请”于朝，赐额“慈济”。于是“北逮莆阳、长乐、建剑，南被汀、潮，以至二广，举知尊事。”^②明清时期，保生大帝崇拜随移民东渡台湾。泉州最早的慈济庙，俗称花桥宫，在旧南罗城外。据宋代杨志《慈济宫碑》云，乾道间进士许衍创建泉州慈济宫^③。闽南三大慈济宫，是厦门青礁慈济宫、漳州白礁慈济宫和泉州花桥慈济宫，均建于宋代。

嘉定、绍定间两知泉州的真德秀，对泉州慈济庙的祀典“著为定例，一岁两祠于神”，即“春之有祈”，“岁事告登……报祝以时”^④。他在《慈济庙》祝文中云：循古之祀典制度，凡神能“捍患御灾，有功于民，始在祀典”。神之生也，广施慈善之医技，妙起死回生之术。神既升飞天上，灵响益著。“此邦之民，不幸有疾，求救于神者，如子之憩其亲，神亦随其所苦，救而疗之，如亲之爱其子。呜乎！其可谓捍患御灾，有功于民者已矣。……仰唯英灵，监此诚恳，俾民无疾痛之苦……”。^⑤知州的祝文，充分表现了老百姓的愿望和精神寄托与封建统治者的君权“受命于天，以作神主”的理学思想，通过祀典的形式统一起来。于是，祀典愈隆重，则政权与神的结合愈紧，加上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心理状态，是故宋代泉州民间信仰特盛。

四、关帝的崇拜

泉州关帝庙在郡城内东南通淮街，俗称通淮关帝庙。据万历《泉州府志》云，“关王庙在郡城通淮街北，郡人奉之特盛”^⑥。万历间，明神宗封关帝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泉州文人李光缙作《前将军汉寿亭侯庙记》，碑文云：“其在吾泉建宫，毋虑百数，独吾儒林里中庙貌为胜。询之故老，不知创所由始。相沿至今，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荐绅学士，红女婴孺，亡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⑦李光缙又作《塑三义像记》，碑文云：“郡故有汉寿亭侯庙，灵响特异，士民奉之甚恪……相议塑刘先主、关寿亭侯、张西乡侯，附诸葛武侯祀于其中堂……表汉时共事之雅，开泉人未有之祀，观者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五，方外，仙道。

② 乾隆《海澄县志》卷二十二，艺文志，记，庄夏《慈济宫碑》。

③ 同注②，杨志《慈济宫碑》。

④⑤ 真德秀《真西山文集》卷四十八《慈济庙祝文》。

⑥ 万历《泉州府志》卷二十四，杂志，寺观宫庙类。

⑦ 李光缙《景璧集》卷八，碑记。

如堵。”^①迨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又增祀岳飞,故称通淮关岳庙。清代,泉州通淮关帝庙分灵台湾,如台南武庙为最早分灵去的庙宇。

关羽、岳飞是忠义的化身。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需要树立典范,让臣民效忠不二。又因为统治者的民族、地域和历史背景不同,他们对关羽、岳飞的崇拜就有所取舍了。如元朝只尊关羽;明初只尊岳飞,明中期又尊关羽;清顺治皇帝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而不宣扬岳飞;北洋军阀政府则下令关帝、岳飞并祀。

关羽又是儒、道、释三家共祀的神明。洛阳关林祀关羽的大殿有对联云:“汉封侯宋封王明封大帝”,“释称佛儒称圣道称天尊”。对联以二十个字高度概括关羽历史上受追封的儒、道、释争祀的事实。现今,泉州关帝信仰的社会功能,已转化为以商业为主的多功能神明了。

五、王爷的崇拜

王爷,原为闽南民间对瘟神的称呼,又称王爷公、大人、王公、千岁等。有的学者认为王爷崇拜是原始社会的精灵崇拜衍化而来的,但实际又不如此。泉州民间有传说,说王爷有三百六十姓,他们是明初遇难的三百六十位进士;但也有人传说是三十六姓。说法不一,也没有根据。泉州地区王爷崇拜的特点,是一般王爷只有姓没有名字,而且还配以夫人妈,且夫人妈也是有姓无名。每座王爷宫供奉的王爷也不一样。如有“三王府”、“五王府”、“七王府”,它们都没有固定的姓。这类王爷宫,遍布泉州城、镇、乡村和港口、渡头,可以说无处不在。每位王爷都有诞辰日,是日热闹非凡。甚至,有的王爷神就是当地的挡境神,即保护一个铺、境的神。从这个角度看,王爷神又不是瘟神,而是保护之神了。

说王爷崇拜是原始精灵崇拜的延续,根据也不足。在泉州众多王爷的神团里,也不乏有姓、有名的王爷。如开闽王王审知,被称为“王公”,享受立庙奉祀,还配以夫人妈。又如宋代泉州知州蔡襄、真德秀,在鲤城和晋江两地,都奉为王爷。更有甚者,泉州城南门晋江边的富美渡头,有一座王爷宫称富美宫,据传宫为明代创建,主祀西汉著名儒臣萧望之。萧望之因遭汉元帝宠信的宦官弘恭、石显等的陷害,被迫饮鸩自杀。因萧望之是忠臣,位居太子太傅,遗诏辅政。是故富美宫主祀萧阿爷(即萧王爷),而陪祀数十位各姓王爷。这是惟一的特例,所以富美宫又被称为王爷总馆。

富美宫每年端午节有放王爷船的习俗。据《泉州府志·风俗》记,每年农历五月,“是月无定日,里社禳灾。先日延道设醮,至期以纸为大舟及五方瘟神,凡百器用皆备陈,鼓乐、仪仗、百戏送水,次焚之。近竟有以木舟具真器,用以浮于海者”^②。木船之大,可以载百担,船上置王爷神像或三位、或五位、或七位,均通过卜筮,由萧王爷派出,把船驾于海上,然后弃船返回,让“王爷船”随海流漂泊。故乾隆以降,台湾西海岸有多处发现泉郡富美宫的王爷船靠岸,居民以为幸事,立即建宫奉祀船上带来的王爷神像。有的甚至把王爷船保护下来,至今犹存。

^① 李光緝《景璧集》卷八,碑记。1996年4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存崇祯版。

^② 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风俗,岁时。

放王爷船也成为萧王爷信仰的传播途径之一。可见随王爷船送出的王爷神并非瘟神。

如今，泉州地区的王爷宫庙，除主祀王爷神像外，亦多数陪祀其他神明，如观音、土地公、关羽、岳飞，或其他不知名的神明，可以说儒、道、释济济一堂矣。

G 13 凤山《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碑

碑高 95 厘米、宽 45 厘米。页岩雕成。原嵌于泉州东门外凤山忠义庙左侧壁上。庙系绍兴年间(公元 1131~1162 年)张汝锡所创建。据碑记云，庙原为道教庙，祀三清五帝、岱岳诸神，又设天坛和地祇祠，祠祀地祇诸神，如炳灵王、赵元帅与两列十王，“皆降魔遗像也”。以后又增祀文天祥、继增祀岳飞、陆秀夫，又继之增祀关羽、张巡、许远，即所谓“有宋忠神，何可遗汉唐神也”。明万历十三年(公元 1640 年)，又增祀张世杰、颜真卿。碑记告诉我们，南宋初的祀三清五帝的道教庙，是如何发展到万历间成为祀忠君神明的神庙的。这是泉州民间信仰发展历史的最好说明，亦为我们留下泉州民间信仰发展的历史轨迹。

其次，据碑记所云，原南宋有“三清五帝、岱岳诸宝殿。前为天坛，坛之下东为地祇天神”，一列皆道教之祀。而迨至明万历年间，则变成地祇庙“前路乃观音堂，左张檀越祠、右翼忠堂，为地祇斋祝之所”。这表明自宋至明，地祇庙不但祀神改变，庙的组成结构改变，甚至佛教观音也被请进来，实际上已经儒、道、释济济一堂了。

附录：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碑

第一山重修地祇忠义庙记

泉号佛国，兼崇道教。玄妙观、紫泽宫，向与紫宫、月台二寺相颉颃。玄风日远，宫观湮然，独第一山蕊宫阙宇，迄今尚存。考之志乘，宋绍兴有金紫光禄大夫张公讳汝锡者，弹击秦桧不中，避地入泉，修玄于此山。是山自舟峰、狮山而来，耸起凤山，左右岩峦，拱青环翠，大夫乐之，曰：是大素紫宸之居也。贻书以其一子一婿，载宝南来，大兴三清五帝、岱岳诸宝殿。前为天坛，坛之下东为地祇天神。地祇，天地位矣。惟是祇中诸像皆列古蹇。王臣何闻之，五岳四渎脉络之相贯也，精神之相系也。坤维也，间生忠臣烈士。金百炼而愈坚也，水百折而愈东也，维□之砥柱也。有会此意者，首貌文信公一像特祀焉。精忠贯日月，大义震乾坤。真有宋一人也，则有继之以岳、陆者，左陆右岳，地道尚右也。又有继之以关、张、许者。有宋忠神，何可遗汉唐神也。位置先后，职一故乎？想之义胆忠肝，聚精神于一堂之上；护国庇民，奠金汤于万山之左；维我温陵，河山巩固，护此在天之灵。其他建置、沿革，则自宋张檀越，而后我嘉靖庚戌，三见册封。君檀越而前，上下数百年，泣事杳冥，存而不论可也。嘉靖庚戌，至今又百年矣。栋宇倾颓，过者邈然。老庙祝丛竖小木支撑以待。己卯岁，观察林希庵先生自浙中归，以是秋登第一山，肃揖地祇，四顾彷徨。庙祝以告，且以兴复为请。先生慨然曰：是予之责也夫，是予之责也夫。盖先生夙崇奉祇神，朔望虔临，伏腊不辍冠形，梦寐应惟影响，此善信所为，一肩不辞乎。遂卜筮诹吉，捐俸鸠工，募助继之。经始于崇祯庚辰元朔。

满百日百废俱新。是日也，炤从先生谒庙，仰视榱桷，俯视几筵，云蔚霞蒸，燕雀落



G 13

成。国人转颠祠下者如堵墙，喜可知。已予昔蒙先生一日知，既自岩栖，达颜十祀，一旦叩荜门而下访也。以是役纪岁月见委，炤逊谢再三，谊不获辞。于是彰往事镜近因，为笔数行如左。其笔之未尽者。

秦桧没，家人迎大夫归。临行倾赀置餉，田二百亩，以充第一山道供。今地祇尚存，十一亩余田皆狞佃隐匿，尚可清查供香火也。庙先有神炳灵王，今为立其主。若夫神座之右三眼赵元帅与两列十王，皆古供降魔遗像也。祏外有张越公世杰一主，万历庚子，小子炤所增也。宋幼主南狩，越公帅师顿泉城九十日，必欲得蒲寿庚而甘心焉。事虽不济，心甚肃之。颜鲁公一主，则林先生所增也。文文山公倾心鲁公，有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诗凡百余言，先生意出于此。祇之界址，前路乃观音堂。左张檀祠，右翼忠堂，为地祇斋祝之所。后轩三檀像在焉，祇夹其中，不键而固矣。用志惟是。此举也，先生引为己责，绅衿感而乐助。工简而华藻，施事毁而巩固。完弁左右，檀祠岁久颓墍，亦议一葺续新之。国人德先生议建颂祠。先生退然，曰：协众力以共，□新举也。乌乎！颂不檀不像，功成而不居。老氏曰：夫惟不居是以不玄。先生宦迹所到，皆一路福星随车，甘雨入越，为水宪岳路使者。去岁有海上金□之捷，两塙交跋于朝，天子方倚为干城。先生适罹阴阳患，休□归□与合。郡道宗暨炤等，考德问业于笋堤之上，先生谒正学而张之鹤，有体有用，宦业忍乎艾也。炤也三秀腐儒，一经迁变，惟一念□□颇见信。乡有道者，岁辛未，郡文山里有□祠祀，合郡贞烈，百氏其中，世远垂圮，张万户□产独力修建，亦向炤徵数言，勒石墙东。嗟乎！忠臣烈女国之纲雄。炤何修忝此银笔而后乎，愧矣！

林先生讳徽，初字调，复希庵，其别号也。衰朽则同安布衣李□、黄子文炤也。崇祯庚辰中和节日记。

第八部分 纪功、贞节牌坊及其他

古代泉州的官员纪功石牌坊和妇女的贞节旌表牌坊很多。

在郡治所在地的泉州城，牌坊几乎遍布各条街道。仅东街及出东门通省城福州的大道上，就曾排列着近二百座各式各样的纪功、贞节牌坊（见图 H1、H2），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叹为观止。那些仕进官员为自己树牌坊，记载受“恩荣”而“劳绩懋著”的累官过程。这些牌坊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众多的贞节牌坊组成一部记载封建礼教吸吮妇女血泪，摧残妇女人性的石头之书，但它保存了古代社会的历史信息，同样是历史文化古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惜这些牌坊已破坏殆尽，留下的几幅旧照片为已消逝了的“文明”提供给我们一种独特的或者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古地方志书皆设置“列女”卷，各县有符合贞节旌表条件者，均须逐级上报，把事迹按条件分别编入县、府、州、省志。乾隆《泉州府志》在“列女”卷前的序言里自誉：“泉为礼义之邦，妇人威仪屏绝交游，而节烈之事代不胜书，其风教然也。”^①府志又引《大清会典》云，“康熙六年（公元 1667 年），议准民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节至五十岁以后完全节操者，照例旌表。又雍正元年（公元 1723 年），议准节妇年逾四十而身故，计其守节已历十五载以上者，亦一体旌表”。可见清代封建礼教的代表——封建政权之极力推崇妇女贞节。

据乾隆《泉州府志》的统计，宋、元、明三代受旌表而传记收入府志的有二百零七人。其中宋六人、元四人。而清代，截止雍正年间，受旌表载入府志的贞节妇女有一千一百九十二人。外加宋、元、明、清受旌表的“贞烈”一百八十六人。即宋、元、明、清受旌表的贞节和贞烈，合计一千五百八十五人。其数量确实可骇。至于那些不入志书的贞节、贞烈，那就是海边的沙粒了，谁也说不清多少了。现今，我们从石牌坊照片上看到“节坚金石”（图 H2）的旌表赞语时，又该作何感想呢？

此外，本部分又收集一幅灵山圣墓的旧照片，但因涉及佛教，故归入“其他”部分，目的在于存史。本部分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元朝一位大使的墓碑，分不清属伊斯兰教或者属基督教，但与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和文化交往关系密切，故置于此。

H 1 东门外古道上的石牌坊

这张照片摄于 1930 年。第一座石牌坊是官员的纪功牌坊。分三层，底层是浮雕横梁，上承托人物画像的石雕（双面雕刻）；第二层横梁，上承托劳绩和累官职衔石牌；第三层中间悬挂“圣旨”、“恩荣”透雕牌匾。整座牌坊有十二根柱子，是较大型的官宦石牌坊。其后，各种牌坊排列如林。

① 乾隆《泉州府志》卷六十六，列女。



H 1

H 2 东门外古道上的石牌坊

照片摄于 1930 年。第一座石牌坊的横额上阴刻“节坚金石”四个大字，则知是一座贞节牌坊。



H 2

H 3 东门外清初透雕大石牌坊

照片摄于 1930 年。这是一座属仕进官员的“恩荣”大牌坊。牌坊作三重檐翘角样式，雕饰华丽。横梁浮雕龙的图案，雀替为透雕飞龙。横梁上是浮雕双面人物故事画像。人物故事上一列文字，是记载受“恩荣”官员的功绩和累官过程。第二层为透雕人物故事，两面人物面相各不相同，雕技精湛。透雕上的横额刻“劳绩懋著”几个大字；两旁各有一座阁楼式建筑，立柱皆浮雕花鸟图案，构思新颖，栩栩如生。阁楼的围栏的栏板亦采用透雕工艺。阁楼配以拱式横梁，空间显得宽敞。第三层立柱皆浮雕花鸟图案。屋檐正中有一对仿木倒垂莲花柱，与立柱间各有一个拱形透雕石刻连接。牌坊顶脊两端有一对翘尾倒竖鲤鱼形鸱尾。三层正中是透雕牌匾，上刻“玉旨”、“恩荣”。整座石牌坊有十二根立柱，通高 11 米左右，气势宏伟，结构精致，采用白花岗岩和辉绿岩为材料，是一座古代精美的石雕艺术品。可惜的是这座石牌坊未能保存至今。



H 3

H 4 开元寺门口的石牌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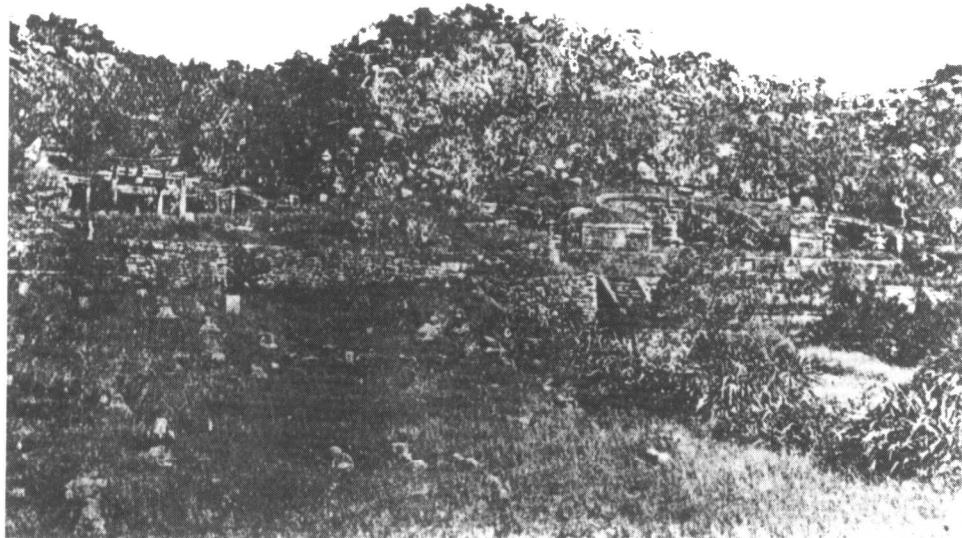
这是一座三层的纪功石牌坊，由德国学者艾克(G. Eg)于 1930 年拍摄，并于 1935 年收入



H 4

艾克和戴密微合著《刺桐双塔》一书里。石牌坊地处泉州西街开元寺山门门口西侧。牌坊作三层，一层石雕武士像和鲤鱼；二层雕刻狮子；三层顶，正脊中间竖立一个葫芦形饰物，两端作鲤鱼形鸱尾。

H 5 东郊灵山圣墓和明代僧人墓



H 5

照片上是 20 世纪初泉州灵山圣墓和僧人墓地的情况。灵山圣墓建于宋代，僧人墓建于明代，历史上两教和睦相处。

左边圣墓的墓亭已塌落，但木架依然高高耸起。这是迄今见到最早的灵山圣墓照片。照片右侧是明代创建的僧人墓。后方挡土墙作马蹄形，前方有三座小型佛塔。以后僧人墓遭破坏，今又恢复。灵山圣墓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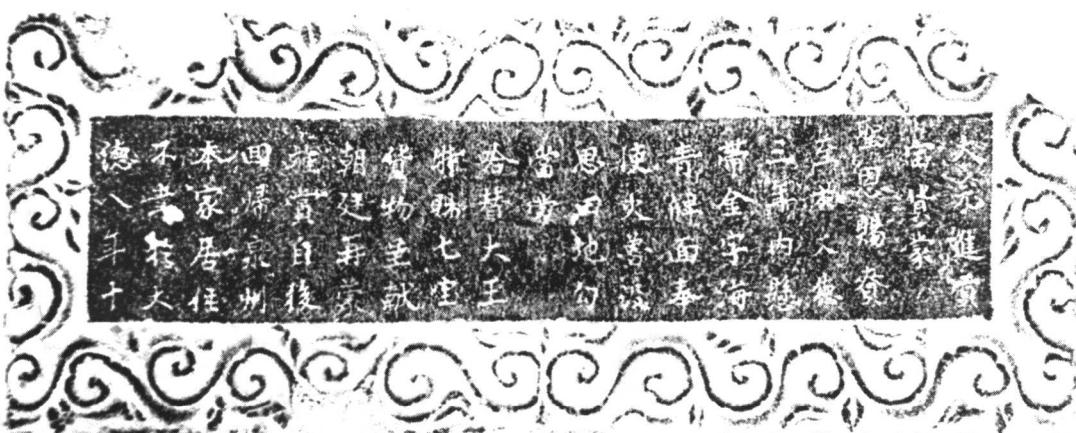
H 6 元代奉使波斯使者的墓碑

碑作长方形，高 25.5 厘米、长 65.5 厘米。辉绿岩石雕成。四周刻连续传枝花纹图案。此石是须弥座祭坛式石墓上的构件。1953 年，在泉州南较场掘获。碑中刻汉字十九行：

大元进贡宝货蒙圣恩赐，至于大德三年内，悬带金字海青牌面，奉使火鲁没思田地勾当，蒙哈赞大王特赐七宝货物，呈献朝廷，再蒙旌赏。自后回归泉州本家居住，不幸



H 6



H 6 拓片

于大德八年十……

查碑中的火鲁没思，就是波斯湾的 Hormuz，这个地方《明史》叫做忽鲁谟斯。哈赞，很可能就是当时的波斯王合赞(Ghazan)。我们在《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找到如下的一段记载，根据《印度史》(Elliot, History of India. vol III p. 45~47)公元14世纪初，窝萨夫(Wassaf)书中所记云：

查摩尔对丁(Jamal ud Din)之子法克尔对丁(Fakhr ud Din admad)氏，于西元一千二百九十七年，曾以波斯易尔干(Ilkhan)合赞(Ghazan)汗使者之资格，由海路到中国，拜谒元之成宗，受赐贵族之女，因滞留中国凡数年。至一千三百零五年，复循海道归国。^①

元成宗大德三年，正是公元1297年，与碑上所记时间吻合。碑中说：“回归泉州本家居住”，我们认为这一个大使很可能不是泉州本地人，他或者是一个色目人，或至少是一个外国人同化于汉人的。因为在元代，民族压迫非常厉害，“南人”最被贱视，不可能做“大使”。

这方奉使波斯使节的墓碑上，可惜见不到使者的名字，从史籍上也无从查考。因此，有的学者想通过碑文“七宝货物”几个字来确定使节的宗教归属。他们认为“七宝货物”是基督教的礼品，但又说不出充分证据。我们从伊儿汗国史看，合赞王不可能以基督教礼仪接待元廷使节。自13世纪中叶，旭烈兀建立伊儿汗国后，此后阿哈八、台古塔尔、阿鲁浑诸王皆一时崇耶教，一时崇回教，因此政治不稳定。特别是接下来的盖喀图和贝杜，均借回教以争汗，结果被杀。合赞王执位之后，深知政治不稳定的原因，宣布恢复回教，且身奉之，以定国是。自此以后，伊儿汗国稳定为伊斯兰教国家。所以合赞王特赐元廷使者的“七宝货物”，不可能是基督教的礼品。

至于碑文中的“悬带金字海青牌面”的问题。据《马可·波罗行纪》载：“大汗畀以使命以后，又赐彼等以金牌。其上有文曰，使臣三人所过之地，必须供应其所需之物，如马匹及供保护的人役之类”。又注释云：“金牌发源于宋。蒙古皇帝时，凡使臣皆持有一种相类牌符，上勒发给牌符的君主之名称、使命之目的等事，命人服从，违者死罪。唯牌符之种类，以金牌为最高。”^②而《多桑蒙古史》有比较详细记载，“军中将校各授牌符，以辨其官阶之大小。百户银牌，重二十两(ounces)；千户镀金银牌，重量同；万户狮头金牌，重三十六两。牌上有文曰：‘奉天承运可汗钦命，违命者死’，余文特书执此牌符者之职分。统将之统大军者，金牌重五十两，狮头，绘日月形”。在注释中亦云，“外籍之要人亦持有牌符以代护照……此种牌符之使用，本于中国旧制，波斯之蒙古朝曾采用之。马可波罗之父尼可罗波罗，以及其叔马迪斡波罗，离波斯时，此国之成吉思汗系阿鲁浑(Argoun)曾以金牌赐之。牌长一肘、宽五姆指，重三四马克(marc)，牌文若曰：天佑大汗，其名永垂不朽，凡违命者死，并籍其家。后云，在阿鲁浑所辖诸国境内，应礼待此三使臣，依应其所需，并以护卫护送”^③。所谓“海青”，蒙古语意为迅疾之意。元朝在燕京至济南置海青驿凡八所，有要事则用之，可乘驿骑。所经之驿，亦以海青为名。

① 冯攸译，桑原骘藏著《唐宋元时代中西通商史》，本文二，考证二十八，马八国王子孛哈里。

② 冯承钧译、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上册，第八章《大汗以金牌赐波罗弟兄二人》。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③ 冯承钧译、多桑著《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四章，军队。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后记

海上丝绸之路是历史上联结东西方的重要通道,是一条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航道。泉州,在中古海上丝绸之路上是重要的一环,经国务院颁布,列为中国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20世纪50年代,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和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十分关注泉州海上丝绸之路遗迹、遗物的保护和研究。1957年,特邀家父吴文良赴北京编著《泉州宗教石刻》,予以出版。其后,家父以该书形成于匆促间,而进行增订,不幸遭遇“文革”而致身亡。1980年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的夏鼐先生,委托研究所的黄展岳研究员,邀请我到北京增订《泉州宗教石刻》,但遇种种原因而未能出版,而夏副院长于1985年仙逝。

本书经过数十年的曲折,如今有幸脱稿付梓。增订本与原书已有很大不同,依照宗教门类,本书分八大部分:一、古伊斯兰教(342图);二、古基督教(76图);三、古摩尼教(4图);四、古印度教(90图);五、古佛教(62图);六、古道教(5图);七、古民间信仰(13图);八、纪功、贞节牌坊及其他(6图)。包括照片、拓本和线图,全书共有图片975幅,同时有图片说明、文献资料和分析讨论,等等。总之,本书报告的宗教石刻数量大大增多了,宗教门类和研究范围扩大了,而且研究也进一步深入。本书通过泉州多元的宗教石刻,再现了中古泉州多元文化一幅幅生动的图画,保存了泉州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信息。

本书的出版得到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的积极倡议,又得到泉州市委、市政府的资助,还得到泉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课题经费的资助。泉州市委书记施永康、市长郑道溪、市人大主任薛祖亮、常务副市长何锦龙、副市长洪泽生等,都很关心和支持本书的出版。本书又得到蔡嘉源先生的大力协助。同行朋友如许在全、朱学群、陈健鹰、蔡湘江、黄秋润、黄天柱、李玉昆、陈鹏、林德民、谢志雄、蔡嘉佑、戴庆铭、吴仕博、谢长寿、陈桂炳、杨尚贤、许伟龙、黄金龙、成冬冬、刘志诚等诸位,都给予了帮助。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陈国强、郭志超教授也给予支持。在这里更要感谢为本书的出版而奔波呼吁数十年,并联系出版社的黄展岳先生,感谢他为本书写了感情丰富而纪实真切的《序言》。还要感谢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维卿研究员,为本书的古阿拉伯文字作释文和翻译。本书的英文提要由科学出版社孙莉女士翻译,并由林梅村教授和Tim Williams先生审校。黄文昆编审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苦的努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编著出版是大家共同劳动的成果。夏鼐副院长和家父为之奋斗多年而未问世的《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终于出版,定会令他们感到欣慰而含笑九泉。

《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将以无可置疑的史实向世人展示,宋元时期的泉州,曾是世界东方大港、世界宗教文化的辐射点,是东西方文化互动的楷模和海上丝绸之路多元一体文化的典范。本书的出版,将为泉州以“海上丝绸之路:泉州史迹”向联合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为“一种现存的或为一种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一种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

吴幼雄

2005年3月23日

Abstract

Quanzhou (Zaitun) 泉州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famous and important coastal ports of China since 12th century, 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Many foreigners were attracted to stay and live there, and numerous cultural remains have been discovered during the past years, especially stone inscriptions. The present book, based on the *Religious stone inscriptions in Quanzhou* published in 1950's, publishes new material on the inscriptions. It is divided into eight sections:

Section I Islamic inscriptions

Islamic burial inscriptions are the most numerous cultural relic in Quanzhou. Stone stele, with Arabic inscriptions of the founder's name and origin, have been discovered at many mosques in Quanzhou. In addition, inscriptions have been found from the qunbah mausoleums and various stone tombs, in the shape of Sumeru altars and sculpture bases. Persian scripts were occasionally found on these tombstones. Most of the tombstones are 8th century AH, although some are 7th century AH. The tombs occupants were mostly Persian, although some were from Yemen, Oman, Caspian, and Bukhara in Central Asia, and were nobles, merchants, sheikhs, artisans and slaves.

Section II Nazarene inscriptions

The ancient Christian stone tombs in Quanzhou take the same shape as the Islamic ones, but with variations in decorative designs, including crosses, angels, lotus, marquee and doves. The epitaphs are carved with inscriptions in Chinese, Mongolian Basba, Syriac, Turkic in Syriac, the Uighur script and other Central Asian dialects spelt in Syriac. Latin is also found in Catholic burial inscriptions. The most intriguing discovery is the co-existence of Islamic and Christian motifs on the same stone stele. The crescent and star Islamic motif was found on one side of the top stone of a Sumeru style burial, while the other side was carved with a Christian cross. The combined religious belief of the occupant was thus corroborated .

Section III Manichean inscriptions

A great number of Yuan Dynasty religious inscriptions have been discovered in the Manichean Straw Temple in Quanzhou. This section also includes the Yuan stone statue of the Manichean Buddha, Manichean cliff inscriptions, and the 1313 AD tombstone of a Si-menhu bishop,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religious issues of the Ming and Chin disciples in

Jiangnan areas”.

Section IV Hindu inscriptions

Numerous Hindu stone steles and figures have been found in the city of Quanzhou, including stone statues of gods Vishnu and Shiva. There is also a memorial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hiva Temple in 1281 AD. The construction materials of the Hindu temples are also illustrated in this section, including Indian-style pillars, stone capitals, pillar bases, doorframes, lions, bulls, centaurs and statues (of semi-bird and semi-beast creatures), as well as a Hellenistic Sphinx and stone capital. In addition, the section include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amous 15th century AD epitaph devoted to one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king of Sri Lanka, who died in Quanzhou.

Section V Buddhist inscriptions

This section includes stone statues of Buddha, pagodas, and pillars with Buddhist inscriptions (of Tang and post-Tang date), all discovered in Quanzhou and its environs. In particular, the Hundred Temples Stone Stele Inscription, by Yiheishimi of the Yuan dynasty, and the Zaitun double pagoda, of the Song dynasty, are explored.

Section VI Taoist inscriptions

This section includes the Lao-jun statue from the Taoist temple on Qingyuan mountain, the stone statues of the Xuanmiaoguan temple, the earliest Taoist temple in Quanzhou, and the famous brick statue *qilin* (imaginary winged beast) in the Chenghuang Temple of Quanzhou.

Section VII Sculptures of the local legendary deities

This section includes stone sculptures of local legendary deities, such as the Tongyuan King (a sea-god), Heavenly princess (a sea-goddess), Baoshengdadi (the Chinese Aesculapius), the loyal Guandi mammon, etc.

Section VIII Monuments

The last section concerns monuments erected for commending either the winner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women on their chastity. In addition, a stone stele of a Yuan envoy dispatched to Persia is also discussed.